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学术丛书之十八

曾国青铜器研究

张昌平　著

文物出版社

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学术丛书之十八

曾国青铜器研究

张昌平　著

文物出版社

北京·2009

封面设计　张希广
责任印制　王少华
责任编辑　黄　曲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曾国青铜器研究／张昌平著．—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7
ISBN 978-7-5010-2747-7

Ⅰ．曾…　Ⅱ．张…　Ⅲ．青铜器（考古）－研究－中国－战国时代　Ⅳ．K876.4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53242 号

曾国青铜器研究
张昌平　著
*
文　物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北京市东直门内北小街 2 号楼）
http: //www.wenwu.com
E-mail: web@wenwu.com
北京燕泰美术制版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787 × 1092　1/16　印张：29.25　插页：1
2009 年 7 月第 1 版　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10-2747-7　定价：148.00 元

周代诸侯国青铜器研究的力作
——读《曾国青铜器研究》

（代序）

前不久，已经调入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担任教授的张昌平博士告诉我，他的《曾国青铜器研究》一书即将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希望我给这本书写篇序。我一向以为，写序是那些德高望重的耆老和大师的专利，像我这样的还需下大力气才有望在某些方面有所成就的人，哪里有资格替别人长期苦心写成专著作序。前不久，一位年长我许多的朋友要我在他的书前面写点推介文字，犹豫好久，勉强答应写了篇《读后记》。这位朋友不由分说，将这篇《读后记》改成了序，还把我的一些带有批评色彩的读后感删去了。我虽然不太赞同，却也没办法，只好任由他处置。我给别人的著作写读后感，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就不仅写好的感觉，感觉不好的也喜欢一股脑地写出来，不大考虑别人的感受。读别人的书而加以品评，这是非常容易的事，如果真让评论者去写这样的书，未必能够写出来。正如宋代诗人杨大年《傀儡诗》所说："鲍老当筵笑郭郎，笑他舞袖太郎当。若教鲍老当筵舞，转更郎当舞袖长。"序跋一类文体，本来就有品评、推介和批评等形式，但对人家的作品评头论足，容易遭人物议，如果在序跋中批评的文字太多，在时下的中国恐怕更不招人喜欢。不过，如果一篇读后感只有叙述而无批评，这又不符合我的习惯。我将我的担心告诉昌平，昌平以为与其将序言写成个简单的推介，还不如写成一个有评有论的比较翔实的评议。这篇读了昌平大作后的读后感，就是在昌平鼓励之下写成的。

一

还是在2004年的夏天，当时已经是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的张昌平与我联系，说是要报考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博士，请我担任他的导师。我与昌平早在1984年就曾在山西曲沃县的天马·曲村遗址一起进行实习，那时他是本科生我是研究生，他在发掘M6210号墓时认真细致的态度就曾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昌平回到家乡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后，我们也一直有联系，他发表的关于商周时期青铜器研究和早期楚文化研究的文章，我都曾仔细读过，对他在青铜器形态和纹饰方面细致入微的分析非常赞赏。昌平来报考我的博士生，我有一种非常矛盾的心情，一方面他已经是一位很有研究能力的学者，又已经承担过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可以自带研究课题，无需我指导就可以完成博士学位论文，可以非常省心省力；另一方面，昌平那时已经是研究员了，而我当上教授也没有几年，自己又没有博士学位，原来就不曾打算当什么“博导”，担心浪得虚名，对他博士期间学术水平的提高没有多少帮助。几经犹豫之后，我还是当了这个名不副实的“博导”，昌平也成为我名下的第一个博士生。当时昌平自己制定的博士期间的学术规划有两个，其一是早期楚文化研究，其二就是曾国青铜器研究，我从研究条件的成熟度上建议他选后一个题目作为博士学位论文选题。他赞同我的建议，在博士课程完毕后，就转入了一度中断的曾国青铜器的研究。目前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就是昌平在他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修改补充完成的研究成果。如果从当初他开始收集和整理曾国青铜器资料算起，到现在这本书的出版，已经都十多个年头了，真正做到了俗话所说的“十年磨一剑”。

从事商周考古的同仁都知道，湖北汉东地区的曾国是至迟从两周之际就已立国，直到战国中期以后才最后灭国的国家，该国遗留下来的可以辨识的青铜器很多，其中包括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复杂多样的曾侯乙墓铜器群。将曾国铜器作为研究对象，对于认识东周铜器地域风格的形成，对于认识楚系铜器和楚文化形成过程中江汉诸国的作用，对于曾国历史的研究和曾、随之谜的解决，都有重要的作用。

曾国铜器数量很多，许多材料没有公布或公布信息不全面，昌平的研究是在全面收集、整理和刊布原始材料的基础上进行的。在撰写《曾国青铜器研究》这本研究专著之前，昌平就花了很长的时间去做资料收集和整理工作，所有传世和出土的可能与曾国有关的铜器，那些还没有发表或发表资料不全的铜器，他都亲自前往铜器收藏单位调查、记录、拍照和绘图，并在对这些铜器进行了国别分析和年代判断的基础上，首先完成了资料汇编《曾国青铜器》（已有文物出版社出版，2007 年）图录的初步编写工作，为论文的写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此基础上，昌平才着手系统观察、排比、分析这些曾国青铜器，对这些铜器发展变化、各时期铜器特征以及这些现象反映出的问题进行思考。在《曾国青铜器研究》的序论中，昌平这样概述自己的研究方法：“本项研究的基本方法，仍然是以考古学文化研究方法为基础，同时结合青铜器工艺研究、青铜器铭文等传统研究方法”。具体地说，“主要是在年代学框架建立的基础上，在纵向的研究上总结器形与纹饰的发展演变规律、总结由各个铜器群构成的青铜文化的发展方向。在横向研究上，进行文化特征的总结、器物群的组合研究、比较不同区域青铜文化因素的相互影响和交流。”这个研究方法虽然传统，但却很有效，正是运用了这个方法，昌平有

效地将曾国青铜器按照它们的发展演变序列排列起来，并结合这些青铜器的空间分布，从而通过不同时期曾国青铜器与所属的周文化、楚文化以及相关其他文化圈青铜器的比较分析，得出了有关曾国青铜器自身特征、文化地位及历史背景的若干重要的结论。

曾国是文献记载甚少的小国，曾国青铜器铭文又缺乏确切的纪年，只能通过器物形态、纹饰、铭文所透露的年代信息，然后通过与年代明确的其他大国青铜器和器物群的比较，来推定曾国铜器各个时期的相对年代。在这个推定年代的类比中，选取恰当的类比材料至关重要，如果用作类比青铜器本身年代就存在争议，由此推出的曾国青铜器的年代也会存在问题。昌平选择比较材料时非常谨慎，他在推定第一阶段（西周末期至春秋早期）各期青铜器的年代时，往往不用争议较大的虢国墓地诸铜器群作为相对年代对比的参照，而是选择周原一些年代下限不晚于西周灭亡的窖藏铜器群、西周晚期和春秋初期墓葬能够明确区分的北赵晋侯墓葬铜器群等作为第一阶段各期曾国青铜器的主要参照对象。他在推定第二阶段各期（即春秋中期至战国中期）曾国青铜器的年代时，对那些学术界认识有歧异的铜器群也都有专门的讨论，并在年代类比时首先选取那些有文献佐证的青铜器群，如文献记载年代下限不晚于前648年黄国灭亡的黄国晚期墓葬铜器群、墓主见于史籍记载年代肯定在春秋晚期偏早阶段的河南淅川县下寺M2铜器群等作为主要参照对象。正是基于这样审慎的类比材料的选择，再加上细致全面的类比事项，使得昌平对曾国青铜器的年代判断相当准确，且每个期别的年代变幅被控制在一个比较小的幅度内。这为通过曾国青铜器正确认识曾国的历史建立了一个刻度相对准确的年代标尺。

昌平大学本科是考古学专业，有扎实的考古学研究的基础；他又曾是美国国家美术馆和普林斯顿大学艺术与考古系的访问学者，受西方艺术史研究方法影响较深。这些，在昌平《曾国青铜器研究》一书中都有充分的反映。春秋早期前后的曾国青铜器，其风格与周文化系统其他国家的青铜器基本相同，而春秋中期以后的曾国青铜器，其风格又与楚文化青铜器基本相同，如果不做细致的分析，很难从中分辨出曾国青铜器的特点来。昌平从器物群的等级、器物种类、纹饰种类、铭文辞例的单一性，只选择某种一些器形和纹饰组合加以发展的延续性、分铸技术的多发性等方面，比较准确地提炼出了第一阶段曾国青铜器的特征。如果没有细致大量的比较分析工夫，这是很难做到的。昌平对曾国青铜器观察细致的最突出反应是在青铜器纹饰做法和工艺运用上，如在对于第一阶段曾国青铜器是范作纹还是模作纹的问题上，他列举了黄季鼎腹部装饰一周五个窃曲纹单元且有的单元不完整、曾子单鬲等不少铜器都有范缝穿过重环纹现象等，证明了这一时期纹饰多为模作纹。如此等等，都需要对实物进行细致入微的观察才能够发现。正是基于青铜器实物的认真考察和详细记录，才有许多容易被忽视的历史信息能够被提炼出来，为曾国历史及周代历史研究增添史料。

在青铜器器研究中，铸造工艺是非常重要的方面。以往商周时期青铜器的研究，由于研究者往往没有条件亲自观摩青铜器实物，或者由于研究者对青铜器铸造工艺不够熟悉，铸造工艺往往受到忽略。以东周时期青铜器研究为例，除了因晋都新田遗址出土了大量泥范，晋系青铜器的铸造工艺研究较为全面外，秦系青铜器、齐系青铜器等都缺少这方面的研究（楚系青铜器的铸造工艺研究集中在淅川下寺楚墓和随州曾侯乙墓出土的部分青铜器，尤其是可能采用失蜡法铸造的青铜器上）。昌平素来注重青铜器铸造工艺训练，有比较扎实的这方面的知识，再加上他曾长期在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有条件过眼经手大多数曾国青铜器，因而他对曾国青铜器铸造工艺痕迹的观察全面，分析细微，研究成果足以反映目前青铜器工艺研究的水准。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以往对于青铜器铸造工艺的术语使用相当混乱，昌平在其序言中专门就术语问题进行了解释，他以华觉民先生的术语体系为基础，重新阐述了自己的铸造术语体系。这些术语的概念和定义，除了描述榫式焊接法所铸青铜器“常常在附件耳侧可见销孔”一语稍欠准确，其余分类和描述都比过去精确，不仅保证了读者能够准确理解书中对曾国青铜器铸造工艺的描述，而且对于青铜器研究者今后描述青铜器的技术工艺现象的术语使用，也有借鉴意义。

二

《曾国青铜器研究》一书共分七章。第一章前言为序论，阐述的是曾国青铜器的研究历史和存在问题，本文的研究目的、重点、范围和为达到这些研究目标需要采取的方法和技术路线，并对书中使用的一些概念、术语进行解释和规范。第七章总结除了概述前面各章的结论外，还提出了一些颇有启发意义的重要推论。该书的本论部分共分五章，标题依次是“曾国青铜器的分期”、“周文化体系之下的曾国青铜器”、“楚文化体系之下的曾国青铜器”、“区域文化之下的曾国青铜器”和“曾国青铜器所反映的曾国历史”。其结构框架和逻辑顺序是：先分别对曾国青铜器以及与曾国有关的青铜器分别进行了考察，以甄别这些青铜器是否属于曾国青铜器，并对这些青铜器的年代进行分析。在材料叙述和分析的基础上，作者根据出土曾国铜器群的器类组合的变化并结合学术界对周代青铜器发展演变节奏的基本认识，以春秋早、中期之际为界限把曾国青铜器划分为两个阶段，并对这两个阶段

曾国青铜器的器形、纹饰、组合诸方面作了器物类型学分析，将第一阶段的曾国青铜器划分为三期，将第二阶段的曾国青铜器划分为五期。在分期、断代及特征分析的过程中，根据曾国青铜器两大发展阶段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属性，将这些青铜器分别置于周文化体系和楚文化体系中进行动态的考察（考察的内容包括：曾国不同时期青铜器的

器物群、器类与器形、花纹与铭文、铸造工艺等）。进而比较分析与曾国青铜器相关但却不属于同一文化的一些国家青铜器的情况，最后讨论这些器物现象所反映的曾国及东周的社会历史问题。这样的论述逻辑清晰，证据充分，所获结论也很有说服力。这里，我们不妨列举几个，以见一般。

例一，关于曾国青铜器的发展进程及文化关系的研究。曾国青铜器与周代青铜器总的发展进程一样，在春秋早、中期之际以前属于周文化的体系，而在这以后属于楚文化的体系，这是一个很容易观察到的现象。昌平关心的则是，在第一阶段像曾国这样的“诸侯国这些次一级的政治中心，青铜器是直接来源于中心区域的输入，抑或可能只是由中央在技术上对地方的传播”的问题。通过仔细的分析比较，昌平得出了在周文化体系下的曾国青铜器，尽管其技术体系上和总体风格上都与周系青铜器相同，但在技术的细节上、器物形态上、装饰花纹上和铭文制作上，还是表现出了一些自身的特点，因此，曾国应当拥有自己的青铜器制造工业和独立生产能力。不过，从曾国青铜器“在西周晚期即已经比周原地区更多地采用分铸技术，并在两周之际至春秋早期相当频繁地运用这一技术”来看，“分铸技术的最初发展，更多地是基于诸侯国青铜器而非王室青铜器”。作者正确地指出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如曾国这样的诸侯国可能缺乏来自中心文化区域的技术支持，维持和发展其规模不大的青铜器生产，简化技术的发展趋向应当是在工作过程中合理的一个选择。”第二阶段的曾国青铜器，虽然可以归属于楚系青铜器的范畴，却也有自己的特征。关于这点，过去已经有学者从曾侯乙墓的包括青铜器在内的文物讨论过这个问题，昌平更从这一阶段曾国青铜器中非楚文化因素的角度全面探讨了这个问题。他指出，“曾国青铜器自春秋中期开始即纳入楚文化青铜器系统，说明曾国与楚国形成所谓楚系的共同文化特征时间大体相当。从楚系青铜器一些器类的文化渊源上看，楚系青铜器甚至是楚国青铜器的源头并不是单纯地由楚国文化凝集而成，而是汇入了该区域文化因素的结果——换言之，楚文化形成独立体系的区域文化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结论不仅对于曾国青铜器的研究，而且对于认识整个周文化青铜器的构成，对于认识周代社会的“中心”与“周边”，都具有重要的价值。

例二，关于曾国青铜器所见曾国历史的研究。先秦的青铜器是当时重要的实物史料，研究先秦青铜器的目的不仅是研究青铜器的本身，更重要的是研究蕴含在这些青铜器中的历史。昌平关于曾国青铜器的研究就很好地体现了对于历史问题的关注，其最直接的体现就是，该书第五章关于曾国国君序列、曾国疆域变迁和曾国社会分层的研究。在曾国国君序列方面，昌平通过全面排比带有曾国国君铭文的铜器，将已知名字曾侯的相对年代排列为：曾伯陭→曾侯絆白→曾穆侯→曾侯昃→曾侯→曾侯→曾侯乙→擂鼓墩M2墓主。这个曾国国君的序列，正如昌平所说的那样“远远不是完整的曾侯世系”，但这个序列却是目前我们可以得到的最完整和最准确的曾国国君序列，从而为认识曾国

政治史理清了一条基本的线索。这个序列看似简单，昌平为此却做了大量的比较分析，其中有些过去学术界认识有分歧的曾侯名字及其序列，通过他的多方面论证，已经可以视为定论。在曾国疆域的问题上，先前的研究者存在着两方面的问题，或简单地依据曾国青铜器的出土分布，将曾国疆域扩展得很大，全然背离了当时这一地区还存在多个国家的事实；或把曾国疆域视为一个相对固定的区域，没有从曾国历史的发展动态去观察曾国疆域的变化。昌平审慎地收集各方面的信息，先将出土于别国疆域中的曾国青铜器与出土本国的曾国青铜器区分开来，再在曾国青铜器分期断代的基础上，通过考察不同时期曾国青铜器的空间分布，得出了曾国疆域在西周晚期至战国时期发生了很大变化的结论。“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曾国共包括漳河上游、滚水中上游、涢水中上游三个不同区域”；春秋早期之后，曾国的势力范围“只局限在涢水中游一带”；春秋晚期以后直至曾国灭亡，“曾国据有涢水中游均川、随州一带较小的区域”。曾国疆域的缩小和中心的移动、曾国贵族社会等级分层较少等结论，不仅拓展了周代铜器分国研究的视角和内容，更直接推进了曾国历史研究的深入。

例三，关于曾国青铜器反映的东周社会历史问题的研究。昌平基于曾国青铜器一些值得关注的现象，进而提出并论述了晚周时期国家手工业的组织、中心文化与地方文化或宗主国与附属国的关系等一系列深层次问题。昌平鉴于“曾侯乙铜器群纹饰和铭文特征显示其大部分容器和甬钟分别属于同一批次铸造，这无疑显示出颇大的作坊规模。但以曾国当时较小的国力，不可能常年维持如此规模的作坊系统特别是大量高水准的技术工人。曾国青铜器一些传统个性的存在，又说明曾国应当有一个常年维持的技术工人和青铜作坊系统”的矛盾现象，进而推论，曾国除了有一个维持日常规模青铜器生产的自己的技术工人队伍外，当时还很可能有“独立或半独立的技术工人群体的存在”，这个专业的社群流动于不同国家之间，以满足这些国家在某些时候大批量铸造青铜器的需要。这是一个非常新颖却又很合情理的推断，为我们思考当时手工业生产模式提供全新的视角。同样，基于对曾国技术性质的深刻认识（包括曾国青铜器与当时主流技术“演进的一致性显示其交流与传播极为活跃”以及曾国青铜器制造者在掌握了基本技术后逐渐形成的自身的“一些工艺习惯”），昌平还指出，“至少在中国青铜时代晚期，青铜器铸造并不存在、或者在程度上不如我们曾经设想的那样中心文化对于地方文化的控制、国家与国家之间设置障碍等等技术壁垒问题”。这个结论对于我们认识先秦时期中心文化对地方文化、宗主国对附属国控制，在不同时期的不同表现层面，也无疑会有十分重要的启迪。

这里还应当例举的是关于曾侯乙墓某些青铜器是否采用失蜡法铸造的问题。这是早先就引起技术史研究者极大关注、前不久还曾引起热烈讨论的有关中国青铜器铸造工艺的大问题。昌平在华觉民先生论述曾侯乙墓铜尊盘采用了失蜡法工艺的基础上，通过仔

细观察这件铜尊盘的铸造痕迹，更提出了三个有力的证据证实了华觉民先生的推断，其中一个证据是：曾侯乙盘兽形饰顶部附饰脱落残件的铜梗表面光洁，不见范缝，“特别是在其中一件附饰的铜梗一侧和纹饰单元底部，分别可见若干褶皱”，这些褶皱应当“反映的是蜡模加热后形成的流态”。这一现象应当是曾侯乙盘附饰为失蜡法铸造的直接证据。有了这些证据，中国青铜器失蜡法的引入年代，至迟应当在春秋晚期的结论，我想恐怕难以再颠覆了。

总之，昌平《曾国青铜器研究》一书是一部扎扎实实，不务空谈，创获很多的中国青铜器研究的优秀作品，许多新观点和新认识在对曾国青铜器的分析中随处可见。这些，读者在阅读这本书时自然会发现，无须我在这里继续唠叨了。

三

《曾国青铜器研究》一书是昌平十多年潜心研究的力作，也是这些年来对一个周代封国青铜器研究得最深入的著述。尽管如此，由于学术界对周代青铜器的一些标准器物群和集群存在着较大的认识分歧，以及对曾国青铜器与文献记载中曾、随二国关联的解释也还不能令所有人满意，昌平这部大作也还有一些应当充实和深化的地方。依我个人愚见，主要有以下两个：

首先是第一阶段第一期的年代。昌平将曾国青铜器划分为两个阶段分别考察，分别就每个阶段不同的问题进行阐述，这是非常恰当的。问题是第一个阶段的年代上限，也就是最早的曾国青铜器能否早到西周末期即平王东迁以前。我们知道，东西周之际，随着西周王朝的崩溃，原先在周人西部王畿的社群，也跟着周王室东迁的浪潮迁徙到周王朝东都王畿，原本就位于天下之中的人口稠密区域，一下子接收了许多来自西部的社群，必然会带来一系列安置上的问题，冲击这一地区原有的社会秩序。如果年代在东西周之际的某些国家和族群的青铜器出现在某一地区，人们自然就会猜测，这些青铜器所代表的国家或族群是在西周时期就栖息在这个地区，还是在东周以后才因为某种原因被安置在这里的？河南三门峡市上村岭虢国墓地，其开始年代始终存在着争议，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这涉及这个虢国的始封问题。同样，湖北这个曾国，它的开始出现的时间，关系到该国是西周时期就已经存在的汉阳诸姬之一，还是东西周之际才出现的新姬姓封国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过去注意的人并不多，这是因为早在商代晚期的甲骨文中，就有一个地望在南方的曾国，这个曾国西周早中期之际还曾作为方国名出现在青铜器铭文中，其地理位置也就在南方汉水中游地区，与后来曾国青铜器分布地域大致相似。故学术界一般都认为，古文字资料中商代晚期至西周前期的曾国就是西周以后的曾国。然而，迄今为止，我们并没有发现一件西周中晚期的有确切铭文证据的曾国青铜器，在西

周早期以前的曾国与西周以后的曾国之间，还存在着西周中期和晚期这样一个很大的缺环。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的曾国与东周时期的曾国是否是同一个曾国，他们是否都是姬姓周人贵族所建立的曾国，这本身就还是一个疑问。曾国青铜器第一阶段的铜器能否早到西周晚期，这牵涉到晚商早周的曾国与东周这个姬姓曾国的关系问题，姬姓曾国的始封年代问题和该国封建的历史背景问题，不得不十分慎重。按照昌平的分析，属于第一阶段第一期的曾国青铜器有："70 熊家老湾、72 熊家老湾、义地岗 M83、桃花坡 M1、桃花坡 M2、72 曹门湾"等器物群以及曾伯从宠鼎、曾仲子敔鼎、曾伯宫父鬲等带铭文可以证实为曾国的典型器。毋庸置疑，这些铜器群中有些青铜器正如昌平所论，其年代可以早到西周晚期，但那些有铭文明确无误表明是曾国的青铜器，其形态和纹饰所表现的年代特征并不一定就必然可以早到西周晚期。西周晚期和春秋早期在青铜器发展史上本来就属于同一个发展阶段，西周晚期偏晚阶段与春秋早期偏早阶段，二者在形态、纹饰、铭文和工艺上都很难区分，比较容易判别的只是某些春秋初期新出现的铜器型式，如宽斜沿浅盘的附耳鼎等。因而关于第一阶段曾国青铜器的年代上限问题，青铜器研究者本来就有不同的看法，朱凤瀚先生就认为曾国青铜器没有能够早到西周晚期的器物，并推断熊家老湾两批青铜器属于春秋早期偏早。在这种情况下，将曾国青铜器的年代上限推定在西周晚期，还需要更多的证据，才能令人信服。

其次是该书第五章，这一章的内容是曾国青铜器与楚文化以的相关小国青铜器的比较研究，标题却为"区域文化之下的曾国青铜器"，给人以标题与内容不甚贴切的感觉。第五章分为两节，分别讨论曾国青铜器与相邻诸国和不相邻诸国青铜器的关系。在"与相邻区域青铜文化的关系"一节中，作者只分析比较了曾国青铜器与黄、蔡二国的青铜器，却没有比较同样在邻近的邓国、应国青铜器。邓国是周王朝南方的重要国家，周王室贵族就这样说，自武王灭商以后，"巴、濮、楚、邓，吾南土也"。春秋时期，邓国在《春秋左传》不时见到，与巴、楚等国关系密切。邓国的中心就在河南邓州市一带，距离曾国比蔡国近得多，传世和出土的邓国铜器也有一定数量，在与曾国相邻区域的国家中忽略邓国是不恰当的。应国也是周代的重要国家，该国的中心河南平顶山市距离曾国虽然稍远些，但应国的公族墓地已经发现并做过发掘，传世和出土铜器都很多，铜器的时间跨度也很长，是一个理想的比较对象，不做曾国与应国铜器的比较，总觉得是个遗憾。在"与跨区域青铜器的关系"一节中，作者按照曾国青铜器的两个发展阶段，分别比较分析了与东北方齐鲁文化圈铜器的关系和东南方吴越文化圈青铜器的关系，但却忽略了在淮河流域的徐舒文化圈的青铜器。徐国一度是淮河流域的大国，群舒是春秋时期活跃在淮河流域的族群，属于这些国家的青铜器群发现了不少，年代集中在春秋中期前后，风格与黄国青铜器接近，其中流行铜器如平盖鼎等，与曾国青铜器很可能有关系，也应当进行比较研究。如果该书第五章能够加上这些内容，就能够使这方

面的比较分析更加充实，这对全面认识曾国在不同时期与不同方向国家关系等历史背景，无疑很有帮助。

除了以上这些应当强化和充实之处外，该书有些表述也还有更具体和更仔细斟酌的必要。比如在描述曾国平盖鼎的蟠螭纹和三角纹时，说它“具有楚系青铜器的特征”，但这两种纹样都是春秋中期前后青铜器的普遍装饰，如果说该纹样具有楚系青铜器的特征，非更具体地加以描述才能够准确。再如书中说第二阶段第一期的曾国青铜器的新风格纹饰中的“U”字构形的纹饰，作者将其作为蟠螭纹的一种，认为这种纹样“似单体的龙”，而据我的理解，这种“U”形纹饰单元，实际上是从先前波带纹的组成单元“公”字纹演变而来，不宜作为龙纹的一种。还如，作者在谈到曾国与蔡国青铜器的关系时，以“曾侯乙墓青铜器中尊与盘组合”及尊的形制为例进行说明，的确，这两件尊的形制与“同时期楚系和中原青铜器不同”，但盘、尊组合却不是曾、蔡两国特有的现象，先秦文献中就有“舟，尊下盘”的说法（蔡侯申尊盘的盘铭恰好自铭为“舟”，李学勤先生已经指出这种盘为托尊之盘“舟”。）这些行文似欠准确之处在全书中尽管很少，但从精益求精的要求来讲，还是需要作者对这些表述作进一步的推敲。

记得还是昌平选择曾国青铜器作为自己的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的时候，我就曾经向他说过，曾国的铜器既然如你所论，其年代从西周晚期一直延续到战国中期，其地域也基本上就在随州一带一个不大的区域内，如果能够以曾国青铜器为主线，通过从西周到东周曾国青铜器的发展演变过程，从肯定属于曾国区域的曾国青铜器文化背景和文化特征变化角度的考察，引入曾国区域内陶器等日常生活用器的发展变化，通过青铜器与陶器发展演变节奏的异同、同时期这两种不同技术含量和文化意义器物的异同，来考察曾国这个两周之际处在中原周文化圈与江汉地方文化圈之间，春秋时期处在周晋文化圈、徐舒文化圈与楚文化圈之间，春秋晚期以后逐渐纳入楚文化圈中的这个姬姓小国文化面貌的变化状况，从而为比较全面认识这类夹在两个或多个大的具有向心力的地缘政治实体中间的小的政治实体，其不同层面物质文化面貌与政治面貌之间、文化变化表象与历史演进事实之间的关系提供一个很好的研究案例。昌平赞同我的想法，但他也指出，曾国统治疆域内的湖北安居至随州一带，考古发掘的西周至战国时期的遗址很少，铜器群中伴出陶器的情况较少且不成系列，目前还难以整理出与曾国青铜器并行的陶器发展序列，更难建立这两种器物序列的交叉关联。昌平所言自然有理，但这也正是目前这课题研究的薄弱环节所在。继续在已经推定的曾国统治疆域内开展考古工作，获取更丰富的考古材料，将居址与墓葬、陶器与铜器综合在一起进行研究，这不仅可以深化曾国青铜器从周系到楚系、曾国从周王朝同姓封国到楚国附庸过程的认识，而且对于昌平本人和不少学者所关注的早期楚文化的研究，也会有所启迪。

昌平在他这本专著的绪论中指出，曾国青铜器的研究历程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我

想，昌平这本研究专著的问世，标志着曾国青铜器研究第三个阶段的结束，也是一个新的研究阶段的开始。我们期待着有更多的新发现，期待着有更多类似《曾国青铜器研究》的青铜器研究力作的问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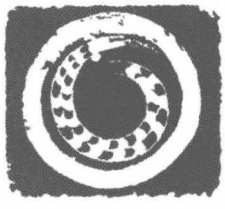
孙　华

2009 年 7 月

Aurora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Ancient Civilizations, Peking University
Publication Series, No.18

The Research on the Bronzes of the Zeng State

Zhang Changping



Cultural Relics Press
Beijing · 2009

目　　录

周代诸侯国青铜器研究的力作（代序） …… 孙华（Ⅰ）

第一章　前　言 …… （1）

第一节　曾国青铜器研究史 …… （1）
第二节　研究范围、任务和方法 …… （14）
一　范围与对象 …… （14）
二　目的与任务 …… （17）
三　方法与基本思路 …… （20）
第三节　几点说明 …… （28）
一　材料来源问题 …… （29）
二　一些概念的规范 …… （29）
三　一些特定的文字表述方式 …… （33）
四　图与表的编制 …… （35）
五　注释方式 …… （35）

第二章　曾国青铜器的分期 …… （36）

第一节　材料出土背景分析 …… （38）
一　漳河地区出土材料 …… （41）
二　滚水地区出土材料 …… （42）
三　涢水中游地区出土材料 …… （47）
四　零星出土和收集品 …… （53）
五　传世品 …… （56）
六　其他与“曾”相关的青铜器 …… （59）
第二节　分期 …… （61）
一　第一阶段青铜器的分期 …… （61）

二 第二阶段青铜器的分期 …… (73)
第三节 年代与特征 …… (79)
一 第一阶段 …… (80)
二 第二阶段 …… (99)
第四节 戟与戈的年代系列 …… (107)
一 戟 …… (108)
二 戈 …… (112)
第三章 周文化体系之下的曾国青铜器 …… (118)
第一节 器类与器形 …… (119)
一 周式器类的沿用 …… (120)
二 周式器类的变异 …… (123)
三 周式器类之外 …… (132)
四 变迁与选择 …… (134)
五 小结 …… (136)
第二节 纹饰 …… (138)
一 纹饰的基本情况 …… (138)
二 周式纹饰的沿用 …… (141)
三 纹饰的模式化组合 …… (144)
四 纹饰的制作 …… (148)
五 小结 …… (152)
第三节 铭文 …… (152)
一 辞例 …… (153)
二 行款 …… (156)
三 铭文特点 …… (161)
第四节 铸造工艺 …… (162)
一 主要器类的基本工艺 …… (165)
二 技术特征 …… (172)
三 小结 …… (179)
第五节 器物群 …… (182)
一 五鼎以上的铜器群 …… (182)
二 二鼎至五鼎的铜器群 …… (190)
三 一鼎的铜器群 …… (192)

四　小结 …… (192)
第六节　结语 …… (192)
第四章　楚文化体系之下的曾国青铜器 …… (197)
第一节　器类与器形 …… (199)
一　曾国青铜器与楚式青铜器的趋同 …… (199)
二　由曾国青铜器看楚式鼎的形成 …… (203)
三　所谓“复古”——楚系青铜器中的周式传统 …… (214)
四　曾国青铜器的器类与器形的个性特征 …… (218)
五　小结 …… (222)
第二节　纹饰 …… (223)
一　不同时期的基本纹饰 …… (223)
二　蟠螭纹与蟠虺纹 …… (233)
三　镶嵌式龙纹 …… (236)
四　小结 …… (239)
第三节　铭文 …… (240)
一　辞例 …… (241)
二　铭文的时代变化 …… (243)
三　铭文的异常现象 …… (249)
四　铭文特点 …… (251)
第四节　铸造工艺 …… (253)
一　主要器类的基本工艺 …… (254)
二　技术特征 …… (262)
三　分铸技术的发展及其背景 …… (270)
四　圆鼎的范型发展 …… (274)
五　个性特征与区域 …… (278)
六　小结 …… (282)
第五节　器物群 …… (283)
一　曾侯铜器群 …… (283)
二　一般贵族铜器群 …… (287)
三　小结 …… (291)
第六节　结语 …… (292)

第五章　区域文化之下的曾国青铜器 …… (295)
第一节　与相邻区域青铜文化的关系 …… (295)
一　黄国 …… (296)
二　蔡国 …… (301)
三　小结 …… (304)
第二节　与跨区域青铜器的关系 …… (305)
一　第一阶段与山东地区的文化交流 …… (305)
二　楚文化背景下与东部地区的文化交流 …… (308)
三　小结 …… (319)
第三节　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 (319)
第六章　曾国青铜器所反映的曾国历史 …… (326)
第一节　曾国的疆域及中心区域 …… (326)
一　鄂北一带曾国的性质 …… (328)
二　曾国的疆域 …… (331)
三　曾国的中心政治区域 …… (341)
第二节　青铜器所反映的曾国政治体系 …… (344)
一　职官、联姻等政治信息片断 …… (345)
二　曾国“子”、“伯”、“仲”等称谓的性质 …… (348)
三　曾侯世系推测 …… (355)
第三节　曾国的早期历史探索 …… (359)
一　出土文献所见早期曾国的线索 …… (359)
二　考古文化遗存所见早期曾国的线索 …… (362)
第七章　总　结 …… (365)
附　论　历史文献中随、缯与曾国的关系考辨 …… (372)
第一节　随、曾之辨 …… (372)
一　有关随国的历史文献记载和随国历史 …… (372)
二　随与曾的关系 …… (374)
第二节　缯、曾之辨 …… (376)
一　有关缯国的历史文献记载和缯国历史 …… (376)

二　缯与曾的关系 …… (380)
第三节　曾为缯—随说 …… (382)
一　“曾国之谜”面面观 …… (382)
二　曾国为先缯后随的假说 …… (385)

附　图 …… (390/391)

附图1　第一阶段曾国青铜器分期图 …… (390/391)
附图2　第二阶段曾国青铜器分期图 …… (390/391)

附　表 …… (391)

附表1　漳河、滚水、涢水等区域出土曾国青铜器登记表 …… (391)
附表2　零星出土和采集的曾国青铜器 …… (393)
附表3　传世曾国青铜器著录表 …… (394)
附表4　第一阶段曾国青铜器铭文登记表 …… (395)
附表5　第一阶段曾国青铜容器铸造登记表 …… (399)
附表6　曾侯乙墓青铜器纹饰、铭文登记表 …… (405)
附表7　第二阶段曾国青铜器铭文登记表 …… (408)
附表8　第二阶段曾国青铜器容器铸造登记表 …… (411)

附　录 …… (417)

附录一　曾国青铜器著录文献 …… (417)
附录二　参考文献 …… (420)

致　谢 …… (437)

插图目录

图 1.1－1　曾国青铜器出土地点位置示意图 ……（2）
图 1.1－2　曾师季韩盘铭文 ……（3）
图 1.3－1　龙纹类纹饰名称 ……（30）
图 2.1－1　与曾相关青铜器铭文 ……（60）
图 2.2－1　第一阶段部分鼎型式 ……（63）
图 2.2－2　第一阶段部分鬲型式 ……（64）
图 2.2－3　第一阶段部分鑐、壶型式 ……（65）
图 2.2－4　窃曲纹型式 ……（69）
图 2.2－5　龙纹型式 ……（70）
图 2.2－6　第二阶段部分铜器型式 ……（75）
图 2.2－7　曾侯之簠发展系列 ……（79）
图 2.3－1　晋侯墓地出土西周晚期青铜器 ……（83）
图 2.3－2　第一阶段第一期曾国青铜器与周式青铜器比较——盘 ……（84）
图 2.3－3　第一阶段第一期曾国青铜器与周式青铜器比较——鼎 ……（85）
图 2.3－4　第一阶段第一期曾国青铜器与周式青铜器比较——鑐 ……（86）
图 2.3－5　第一阶段第一期曾国青铜器与周式青铜器比较——鼎 ……（87）
图 2.3－6　第一阶段第一期曾国青铜器与周式青铜器比较——方甗 ……（87）
图 2.3－7　第一阶段第一期曾国青铜器与周式青铜器比较——鬲 ……（88）
图 2.3－8　第一阶段第一期曾国青铜器与周式青铜器比较——簋 ……（89）
图 2.3－9　第一阶段第一期曾国青铜器与周式青铜器比较——盘、匜 ……（90）
图 2.3－10　第一阶段第一期曾国青铜器 ……（90）
图 2.3－11　第一阶段第二期曾国青铜器与晋侯墓地 M93、M102 青铜器比较 …（93）
图 2.3－12　春秋早期的窃曲纹 ……（94）
图 2.3－13　春秋早期的蟠螭纹 ……（94）
图 2.3－14　春秋早期传世曾国青铜器 ……（95）
图 2.3－15　曾孟嬭谏盆与郭家庙 M8 匜纹饰比较 ……（96）

图 2.3－16　曾伯霥簠与信阳平桥 M1：10 盆纹饰比较 ……（97）
图 2.3－17　曾孙史夷簠与黄君孟夫妇墓铜器纹饰比较 ……（97）
图 2.3－18　曾侯乙墓与和尚岭、徐家岭墓地盖鼎比较 ……（102）
图 2.3－19　擂鼓墩 M2 圆壶与徐家岭 M10 圆壶比较 ……（103）
图 2.3－20　东风油库 M1 与下寺 M10 鼎、簠对比 ……（105）
图 2.4－1　曾侯戟演变以及与楚国戟的比较 ……（110）
图 2.4－2　曾仲之孙戈与曾侯昃戈 ……（113）
图 2.4－3　曾国铜戈的演变以及与楚国戈的比较 ……（115）
图 3.1－1　曾国铜簋与周式铜簋比较 ……（122）
图 3.1－2　西周晚期铜簋风格在东周时期的延续 ……（122）
图 3.1－3　曾国附耳鼎的来源 ……（126）
图 3.1－4　两周之际曾国以外地区的附耳鼎 ……（126）
图 3.1－5　第一阶段第二、三期曾国附耳鼎比较 ……（127）
图 3.1－6　第一阶段曾国的折肩鬲 ……（128）
图 3.1－7　曾国的莲瓣形装饰圆壶 ……（129）
图 3.1－8　曾国一带方壶的莲瓣形装饰传统 ……（131）
图 3.1－9　西周晚期曾国与晋国的圆壶 ……（132）
图 3.1－10　曾伯陭钺与相关铜器比较 ……（133）
图 3.1－11　曾国苏家垅铜器群与虢国墓地 M2001 铜器群比较 ……（137）
图 3.2－1　第一阶段曾国青铜器主要纹饰种类 ……（139）
图 3.2－2　第一阶段曾国青铜器各期的“C”形窃曲纹 ……（140）
图 3.2－3　曾国青铜器窃曲纹与周式窃曲纹比较 ……（142）
图 3.2－4　第一阶段曾国青铜簋模式化装饰 ……（145）
图 3.2－5　西周晚期方壶的纹饰 ……（146）
图 3.2－6　曾仲斿父方壶与曾伯陭圆壶纹饰组合比较 ……（147）
图 3.2－7　曾伯文簋纹饰组合 ……（149）
图 3.2－8　曾仲斿父方壶的范作纹饰 ……（149）
图 3.2－9　曾国青铜器的模作纹饰 ……（150）
图 3.2－10　黄季鼎模作的纹饰 ……（151）
图 3.3－1　曾子伯沓盘铭文不规范的排列 ……（157）
图 3.3－2　虢国墓地 M2001：86 簋盖铭文的长方形布局 ……（158）
图 3.3－3　曾仲斿父方壶冠部铭文漏字和不规范的排列 ……（159）
图 3.3－4　曾子㝬鼎铭文曲行现象 ……（159）

图 3.3－5 文字、语法颠倒的起右盘铭文 …… (160)
图 3.3－6 漏字、排列不规整的曾伯霥簠铭文 …… (160)
图 3.4－1 第一阶段曾国青铜鼎铸造工艺 …… (166)
图 3.4－2 第一阶段曾国青铜器铸造工艺 …… (167)
图 3.4－3 第一阶段曾国青铜器铸造工艺 …… (169)
图 3.4－4 第一阶段曾国青铜器铸造工艺 …… (170)
图 3.4－5 第一阶段曾国青铜器铸造工艺 …… (171)
图 3.4－6 第一阶段曾国青铜器铸造工艺 …… (172)
图 3.4－7 第一阶段曾国青铜器铸造工艺 …… (175)
图 3.4－8 曾国青铜器的特殊设计 …… (181)
图 3.5－1 苏家垅铜器群九鼎 …… (184)
图 3.5－2 苏家垅 3 号有铭鼎与 5 号无铭鼎比较 …… (185)
图 4.1－1 春秋中期曾国青铜器与楚系青铜器比较 …… (202)
图 4.1－2 春秋中期曾国与楚国平盖鼎比较 …… (203)
图 4.1－3 山东地区的平盖鼎 …… (204)
图 4.1－4 曾国与山东地区鼎平盖比较 …… (205)
图 4.1－5 平盖鼎与弧盖鼎比较 …… (206)
图 4.1－6 楚式平盖鼎的形成 …… (207)
图 4.1－7 升鼎的起源 …… (210)
图 4.1－8 A 型升鼎的演变 …… (212)
图 4.1－9 B 型升鼎的演变 …… (213)
图 4.1－10 方壶的“复古”风格 …… (216)
图 4.1－11 春秋晚期曾国的素面方壶及其近似者 …… (219)
图 4.1－12 春秋晚期曾国的簠与盘 …… (219)
图 4.1－13 曾国的绳纹鬲 …… (220)
图 4.1－14 曾国的编钟 …… (221)
图 4.2－1 第二阶段第一期曾国青铜器纹饰 …… (224)
图 4.2－2 第二阶段第二期曾国青铜器纹饰 …… (225)
图 4.2－3 第二阶段第三期曾国青铜器纹饰 …… (226)
图 4.2－4 第二阶段第四期曾侯乙墓青铜器纹饰 …… (227)
图 4.2－5 第二阶段第四期曾侯乙墓青铜器的蟠龙纹 …… (228)
图 4.2－6 第二阶段第五期擂鼓墩 M2 青铜器纹饰 …… (230)
图 4.2－7 第二阶段第五期擂鼓墩 M2 青铜器纹饰 …… (231)

图 4.2－8　春秋中期曾国与楚文化青铜器纹饰比较 …… (232)
图 4.2－9　蟠螭纹的形成 …… (233)
图 4.2－10　龙纹形成的其他纹样 …… (234)
图 4.2－11　蟠螭纹的发展 …… (235)
图 4.2－12　蟠虺纹的发展 …… (236)
图 4.2－13　曾侯乙墓青铜器镶嵌类纹饰 …… (237)
图 4.2－14　龙纹向心式构图 …… (239)
图 4.2－15　镶嵌式龙纹的演变 …… (240)
图 4.3－1　曾侯乙青铜器不同的铭文 …… (243)
图 4.3－2　曾国青铜器铭文在不同时期的字形变化 …… (245)
图 4.3－3　“曾”字字形在不同时期的变化 …… (245)
图 4.3－4　曾侯遇、曾侯郕、曾侯乙之“曾侯”字体比较 …… (248)
图 4.3－5　盗叔壶铭文局部 …… (250)
图 4.3－6　曾侯乙盖豆铭文笔画缺失和位移现象 …… (250)
图 4.3－7　曾侯乙墓青铜器中特殊的“曾”字 …… (250)
图 4.4－1　第二阶段曾国青铜鼎铸造工艺 …… (255)
图 4.4－2　第二阶段曾国青铜鼎铸造工艺 …… (257)
图 4.4－3　第二阶段曾国青铜器铸造工艺 …… (258)
图 4.4－4　曾侯乙尊盘附饰铸造工艺 …… (260)
图 4.4－5　曾侯乙尊盘附饰 …… (263)
图 4.4－6　第二阶段曾国青铜器铸造工艺 …… (265)
图 4.4－7　第二阶段曾国青铜器铸造工艺 …… (268)
图 4.4－8　曾仲斿父鼎与连迂升鼎的范型比较 …… (271)
图 4.4－9　第二阶段曾国青铜器合范情况 …… (273)
图 4.4－10　圆鼎范型演变 …… (275)
图 4.4－11　第二阶段曾国青铜器铸造工艺 …… (280)
图 5.1－1　曾国与黄国铜器群比较 …… (297)
图 5.1－2　曾国与黄国青铜器特殊的铭文辞例 …… (301)
图 5.1－3　曾侯乙尊与蔡侯申尊 …… (303)
图 5.2－1　曾国鑐与山东地区鑐 …… (306)
图 5.2－2　曾国与山东曾国鼎 …… (308)
图 5.2－3　曾国鼎与长江下游地区鼎 …… (309)
图 5.2－4　曾国与东部地区出土的部分方座形器 …… (317)

图 5.3－1 不同区域的扉棱方卣 …… (321)
图 5.3－2 不同地区的勾云状龙纹 …… (322)
图 5.3－3 春秋中期曾国与中原地区青铜器的共性 …… (324)
图 5.3－4 楚系与晋系盖鼎的差异 …… (324)
图 5.3－5 楚系与晋系蟠螭纹的相似性 …… (325)
图 6.1－1 曾国青铜器出土位置示意图 …… (327)
图 6.1－2 第一阶段曾国的疆域示意图 …… (337)
图 6.1－3 第二阶段曾国的疆域示意图 …… (340)
图 6.1－4 不同时期曾国的中心区域位置示意图 …… (344)
图 6.2－1 曾子遗、曾侯遗字形比较 …… (355)
图 6.2－2 曾侯乙盘改制的铭文 …… (357)
图 6.2－3 曾侯郕鼎比较图 …… (358)

插表目录

表2.1.1　郭家庙墓地墓葬随葬品类别统计表……（44）
表2.2－1　第一阶段青铜器器形型式登记表 ……（66）
表2.2－2　第一阶段青铜器纹饰型式登记表 ……（70）
表2.2－3　第二阶段青铜器器形型式登记表 ……（76）
表2.4－1　曾侯乙墓相关戟型式统计 ……（111）
表3.2－1　第一阶段青铜器纹饰统计表 ……（140）
表3.2－2　苏家垅与虢国墓地M2001青铜器纹饰组合比较 ……（143）
表3.3－1　第一阶段曾国青铜器铭文嘏辞登记表 ……（153）
表3.3－2　第一阶段曾国青铜器自铭登记表 ……（156）
表3.5－1　苏家垅九鼎大小登记表 ……（183）
表3.5－2　苏家垅铜器群与虢国等高级别铜器群比较 ……（187）
表3.5－3　曾国青铜器二鼎至五鼎铜器群登记表 ……（190）
表3.5－4　虢国墓地二鼎至五鼎墓葬青铜器登记 ……（191）
表3.5－5　曾国青铜器一鼎青铜群登记 ……（192）
表4.3－1　第二阶段曾国青铜器铭文辞例登记表 ……（241）
表4.3－2　曾侯鞞青铜器列表 ……（246）
表4.3－3　曾侯甾青铜器列表 ……（246）
表4.5－1　曾侯乙墓用器器类登记表 ……（284）
表4.5－2　擂鼓墩M2用器器类登记表 ……（286）
表4.5－3　第二阶段曾国青铜器器类登记表 ……（288）
表4.5－4　春秋时期楚系贵族铜器群器类登记表 ……（289）
表6.1－1　不同区域的曾“侯”、“伯”、“子”称谓比较……（329）
表6.1－2　第一阶段曾国青铜器铭文中“曾”字的写法 ……（330）
表6.2－1　曾国青铜器铭文不同称谓年代关系表 ……（349）

第一章　前　言

曾国是以出土青铜器来确定其文化面貌、国族属性的。性质明确的曾国青铜器从西周晚期经春秋时期延续到战国中期共约500年，其间曾国的发展先后处于周文化和楚文化两个不同的文化体系之下。这样的地位实际上代表了周代“五霸”、“七雄”之外绝大部分诸侯国的情形。因此，将曾国作为周代方国的一个个案，对周代青铜器研究具有相当普遍的意义。如果将曾国青铜器作为周文化体系下的区域文化研究个案，对于中国商周时期地域青铜文化研究，也具有同样的普遍意义。

第一节　曾国青铜器研究史

曾国是这样的一个特别的国家，有关它的出土文物和历史文献都有较多的资料，但二者之间却始终未能有较好的对应。如果从宋人著录和研究曾国青铜器算起，迄今对曾国青铜器的认识已经历近千年。虽然各个不同时期学者的论点不同且研究逐次深入，但问题的焦点——青铜器中的曾国到底是历史文献中的哪一个国家？自始至终为曾国青铜器研究几乎未曾有过变化的研究主题。

在曾国青铜器的早期研究历程中，对于曾国国族属性的探讨，是随着新的材料的出现而不断更新的。从宋代开始著录曾国青铜器到曾国青铜器零星出土再到性质明确的曾国大型墓葬的发现，从曾国位置不明到曾国青铜器分布广泛再到大体稳定在今鄂北豫南一带（图1.1－1），新的发现不断推动着认识的深入。这样一个渐进的认识历程，可以大体分为如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主要基于传世品的研究。

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学术界所知的曾国青铜器都属于传世品①。由于当时收录有关青铜器的著作很少记录出土地点，学者们对于传世曾国青铜器的了解，实际上是仅限于那些铭文中标识有“曾”的青铜器。即便如此，在开始著录曾国青铜器的宋代，

① 现在我们知道在清光绪年间襄阳太平店已经出土有曾孟嬭谏盆，但该器材料很晚才报道。参见曾昭岷、李谨：《曾国和曾国青铜器综考》，《江汉考古》1980年第1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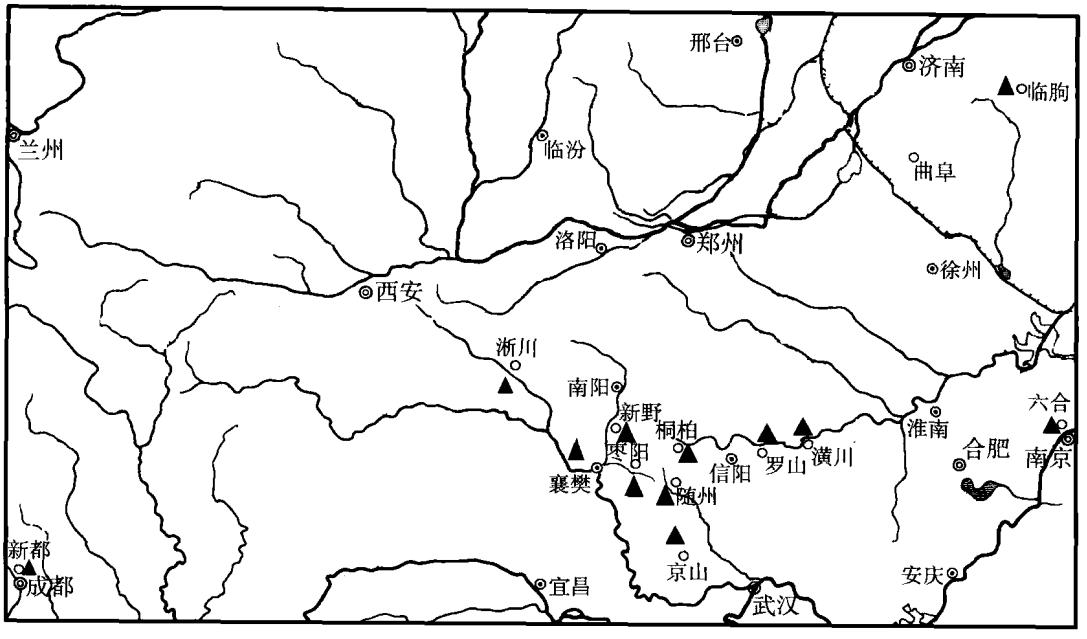


图 1.1－1 曾国青铜器出土地点位置示意图

当时学者对于曾国甚至还缺乏基本认识。

薛尚功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薛氏》）中刊有曾师季鞞盘（《薛氏》16.165）（图 1.1－2）。该盘在《薛氏》中被称为“翼师盘”，“曾”字未被认出而被释为“冀”，薛尚功谓：“《博古》云‘冀者，国名’”。由于铭文为摹本，字、笔或有脱落，“曾”字下部即脱一横。现在我们知道此字字形为两周之际“曾”字的典型写法之一，故该器为两周之际曾国青铜器无疑。另外，盘铭右行反书，也是两周之际曾国青铜器铭文常见的一个不规范现象。

《薛氏》中还著录了三件和曾国历史相关的青铜器，即两件楚王酓章钟（《薛氏》6.53、54 之曾侯钟）、安州六器中的中甗（《薛氏》16.156）。这三件器物出土地点在今湖北安陆及邻近的孝感，它们并不是曾国所铸造。中甗铭文称周王南征经过汉水流域的几个国家，其中包括曾国，和曾师季鞞盘一样，中甗铭文中的“曾”也未被释出①。两件楚王酓章钟铭文和 1978 年发掘的曾侯乙墓出土同人所作镈钟铭文相同，均记载楚王因曾侯乙之死而铸钟②。薛尚功引赵明诚《古器物铭》的看法，正确地指出“钟为惠王作无疑也”。但他未对铭文中的“曾侯”性质作出判断。

① 中甗，《薛氏》作“父乙甗”，时代属于西周早期，此时曾字作“㒸”，写法为曾字所从，无下部“口”符。

② 两件酓章钟的合铭与曾侯乙墓出土楚王酓章钟相同，行款则有不同。

首次将青铜器中曾国与文献记载对应的是晚清的阮元。他的《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新著录有曾伯霥簠（《积古》7.7）、曾仲盘（《积古》8.1）。在曾伯霥簠条下阮元考释说："元案曾当为鄫，夏之后。国爵为伯，而《春秋》作子者，意后王贬之也。"《积古》也移录有楚王酓章钟，可能因为这里的称谓是"曾侯"，所以阮元同样未对此作评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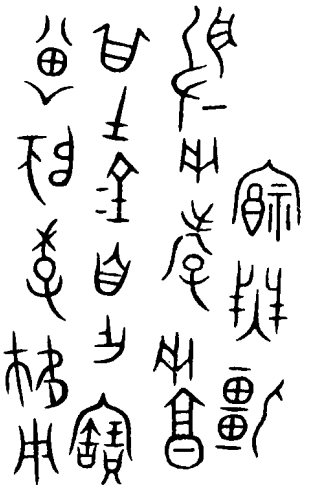


图1.1－2　曾师季䪫盘铭文
（《薛氏》16.165）
（说明宋代即已发现有曾国青铜器）

在历史文献关于"鄫"或"缯"的记载中，"鄫"或"缯"有的作为地名、有的作为国名。其中山东之"鄫"姒姓，子爵。此"鄫"作为诸侯国，地望、国姓和历史轨迹都相对清晰，因此易于将曾国青铜器与之关联。相反，历史文献中并没有记载有爵位为侯、与战国时期楚关系密切的曾国，学者无从解释楚王酓章钟中的"曾侯"，应该是可以理解的。

"曾"即山东之"鄫"的说法影响深远，也或许因为阮元的学术地位，该说在晚清和民国时期成为学术界的主流看法。直到曾国青铜器开始有器物群出土于鄂豫地区之前，大多数学者仍然坚持这一看法①。20世纪20年代前后，曾国青铜器出土数量大增，曾诸子鼎、曾子仲宣鼎、曾子尿簠、曾侯作叔姬簠、曾子遇缶、曾太保𩰫叔盆、曾孙无谌鼎、曾伯陭壶、曾子伯𠭯匜、曾子⧄簠、曾□⧄簠、曾子遇簠等器为诸多著录所收。虽然当时的著录者对文字考释的兴趣远大于对曾国历史的探讨，但在这些新收曾器中，有不少"曾子"之器，似乎更增加了"曾"即"鄫"之说的依据。同时，随着新的材料的发现，曾国有"曾子"、"曾伯"、"曾侯"等不同称谓，则已经是学者们开始面临的新问题。

曾毅公的《山东金文集存·先秦编》将曾国青铜器与山东之"鄫"作了进一步的关联。他列出属于山东曾国的铜器有：曾伯霥簠2、曾伯陭壶、曾子仲宣鼎、曾子尿簠、曾子伯𠭯盘、曾子⧄簠、曾□⧄簠、曾诸子鼎、曾子遇簠2、曾仲盘、曾太保盆以及另外一鬲。除了曾侯作叔姬簠之外②，几乎囊括了当时所见曾国铜器。在书中他列有《山东先秦吉金出土地址图》，并将曾国标识于薛国之东、邾国之东南。曾毅公在《序》文中强调了他的收器原则："春秋以前之古国，若鬲若过若攸，虽有彝器传世，然诸器之制造出土是否属山东，于义有疑，未敢率尔收录。……他若匽、徐之器，虽出齐、

① 屈万里：《曾伯霥簠考释》，《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三十三本，台北，1962年。

② 此器称曾侯，又有叔姬，均与山东之鄫情况不合，可能是曾毅公未收录的原因。

鲁，制非山东，亦当非录。”按照他的这一标准，所列曾国青铜器的出土和制作似乎都在山东。但实际上，曾毅公标出的《山东先秦吉金出土地址图》是根据历史文献的记载对春秋时期山东诸国地理位置的标识，而非是真正铜器地点的具体出土位置。他当然也未能举出所列的曾国铜器在山东出土的依据。我们知道，清末前后收藏之风大盛，出于利益考虑，商贾往往匿密器物出土地点而不轻易示人，因此当时的青铜器著录往往少有出土地点，或者记录的出土地点也多不可靠。实际上，当时学者们对这一时期曾国青铜器的出土背景几乎一无所知①。曾毅公辑出的山东曾国青铜器，在认识上还仅仅是“曾国为山东鄫国”思想的产物。

1933 年，安徽寿县李三孤堆出土大量战国时期高级别楚国青铜器，其中包括有一对曾姬无卹方壶。曾姬无卹方壶和楚王酓章钟一样，也将曾国与楚国关联起来。曾姬无卹方壶中“曾姬”的称谓明确了曾国为姬姓，方壶的年代说明曾国的立国年代延续到战国时期。因此，这个曾国当然就不可能是姒姓、春秋时期即灭于莒的山东之鄫了。在此情形之下，学术界在继续认同曾国青铜器与山东之鄫关联的同时，也将部分曾国青铜器与楚地之曾联系起来。对于曾国的认识，无疑因此前进了一大步。不过，由于出土于楚墓之中，曾姬无卹方壶和传世曾国青铜器一样，也没有反映有关曾国地望的信息。

较早将曾国青铜器与楚地之曾关联的是郭沫若。他在《两周金文辞大系》（《大系》）中将曾伯霥簠、曾伯陭壶、曾子尿簠、曾子遇簠、曾子⊠簠、曾子仲宣鼎、曾太保盆等列为曾国铜器，在《大系》曾太保盆条下谓：“右凡曾器七”②。按照《大系》中国家的排列，在“北系”的黄河流域国家排列次序是“溯流而上”（《大系·序文》）。曾国的位置处在“郑、陈、宋、曾、滕、薛、邾”排序之中，显然《大系》是将曾国列入山东之鄫的。在这七件次青铜器中，因考虑到文献记载春秋中期鄫灭于莒国，郭氏只能调和地将曾子遇簠、曾子⊠簠这些较晚的器物年代定在春秋中叶。另一方面，《大系》将曾侯作叔姬簠、曾姬无卹方壶视为楚器，并将这个称侯的曾视为“楚之邻国”（《大系·叔姬簠》）。

郭沫若的认识代表了当时学术界对曾国的基本看法。杨树达在讨论曾侯簠、曾伯霥簠、曾子遇簠、曾子仲宣鼎、曾姬无卹方壶等器时，基本上采纳了郭沫若对曾国青铜器性质的认定③。例如在《曾侯簠》中，他说“郭沫若据彼文（指《楚王酓章镈钟》铭

① 罗振玉《贞松》记录曾国青铜器的背景，也只是限于“庚午岁（1930 年）见之辽东估人手”（《贞松》6.34 曾□⊠簠条下）；“己未岁（1919 年）见之都肆”（《贞松》6.24 曾子遇簠条下）。

② 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第 188 页，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 年。此书之考释部分《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出版于 1935 年。

③ 杨树达：《积微居金文说》（增订本），中华书局，1997 年。该书对曾器如曾侯簠、曾伯霥簠、曾子遇簠、曾子仲宣鼎、曾姬无卹壶逐器进行了讨论。

文，引者注）谓此簠亦是楚器，……按郭说皆是也”。杨树达同样也将大部分曾国铜器归为山东之鄫，并将《曾子簠》进一步引申为孔子门徒曾参（字子舆）所制之器。

但是这个称侯的曾是历史文献中的哪一个国家？刘节对此作了如下探索：“曾国有二，其在山东者，附庸于齐。……此姒姓之国，即周语所谓杞缯由大姒也。……故史学家皆以鄫为姒姓。然在古器之中求之，若曾伯陭壶、曾大保盆、曾子仲宣鼎、曾诸子鼎，皆无直接证据可断定为姒姓之国。反之，若曾伯霥簠、若曾侯簠，其与楚国之关系则显而易见。此在河南者，附庸于郑之曾也。水经洧水注‘缯人者，郑人也’；左氏襄公元年传‘次于鄫’，杜氏注曰‘郑地’。余以为此即姬姓之曾，与曾伯霥同族，故徐锴说文系传引杜预曰‘鄫，姬姓’。……可见有姬姓之鄫，又有姒姓之鄫。”① 在他看来，姬姓之鄫与历史文献记载的郑地之鄫、灭周之缯以及出土文物中的曾伯、曾侯之器都有关联，因此“曾人之足迹北起郑郊，南及光州，西起西阳，东抵睢州”。对于具体曾国的地望，刘节认为楚王酓章镈钟铭文中的“西阳”为曾国国邑，“处于汝阳南郡之间”。曾伯霥簠之繁阳即《左传》杜预所注“繁阳，楚地，在汝南鲖阳县南”。他推测说“曾伯霥平淮夷而南行，故所谓繁汤者，其地在楚。因处其族人于此，由是稍南移，乃邑于西阳。然则楚之曾，即郑之曾南徙而来，亦可略得其线索矣”。

刘节提出历史文献中也有姬姓之曾，进而认为历史文献中的曾国不止一个，这对后来的研究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②。不过，他的“鄫国姬姓”的结论，是引自徐锴《说文解字系传》，而徐锴之说，则是错误地引用文献所致，这一点学者们已经特别强调指出③。

刘节“郑地有姬姓之曾”说也影响到陈梦家④，后者认为“金文曾伯、曾侯、曾姬等器都是郑地之曾，监临淮水北的繁阳、淮夷”。此“曾”所指即《春秋》中“次于鄫”，地望如杜预注“鄫，郑地，在陈留襄邑县东南”。

这一阶段除了确定曾国青铜器与历史文献中山东之鄫的关系之外，学者们还能够不局限于历史文献，明确一个与楚国地理与政治关系近缘的曾国，是认识上的一大进步。

第二阶段：基于零星出土曾国青铜器的研究。

---

① 刘节：《寿县所出楚铜器考释》，《古史考存》108～140页，人民出版社，1958年。刘节此文撰于1934年，首次出版于1935年。

② 如杨宝成仍然认为：“（刘节以为曾国）是位于汝阳和南郡之间的一个姬姓曾国，……近来大批曾国铜器的发现，证明刘节先生的推断是正确的。”杨宝成：《试论随枣地区的两周铜器》，《中国考古学会第七次年会论文集·1989》，文物出版社，1992年。

③ 屈万里：《曾伯霥簠考释》，《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三十三本，台北，1962年。李学勤：《论江淮间的春秋青铜器·再论曾国之谜》，《文物》1980年第1期。

④ 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二）班簋条下，《考古学报》1955年第10册。

1966年，湖北京山苏家垅出土包括九鼎七簋的铜器群①，在器群的10件有铭器中，鼎、豆、方壶等6件青铜器带有“曾（侯）中斿父”铭文，说明这一器群的性质是曾国青铜器，曾国的地理位置位于鄂北一带。同时，该器群包括有九件大小成列的鼎。这一发现使过去学者们对曾国青铜器与历史文献关联的解说难以解释：这个曾国显然并非山东之鄫，但也看不出与楚国的联系。因此，大家认识到必须对历史文献重新进行检索。

在张政烺的指导下②，苏家垅简报指出，历史文献记载的曾国有三个，除了山东之鄫和河南郑地之鄫以外，第三个则是《国语·晋语》中所谓“申人、缯人召西戎以伐周”的缯国。申的地望在今南阳，京山符合缯国邻近申的条件。因此苏家垅铜器群可能属于这个缯国，其国姓为姬姓③。但是，简报中“灭周之缯为姬姓”的说法来源于刘节之说，存在与刘氏同样的错误。无论如何，山东之鄫、郑地之鄫、湖北之曾等三个曾国的说法，是在出土材料的知识背景之下梳理历史文献的重要成果。自此，学者们对于曾国的认识，均认可或在研究中运用了这一结论。

此后直至曾侯乙墓发掘之前，曾国青铜器又在随州、枣阳、新野连续有几次发现，似乎印证了曾国为灭周之缯的看法。报道这一时期曾国青铜器的简报因之都对此论点作了进一步的申述和明确。1971年新野城郊小西关发现一座墓葬④，随葬有铜鼎、敦形鼎、甗、簠、盆、盘、匜等，出土铜器中包括曾子仲諆甗。报告者根据《国语·郑语》认为申国在今南阳、唐河地区，而缯为“申之与国”，故缯即曾国。“此墓出土于新野城郊，北距南阳、唐河不过百里左右，与文献记载恰相符合，说明春秋初期新野地区当属曾国境内，或者就是曾国的一个重镇。”此后，枣阳、随州、桐柏、新野再次发现相关青铜器，至此，在豫南鄂北一带存在一个曾国，从考古学的角度来说是毋庸置疑的，新野墓葬的简报认为“这些文物资料不仅数量多，而且形制接近，时代也基本相同，它说明西周末至春秋初期在今汉水下游、淮河上游的广阔地域内确实存在着一个比较强大的曾国”。曾国墓葬的一个特点是随葬大批青铜器，“与文献所记载的当时曾国强盛一时的情况是符合的”⑤。

曾国为灭周之缯说不自苏家垅铜器群发现始。清人高士奇根据《国语》、《史记》中西周灭亡故事，认为申、缯必相近，缯国故地是在方城之外的缯关。而《左传》中

---

① 湖北省博物馆：《湖北京山发现曾国铜器》，《文物》1972年第2期。

② 舒之梅、刘彬徽：《论汉东曾国为土著姬姓随国》，《江汉论坛》1982年第1期。谭维四：《20世纪中国文物考古发现与研究丛书·曾侯乙墓》第66页，文物出版社，2001年。两文都谈到是张政烺提出三个曾国的见解。

③ 湖北省博物馆：《湖北京山发现曾国铜器》，《文物》1972年第2期。

④ 郑杰祥：《河南新野发现的曾国铜器》，《文物》1973年第5期。

⑤ 河南省博物馆等：《河南新野古墓葬清理简报》，《文物资料丛刊》3，1978年。

春秋鄫国在山东之地①。他将这两个曾国联系到一起，认为山东之鄫大约为灭周之缯迁徙而来。高士奇缯在方城之外、缯国有过迁徙等说，成为其后曾国性质讨论中不少论说的根源。早期受其影响的有容庚、刘节。容庚引高士奇之说，将曾国铜器与灭周之缯、山东之鄫并为一谈②。当刘节根据曾侯作叔姬簠、曾姬无卹方壶确定姬姓曾国存在之时，他也试图将灭周之缯与姬姓曾国联系起来。屈万里比较明确地提出：曾国“另有和申及西戎邻近的缯，是姬姓之国（当是江汉诸姬之一），……春秋初年，……成了楚的附庸国”③。他认为，楚王酓章镈钟、曾姬无卹方壶中的“曾”，就是这个姬姓的曾国。这一认识和后来苏家垅简报提出的看法基本相同。但同样，屈氏也未能够开列出灭周之缯为姬姓的充分依据。

本阶段研究自苏家垅铜器群的发现始，学术界几乎将青铜器中的曾国与参与灭周的缯相等同而不作他想，除了青铜器中曾与历史文献中缯（鄫）直接的关联、出土铜器与历史文献中曾与申两个国家恰好在地理位置上对应这两个主要原因之外，青铜器中的曾国表现出的实力颇为强大，似乎与“叛周”的身份也十分吻合。

第三阶段：曾侯乙墓发现后的曾国研究。

1978 年，湖北随州城郊发现曾侯乙墓，出土了包括曾侯乙编钟、九鼎八簋在内的总重量约十吨的青铜器，墓主为曾侯乙④。根据一般“国君的墓葬应在其国都”⑤ 的情况，曾国都城应在今随州。但是，按照历史文献中的记载，随国为姬姓，国都也在故随县。曾侯乙墓并非是曾国青铜器在随州一带出土的孤例，1970 年和 1972 年随州均川熊家老湾就两次出土曾国青铜器⑥，但均川熊家老湾至随州城区约有 20 千米距离，随国故地出土曾国青铜器的问题尚未充分暴露出来。由随州城郊、均川一带，结合枣阳、京山、新野出土曾国青铜器的情况，在随国故地及其周边分布着一个范围颇大的曾国，是学者们不得不承认的事实。出土资料与文献记载形成这样明显的矛盾，这种情形被学者称之为“曾国之谜”⑦。对曾国青铜器与历史文献的关联遇到的新障碍，很快在学术界掀起了一股讨论出土曾国青铜器性质的热潮。

提出“曾国之谜”的李学勤作了曾即随的解答。他认为《左传》说“汉东之国随

---

① 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卷十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版。

② 容庚：《武英殿彝器图录》38 曾子⿰匚簠条，哈佛燕京学社，1934 年。

③ 屈万里：《曾伯簠考释》，《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三十三本，台北，1962 年。

④ 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第 459 - 461 页，文物出版社，1989 年。

⑤ 李学勤：《曾国之谜》，《光明日报》1978 年 10 月 4 日。后收入《新出青铜器研究》，文物出版社，1990 年。

⑥ 鄂兵：《湖北随县发现曾国铜器》，《文物》1973 年第 5 期。

⑦ 李学勤：《曾国之谜》，《新出青铜器研究》，文物出版社，1990 年。

为大”，随国历经春秋之世不亡。随国的国力、存世时间与曾国一致，同时曾国姬姓、都城在今随州以及与楚国关系密切等特征，在历史文献中也恰好只有随国符合。因此曾随说一出，立即得到了许多学者的认同，并进一步形成不同的解说。

差不多与李氏之说同时①，石泉也不约而同地提出了曾随合一的论点②。其论据也是曾随“在时、地、族方面相重合”。石泉对曾国的性质作出了更为深刻的思考。曾国青铜器出土地点与申国所在的南阳接近，使人易于联想到文献记载与申国邻近的灭周之缯。因此他引童书业之说，认为参与灭周的申国为西申而非南阳之申，西申和灭周之缯相邻，都应在陕西关中附近，此意是为排除曾国与灭周之缯的关联。同时，他还认为“曾国既是姬姓国，必然是由北方迁来的西周封国之一”。但是，参与灭周的申国为西申的说法论据并不很充分，且在学术界有较大争议。因此徐少华提出随枣一带的曾国与灭周之缯是两个并存的国家③。曾国即随国，系由北方迁来，大约在周成王时受封于随枣一带；而缯国地望在缯关一带，春秋早期之后下落不明，可能为楚所灭。

不过，李学勤在其后续的研究中，明确不同意曾国有过迁徙的看法。他认为曾作为地名可追溯到商代甲骨文和西周早期金文，其地正在汉东地区④。但是，曾国历史可以追溯到商时期的迹象，恰恰是支持曾国可能迁移的证据。因为既然曾国为姬姓国家，何以能够在商时期活动在随枣走廊一带？为解决这一矛盾，曾随说者还提出了曾国为土著姬姓说⑤，因为根据历史文献，“黄帝是姬姓，他的分支中，头一名也是姬姓”，“有理由推测，在原始氏族社会阶段，现今江汉地区和汉东一带，有姬姓的氏族或部落生息于斯”，而曾国即出自于此。不过，土著姬姓说的理由特别是文献可信程度似乎并不充分。

但毕竟，曾国即缯国或鄫国是出土文献与历史文献最可能的关联。这样，曾国与灭周之缯在名字上的直接联系，同时曾国与随国在地理位置上的重合，使曾国体现出既像缯国也像随国、既与缯国矛盾也与随国矛盾的特性。这使学者们在探讨曾国国族性质时为调和这种矛盾而努力，使曾、缯、随关系出现了种种可能的假说。例如：

曾国为随—缯说⑥。此说认为曾即缯为姬姓，由南阳以北的缯关迁至随故地，并在

---

① 谭维四回忆说石泉于1978年6月“首先提出了‘曾、随为同一国家’的见解”。见谭维四：《20世纪中国文物考古发现与研究丛书·曾侯乙墓》第67－68页，文物出版社，2001年。只是石泉论文发表在李学勤文之后，并在文中引叙到李文。

② 石泉：《古代曾国——随国地望初探》，《武汉大学学报》1979年第1期，后收入《古代荆楚地理新探》，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

③ 徐少华：《曾即随及其历史渊源》，《江汉论坛》1986年第4期。

④ 李学勤：《续论曾国之谜》，《楚学论丛——江汉论坛专刊》1990年9月。

⑤ 舒之梅、刘彬徽：《论汉东曾国为土著姬姓随国》，《江汉论坛》1982年第1期。

⑥ 杨宽、钱林书：《曾侯之谜试探》，《复旦大学学报（社哲版）》1980年第3期。

楚国的帮助下灭随而代之。但是，如果缯灭随，按照历史文献记载缯为姒姓，这与春秋早期至战国时期曾国姬姓的材料矛盾。为了修补这一缺陷，主张此说的任伟，提出缯国亦为姬姓的说法①。但缯国姬姓的论点需要更多的文献依据。

曾为缯—随说。认为曾国青铜器早期属于灭周之缯为姒姓，晚期属于随国为姬姓。缯地望与申国接壤，南与随国近邻。随国灭姒缯，而迁都于缯国故都西阳（今河南光山），并自称曾②。不过，此说认为随国晚期都城在光山与考古发现情况不符。张昌平对此说进行补充，认为晚期曾国都城在今随州，大约在春秋早期随灭缯国③。

曾即缯、随说④。此说强调过去学者已经提出的曾国与灭周之缯的联系，联系到曾国邻近申国的南阳，因此认为曾即缯。又因为曾随的一致性，故曾即是随。这种假说也是在曾随说的基础之上提出，但不能解释文献中的缯国姒姓而铜器中的曾国姬姓，此说更承认《国语·郑语》中“既提到缯（申、缯、西戎方强），又提到随（南有……陈、蔡、随、唐）。……郑、随同见于《郑语》，……这仍然是一个矛盾”⑤。

缯、随合并说⑥。认为春秋早期楚人将灭周之缯与随国合并，曾、随只是在不同的情形下称谓的不同。此说只是为调和缯、随矛盾的臆测，并没有具体的历史背景或材料依据。

历史文献和出土文献中许多诸侯国都不能相互关联，这在目前是一个常见的现象。因此没有发现随国青铜器，并不意味着随就是曾，也就是说，不应随意将历史文献和出土文献中不同名称的国家牵扯到一起。基于这样的考虑，自然并非所有的学者都同意曾与随国相关的观点。杨宽等认为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如鲁、秦，国君墓葬不一定在都城，因此曾侯乙墓的位置并不意味这里就是曾国都城。曾、随是两个不同的国家，曾即是姒姓的灭周之缯，至战国早期仍然为势力较大的独立诸侯国，与作为附庸的随国地位不同。曾国都城西阳处于今光山西南，位置在随之东。缯、随两个国家在西周时期就开始同时并存。⑦ 鉴于曾姬无卹方壶的存在，这一说法认为还另外有一个姬姓曾国，但其地望“不知所在”。但是，曾国铜器中另外还有若干器可反映曾国姬姓的特征，与此说

---

① 任伟：《曾、随之谜试解》，《华夏文明的形成与发展——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建所五十周年庆祝会暨华夏文明的形成与发展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大象出版社，2003 年。

② 于豪亮：《为什么随县出土曾侯墓》，《古文字研究》第一辑，中华书局，1979 年。

③ 张昌平：《曾国为缯——随说》，《江汉考古》1994 年第 4 期。

④ 周永珍：《曾国与曾国铜器》，《考古》1980 年第 5 期。姚政：《古曾国考》，《南充师范学院学报》1980 年第 4 期。陈振裕、梁柱：《试论曾国与曾楚关系》，《考古与文物》1985 年第 6 期。

⑤ 周永珍：《曾国与曾国铜器》，《考古》1980 年第 5 期。

⑥ 刘先枚：《“曾国之谜”的猜想》，《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 年第 1 期。

⑦ 杨宽、钱林书：《曾侯之谜试探》，《复旦大学学报（社哲版）》1980 年第 3 期。杨宽还进一步强调了这一论点，参杨宽：《西周史》642～652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年。

曾即姒姓缯国相矛盾。此外，曾国青铜器反映的曾国地域明确跨越随州之西，这些都是此说不能解释的问题。

曾昭岷等也反对曾国即随国之说，认为出土青铜器的曾国有三个①：称谓为曾子某的曾国爵称为子，对应历史文献记载中的山东琅琊一带的“东海曾国”②；称谓为曾伯某的曾国爵称为伯，对应历史文献中郑地的曾国，其地在汝颍之间；而称谓为曾侯的曾国爵称为侯，此即灭周之缯，地望先在南阳一带，其后迁至淮西。从这些说法中依然可见刘节的影响，但曾昭岷认为上述曾国均为姒姓，其青铜器之所以多出土于湖北地区一带，是楚人作为战利品攫取而置于楚墓之中，因此曾侯乙墓并非战国早期曾侯之墓，而是战国晚期楚墓③。此说中关于曾侯乙墓的年代与性质已有学者作出明确的辩驳④，除此而外，历年出土的曾国青铜器不同的铜器群多是组合有序、年代一致，楚人不可能专门挑选年代、性质相同的曾国青铜器分别作为不同墓葬的随葬品。可见，此说的一些基本论据存在问题。

“曾、随国别既异，形、音亦相差很远，无由合而为一”⑤，黄盛璋认为曾国“应是随为楚灭后迁居随地”，即曾国原来在南阳新野一带。他也认为曾国为姬姓，但未明确表示此曾国是否为灭周之缯。

曾侯乙墓表现出较强的楚文化特征，因此徐扬杰认为曾侯乙“是楚国在春秋战国之间分封于原随地的楚国大贵族”，而西周、春秋等早期的曾国青铜器，则属于南阳之曾，这个曾国就是与申国为邻的灭周之缯⑥。此说既强调曾国、随国不可能为同一个国家，实际上又将曾国青铜器与缯国、随国关联到一起。但是曾国青铜器在春秋、战国时期都表现出姬姓的特性，却是此说对曾国青铜器前后两个阶段不同假说的障碍。

当曾国青铜器的发现达到一定数量，对其研究自然不再局限在狭义的历史学范畴之内。因此在曾侯乙墓被发现后，有关曾国青铜器文化特征、与其他青铜文化关系的研究，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像这一时期其他考古学研究项目一样，对曾国青铜器进行的考古学研究，首先也是自年代学框架的建立开始。

首先对曾国青铜器作分期研究的是周永珍，她将当时随州、京山、枣阳、新野出土

---

① 曾昭岷、李瑾：《曾国和曾国铜器综考》，《江汉考古》1980 年第 1 期。

② 《曾国和曾国铜器综考》文中“琅琊”均作“琅邪”，疑为编辑之误。

③ 曾昭岷、李瑾：《随县擂鼓墩一号墓年代、国别问题刍议》，《武汉师范学院学报》1979 年第 4 期。曾昭岷、李瑾：《随县擂墓断代补论——兼答郭德维君》，《武汉师范学院学报》1982 年第 2 期。

④ 郭德维：《随县曾侯乙墓的年代——与曾昭岷、李瑾同志商榷》，《武汉师范学院学报》1980 年第 1、2 期合刊本。郭德维：《曾侯乙墓并非楚墓》，《江汉论坛》1980 年第 1 期。

⑤ 黄盛璋：《山东诸小国铜器研究·鄫（上曾）国》，《华夏考古》1989 年第 1 期。

⑥ 徐扬杰：《关于曾侯问题的一点看法》，《江汉论坛》1979 年第 3 期。

的早于曾侯乙墓的七批青铜器材料，与周原及其他诸侯国青铜器进行了比较分析①，指出它们的年代早至西周晚期，较晚者在春秋中期。

20 世纪 90 年代，曾国青铜器又有几次新的发现。1981 年在距离曾侯乙墓约百米处发现擂鼓墩 M2，墓葬年代晚于曾侯乙墓而在战国中期②。在随州义地岗墓地发现几批青铜器，年代多在春秋中晚期③。这样，曾国青铜器材料基本上已经涵盖了迄今所知的各个时间段，对曾国青铜器进行全面的分期条件成熟。杨宝成、张昌平先后尝试了分期工作。杨宝成认为“曾国青铜器上限可达西周早期，下限为战国中期”④，他将曾国青铜器划分为西周早期、西周晚期、春秋早期、春秋晚期、战国早期、战国中期六个时期，战国早期楚文化开始形成对曾国青铜器的影响。在另一篇相似的文章里，他更将随州出土的商代青铜器归入曾国⑤，认为曾国青铜器早晚各期一脉相承，基本上属于中原文化体系，从春秋晚期开始有来自楚文化的影响。张昌平不同意将随枣走廊一带的商、西周早期青铜器归入曾国⑥，他将西周晚期至战国时期曾国青铜器划分为七个期别，认为曾国青铜器前后两个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的文化特性，强调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曾国青铜器与周文化特征基本相同，而春秋中期之后的曾国青铜器则与楚文化特征相同。2002－2003 年，襄樊市考古队等对枣阳郭家庙墓地进行了发掘⑦，这是首次以墓地为单位规模对曾国遗存的发掘。发掘者将该墓地曾国青铜器分为西周末年至春秋早期三个时期。通过这样一些工作，曾国青铜器的年代系列大体建立了起来。

曾侯乙墓面世后，关于墓葬出土青铜器的文化属性为学者们所关注。一般学者都注意到，曾侯乙墓青铜器表现出强烈的楚文化特征。舒之梅等比较了曾侯乙墓升鼎、盖鼎、青铜器纹饰乃至于铭文，较全面地论证了“进入战国以后，曾国文化确已纳入了楚文化的范围”⑧。也有学者认为曾侯乙墓青铜器有一些中原文化特征⑨，或者“有些是受东周时期中原文化的影响或具有曾国自身特点，但更多的是与楚墓的墓葬形制、随葬

---

① 周永珍：《曾国与曾国铜器》，《考古》1980 年第 5 期。

② 湖北省博物馆等：《湖北随州擂鼓墩二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85 年第 1 期。

③ 随县博物馆：《湖北随县城郊发现春秋墓葬和铜器》，《文物》1980 年第 1 期。随州市博物馆：《随州东城区发现东周墓葬和青铜器》，《江汉考古》1989 年第 1 期。

④ 杨宝成：《试论随枣地区的两周铜器》，《中国考古学会第七次年会论文集·1989》，文物出版社，1992 年。

⑤ 杨宝成：《试论曾国铜器的分期》，《中原文物》1991 年第 4 期。

⑥ 张昌平：《曾国铜器的分期及其相关问题》，《江汉考古》1992 年第 3 期。

⑦ 襄樊市考古队等：《枣阳郭家庙曾国墓地》，科学出版社，2005 年。

⑧ 舒之梅、刘彬徽：《从近年出土曾器看楚文化对曾的影响》，《楚史研究专辑》第一期，武汉师范学院学报 1982 年。又见《楚史论丛》，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 年。刘彬徽：《曾侯乙墓青铜礼器初步研究》，《湖北省考古学会论文选集》1988 年第 1 期。两文均收录于刘彬徽：《早期文明与楚文化研究》，岳麓书社，2001 年。

⑨ 时学颜：《有关曾国遗物所表现的文化性质》，《江汉考古》1985 年第 3 期。

器物相同或近似，表明它受楚文化的影响是很深刻的”①。至于春秋晚期之前的曾国青铜器，大家的共识是具有与中原地区文化关系密切的特征②。

除了因为对曾国属性讨论而附论曾国都城、存亡等问题之外，也有学者对相关曾国历史问题进行了研究。刘彬徽等基于属于战国中期偏早的擂鼓墩 M2 为曾国墓葬、而擂鼓墩墓群的 M13 属于战国中期偏晚属于楚墓的认识，推断曾国灭亡于战国中期③，李家浩根据曾姬无卹方壶铭文也得出近似的结论④。关于曾国都城的地望，除了因为曾侯乙墓而认为在今随州之说外，石泉根据对历史文献的考订，认为曾都应当在汉代随县故城即今随州安居一带⑤，左德田亦支持此说⑥。1998 年通过遥感发现的安居古城似乎进一步佐证了这一观点⑦。不过，枣阳郭家庙曾国墓地发现有级别较高的 M21，发掘者因之认为该地为曾国都城⑧。显然，对于曾国都城问题，其复杂性也可能超乎我们的想象。

在曾国青铜器的研究中，也有具体而微的个案研究。李先登以“曾”字的写法区别湖北之曾和山东之曾⑨。而陈振裕等运用相同的研究方法，得出了京山、随州、新野不同地点出土的曾国青铜器应当属于同一个曾国的结论⑩。不过，这一方法似乎首先需要证明这样一个前提：同一时期、不同诸侯国的曾国字形是否一定不同？两周之际前后的青铜器铭文是否已经具有地方特征？

曾侯乙墓出土青铜器也还推动了相关学科与考古学的合作研究。编钟作为曾侯乙墓最为重要的发现，围绕其进行了全面的音乐学检测和复制研究，学者们对编钟的研究，也形成了丰硕的成果⑪。1988 年召开的“曾侯乙墓编钟国际学术研讨会”，是对曾侯乙编钟研究的一次总结⑫。此后，罗泰（Lother von Falkengousen）、贝格立（Robert Bag-

---

① 陈振裕、梁柱：《试论曾国与曾楚关系》，《考古与文物》1985 年第 6 期。

② 周永珍：《曾国与曾国铜器》，《考古》1980 年第 5 期。陈振裕、梁柱：《试论曾国与曾楚关系》，《考古与文物》1985 年第 6 期。

③ 刘彬徽、王世振：《曾国灭亡年代小考》，《江汉考古》1984 年第 4 期。

④ 李家浩：《从曾姬无卹壶铭文谈楚灭曾的年代》，《文史》第 33 辑，中华书局，1990 年。

⑤ 石泉：《古代曾国——随国地望初探》，《古代荆楚地理新探》，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 年。

⑥ 左德田：《曾都刍议》，《江汉考古》1990 年第 1 期。

⑦ 张昌平：《安居周代城址的发现及其意义》，《中国文物报》1998 年 8 月 26 日第 3 版。

⑧ 襄樊市考古队等：《枣阳郭家庙曾国墓地》结语，科学出版社，2005 年。

⑨ 李先登：《曾国铜器的初步分析》，《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6 年第 9 期。

⑩ 陈振裕等：《试论曾国与曾楚关系》，《考古与文物》1985 年第 6 期。

⑪ 部分成果收入曾侯乙墓发掘报告。相关成果可参见谭维四《20 世纪中国文物考古发现与研究丛书·曾侯乙墓》参考文献，文物出版社，2001 年。

⑫ 会议讨论的成果，汇集出版为论文集，见湖北省博物馆等：《曾侯乙编钟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1992 年。

ley）分别从音乐的角度对曾侯乙编钟进行了颇有影响的研究①。

曾侯乙墓出土青铜器也促进了对相关青铜器进行自然科学的研究工作。学者们主要就青铜器合金性质、曾侯乙尊与盘的失蜡法工艺、曾侯乙编钟的铸冶技术以及红铜纹饰铸镶法进行了较多的讨论②。这些研究不仅对曾国乃至整个战国早期及前后青铜器工艺水平的了解都有较大的价值，同时也奠定了对春秋战国之际前后青铜器制作工艺研究的基础。不过，对于当时认为曾侯乙尊盘是失蜡法铸造的结论③，近年又有否定的看法。反对意见认为曾侯乙尊盘所谓失蜡法铸造的附饰是范铸后焊接而成④，主张此说的学者则从间接的角度捍卫原有观点⑤。不过，两派意见似乎都未有坚实的证明己见的依据⑥。

此外，陈千万等对郭家庙墓地出土的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曾国青铜器铸造工艺进行了研究⑦，这使两周之际前后曾国青铜器的工艺特征也大体展现出来。

纵观曾国青铜器的研究，总体是一个认识不断深入、视角不断拓宽的过程。但同时，如下的不足和有待深入之处也应该提出，作为我们重新开始这一研究的借鉴。

编史（Historiography）倾向⑧强烈地表现在曾国青铜器研究之中。从金石学到考古学研究的不同时期，虽然曾国青铜器本身的数量和特征都相对突出，但研究者对于曾国的认识往往只是落脚在与文献记载国家的对应之上。这种不遗余力地去寻找历史文献材料来比附出土文献资料的努力过程，恰恰是随着新材料的出土，不断变幻新的假说和不断推翻旧说的过程，这一过程又恰恰强烈地显示出这些假设的脆弱性。形成这一局面的

---

① Lother von Falkengousen, Suspended Music – Chime – Bells in the Culture of Bronze Age Chi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其中该书第七章第 244 – 255 页、第八章专门讨论了曾侯乙编钟。Robert Bagley, The Prehistory of Chinese Music Theory, 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 131, pp41 – 90. The British Academy, 2005.

② 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附录 5 – 8、10 – 14，文物出版社，1989 年。

③ 上世纪关于曾侯乙尊盘失蜡法工艺的研究，主要见于苏荣誉等：《中国上古金属技术》第 312 – 317 页，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 年。华觉明：《中国古代金属技术——铜和铁造就的文明》第 164 – 175 页，大象出版社，1999 年。

④ 周卫荣等：《中国青铜时代不存在失蜡法铸造工艺》，《江汉考古》2006 年第 2 期。周卫荣等：《失蜡工艺不是中国青铜时代的选择》，《中国文物报》2006 年 7 月 21 日第 7 版。周卫荣等：《再论“失蜡工艺不是中国青铜时代的选择”》，《南方文物》2007 年第 2 期。

⑤ 华觉明等：《中国失蜡法的研究、鉴定和著述记略》，《中国文物报》2006 年 9 月 15 日第 7 版。李元芝等：《许公宁透空蟠虺纹青铜饰件——先秦失蜡法之一器例》，《中原文物》2007 年第 1 期。谭德睿：《中国早期失蜡铸造问题的考察与思考》，《南方文物》2007 年第 2 期。

⑥ 张昌平：《关于曾侯乙尊盘是否采用失蜡法铸造争论的述评》，《江汉考古》2007 年第 4 期。

⑦ 陈千万等：《枣阳郭家庙曾国墓地出土铜器铸造工艺探析》，襄樊市考古队等《枣阳郭家庙曾国墓地》附录三，科学出版社，2005 年。

⑧ Lothar Von Falkenhausen, On the Historiographical Orientation of Chinese Archaeology. Antiquity 67. 257 (1993), pp. 839 – 49.

原因，是因为研究者多数并未从曾国青铜器自身的特征研究入手，而仅仅是根据少数几条文献材料的对应，就推导出种种依据并不充分的结论。虽然这些结论不少是有明显的漏洞甚至自相矛盾，但论者似乎往往乐此不疲而不作他想：这正是所谓编史倾向的大环境影响所致。而囿于这种研究倾向和时代的局限，学者们对于应当进行的研究工作，即曾国青铜器自身的特征及其所反映的历史文化面貌，却鲜有涉及。即便是曾侯乙墓出土之后曾国青铜器材料不断丰富，也依然是猜测“曾国之谜”者众，而研究曾国青铜器者寡。

一些为学术界所诟病的研究方法累累出现。在对历史文献的理解和运用上，往往将文献中与缯（鄫）相关的名词一并与缯（鄫）国挂钩。许多学者将文献中的缯（鄫）一概视为国名，而无视其作为地名的性质；或者在考察缯国地望时，将“缯关”直接等同于缯国地望①。在曾国青铜器的研究中，凡出土曾国青铜器的地点，即被视为曾国的疆域范围；带有曾国铭文铜器的墓葬，墓主即被视为曾人。例如许多学者因为新野小西关出土有一件曾子仲谏甗，均将新野作为论证曾国地望的主要依据。擂鼓墩 M2 出土有铭青铜器仅见一件簠②，器主盛君縈即被视为该墓墓主③。这些未必可靠的孤立例证，当然可能导致不实的结论。

在研究方向上，以曾国青铜器为对象的研究更有待深入。曾国青铜器的发现，无论在数量、年代跨度和级别的构成上，都是在周代诸侯国中比较突出的，这为曾国青铜器研究从深度和广度的扩展，提供了极佳的条件。但在过去有关曾国青铜器的研究，仍然主要停留在年代框架的建立、文化特征的总结和文化属性研究的层面上。对于形成这些特征的文化背景和机制，对于曾国青铜器文化属性的成因等等方面，则缺乏深入、细致的讨论。

第二节　研究范围、任务和方法

一　范围与对象

曾国青铜器应当是指曾国立国时间之内曾国的青铜器，这包括曾国立国的时间和曾国存在的空间两个方面的范畴。但是，这一时空范畴并不十分明确，因为我们对于曾国

① 清人高士奇最早作此推测：（《左传》）“哀四年‘致方城之外于缯关’，岂其故墟呼?”（《春秋地名考略》卷十四）其后诸多学者将缯关作为曾地的直接证据。

② 湖北省博物馆等：《湖北随州擂鼓墩二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85 年第 1 期。

③ 饶宗颐：《谈盛君簠——随州擂鼓墩文物展侧记》，《江汉考古》1985 年第 1 期。吴郁芳：《擂鼓墩二号墓簠铭“盛君縈”小考》，《文物》1986 年第 2 期。

的认识，正是源自于曾国青铜器的发现。曾国的立国时间、曾国所涵盖的空间范围等，都是有待通过曾国青铜器的研究来明确的。

从研究的时间范畴角度看，目前所知有曾国标识的青铜器，自西周晚期延续至战国中期。这段时期自然成为本项研究中的主要时段，该时段的曾国青铜器即为本研究的主体。但是，这一时间范围并不会完全对应于曾国的立国时间。一方面，出土文献材料表明，曾国的活动可能早至晚商时期就已存在①，而西周早中期更已经有明确的关于曾国的信息。这就是说，曾国的立国时间上限，远远早于目前所知曾国青铜器的时间范围。因此晚商至西周早中期，也是研究曾国青铜器所需要关注的，甚至这一时间段内，还有可能存在未为我们所认识的曾国青铜器。另一方面，学者们一般认为，曾国大约灭亡于战国中期偏早阶段②，但此时原来组成曾国的人群并不会因此遽然消失，曾国灭亡前后文化变迁的情形也是观察曾国青铜文化一个有趣的视角。例如，有学者认为，曾姬无卹方壶应当是铸造于曾国灭国之后③。但是该方壶包含有关于曾国的重要历史信息，当然仍然是我们研究的对象。

在空间上，曾国青铜器的范畴更加复杂，这需要从几个方面来认识和界定。

有曾国标识的青铜器，出土在今山东、湖北、河南、四川、安徽、江苏等范围广大的地域，它在国族属性上可能代表两个曾国：山东的曾国和鄂北豫南一带的曾国。山东临朐泉头村发现上曾太子般殷鼎④，“上曾”之称在这里应该是相对于另外一个曾国而言。据历史文献记载，山东地区存有姒姓鄫国，应该就是这个“上曾”⑤。本项研究的曾国，是山东曾国以外、鄂北豫南一带出土青铜器所代表的曾国。这里我们称之为“湖北之曾”⑥ 或简称为“曾国”，以区别“山东之曾”。

但鄂北豫南其实只是概念上曾国的地域属性，它并不是一个明确等同于曾国的区域范围。一方面，鄂北豫南地区是一个较曾国大得多的地域，在西周晚期至战国中期存在其他国家、出土大量其他国家青铜器。另一方面，某国青铜器的出土范围并不等于该国的地域范围。由于青铜器各种形式的外流，一个国家青铜器的流传范围，往往会大于该国的地域范围。资料表明，曾国青铜器明确出土在其他诸侯国地域范围之内，曾国青铜

---

① 江鸿：《盘龙城与商朝的南土》，《文物》1976 年第 2 期。收入李学勤《新出青铜器研究》，文物出版社，1990 年。

② 刘彬徽、王世振：《曾国灭亡年代小考》，《江汉考古》1984 年第 4 期。

③ 李家浩：《从曾姬无卹壶铭文谈楚灭曾的年代》，《文史》第 33 辑，中华书局，1990 年。

④ 临朐县文化馆等：《山东临朐发现齐、鄩、曾诸国铜器》，《文物》1983 年第 12 期。

⑤ 孙敬明等：《山东临朐新出铜器铭文考释与有关问题》，《文物》1983 年第 12 期。李学勤：《试论山东新出青铜器的意义》，《文物》1983 年 12 期。又载于《新出青铜器研究》，文物出版社，1990 年。

⑥ “湖北之曾”未必是一个妥当的名称，这样叫法只是相对于“山东之曾”而言。

器的出土范围是大于曾国的地域范围的。因此反之，曾国地域范围并不是简单的曾国青铜器出土地点的集合，而实际上是需要对曾国青铜器作具体的分析和研究之后才能给出。这样，我们的研究对象在空间上并没有一个现成的界定，它需要在鄂北豫南这一范围之内对那些可能与曾国青铜器相关的铜器群进行一个具体的预判和甄别。

要明确鄂北豫南地区业已发现的可能与曾国铜器相关的所有青铜器的性质，实际的情形也比较复杂。曾国的青铜器的构成单位包括单件的青铜器和各个不同的青铜器群。从个体上看，曾国青铜器在形式上可能是带有曾国铭文标识的青铜器，也可能是无曾国铭文标识或无铭的青铜器；它可能出土在曾国地域范围之内，当然也可能出土在曾国地域范围之外；无曾国铭文标识的青铜器未必不是曾国青铜器，而有曾国铭文标识的青铜器，是否是具有曾国的性质仍然需要考虑，例如前举曾姬无卹方壶，生产该方壶的国家无疑是楚国而非曾国①。出土在曾国疆域之外的青铜器，很可能是由曾国流传而出，但也可能就是在他国铸造。一些他国青铜器也可能成为曾国青铜器的研究对象，因为他国青铜器可能会流入曾国，甚至也可能会是在曾国铸造。这样，从研究对象的角度判定曾国青铜器，是那些能够反映曾国历史文化信息的青铜器。而在对一个器物群的判断上，带有曾国铭文标识的青铜器在数量上总是只占少数，因此我们主要需要确定那些没有铭文而出土于曾国疆域范围之内的器群。

基于上述曾国青铜器在认知上的一些可能性，属于我们研究范围的曾国青铜器，大约包括如下几种情况：

1）一个器群中有几件带有相同性质曾国铭文铜器，结合其出土的时空范围，由此可以判断该铜器群在性质上是否可能为曾国青铜器。若是，则该铜器群其他无铭文的青铜器也应当为曾国青铜器。若某一地理单元存在若干性质相同的器群，则可进一步判断该地域出土青铜器具有曾国青铜器的性质；

2）一个器群中只有个别带曾国铭文标识、或者没有明确的曾国标识，但从地理位置、年代、文化特征上关联于第1类铜器群性质，也可以推定它为曾国青铜器；

3）有曾国铭文标识的个别铜器，出土在曾国疆域范围之外并与他国铜器群形成组合，该曾国铭文铜器仍然属于曾国青铜器；

4）数件带有曾国铭文标识的青铜器，出土在曾国疆域范围之外的铜器群之中，该器群有可能是曾国青铜器群；

5）有他国铭文标识的青铜器、或者没有他国铭文标识的铜器，但由纹饰等器物风格判断非曾国生产的青铜器，出土在性质明确为曾国的铜器群之中，该铜器与曾国铜器

① 曾姬无卹为曾国女子嫁入楚国，该方壶也是嫁入楚国后在楚国所作。但从研究范围的角度而言，又应该属于曾国青铜器研究的对象。

形成组合关系，从组合关系、文化交流等研究来说，它仍然是曾国青铜器研究的一部分；

6）采集和传世品中性质可能属于鄂北豫南曾国的青铜器。

当然，从可行性上说，我们很难区分那些没有曾国铭文标识而可能流失在曾国之外的青铜器，也无法判明其曾国的性质，这些青铜器无从成为我们的研究对象。当然，从研究的角度而言，我们无须将所有的曾国青铜器列为我们的研究对象。同时，假定存在同出于曾国青铜器群之中的他国青铜器，或者无他国标识亦不能从风格判别非曾国青铜器，则亦为我们的研究对象。

另外，从研究材料的角度看，考古学研究当然以科学发掘品为主要对象。但曾国青铜器材料从考古发掘到偶然发现，从零星收集到历代传世品，俱应是研究对象的一部分。特别是容易被忽视的传世品，无论是曾国青铜器抑或是与曾国青铜器研究相关的其他传世品，都应当被给予同样的重视①。

二 目的与任务

因为关乎中华民族文化渊源以及人们对于商周时期礼仪、历史、文化特殊的情感，无论是宋代开始的金石学，还是发端于近代的中国考古学，都是以商周时期为研究重点。这一偏重，使商周考古成为中国考古学文化面貌最为清晰的时段之一。时至今日，反映商周时期青铜文化时空变化的框架，基本已经搭建起来②。在此框架之下，大体可以把握不同时期、不同地域文化的一般特征，中原文化与周边地区文化、周边地区文化之间的交互关系以及不同区域考古学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也都基本清楚。在周代，由于历史和出土文献材料的优势，这个框架更加细致一些。但是，对于某一地区——或者在这一时期该地区表现为某一诸侯国，其青铜文化的特性、发展过程以及与中原中心文化区域的关系，往往就并不那么明晰。也就是说，以诸侯国为时空单位的方国文化研究，在搭建周代文化框架中是有待丰富的一个方面。

周代封邦建国的体制，使当时的物质文化如青铜器形成以诸侯国为单位的地域构成。郭沫若在20世纪30年代即已尝试“以国别为次”来整合东周青铜器资料③。与这种历史学倾向不同的是，考古学文化研究更加注重以区域文化共性特征为依据来划分地

---

① 在青铜器研究中应该是发掘品和传世品并重，这一点邹衡有精辟的分析。参邹衡等：《整理后记》，郭宝均《商周青铜器群综合研究》第197－198页，文物出版社，1981年。

② 李伯谦：《中国青铜文化的发展阶段和分区系统》，《华夏考古》，1990年第2期。收入李伯谦：《中国青铜文化结构体系研究》，科学出版社，1998年。孙华：《中国青铜文化体系的几个问题》，《考古学研究（五）》，科学出版社，2002年。

③ 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序言》，科学出版社，1958年。

域单位，学者们更愿意从三晋、楚系等大的文化区域角度来把握东周文化区系①。这对于宏观地总结当时的区域文化特征无疑是合适的。学者们以晋、齐鲁、秦、楚、吴越等为区块对当时青铜文化特征的总结，也说明这种把握是相当成功的。但是，除了秦、齐、楚这些在春秋时期形成相对独立文化体系的大国之外，更多的小国文化湮没在这种宏观的框架之中。比如，春秋战国之际与楚国相关的小国，尚存陈、蔡、卫、郑、曾等。他们在楚文化体系形成之前的文化地位如何？在楚系文化的形成过程之中是否和如何发挥其作用？曾国出土材料的年代和等级系列比较完整，如果我们以其作为探究这类国势较小的方国文化的个案，应当是一个很好的典型。

青铜器是商周时期最为重要的物质文化材料，在周代，这一点更加突出。如果说商时期文化框架是以甲骨文材料为基础搭建的话，青铜器铭文则是建立周时期框架的基础。青铜器研究构成商周青铜文化研究的主体，还因为青铜器自身代表社会精英阶层的特质以及具备反映历史文化多层次、多方面的信息。曾国也是因为青铜器和青铜器铭文才得以确定其国族、文化属性的。曾国青铜器研究同样应当揭示曾国从文化特征到生产力发展状况乃至上层建筑构成等方面面貌，并由此构成研究曾国历史文化的核心。

曾国青铜器研究这样的取向，涉及此类考古学研究性质的定位。尽管近年来学术界对于中国考古学的定义存在诸多分歧，但从本质上说考古学仍然属于广义历史学的范畴②——但它当然也不是对狭义史学的填阙补遗。这一点，如我们前面分析的情况，在商周时期的考古学研究中更为突出。因此，考古学特别是三代考古研究任务，也像历史学研究一样，是为丰富历史框架内容而努力③，只是这些内容可以是以考古学语言及形式来表达。曾国青铜器研究也是如此，一方面它是以青铜器为研究对象的考古学文化研究，同时更是对曾国物质文化及其所反映的历史研究。

作为曾国青铜器的研究任务，因此也相应的包括两个方面：一、以考古学文化研究的手段和途径，考察曾国青铜器特性及其形成背景。二、由曾国青铜器折射出的信息研究曾国存亡、疆域、世系等历史问题。无疑，这一研究既是考古学的、同时也是历史学的。

这两个方面任务具体需要从如下一些角度展开：

年代学问题。考古学研究总是从建立年代学系列的基础工作入手。虽然关于曾国青铜器的分期已经有现成的研究成果，但在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的时间段内，学术界对于中原地区青铜器的分期意见并不一致，曾国青铜器的分期工作也仍然有进一步讨论和完

---

① 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第 11 - 12 页，文物出版社，1984 年。

② 朱凤瀚：《论中国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关系》，《历史研究》2003 年第 1 期。

③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考古学与中国历史的重构——为纪念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成立五十周年而作》，《文物》2002 年第 7 期。

尊之处。在春秋中期至战国中期的时间段内，曾国青铜器与相应楚系青铜器的年代对应关系也不明确。同时，我们重建曾国青铜器的分期还缘于这一分期较过去分期研究目的的有所不同。除了在分期中总结各期曾国青铜器器物特征之外，曾国青铜器的工艺、文字在不同时期的变化以及曾国青铜器器形、纹饰、工艺、文字内在的关联，都是要在年代系列下进行考察的。因此，曾国青铜器的分期仍然是一项重要的基础工作。

曾国青铜文化的地位。如上节曾国青铜器研究史所示，学者的研究已经表明，曾国青铜器在早晚不同的阶段分别接近于周文化和楚文化体系，即较早时期的曾国作为周文化体系下一个方国的文化特征，较晚时期的曾国作为楚系文化体系下一个附庸国的文化特征。但问题在于，政治处于他人掌控或影响之下的曾国，其青铜文化地位如何？文化形成的背景如何？比如，说曾国青铜器较早时期接近周文化，但这一时期的周王朝恰恰在政治上处于式微和对诸侯国失控的过程，曾国青铜器何以以及如何保持周文化传统？又如，说曾国青铜器晚期趋同于楚系青铜器，则是否当时曾国的青铜文化因素都是在楚文化的影响下形成？除此而外，曾国青铜文化的地位是否具有普遍意义？黄、蔡等其他类似诸侯国是否也有类似的文化发展历程？

曾国青铜文化的地位还关联着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曾国青铜器反映的社会生产状况。青铜是青铜时代最为重要的战略资源，如果曾国青铜文化处于周、楚体系之下，曾国是否有、或者可以有能力独立生产青铜器？由此引发的问题是，当时中央王朝是否和如何控制青铜原料？青铜器生产技术是在何种条件下进行传播？甚至这一技术是否在同一时期被传播？

2）曾国是否独立生产青铜器将由其青铜文化个性来作出判断。文化个性代表文化的独立性，是曾国青铜文化地位的主要反映。不过，由于曾国青铜文化早晚分别属于周、楚文化，在统一的文化格局下讨论地域文化的个性，严格地说，目前甚至还不是一个成熟的话题。比如殷墟文化时期安阳周边文化的个性问题，虽然 30 多年前 Virginia C. Kane 就已经提出南方青铜器独立生产问题①，但时至今日，南方青铜器的独立性问题仍然没有在学术界有很大的共识。曾国青铜文化与其上层文化面貌一致性更强，其个性未必是排他性的独立特点，而可能是一种倾向性习惯的积累。如何观察和定位这些个性，将是我们试验性探讨的一个方向。

3）曾国青铜文化与邻近地区青铜文化的关系问题。地域是形成考古学文化或考古学地域特征的空间基础，一定的地域就会形成某种层面的地域特征。曾国青铜文化既然是属于周文化或者楚文化体系，它是否可能与邻近的诸侯国如黄国等形成相似的区域特

① Virginia C. Kane, The Independent Bronze Industries in the South of China Contemporary with the Shang and Western Chou Dynasties, Archives of Asian Art 28, 1974 – 75.

性，值得关注。同时，在这种区域之间的关联之中，是政治的还是文化的关联，也值得关注。

4）曾国青铜文化与非邻近的其他区域青铜文化的关系问题。同样由于文化地位的限制，曾国青铜文化是否可能与其他区域青铜文化形成交流？如果有的话，这种交流是何种背景之下的交流？春秋中期之后，曾国在政治、文化上都成为楚国附庸，曾国周边地区也属于楚国的疆域范围。在此情形之下，曾国除了与楚国形成的文化交流之外，是否仍然可能与其他区域青铜文化形成交流？

曾国青铜器反映的历史信息：存灭，疆域，国族，世系，都城等。这是一个由考古学而及历史学的研究方向。由于缺乏历史文献记载，由于曾国出土文献内容的局限，由考古学研究来承担这些历史信息研究的任务，在目前的条件下成为唯一的选择。但考古学研究只能在一定的遗存基础上进行，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其遗存的发现必然是有限度的，遗存所反映该国历史信息必然也是部分的、片断的。比如，目前我们所知的曾国青铜器只包括西周晚期至战国中期一段时间，通过研究，我们可以对这一时期曾国的疆域、国族以及曾国国君世系有相当的了解。但西周晚期至战国中期当然并不代表曾国存在时间的全部，而对于西周晚期之前的曾国，其信息微弱到不足以让人了解曾国大体的性质。因此，对于曾国历史面貌的恢复，目前只能是在相当有局限的程度内进行，而在不断的新的考古发现之中，这一任务必将被向前推进。

以上这样一些任务，决定了本书的主体内容，也正是我们正文的分章立节背景。

三　方法与基本思路

1. 研究方式的处理

本章第一节已经提到，不少学者认为鄂北豫南一带出土的曾国青铜器可能代表历史文献中的几个不同曾国，而湖北之曾还牵涉到如何与历史文献记载国家的对应问题。在研究曾国青铜器的过程中，如何处理对这些不同国家的研究与曾国青铜器研究的关系，是首先必须明确的。

在历史文献记载中的缯国或随国中，到底是否是或者哪一个国家是应当对应到物质文化反映的曾国？这是过去曾国研究中的焦点问题。形成这一焦点的原因，一个重要方面是由于古代史家对于周代诸侯国特别是东周时期诸侯国有相当多的记载，我们对其研究往往是由文献资料而及出土资料；或者即便是研究出土资料，也往往落脚于文献反映的历史问题。东周时期的楚、秦如此，西周时期的燕、晋也是如此。历史文献中有关曾国的内容模糊和简略，再加之历史文献本身可靠性存在一定的局限，使曾国与文献的对应问题扑朔迷离。我们认为，探索曾国之谜的途径应当是以曾国物质文化所反映的有关信息为主线，再结合历史文献进行分析。如果在明确曾国青铜器特征之前就贸然作曾国

与文献的对应，结论的客观性必然受到限制。更为重要的是，曾国青铜器的研究目的是通过考古学研究的手段，建立曾国历史文化框架。曾国与历史文献中哪一个国家相对应，甚至可以说不是建立这个框架中必要的一个项目。因为出土青铜器并非总是可以与历史文献相互对应，一个极端的情况是曾国或许不能和历史文献中的任何一个国家对应。这样，我们一改过去对于曾国问题的讨论方式，对这一问题的处理是：暂时先撇开涉及历史文献中孰缯孰随的问题，以考古学材料为基础来展现曾国的文化面貌。至于鄫、随与曾国的对应问题，鉴于它是曾国研究的一个焦点，将其单独列入附录讨论。

湖北一带出土的曾国青铜器是属于一个还是几个不同的曾国？这个问题也应当是首先从廓清青铜器特征入手、而后再分析湖北一带曾国青铜器国族属性是否一致。在研究方式上可以有两种处理：一是先对可能是不同的曾国地域进行分区——比如分为漳河、滚水、涢水区域，在分区研究后再比较各区域曾国青铜器的性质。但由于曾国青铜器的不同区域在数量和时代的分布上都极其不均衡，不同区域的青铜器缺乏可对比性，分区研究在客观上难以进行。况且对曾国青铜器国族属性的认定也并非本文的终极目的，分区研究同时又会对其他方面的研究带来掣肘，因此本文不采用这种方式。另一种方式是先将湖北一带出土的曾国青铜器视为一个整体研究对象，对其进行考古学文化研究，而后再看不同区域出土的青铜器是否可能属于不同的曾国。由于曾国青铜器在湖北一带的分布处于彼此连接、范围不大的地理单元，即便这些青铜器的确属于不同的曾国，这种整体研究也应当是合理的。出于这样的考虑，本文采用第二种研究方式，因而将湖北一带的曾国青铜器是否属于不同曾国的问题，放在青铜器特征研究之后来讨论。

曾国青铜器集中发现于西周晚期至战国中期，这一段时间在中原青铜文化的发展上包含了以春秋早中期之间为分界线的两个大的阶段①，两个阶段的历史背景、青铜器从组合到技术特征都迥然有异。具体到曾国青铜器，这些差异也同样明显地表现为类似的两个不同阶段。但在另一方面，由于春秋中期之后江汉地区趋同于特征较为一致的楚系文化，跨越这一时期的曾国青铜器在性质上的变化也是趋同于楚文化。从我们观察曾国青铜文化地位的研究任务而言，将曾国青铜器这样的两个发展阶段分别置于不同的单元进行独立研究，并分别观察两个阶段青铜器从器群到铸造技术的特征，无疑能够更好地厘清曾国青铜器在两个不同阶段的存在背景。因为既然曾国在前后两个角度所从属的政体不同，文化阶段不同，两个阶段青铜文化的产生背景可能就不同。例如独立生产青铜器的能力问题，在周文化体系下曾国青铜器可能独立生产，但楚文化体系下情况未必相同。

---

① 孙华：《中原青铜文化系统的几个问题》，许倬云、张忠培主编《中国考古学的跨世纪反思》下册第305－334页，商务印书馆，1999年。

2. 研究方法与思路

本项研究的基本方法，仍然是以考古学文化研究方法为基础，同时结合青铜器工艺研究、青铜器铭文等传统研究方法，或者说，是试图将考古学研究、工艺研究、铭文研究方法加以整合，以寻求较为全面的方式进行研究。从微观的角度，我们试图从器物学研究的视角，对个体青铜器的器形、纹饰、工艺和铭文作尽可能细致的观察和分析。但是，这种对于青铜器的研究，只是作为青铜文化研究的一个基础，我们的目的，仍然是从宏观的角度，对曾国青铜器所反映的青铜文化研究。

这些方法运用在曾国青铜器研究上，主要体现在这样一些方面：

考古学研究对于物质文化形态的研究主要是类型学以及在类型学基础上的文化因素分析等方法。运用在青铜器研究上，主要是在年代学框架建立的基础上，在纵向的研究上总结器形与纹饰的发展演变规律、总结由各个铜器群构成的青铜文化的发展方向；在横向研究上进行文化特征的总结、器物群的组合研究、比较不同区域青铜文化因素的相互影响和交流。

建立曾国青铜器年代框架，类型学是主要的路径。虽然可供曾国青铜器分期借鉴的中原地区西周和春秋青铜器年代系列都已经大体建立，但学术界关于两周之际前后青铜器群年代的不同结论，暗示出这一时期青铜器分期在细节上还存在一些问题。这样，建立相对独立的曾国青铜器年代框架就成为必要。同时，由于需要细致地观察曾国青铜器在不同时期的发展，同时可类比曾国青铜器和其他青铜器发展的相同与不同，年代分期工作也需要相对较为缜密。出于这样的研究目的，对于曾国青铜器的分期，并无必要对曾国青铜器的各类青铜器进行全面的类型学分析，而只需要在发展系列较为完整和清晰、分期排队条件较成熟的青铜礼器中进行。不同阶段的曾国青铜器的分期，在要求上有所不同。对于春秋中期及其后的阶段，学术界已经形成有较成熟的楚系青铜器年代体系可供参照，但春秋中期之前阶段的青铜器分期，歧见则较多。在这种情况之下，春秋中期之前阶段曾国青铜器年代框架的建立就应当特别谨慎从事。我们对这一阶段的分期工作主要考虑两个方面情况：其一，由于春秋中期之前的曾国青铜器变化节奏缓慢，特别是纹饰在单种器类中的年代变化不明显，因此将器形、纹饰分开进行排队。器形的排队是依靠基本没有争议的典型器形及其早晚发展关系，独立进行不同器类的排队，在此基础上排列出铜器群的发展系列。同时，将纹饰以同样的排队方式，并特别注意纹饰在不同铜器群中种类的变化，以纹饰的排队来检验器形对铜器群排队的情况。其二，在确定曾国青铜器各期的年代时，尽可能将年代有争议的铜器群，不作为确定年代的参考单位，以保障各期年代的客观性。在较早时期曾国青铜器的分期工作中，不以争议较大的虢国墓地如 M2001 出土青铜器作为相对年代对比的参数，而是选择一些年代清晰的器物群支撑。例如以周原、晋侯墓地等典型的西周晚期青铜器作为定位曾国西周晚期青铜

器的主要参考对象，特别是晋侯墓地西周晚期和两周之际的几个铜器群，年代范围比较明确，晋国与曾国同样作为诸侯国，青铜器特征更具有可比性。曾国的邻国——黄国最晚阶段的几个铜器群①是作为判定春秋早期偏晚至春秋中期铜器群的参考点。有这样一些标志性时间点，再可推断出其他曾国青铜器相应期别的年代。

有了年代分期这一基础，可以以器群、器类、纹饰、铭文、工艺这几个青铜器不同要素为视角，分别观察曾国青铜器在相应方面的表征。

器类包括器形是目前我们表述青铜文化特征和划分青铜文化的主要依据，也是我们用以比较研究不同青铜文化特征的主要路径。曾国青铜器从属于周文化抑或是楚文化，甚至是游离于二者之外的性质特征，是要通过器类及其特征来比较说明的。除此而外，一些代表性器类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所表达的除了该青铜文化的特征之外，还可以观察到形成这一过程的文化背景甚至是历史背景。而一些风格特出的器类或者器形，则可能反映了不同地区之间的文化传播和较密切的关系。对于曾国这样一个处于次一级文化地位的青铜文化而言，器类和器形是中心文化区相应因素的辐射和反映。曾国在这一方面对中心文化的吸收和可能的改造，也可能暗示出曾国文化地位的独立程度。这时，将其他处于同一层面、和曾国文化地位相当的其他诸侯国器类作一比较研究，则可考察上一级文化体系的同一性及其强势程度。

由于一些学者在青铜器的类型学研究中特别侧重于青铜器的器类与器形，纹饰的研究在国内经常被置于次要或被忽视的地位。其实，即便撇开纹饰可能包含的器形不能表达的、反映精神领域的信息不谈，纹饰在构图上不受器形如三足器、圈足器等基本形状的局限，具有更大的可塑性，因此纵观商周时期青铜器形制，纹饰的复杂和多变程度，远非器类与器形可比，纹饰所反映的特征性信息往往更加丰富。另一方面，单件器物上纹饰与纹饰的组合、纹饰与器形的搭配，都有一定的范式和规律。在工艺过程上，一件器物纹饰总是均匀地分为规范的几组，为此，纹饰的布局和构图一定要经过设计。这样，纹饰的规整性、纹饰变化的逻辑性都会优于器形。再者，与器形较多反映技术背景不同，纹饰则更多地反映艺术趋向。至少在西周中期以后，装饰性是纹饰的一个主要功能，因此纹饰可能反映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风尚。纹饰是否存在设计上的固定模式或偏好，可能反映其是否存在独立的铸铜作坊系统。而纹饰的复杂和新颖程度，无疑还能反映出青铜器的社会等级，或者反映出某地区青铜文化的地位或发达程度。最后，对于考古学研究更有意义的一点是，相同的纹饰可能出现在不同的器物上，这使不同器类、甚至不同文化之间的对比得以在同一个平台上进行；相反，某些不同考古学文化之间关系密切，相同的器形可见于不同的区域，但它们纹饰风格的不同仍然可揭示其不同

① 按照《春秋·僖公十二年》记载，黄国于公元前648年灭于楚国。

的文化背景。这些说明，青铜器研究中纹饰的重要程度丝毫不亚于器类器形。在郑州商城青铜器发现之前，罗越（Max Loehr）正是以纹饰为基础的风格分析①，成功地建立了青铜时期早期青铜器纹饰演变发展序列，并由此形成该时期青铜器相对年代系列，成为学术史上最有影响力和最成功的青铜器研究例之一。在周代青铜器研究方面，王世民等《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也是主要基于对纹饰的演变来进行分期断代研究的②。

西周中期之后青铜器纹饰趋于简约，而至春秋中期及其后纹饰的制作开始广泛地采用模印技术，这使我们的研究对象变得过于规范和相对缺乏内涵。不过，规范的纹饰说明其年代演变同样比较有规律性，因此对纹饰作类型学分析，可以作为两周之际前后曾国青铜器分期的一种方式。相对于曾国的文化地位，对于纹饰的设计、选择和搭配方式，是体现曾国青铜器的文化水准和独立程度的一个方面，因此曾国青铜器纹饰与同时期中心文化区域纹饰的异同程度，是应当作为重点考察的项目。

在包括古代中国在内的一些早期文明中，文字往往与装饰等艺术形式相结合，并形成一种超常的力量③。青铜器铭文同样不仅仅是表意的文字，它在青铜器诸因素中代表了较高的社会层次，往往潜在的表达社会上层的政治理念。商周时期较高社会等级的铜器群总是较多地出现铭文、铭铸较长且铭文较精美，铭文也与代表其等级地位的使用者而不是制作者有着更多的关联。因此铭文更能够反映一个青铜文化上层社会的文化风尚和水平。受时代风格和作为诸侯国地位的限制，曾国青铜器少有长篇、纪事性铭文，铭文文字简短，辞例单一，所反映的信息量相对较小。但是，如果我们将曾国青铜器铭文的研究主要着眼于铭文所反映的文化特征和文化背景的分析，是反映曾国青铜器特征的一个特别的方面。例如，某一种或几种铭文辞例流行程度，可能代表曾国或曾国一带文化风尚，无疑是反映出这一区域文化的特征。由于铭文作为文字形式并非是一般工匠所能够掌握，但铭文的制作却又必须由工匠来完成，因此铭文在制作方式上表现出来的一些信息，可能也会体现出文化层次的不同。当然，铭文作为文献材料，包含有曾国上层社会的政治、生活信息，例如反映曾国国君世系、曾国官制、婚姻状态等信息，也当然是应当关注的重点。

青铜器冶铸技术反映了社会生产和组织。从技术的角度为理解曾国青铜器提供了更加深入观察曾国青铜文化的路径。青铜器生产是青铜时代最为重要的生产活动，因此青铜材料和冶铸技术是这一时期最可能被国家机关所垄断和控制的物质和技术资源④。作

① Max Loehr, The Bronze Styles of the Anyang Period (1300 - 1028B. C.), Archives of the Chinese Art Society of America, pp42 - 53, 1953, 7.

② 王世民等:《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文物出版社，1999 年。

③ John Baines, Image and Picture in Egyptian Art, Art International, Vol. 1, p123. Paris, 1987.

④ 俞伟超:《长江流域青铜文化发展背景的新思考》,《古史的考古学探索》，文物出版社，2002 年。

为诸侯国或附庸国地位的曾国，在青铜器生产方面的情况，使我们得以透过青铜文化观察到当时的社会更深入的层面。不过，需要明确曾国青铜器是否是曾国自身生产，才使上述分析具有意义。曾国迄今没有发现与冶铸相关的遗迹，青铜器所反映的技术信息，因之成为了解其是否存在青铜工业的重要途径。

但是，中国古代青铜器铸造技术高超而复杂，所蕴藏的信息量深邃而庞杂，迄今这一方面的研究，远非达到理解其技术体系的程度。不过，经过数十年来几代学者的努力，目前对于周代青铜器铸造工艺的基本方面，已经大体有了轮廓性认识。例如，对于周代特别是西周中期及以后的多数青铜容器如鼎、簋、壶等基本范型及其拼合方式，学者们已有了比较清晰和一致的认识，对于耳、鋬、足等附件的连接技术和方式，也大体有了一致的认识。本文并非是从纯技术的角度，以曾国青铜器的铸造技术来加强或填补周代青铜器铸造工艺的技术细节——虽然从过程上看有关工艺技术研究可能起到这一作用。我们是试图在认识曾国青铜器的工艺基础之上，来比较研究不同时期曾国与中心文化区域、与其他地位类似国家在这一层面上的联系与区别，以考察曾国是否有自己独立的青铜工业，曾国青铜器的铸造技术是否像青铜器形制特征一样，有一个相对独立的发展，同时，在这两个方面的是与否，又分别反映了怎样一种文化或社会背景。当然，关于铸造技术的分析在过去的曾国青铜器报告中鲜见，在进行具体的分析之前，我们需要对各阶段不同类别曾国青铜器铸造技术作概要地介绍①。

铜器群既是反映一支青铜文化性质的综合性材料，又是表明其所有者身份等级的标志物。曾国在不同时期诸多器物群的不同组合，既是曾国不同阶层贵族构成的反映，同时又表达了曾国国家等级与地位——这一点往往需要通过比较研究才能明确。例如，一个显而易见的现象是，两周之际前后晋国国君用五鼎，虢君可能用七鼎，而苏家垅铜器群见列鼎九件，是否是说明了曾国当时较高的社会地位？曾国其他铜器群是否也具有反映曾国较高的等级特征？他们如何反映曾国社会阶层的构成情况？当然，虽然考古所见周代九鼎较早的几个例子——苏家垅、曾侯乙墓、擂鼓墩 M2——都来自曾国，但我们并不准备因此而对周代用鼎制度进行独立的讨论。现在看来，周代贵族特别是地方贵族的器用体系可能远远比我们设想的要复杂得多。虽然过去学者在这方面已有深入的研究②，但出土资料反映的情况远不如文献记载那样整齐划一③。以物质文化材料来复原周代鼎制等礼仪方面的制度，目前似乎还不具备条件。

---

① 对于曾国青铜器铸造技术方面的具体介绍，可参考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曾国青铜器》，文物出版社，2007 年。

② 俞伟超、高明：《周代用鼎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学报（社哲版）》1978 年第 1 期。

③ 林沄：《周代用鼎制度商榷》，《林沄学术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 年。

青铜器器类、纹饰、铭文、工艺、器群的研究，仅仅只是我们研究曾国青铜器的几个不同路径。一方面，如上所述，这些路径所反映的文化及社会层面不同，因此我们并非是要将青铜器研究中的这几个方面割裂开来，而是要比较它们在青铜文化的演进过程中各自发展的频率是否一致。实际上，在进行某一项研究中，当然会同时穿插涉及另一项内容。另一方面，对这些项目的研究，也并非是要分别作铭文的考释、纹饰含意的追溯、或者是铸造工艺细节的探究。观察曾国青铜器在周、楚文化体系之下的地位，实际上是需要同时整合青铜器形制、铸造、文字等不同方面的信息，围绕文化地位这一主题加以综合考察和分析。例如有曾国铭文标识的青铜器似乎是说明曾国拥有自身青铜铸造工业的依据，但松丸道雄认为“王室工房”为西周青铜器的制作中心，列国青铜器中即便是有某某“自作”某器，也不能说明其自铸的能力①。这样，判断曾国青铜器是否有独立的青铜工业，在没有作坊等铸造遗迹发现的条件下，从工艺、形制等多方面因素的考察和分析就成为必须。又如，从器群和器类的角度看，一般认为两周之际前后青铜器的发展处于相对停滞的状态②。但是，这一时期兴起的诸侯国如曾国青铜器，在技术层面是否也是表现出相同的特征？是否也是如器类、纹饰等因素一样处于较中心区域文化略低的水准？

对于上述青铜器从器类到器群等不同因素在曾国青铜器前后两个不同阶段的考察，侧重点有所不同。

第一阶段考察曾国青铜器在周制之下作为诸侯国表现出的一般特征、个性特征以及周文化和曾国青铜文化体现出怎样的一个主从关系。这里既需要将曾国青铜器与周文化中心区域青铜器作比较，以观察地方与中央在文化等级、风尚方面的异同，由此进而观察周与曾在生产关系上的联系；同时，也应该将曾国青铜器与其他诸侯国青铜器作比较，以观察不同诸侯国之间文化的异同，而其中的差异是反映等级的、抑或是地域的？在与诸侯国作文化特征比较时，晋国、虢国和黄国等三个国家是较为理想的对象。两周之际前后晋国青铜器的年代系列在诸侯国青铜器中最为清晰，青铜器反映的社会等级、文化背景和特征明确，适合于从历时性的角度比较研究。虢国青铜器的时代和时间跨度、虢国墓地的性质与等级，分别与曾国铜器以及郭家庙墓地有很大的共同点。虢国国族性质、地位以及文化属性大体清晰，曾、虢的比较是判断曾国青铜文化区域性和社会等级的标点。黄国是第一阶段与曾国关系最为密切的邻国，曾国与黄国构成区域文化的相同点以及相同地域下的不同点，都是考察方国文化特点的绝好材料。

---

① 松丸道雄：《西周青铜器制作的背景——周金文研究序章》，樋口隆康主编、蔡凤书翻译《日本考古学研究者——中国考古学研究论文集》，东方书店，1990年，香港。

② 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青铜器》第222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

第二阶段也是考察曾国青铜器在楚系之下的一般特征与个性特征，以及考察曾国青铜文化在楚系文化形成的过程中是否和怎样发挥其作用。春秋中期之后，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都发生了巨大变化，青铜器所代表的礼制、文化面貌和生产技术从形式到内在都相应地发生了变化。这一变化之下的曾国青铜器与楚国青铜器的文化关系，是较上一阶段保持更加紧密的关系抑或相反？或者说，作为附庸国的文化地位与作为诸侯国有何不同？春秋中期之后社会生产力迅速提高，青铜器的时代特征变化有了更快的频率，曾国是否也保持与社会发展同样的水平？是否还拥有一个独立的青铜生产工业？在春秋中期前后楚文化特征成形的过程中，代表鄂北一带青铜文化发展水平的曾国青铜器材料较多，从这些材料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在此前后曾国青铜器特征由周文化体系转变到楚文化体系是如何发生变化，由此可以理解楚文化对于周边地区文化一体化的过程与方式。比如，一般认为，这一时期曾国青铜器特征为楚文化影响之下形成①。但是，目前我们对于春秋中期之前楚文化包括青铜文化特征并不十分了解，这样，春秋中期曾国青铜文化与楚文化相同的特征何以见得是楚影响曾而不是相反？如果我们由曾国青铜文化来作为一个侧面观察楚文化的形成，对于楚文化形成的过程与机制、对于楚与曾的文化关系的理解，无疑是一个较新颖的视角。

从地域文化的角度研究曾国青铜器，是考察曾国与相邻地区的文化关联、与不同地区之间的交流情况。目前大家趋于认可，两周之际前后的诸侯国青铜文化已经形成一些个性因素②。在这一文化背景之下，曾国与周边区域是否以及可能形成哪样一些区域特征？按照青铜器铭文的指示，曾国与其邻近的黄国或淮河流域地区政治关系密切，他们的文化面貌是否也体现出这种密切的关联，这就是一个饶有趣味的问题了。同样，楚文化也存在着区域的文化差异③，但这是否意味着曾国这种附庸国家也会与周边形成区域共性？除了上述问题之外，有关相同区域文化另外一个需要考虑之处是，以国家为地域地位形成的文化特性和以区域为基础形成的文化特性之间，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对于不同区域之间，作为一个亚文化的诸侯国文化之间存在的共性，往往可能是一个共同的时代风格。但曾国在不同阶段与不同区域之间的文化交流确乎存在，这是一个颇为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个中的背景需要在曾国的历史环境中得到解答。

曾国都城等历史问题的研究是建立在上述曾国考古学文化研究的基础之上的。对于曾国疆域范围的研究，首先需要掌握当时曾国青铜器特征，以确定曾国青铜器性质为前提，进而确定当时曾国活动区域。同时，这一工作在两周之际前后还需要根据曾国所在

① 李学勤：《楚青铜器与楚文化》，收入李学勤《缀古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

② 朱凤瀚：《古代中国青铜器》之《春秋青铜器》第 859 页，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 年。

③ 郭德维：《楚系墓葬研究》第 32 – 36 页，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 年。

区域其他诸侯国的特征和地望来进行判断，而在第二阶段则需要根据楚国势力范围来判断曾国疆域所受到的影响。对于曾国国君世系的排寻，虽然还只是在串联一些片断，但仍然要通过年代学分析而确定相关曾国国君的排序，更重要的是需要通过对铭文材料的分析，在曾子、曾伯、曾仲、曾侯等等称谓之中，明确那些或那种称谓属于曾国国君专称。对于曾国都城——从考古学而言的曾国文化中心区域——的探索，除了寻找都城性质的高等级遗址之外，国君级别的墓葬或墓地、高级贵族墓地等都是重要的参照条件。关于曾国的存灭问题，重点其实是关于曾国早期历史文化的探索。苏秉琦对于早期楚文化探索的思路①，可作为这项研究的借鉴："一是从下而上"，在确定曾国已知较早文化面貌及其活动区域的基础上，由此在相关区域向上追溯曾国早期文化。"二是从上而下"，由甲骨文记载中的曾向下探索，看看是否可以建立与晚期已知的曾国之间建立直接的联系。

最后必须说明的是，以下对于曾国青铜器的研究，主要是集中在青铜礼器方面。除了容器之外，曾国青铜器还包括有数量更大的车马器②、极为重要的青铜乐器。车马器是中国青铜时代青铜器中出土数量最大的一个类别，但学者对其研究多集中在性质和功能的认定之上③，目前还很难上升到在同一文化体系下观察到不同个性特征和说明文化地位的信息。编钟特别是曾侯乙编钟在曾国青铜器中占有重要地位，对后者的研究无论是在音乐学还是文字学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就，这一点已如前节所述。不过由于曾侯乙编钟的特殊性④，其音乐学特性难以作为一般性对象从文化特征角度作合乎本项目主题的、相应的比较研究。无论如何，我们仍然会从考古学角度考察编钟并注意引用这些方面和本项目相关的研究成果。

第三节　几点说明

为了使本书的文字、概念表述清楚，我们特地作出一些说明和技术性规定。说明和规定的对象，主要是目前分歧较大或尚无规范而容易造成混淆的概念性内容。我们的原则是尽可能遵循和沿用学术界已有的规范，尽可能使用现代的语言表述方式。因此在文字上尽量使用现代汉语隶释古文字，称谓上采用已经通行或习惯的概念——比如长方体

① 苏秉琦：《从楚文化探索中提出的问题》，《江汉考古》1982 年 1 期。

② 在枣阳郭家庙墓地出土的 3416 件青铜器中，有车马器 3113 件。统计数据依照襄樊市考古队等：《枣阳郭家庙曾国墓地》第三章，科学出版社，2005 年。

③ 参吴晓筠：《商至春秋时期中原地区青铜车马器形式研究》，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等编《古代文明》第 1 卷，文物出版社，2002 年。吴晓筠对车马器进行了系统地分期研究。

④ 曾侯乙编钟具有多方面的独特性，例如编钟音乐方面的铭文，在迄今所见编钟中仍然是唯一的。

的食器称“簠”而不称“瑚”等等。

一 材料来源问题

本书对于曾国青铜器的研究，较多涉及青铜器形制的细节。但曾国青铜器这方面的信息特别是纹饰构成、铸造工艺等，在20世纪曾国青铜器的发掘报告中几乎无从获取。鉴于这种情况，笔者专门对大部分曾国青铜器作了逐件的实物观察，对战国时期以前的曾国青铜器材料进行了重新的整理。整理的材料，以《曾国青铜器》报告的形式出版①，本书在引用这一时期曾国青铜器的材料时，一般不另外作注释和说明。战国时期曾国青铜器的材料，主要包括有曾侯乙墓②和擂鼓墩M2③，本书主要参考发掘报告和简报的材料，但对于纹饰、铸造工艺方面的信息，仍然主要依赖于对实物的观察。

二 一些概念的规范

考古学特别是青铜器研究中，不同的学者常常使用不同的词汇来表述相同的事物如器物特征，或者相同的词汇被不同的学者表述为不同的事物特征。这其中固然有对这些特征的理解问题，但更重要的原因是缺乏规范。本书并非是试图建立这样的规范，而是将书中经常使用而可能引起误解或学术界歧义多见的一些词汇作出说明，以便读者清楚理解书中概念表达的文意。

1. 纹饰的定名

青铜器纹饰的定名，既无器物自名一类的直接依据，也不像铸造工艺那样有现代科学概念作支撑，因此不同学者向来根据各自不同的理解，而有不同的名称。对商周青铜器纹饰研究较为系统、定名较为科学的是马承源④，但他的定名方式过于独立，与大家惯用的名称多有不同且多未为学术界所接受。青铜器纹饰的定名，首先应当有较好的逻辑性和连贯性，这样才不会因为名称引起自相混淆和概念上的误会。同时，定名还应当考虑到与现行名称的兼容性，以便读者能够较好地理解文意。有鉴于此，本书仍然沿用过去已刊用并已经通行的纹饰名称，对一些歧义较多的名称，则加以定义和规定。

学术界对于西周中晚期到春秋早期阶段纹饰名称，大多按照容庚的分类和称谓⑤，使用相对较为一致，本书也依照这一习惯。书中依照容庚之说的纹饰名称主要有：窃曲

---

①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曾国青铜器》，文物出版社，2007年。

② 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文物出版社，1989年。

③ 湖北省博物馆等：《湖北随州擂鼓墩二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85年第1期。

④ 马承源：《商周青铜器纹饰综述》，上海博物馆青铜器研究组《商周青铜器文饰》，文物出版社，1984年。

⑤ 容庚：《商周彝器通考》第六章《花纹》，哈佛燕京学社，1941年。容庚、张维持：《殷周青铜器通论》，文物出版社，1984年。

纹、重环纹、环带纹、垂鳞纹、瓦纹。

商和西周时期青铜纹饰结构相对稳定，因此学术界对其命名多有较一致的意见。东周时期特别是春秋晚期之后青铜器多以龙或龙形动物为母题构图，装饰纹样在不同区域和时间上变化复杂。对于这些纹饰的称谓，各家多无定式。一些考古报告以蟠螭纹统称这些龙形构图，也有根据龙形体的变化而作描绘式的命名。本书仍然参照容庚的命名基础，作如下规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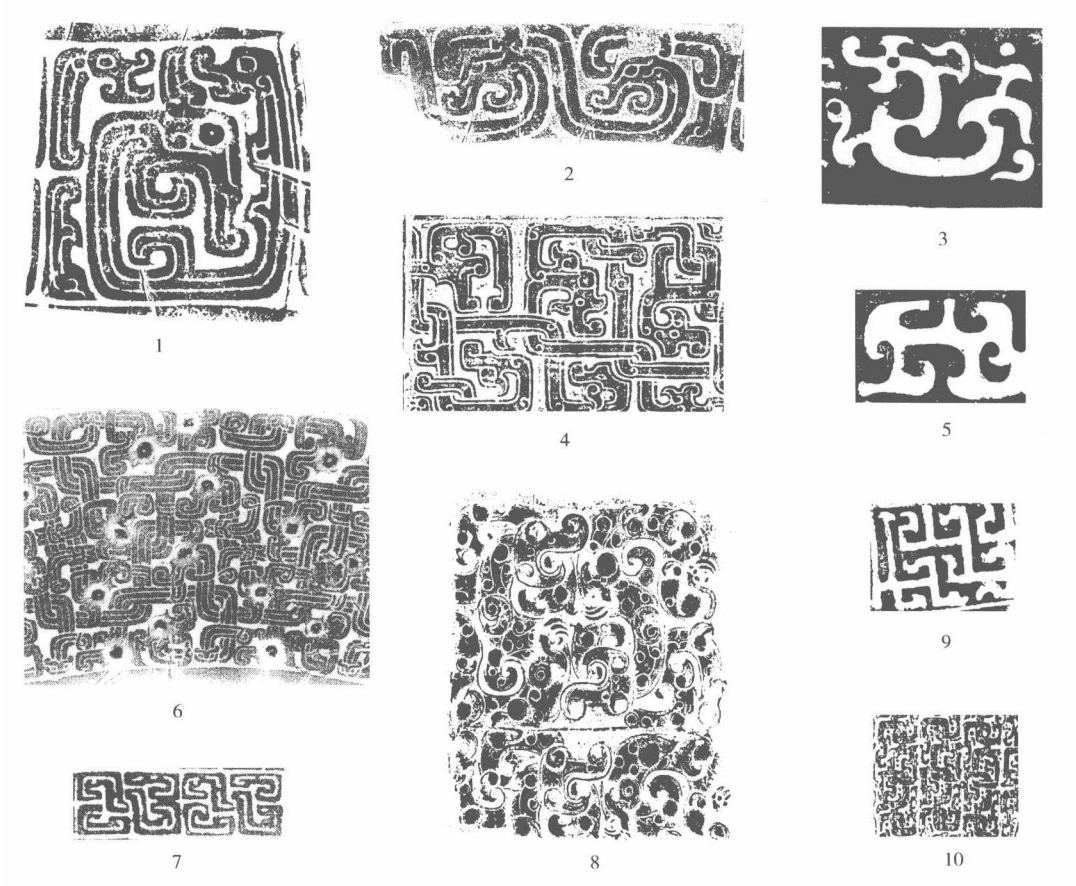


图 1.3－1　龙纹类纹饰名称

龙纹：1. 郭家庙 M17：4 壶　2. 72 曹门湾鼎　3. 曾侯乙鼎（C. 37）

蟠螭纹：4. 曾侯乙鼎（C. 96）　6. 曾孟嬭谏盆　变形龙纹：5. 曾侯乙盥缶（C. 189）

蟠虺纹：7. 八角楼墓葬鼎　10. 曾侯乙联禁大壶（C. 133）

变形蟠螭纹：9. 曾侯乙提链壶（C. 182）　蟠龙纹：8. 曾侯乙甬钟（中. 2. 6）

龙纹：独立的龙，独首、双首或类似带冠的鸟首。如图 1.3－1，1～3。

蟠螭纹：由两条以上的龙相互缠绕，形成几何形构图的单元，纹样中龙首以及带状

的龙身均较具象。如图1.3－1，4、6。

龙纹或蟠螭纹的变体分别称为变形龙纹或变形蟠螭纹，这种纹饰多见于曾侯乙墓的镶嵌式纹样。如图1.3－1，5、9。

蟠虺纹：细密的几何形构图纹样，构图元素为抽象的龙。如图1.3－1，7、10。

蟠龙纹：半浮雕直至圆雕、相互缠绕的龙。如曾侯乙墓建鼓座，另外如图1.3－1，8。

2. 铸造工艺的几个名称

中国古代青铜铸造研究需要使用一些专用词汇来表述一些工艺方式。但学术界在描述同一工艺方式时使用词汇各异，极不便于理解。这里在规范本书的一些概念时，也说明本书涉及的一些歧义较大的词汇在不同学者研究中的表述形式，以明确其含义。以下所述青铜器，基本是指青铜容器。

1）关于铸造工艺的一般性概念。

虽然表述各异，但此类概念所指比较明确：

腹范：或称外范、侧范。相对于铸器所用的芯范和底范而言，指容器主体周围所用的制范。

芯范：或称内芯、内范。本书用以指被其他制范所包围或半包围的范块，如器腹内、足内、耳内的范块，以及附耳鼎的附耳与器外腹壁之间设置的制范。

范缝：或称披缝、铸缝。浇铸后在合范缝隙之间留下的凸起痕迹。

垫片：或称铜芯撑、铜支钉。安置于芯范与底范、腹范之间以形成器壁的铜片。

泥芯撑：或称芯撑、泥支钉。耳、足内芯范上的条形凸起，在器壁上作条形孔状，功能与垫片相同，是为形成足部和耳部器壁而设。

浇口与冒口：为了铜液注入和空气排出而在范间或范上开设腔道，铸造时在器体上留下的痕迹。有时浇口与冒口难以分别，则一并称为浇口。

2）关于附件连接技术的概念。

器物附件如器足、耳、鋬、纽、柱、捉手等如何连接到铜器的主体，这在青铜器铸造中复杂而多变。因此不同学者对连接技术从理解到概念的命名都存在较大分歧。按照笔者的理解，附件的连接在方式上有浑铸、先铸、后铸（铸接）、焊接四种方式，其中后铸和焊接还有不同的变化。在对这些方式的称谓上华觉明①的体系较为清晰，在此基础上，本书作如下界定：

① 华觉明：《中国古代金属技术——铜和铁造就的文明》第四章《商周青铜器的范铸技术》，大象出版社，1999年。

浑铸：郭宝钧称之为铸生①，万家保称之为原生②。器物主体和附件在同一次浇铸活动中一并成形完成。对于浑铸技术，大家看法一致。

先铸③：郭宝钧称之为嵌铸，李京华称之为分铸连接④。是将先已铸好的附件安置在器物的主体范腔中，在浇铸主体成形时对附件部分表面会形成包围形态。对先铸法，大家看法基本一致⑤。

后铸：先铸器物主体，然后再将附件铸接到主体。可分铆式后铸、榫式后铸和无榫后铸等几种方式。

铆式后铸：华觉明称之为铆接式铸接。铸造器物主体时在器壁上预铸孔洞，然后在孔洞处安放范具，浇铸出的附件透过孔洞与主体直接连接。这种后铸方式最早见于盘龙城李家嘴 M1 簋⑥。

榫式后铸：华觉明称之为榫卯式铸接。铸造器物主体时在器外壁预铸出榫头，然后在榫头处安放范具，浇铸出附件。

无榫后铸：器物主体上无需专门预留榫头，范具安置在主体的器壁边缘，直接铸接出附件，附件往往包裹住主体器壁缘。此技法较早多见于新干大洋洲铜器群⑦，用于鼎、甗立耳与后铸虎的连接。

焊接：分别铸出器物主体和附件，然后以铸焊或焊料焊接的方式连接主体和附件。可分榫式焊接和铆式焊接。

铆式焊接：苏荣誉称之为铸铆⑧，华觉明称之为铸铆焊或铸焊⑨，李京华称之为补铸连接法，陈千万称之为铸榫式焊接。这种连接方式也可理解为一种后铸，其大体方式

---

① 郭宝均：《商周青铜器群综合研究》《东周初年及春秋时期铜器群》，文物出版社，1981 年。

② 万家保：《试论中国古代青铜器的连接方法——中西古代金属技术发展比较之二》，《大陆杂志》第六十四卷第六期，1982 年。

③ 这里的先铸不是指套环、提链等可活动的套接构件。

④ 李京华：《淅川和尚岭楚国青铜器与编钟的铸造技术》，《中原古代冶金技术研究》（第二集），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 年。黄克映、李京华：《淅川和尚岭、徐家岭楚墓青铜器铸造技术》，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淅川和尚岭与徐家岭楚墓》附录二，大象出版社，2004 年。

⑤ 吴坤仪认为虢国青铜簋耳、圆壶耳为先铸，分别称为“榫卯式铸接”、“榫卯销式铸接”。这一说法值得商榷，讨论见第三章《铸造工艺》一节。吴说见吴坤仪等：《虢国墓地出土青铜器铸造工艺分析与研究》，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三门峡虢国墓（第一卷）》附录二，文物出版社，1999 年。相似看法又见《当阳赵家湖青铜器铸造工艺研究报告》，见吴坤仪：《当阳赵家湖楚墓铜器铸造工艺》，湖北省宜昌地区博物馆等：《当阳赵家湖楚墓》附录二，文物出版社，1992 年。

⑥ 苏荣誉等：《中国上古金属技术》第 110 页注释①引用的周建勋硕士论文，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 年。

⑦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新干商代大墓》，文物出版社，1997 年。

⑧ 苏荣誉等：《中国上古金属技术》第 321 页，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 年。

⑨ 华觉明：《中国古代金属技术——铜和铁造就的文明》第 166、167、181、182 页，大象出版社，1999 年。

是铸造器物主体时在器壁上预铸孔洞，由器内壁孔洞处浇铸，铸焊连接至附件的根部。

榫式焊接：苏荣誉和华觉明称之为铸焊，李京华称之为焊接连接法，陈千万称之为铸销式焊接①，吴坤仪称之为榫卯式焊接②。铸造器物主体时在器外壁铸出榫头，在附件根部注入焊料连接主体。这种方式常常在附件耳侧可见销孔。榫式焊接的另一种方式是在器物主体上预留孔洞，以附件榫头焊入。

分铸：我们将先铸、后铸（铸接）、焊接一并称为分铸。铸接与焊接性质有别③，将其一并归入分铸技术并不科学。但铸接与焊接都是连接附件的方法，有时甚至难以区分④，因此这里为表述方便，以分铸或分铸法统称。

三 一些特定的文字表述方式

为了文字叙述的准确直接，同时避免赘繁的重复，正文中将采用一些学术界没有或尚未普遍采纳的表述方式。这里作如下定义：

1. 曾国的称谓

曾国有历史文献记载和出土铜器的不同，二者又可能分别代表不同国家，称谓上非常容易混淆。历史文献中的曾，“春秋左氏、公羊两传作‘鄫’、穀梁传作‘缯’，国语晋语作‘鄫’、郑语作‘缯’”⑤。国名、地名相杂。按照一般的看法，曾国大约有三个：

1）山东曾国。如《春秋》僖公十四年：“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来朝。”1981年在山东临朐泉头村墓葬出土有“上曾太子般殷”鼎，历史文献和出土资料互证了山东之曾的确存在⑥。因此我们将这一曾国称之为“山东之鄫”或“鄫”；

2）郑地曾国，作为地名出现在郑国或其附近，地望或各不相同。如《左传》宣公十八年：“齐侯会晋侯，盟于缯。”《左传》襄公元年：“于是东诸侯之师次于鄫，以待晋师。”又《荀子·尧问》：“缯丘之封人见楚相孙叔敖”，杨倞注：“缯与鄫同，缯丘，故国”。其为地名，但不能排除为国名的可能，我们称其为“郑地之鄫”。

---

① 陈千万等：《枣阳郭家庙曾国墓地出土铜器铸造工艺探析》，襄樊市考古队等《枣阳郭家庙曾国墓地》附录三，科学出版社，2005年。

② 吴坤仪等：《虢国墓地出土青铜器铸造工艺分析与研究》，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三门峡虢国墓（第一卷）》，文物出版社，1999年。

③ 苏荣誉对于铸接（后铸）与焊接有很好的定义，见苏荣誉等《中国上古金属技术》第321页，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年。

④ 本文所谓的铆式焊接，是属于铸接还是焊接的性质，歧见之大，由各家给出的不同称谓可知。

⑤ 容庚：《武英殿彝器图录》38曾子⿰金匿簠，哈佛燕京学社，1934年。

⑥ 临朐县文化馆等：《山东临朐发现齐、鄩、曾诸国铜器》，《文物》1983年第12期。孙敬明等：《山东临朐新出铜器铭文考释与有关问题》，《文物》1983年第12期。

3）灭周之缯。《国语·晋语》："申人、缯人召西戎以伐周。"《史记·周本记》："申侯与缯、西夷犬戎攻幽王。"我们称其为"灭周之缯"或"缯"。

对于在鄂北豫南地区出土青铜器中的曾国，我们称之为"曾国"。在为区别其他曾国时，或称"湖北之曾"。我们所谓曾国青铜器，即指这一曾国而言。

2. 关于时间称谓的界定

某一时期的"以前"、"以后"，不包括该时间段，如"春秋早期以前"。

某一时期的"及以前"、"及以后"，包括该时间段，如"春秋早期及以前"。

"两周之际"表示西周晚期和春秋早期之间较小的时间段，"两周之际前后"表示从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一段时间。"商周之际"、"春战之际"类推。

3. 器物部位的表述

为便于准确指称器物部位，对器物足、耳作如下称谓：凡圆腹三足器如鼎、甗以及带小足的簋，将与双耳平行的两足前置。如面对器物而视，则左侧的一个足称为1号足，右侧的足称为2号足，另外与双耳垂直的一足称为3号足。

同样，对此类器器耳的称谓，左侧的一耳称为左耳，右侧的称为右耳。

4. 统计数量的"类次"

"类次"是指同一器群之内的器物，在形制、铭文、纹饰方面各自具有相同的特征。"类次"的概念是为了在统计时，表示这些项目在不同器物和器类中的出现频率。以铭文为例，曾仲斿父方壶，两件壶的器、盖4次出现相同的铭文，为一个"类次"。而曾子单鬲铭文只一次出现，也是一个"类次"。因此，"类次"不同于"件"的概念，一个类次有时包含有若干件。

5. 铭文的释文

铭文的释文尽可能采用现代通行文字。另外，释文中以"□"表示缺字、以"⊠"表示残字、以"/"表示换行。

6. 器群的命名

各器群皆以出土地的小地名命名，若同一地点出土多个器群，则以出土年代区别。如随州熊家老湾1970年、1972年两次出土的青铜器，分别称为70熊家老湾、72熊家老湾。而如同年出土不同器群，则再以A、B区别，如75刘家崖A、75刘家崖B。

7. 青铜容器的范型描述

苏荣誉对于青铜容器主体范型有一套简单、明了的描述①。根据他的描述原则，本书引进这种表述方法并作如下改进：数字×数字－符号＋数字。

所代表的含义：第一个数字表示水平分范的段数，由于水平分范的范型很少，因此

① 苏荣誉等：《中国上古金属技术》第三章《青铜范铸技术》，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年。

这个数字和“×”一般不用。第二个数字表示一周腹范的数量，最后一个数字表示芯范的数量，中间的符号表示底范形状。△表示三角形底范，底范角端与腹范范缝相对；▽表示三角形底范，底范范缝与腹范范缝垂直；Y 表示三条底范范缝合聚于底中央；○表示圆形底范；□表示长方形底范；N 表示未有该项；？表示情况不明。

例如，3－△＋1 表示 3 块腹范、1 块三角形底范、1 块芯范。

2×4－○＋？表示有上下水平分范，一周腹范 4 块，圆形底范，芯范数目不明。

四 图与表的编制

正文之外，有图、表以及附图、附表。与正文直接相关、起说明作用的为图、表。图、表插于正文之中，编号由章、节和顺序号构成。如图 2.3－4，表示第二章第三节的第 4 幅插图。附图、附表未对正文起说明作用，列于全文之尾。附图、附表只按顺序编号，如附表 1、附表 2 等。

五 注释方式

本书注释采用脚注，每页重新编号。但对于一些反复引用的文献和材料，为避免注释的繁冗与重复，特采用一些简化的注释方式。

1. 凡属于本书研究对象的曾国青铜器材料，在第二章材料分析一节中集中注释。其后再在本书其他部分引用时，不另作注释。书末另外特设《附录一：曾国青铜器著录文献》。

2. 在引用一些器物图片等参考资料时，对一些参考书目设置简称，直接在正文之中起注以说明其出处。插图下括号内文字所标书刊名或书名简称，表示该图片引用出处。只有在脚注中专门说明某一问题而引用这些书目时，才注出全称。这些书目有：

《全集》：《中国青铜器全集》，文物出版社，1994－1998 年。

《断代研究》：王世民等《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文物出版社，1999 年。

《夏商周》：陈佩芬《夏商周青铜器研究》，世纪出版集团等，2004 年。

《周原》：曹玮《周原出土青铜器》，巴蜀书社，2005 年。

3. 曾国青铜器以外铭文，如在《殷周金文集成》、《近出殷周金文集录》中著录，则注明其著录编号。两部书名分别用其简称：

《集成》：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中华书局，1984－1994 年。

《近出》：刘雨《近出殷周金文集录》，中华书局，2002 年。

第二章　曾国青铜器的分期

曾国青铜器的分期，是周代青铜器年代学研究中颇为突出的一项工作。最早对曾国青铜器进行断代的是郭沫若，他在《大系》“曾伯霥簠”条下对该簠的年代判定为“春秋初年之物”；又在“曾子遗簠”条下推测该簠“盖春秋中叶前后之器”①。在当时缺乏成组器物群出土的条件下，对曾国青铜器年代研究不得不单件器物孤立地进行判断，其依据大体是铭文字体、器物形制等因素。真正进行曾国青铜器的分期工作，只能是在曾国青铜器群出土有相当数量之后才得以开展。1978 年曾侯乙墓的发掘，使学术界对此前出土的几批曾国青铜器的材料也重视起来。在此背景下，周永珍首先尝试对早于曾侯乙墓的曾国青铜器作分期的探讨，她将当时随州、京山、枣阳以及她认为属于曾国的新野出土青铜器等 7 个铜器群进行排序，分析指出这些铜器群的年代早至西周晚期，较晚者在春秋中期②。除了将熊集段营的年代定得略晚之外③，周永珍对这些器物群年代的判断大体是客观的。这是学术界首次对曾国青铜器作分期意义上的年代学研究。在两周之际诸侯国青铜器中，此次研究也是首次较有系统的分期工作。在当时两周青铜器年代框架尚不健全的条件下，可供对比的年代确切的青铜器材料亦不多，作出上述研究结论确实难能可贵。

20 世纪 90 年代，曾国青铜器材料基本上已经涵盖了迄今所知的各个时间段，对曾国青铜器进行全面分期的条件成熟。杨宝成、张昌平等先后作了这一工作。杨宝成将曾国青铜器划分为商、西周、春秋、战国四个阶段共八期④。但他直接将随州一带出土的商、西周早期青铜器都归入曾国青铜器则缺乏依据，他将战国中期偏晚的擂鼓墩 M13 也视为曾国墓葬⑤，也是不确之论⑥。同时，杨宝成的分期方法是直接将各个铜器群与

---

① 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第 186－188 页，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 年。

② 周永珍：《曾国与曾国铜器》，《考古》1980 年第 5 期。

③ 周永珍最早注意到段营的曾子仲谏鼎与 71 新野小西关曾子仲谏甗为同人所作，但她因此而认为段营器群的年代接近 71 新野小西关，则是不确的。

④ 杨宝成：《试论曾国铜器的分期》，《中原文物》1991 年第 4 期。

⑤ 杨宝成：《试论随枣地区的两周铜器》，《中国考古学会第七次年会论文集·1989》，文物出版社，1992 年。

⑥ 一般认为擂鼓墩 M13 性质为曾国灭亡后的楚墓。刘彬徽等：《曾国灭亡年代小考》，《江汉考古》1984 年第 4 期。

中原地区一些典型铜器群作年代比照，而没有对曾国青铜器的不同器群作排队分析，这在方法上值得商榷。或因如此，他的一些结论似乎也有可商之处。比如他认为段营、桃花坡 M1 器群年代晚于苏家垅、何家台，就显得缺乏证据①。张昌平将西周晚期至战国时期曾国青铜器划分为七个期别，强调曾国青铜器在春秋中期前后两个不同阶段表现出较大的变化②。张昌平的分期是通过类型学分析完成的，但将出土龙纹鑐的郭家庙 M02 定在最早的一期，说明对曾国青铜器自身的特征分析仍然不够。朱凤瀚也对曾国青铜器提出了结论性意见③，并认为曾国青铜器未有早至西周晚期者。他将曾国各铜器群分别比照他提出的中原地区春秋青铜器的分期，认为熊家老湾两批青铜器属于春秋早期偏早，桃花坡 M1、M2 属于春秋早期偏晚，而苏家垅器群属于春秋中期偏早等等。这样，朱凤瀚将春秋晚期之前曾国青铜器的年代定得普遍较晚④，因此一些结论性意见就与其他学者分歧较大，例如他认为“曾国铜器中鬲出现较晚，至早期偏晚才出现而且只盛行至于春秋中期偏晚这一段时间内”；“春秋早期时曾器中一直未见簠，直到近春秋晚期时始出现”⑤。现在看来，这样一些判断的依据未必确切。上述研究虽然大体将曾国青铜器的年代系列建立起来，但大家对一些铜器群年代上的分歧，说明分期工作存在着问题。同时，对曾国青铜器年代的看法不同，得出关于曾国青铜器的认识也大相径庭。这无疑是全面研究曾国青铜器的一大障碍。

回顾曾国青铜器分期，可以看出这一研究存在着几个方面的问题。

1）由于曾国青铜器多数器物群材料比较零碎，如果将各群材料不加甄别而直接作为分期的典型单位使用，势必影响到分期的准确性。

2）研究中一些铜器群的年代往往是直接由器群中某一件器物与中原周文化某器群相应器物作对比而作出。这样由局部代表全面的研究方法当然容易出现问题。由于两周之际前后青铜器在相当的地域和时间范围内所表现出的文化面貌具有较强的一致性，以几件单个器物类比来判定一个器群的年代，往往带有很大的主观性，因此乃至于罗泰认

---

① 相反，王世民认为段营铜器较早，属于西周晚期。见王世民：《西周时期诸侯方国青铜器概述》，《中国青铜器全集 6》，文物出版社，1997 年。

② 张昌平：《曾国铜器的分期及其相关问题》，《江汉考古》1992 年第 3 期。

③ 朱凤瀚：《古代中国青铜器》之《春秋青铜器》，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 年。

④ 朱凤瀚没有具体论证判定曾国青铜器各期年代的依据，但他认为“中原地区附耳鼎约在春秋早期偏晚即出现”，可能是一个重要标准。参朱凤瀚：《古代中国青铜器》之《春秋青铜器》第 892 页，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 年。

⑤ 朱凤瀚：《古代中国青铜器》之《春秋青铜器》第 892 页，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 年。

为两周之际曾国青铜器“可以断代于九世纪中期到八世纪后期的任何年代”①。同时，简单地将曾国青铜器与其他铜器群类比，更抹杀了曾国青铜器自身可能存在的特点和发展轨迹，也掩盖了曾国青铜器自身可能存在的早晚差异。

3）由于曾国青铜器较明显的存在两个大的发展阶段，两大阶段之间文化差异较大，将这两个不同阶段置于同一框架之内进行器物和器群发展排序，也容易混淆各阶段自身特征，因此而进行的分期，形成的结论至少在看上去是武断的。

4）分期工作中确定各期年代依据的本身存在着问题，因此形成较大的分歧。学术界对于西周晚期及其后一些重要的青铜器群年代认识并不一致，以曾国青铜器比附这些铜器群，会影响结论的客观性。另一方面，由于曾国青铜器不少铜器群中存在早晚不同器物，若以某较早特征铜器为依据来判断该铜器群的年代，也会影响到结论的正确性。

以上几个方面的问题，是在曾国青铜器分期工作中应当避免的。因此对于曾国青铜器的分期，首先所要做的工作是从各群青铜器材料中选取组合相对完整的单位，将其作为参加分期的典型单位。而整个分期工作，可以分为两个层次，即先对曾国青铜器大的发展阶段作一划分，然后，再在各个大的阶段内进行各自的分期。

上述所谓曾国青铜器的分期，实际上只是青铜容器的分期。而数量相对较多的车马器和兵器，由于单位材料的不平衡，我们不作特别地强调。如果在讨论过程中涉及其年代和时代特征等问题，将在与青铜容器相关的分期平台下作考虑。但兵器中某些戟与戈，常为曾国高级贵族特别是曾侯所使用，而其材料又有不少是缺乏有价值的同出关系，因此需要对其作一独立的年代序列等方面的考察。

第一节　材料出土背景分析

青铜器研究的一个理想的研究条件，是要求研究对象必须有清晰、完整的背景信息。但遗憾的是，曾国青铜器尤其是器物群却往往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在出土背景上，曾国青铜器基本上有如下四种情况：一是出土地点、时间明确的采集品，器物一般有共存关系，但多为农民偶然发现，青铜器的组合关系等方面的信息受到干扰。这类青铜器大约有20个单位②，它们多发现于20世纪90年代以前。二是出土地点、时间明确的

① Lothar von Falkenhausen, The Waning of the Bronze Age, p512.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 from the Origins of Civilization to 221 B. C. Michael Loewe and Edward L. Shaughnessy, editor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② 这种统计数量为约数，是因为一些曾国青铜器出土情况较为复杂。例如1975年随州均川刘家崖采集的青铜器“是分三次在百米范围内先后出土”，但其中不少青铜器又具有相同的性质。这种情况就难以确定青铜器的批数甚至是件数。

发掘品，器物多出土于墓葬，但不少单位受到了盗扰。经过正式发掘的曾国31座墓葬中，只有8座墓葬未受到盗扰或破坏。这些单位主要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发现的，受到盗扰的墓地主要是郭家庙墓地，甚至曾侯乙墓、擂鼓墩M2也发现有盗扰痕迹。三是出土地点、时间只是大体清楚的采集品，这类青铜器都是单个的有铭铜器。四是出土地点、时间均不清楚的传世品。三、四两类青铜器之确定为曾国青铜器，是依据其铭文带有“曾”国的属性。但第四类铜器是否属于我们研究的这个曾国，也还有待辨析。

曾国青铜器的背景信息不完整，但可以对其加以分析，从中提取尽可能多的信息。另一方面，又需要剔除那些干扰、混淆主题的材料，为相关的研究特别是分期研究打下基础。对曾国青铜器材料的分析，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铜器组合价值的评估

青铜器组合是研究青铜器分期、社会等级、文化关系等诸多问题的重要材料。组合关系完整的铜器群当然是进行上述科目分析的典型材料，但即便是组合关系残破的器群，也仍然有其价值。比如郭家庙M1出土鼎1、簠2、方壶2、盘1、匜1，这些随葬品是墓葬遭破坏后收集的，其组合关系已不完整，但这组器群仍然可以说明三点组合方面的信息：一是这一时期簠在曾国青铜器中已经出现，二是在M1之中簠可能是取代了簋，三是M1原来可能随葬鼎三件或以上。另一方面，青铜器之外其他质地的组合材料也有参考价值。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发现的春秋中期之前的曾国青铜器，多未见有同出陶器的现象。但郭家庙墓地的一些墓葬虽然被盗，但仍然可见有不少铜器墓包括铜礼器墓同出陶器的。看来当时有的墓葬铜礼器与陶器有可能同出，只是20世纪90年代以前发现的青铜器多系农民发现而后上缴，当时同出的陶器极有可能在出土时即遭损毁。

有鉴于此，我们可以将出土曾国青铜器的各个单位，按照其组合的完残程度划分为四个不同的价值档次，以便为分期、特征等不同的项目作材料的准备。

第Ⅰ类：有一定同出组合关系、未见扰乱的墓葬。这类单位是作为分期等项目的典型材料。

第Ⅱ类：同出关系比较完整但可能有一定的扰乱、或者确实经过扰乱但组合仍然比较齐全的单位，以及器类比较齐全的采集品。这类单位可参与分期排队，亦可作为组合分析的参考。

第Ⅲ类：可能未经扰乱但只有单类铜器的单位。此类单位对于分期排队的意义不大，却是组合分析的典型材料。

第Ⅳ类：经过严重扰乱但有少量不同类别铜器或不同质地出土物的单位，或者是单件的采集品和传世品。

第Ⅲ、Ⅳ类单位铜器不参加分期、排队，其年代是通过比照已有的分期成果来确定。这些青铜器也不能参与组合等项目分析，但作为个体青铜器表现出的曾国历史信息仍然有相应价值。

在作价值评估之前，我们还应该意识到与组合关系相关的三个方面的情况。

1）在对采集品作组合完整程度分析时，应当考虑到不同时期采集品的完整程度情况可能有所不同。对于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采集品，在当时社会风气的条件下，我们可以假定农民会上缴他们的全部或至少是大部的发现。也就是说，当时经由农民发现的铜器群可能组合比较齐全。而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文物的经济价值被社会普遍重视，在建设施工中发现的青铜器，即便是及时收缴，组合关系遭到破坏的可能性也会较大。

2）郭家庙墓地中经过正式发掘的有25座墓葬，其中15座早期被盗（另外6座墓葬被现代施工破坏，其中也有早期被盗情况）。在扰乱范围常常遗留有铜兵器、车马器以及玉器等小件，说明这些盗扰目标往往是青铜礼器。由于车马器、兵器和玉器等小件器往往数量较多，因此如果一座被盗墓葬中未见某一类小件器（例如玉器），我们可以假定该墓可能原来就没有随葬该类器（玉器）。

3）在20世纪80年代曹门湾、郭家庙一带采集的4批青铜器，这些铜器的出土地点与郭家庙墓地相近，其中1984年3月采集的青铜器地点GM2就位于郭家庙墓地西北，它们与郭家庙墓地可能属于同一墓地的不同墓区，它们早期被盗的可能性如同郭家庙墓地，也应当是很高的①。

2. 年代分析

年代分析本来应当是分期工作的任务。但既然确定一个铜器群的年代是以该群中最晚的年代特征为依据，这样就应当在进行分期工作之前辨析出那些年代明显早于器群年代的器物，以免干扰分期工作的客观性。铭文内容表明，曾国青铜器一些组合中包含有黄、卫、陈等其他诸侯国铜器，或者也有沿用其先辈青铜器的情况，这些来源复杂的铜器年代往往可能较早。而那些无铭的青铜器当然也可能包括同样的情况，比如，有些青铜器器形、纹饰风格与同出其他青铜器差异较大，它们可能也是早期青铜器风格的变异或其遗型。

3. 出土铜器单位埋藏性质的分析

出土铜器单位性质是判断其身份等级以及所在遗存性质的重要依据。曾国青铜器不少器群的出土背景不明，器群是属于墓葬还是其他性质并不清楚。明确遗物埋藏性质有助于对器物群所有者身份、等级的判断。

---

① 如果认识到这一背景，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何以曹门湾等几批青铜器的组合不完整。

4. 传世品国别性质的分析

传世的曾国青铜器是否属于湖北之曾的曾国青铜器？如果我们将其他曾国青铜器混淆入湖北之曾，必然会使研究结论产生歧义。因此这也是一个必须廓清的基本问题。

从发现背景来说，曾国青铜器有如下几种不同性质：

A、在几个集中的区域多作为铜器群出土，这些地域主要是漳河、滚水、涢水等几个，它们多数可能属于曾国疆域范围内。

B、在上述区域之外零星出土，这些均为单个带曾国铭文标识的青铜器，有的伴出于非曾国背景的墓葬中，出土地域可能在曾国疆域范围之外。

C、收集的曾国青铜器，这些青铜器虽然没有明确的出土地点，但其收集背景往往比较清楚。

D、传世的曾国青铜器，其出土背景完全不明。

以下我们将 A 类曾国青铜器按漳河、滚水、涢水等几个出土地域分别叙述，主要分析铜器群的出土背景和组合完残程度；将 B、C 类曾国青铜器一并叙述，主要分析其出土背景与湖北之曾的关联；最后分析 D 类曾国青铜器是否与湖北之曾相关。

一　漳河地区出土材料

今湖北省京山县北部大洪山山脉南麓的漳河流域出土过曾国青铜器两批：两个地点分别隶属于坪坝镇苏家垅和檀梨树岗。

1. 苏家垅

苏家垅位于坪坝镇西北的漳河北部，出土青铜器地点位于山地边缘，其南部为漳河河谷地带。1966 年这里因为水利工程建设而发现青铜器 97 件①，其中铜容器鼎 9、鬲 9、甗 1、簋 7、豆 2、方壶 2、盉 1、盘 1、匜 1 共 33 件。除容器之外，其他为马镳、衔等马器，明确的车器则未见。苏家垅这批青铜器在鼎、豆、壶等 6 件铜器上都有“曾（侯）仲斿父”铭文，因此，斿父应该是这批青铜器的所有者。另外的有铭铜器有鼋乎簋和黄朱柁鬲各 2 件，其年代可能略早。尽管苏家垅铜器群的器物构成比较复杂，它们可能并非是同一时间铸造，但它们所构成的组合形式却是井然有序的。例如 2 件有铭鼎与其他 7 件无铭鼎大小成列，方壶、豆成对出现，有铭鬲与无铭鬲也配成 9 件。说明这一铜器群的组合比较整齐、完整。但是鼋乎簋与其他无铭簋一共 7 件，不合 9 鼎 8 簋的常数，或与这批铜器是采集的出土背景有关。苏家垅铜器出土性质不明，从出土地点为山地之侧、铜器群的构成为组合较齐全的容器和马器，可以推测这批铜器出土于墓葬之中。

① 湖北省博物馆：《湖北京山发现曾国铜器》，《文物》1972 年第 2 期。

2. 檀梨树岗

檀梨树岗隶属于坪坝镇罗新村，1973 年此地发现曾太师鼎和曾子单鬲两件有铭铜器①。京山博物馆另收藏有一件鼎，据记录资料也是同年罗新村出土。但由于资料的缺失，目前已难以了解这些器是否是同出、出土性质以及当时是否有其他伴出器物等。因此这些青铜器在组合情况上只能作为第Ⅲ类处理。

二 滚水地区出土材料

今湖北枣阳南部的滚水地区发现的曾国青铜器主要集中于两地：下游的熊集段营和上游的吴店东赵湖村，后者又包括曹门湾和郭家庙两个墓地。郭家庙墓地发现墓葬 27 座，是曾国已发现并发掘墓葬最多的墓地。

1. 段营

1972 年枣阳熊集镇茶庵乡段营农民发现青铜器，后经考古清理确定这里是一处葬具为一棺一椁的墓葬②。墓葬中出土 289 件青铜器，其中有鼎 3、簋 4、壶 2 共 9 件容器，戈、矛、镞兵器 5 件，其他为车辖、马衔等车马器。三件鼎形制、纹饰略有差异，其中两件重环纹鼎，另外一件窃曲纹鼎有“曾子仲谏”铭文，四件簋形制、纹饰相同。这批材料有如下几点值得注意：

1）段营墓葬的青铜器为农民所发现，其容器中不见水器，这在 4 簋、2 圆壶这种级别的墓葬中罕见。因此，此墓组合价值只能列入第Ⅱ类。

2）与曾子仲谏鼎同人所作之器曾子仲谏甗 1971 年出土于新野小西关墓葬③，可见曾子仲谏之器较为分散。小西关墓葬墓主并非曾子仲谏（详后），段营这座墓葬只见这一件带铭文青铜器，墓主也不能确定为曾子仲谏。

3）关于段营及东赵湖一带墓葬青铜器材料的错讹问题。段营的材料发现较早，由此引发东赵湖曾国青铜器材料报道连锁反应式的错误。根据段营墓葬的简报，该墓葬出土相同的簋四件。对照简报图片，簋的形制为三周重环纹、螺旋状角的兽首耳。根据笔者调查，这种重环纹簋收藏于枣阳市博物馆 2 件（其中一件失盖）、襄樊市博物馆 1 件，另外 1 件簋不知所在。段营简报发表于 1975 年，因此不可能混入其后发现的材料。但在《江汉考古》1983 年第 3 期和《枣阳郭家庙曾国墓地》两处关于曹门湾出土青铜器的报道中，都将枣阳市博物馆收藏的段营出土的两件重环纹簋视为 1983 年 1 月曹门

① 杨权喜：《江汉地区发现的商周青铜器——兼述楚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关系》，《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4 年。黄锡全：《湖北出土商周文字辑证》，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 年。

② 湖北省博物馆：《湖北枣阳县发现曾国墓葬》，《考古》1975 年第 4 期。

③ 郑杰祥：《河南新野发现的曾国铜器》，《文物》1973 年第 5 期。

湾所出，这是不对的。根据枣阳市博物馆收藏有另外两件窃曲纹、勾云状兽首耳的簋，推测其为1983年1月出土的两件簋。但《枣阳郭家庙曾国墓地》将这两件簋归入1983年4月在郭家庙的墓葬（编号GM02），并将另外盘1、匜1均归入此次发现，即以为GM02出土鼎1、簋2（《枣阳郭家庙曾国墓地》误作簋1）、鑐1、盘1、匜1，这又是不对的。因该组青铜器中盘、匜的年代特征略早于83郭家庙墓葬出土的鼎、鑐，查《江汉考古》1984年第1期对1983年4月发现东赵湖郭家庙GM02的简报①，该次发现的青铜器是鼎1、鑐2，因此盘、匜不大可能与鼎、鑐同出。这里的盘、匜，徐正国认为是熊集段营所出②，亦误。按照东赵湖一带屡次出土青铜器的情况，盘、匜可能是那里出土的，但目前无法确认。以上情况系参照笔者在《曾国青铜器》中的分析③。

2. 曹门湾

曹门湾在段营之东约5千米的吴店镇，这里与郭家庙曾国墓地毗邻，它们在地域上都属于东赵湖村，因此较早的简报将这里称为东赵湖。曹门湾一带有三次出土青铜器。1972年，农民挖地时发现鼎2、簋2④。经过近年的再次调查，确定这批铜器可能出土于墓葬⑤。1982年，农民在曹门湾耕地时采集到“曾侯絴伯”戈1件⑥。1983年1月，在距离1972年曹门湾发现青铜器地点不到20米处，农民发现一批青铜器。经调查，铜器出土于一座墓葬，墓葬方向约正南北向，青铜器包括有鼎1、簋2、壶1⑦。如同熊集段营一节的材料分析，83曹门湾这批青铜器的2件簋应当为窃曲纹簋，而简报中所报道的重环纹簋实为段营4件簋中的2件。由于曹门湾在位置上与郭家庙墓地毗连，而郭家庙墓地普遍有早期被盗的现象，再考虑到83曹门湾鼎1、簋2、壶1的组合形式少见，因此72曹门湾、83曹门湾出土青铜器的墓葬早期被盗的可能性也很大。这两次出土青铜器的组合价值为第Ⅱ类。

3. 郭家庙墓地

郭家庙仅仅是位于曹门湾之南300米。2002年，襄樊市考古队在东赵湖郭家庙发掘了25座曾国墓葬、1座车马坑和2座车坑，并在一座遭破坏的墓葬中采集到青铜

---

① 徐正国：《枣阳东赵湖再次出土青铜器》，《江汉考古》1984年第4期。在《枣阳郭家庙曾国墓地》第4页注释②认为GM02“资料未发表”，是未能见到这一简报，因此引发错误。

② 徐正国：《枣阳文物古迹录》第7页，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

③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曾国青铜器》，文物出版社，2007年。

④ 湖北省博物馆：《湖北枣阳县发现曾国墓葬》，《考古》1975年第4期。

⑤ 襄樊市考古队等：《枣阳郭家庙曾国墓地》第二章第六节，科学出版社，2005年。

⑥ 田海峰：《湖北枣阳县又发现曾国铜器》，《江汉考古》1983年第3期。

⑦ 田海峰：《湖北枣阳县又发现曾国铜器》，《江汉考古》1983年第3期。

器①。在此之前的1983年4月，农民在墓地之西北发现一座较小的墓葬②，因其位于郭家庙墓地，《枣阳郭家庙曾国墓地》报告将这座墓葬编号为M02。这样，郭家庙墓地共已发现墓葬27座。

这27座墓葬分布在大约200米见方的范围内，这一范围是一处北高南低的岗地，但它们并未构成一处完整的墓地。由于是配合高速公路的建设，对墓地的发掘主要限于建设工程涉及的区域。根据调查和勘探的情况，发掘者分析在墓地的北部、南部以及西南部还应该有未经发掘的墓葬。这种不完整性加之该墓地遭早期和现代严重盗扰，郭家庙墓地虽然是迄今唯一一处经过正式发掘的曾国墓地，但墓地的布局和埋葬制度方面的信息受到严重破坏和局限。

根据墓地发掘报告，墓地出土青铜器总数为3416件，车马器和兵器占绝大部分，而容器仅见25件。有出土单位的25座墓葬仅5座墓葬出土17件青铜容器，有10座墓葬不出土青铜器。这些似乎说明郭家庙墓地等级较低。但是，考虑到郭家庙墓地早期曾经严重被盗，25座墓葬仅有M6、M10、M19和M24等4座墓葬未受扰乱，显然，墓地原来的情况与发掘所见情况应有不同。这首先需要对墓地的随葬青铜器的情况进行分析。

郭家庙墓地的27座墓葬中，两座采集铜器的墓葬无法复原墓葬规模，也无从反映墓葬规模和随葬品的关系，这里的分析主要针对墓室结构大体明确的25座墓葬。这些墓葬的随葬品关系如表2.1.1。

表2.1.1　　郭家庙墓地墓葬随葬品类别统计表

	椁室大小	铜容器	铜兵器	铜车马器	玉石器	陶器	保存状况
M1	3.42×（残）0.9	鼎1、簠2、壶2、盘1、匜1		3	4		破坏
M2	3.1×?						被盗、破坏
M3	3.92×1.3		11	260			破坏
M4	3.5×1.1				1	1	被盗
M5	3.65×1.26		5	139	3		被盗、破坏
M6	3.3×1	鼎1	12			1	完好
M7	3.3×1.3	壶冠残片		190	2		被盗
M8	3.2×1.2	匜1				2	被盗
M9	3.08×0.96					9	被盗

① 襄樊市考古队等：《枣阳郭家庙曾国墓地》，科学出版社，2005年。

② 徐正国：《枣阳东赵湖再次出土青铜器》，《江汉考古》1984年第4期。

续表 2.1.1

	椁室大小	铜容器	铜兵器	铜车马器	玉石器	陶器	保存状况
M10	无						完好
M11	2.68×0.65		1		1	5	被盗
M12	2.9×1.35				5	1	被盗
M13	4×1.84			531	10	3	被盗、破坏
M14	3×0.9				2	4	被盗
M15	3.24×1.18				1	2	被盗
M16	3.3×1.32			37?	22	1	被盗
M17	4.3×2.6	鼎3、壶2、鬲1、杯1			141	17	被盗
M18	2.7×0.95				1	4	被盗
M19	2.88×1				2	10	完好
M20	3.4×1.46				3	1	被盗
M21	5.3×3.62	簋足及壶冠残片	160	1887	18		被盗
M22	3.1×1		13	6	4	2	被盗
M23	3×1.3				4	4	被盗
M24	2.76×0.74				2	3	完好
M25	（残）2.5×1.1	壶1	6	8	1	1	破坏

说明：表中椁室大小的数据单位为米，随葬品的数目为件。

我们知道，棺椁重数的多寡和大小是衡量墓主身份、墓葬等级的最重要的指标之一。在郭家庙墓地25座墓葬中，椁室大小基本与墓葬等级和随葬品的丰富程度相关。椁室长度超过4米的墓葬只有M17和M21，这也是仅有的两座带墓道墓葬，它们的等级最高。两座未被盗的墓葬M19、M24不出青铜器，它们的椁室较小。无随葬品的M10亦无棺椁。因此将棺椁作为评判郭家庙墓葬等级的主要指标是合适的。

出土陶器的墓葬等级未见得较低，例如M17出土较多陶器，规模较大的M13也出土陶器。在郭家庙墓地发掘之前，曾国青铜器多为社会生产活动所偶然发现，故鲜有陶器同出材料的报道。郭家庙墓地25座墓葬中只有7座未见陶器，这还包括一座无随葬品的M10。如果墓地未遭盗掘和破坏，出土陶器的墓葬数量可能更大。由此推之，其他地点的曾国铜器墓不少原来也应该是随葬陶器的。

车马器数量较多的墓葬椁室较大，M17椁室颇大却未见车马器，可能与墓主性别有关。出土车马器数量超过10件的墓葬有M3、M5、M7、M13、M16、M21等6座，这些墓葬的椁室长度均超过3.3米。但同时，这些墓葬多不见青铜礼器。显然，早期被盗是青铜礼器少见的主要原因。郭家庙墓地25座墓葬中，可确定早期被盗的墓葬有18座，明确未被盗的墓葬4座，另外3座为现代破坏，是否有早期被盗的情况不明。被盗墓葬

中青铜礼器几乎无存，只有 M8 一座墓穴中残留一件铜匜。M17 的几件青铜礼器得以幸免，是因其被放置于附葬坑之中。相对而言，被盗墓葬中武器和车马器等青铜小件、玉器以及陶器多有保存，可见郭家庙墓地早期被盗扰的目标主要在青铜礼器。在 M7、M21 等墓葬中出土铜礼器的残片，可以推测，墓地原来随葬青铜礼器的墓葬数量应当是较多的。

以下再对几座重点墓葬随葬品进行分析。

M1，位于郭家庙墓区中部偏东处。墓葬被现代施工所破坏，仅存墓底北部。随葬品经追缴获有铜鼎 1、簠 2、壶 2、盘 1、匜 1 等 7 件容器以及镳 1、节约 1、环 1 等车马器，另外见有玦、佩等玉器。此墓出土青铜器已遭严重损坏，其中盘、匜残甚，无法复原。簠和方壶各为一对，根据铭文可知，它们各是曾孟嬴削和幻伯隹所作之器。墓葬随葬品在组合上出现了簠并可能替代了簋，器物也有一些晚的特点。但幻伯隹方壶的年代较早，这种背带纹方壶出现和流行于西周中期，贯耳的作风也是西周中期风格，与该方壶形制相同的是 1960 年陕西扶风齐家村窖藏出土的方壶（《周原》1－57、60），唯齐家村壶纹细部饰窃曲纹。因此幻伯隹方壶的年代早于 M1。此墓铜器数量较多，但显然组合已不全。其组合价值为第Ⅱ类。

M17，位于郭家庙墓地中部西侧。墓坑之南设有附葬坑。墓室早期被盗，而附葬坑内器物保存完整。随葬品共见有铜鼎 2、鼎足 1、鬲 1、壶 2、杯 1、方座形器 1、小铃 7、“Y”形器 4、帽形器 1 件，陶小口鬲 2、罐 5、豆 4，玉石佩 14、管 22、贝 1、珠 102 等。M17 设附葬坑，但坑内器物并非是特定的一套器物。除铜容器外，附葬坑随葬有罐、豆等陶器，但相同器类和器形的随葬品又见于墓室内；附葬坑有铜鼎两件，但在墓室还发现有扰乱残剩的鼎足，说明原有的鼎不止此数。推测附葬坑是因 M17 随葬品过多无法放置或者其他原因而加设的，坑内器物并不成套。因此 M17 现存青铜容器的组合也不完整。除了墓葬结构反映的高等级之外，两周之际前后的墓葬若随葬壶一对，则器主级别较高，其器物组合往往很齐备。但 M17 未见簋或簠这类盛食器，也未见盘、匜这种极其常见的水器，鬲仅 1 件，也同样不合常规。可见 M17 早期被盗已经造成青铜容器的损失，现存青铜器的组合形式已不能反映墓主等级。M17 随葬品类别构成比较特别，陶器和玉器的数量较多，特别是玉器 141 件的数量远远大于郭家庙墓地其他 24 座墓葬所出玉器总和，玉器的器类也以佩玉为多。M17 另外一个突出现象是不见兵器和车马器，这与 M17 墓主的身份有关。M17 出土的两件铜鼎均为曾亘嫚非录所作，曾亘嫚非录应当是墓主。根据金文妇称规律可知，曾亘嫚非录是嫁入曾国的嫚姓女子，这一情况与 M17 随葬品反映出的女性特征相符。M17 为带墓道的一棺一椁墓，两周之际前后发现带墓道墓葬的级别都在国君或夫人一级。M17 墓底长 5.63、宽 3.76－3.8 米，这一规模相当于晋侯墓地晋侯夫人墓。基于以上几个方面的情况，推测 M17 墓主曾亘

嫚非录为曾侯夫人。

M21，位于郭家庙墓区北部最高的台地偏东处，是墓地级别最高的墓葬。墓葬周围未经调查，但发掘报告已经指出 M21 东西两侧未见有其他墓葬。M21 与周围墓葬的距离远远大于其他墓葬之间的距离，它距离最近的 M24 达 48 米，西距 M17 约 120 米。这种布局与虢国 M2001 虢君墓相似。郭家庙墓地的年代，按照发掘报告的分期，是东北较早，而向西南渐晚。墓地的这些布局特征与虢国墓地的情况完全相同①，M21 与墓地其他小墓，大约也是有血缘关系而构成的公墓地②。按照这样的墓地布局，M21 应当为一代曾侯墓葬。M21 为带墓道的重棺一椁墓，墓底东西长 6.56、南北宽 4.12 米，是郭家庙墓地葬制最高、规模最大的墓葬。墓葬结构、规模与晋侯墓地的晋侯墓葬相同，因此不排除其是一代曾侯墓葬。

M02，为 1983 年 4 月农民发现，当时简报报道所见青铜器为鼎 1、鑐 2③。这一发现在 2005 年经过重新报道④，报告重新调查了出土地点，发现其位于郭家庙墓地之西北，原来应该为一处墓葬，并给以新的墓葬编号 M02。如我们在熊集段营的材料分析所言，2005 年的报道将这批材料报道为鼎、簋、鑐、盘、匜各一是不对的。M02 出土的鼎 1、鑐 2，从组合上看很特异。考虑到郭家庙墓地其他墓葬被盗严重，推测这三件青铜器也是劫后之余。这组器物组合价值为第Ⅱ类。

综合郭家庙墓地布局和随葬品所反映出的等级诸方面的情况，这里应当是一处曾国公族墓地。

三　溳水中游地区出土材料

今湖北随州市地域主要水系为溳水，溳水中上游较大的支流涢水、漷水、漂水、均水与南北两侧的大洪山、桐柏山构成这一区域的地理概势。由溳水与均水交汇区到溳水与漂水交汇区的一段河谷，即由安居至淅河一带属于地势较为开阔的地带。这里是曾国青铜器的一个较大的分布区域，它们主要包括如下一些小的地理单元：均水中上游地区、溳水与涢水交汇地带的安居一带、溳水北部支流漂水一带、溳水与北部支流水交汇处的随州城郊义地岗和擂鼓墩一带、溳水上游的鲢鱼嘴等。

（一）均水中上游一带

均水是溳水南部区域的水系。这里发现的曾国青铜器包括有熊家老湾、刘家崖、何

① 孙华：《周代前期的周人墓地》，《远望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华诞四十周年纪念文集》，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 年。

② 赵化成：《从商周“集中公墓制”到秦汉“独立陵园制”的演化轨迹》，《文物》2006 年第 7 期。

③ 徐正国：《枣阳东赵湖再次出土青铜器》，《江汉考古》1984 年第 4 期。

④ 襄樊市考古队等：《枣阳郭家庙曾国墓地》第 189－195 页，科学出版社，2005 年。

家台等三个地点。

1. 熊家老湾

随州均川熊家老湾于1970年、1972年两次发现青铜器，“两次出土地点彼此相距约60米”①，其出土性质应当相同。熊家老湾位于均水左岸，北部邻近于山地。出土铜器地点之南有西周至春秋时期的黄土岗遗址。这种地理环境说明熊家老湾可能是一处曾国墓地。70熊家老湾出土铜器包括曾伯文簋4、曾伯文鑐1、方卣1，这应当不是该器群原来完整的组合形式。72熊家老湾器群出土器为鼎3、方甗1、簋2、鑐1、盘1、匜1，2件鼎和2件簋上分别有“曾仲大父蛸”和“黄季”铭文。除了未见这一时期常见的鬲之外，这是一个比较齐全的组合。

2. 刘家崖

刘家崖位于熊家老湾西南约500米的均水左岸，这一带的土岗多次出土、采集到东周时期青铜器，考古工作表明这里是一处墓地，因此可明确这里的青铜器出土性质均应当属于墓葬。刘家崖几个铜器群年代均晚于熊家老湾两批青铜器，推测两个地点是前后延续的两个不同时期墓地。刘家崖的青铜器主要分1975年、1980年两个年度所出。按照报道，1975年出土的青铜器颇为纷杂。1975年冬，在刘家崖“三次在百米范围内先后出土”鼎5（另外有鼎盖5、鼎耳5、鼎口沿2、鼎足23）、甗1、簋4、簠4、壶5、盘3、车軎2②。在这些鼎的材料中，可复原“连迁之行升”升鼎3件，它们与带“连迁之御吉”铭文的深腹鼎（盖已失）无疑为同一组器。这4件鼎显然也并非完整的随葬组合，但为升鼎与盖鼎较早的搭配形式。其他青铜器则无法分组。1975年还发现另外两件形制相同的方豆③，作器者为“邵”，同铭之鼎还在四川新都战国中期蜀国墓葬中出土④。邵方豆与邵鼎铭文字体、行款也完全相同，当为同人所作之器⑤。

1980年，随州市博物馆在刘家崖发掘了一座墓葬，墓葬早期被盗，但仍然出土铜器30件，其他有金箔、玉石玦、牌形饰、璜、佩、陶罐等⑥。铜器包括有鼎2、鼎足1、鬲4、簋耳4、圆壶2、编铃5、勺2、戈1、銮铃2、节约1、管形饰6。鼎、圆壶、戈有“盅”、“盛叔”等铭文，是同一人所作之器，当为墓主。此墓随葬品虽有流失，但青铜器器类信息仍较丰富。

---

① 鄂兵：《湖北随县发现曾国铜器》，《文物》1973年第5期。

② 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县刘家崖发现古代青铜器》，《考古》1982年第2期。

③ 随州市博物馆：《随州均川出土铭文青铜器》，《江汉考古》1986年第2期。简报误将豆报道作器盖。

④ 四川省博物馆、新都县文物管理所：《四川新都战国木椁墓》，《文物》1981年第6期。

⑤ 黄锡全：《湖北出土商周文字辑证》，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

⑥ 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县刘家崖发现古代青铜器》，《考古》1982年第2期。

3. 何家台

何家台位于大洪山北麓，由此地可向南越过大洪山，因此这里可能也是由涢水流域通往苏家垅的通道。1978 年何店何家台河沙中出土一批青铜器 18 件①，计有鼎 2、方甗 1、鬲 4、簋 2、圆壶 2、盘 1、匜 1 等 13 件容器及马衔 2、车軎 2、锛 1。此外还有小玉饰、马饰等。这批铜器组合有序，结合其出土车马器和玉器的情况，原应是一座墓葬中的随葬品。

（二）涢水与溠水交汇地带的安居一带

安居位于涢水中游开阔的河谷地带西部，其南为熊家老湾、刘家崖等地点所在的均水流域。安居河谷东部由涢水延绵至今随州城区，这里出土青铜器的地点有安居镇之西的桃花坡、位于安居到随州城区之间的汪家塄两个地点。

1. 桃花坡

1979 年安居桃花坡农民发现青铜器，后经调查、清理确知青铜器出自两座并穴的东西向墓葬，编号为 M1、M2②。桃花坡 M1 随葬品有铜鼎 2、鬲 4、簋 4、壶 1、盘 1、匜 1、车軎 2、马衔 2、马镳 2、节约 138 件以及残玉、漆器，器物组合较完整。M2 随葬品有铜鼎 4、鬲 2、簋 1，其中鼎为 3 件重环纹鼎、1 件弦纹鼎。此墓鼎、鬲、簋的数量搭配不匀，不见西周晚期流行的水器，另外此墓也未见其他小件器物，颇疑现存铜器组合已不完整。桃花坡这两座墓葬并穴而葬，其年代、性质都应当是一致的。

2. 汪家塄

1988 年，安居徐家嘴的汪家塄发现春秋晚期一残墓③，出土铜鼎 1、簠 2、镞 2 及铅方壶 2、陶罐 1 件。鼎、簠分别有“曾孙定”、“曾都尹定”铭文，“定”应当为墓主。随葬品组合应当是完整的。铅方壶虽然并非青铜器，但春秋中晚期楚墓如赵家湖楚墓中见有铅器替代青铜器的现象④。若如此，这座墓葬鼎、簠、方壶的组合形式正与义地岗墓地东风油库 M1、M2 相同。

（三）涢水北部支流漂水一带

漂水与涢水汇合处位于涢水中游开阔地带的东部，这里向北是由涢水中游联系淮河中上游地区的交通通道。这一带出土的青铜器有北部的周家岗和漂水与涢水交汇处的旭光砖瓦厂。

1. 周家岗

---

① 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县新发现古代青铜器》，《考古》1982 年第 2 期。

② 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县安居出土青铜器》，《文物》1982 年第 12 期。

③ 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州市安居镇发现春秋曾国墓》，《江汉考古》1990 年第 1 期。

④ 湖北宜昌地区博物馆等：《当阳赵家湖楚墓》，文物出版社，1992 年。

1976年，农民在万店周家岗发现16件青铜器，根据出土青铜器坑内有朱砂、漆皮等遗迹，可确定为一座墓葬所出①。出土青铜器计有鼎2、鬲2、簋2、圆壶2、盘1、匜1等10件容器以及戈2、车軎4，鼎、盘有“廓季之伯歸塞”铭文，且作器风格与壶、匜接近，由此可知该墓葬墓主为“歸塞”。两件簋、鬲铭文均被刮，这四件铜器的年代恰好略早，说明它们系“歸塞”由他处掠入的。但鬲、簋无疑参加了这座墓葬铜器的组合，使其铜器的组合较为整齐。

2. 旭光砖瓦厂

1983年随州东郊旭光砖瓦厂发现青铜器，系出土于一座墓葬，出土物有铜簋2、铲1、矛1、镞12②。从发现情况看，这些铜器可能是墓葬的全部随葬品。

（四）义地岗墓地一带

溳水与北部支流水交汇处为今随州城区，其东部郊区义地岗墓地多次发现曾国青铜器。此外，义地岗之北的黄土坡也发现有青铜器。

1. 义地岗墓地

1976年，农民在随州义地岗墓地挖出鼎、盏各1③，鼎、盏器主均为敃，这两件青铜器也应该为墓葬所出，这一组合是否齐全，不能确定。

1979年，农民在义地岗墓地南部的季氏梁发现青铜器，调查和清理表明这是一座南北向墓葬，出土有青铜鼎1、甗1、簠2、编钟5、戈2以及车马器等40件，玉器5件以及漆器、丝麻织物等④。青铜器中一件簠盖有“陈公子仲庆”铭文，两件戈分别有“周王孙季怠”及“曾大攻尹季怠”铭文。“季怠”应是这座墓葬的墓主。陈公子仲庆簠盖年代较早，年代当在春秋早期，此盖与2件簠其他部分只是纹饰略有差异，大约2件簠是据陈公子仲庆簠盖而配的。此墓出土编钟5件，显示出墓主较高的等级，墓葬出土的铜容器的组合则已不完整。

1980年，在义地岗墓地季氏梁墓葬西南300米的八角楼发现青铜器，铜器为一座东西向墓葬出土⑤，墓葬随葬品有铜鼎1、盏1、陶鬲1、罐1。此墓陶器能够得以完整保存，说明其组合也未遭扰乱。

1993年，义地岗墓地发现铜鬲1、盘1、匜1及玉环2件，其中铜鬲有铭文。调查确认器物为一南北向墓葬中所出，该墓葬被编号为M83⑥。根据简报报道的出土背景，

① 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县发现商周青铜器》，《考古》1984年第6期。

② 左德田：《随州旭光砖瓦厂出土青铜器》，《江汉考古》1985年第1期。

③ 陈欣人、刘彬徽：《古盏小议》，《江汉考古》1983年第1期。

④ 随县博物馆：《湖北随县城郊发现春秋墓葬和铜器》，《文物》1980年第1期。

⑤ 随州市博物馆：《随州东城区发现东周墓葬和青铜器》，《江汉考古》1989年第1期。

⑥ 随州市考古队：《湖北随州义地岗又出土青铜器》，《江汉考古》1994年第2期。

这座墓葬的器物组合是完整的。此墓的年代较早，基本代表了义地岗作为墓地使用的起始时间。

1994 年初，随州市石油公司在义地岗墓地南部的东风油库进行施工建设，随州考古队配合工程发掘了三座墓葬①（M1 - M3），三座墓葬处于同一区域，M2 与 M1 南北并列，其间相距约 2 米，南部的 M3 北距 M2 约十余米。三座墓葬方向相同，均为西向，葬具均为一棺一椁。M1 随葬品有铜鼎 1、甗 1、簠 1、方壶 1、盘 1、匜 1、戈 1、镞 4 以及陶鼎 1、豆 1、壶 1。所出全部 6 件容器均带铭文“曾少宰黄仲酉”，因此黄仲酉为墓主无疑。M1 出兵器而无玉器，墓主当为男性，“黄仲”与黄国无关，而应该为曾国某支贵族。M2 随葬品有铜鼎 1、簠 1、方壶 1、盘 1、匜 1；陶鼎 1、豆 1、壶 1；玉玦、鱼、绿松石珠 2；骨环、料管形器。其全部 4 件带铭文的容器均为“可”所作，墓主为可。M3 随葬品有铜鼎 1、方豆 1、壶 1、盘 1、匜 1、器盖 1；陶鼎 2、罐 1；玉环 3、玦、长方牌形饰 5、璜 2；水晶珠 4。M3 带铭文的铜器分别有曾侯郕鼎和曾仲姬壶，从墓葬规模和年代角度考虑，此墓墓主为曾侯郕的可能性不大。M3 出土玉器较多，墓主可能为曾仲姬。东风油库这三座墓葬均属于考古发掘，随葬品组合齐全。

上述发现说明义地岗墓地是一处周代贵族墓地。曾国灭亡之后岗地成为平民墓地，1987 年和 1988 年在墓地北部的随州师范学校分别发掘了 24 座和 33 座墓葬，墓葬多为小型陶器墓，陶器组合以鼎、豆、壶为多，鼎、簠、壶次之，其时代为战国中、晚期②。该墓地一直沿用至东汉时期。

2. 黄土坡

黄土坡位于义地岗墓地之北约六公里，这里因为砖瓦厂施工发现青铜器，后清理确定铜器出土于墓葬。墓葬编号为 M1，南北向，葬具为一棺一椁。随葬品有鬲、壶等陶器和铜鼎 1、戈 1、钺 1③。黄土坡 M1 随葬品保存应当是完整的，其组合情况反映了曾国较低级别贵族墓的情形。

（五）擂鼓墩墓群

擂鼓墩墓群隔水与义地岗墓地相望，但墓葬等级明显较义地岗墓地为高。1978 年在墓群东南部的东团坡发现曾侯乙墓（擂鼓墩一号墓）④。墓葬出土有青铜器、漆木竹器、金玉石器及竹简等大量随葬品，其中青铜器包括一套 65 件编钟以及鼎、鬲、甗、簠、簋、壶、尊、盘、匜等礼器。整座墓葬出土青铜器总重量超过 10 吨，是中国古代

①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北随州义地岗墓地曾国墓 1994 年发掘简报》，《文物》2008 年第 2 期。

② 王善才、黄建勋：《随州市师范学校战国墓群》，《中国考古学年鉴 1989》，文物出版社，1990 年。

③ 拓古、熊燕：《湖北随州市黄土坡周代墓的发掘》，《考古》2007 年第 8 期。

④ 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文物出版社，1989 年。

青铜器最大的一次发现。墓葬中所有重要类别青铜器超过一百件次铭有“曾侯乙”之名，墓主为曾侯乙无疑。根据出土的曾侯乙编钟中的楚王酓章镈有“唯王五十又六祀，返自西阳”之句，五十六年当为楚惠王纪年，即公元前433年。这样，曾侯乙墓年代应在这一年或稍后。曾侯乙墓社会属性、墓主身份以及年代明确，也是判断擂鼓墩墓群性质的重要依据。

1981年在距离东团坡仅102米的西团坡发现随州擂鼓墩二号墓①。墓葬出土编钟以及鼎、鬲、甗、簋、簠、壶、缶、盘、匜等青铜器，其中编钟一套36件，升鼎9件，表明墓主身份也在曾侯一级。1997年，经调查与勘探，发现擂鼓墩墓群南北延续一公里，并新发现擂鼓墩土冢、王家湾、蔡家包M14、王家包等另外四个带封土的墓葬。这些墓葬分别占据临近溳水的各个岗地的制高点，在布局上都是彼此独立，有的墓葬如蔡家包M14、王家包等规模与曾侯乙墓接近②。根据这些墓葬规模、布局等方面情况分析，它们也应当和曾侯乙墓一样，是曾侯一级墓葬③，因此擂鼓墩墓群应当是布局比较完整的战国时期曾国国君陵园区。

明确擂鼓墩墓群为曾国陵园的性质，擂鼓墩M2墓主身份就有了明确的答案。过去由于该墓葬临近曾侯乙墓且未见兵器，故多被学者断为曾侯夫人墓。不过，是否随葬兵器并非判断墓主性别的绝对标准，商周时期如著名的妇好墓即随葬兵器，楚系墓葬中江陵天星观M2墓主应当为女性，但也随葬有兵器④。从另一方面看，擂鼓墩M2只见玉璜2、环2、石璧2、料珠24件，装饰品数量与其墓葬等级不符。其实如果M2墓主为女性，也与夫人墓应当随葬大量装饰品的惯例不合。根据M2年代距曾国灭国时间不远的情况，该墓不见兵器应当是与其时曾国的政治局势相关。擂鼓墩M2和曾侯乙墓是擂鼓墩墓群中两座经发掘的曾侯级别的墓葬，铜礼器组合应当都是完整的。曾侯乙墓虽然发现有早期盗洞，但墓葬随葬品未有损失情况。擂鼓墩M2亦发现有“一条2米多宽的扰乱沟”，但墓葬中放置青铜礼器的位置未被扰乱，墓葬铜礼器组合仍可能是齐全的。擂鼓墩M2出土九鼎八簋，这一组合与曾侯乙墓相同，其他礼器亦接近于曾侯乙墓。从擂鼓墩墓群不见夫人陪葬墓和曾侯墓葬形成独立陵园的情况，可以明确擂鼓墩M2为曾侯墓葬的性质⑤。擂鼓墩墓群陵园式布局，也与战国时期其他国君墓地发展轨迹相同⑥。

此外，在擂鼓墩墓群也发现性质与义地岗墓地小型墓葬相同的战国中期楚墓，说明

① 湖北省博物馆等：《湖北随州擂鼓墩二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85年第1期。

②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北随州市擂鼓墩墓群的勘查与试掘》，《考古》2003年第9期。

③ 张昌平：《关于擂鼓墩墓群》，《江汉考古》2007年第1期。

④ 湖北省荆州博物馆：《荆州天星观二号楚墓》彩版10，文物出版社，2003年。

⑤ 张昌平：《关于擂鼓墩墓群》，《江汉考古》2007年第1期。

⑥ 赵化成：《从商周“集中公墓制”到秦汉“独立陵园制”的演化轨迹》，《文物》2006年第7期。

墓群的废弃时间与义地岗相同，同时也即说明曾国是灭亡于战国中期。

（六）涢水上游的鲢鱼嘴

涢水上游的随州涢阳鲢鱼嘴位置在安居西北约25公里，在直线距离上更接近其西北的滚水流域曾国青铜器区域。1975年农民在鲢鱼嘴发现青铜器，计有鼎2、簠2、盆1、戈3①。有铭青铜器分别有屈子赤角簠、曾子原彝簠（失盖）、息子行盆、曾仲之孙戈。青铜器出土背景不明，鲢鱼嘴一带地势狭隘，出土青铜器位置亦不似墓葬所具备的地理环境。这批青铜器中曾国铜器与楚国、息国铜器同出于一地，可能有某种特别的背景，考虑到当时曾国在鲢鱼嘴以东安居的活动已经消退，这一组青铜器的器主应当属于楚人。

（七）罗山高庙

罗山高庙所在的罗山高店砖瓦厂位于淮河支流泻河北岸，1989年农民在这里挖出青铜器②，并向罗山文物局上交曾季兴盘1、曾兴臣匜1。信阳市文物局随即对该地点进行调查和清理，确定出土青铜器地点为一座墓葬。清理和上交青铜器有鼎1、簠2、壶2，其他有戈2、矛1、銮铃3、车軎2（一件带辖）、衔5、镳10、圆形节约6，其中簠、盘、匜铭文标明为曾兴臣所作。因此，这座墓葬的墓主应当是曾兴臣。但罗山一带为黄国之地，过去数次出土有黄国、蔡国青铜器③，考虑到地理位置、当时的政治格局，曾兴臣当属于客死他乡的曾国贵族。

以上几个集中出土曾国青铜器区域的材料概略成附表1。依照上述分析，附表分别列出各铜器群的组合值。

四　零星出土和收集品

在漳河、滚水、涢水等几个区域之外的湖北襄阳，河南淅川、新野、桐柏、潢川，四川新都，江苏六合等更为广大的地区出土有曾国青铜器（图1.1－1）。这些多为零星出土，出土地域可能在曾国疆域范围之外，这些青铜器性质的确定是因其带有曾国铭文标识。另外，在收集的曾国青铜器中，虽然没有明确的出土地点，但其收集背景大体清晰，这些青铜器往往与湖北之曾相关。

1. 零星出土的曾国青铜器

零星出土的曾国青铜器的地点包括有湖北襄阳天平店、梁家老坟，河南桐柏、新野小西关、淅川和尚岭和徐家岭、潢川高稻场，安徽寿县李三孤堆，江苏六合程桥，四川

① 程欣人：《随县涢阳出土楚、曾、息青铜器》，《江汉考古》1980年第1期。

② 左超：《关于曾国问题的补遗》，《楚文化研究论集》（第五集），黄山书社，2003年。

③ 信阳地区文管会等：《罗山县高店公社又发现一批春秋时期青铜器》，《中原文物》1981年第4期。

新都马家乡。

湖北襄阳太平店位置在湖北谷城、襄阳交界处，东距位置靠西的滚水曾器出土地点近百公里。清光绪年间这里出土青铜器多件，今仅存有曾孟嬭谏盆①。铜器相关的出土背景不明。

襄阳梁家老坟墓地位于汉水之西，这里是一处楚国墓地。2003 年在配合基本建设工程中发掘了该墓地，其中 M11 出土曾侯昃戈②。M11 为战国中期楚墓，而曾侯昃戈的年代较早。战国时期楚墓常出土有越、吴等其他国家兵器，其中有不少为战利品，曾侯昃戈的情况可能也属于这种情况。

河南桐柏出土有曾子伯沓盘，未见于正式的报道，只是在《殷周金文集成》10156 著录有铭文和一些论著中提及。盘大约出土于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出土背景不明。

新野小西关位于新野县城关，1971 年小西关一座春秋早期偏晚墓葬中出土曾子仲谌甗，发掘者因之认为这是曾国墓葬③。但曾子仲谌甗的年代与墓葬同出其他铜器差距较大，曾子仲谌所作之鼎又见于枣阳熊集段营，这样，小西关墓主不可能为曾子仲谌。

河南淅川和尚岭和徐家岭是邻近淅川下寺楚墓的两处墓地，1990 年这里发掘 12 座楚墓④，其中三座墓葬出土曾器。和尚岭 M1 出土曾太师鼎，和尚岭 M2 出土曾仲𠈌君䏰器座，这两座墓葬年代都在战国早期，其中 M1 稍早。徐家岭 M9 出土有曾嫚嬞朱姬簠，墓葬的年代也在战国早期⑤，而三件曾国青铜器的年代均早于墓葬年代。

1996 年在河南潢川高稻场发现 40 座春秋中晚期墓葬。其中 M9 出土有鼎 2、敦 2、壶 2、镂孔豆 2、盘 1、匜 1、舟 1，其中盘铭文为“⊠夫人𦍒姬之盘”⑥。墓葬和盘的年代都在春秋晚期。潢川为黄国故地，但春秋晚期黄国已灭，故此墓地应当为楚国墓地。盘的器形为典型楚式，盘铭中“𦍒”字作为国名，在曾国青铜器中首见，是否即指湖北之曾，需要分析。“𦍒”字在金文中也是首见，春秋晚期楚系文字常常有增繁现象，此字也应当是“曾”的增繁⑦。春秋时期的曾国立国至这一时期的，只有湖北之曾。故这里将曾姬盘作为曾国青铜器录入。

20 世纪 30 年代，安徽寿县李三孤堆楚墓数次被盗，出土了大量重要文物。该墓为

---

① 曾昭岷、李谨：《曾国和曾国青铜器综考》，《江汉考古》1980 年第 1 期。

② 湖北省博物馆：《湖北出土文物精粹》图 59，文物出版社，2006 年。

③ 郑杰祥：《河南新野发现的曾国铜器》，《文物》1973 年第 5 期。

④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淅川和尚岭与徐家岭楚墓》，大象出版社，2004 年。

⑤ 墓葬发掘简报和报告对这三座墓葬的年代判定在春秋晚期，误。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见本章第三节以及高成林：《淅川和尚岭楚墓的年代问题》，《中原文物》1996 年第 4 期。

⑥ 《河南潢川春秋墓群发掘获初步成果》，《中国文物报》2000 年 1 月 16 日。

⑦ 战国文字中有大量文字繁化现象，其中有的是添加无义偏旁。高稻场盘“曾”字上部义旁，大约属于这类情形。参见何琳仪：《战国文字通论（订补）》第 215－220 页，江苏教育出版社，2003 年。

战国晚期某位楚王墓。墓葬中出土有曾姬无卹方壶一对[①]。根据方壶铭文可知，此时曾姬无卹为楚国先王夫人，方壶的制作无疑是在楚国完成的。不过此器因为曾姬仍然可视为曾国铜器。

1988 年江苏六合县程桥中学第三次发掘墓葬，编号为 M3 的墓葬出土有鼎 2、甗 1、簠 1、盘 1、匜 1、铞 1、勺 1、剑 1 等 9 件青铜器[②]。其中簠、盘、匜有铭，盘、匜分别为吴国攻吴太叔、罗儿之器。簠为曾国青铜器，为曾子义行所作。墓葬和簠的年代都在春秋晚期。

1980 年四川新都马家乡发现的蜀国墓葬中，出土一带盖鼎，盖内铸铭文“邵之飤鼎”[③]。邵鼎铭文与 75 均川刘家崖出土的邵方豆字体完全相同，两器当为同人所作。关于邵器国属有不同意见，不少学者认为“邵”为楚国旺族邵氏，邵器为楚器。其实春秋中期之后“邵之飤鼎”这类铭文中的人名，均指私名而非族名，这里的“邵”与楚族无关。根据邵方豆判断，邵鼎也应当是曾国青铜器。邵鼎出土的墓葬年代在战国中期，略晚于战国早中期的邵鼎。

2. 收集的曾国青铜器

新中国成立后收集的一些曾国青铜器，是各博物馆通过不同途径征集到的，它们大约多为“文化大革命”前后在农业生产中出土，出土地域大体的范围多与收集背景相关，即或收集于湖北地区，或有湖北地区出土背景，说明这些青铜器与湖北之曾相关。

曾伯从宠鼎：1965 年收集于武汉市[④]。

曾仲子敔鼎：1979 年襄樊市收集[⑤]，当为该地区所出。

曾子軎鼎[⑥]：上海市博物馆收集，鼎自 1964 年从湖北运抵上海冶炼厂的废铜中拣选[⑦]。

曾伯宫父鬲[⑧]：上海市博物馆 1956 年从上海冶炼厂的废铜中拣选，传为湖北出土[⑨]。

---

① 容庚：《善斋彝器图录》图 104、105，1936 年。容庚：《商周彝器通考》图版 744，哈佛燕京学社，1940 年。陈芳妹：《商周青铜酒器》图 69、70，台北故宫博物院，1989 年。

② 南京市博物馆、六合县文教局：《江苏六合程桥东周三号墓》，《东南文化》1991 年第 1 期。

③ 四川省博物馆、新都县文物管理所：《四川新都战国木椁墓》，《文物》1981 年第 6 期。

④ 蓝蔚：《武汉发现鄫伯鼎一件》，《文物》1965 年第 7 期。

⑤ 襄樊市文物管理处：《湖北襄樊拣选的商周青铜器》，《文物》1982 年第 9 期。

⑥ 马承源：《记上海博物馆新收集的青铜器》，《文物》1964 年第 7 期。

⑦ 马承源主编：《商周青铜器铭文选》第四卷第 446 页，文物出版社，1990 年。

⑧ 曾昭岷、李谨：《曾国和曾国青铜器综考》，《江汉考古》1980 年第 1 期。

⑨ 马承源主编：《商周青铜器铭文选》第四卷第 451 页，文物出版社，1990 年。

曾太保庆盆：近年为某私人所收藏①，可能为随枣走廊或信阳地区流出。

曾侯郳簠：收集背景与曾太保庆盆相同，也可能为随枣走廊或信阳地区出土。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文物的经济价值逐渐为社会所认识，在建设中发现的甚至是盗掘而出的文物多流入私人收藏中。近年来常传有一些曾国青铜器流入私人收藏，其部分亦可追踪出出土背景。但私人藏品或秘不示人，因此曾国青铜器尚可能有未见于报道的情况。

以上零星出土和收集的曾国青铜器情况概略如附表 2。

五 传世品

传世的曾国青铜器，是根据其铭文带有“曾”国的名称而确定它们属于曾国的性质的。这些青铜器最早见于宋代著录于《薛氏》16.165 的曾师季鞈盘，但大部分为晚清之后面世。部分传世品器物由近代流传下来，也有的已毁或不知所在，仅有铭文存世，曾师季鞈盘更是仅存摹本。传世曾国青铜器著录的基本情况，可概略为附表 3。

这些传世品是否都属于湖北之曾？另外，除了这些传世品之外，出土文献中是否还有其他相关“曾”的材料？这是我们本节要讨论的。

由于出土背景多数不明，附表 3 所列是否全部属于湖北之曾并不能够完全确定。我们在前言《曾国青铜器研究史》一节已经谈到，在历史文献的记载中，曾国不止一个。比如在山东地区有一个曾国，频繁与莒国、鲁国发生关系。1981 年在临朐泉头村墓葬出土有“上曾太子般殷”鼎，这说明历史上山东之曾的确存在②。因此李学勤指出：“近年由于姬姓曾国的器物不断出现，有的学者把著录中的曾国青铜器都断归湖北的曾，不免是一种倾向。”③ 这一看法无疑是审慎而周到的。但“上曾”为山东之鄫的情况也恰好说明，过去将一些传世曾国青铜器列入山东鄫国是错误的。我们认为，迄今所见有“曾”国标识的青铜器——亦即附表 3 所列，都属于湖北之曾。这一推断还可以作如下进一步申论。

1）越来越多的传世曾国青铜器器主出现在湖北之曾青铜器之中，说明他们原本就是属于湖北之曾。例如：

曾伯陭壶：同人所作之钺见于枣阳郭家庙墓地 M21，曾伯陭可能即为该墓墓主。该墓早期遭严重盗扰，曾伯陭壶流出或可能与盗扰相关。

---

① 韩自强、刘海洋：《近年所见有铭铜器简述》，《古文字研究》第 24 辑，中华书局，2002 年。

② 临朐县文化馆等：《山东临朐发现齐、鄩、曾诸国铜器》，《文物》1983 年第 12 期。孙敬明等：《山东临朐新出铜器铭文考释与有关问题》，《文物》1983 年第 12 期。

③ 李学勤：《试论山东新出青铜器的意义》，《文物》1983 年 12 期。又载于《新出青铜器研究》，文物出版社，1990 年。

曾子遗器组：包括曾子遗簠2件、曾子遗缶1件，曾子遗即为曾侯遗，后者器数见于曾侯乙墓。

曾子伯杳匜①：同人所作之盘出土于河南桐柏。

曾侯昃戈：同人所作之戈出土于襄阳梁家老坟M11战国中期楚墓。

2）一些传世品与湖北之曾青铜器有着各种关联，能够侧面证明他们也属于湖北之曾。湖北之曾的一些较独特的文化特征在这些传世品之中也有体现，例如传世品曾太保𩰫叔盆可能与另一件由湖北流出的曾太保庆盆为同人所作②，太保作器在周代诸侯国中仅见于湖北之曾，曾国的太保作器还见于随州万店周家岗庳季墓出土的曾太保簋一对。曾师季韩盘中“曾师”，即是与檀梨树岗出土的曾太师鼎中“曾太师”为同一官制系统。湖北之曾与邻近的黄国关系密切，曾国青铜器铭文多有反映两国婚嫁活动的内容，传世品曾侯作叔姬簠记载曾侯为嫁往黄国的叔姬作器，此曾侯当然为湖北之曾。曾子伯詣鼎③形制特征与苏家垅鼎相同，其铭文“铸行器，……永祜福”是春秋早期前后较为固定搭配的一组嘏辞，多见于黄、曾两国，在河南光山宝相寺黄君夫妇墓葬出土的一批铜器铭文中，多有类似铭文句式④。相似铭文辞例还见于曾子尿簠，簠斜壁饰垂鳞纹，颇为罕见，相似风格的纹饰也见于黄夫人方座形器（《全集》7－93）。

在历史文献记载的两个曾国中，山东之曾于鲁襄公六年（前567年）灭于莒国。因此，年代晚于这一时间的曾国青铜器就不属于山东鄫国。与此同时，湖北之曾也大约形成与楚文化青铜器相同的楚系铜器特征⑤。在传世品之中，曾子⊠簠饰细密的蟠虺纹，铭文“唯正月初吉丁亥，曾子⊠自作飤簠。子子孙孙永宝用之”第一、三句辞例仍然沿用两周之际格式，是这一时期一些楚系铜器的做法。相似的情形也见于曾□⊠簠。曾孙无谌鼎⑥形制、纹饰、铸造工艺俱为楚式风格，也与76义地岗放鼎特征相同。曾孙史夷簠⑦形制亦与同时期汉淮地区簠相同，“曾孙”之称除了见于曾孙无谌鼎之外，还见于曾孙定鼎，可见曾孙史夷簠同样属于湖北之曾。

3）传世曾国青铜器之中，学术界对曾伯霥簠的性质分歧最大。现代学者中屈万

---

① 一般著录曾子伯杳匜均作曾子伯父匜，但比勘曾子伯杳盘铭文，可知器主为曾子伯杳。参见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曾国青铜器》第390页，文物出版社，2007年。

② 韩自强、刘海洋：《近年所见有铭铜器简述》，《古文字研究》第24辑，中华书局，2002年。

③ 图像又见陈佩芬：《夏商周青铜器研究·东周卷（上）》第441器，世纪出版集团等，2004年。

④ 河南信阳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等：《春秋早期黄君孟夫妇墓发掘报告》，《考古》1984年第4期。

⑤ 刘彬徽：《楚系铜器略论》，《楚文化研究论集》第1集，荆楚书社，1987年。

⑥ 国立故宫、中央博物院联合管理处编：《故宫铜器图录下册下编》图93，中华丛书委员会，台北，1958年。

⑦ 陈佩芬：《夏商周青铜器研究·东周卷（上）》第557器，世纪出版集团等，2004年。

里①、李学勤②认为其属于山东之鄫，刘彬徽③、陈公柔④认为其属于湖北之曾，黄盛璋认为其为郑地之鄫或湖北之曾中之一者⑤。这里需要重点讨论。

曾伯霥簠的年代，大体在春秋早中期之间⑥。簠仅存盖，盖长方体，直口，曲尺形足，圈足明显小于口。纹饰以双首共身的蟠螭纹为主体。仅从簠的形制、纹饰特征难以判断簠的性质，因为春秋早期前后山东地区和汉淮一带文化面貌多有接近之处，例如簠的蟠螭纹结构与郭家庙 M02 鑐相似，而曲阜鲁故城 M48：28 簠⑦亦与曾伯霥簠接近，也就是说，曾伯霥簠的形制特征放在这两国地区都是合适的。但实际上，曾伯霥簠铭文有曾国铜器中少有的反映历史事件背景的内容，“曾伯霥哲圣元武，元武孔致，克逖淮夷，抑燮繁阳，金道锡行”等语，可折射出当时曾伯霥的地理背景。淮夷是春秋中期之前中原国家与之反复发生关系的族群，这种关系在金文和历史文献中多有记载。从地理位置上来说，有关淮夷记载西周早期多发生在山东地区⑧，而在西周晚期之后，周文化则是通过江汉地区而与淮夷交往，《诗·大雅·江汉》记载的即是这一史实⑨。西周晚期及其后的青铜器铭文材料，有关淮夷的事例都是与淮河中上游地区相关。如兮甲盘、禹鼎等多件青铜器记载有淮夷与周王室的交恶与和好的关系，其中位于今南阳一带的噩国是对淮夷关系的一个重要窗口⑩，噩侯驭方鼎、禹鼎反映了噩国和淮夷一起服、叛周的情景。噩国灭亡之后，江汉地区的曾国即湖北之曾成为对淮夷关系的屏障，是与这一时期的政治地理格局吻合的。《春秋》、《左传》在僖公年间记载有山东一带国家以及山东之鄫与淮夷发生过关系，但这一事件在金文中并未有反映。再从曾伯霥簠中涉及的“繁阳”、“金道锡行”看，一般认为此繁阳即晋姜鼎、戎生钟、繁阳之金剑、鄂君启节车节中的繁阳，地望在今淮河地区的河南新蔡⑪。此地近于黄国，正是曾国与淮夷发生关系的必经之地。

这样，附表 3 所列传世品之中，绝大部分均有证据纳入湖北之曾的范畴。而曾仲

---

① 屈万里：《曾伯霥簠考释》，《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三十三本，台北，1962 年。

② 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第九章《泗上诸侯》，文物出版社，1984 年。

③ 宾晖：《金文试释二则》，一则关于曾伯霥簠，《江汉考古》1985 年第 1 期。又收录于刘彬徽：《早期文明与楚文化研究》第 158－161 页，岳麓书社，2001 年。

④ 陈公柔：《“曾伯霥簠”铭中的“金道锡行”及相关问题》，《中国考古学论丛》，科学出版社，1993 年。

⑤ 黄盛璋：《淮夷新考》，《文物研究》第 5 辑，1989 年。

⑥ 具体讨论见本章第三节《年代与特征》。

⑦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曲阜鲁国故城》，齐鲁书社，1982 年。

⑧ 黄盛璋：《淮夷新考》，《文物研究》第 5 辑，1989 年。

⑨ 李学勤：《兮甲盘与驹父盨》，《新出青铜器研究》，文物出版社，1990 年。

⑩ 刘翔：《周夷王经营南淮夷及其与鄂国之关系》，《江汉考古》1983 年第 3 期。

⑪ 李学勤：《戎生编钟论释》，马承源：《戎生钟铭文的探讨》，保利艺术博物馆《保利藏金》，岭南美术出版社，1999 年。

盘、曾诸子鼎、曾子仲宣鼎等几件器虽未有作为湖北之曾的直接依据，但也未见有悖于湖北之曾的特征。因此，我们将这些曾国青铜器一并视为湖北之曾青铜器，并以其作为研究湖北之曾的直接材料。

六　其他与“曾”相关的青铜器

我们将绝大部分传世曾国青铜器视为湖北之曾，但是，并非所有带“曾”标识的青铜器都与湖北之曾相关，甚至并非所有带“曾”标识的青铜器即与曾国相关。这其中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曾”是否是作为一个国家，或该青铜器特征是否与曾国相关；二是作为国名的“曾”是否可能并不是真正的“曾”字。

在曾国青铜器前后的发展历程中，作为国名的“曾”字字形变化有序。早期字形如曾字本义作“甾”，西周中期以后在其下加“口”、“日”等部件。但除了高稻场出土的曾姬盘（图 2.1－1，1）之外，一直未有在字侧加其他偏旁的。在本节所述曾国金文材料之外，既有曾字早期形态铭文材料，还出现有曾字带有其他义旁的材料。它们是否属于湖北之曾，需要作具体分析。

曾昭岷等认为商时期已有曾国青铜器①，所引材料为《美帝》中著录的一斝②和《三代》著录的䵼鼎③。按《美帝》斝为一徽铭（图 2.1－1，4），且字形与商时期“曾”字差异颇大。䵼鼎（图 2.1－1，3）同人所作之器还有两件爵（《集成》8885、8886），传出土于洛阳，器物年代当在西周早期。这几件器中“䵼”字或可理解为“曾”字的异构，但“䵼”在鼎中应该是用作人名。因此，曾昭岷所引这两件材料与曾国并无关联。

《集成》2532 的乃𩰫子鼎（图 2.1－1，2），年代大约在西周早期，铭文为“乃𩰫子作厥文/考尊彝……”，铭文前两字可能为“[illegible]”一字，用作国名。但其时曾国之名写法与此相异，可知此器并不属于曾国。

1990 年河南洛宁县境内出土一件西周中期戈，带铭四字，原释“嬮之肘戈”④。此“嬮”当用作人名，与曾国无关。

近年私人收藏中出现鄫子[illegible]簠（图 2.1－1，6），簠有铸铭三行 18 字左行：“鄫子[illegible]自作飤簠/，其眉寿无期，子/子永保用之”⑤。“鄫”在这里作为国名，从“邑”从“曾”的字形在历史文献中多见，但出现在金文中却是首次。铭文字体构架疏散，字形

① 曾昭岷、李瑾：《曾国和曾国铜器综考》，《江汉考古》1980 年第 1 期。

② 陈梦家：《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R. 459，科学出版社。此器铭文又著录于《集成》91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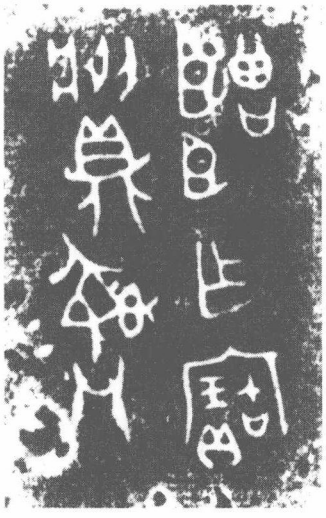
③ 罗振玉：《三代吉金文存》，此鼎铭文又著录于《集成》2060。

④ 杨平：《西周中胡二穿戈》，《中国文物报》1994 年 5 月 22 日第 3 版。

⑤ 韩自强：《阜阳亳州出土文物文字篇》图 203，阜阳市博物馆等，2004 年。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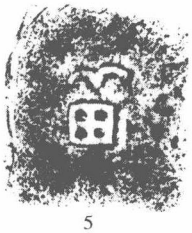
2



3

6

4



5

图 2.1－1　与曾相关青铜器铭文

1. 曾姬盘（《曾国青铜器》第 408 页）　2. 乃孺子鼎（《集成》2532）　3. 鼄鼎（《三代》、《集成》2060）　4. 斝（《美帝》、《集成》9145）　5. 㠯觚（《集成》6760）　6. 鄫子𢍰簠（私人收藏）

不甚规整，据此判断，簠的年代在春秋早中期之际。这里的鄫国，到底是哪一个曾，难以判断，因此我们暂不将其置于湖北之曾青铜器之列。

《集成》6760 有爷觚（图 2.1－1，5），“爷”为徽族文字，但它是否作为国名，是否与曾国相关，还需要结合相关材料来进行讨论。

第二节　分　期

通过上节分析，曾国青铜器各器物群组合比较完整的单位，即价值档次在第Ⅰ、Ⅱ类的共有 26 个。这 26 个器物群构成曾国青铜器分期的典型单位和基本平台。

从宏观的角度来看，26 个单位按照器物群组合和器物形制特征可以分为两大群。

第一大群器物以鼎、鬲、簋为基本组合，少见第二群的簠。器形上，鼎腹部较浅，无盖，但常见附耳鼎。盘带圈足，匜有扁足。纹饰以重环纹、窃曲纹、环带纹等几何形构图占绝大多数，纹样以宽带构图，布局宽松。具有这些特征的有如下 14 个器群：苏家垅、段营、72 曹门湾、83 曹门湾、郭家庙 M1、郭家庙 M17、郭家庙 M02、70 熊家老湾、72 熊家老湾、何家台、桃花坡 M1、桃花坡 M2、周家岗、义地岗 M83。

第二大群器物以鼎、簠（盏）为基本组合，鬲、簋少见。深腹鼎均带盖，出现浅腹平底的升鼎。盘带蹄形足或平底，匜均平底。纹饰多是以曲体龙为构图单元的蟠虺纹或蟠龙纹，纹饰线条纤细，布局稠密。以下 12 个器群具有这样的特征：75 刘家崖 A、80 刘家崖、汪家垮、76 义地岗、季氏梁墓葬、八角楼墓葬、东风油库 M1、东风油库 M2、东风油库 M3、曾侯乙墓（擂鼓墩 M1）、擂鼓墩 M2、罗山高庙。

以上两群青铜器特征差别明显，现今有关两周时期青铜器年代知识构架表明，这样两大群青铜器很明显分别代表了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两个阶段的历史背景、青铜器从组合到技术特征都迥然有异。它们之间的特征及变化，吻合于中原地区青铜文化发展上以春秋早中期之间为分界线的两个大的阶段①的变化，因此两个阶段之间的年代界限大体也应当在春秋早中期之间，其中第一阶段早于第二阶段。按照过去已有的研究成果，第一阶段的年代大体在两周之际及其前后，第二阶段的年代大体在春秋中期至战国时期。这两个阶段分别跨越了较长的历史时期，两个阶段所包括的器物群也各略有早晚之别，可以在两个阶段内分别再进行分期。它们的年代可以在分期后具体考定。

一　第一阶段青铜器的分期

属于第一阶段的苏家垅等 14 个器物群，代表了较长的历史时期，在年代上所具有

① 孙华：《中原青铜文化系统的几个问题》，许倬云、张忠培主编《中国考古学的跨世纪反思》下册第 305－334 页，商务印书馆，1999 年。

的早晚之别相对也跨有较长的时间段。例如，周家岗、郭家庙 M8、M02 等铜器群出现平底鼎或簠，纹饰常见蟠螭纹，特征与光山黄君孟夫妇墓等青铜器极为接近。黄君孟夫妇墓的年代明确①，属于春秋早期偏晚阶段，最晚或可接近春秋中期。这也基本就是这一阶段曾国青铜器年代的下限。而一些器群如 72 熊家老湾、义地岗 M83、桃花坡 M1、M2 各有一些器形或纹饰具有西周中期阶段特征或其遗型，且这些器群恰好不见蟠螭纹等风格，这些较早的曾国青铜器大体与周原地区西周晚期青铜器特征相同，年代的上限应当与之接近。这样，公元前 9 世纪之末至公元前 7 世纪中叶的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接近二百年的时间，大体就是第一阶段曾国青铜器各群材料所代表的历史时期。这也是各家关于曾国青铜器年代讨论上的一点基本认识②。这样，鉴于第一阶段曾国青铜器所跨越的时间段长度、鉴于其早晚青铜器特征已经表现出历时性的变化，对这一阶段曾国青铜器进行分期应当是可行的。

但是，对第一阶段曾国青铜器的分期，形成了如本章前言所述的各家不同的意见，又说明分期工作存在着问题。形成这一问题的原因可能主要有如下不同的外在和内在的因素：第一，中原地区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青铜器无论是在时间上还是在地域上都表现出较强的一致性，这一时期青铜器的变化速率较为缓慢③，造成铜器分期的困难。第一阶段曾国青铜器有些器物群也具有这一时代特征，因此对曾国青铜器分期观点出现分歧，并不足为奇。第二，由于我们对分期研究本身在方法上存在局限，各个期段的划分往往难以表现出青铜器发展的逻辑系列，各个期段的青铜器一般性特征也没有能够得到充分表达。这样的工作即便形成结论性意见，也难以在新的材料中得到运用，也难以令学术界遵从。

因此，曾国青铜器分期中存在的问题与方法缺陷，实际上也是两周之际前后周文化青铜器分期中存在的问题与方法缺陷的反映。但在目前的条件下，难以有超然于时代的分期手段和方法，仍然只有运用类型学方法，细致而谨慎地分析各群器物组合和各类器别的型式变化，排列出各器群相对早晚关系，据此划分期。

如前所述，第一大阶段 14 组铜器群材料中，72 熊家老湾、义地岗 M83、桃花坡 M1、M2 时代应当较早；而周家岗、郭家庙 M02 等铜器群相对略晚。这样几组相对早晚关系，同时参考同时期中原地区青铜器器物演变的一般规律，是我们进行型、式划分

---

① 李学勤：《光山黄国墓的几个问题》，《考古与文物》1985 年第 2 期。

② 周永珍：《曾国与曾国铜器》，《考古》1980 年第 5 期。杨宝成：《试论曾国铜器的分期》，《中原文物》1991 年第 4 期。Lothar von Falkenhausen, The Waning of the Bronze Age, p523.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 Edward L. Shaughnessy and Michael Loewe, editor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③ 高明：《中原地区东周时代青铜礼器研究》（上），《考古与文物》1981 年第 2 期。

的基础。以下我们尝试从器形、纹饰两个方面分别进行排队，力求列出第一阶段青铜容器的演变规律。

（一）器类的型式

由于第一阶段曾国青铜器组合、器形的时代变化不甚明显，因此我们对反映早晚变化的式别的划分，只是在有把握的情况下才作出，这样才能保障其后分期结论的可靠性。以下先将第一大阶段各器类的一般变化规律加以分析，确定其较明显的演变轨迹后，再依次对各类器进行类型排比：

鼎

一般认为，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鼎大体有由深腹到浅腹的变化趋势。另外，周原地区西周晚期鼎，上腹多饰一周重环纹，三足细长而相对较直。而春秋早期鼎多有较粗的蹄形足。这些是排列鼎的式别的基本依据。同时，此阶段鼎明显可分为立耳鼎和附耳鼎两大类。在中原地区，立耳鼎多见于西周时期，而附耳鼎年代多在春秋时期，因此这里分别将立耳鼎、附耳鼎列为 A、B 型。不类 A、B 型鼎者归入其他 C 型鼎。

A 型　立耳，深腹圜底，其下接较高的兽蹄形足。可分三式：

AⅠ：腹部近半圆形，足细长而略直，蹄足不甚发达。有 72 熊家老湾重环纹鼎和桃花坡 M2 重环纹鼎（附图 1，1）。此类鼎常在上腹部饰一周重环纹。

AⅡ：腹深，腹部最大径大于口径，故腹部有大于半球形之感，底较平，足曲而较粗。如桃花坡 M1 鼎、72 曹门湾鼎（图 2.2－1，1）。此类鼎常在最大腹径处突起一周弦纹，弦纹上、下各饰一周纹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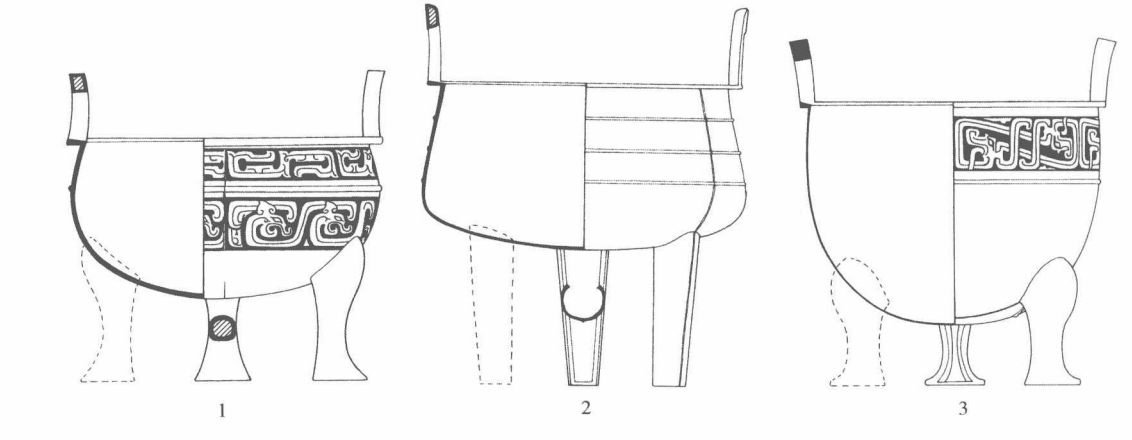


图 2.2－1　第一阶段部分鼎型式

1. AⅡ（72 曹门湾鼎）　2. C 型（桃花坡 M2 弦纹鼎）　3. C 型（黄土坡 M1 龙纹鼎）

AⅢ：腹部变浅而足粗。器形接近 B 型的附耳鼎。如何家台鼎及 83 曹门湾鼎（附

图1，8）。此类鼎纹饰亦如附耳鼎只饰一周窃曲纹。

B型　附耳，浅腹宽体，其下接较高的兽蹄形足。可分二式：

BⅠ：为附耳鼎的主要形式，敞口，宽体。如苏家垅鼎、郭家庙M17鼎（附图1，9）。

BⅡ：1件，郭家庙M02鼎（附图1，16），体变宽，底近乎平。

C型：其他器形的鼎。如桃花坡M2弦纹鼎（图2.2－1，2）、黄土坡M1龙纹鼎（图2.2－1，3）均为立耳，但前者垂腹直足，后者深腹矮足，均与A型鼎有较大差别。周家岗鼎附耳，但束腰的特征也明显与B型鼎不同。

鬲

此阶段鬲绝大多数为折肩重环纹鬲，形制接近，可划为A型，其他形制鬲归入B型。鬲带扉棱，系西周中晚期形成的风格，据此可确定鬲之较早者。

A型　器形与纹饰变化均不大。可分三式：

AⅠ：在腰部饰一新月形扉棱。如苏家垅黄季鬲（图2.2－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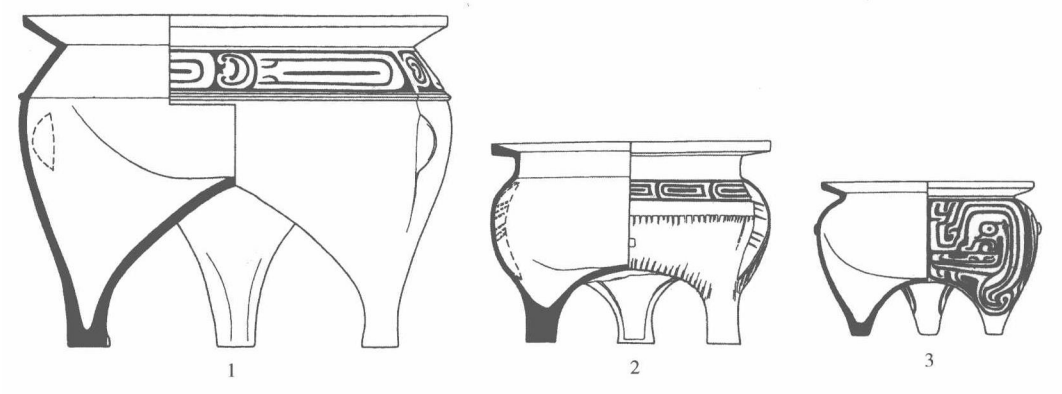


图2.2－2　第一阶段部分鬲型式

1. AⅠ（苏家垅黄季鬲）　2. B型（义地岗M83鬲）　3. B型（桃花坡M1鬲）

AⅡ：无扉棱，腹部圆弧。如苏家垅其他无铭鬲及郭家庙M17鬲（附图1，11）。

AⅢ：腹壁较直，折肩明显。见于周家岗墓葬（附图1，17）。

B型　其他鬲。如义地岗M83仿陶直棱纹鬲（图2.2－2，2）和桃花坡M1龙纹鬲（图2.2－2，3）。

簋

第一阶段青铜器中簋的时代变化特征不甚明显。第一阶段曾国青铜器各种形制的簋，几乎都可在周原出土铜簋中找到相同的形制，这说明曾国青铜簋的器形变化不甚敏感。另一方面，如材料分析一节所言，较晚阶段的周家岗所出簋应当早于其器群，故亦不能作为簋的型式分析的标本。基于这些情况，簋不作型式的划分。

罐

只见4件，但形制、纹饰所反映的年代关系清晰。70熊家老湾和郭家庙M02罐可列为A型，郭家庙M02罐形制与春秋中晚期罐已有接近之处，其年代较晚。因此A型70熊家老湾罐（图2.2－3，1）和郭家庙M02罐（图2.2－3，2）变化轨迹是由喇叭形颈变为直颈，肩部升高，分别为AⅠ、AⅡ。72熊家老湾罐尚处于过渡形态，可列为B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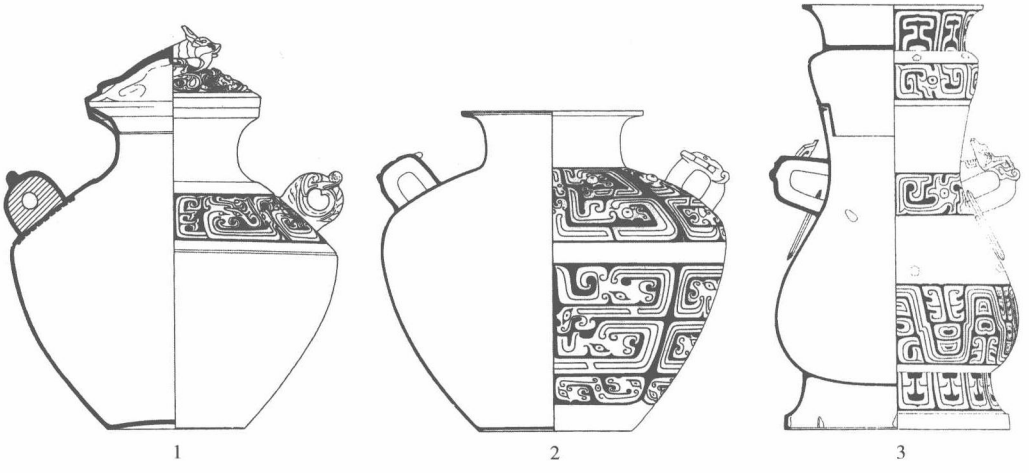


图2.2－3　第一阶段部分罐、壶型式

1. AⅠ罐（70熊家老湾罐）　2. AⅡ罐（郭家庙M02罐）　3. Ⅱ壶（83曹门湾壶）

圆壶

均为双耳带盖长颈垂腹壶，这种圆壶滥觞于西周中期，流行于整个春秋时期。较早者如几父壶（《全集》5－138）壶腹垂扁，至春秋时期腹部浑圆。这种壶盖也有明显变化，西周中晚期壶盖的捉手宽大，梁其壶（《全集》5－148）盖开始出现瓣状捉手，至春秋早中期瓣状捉手流行。因此，可以总结出此类壶的特征变化：壶腹部由低垂而及浑圆，捉手由圆盘形到瓣状。据此圆壶可分如下四式：

Ⅰ：圆形捉手，长腹低垂。见于桃花坡M1（附图1，5）。

Ⅱ：圆形捉手，长颈，腹部略圆。见于何家台和83曹门湾（图2.2－3，3）。段营壶腹部垂扁，但开始有瓣状捉手，也可归入这一式。

Ⅲ：莲瓣状捉手，长颈圆腹。如郭家庙M17圆壶（附图1，13）。

Ⅳ：器盖蜕化为顶腹相通的莲瓣状冠，长颈圆腹。如周家岗圆壶（附图1，18）。

盘

除桃花坡M1带流盘可另列为B型外，其他盘归为A型，可分三式。其早晚变化的趋势是盘腹部由深及浅。

AⅠ：深腹，圈足较高足径较小，圈足下无小足。如72熊家老湾（附图1，6）和义地岗M83盘。

AⅡ：圈足变宽，盘体为长方形，双耳折成90°，耳横截面为方形，盘圈足下设3个小足。有苏家垅（附图1，14）和何家台盘。

AⅢ：周家岗盘1件，器形变化不大，圈足下小足已残。窃曲纹形态较晚（附图1，19）。

匜

除桃花坡M1匜另列为B型外，其他匜为A型，分三式。比照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匜，其变化是流口上翘，多数匜的流变长。

AⅠ：器体及流均较短粗，饰重环纹与瓦纹组合。有72熊家老湾（附图1，7）及义地岗M83匜。

AⅡ：流变长而上翘，见于苏家垅（附图1，15）和何家台。主题纹饰为窃曲纹与瓦纹组合。

AⅢ：长流，口下一周纹饰为龙纹。见于周家岗（附图1，20）。郭家庙M1匜残剩口沿，但仍然可见此式特征，故可归入。

第一阶段14个器物群按照其型式变化，可大体排序归结为下表2.2－1。

表2.2－1　　第一阶段青铜器器形型式登记表

序号	器类 / 器群	鼎			鬲		簋	罐		圆壶	盘		匜		其他
		A	B	C	A	B		A	B		A	B	A	B	
1	70熊家老湾						√	Ⅰ							方卣
2	义地岗M83					√					Ⅰ		Ⅰ		
3	桃花坡M2	Ⅰ		√	Ⅱ		√								
4	72熊家老湾	Ⅰ、Ⅱ		√			√		√		Ⅰ		Ⅰ		方甗
5	桃花坡M1	Ⅱ				√	√			Ⅰ		√		√	
6	72曹门湾	Ⅱ					√								
7	83曹门湾	Ⅲ					√			Ⅱ					
8	何家台	Ⅲ			Ⅰ、Ⅱ		√			Ⅱ	Ⅱ		Ⅱ		方甗
9	苏家垅		Ⅰ		Ⅰ、Ⅱ		√				Ⅱ		Ⅱ		方甗、豆、方壶、盉
10	段营		Ⅰ				√			Ⅱ					
11	郭家庙M17		Ⅰ		Ⅱ					Ⅲ					杯
12	郭家庙M1		Ⅰ								√		Ⅲ		簠、方壶
13	郭家庙M02		Ⅱ					Ⅱ							
14	周家岗			√	Ⅲ		√			Ⅳ	Ⅲ		Ⅲ		

说明："√"在器类栏中表示该类型器的存在。

14 个器物群中，考虑到其他各类器物的器形变化和组合关系，可将 14 群青铜器分为如下三组：

第一组：包括第 1－6 铜器群。本组见 AⅠ鼎、AⅡ鼎、Ⅱ鬲、AⅠ鑐、Ⅰ圆壶、AⅠ盘、B 盘、AⅠ匜、B 匜以及簋、方甗、方卣。

第二组：包括第 7－11 铜器群。本组见 AⅢ鼎、BⅠ鼎、AⅠ鬲、AⅡ鬲、Ⅱ圆壶、Ⅲ圆壶、AⅡ盘、AⅡ匜以及方甗、簋、方壶、豆、杯、盉等。B 型附耳鼎的出现是一个重要标志，也是一个判断本组器群晚于上组的重要标准①。第 7、8 群出 A 鼎，并不见 B 鼎，没有归入第一组而划归本组是因为 AⅢ鼎较其他 A 鼎为晚，同时这两群的圆壶出现晚的特征。此外，第7、第8 群关系近密，而第8 群与第9 群也有多项因素相同。这样将第7、8 群归入与第9 群相同的组别是合适的。第 11 群的郭家庙 M17 出现较晚的Ⅲ壶，没有将其归入下一组是因为其 BⅠ鼎、AⅡ鬲分别见于本组的第 8、9 群，其壶也有别于第 14 群的周家岗壶，此外，此墓也没有第三组墓葬那样出现明确的较晚特征。

第三组：包括第 12－14 铜器群。本组见 BⅠ鼎、BⅡ鼎、Ⅲ鬲、Ⅳ壶、AⅢ盘、AⅢ匜以及簋、簠、方壶等。第 12 群的郭家庙 M1 见第二组的 BⅠ鼎，但其有Ⅲ匜并且出现有簠，这是两个明确较晚的因素。本组簋少见且第 14 群的簋并非典型标本，不能代表本组簋的器形。

以上三组应当代表了第一阶段曾国青铜器由早及晚的三个时期。但是，一些器物群归入该组的依据似乎不够充分。例如第 1 群 70 熊家老湾仅据鑐而归入第一组，第 6 群的 72 曹门湾也是仅据鼎而归入第一组。因此，这些器物群的位置排序的确定还需要参考它们的纹饰排序情况。

（二）纹饰的型式

鉴于器形排队分组的依据比较薄弱，这里尝试再将这 14 个器物群从纹饰的角度作一次排队工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观察这些器群是否具有相同的早晚关系。

属于第一阶段亦即两周之际前后的青铜纹饰，是西周中期以来流行的几何形构图纹样的发展形式，纹样的种类和构图多数比较规范，其基本种类有环带纹、瓦纹、重环纹、窃曲纹、垂鳞纹，此外还有西周晚期开始出现的非几何形结构的纹样——龙纹。这些几何形纹样由于构图较为简单，因此时代演变的频率较为缓慢。例如重环纹均作两重，由一个大重环和一个小的重环构成；垂鳞纹、环带纹在曾国青铜器中也基本没有大的变化，瓦纹更为简单。因此曾国第一阶段各件青铜器的绝大多数纹饰，在周原地区几乎都有发现。

---

① 周原青铜器中西周晚期的附耳鼎不多，且往往是足带扉棱宽体形制。但在诸侯国青铜器中，晋侯墓地已经出土有若干附耳圜底鼎。这样看来，附耳鼎大约是西周晚期才出现而春秋早期才得以流行的式样。

虽然这一阶段青铜器纹饰可供排队的条件并不理想，但这并非意味着这些纹饰在第一阶段不存在演变关系。青铜器纹饰的变化，除了体现在纹样构图自身之外，还可能存在于器类或器形对纹样的选择、不同纹饰之间的组合关系之中。这样一些可能的变化在不同地区可能并不相同。因此对于曾国青铜器而言，我们需要重新分析、探讨这些可能。这也是何以我们将纹饰独立进行型式分析的原因。

和器类的型式划分一样，我们作式别的划分，只是在有把握的情况下才作出，以保障各器群排序的可靠性。因此，依然应当将各器类纹饰的变化规律加以分析，在确定其较明显的演变轨迹后，再依次对其进行类型排比。

以下分别对重环纹、环带纹、窃曲纹、垂鳞纹、瓦纹、龙纹进行分析。

重环纹

构图简单，第一阶段曾国青铜器的重环纹绝大多数模式化地作大、小重环相间排列，均为两周重环。其变化是有重环弧形的一端朝向不同，但这种方向往往在同一件簋上并存，不具备年代变化特征。

环带纹

与重环纹不同的是，环带纹构形较复杂，且总是作为器物的主要纹样装饰在幅面较大的画面上。但曾国青铜器装饰环带纹较少，且其变化亦不大。

窃曲纹

窃曲纹是第一阶段曾国青铜器样式最多、使用频率最高的纹样。但多数窃曲纹难以总结其变化规律，只能依据周家岗器群窃曲纹较晚的特征来推断其演变轨迹。窃曲纹可分为五型。

A 型　由正反相反的两个“C”形单元构成。此型窃曲纹颇为常见，但多数结构相同，难以辨别其演变关系，唯有周家岗此类纹饰较晚。此型可分二式：

AⅠ：“C”形单元较平，无目。此式最为常见，如苏家垅鼎（图 2.2－4，1）。

AⅡ：“C”形单元中有圆凸的目。见于周家岗鼎（图 2.2－4，2）。

B 型　由并列的“∽”形单元组成，“∽”单元之间或有目。数量不多，其例如 72 熊家老湾方甗（图 2.2－4，3）。

C 型　由单“∽”形单元组成，“∽”中部有目。数量较多，如苏家垅匜等（图 2.2－4，5）。

D 型　由两个并列的“C”形单元组成，较晚的如周家岗盘在“C”之间带目。由此可排出三个不同的式别：

DⅠ：两个“C”连接紧密，其间无目。如 72 曹门湾鼎（图 2.2－4，6）。

DⅡ：两个“C”连接紧密，其间出现目。如郭家庙 M17 鼎（图 2.2－4，7）。

DⅢ：两个“C”分离，其间夹有目。如周家岗盘（图 2.2－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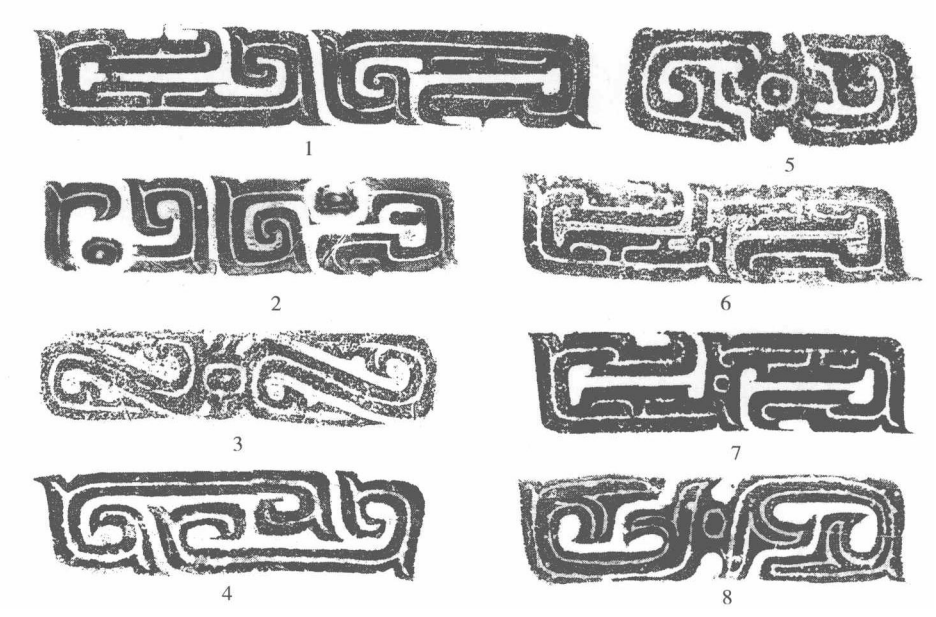


图 2.2－4　窃曲纹型式

1. AⅠ（苏家垅鼎）　2. AⅡ（周家岗鼎）　3. B 型（72 熊家老湾方甗）　4. E 型（苏家垅盘）　5. C 型（苏家垅匜）　6. DⅠ（72 曹门湾鼎）　7. DⅡ（郭家庙 M17 鼎）　8. DⅢ（周家岗盘）

E 型　由上下两个“C”斜叠而成。数量较多，如苏家垅盘等（图 2.2－4，4）。

垂鳞纹

除了少数铜器如郭家庙 M25 圆壶之外，垂鳞纹绝大部分装饰在器物的圈足部分，其构形变化较小。

瓦纹

较固定地装饰于簋、匜上，偶见于圆壶上。难以分别其构形变化。

龙纹

颇为多见，其早晚演变轨迹较为清晰：

Ⅰ：团身的龙，往往为两两一组。如 72 曹门湾鼎（图 2.2－5，1）。

Ⅱ：团身的龙，出有双首。如郭家庙 M17 圆壶（图 2.2－5，2）。

Ⅲ：双首反向的龙。如郭家庙 M02 鑐（图 2.2－5，3）。

Ⅳ：双首反向的龙相互缠绕，如周家岗圆壶。更细密的龙纹缠绕构成蟠螭纹，见如郭家庙 M8 匜（图 2.2－5，4）和几件传世品。

从纹饰的型式分析可知，除了少数纹样略有早晚变化规律之外，其他多数纹饰难以观察其早晚发展轨迹。但是，和器物的组合可能是反映时代变化的重要因素一样，纹饰的组合情况也可能反映器物和器群的年代变化。因此，我们既将可划分型式的窃曲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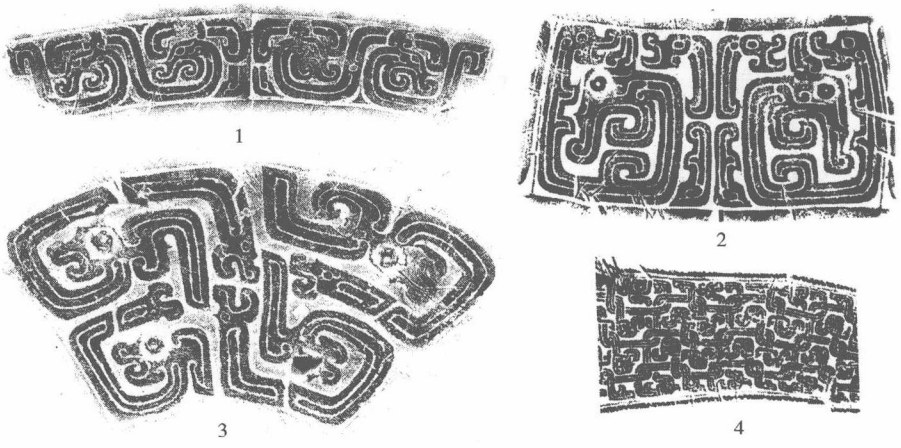


图 2.2－5 龙纹型式

1. Ⅰ（72 曹门湾鼎） 2. Ⅱ（郭家庙 M17 圆壶） 3. Ⅲ（郭家庙 M02 鑐）
4. Ⅳ（郭家庙 M8 匜）

龙纹进行排队，也将无型式变化的重环纹、环带纹列入登记。考虑到垂鳞纹往往规律性地出现在器物的圈足上，瓦纹规律性地出现在簋、匜的下腹，这两种纹饰就无须进行纹饰分析。此外，器物鋬、耳、足等附件纹饰也无须进行登记。

这里选择鼎、甗、簋、鑐、圆壶、盘、匜等在第一至三组均已出现的器类，将其出现的纹饰综合登记如表 2.2－2。表中未列入鬲的纹饰，是因为 A 型鬲纹饰基本全部作重环纹装饰而难以捕捉其变化。

表 2.2－2 第一阶段青铜器纹饰型式登记表

序号	器类 / 器群	鼎			甗				簋		鑐	圆壶				盘		匜		
		重环纹	窃曲纹	龙纹	重环纹	环带纹	窃曲纹	龙纹	重环纹	窃曲纹	龙纹	重环纹	环带纹	窃曲纹	龙纹	重环纹	窃曲纹	重环纹	窃曲纹	龙纹
1	70 熊家老湾								√		Ⅰ									
2	义地岗 M83															√	B	√		
3	桃花坡 M2	√																		
4	72 熊家老湾	√	A Ⅰ	Ⅰ	√	√	B		√									√		
5	桃花坡 M1	√							√			√	√	B、C			A Ⅰ	√		
6	72 曹门湾		D Ⅰ	Ⅰ																

续表 2.2－2

序号	器类 / 器群	鼎			甗				簋			圆壶				盘		匜		
		重环纹	窃曲纹	龙纹	重环纹	环带纹	窃曲纹	龙纹	重环纹	窃曲纹	龙纹	重环纹	环带纹	窃曲纹	龙纹	重环纹	窃曲纹	重环纹	窃曲纹	龙纹
7	83 曹门湾		AⅠ						√	AⅠ			√	C						
8	何家台		AⅠ				E	Ⅰ		AⅠ、E					Ⅰ		B、E		C	
9	苏家垅		AⅠ				AⅠ、E	Ⅰ		AⅠ							E		C	
10	段营	√	AⅠ						√				√	C						
11	郭家庙 M17		DⅡ											AⅠ	Ⅱ					
12	郭家庙 M1		AⅠ																	Ⅳ
13	郭家庙 M02		DⅢ								Ⅲ									
14	周家岗		AⅡ							E					Ⅳ		DⅢ			Ⅳ

表 2.2－2 说明此前以器形和器物组合为平台的器类排序与以纹饰为基准的排序结果是大体吻合的。表中所示的一个突出现象是重环纹较集中地出现在较早器群中，70 熊家老湾、72 曹门湾等再次反映出较早的排序位置。同时，但凡较多出现在较早阶段的纹饰类型，如 AⅠ窃曲纹、B 型窃曲纹、C 型窃曲纹、环带纹均少见于第二组器群，均罕见于第三组器群之中。在较晚的第三组，双首的龙纹成为纹饰的主要构成。在型式分析中不甚明确的几个器物群中，70 熊家老湾的重环纹、Ⅰ式龙纹均为较早特征。72 曹门湾则有较早的 DⅠ窃曲纹和Ⅰ式龙纹。它们都可列入第一组。因此，纹饰的类型学分析基本支持此前的器形与组合的分析。

综前所述，通过对第一阶段 14 个器物群的器形、纹饰排队，并考虑到各器群的组合变化情况，可认为它们所形成的三个组别就是早晚相次的三个发展时期，它们分别代表了第一阶段曾国青铜器的三个期别。各期器群及器物的型式组合，已如器类的型式分析中所述。三期器物发展的示意，可参考附图 1 第一阶段曾国青铜器分期图。

（三）其他青铜器的期别

按照三期器物的型式和纹饰特征，可以将其他未能分组的出土曾国青铜器、采集以及传世的曾国青铜器作出相应的类比，以归入相应的期别。必须说明的是，对单个器物作较细致的年代定位，其准确程度远不及器群，因此，以下归位只是在相对年代上的大体界定。

檀梨树岗鼎饰一周重环纹和龙纹，腹部较深，其器形与纹饰似于 72 熊家老湾 AⅠ鼎。

檀梨树岗鬲弧腹带扉棱，与 AⅠ鬲相同，这种鬲见于苏家垅和何家台两个器群，在

苏家垅器群中明显早于其他不带扉棱的AⅡ鬲。鬲带扉棱渊源于西周中期周原地区鬲，在曾国青铜器中的例子如义地岗M83鬲。这样看来檀梨树岗鬲可归入第一期。

采集的曾伯从宠鼎深腹立耳，腹部饰一周重环纹和环带纹，特征接近桃花坡M1鼎。

曾仲子敔鼎深腹立耳，腹部饰一周AⅠ窃曲纹和Ⅰ式龙纹，形制与72熊家老湾AⅡ鼎完全相同。

传世的曾伯宫父鬲弧腹带扉棱，装饰有较早的兽纹。

以上青铜器可归入第一期。

郭家庙M01鼎浅腹，接近AⅢ鼎，纹饰结构类似AⅠ鼎，该墓出土盘腹较浅，不早于Ⅱ式盘。

黄土坡M1鼎形制独特，深腹的特征接近第二阶段曾国青铜器鼎，但其所饰龙纹为反向双首，与郭家庙M17圆壶Ⅱ式以及郭家庙M02鑐Ⅲ式龙纹接近。

旭光砖瓦厂出土的一对簋饰AⅠ窃曲纹，带翼的龙首耳、圈足下三个小扁足等特征与何家台簋相同。

传世品曾伯陭圆壶与郭家庙M21钺为同人所作。壶以环带纹为主体纹饰，壶盖带莲瓣形饰，接近段营壶和郭家庙M17壶，因此曾伯陭壶和郭家庙M21都与段营、郭家庙M17年代相同。

采集于湖北的曾子倗鼎形制与苏家垅鼎完全相同。

曾子伯詰鼎附耳宽腹，形制、纹饰特征与郭家庙M17鼎几乎完全相同。

曾诸子鼎附耳，腹部纹饰两周，分别为E型窃曲纹和垂鳞纹。两周纹饰在第一阶段曾国圜底附耳鼎中少见。此鼎纹饰、腹部形制与曾国立耳鼎相同，但附耳特征说明其年代可能晚于立耳鼎。

曾太保釐叔盆饰DⅡ、E型窃曲纹，前者与郭家庙鼎相同，后者见于何家台簋。采集的曾太保庆盆饰B型窃曲纹，年代大约与曾太保釐叔盆相同。

以上单位和铜器，可归入第二期。

郭家庙M6鼎纹饰与BⅠ鼎的AⅠ窃曲纹相同，但鼎浅腹，底近于平，因此此鼎更接近郭家庙M02的BⅡ鼎。

郭家庙M8匜饰较细密的蟠螭纹，纹饰接近Ⅳ式龙纹。

传世品曾子尿簠、曾伯霥簠、曾孙史夷簠直口，圈足较小。曾伯霥簠、曾孙史夷簠所饰蟠螭纹与郭家庙M8匜相同。

曾孟嬭谏盆纹饰特征与郭家庙M8匜完全相同。

以上单位与青铜器，可归入第三期。

郭家庙M25圆壶形制较为特别，器形与其他圆壶略有区别，所饰纹饰中倒垂鳞纹

罕见，属于C型的窃曲纹时代风格不明显。M25同出随葬品中也没有可以确定其分期的遗物，因此其所属期别难以遽定。

这样，第一阶段曾国青铜器各单位和青铜器期别可作如下划分：

第一期：70熊家老湾、72熊家老湾、义地岗M83、桃花坡M1、桃花坡M2、72曹门湾；檀梨树岗鼎与鬲、曾伯从宠鼎、曾仲子敔鼎、曾伯宫父鬲。

第二期：83曹门湾、何家台、苏家垅、段营、郭家庙M17、郭家庙M21、郭家庙M01、黄土坡M1、旭光砖瓦厂；曾伯陭圆壶、曾子軎鼎、曾子伯誥鼎、曾诸子鼎、曾子仲谏甗、曾太保釐叔盆、曾太保庆盆。

第三期：郭家庙M1、郭家庙M02、周家岗、郭家庙M6、郭家庙M8；曾子尿簠、曾伯霥簠、曾孙史夷簠、曾孟嬭谏盆。

关于82曹门湾的曾侯絳伯戈的年代，将在铜戈的发展系列一节中分析。

二　第二阶段青铜器的分期

属于第二阶段的曾国青铜器，较第一阶段曾国青铜器有明确得多的年代关系，分期条件较好。例如第二阶段曾国青铜器包括有纪年材料的曾侯乙墓，墓葬的绝对年代基本可定。这一阶段的擂鼓墩M2的年代，学术界已经形成一致的看法。而早于曾侯乙墓的春秋时期，也有较多可供参考的断代材料。例如春秋时期铜器墓葬如赵家湖楚墓①、春秋中晚期铜器墓葬的下寺楚墓②等等。这样，春秋中晚期各时期曾国青铜器的年代实际上通过比照楚墓出土青铜器即可得出结论性意见。

但是，对于第二阶段曾国青铜器的分期工作，仍然应该进行。这是因为楚国青铜器的年代系列，并不能完全等同于曾国青铜器的年代系列。同时，通过对曾国青铜器的分期排队，总结出曾国青铜器的发展轨迹，再由此比较与楚国青铜器异同的程度。同时由此可观察，在楚系青铜文化的形成过程中，曾国所起到的作用和地位。

（一）型式划分与分期

第二阶段的曾国青铜器材料在等级和时间段上都不均衡，并非所有的器形在不同的各个器群中都有反映。特别是曾侯乙墓、擂鼓墩M2多套组合的器类，自然难以在其他的器群中找到可对应的材料。因此，在多数的器群中都有发现、并由此可以观察到在这一阶段不同时期的发展轨迹的器类，只有升鼎、盖鼎、甗、簠、盘、匜等几种。以下我们仅就这几种器形作型式的分析。

---

① 湖北宜昌地区博物馆等：《当阳赵家湖楚墓》，文物出版社，1992年。

②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淅川下寺春秋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

升鼎

升鼎见于级别较高墓葬之中，如曾侯乙墓、擂鼓墩 M2。在此之前，80 刘家崖盅鼎自铭为“登鼎”，即为升鼎①。可见升鼎亦经历了较长的发展。共分四式：

Ⅰ：浅腹，束腰，底近平，附耳。饰较抽象的环带纹和垂鳞纹。见于 80 刘家崖（附图 2，1）。

Ⅱ：腹变浅，束腰，平底，耳侧贴于口部。饰蟠虺纹和垂鳞纹。见于 75 刘家崖 A（附图 2，4）。

Ⅲ：腹变浅，束腰，平底，耳外曲。饰镶嵌龙纹。见于曾侯乙墓（附图 2，12）。

Ⅳ：浅腹，束腰，平底，耳外撇。饰蟠虺纹。见于擂鼓墩 M2（附图 2，18）。

升鼎的演变趋势是：腹部变浅，耳趋于外撇。

盖鼎

此阶段深腹鼎均作子口带盖，或有失盖的鼎由其子口亦可判明其带盖的情况，如 75 刘家崖连迁盖鼎。季氏梁墓葬出土的平盖鼎，与其他弧形盖面的鼎发展系列可能不同，不归入盖鼎的排序之中。这样，盖鼎可排列出以下六式：

Ⅰ：深腹，盖面隆起，上立盘状捉手，兽蹄形足较短。饰几何形蟠虺纹。见于八角楼墓葬（附图 2，2）。

Ⅱ：盖带喇叭形捉手，腹部趋深，兽蹄形足上端出现半浮雕兽面纹。饰蟠螭纹。见于 75 刘家崖 A（附图 2，5）。

Ⅲ：喇叭形捉手盖，腹部趋深，腹底较尖，兽蹄形较长，足上端饰半浮雕兽面纹。饰较细的蟠螭纹。见于 76 义地岗（图 2.2－6，1）。

Ⅳ：盖带四环纽，深腹而尖底，蹄足长而曲，上端饰半浮雕兽面纹。饰抽象的蟠虺纹。如汪家墱鼎、东风油库 M1 鼎（附图 2，7）。东风油库 M2 鼎器形与此式类似，亦可归入。

Ⅴ：盖带环纽，腹部扁而略浅，足高而直。饰镶嵌的变形龙纹。见于曾侯乙墓（附图 2，13）。

Ⅵ：兽纽盖，器身近于盒形，足高直。见于擂鼓墩 M2（附图 2，19）。

盖鼎的演变趋势是：腹部变深而及浅，三足趋高，盖由捉手到角形纽再到兽形纽。

甗

此阶段甗均为圆体，甑、鬲体可拆分。可分四式：

Ⅰ：索状立耳，鬲体为鼎形。饰云雷纹。见于季氏梁墓葬（附图 2，3）。

Ⅱ：附耳，鬲体为鼎形，足上端见半浮雕兽面纹。饰较抽象的蟠虺纹。见于东风油

① 高崇文：《东周楚式鼎形态分析》，《江汉考古》1983 年第 1 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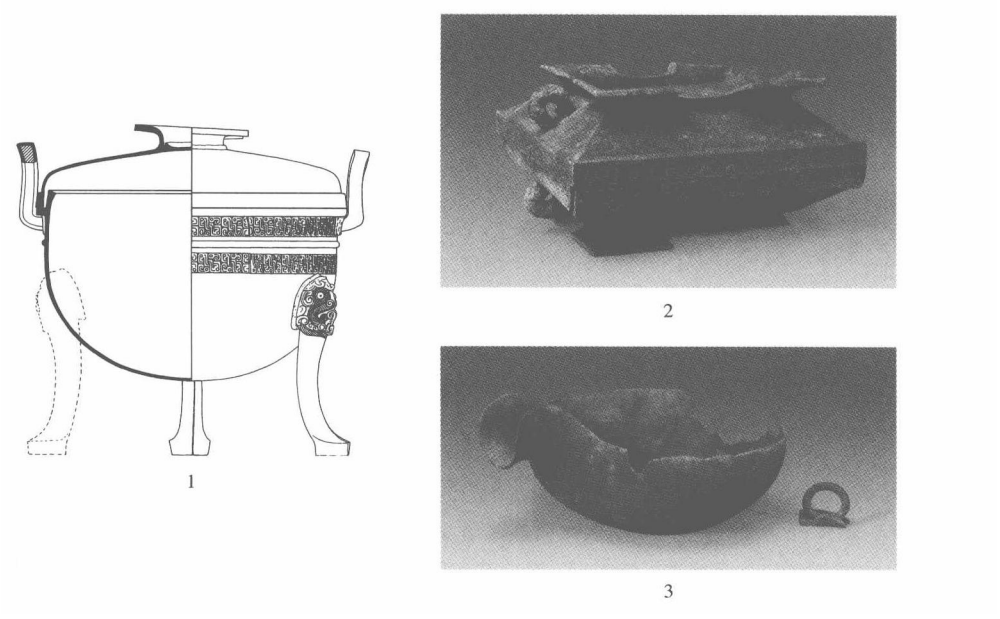


图 2.2－6　第二阶段部分铜器型式

1. Ⅲ盖鼎（76 义地岗鼎）　2. AⅠ簠（罗山高庙簠）　3. Ⅰ匜（罗山高庙匜）

库 M1（附图 2，8）。

Ⅲ：附耳，鬲体为鬲形。饰镶嵌变形龙纹。见于曾侯乙墓（附图 2，14）。

Ⅳ：形制接近Ⅲ式，鬲体较为变异。饰蟠虺纹。见于擂鼓墩 M2（附图 2，20）。

甗由鼎形的鬲体而及鬲形的鬲体。

簠

墓葬出土的簠数量不多，其形制明显有扁体和高体的两型。

A 型　簠体扁长。可分二式：

AⅠ：圈足径明显小于口径，圈足低矮。饰近似于蟠虺纹的云状纹。见于罗山高庙（图 2.2－6，2）。

AⅡ：圈足径接近于口径，圈足略高。饰抽象的蟠虺纹。如汪家墓簠。

B 型　簠体较高。可分三式：

BⅠ：圈足径小于口径。饰蟠虺纹。见于东风油库 M1（附图 2，9）。

BⅡ：圈足径基本等于口径，圈足加高。见于曾侯乙墓（附图 2，15）。

BⅢ：圈足径约等于口径，圈足进一步加高。见于擂鼓墩 M2（附图 2，21）。

两型簠共同的变化是：圈足径变大，同时簠体变高。

盘

此阶段盘多为三足盘，至擂鼓墩 M2 盘为平底。分为三式：

Ⅰ：附耳，三足，底近于平。见于东风油库 M1、M2（附图 2，10）。

Ⅱ：附耳，三足，平底。见于曾侯乙墓（附图 2，16）。

Ⅲ：铺首形耳，平底。素面。见于擂鼓墩 M2（附图 2，22）。

匜

此阶段匜均平底，多数匜光素。可分四式：

Ⅰ：短流弧曲，宽体。见于罗山高庙（图 2.2－6，3）。

Ⅱ：短流，体较窄。例如东风油库 M1（附图 2，11）。

Ⅲ：短流。饰镶嵌的变形龙纹。见于曾侯乙墓（附图 2，17）。

Ⅳ：长流近平，腹下接圈足。素面。见于擂鼓墩 M2（附图 2，23）。

第二阶段 12 个器物群按照其型式变化，可大体排序归结为表 2.2－3。

表 2.2－3　　第二阶段青铜器器形型式登记表

序号	器类 / 器群	升鼎	盖鼎	甗	簠		盘	匜	其他器类
					A	B			
1	80 刘家崖	Ⅰ							鬲、簋、圆壶、编钟
2	季氏梁墓葬			Ⅰ					平盖鼎、编钟
3	八角楼墓葬		Ⅰ						盏
4	罗山高庙				Ⅰ			Ⅰ	立耳鼎、圆壶、圈足盘
5	75 刘家崖 A	Ⅱ	Ⅱ						
6	76 义地岗		Ⅲ						盏
7	汪家塄		Ⅳ		Ⅱ				
8	东风油库 M2		Ⅳ		Ⅱ		Ⅰ	Ⅱ	方壶
9	东风油库 M1		Ⅳ	Ⅱ		Ⅰ	Ⅰ	Ⅱ	方壶
10	东风油库 M3		Ⅳ						方豆、圆壶、盘、匜
11	曾侯乙墓	Ⅲ	Ⅴ	Ⅲ		Ⅱ	Ⅱ	Ⅲ	鬲、簋、豆等多类器
12	擂鼓墩 M2	Ⅳ	Ⅵ	Ⅳ		Ⅲ		Ⅳ	鬲、簋、豆等多类器

以上 12 群青铜器，据其型式的变化，明显可分为如下五组：

第一组：包括第 1－4 群。本组见鼎、升鼎、甗、A 型簠、匜各器类的Ⅰ式型式。各群常见的器类有盖鼎、簠。

第二组：包括第 5、6 两群。这两组所出器物和器类不多，但器物型式与前后各群

有别。

第三组：包括第7－10群。包括Ⅳ式盖鼎、Ⅱ式甗、AⅡ和BⅠ簠以及形制相同的盘、匜。

第四组：即第11群的曾侯乙墓。

第五组：即第12群的擂鼓墩M2。

第四、五两组青铜器代表曾国最高级别，其组合与器类齐全。

以上五组大体代表了第二阶段曾国青铜器发展的五个阶段，由此可以将它们视为五个不同的时期。由表2.2－3可见，这五个时期的器物类型演变基本是在有序、节奏近似的变化之中，暗示出五期的变化是循序渐进，基本没有缺环。上述五期青铜器发展的示意，可参考附图2第二阶段曾国青铜器分期图。

（二）其他青铜器的期别

按照五期器物的型式特征，可以将其他零星出土而未能分组的曾国青铜器、采集以及传世的曾国青铜器作出相应的类比，以归入相应的期别。不过，和第一阶段青铜器一样，这种归位只是在相对年代上的大体界定。

可归入第二期的青铜器有：

传世品曾孙无谌鼎深腹，附耳较直，盖、腹饰带三角形纹的蟠虺纹，纹饰接近Ⅰ式盖鼎，但形制更接近Ⅱ式盖鼎，兽蹄形足亦出现有兽面纹。

随州鲢鱼嘴出土的曾子原彝簠（附图2，6）圈足径大于口径，形制、纹饰均早于东风油库M1的BⅠ式簠。

可归入第三期的青铜器有：

淅川和尚岭M1出土的曾太师鼎，形制、纹饰与Ⅳ式盖鼎特别是东风油库M3鼎完全相同。

淅川徐家岭M9出土曾嫚嬗朱姬簠、六合县程桥中学的曾子义行簠、私人收藏的曾侯郧簠、传世品曾子⊠簠圈足径接近口径，器体较高，器腹壁均饰细密的蟠螭纹，形制特征与BⅠ式簠相同。

和尚岭M2出土曾仲郤君腔器座所饰镶嵌纹饰以龙纹为主体，龙纹与东风油库M3曾姬圆壶完全相同，两件铜器镶嵌纹饰做法也接近。

潢川高稻场出土的曾姬盘作浅腹，底部近平，除了龙首形耳较特异之外，腹与足器形接近于Ⅰ式盘如东风油库M1盘。

可归入第五期的青铜器有：

安徽寿县李三孤堆楚墓出土的一对曾姬无卹方壶年代清楚[①]，方壶纹饰与擂鼓墩

① 李家浩：《从曾姬无卹壶铭文谈楚灭曾的年代》，《文史》第33辑，中华书局，1990年。

M2 青铜器蟠虺纹风格相同。

75 刘家崖 B 出土的邵方豆与新都马家乡出土的邵鼎当为同一人所作，邵鼎形制与擂鼓墩 M2 出土的Ⅵ盖鼎相同，如此则邵豆、鼎均属于第五期。

75 刘家崖 C 出土的带爬兽方壶、襄阳梁家老坟 M11 出土以及私人收藏的两件曾侯昃戈、鲢鱼嘴出土的曾仲之孙戈等器无可类比的参照物，其年代将在年代一节和戈的发展系列一节中确定。

这样，属于第二阶段第一至五期的遗存和单件青铜器分别为：

第一期：80 刘家崖、季氏梁墓葬、八角楼墓葬、罗山高庙。

第二期：75 刘家崖 A、76 义地岗；曾孙无谌鼎、曾子原彝簠。

第三期：汪家塄、东风油库 M1、东风油库 M2、东风油库 M3；曾太师鼎、曾嫚嬞朱姬簠、曾子义行簠、曾侯郕簠、曾子⊿簠、曾姬盘、曾仲伽君腚方座器。

第四期：曾侯乙墓（擂鼓墩 M1）。

第五期：擂鼓墩 M2；邵方豆、邵鼎、曾姬无卹方壶。

传世的曾国青铜器中无器物或图像存世者，无法确定其具体期别，只能根据其铭文字形特征大体推定其所属时期。

（三）曾侯遗、曾侯郕与曾侯乙簠的发展序列

春秋战国之际的曾侯，除了曾侯乙之外，还有曾侯遗和曾侯郕。他们的年代早晚关系不明，需要通过一些共同因素来比勘其年代的早晚，其中簠是这几位曾侯共见容器，其发展序列应当对判断曾侯遗与曾侯郕孰早孰晚有所帮助。

春秋中期之后包括曾国青铜器在内的楚系青铜器中，簠的形制变化轨迹比较清晰，那就是器体趋高、圈足径与口径之间的比例趋大。依照这一变化规律，我们可观察由曾侯遗、曾侯郕到曾侯乙簠是否形成有先后次序。

曾侯乙等三位曾侯的簠形制接近，是春战之际前后的典型风格。各簠均作长方体，直口较高，斜壁两端设粗大的龙首形耳，曲尺形足，圈足径接近于口径。曾侯遗、曾侯郕簠均饰细密的蟠虺纹，而曾侯乙簠则施镶嵌的变形龙纹。后者的纹饰与曾侯乙墓其他青铜容器纹饰风格一致，并不代表年代特征。以上诸器涉及形制变化的具体情况如下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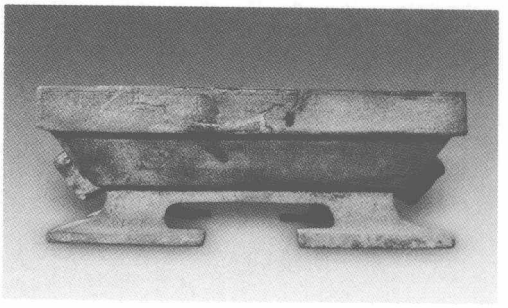
曾子遗簠：《集成》4488、4489 可能为同一簠的盖与器，其中 4489 藏于苏州博物馆，为簠之器身（图 2.2－7，1）。簠口长 27.4、足间距 26.4、高 10.3 厘米。这样曾子遗簠口长/圈足长/高的比值为 27.4/26.4/20.6。

① 曾子遗簠与曾侯乙簠报告均无圈足长度数据，本文数据分别为苏州博物馆姚晨辰、湖北省博物馆韩壮丽提供，此致谢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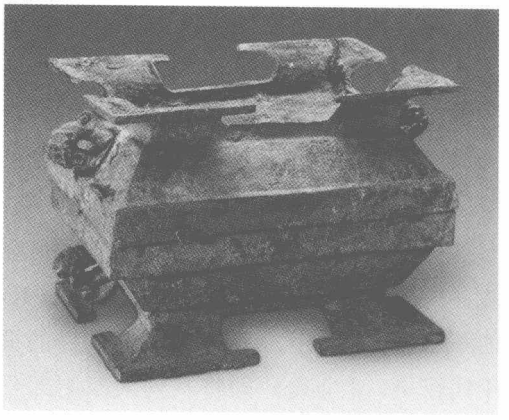
曾侯郧簠：器形完整（图 2.2－7，2）。簠口长/圈足长/高的比值为 32.5/31.5/25。

曾侯乙簠：共见 4 件，形制、纹饰相同，大小稍有不同。C.122（图 2.2－7，3）和 C.123 簠口长/圈足长/高的比值分别为 31.4/30.2/26.2 和 31/30.3/2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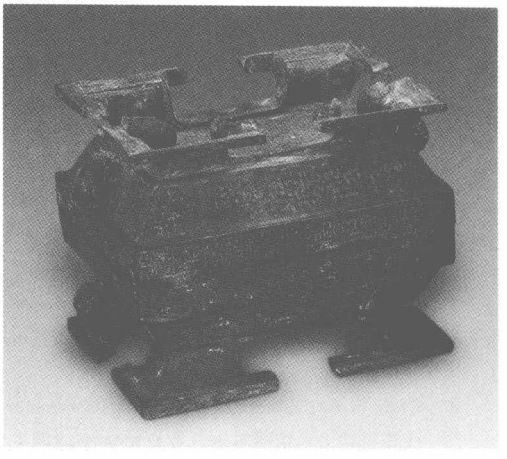
以上曾侯遗、曾侯郧、曾侯乙簠口长与圈足长的比值均接近于 1，如果将这些簠的大小都换算成口长 32 厘米（相当于曾侯郧簠和曾侯乙簠），则它们的口长与圈足长之差基本上都为 1 厘米，几乎没有差别。如果考虑到青铜器的精密度并不很高，这些差别显然是可以忽略的。不过，上述几件簠高与口长的比值分别为 0.75、0.77、0.83，也就是说，如果将这些簠的大小都换算成口长 32 厘米，则三类簠的高度各有超过 1 厘米的差别，这对于年代接近的簠而言，变化还是比较明显的。若如此，则曾侯遗、曾侯郧、曾侯乙三代曾侯的早晚次序仍然与行文次序相同。



1



2



3

图 2.2－7　曾侯之簠发展系列

1. 曾子遗簠　2. 曾侯郧簠　3. 曾侯乙簠

第三节　年代与特征

与陶器不同，青铜器均有相对较长的使用时间和较缓的发展频率。这样，在某一时间段的青铜器，可能包含有较早时期生产或沿用较早时期形制的青铜器。对于该时间段的年代，当然就不能根据这些较早的特征来确定。曾国青铜器先后处于周文化和楚文化的体系之下，难以在青铜器器形、纹饰等特征上开时代风气之先河。但是在另一方面，曾国青铜器当然也可能形成一些自身的个性特征。因此，曾国青铜器各期别的年代，就

不能根据个别器物或有较早时代特征的器物来确定其年代，而只能是以各器群或期别较晚特征的青铜器来确定年代。同时，由于青铜器的使用时间也有其限度，铜器群中一些时代特征较早的青铜器，或可能年代较早，或可能是说明该器群延续着较早的风格传统，且往往不会距离器物群真正的年代太远。认识这一点，对于各期年代及特征的总结，也是十分有帮助的。

一 第一阶段

（一）年代

第一阶段的曾国青铜器形成的不同发展时期的青铜器，代表了不同的时间阶段。但是，并非所有的器群都具有早晚立判的时代特征。以第一阶段最重要的器群苏家垅器群为例，论者对其年代属于西周晚期还是春秋早期各有不同意见：周永珍①、杨宝成②认为属于西周晚期，而李学勤③等认为其在春秋早期，朱凤瀚更定其在春秋中期④。在一些大型的参考书中，《全集》⑤、《铭文选4》⑥ 定其为春秋早期。西方学者对其年代同样有这样的分歧，例如贝格立将苏家垅方壶定在西周⑦，苏芳淑（Jenny F. So）认为苏家垅器群属于春秋早期⑧，罗森（Jessica Rawson）则未作严格的区分⑨。对于这一阶段其他一些器群的年代，学术界也有同样的分歧。例如一般认为70、72熊家老湾两个器群年代较早，《全集》即将其列入西周部分⑩，而林巳奈夫、朱凤瀚将曾国青铜器一概归入东周时期⑪。

---

① 周永珍：《曾国与曾国铜器》，《考古》1980年第5期。

② 杨宝成：《试论曾国铜器的分期》，《中原文物》1991年第4期。

③ 李学勤：《曾国之谜》，《光明日报》1978年10月4日。又载于《新出青铜器研究》，文物出版社，1990年。

④ 朱凤瀚：《古代中国青铜器》之《春秋青铜器》，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年。

⑤ 《中国青铜器全集（10）》，文物出版社，1998年。

⑥ 马承源主编：《商周青铜器铭文选》第四卷，文物出版社，1990年。

⑦ Robert W. Bagley, Transformation of the Bronze Art in Later Western Zhou, p248. The Great Bronze Age of China: an Exhibition from the People's Repuhlic of China, edited by Wen Fong.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New York, 1980.

⑧ Jenny F. So, Eastern Zhou ritual bronzes from the 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s, p15. Washington, D. C. 1995.

⑨ 在赛克勒美术馆图录中，罗森将苏家垅器群断代在春秋早期。Jessica Rawson, Western Zhou ritual bronzes from the 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s, p104. Washington, D. C. 1990. 但她也认为苏家垅器群在西周末年，参《西周青铜冶铸技术的革命及其对各地铸造业的影响》，罗森《中国古代的艺术与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⑩ 《中国青铜器全集（6）》图110，文物出版社，1997年。

⑪ 林巳奈夫：《春秋戰國时代青銅器の研究——殷周青铜器纵览三》，吉川弘文館，1989年。朱凤瀚：《古代中国青铜器》之《春秋青铜器》，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年。

如分期一节所述，和其他诸侯国青铜器一样，曾国青铜器在两周之际及前后的年代的不确定性，原因之一是过去学术界首先对于中原地区两周之际前后诸侯国青铜器群年代未能形成成熟看法和一致意见。虢国墓地——过去中原地区这一时期最为重要的材料——的年代，体现了这一研究状态。多数学者认为虢国墓地的年代跨越西周和东周①，而也有相当学者认为其上限不早于东周初②。具体到较重要的虢国墓地 M2001，同样存在西周晚期③和春秋早期④两说。形成这一局面的原因，除了前节所说的分期方法问题之外，过去缺乏西周末年和春秋初期年代明确的铜器群是一个重要原因——即便是周原地区，西周晚期特别是偏晚阶段的青铜器，除了一些有铭青铜器之外，体现青铜器一般特征的墓葬材料发现并不多。因此我们甚至可以看到在考订一些诸侯国铜器群年代时存在的循环论证现象，比如讨论曾国青铜器年代时引用虢国青铜器材料为依据，而在订证虢国青铜器年代时的依据又是曾国青铜器。此外，在西周青铜器年代学研究上有如下两个倾向，似乎是问题的主观因素。第一，以历史事件确定铜器或铜器群年代。这一方法本身没有问题，但对于事件和铜器这两个需要关联的因素的判断，往往具有主观性，而一个主观的判断又往往会影响相关其他判断。类似情况并不在少数，杨家村逨器年代⑤、前述虢国青铜器年代东、西周之说均为其例。不同学者对历史事件判断的标准不同，对同一群青铜器的年代自然有不同的判断。因此而对虢国青铜器的年代，自然也难以形成一致的结论性意见⑥。第二，相对年代绝对化倾向。通过类型学方法确定的青铜器年代都应当是相对的、有弹性的，因此即便是某器形制特征等同于某王之器，也只能得出该器年代与该王年大体相当的结论。认识这一点，我们既不能指望类型学能够精确排列出属于同一时期不同铜器群的早晚顺序如晋侯墓地 M8、

---

① 林寿晋：《〈上村岭虢国墓地〉补记》，《考古》1961 年第 9 期。李丰：《虢国墓地铜器群的分期及其相关问题》，《考古》1988 年第 11 期。

② 郭宝均：《商周青铜器群综合研究》之《东周初年及春秋时期铜器群》，文物出版社，1981 年。朱凤瀚：《古代中国青铜器》之《春秋青铜器》，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 年。赵世纲：《虢国青铜器与虢国墓地的年代问题》，《河南文物考古论集》第 350－364 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 年。

③ 马承源：《虢国大墓参观记》，《中国文物报》1991 年 3 月 3 日第 3 版。张长寿：《虢国墓地的新发现》，《中国文物报》1991 年 3 月 17 日第 3 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门峡市文物工作队：《三门峡虢国墓（第一卷）》，文物出版社，1999 年。

④ 俞伟超：《上村岭虢国墓地新发现及其相关问题》，《中国文物报》1991 年 2 月 3 日第 3 版。李学勤：《三门峡虢墓新发现与虢国史》，《中国文物报》1991 年 2 月 3 日第 3 版。朱凤瀚更认为 M2001 晚到春秋早期晚段，见朱凤瀚：《古代中国青铜器》之《春秋青铜器》，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 年。

⑤ 学术界一般认为杨家村逨器年代在西周宣王，但马承源等趋向于历王时期。参《陕西眉县出土窖藏青铜器笔谈》，《文物》2003 年第 6 期。

⑥ 例如李丰和朱凤瀚各有差异较大的不同结论。李丰：《虢国墓地铜器群的分期及其相关问题》，《考古》1988 年第 11 期。朱凤瀚：《古代中国青铜器》第十二章《春秋青铜器》，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 年。

M64 年代排序①，也不能绝对化考古学分期相对有弹性的年代，比如判断苏家垅铜器群年代在西周晚期而不可能属于春秋早期——当我们划分两个历史时期时，其首尾距离只有一年之差。

准此，在讨论曾国青铜器年代时，我们不应当也不可能将某一群青铜器年代绝对判定在某一时期比如说西周晚期。因为即便所参照的铜器群绝对年代不晚于西周晚期，但由此所比勘出的某一曾国青铜器群的年代，依然不能保证不晚于西周晚期。如前所述，我们也不会将西周晚期和春秋早期作绝对的年代区分。

不过，对于前述的客观因素，近年来晋侯墓地的考古新发现已经为两周之际青铜器年代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晋侯墓地包括有西周晚期的 M8②、M64③ 两组晋侯墓铜器群，也发现有下葬年代属于春秋初年的 M93 和 M102④，这成为分辨其他诸侯国西周晚期和春秋早期铜器群年代的可靠参考⑤。

晋侯墓地西周晚期青铜器的意义还在于，过去学术界常常将周原地区青铜器视为判断西周晚期青铜器近乎唯一的标准，也就是说，周原地区不见的器类和器形，其年代即被视为晚于西周时期。在此背景下认识诸侯国青铜器，当然难以看出个性因素的存在。“诸侯国青铜器很多和周王朝的器物形制相同，在器形、纹饰和工艺上都看不出明显的特点”⑥。这一认识可以说是代表了晋侯墓地发现之前学术界的基本动态。但是，晋侯墓地 M8 和 M64 两组墓葬出土青铜器，既出现有地方特征，也有不少属于新兴的形制，说明西周晚期诸侯国青铜文化中个性不仅存在，更确证这一时期方国青铜器已经出现了中心文化区域未见的新的因素。例如，晋侯墓地 M63 杨姞壶（《全集》6－51）（图 2.3－1，1）形制不同于周原青铜器如几父壶（《全集》5－138）那种垂腹环带纹圆壶，这种圆壶过去多见于春秋早中期⑦。又如，周原地区附耳鼎多为大克鼎那种宽体带扉棱形制⑧，而

① 一般认为晋侯墓地 M8 早于 M64，但也有相反的看法，例如许杰：《晋侯墓地中南排晋侯墓的早晚系列及其相关问题》，上海博物馆编《晋侯墓地出土青铜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书画出版社，2002 年。

②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等：《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二次发掘》，《文物》1994 年第 1 期。

③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等：《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四次发掘》，《文物》1994 年第 8 期。

④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等：《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五次发掘》，《文物》1995 年第 7 期。

⑤ 虽然学术界对于晋侯墓地具体墓葬年代排序存在争议，但对 M8 和 M64、M93 和 M102 两组墓葬分别属于西周晚期和春秋初年的认识却是一致的。参徐天进：《晋侯墓地的发现及研究现状》，上海博物馆编《晋侯墓地出土青铜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书画出版社，2002 年。

⑥ 李学勤：《西周时期的诸侯国青铜器》，《新出青铜器研究》，文物出版社，1990 年。

⑦ 高崇文：《两周时期铜壶的形态学研究》，俞伟超主编《考古类型学的理论与实践》，文物出版社，1989 年。高氏将此类圆壶归为ⅡC 型，出土在汉淮地区者年代在春秋早中期，出土在郑国地域为春秋中期。

⑧ 这里不包括一些方形附耳鼎或特异形制的附耳鼎。例如，长安张家坡 M183、M311、M152 均见特形的附耳鼎。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张家坡西周墓地》，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 年。

1

2

图 2.3－1　晋侯墓地出土西周晚期青铜器

1. M63 杨姞壶（《全集》6－51）

2. M8 晋侯苏鼎（《晋国奇珍》第 101 页）

圜底蹄足附耳鼎过去被认为出现于春秋早期①，这也是许多学者分断西周、春秋青铜器的一个重要标准。但晋侯墓地 M92 晋侯对鼎、M8 晋侯苏鼎（图 2.3－1，2）以及 M62 窃曲纹鼎均为附耳鼎，说明这种圜底蹄足附耳鼎不仅在西周晚期已经出现，而且在较早阶段即已出现②。方甗出现于西周中晚期③，但像虢国墓地出土的那种附耳分体方甗过去被视为春秋早期出现的新的式样④。晋侯墓地 M64 出土的叔钊父方甗⑤（见图 2.3－6，2）说明了西周晚期这种形制的方甗已经存在。晋侯墓地还出现有区域特征较强的铜三足瓮和双耳罐，又说明一些个性特征颇强的青铜器在西周时期也已为诸侯国所使用。这些情况，对于理解两周之际前后诸侯国青铜器年代有着重要参考价值。

---

① 朱凤瀚认为“中原地区附耳鼎约在春秋早期偏晚即出现”。朱凤瀚：《古代中国青铜器》之《春秋青铜器》，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 年。

② M92 晋侯对墓年代相当于西周晚期偏早阶段。参李伯谦：《晋侯墓地发掘与研究》，上海博物馆编《晋侯墓地出土青铜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书画出版社，2002 年。

③ 扶风庄白二号窖藏出土连体方甗（《周原》窖藏 974），甗之鬲体无附耳。1948 年洛阳马坡出土方甗（《全集》5－48），甑体为竖式的附耳。这两件方甗甑体饰弦纹，具西周中期时代特征，与虢国墓地一类方甗不同。

④ 郭宝均：《商周青铜器群综合研究》之《东周初年及春秋时期铜器群》，文物出版社，1981 年。郭宝钧谓方形分体甗“是上村岭的创制，在西周后期尚不曾见过”。

⑤ 上海博物馆：《晋国奇珍——山西晋侯墓群出土文物精品》第 149 页，上海美术出版社，2002 年。

由于两周之际前后青铜器地方特征的可能存在，对曾国青铜器断代工作的参考对象还不能仅限于中原地区的材料。在曾国邻近地区，可靠的参照材料有：1981 年南阳北郊砖瓦厂出土的仲禹父器群①，由铭文可判定其年代属于西周晚期②；与曾国关系密切的黄国于公元前 648 年灭于楚国③，数起黄国青铜器可判定为早于这一底线的春秋早期偏晚阶段④。这两类材料年代明确，学术界均无异议，它们特别是黄国青铜器材料是我们判断第一阶段曾国青铜器年代下限的重要参考点。

以下是我们对于第一阶段曾国青铜器各期年代的讨论。

1

2

图 2.3－2　第一阶段第一期曾国青铜器与周式青铜器比较——盘

1. 72 熊家老湾盘　2. 史墙盘（《全集》5－198）

第一期：

本期曾国青铜器主要有 70 和 72 熊家老湾、桃花坡 M1 和 M2 等几个典型器群。从年代学的角度观察，本期的青铜器包含有几种不同的情形：

1）一些器群中包含有西周中期或晚期较早阶段出现的青铜器形制特征。

72 熊家老湾盘（图 2.3－2，1）深腹，圈足较高，双耳弧曲，器形与史墙盘（《全集》5－198）（图 2.3－2，2）、守宫盘（《断代研究》盘 9）等相同。该盘纹饰呈左右对称布局，这是西周早中期或更早的兽面纹、鸟纹纹饰布局的一般模式，不同于西周晚期及以后一周纹饰作连续、单向的排列方式。此外，该盘腹部纹饰作鸟纹向窃曲纹过渡形态⑤，也与史墙盘、守宫盘相似。义地岗 M83 盘深腹，高圈足，腹部窃曲纹也有鸟纹的遗风，该盘与 72 熊家老湾盘一样具有

① 崔庆明等：《南阳市北郊出土一批申国青铜器》，《中原文物》1984 年第 4 期。

② 李学勤：《论仲禹父簋与申国》，《中原文物》1984 年第 4 期。

③ 《春秋·僖公十二年》："夏，楚人灭黄"。这在公元前 648 年。

④ 河南信阳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光山县文物管理委员会：《春秋早期黄君孟夫妇墓发掘报告》，《考古》1984 年第 4 期。信阳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光山县文物管理委员会：《河南光山春秋黄季佗父墓发掘简报》，《考古》1989 年第 1 期。

⑤ 西周早中期青铜器诸多纹饰特征显示，窃曲纹是鸟纹的抽象和发展形式。

1

2

图 2.3－3　第一阶段第一期曾国青铜器与周式青铜器比较——鼎

1. 桃花坡 M2 弦纹鼎　2. 1960 召陈村窖藏弦纹鼎（《周原》2、窖藏 156）

较早特征。

桃花坡 M2 弦纹鼎（图 2.3－3，1）腹部作倾垂腹，腹部饰弦纹，这种形制的鼎流行于西周中期，如 1960 召陈村窖藏出土的弦纹鼎（《周原》2、窖藏 156）（图 2.3－3，2）。

罍出现在西周中期，如中义父罍①，早期的器体较高，其后趋于低矮。第一期曾国青铜器见罍两件，分别出土于 70 熊家老湾（图 2.3－4，1）和 72 熊家老湾，器形接近于中义父罍（图 2.3－4，2）。同时，这种罍作侈口、圜底，器形明显来自于陶器。70 熊家老湾罍作折肩，器形与西周早中期流行的折肩陶罐相同。此罍肩上设角形纽一对，接近西周早中期的原始瓷罍，如洛阳北窑 M202：3 西周早期罍②。可见，曾国的两件尚处于早期发展阶段。72 熊家老湾出土波折纹罍纹饰颇有个性（见图 5.2－1），罍颈部以下饰三周波折纹，其间夹仿绳纹的直条纹。此罍与莱阳前村出土的己国铜器中一件罍③、烟台上夼村出土的罍（《全集》9－85）形制相同。这些罍器形和纹饰都与陶罐相似，从这个角度看，这种罍应该早于曲阜鲁故城 M48 出土的侯母壶（《全集》6－69）。将两周之际青铜器定位较晚的朱凤瀚也认为莱阳前村青铜器属于西周晚期④。72 熊家老湾罍年代也应在西周晚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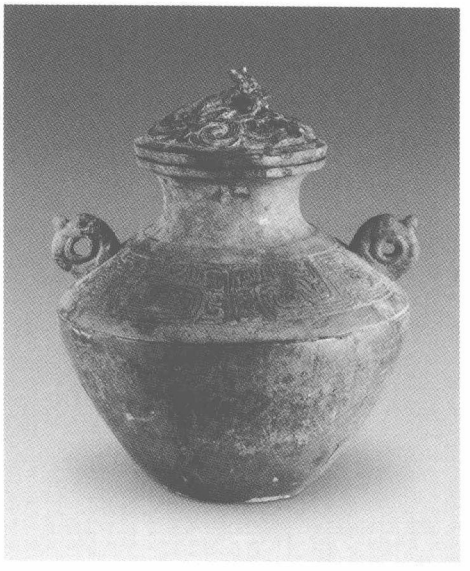
---

① 陈佩芬：《夏商周青铜器研究·西周卷（下）》第 353 器，世纪出版集团等，2004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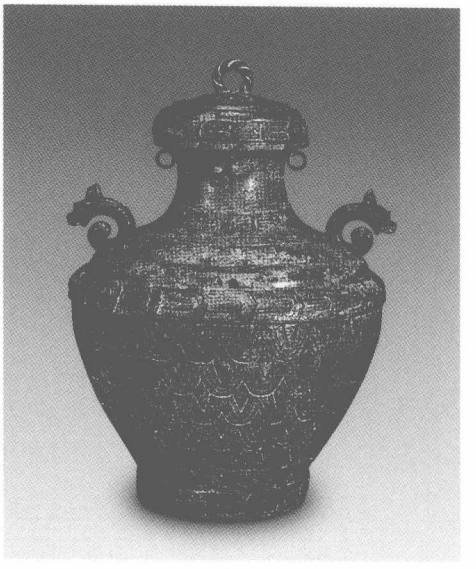
②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北窑西周墓》彩版 1，文物出版社，1999 年。

③ 李步青：《山东莱阳县出土己国铜器》，《文物》1983 年第 9 期。

④ 朱凤瀚：《古代中国青铜器》之《西周青铜器》，第 789 页，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 年。



1



2

图 2.3－4 第一阶段第一期曾国青铜器与周式青铜器比较——罐

1. 70 熊家老湾罐 2. 中义父罐（《夏商周·西周下》353）

2）多数青铜器具有典型西周晚期时代特征。

本期鼎典型形制为 A Ⅰ鼎，深腹立耳，蹄形足不甚发达，鼎上腹饰一周重环纹（图 2.3－5，1），这种形制的鼎为西周晚期周原地区所常见，如善夫鼎（图 2.3－5，2）。著名的毛公鼎（《全集》5－36）、梁其鼎（《断代研究》鼎 67）等也作这种形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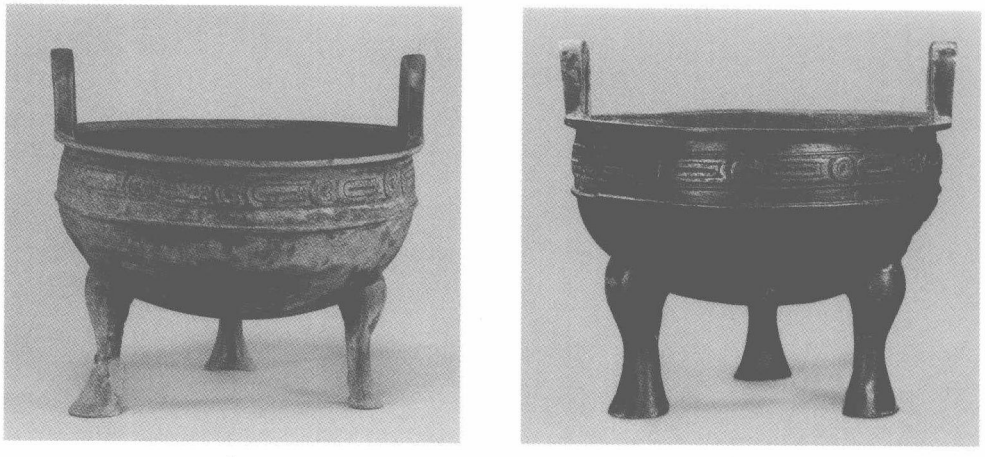
72 熊家老湾方甗与晋侯墓地 M64：120 叔钊父方甗[①]形制完全相同，甚至二者甑体也都以环带纹为主体纹饰（图 2.3－6）。

义地岗 M83 鬲（图 2.3－7，1）宽沿扁腹，饰重环纹和直条纹，腹侧带新月形扉棱。此类鬲在周原地区西周中期即已流行，西周晚期多见，如杜伯鬲（《断代研究》鬲 15）、伯先父鬲（图 2.3－7，2）等等。

曾国青铜簋均作截面为梯形的敛口瓦纹簋，圈足下大多带小足，是西周中晚期流行式样。第一期簋可见两类形制，一类是重环纹簋，一类是全瓦纹簋，这两类簋均是敛口瓦纹簋中较早的形态。与重环纹簋相同的形制可举噩侯簋[②]（图 2.3－8，2）、豢簋

① 上海博物馆：《晋国奇珍——山西晋侯墓群出土文物精品》第 149 页，上海美术出版社，2002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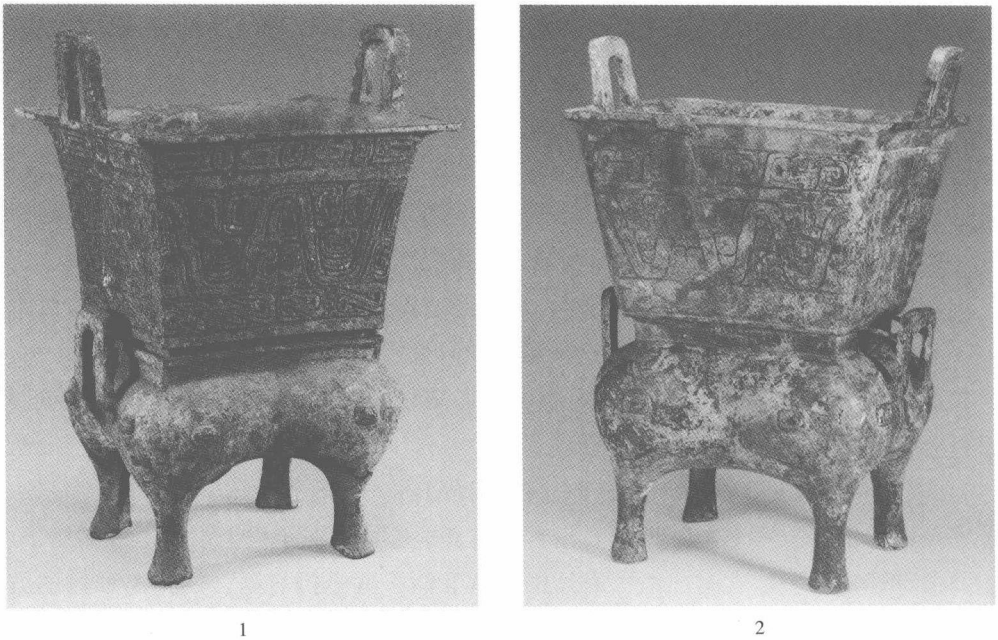
② 陈芳妹：《商周青铜粢盛器特展图录》图版 68，台北故宫博物院，1985 年。噩侯簋年代在西周中期。噩国地望在今南阳一带，西周中期一度与周王室关系密切，但约在周夷王时灭于周。参刘翔：《周夷王经营南淮夷及其与鄂国之关系》，《江汉考古》1983 年第 3 期。张昌平：《噩国与噩国铜器》，《华夏考古》1995 年第一期。



1　2

图 2.3－5　第一阶段第一期曾国青铜器与周式青铜器比较——鼎

1. 桃花坡 M2 重环纹鼎　2. 善夫鼎（《周原》3、窖藏 446）



1　2

图 2.3－6　第一阶段第一期曾国青铜器与周式青铜器比较——方甗

1. 72 熊家老湾方甗　2. 晋侯墓地 M64 叔钊父方甗（《晋国奇珍》第 148 页）

（《夏商周·西周上》329）、师酉簋（《断代研究》簋 81）等，这些簋的年代从西周中期延续到西周晚期。全瓦纹簋多见于西周中期，双耳多无垂珥，如师虎簋（《夏商周·

1

2

图 2.3－7 第一阶段第一期曾国青铜器与周式青铜器比较——鬲

1. 义地岗 M83 鬲 2. 伯先父鬲（《周原》5、窖藏 939）

西周上》315）、无㠱簋（《夏商周·西周上》320）、散伯簋（《夏商周·西周上》334）（图 2.3－8，4），曾国的全瓦纹簋双耳与其他类型的瓦纹敛口簋相同，与西周中期全瓦纹簋大体接近。

桃花坡 M1 长颈圆壶曾经被视为第一阶段曾国青铜器中年代较晚的典型材料①，这可能因为其发展形态具有汉淮区域壶的特征②的缘故。但桃花坡 M1 圆壶与晋侯墓地 M63 杨姞壶（《全集》6－51）器形大体相同（图 2.3－1，1），纹饰的布局和组合也是相互一致的。桃花坡 M1 圆壶长颈不明显，器形更加接近西周早中期的贯耳圆壶。

桃花坡 M1 盘龙首鋬与槽形流相对，形制与蓝田指甲湾出土的宗仲盘（《断代研究》盘 17）相同（图 2.3－9，1、2）。这种盘目前只见于西周中晚期。

72 熊家老湾和义地岗 M83 匜在周原可见形制相同者（图 2.3－9，3、4），如 1963 齐家村窖藏匜（《周原》2、窖藏 260）。

3）存在一些未见于典型西周晚期遗存的青铜器。

第一期青铜器有些形制不见于周原、晋侯墓地等这些在年代上没有争议的属于西周晚期的遗存。这些铜器有腹部饰二周纹饰的 AⅡ鼎、宽沿折肩鬲、四角出扉棱的方卣。不过这些青铜器仍然可以找到属于西周晚期的依据。

AⅡ鼎在第一期也较常见，如 72 曹门湾鼎（图 2.3－10，1）和桃花坡 M1 鼎（图

① 杨宝成：《试论随枣地区的两周铜器》，《中国考古学会第七次年会论文集·1989》，文物出版社，1992 年。

② 高崇文：《两周时期铜壶的形态学研究》，俞伟超主编《考古类型学的理论与实践》，文物出版社，1989 年。

1

2

3

4

图 2.3－8　第一阶段第一期曾国青铜器与周式青铜器比较——簋

1. 72 熊家老湾曾仲大父簋　2. 噩侯簋（《商周青铜粢盛器特展图录》图版 68）　3. 桃花坡 M2 簋

4. 散伯簋（《夏商周·西周上》334）

2.3－10，2），此类鼎器形与 A Ⅰ鼎完全相同，只是腹部在一周凸弦纹上、下各饰一周纹饰，上腹的纹饰为一周重环纹或窃曲纹，下腹一周龙纹或垂鳞纹。这种纹饰布局和风格的鼎多出土于虢国、鲁国等地墓地，例如虢国墓地 M2012 立耳鼎和 M2001 附耳鼎均作这种设计①。在周原地区虽然未见形制完全相同者，但鼎腹部这种二周纹饰的组合特征已经较多出现。和虢、鲁等相关青铜器一样，中原这种鼎也是上腹饰一周较窄纹饰，

①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三门峡虢国墓（第一卷）》，文物出版社，1999 年。

1

2

3

4

图 2.3－9　第一阶段第一期曾国青铜器与周式青铜器比较——盘、匜

1. 桃花坡 M1 盘　2. 蓝田指甲湾出土宗仲盘（《断代研究》盘 17）　3. 72 熊家老湾匜　4. 1963 齐家村窖藏匜（《周原》2、窖藏 260）

1

2

图 2.3－10　第一阶段第一期曾国青铜器

1. 72 曹门湾鼎　2. 桃花坡 M1 鼎

下腹饰一周较宽纹饰。例如，在西周中期青铜器中，一类典型的器形是宽扁体带扉棱鼎，这类鼎多在上腹饰一周较窄的窃曲纹，下腹饰一周较宽的环带纹，如大克鼎（《全集》5－31）、小克鼎（《断代研究》鼎54）。这种纹饰的鼎一直延续到西周晚期，如史颂鼎（《全集》5－35）、禹鼎①，其纹饰布局与曾国青铜器AⅡ鼎相同。西周晚期此型鼎也有窃曲纹与垂鳞纹的组合，如《断代研究》中鼎58。从器形上而言，AⅡ鼎圜底深腹，类似的器形如毛公鼎（《全集》5－36），在西周晚期亦已多见。因此在西周晚期出现如AⅡ鼎这种两周纹饰的立耳鼎是可能的②。实际上，在周原乃至于关中地区这种鼎的确罕见，但1963年扶风庄白李村征集到的一件窃曲纹鼎（《周原》10，征集2078）③，鼎上腹饰窃曲纹、下腹饰环带纹，纹饰组合形式与曾国常见的立耳鼎相同，该鼎足足根伸张成圆盘状，也与西周晚期、两周之际曾国鼎相同。唯该鼎足饰兽面、上腹有扉棱，保留了西周中期的传统。

以上分析说明，一些形制尚未见于周原地区的青铜器，并不意味着它们的时代就晚于西周晚期。形成这一现象的背景，与西周晚期开始诸侯国青铜器逐步出现新的作风相关。这种新的作风，一方面是对原来周式青铜器因素进行新的组合，形成如AⅡ鼎这种形制略异于周式、但风格与周式相同的青铜器。另一方面，是一些带有地方特征的个性因素的出现，如方卣等青铜器。前述在晋侯墓地西周晚期墓葬中出土不同于周原的青铜器，是为这种现象的最好说明④。

综合第一期曾国青铜器上述不同方面的年代特征，可将其年代定在西周晚期。考虑到较多个性因素的存在，或许部分器群的年代可晚至西周末年。

第二期：

本期青铜器以苏家垅、郭家庙M17以及何家台等为典型器群。多数青铜器基本形制承接于第一期，且变化不大。例如A型鼎继续使用，分体的方甗器形变化很小，几种簋几乎仍然可在西周晚期青铜器中找到形制完全相同者，重环纹鬲、附耳盘、扁足龙鋬匜的形制变化均较小。这说明本期年代与第一期相距不远。与第一期青铜器的变化当然存在。在相同的类型中，A型鼎蹄形足较发达，上腹不再装饰重环纹；盘腹趋浅，匜流更为突出。本期也不再像第一期那样见有时代特征较早的西周中期器物特征，相反，

---

① 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精华大辞典》图321，上海辞书出版社，1995年。

② 旧藏颐和园、后归故宫博物院的虢文公鼎，立耳，上腹饰窃曲纹，下腹饰环带纹，为两周之际两周纹饰的立耳鼎样式。此鼎器主郭沫若认为即历史文献有记载的周宣王时之虢文公。但此说有不同意见。郭氏之说见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虢文公鼎条下，科学出版社，1957年。虢文公鼎新图像著录见故宫博物院：《故宫青铜器》图187，紫禁城出版社，1999年。

③ 关于该鼎的背景，有报道为出土，同出有重环纹簋4件。见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编：《陕西出土商周青铜器（三）》图134说明文字，文物出版社，1980年。

④ 如果以周原青铜器特征为判断诸侯国青铜器年代的唯一标准，势必会将包括晋侯墓地青铜器在内的绝大部分诸侯国青铜器年代视为东周时期。

多数器类与周原地区西周晚期青铜器表现出较明显的差异。重要的是，这一时期出现或流行一些新的作风。在器类上出现 B 型的附耳浅腹鼎，圆壶或方壶顶部多见莲瓣状造型。装饰上多见窃曲纹形成的纹饰组合，略异于第一期多以重环纹形成的纹饰组合。与本期青铜器时代特征近似的器物群多见，如虢国墓地 M2001①、北滍村应国墓地 M1② 以及晋侯墓地 M93、M102③ 等。其中晋侯墓地铜器时代明确，这是确定本期青铜器年代的一个重要标点。晋侯墓地 M93、M102 鼎兽蹄形足粗大而曲，与这一时期曾国鼎足时代风格相同，晋侯墓地 M93：49、M102：11 立耳鼎与何家台等立耳鼎形制相同，晋侯墓地这两座墓葬青铜器的窃曲纹簋、盘、匜亦与曾国第二期相应青铜器形制相同（图 2.3－11）。从总的风格上看，晋侯墓地 M93、M102 青铜器少见和周原西周晚期完全相同的形制特征，但铜器器形和纹饰因素又都与周原西周晚期青铜器相关。这也正是第二期曾国青铜器的时代特征。如此，第二期曾国青铜器年代应当与晋侯墓地 M93、M102 大体相同，也属于两周之际或可晚至春秋初期。

第三期：

属于本期的铜器群主要有周家岗和郭家庙 M02。本期青铜器风格与第二期有较明显差异。在器形方面，附耳鼎腹部较第二期鼎变宽而浅，盘腹较深，匜流长而且曲。在纹饰方面，出现交体龙纹构成的蟠螭纹，这一点颇为突出，也是不见于第二期的新风格。

本期年代的判断主要是以光山宝相寺黄君孟夫妇墓④等一批青铜器为参照。黄国地望在今光山、潢川一带，按照《春秋·僖公十二年》（前 648 年）记载："夏，楚人灭黄"，这样，黄国青铜器的年代下限不可能晚于春秋中期偏早。"宝相寺的黄君墓可能是黄国最晚的国君墓葬"⑤，当然也有学者认为黄君孟夫妇墓为春秋中期最早阶段的墓葬⑥，这些判断的基础大体相同。以此为标准，并考虑到当时楚国灭国的政治形势，也可以判定信阳平桥的几座与黄君孟夫妇墓特征接近的樊国墓葬年代在春秋早中期之际或春秋早期偏晚阶段⑦。曾国地

①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三门峡虢国墓（第一卷）》，文物出版社，1999 年。

②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平顶山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平顶山市北滍村两周墓地一号墓发掘简报》，《华夏考古》1988 年第 1 期。

③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等：《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五次发掘》，《文物》1995 年第 7 期。

④ 河南信阳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光山县文物管理委员会：《春秋早期黄君孟夫妇墓发掘报告》，《考古》1984 年第 4 期。

⑤ 李学勤：《光山黄国墓的几个问题》，《考古与文物》1985 年第 2 期。

⑥ 郝本性：《虢、郑、秦、蔡、黄等国青铜器概述》，《中国青铜器全集（7）》，文物出版社，1998 年。

⑦ 河南省博物馆等：《河南信阳市平桥春秋墓发掘简报》，《文物》1981 年第 1 期。简报发表 M1、M2 材料，其中 M2 打破 M1，但两座墓葬年代接近。平桥 M2 略早于黄君孟夫妇墓，年代大约在春秋早期偏晚阶段。信阳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等：《河南信阳市平桥五号春秋墓发掘简报》，《考古》1989 年第 1 期。平桥 M5 的年代与 M1、M2 相同，大体也在春秋早期偏晚阶段。关于这几座墓葬的年代，还可参考刘彬徽：《楚系青铜器研究》第二章，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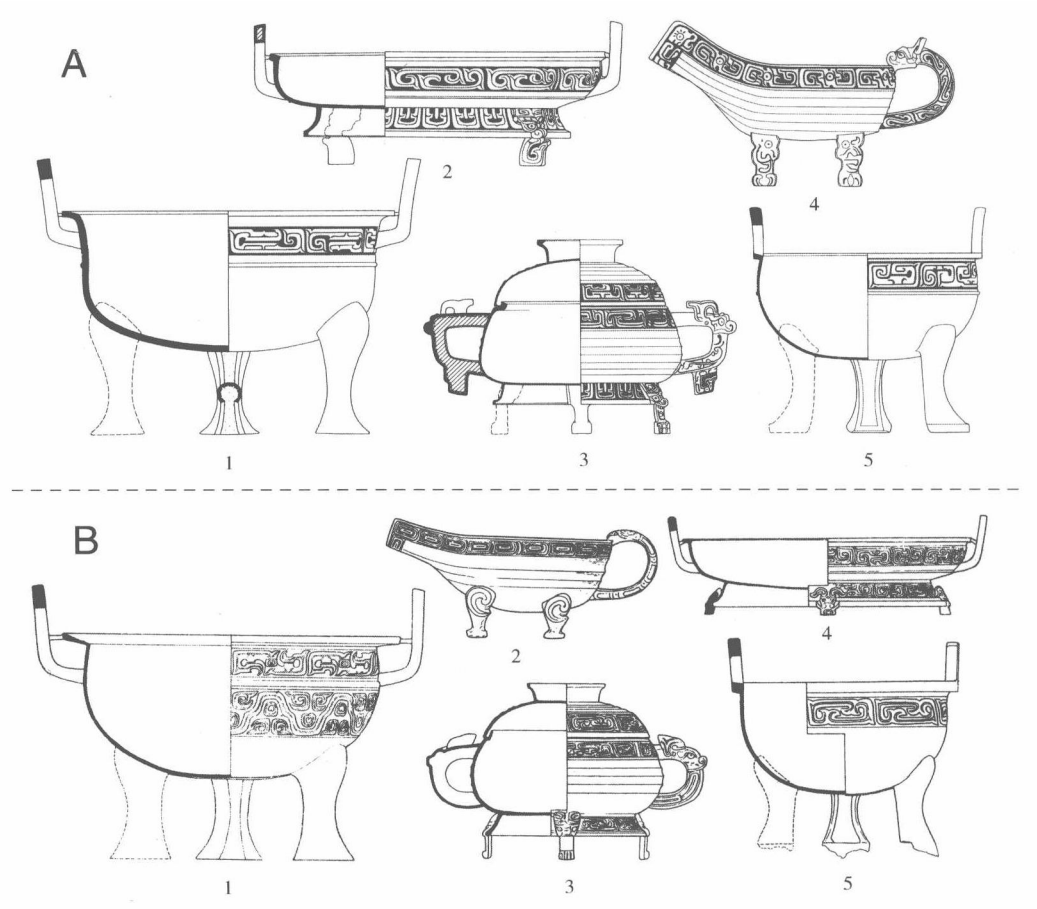


图 2.3－11　第一阶段第二期曾国青铜器与晋侯墓地 M93、M102 青铜器比较

A 曾国青铜器：1、2. 苏家垅鼎、盘　3、4、5. 何家台簋、匜、鼎

B 晋侯墓地青铜器：1、4. M93 鼎、盘　2、3、5. M102 匜、簋、鼎

理和文化与上述区域关系密切，上述特征作为我们推定第三期曾国青铜器年代的主要依据，应当是合理的。

第三期曾国青铜器器形可与上述铜器群比照的主要有圆壶和盘、匜。例如周家岗圆壶与平桥 M2 圆壶形态近似，盘、匜与平桥两座墓葬和黄君孟夫妇墓出土的形制相同。

第三期青铜器的年代，除了一些器物形制与上述黄、樊国青铜器接近之外，还可通过本期最突出的特征——纹饰来说明。纹饰在本期蟠螭纹趋向明显，其变化与特征等同于上述黄国等地青铜器。第三期曾国青铜器纹饰主要有窃曲纹和蟠螭纹两类，窃曲纹是以双“C”形并列夹单目的 DⅢ窃曲纹，见于周家岗盘、郭家庙 M02 鼎，另外周家岗鼎 AⅡ窃曲纹也有相似的作风。DⅢ窃曲纹也多见于上述黄、樊国青铜器，如黄君孟夫妇墓 G2：A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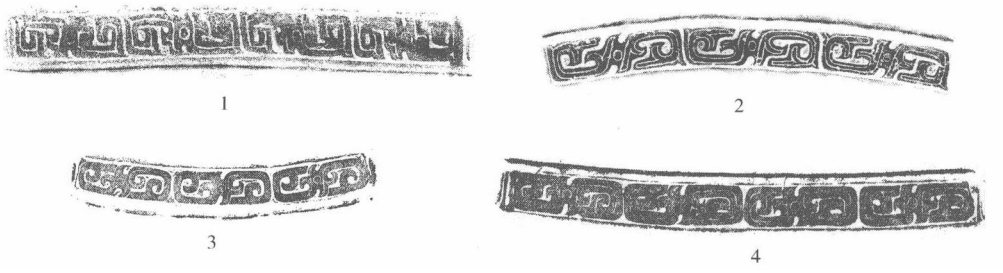


图 2.3－12 春秋早期的窃曲纹

1. 郭家庙 M02 鼎 2. 周家岗盘 3. 信阳平桥 M1：14 盘 4. 光山宝相寺黄君孟夫妇墓 G2：A12 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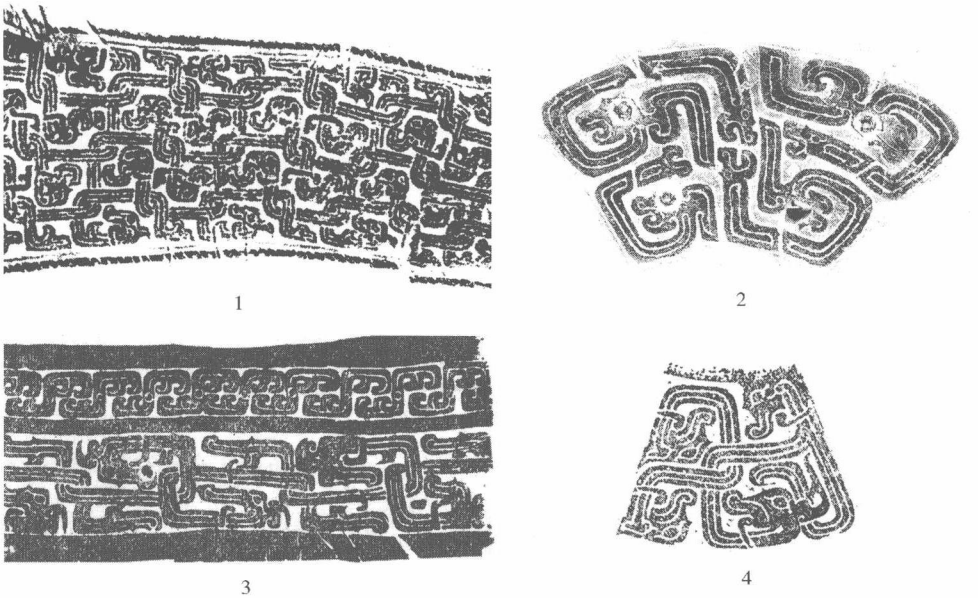


图 2.3－13 春秋早期的蟠螭纹

1. 郭家庙 M8 匜 2. 郭家庙 M02 鑐 3. 光山宝相寺黄君孟夫妇墓 G2：A13 匜 4. 信阳平桥 M1：10 盆

盘、平桥 M1：14 盘、黄君孟夫妇墓 G2：A10 方座形器等（图 2.3－12）。本期曾国青铜器另一类纹饰是交体龙纹构成的蟠螭纹，有的纹饰如郭家庙 M8 匜蟠螭纹结构细密。这些所谓“吐舌蟠螭纹”① 也是上述黄、樊国青铜器最典型的纹饰，在其鼎、簠、壶、盘、匜等器类上多见，特征与第三期曾国相应青铜器相同②（图 2.3－13）。由此可知，第三期曾

① 李学勤：《光山黄国墓的几个问题》，《考古与文物》1985 年第 2 期。

② 交体龙纹带吐舌的特征出现于西周晚期，如晋侯墓地 M64 铜方壶、眉县杨家村铜方壶等。有学者沿用李学勤之说，以“吐舌”的特征作为春秋早期青铜器的断代标准，则是有问题的。

国青铜器的年代，如郭家庙 M1、郭家庙 M02 等与上述黄国青铜器相同，应在春秋早期偏晚阶段。一些青铜器，如饰有较细密的蟠螭纹的郭家庙 M8 匜、周家岗青铜器年代可能在春秋中期偏早阶段，它们应当代表了本期年代的下限。

属于本期的若干传世青铜器，它们的年代在学术界认识的差异较大，还需要作进一步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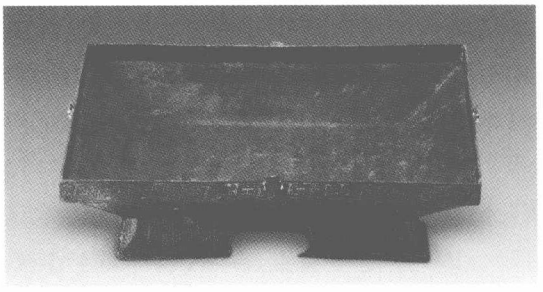
曾孟嬭谏盆（图 2.3－14，1），曾昭岷等、刘彬徽认为属于春秋中期①，《铭文选 4》定为战国早期。

曾孙史夷簠（图 2.3－14，2），马承源认为年代属于春秋晚期②，陈佩芬也作相同判断③。

曾伯霥簠④（图 2.3－14，3），过去学者对其年代的意见分歧较大⑤，李学勤认为在春秋早期⑥，刘彬徽认为属春秋早期中段⑦，马承源在不同的著述中则有不

1

2



3

图 2.3－14　春秋早期传世曾国青铜器

1. 曾孟嬭谏盆　2. 曾孙史夷簠（《夏商周·东周上》557）　3. 曾伯霥簠（《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捐赠文物集粹》图 17）

① 曾昭岷等：《曾国和曾国铜器综考》，《江汉考古》1980 年第 1 期。刘彬徽：《湖北出土两周金文国别年代考述》，《古文字研究》第 13 辑，中华书局，1986 年。

② 马承源：《商周青铜器纹饰综述》，上海博物馆青铜器研究组编《商周青铜器文饰》图 472，文物出版社，1984 年。

③ 陈佩芬：《夏商周青铜器研究·东周卷（上）》第 557 器，世纪出版集团等，2004 年。

④ 中国历史博物馆保管部：《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捐赠文物集粹》图 17，长城出版社，1999 年。

⑤ 近代学者的看法，参见屈万里：《曾伯霥簠考释》，《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三十三本，台北，1962 年。屈万里认为簠的年代在春秋早中期之间。

⑥ 李学勤：《戎生编钟铭文考释》，《保利藏金——保利艺术博物馆精品选》，岭南美术出版社，1999 年。

⑦ 宾晖：《金文试释二则》，一则关于曾伯霥簠，《江汉考古》1985 年第 1 期。又收录于刘彬徽：《早期文明与楚文化研究》第 158－161 页，岳麓书社，2001 年。

1 2

图 2.3－15 曾孟嬭谏盆与郭家庙 M8 匜纹饰比较

1. 曾孟嬭谏盆 2. 郭家庙 M8 匜

同的认识①。

造成上述诸器年代认识上的分歧意见，大体有两个方面的背景，一是春秋早期前后青铜器处于由周式体系向区域性过渡时期，当前学术界对其年代特征的认识仍不清晰；二是上述器物均饰有结构繁复的蟠螭纹，此类蟠螭纹及其变化的形态流行于春秋早期至春秋晚期，在作年代判断时容易相互混淆②。

从器形而言，上述器物中曾孟嬭谏盆与信阳平桥 M1：10 盆完全相同，相似圈足足径较小的簠见于新野小西关③、枝江百里洲④等地点。从纹饰而言，以上几件铜器均饰第三期相同的那种交体龙纹形成的蟠螭纹，例如曾孟嬭谏盆蟠螭纹与郭家庙 M8 匜相同（图 2.3－15），盆下腹蟠螭纹凸出龙目，类似装饰见于黄国伯遊父鑐、盘等器⑤。曾伯霥簠盖蟠螭纹与信阳平桥 M1：10 盆、黄国伯遊父鑐纹饰相同（图 2.3－16），曾孙史夷簠所饰蟠螭纹与光山宝相寺黄君孟夫妇墓 G2 壶、鼎等器纹饰相同（图 2.3－17）。因此，这些青铜器年代也都属于春秋早期偏晚阶段，其下限可能晚至春秋中期偏早。

---

① 马承源主编的《商周青铜器铭文选·第四卷》以及《商周青铜器文饰》图 471 中均认为簠的年代在春秋早期。但他又认为“簠的形制、铭文和纹饰，在春秋初世出土青铜器中，找不到对照的例子，它的时代至少晚于春秋初世晋文侯在位之年。折壁直缘的簠出现于春秋中期，春秋早期无此形制，曾伯霥簠的年代置于春秋中期为宜”。见马承源：《戎生钟铭文的探讨》，《保利藏金——保利艺术博物馆精品选》，岭南美术出版社，1999 年。收入马承源：《中国青铜器研究》第 341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

② 陈佩芬《夏商周青铜器研究·东周卷（上）》中，不少被认为春秋晚期的青铜器实际上可能属于春秋早中期之间，如第 499 邾大宰簠、第 501 交龙纹簠、第 506 交龙纹盆、第 507 变形兽纹盆等。

③ 郑杰祥：《河南新野发现的曾国铜器》，《文物》1973 年第 5 期。

④ 湖北省博物馆：《湖北枝江百里洲发现春秋铜器》，《文物》1972 年第 3 期。

⑤ 周亚：《伯遊父诸器刍议》，《上海博物馆馆刊》第十期，上海书画出版社，2005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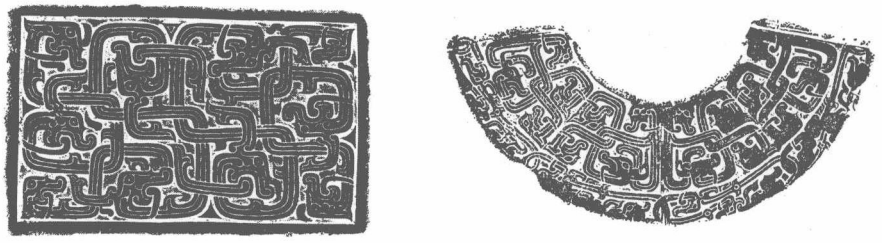


图 2.3－16　曾伯霥簠与信阳平桥 M1：10 盆纹饰比较

1. 曾伯霥簠　2. 信阳平桥 M1：10 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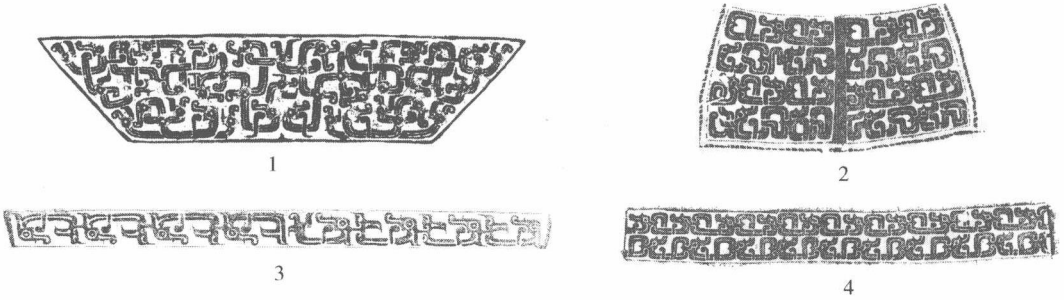


图 2.3－17　曾孙史夷簠与黄君孟夫妇墓铜器纹饰比较

1、3. 曾孙史夷簠　2. 光山宝相寺黄君孟夫妇墓 G2：A14 壶　4. 光山宝相寺黄君孟夫妇墓 G2：A2 鼎

根据我们对曾国青铜器的以上认识框架，兹列两周之际前后一些诸侯国重要的铜器群的年代认识，以便在研究曾国青铜器的过程中利用这些材料。

山东地区：莱阳前村己国墓葬①属于西周晚期。曲阜鲁故城乙组墓葬②中，M11、M20 属于西周晚期③，M30、M48 属于两周之际④。

虢国墓地⑤：M1602、M1819、M1810、M1820 属于西周晚期⑥，M1612 可能属于西

① 李步青：《山东莱阳县出土己国铜器》，《文物》1983 年第 9 期。

②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曲阜鲁国故城》，齐鲁书社，1982 年。该报告分期中将 M11、M48 等墓葬一概归入西周中期。

③ 李丰：《黄河流域西周墓葬出土青铜礼器的分期与年代》，《考古学报》1988 年第 4 期。

④ 李学勤认为其属于西周晚期，与我们的看法接近。参李学勤：《西周时期的诸侯国青铜器》，《新出青铜器研究》，文物出版社，1990 年。朱凤瀚对 M48 认识不一致，《古代中国青铜器》第 788 页认为属于春秋中期，第 789、883 页认为属于春秋早期中叶。朱凤瀚：《古代中国青铜器》，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 年。

⑤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上村岭虢国墓地》，科学出版社，1959 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三门峡虢国墓（第一卷）》，文物出版社，1999 年。

⑥ 学术界对于虢国墓地分期争议颇大，这里参考李丰：《虢国墓地铜器群的分期及其相关问题》，《考古》1988 年第 11 期。

周晚期①，M1052、M2001、M2012 属于两周之际。

应国墓地：北滍村 M1 年代在两周之际②。

郑国祭祀坑：年代在春秋早期偏晚或至春秋中期偏早阶段③。

（二）特征

根据分期及其年代的讨论，可归纳第一阶段青铜器各期特征如下：

第一期：铜器组合不甚规律，但鼎、簋的核心地位明确，有的组合在鼎、簋之外再加一套盘、匜的水器，鬲和鑐也较常见。70 熊家老湾出土有 4 件曾伯文簋以及提梁卣、鑐等，等级较高。除此铜器群之外，本期未见级别更高和组合更齐全的青铜器群。在器物形制方面，本期器腹较深，鼎足多较细而稍直。甗、盘的附耳弧曲，不见第二期那样附耳与器口连接的圆梗。本期尚不见附耳鼎，此后常见的重环纹鬲亦未见。立耳球腹鼎、弧腹鬲、带瓦纹簋、高圈足盘及短流匜为本期典型器物，这些器物形制与周原等西周中心区域青铜器基本相同，本期同时保留有一些西周中晚期流行的典型器类如桃花坡 M2 的倾垂腹弦纹鼎、72 熊家老湾盘等。纹饰中窃曲纹、重环纹、瓦纹等西周晚期流行的纹饰常见，72 熊家老湾和义地岗 M83 的高圈足盘等斜线三角及接近鸟纹的窃曲纹遗留有西周中晚期纹饰作风。不过，此类特征较早的器物和纹饰数量不多，显示出它们的过渡性特征。器物的圈足尚未以垂鳞纹为经常性的装饰。因此本期装饰重环纹的鼎、簋、匜较多，全瓦纹簋亦多见。

第二期：本期苏家垅、何家台两个青铜器群组合较齐全，据此可以推测当时级别较高的组合是鼎、簋、鬲、甗、圆壶（方壶）、盘、匜。鼎、簋仍然是基本组合形式，甗、壶则只见于级别较高的墓葬之中。本期包括的曾国青铜器批次较多，苏家垅同出九鼎七簋，郭家庙墓地 M21、M17 发现带有墓道墓葬，这些应当是国君、夫人一级的墓葬，体现出当时曾国正值繁盛阶段。器物形制与第一期相比，早期遗型作风几乎不见，上期常见的立耳弧腹鼎也少见。本期器腹部趋浅，器体趋宽，鼎、甗、盘等附耳较为方折，耳与器口均有圆梗连接，器足较为粗大弯曲。这些器物造型一致而略显单调，如鼎多作附耳宽腹窃曲纹、鬲皆为折肩饰重环纹、壶作长颈圆腹，簋、盘等圈足器多加有小足。本期窃曲纹、重环纹、瓦纹继续作为主流装饰，龙纹开始有一定的数量。纹饰多由窃曲纹与其他纹饰形成组合。本期的多数器物特征在第一期已经出现，例如立耳鼎、瓦纹与窃曲纹以及重环纹组合的簋、重环纹鬲、方甗、附耳盘和扁足龙鋬匜。因此青铜器

① 此墓出土深腹鼎 1 件，浅腹云纹鼎 1 件，后者年代可能早至西周晚期。

②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平顶山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平顶山市北滍村两周墓地一号墓发掘简报》，《华夏考古》1988 年第 1 期。

③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郑郑国祭祀遗址》，大象出版社，2006 年。该报告未对祭祀坑青铜器年代作具体界定。

一些特征特别是簋、匜等接近西周晚期周原地区青铜器，说明这些器物变化轨迹较为缓慢。一些带有曾国特色的形制在本期开始多见，如 B 型附耳宽体的窃曲纹鼎、折平沿折肩重环纹鬲和壶的莲瓣形装饰等。本期也见有曾国青铜器独有的形制，如环带纹的曾中斿父方壶、环带纹盉。在这些新风格中，某些因素在曾国青铜器中较其他区域更为流行，如 B 型鼎、折肩重环纹鬲等。这些因素大多脱胎于周原地区西周青铜器，但似乎已经形成曾国自身一些偏好——如果它们还不能称之为特点的话。

第三期：本期遗存发现不多，也未见级别较高的墓葬。因为各种原因，其组合关系比较残缺。从周家岗墓葬看，本期的铜礼器组合仍然是以鼎、鬲、簋、盘、匜为主体。大部分器类及其形制仍然是沿袭上一阶段，例如附耳窃曲纹鼎、簋、鬲、盘、匜等，这其中有些是对较早时期器物的继续使用，如曾太保簋、幻伯隹方壶等，它们均早于所属墓葬年代。同时，一些在第一、二期可见的器形如立耳球腹鼎、方甗消失。瓦纹簋和重环纹鬲虽然仍然在组合中出现，但它们都是早期器物沿用至本期。可见，西周晚期铜器的传统作风至这一时期已经有了较大的改变。本期新出现有其后在楚文化青铜体系中占重要地位的平底束腰鼎，簋衰退后，簠的数量在本期特别是较晚时期较多出现，如传世品曾子尿簠、曾伯霥簠、曾孙史夷簠等。器物造型多以浅腹、扁体见长。纹饰常见双首曲身龙构成的蟠螭纹，结构较细密的交体龙纹的出现反映了本期年代较晚的特征。窃曲纹和垂鳞纹等纹样仍然较多见，但形制已发生一些变化，DⅢ窃曲纹成为本期的典型式样。重环纹则已基本不见。

总括第一大阶段曾国青铜礼器特征，其器物组合以鼎、簋为核心，或加有鬲、圆壶，盘与匜常常搭配使用，常见鼎、鬲、簋、壶、盘、匜的组合形式，鼎多为奇数，而簋、壶多作偶数，这些与西周晚期周原等周文化中心区域青铜器的情况是一致的，如京山苏家垅出土鼎 9、鬲 9、方甗 1、簋 7、方壶 2、豆 2、盉 1、盘 1、匜 1，除七簋之数比较特别之外，与虢国墓地 M2001 虢季墓①组合类别大体相似。本阶段鼎立耳与附耳俱见，两类鼎各有较为固定的造型。簋的数量较多，但基本都是敛口带盖的瓦纹簋，其风格一致。鬲多为形制相同的重环纹折肩鬲，器形单调。这类单调的作风也贯穿于第一大阶段其他类别青铜器之中。在装饰上，窃曲纹、环带纹、重环纹、垂鳞纹几种纹饰反复出现，并相互搭配形成组合。总的看来，第一大阶段曾国青铜器的器物、纹饰基本都可以在周原以及与周王朝近缘的诸侯国中找到相似物，青铜器总的特征与相应时期典型的周文化青铜器特征相同。

二　第二阶段

（一）相关楚系青铜器的年代

①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三门峡虢国墓（第一卷）》，文物出版社，1999 年。

第二阶段曾国青铜器的年代，由曾侯乙墓可建立一个明确的标点。曾侯乙墓出土的楚王酓章镈钟有“唯王五十又六祀，返自西阳”之语，钟的纪年“五十又六祀”可明确为楚惠王五十六年即公元前433年，则曾侯乙墓的下葬年代在该年或稍晚，曾侯乙墓属于战国早期阶段确定无疑①。而在曾侯乙墓之前至第一阶段之间的青铜器年代，则有赖于在地域和特征上都大体相近的下寺楚墓铜器群②和其他一些年代关系清晰的楚墓。比如，下寺M2年代大约在公元前488年，属于春秋晚期偏早阶段也是确切的。此外，淅川和尚岭和徐家岭楚墓③的青铜器材料填补了过去战国早期前后楚墓材料的不足，这些材料对于比较研究相关时期曾国青铜器亦有重要价值。

目前，学术界对于楚系墓葬的年代框架已有比较成熟的认识。但是，对于上述与曾国青铜器相关的一些楚国或楚系墓葬的年代，在一些发掘报告和论述中，仍然存在着细节上认识的不同。因此，在明确曾国青铜器之前，这里有必要对下寺、和尚岭、徐家岭等楚墓以及相关的楚墓或青铜器的年代作一简要的清理。

《淅川下寺春秋楚墓》报告将其墓葬作如下分期和年代的划分：

第一期：M7、M8、M36，春秋中期偏晚阶段；

第二期：M1、M2、M4，春秋晚期偏早阶段；

第三期：M10、M11，春秋晚期偏晚阶段。

大体来说，下寺楚墓这一年代体系是建立在两个要点之上：一是M2墓主邬子倗或王子午见于史籍④，可确定其年代在春秋晚期偏早阶段；二是M10、M11两墓青铜器特征与寿县蔡侯墓⑤相同，蔡侯墓年代在春秋晚期偏晚阶段。因此这两期墓葬的年代是可靠的，学术界亦基本无分歧意见。

需要讨论的是第一期墓葬的年代。下寺楚墓发掘报告将第一期的M7、M8和M36都视为同一时期即春秋中期偏晚，失之粗略。现在看来，M7、M8青铜器饰粗体的蟠螭纹或变形蟠螭纹，而M36青铜器均饰细密的蟠虺纹；M36簠圈足径接近口径，较M7、M8明显有晚的特征，这几座墓葬其他青铜器也表现出类似特性。因此学者多认为M7、

① 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第461页，文物出版社，1989年。

②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淅川下寺春秋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

③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淅川和尚岭与徐家岭楚墓》，大象出版社，2004年。

④ M2墓主是邬子倗或王子午，尚有不同说法，但不影响墓葬年代在春秋晚期偏早的结论。邬子倗之说以为M2下葬年代在前488年，见李零：《“楚叔之孙倗”究竟是谁——楚淅川下寺二号墓之墓主和年代问题的讨论》，《中原文物》1981年第4期。收入《出山与入塞》，文物出版社，2004年。此说基本为学术界认同，如陈伟：《淅川下寺二号墓及其相关问题》，《江汉考古》1983年第1期。王子午之说以为M2下葬年代在前552年，如下寺发掘报告。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淅川下寺春秋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

⑤ 安徽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安徽省博物馆：《寿县蔡侯墓出土遗物》，科学出版社，1956年。

M8 的年代早于 M36①。但是，M7、M8 与 M36 的年代如何归属，仍然有不同意见。刘彬徽将两组墓葬年代分别定为春秋中期、春秋中期偏晚②，而李零认为 M7、M8 的年代在春秋中期偏晚阶段③。如果回顾我们在判断第一阶段第三期青铜器年代所参照的黄君孟夫妇墓等一批春秋早中期之际前后的墓葬，可以从青铜器纹饰演变的角度排出这样的系列：黄君孟夫妇墓→M7、M8→M36，这三组墓葬年代关系紧密，黄君孟夫妇墓纹饰特征与 M7、M8 已经极为接近，彼此之间年代相隔不远。因此，将 M7 和 M8 的年代订在春秋中期或偏晚、M36 的年代订在春秋中晚期之际是合适的。

属于春秋中期偏晚阶段较典型的楚墓还有当阳金家山 M9④，其青铜鼎特征与下寺 M36 鼎完全相同。

与下寺 M7、M8 年代相同的楚系青铜器还有湖北江陵岳山青铜器⑤。这批青铜器是否属于楚国有不同意见⑥，一般认为其年代在春秋中期⑦，但刘彬徽认为其盏、缶年代较晚，故该认其为春秋晚期偏早⑧。按岳山盏作圆形捉手，器形特征早于当阳金家山 M9 盏，盥缶特征亦与下寺 M36：3 缶相同，因此这组青铜器的年代也应当在春秋中期偏晚。

《淅川和尚岭与徐家岭楚墓》报告将其几座重要墓葬年代作如下判断：

春秋晚期：和尚岭 M1、M2，徐家岭 M3、M9。

战国早期：徐家岭 M10。

按，报告上述年代判断均有误差。报告作者对墓葬年代的论证逻辑也有可商之处。例如该作者承认和尚岭 M1 一些铜器特征与属于春秋晚期偏晚的下寺 M10、M11 相同，但仍然将活动年代在春秋中期的克黄视为墓主，最后结论却是墓葬年代在春秋晚期偏早阶段。

已有学者指出⑨，和尚岭 M1 的年代在春秋晚期偏晚，M2 的年代在战国早期偏早。这无疑是正确的。和尚岭 M1 除了近似下寺 M10、M11 的特征之外，两件卷云纹鼎有中

---

① 李零：《再论淅川下寺楚墓》，《文物》1996 年第 1 期。刘彬徽：《楚系青铜器研究》第二章，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 年。

② 刘彬徽：《楚系青铜器研究》第二章，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 年。

③ 李零：《再论淅川下寺楚墓》，《出山与入塞》，文物出版社，2004 年。李零认为 M7、M8 年代接近新郑李家楼大墓，但他并未对 M36 的年代归属作具体判断。

④ 湖北宜昌地区博物馆等：《当阳赵家湖楚墓》，文物出版社，1992 年。

⑤ 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岳山大队出土一批春秋青铜器》，《文物》1982 年第 10 期。

⑥ 王光镐：《楚史源流新证》第 262 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 年。

⑦ 刘彬徽：《楚国青铜礼器初步研究》，《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5 年。

⑧ 刘彬徽：《楚系青铜器研究》第 70 页，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 年。

⑨ 高成林：《淅川和尚岭楚墓的年代问题》，《中原文物》1996 年第 4 期。

原铜鼎的因素，在这类地纹填以三角云纹的深腹矮足鼎中，主体纹饰以曲线构图的鼎一概不早于春秋晚期流行的蟠螭纹构图的鼎（《全集》8－22）。和尚岭 M2 出土多件平底直足鼎，这种鼎与春秋晚期流行、形如下寺 M10、M11 的那种圜底曲足鼎风格不同，相似形制的鼎最早才在战国早期如曾侯乙墓中出现（图 2.3－18）。和尚岭 M2 出土的两件图像纹壶出现铺首，亦晚于春秋晚期环纽的镶嵌龙纹壶，而多见于战国早期（如《全集》7－141）。M2 这些特征还接近于襄阳蔡坡 M4①，其年代在战国早期是可确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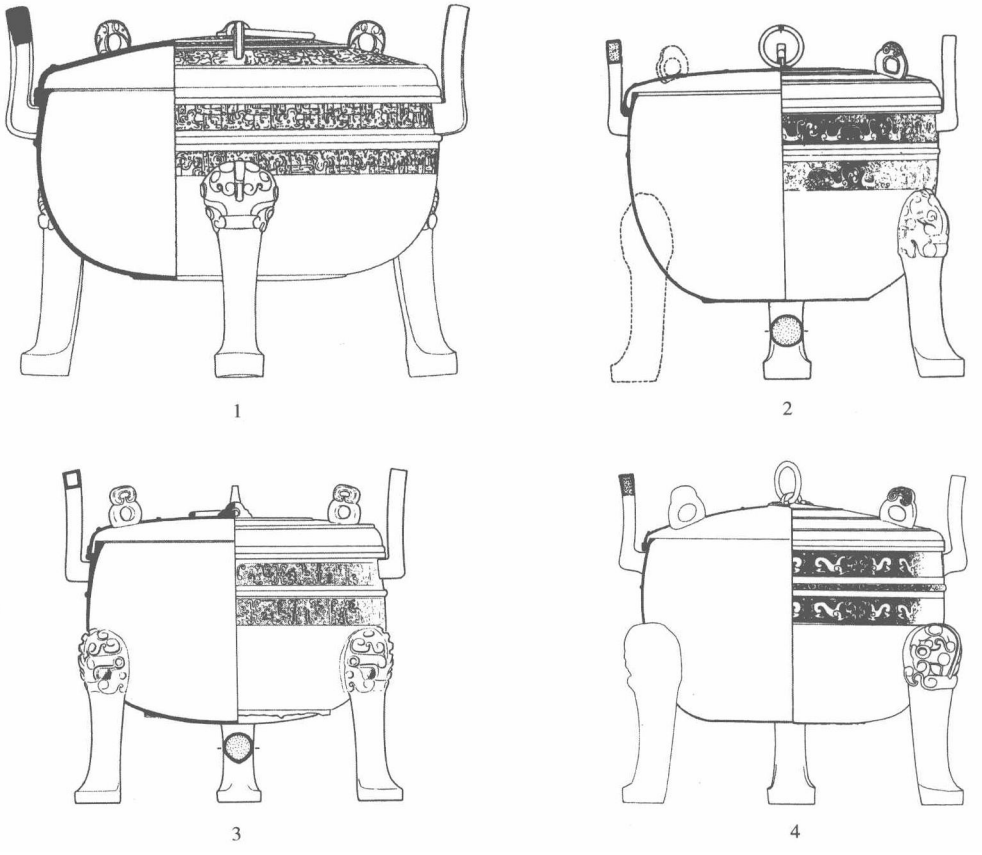


图 2.3－18 曾侯乙墓与和尚岭、徐家岭墓地盖鼎比较

1. 曾侯乙墓 C102 2. 和尚岭 M2：29 3. 徐家岭 M3：39 4. 徐家岭 M9：21

徐家岭 M3、M9 鼎形制特征与和尚岭 M2 相同，年代基本一致（图 2.3－18）。徐家岭 M9 出土的铜兽镶嵌龙纹，与曾侯乙墓常见的镶嵌龙纹构图完全一致。在和尚岭

① 湖北省博物馆：《襄阳蔡坡战国墓发掘报告》，《江汉考古》1985 年第 1 期。

M2、徐家岭 M3、M9 这几座战国早期墓葬中徐家岭 M9 年代稍晚，可能接近偏晚阶段。另外，和尚岭 M2、徐家岭 M3、M9 都出土有伽子受之器，目前还难以判断伽子受是哪一座墓葬的墓主、抑或都不是这些墓葬的墓主。但伽子受器年代多偏早，大约在战国早期偏早的阶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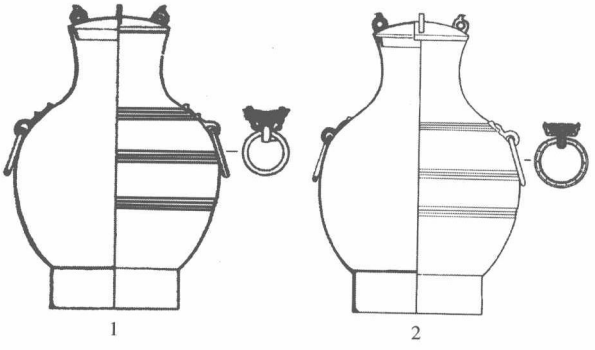


图 2.3－19　擂鼓墩 M2 圆壶与徐家岭 M10 圆壶比较

1. 擂鼓墩 M2　2. 徐家岭 M10：72

徐家岭 M10 镬鼎、兽纽盖鼎特征与天星观 M2 鼎[①]接近，出土的铺首圆腹壶圈足较高、圆腹最大径在上部[②]，形制与擂鼓墩 M2 圆壶相同（图 2.3－19）。M10 青铜器这些特征均不能早至战国早期。但 M10 青铜器与天星观 M2、包山、望山等战国中期偏晚阶段楚墓相应器类仍然有一定区别，其年代应当在战国中期偏早阶段。徐家岭 M1 年代特征与 M10 相同，也属于同一时期。

综前所述，我们对相关楚系墓葬的年代认识如下：

春秋中期（或偏晚）：下寺 M7、M8

春秋中晚期：下寺 M36、金家山 M9、岳山青铜器

春秋晚期：下寺 M1－M4

春秋战国之际：下寺 M10、M11、和尚岭 M1、寿县蔡侯墓

战国早期（偏晚）：和尚岭 M2、徐家岭 M3、M9

战国中期偏早：徐家岭 M1、M10、蔡坡 M4

这些是我们讨论曾国青铜器年代和其他问题的基本认识。

（二）第二阶段曾国青铜器的年代

第一期：

此期各组青铜器彼此之间器类多有不同，需要分别讨论。

80 刘家崖升鼎、圆壶缺乏可对比器形。圆壶器形接近上阶段周家岗圆壶，但 80 刘家崖壶颈部所饰的三角形云纹不见于上一阶段，这种纹饰出现在春秋中期器如下寺 M8：8盖鼎、M7：3 盥缶中。

---

① 湖北省荆州博物馆：《荆州天星观二号楚墓》，文物出版社，2003 年。

② 高崇文：《两周时期铜壶的形态学研究》，俞伟超主编《考古类型学的理论与实践》，文物出版社，1989 年。

季氏梁墓葬青铜器中包含有较早形制，年代特征较晚者有平盖鼎和云纹甗。平盖鼎饰蟠虺纹，器形特征与下寺 M7：6 平盖鼎完全相同（参见图 4.1－2，2），云纹甗则与辉县乙墓甗（Z 乙－10）形制、风格相同①。辉县甲乙二墓年代在学术界有较大分歧②，但乙墓年代早于甲墓，笔者认为其在春秋中期，略晚于属于春秋中期偏早阶段的新郑祭祀坑青铜器年代。

80 八角楼墓葬出土鼎、盏。盖鼎与下寺 M8：8 鼎近似，唯后者器盖设横耳。盏深腹圜底，形制略晚于下寺 M7：8 盏，而与当阳金家山 M9：11 盏完全相同（参见图 4.1－1，4）。

罗山高庙器群多数铜器如附耳鼎、圆壶、盘年代特征较早，而簠、匜所代表的时代风格则较晚。高庙簠圈足径明显小于口径，形制与岳山簠相同，器表饰变形的蟠虺纹，纹饰构图与下寺 M8：8 鼎相同。匜器表光素，平面为桃形，平底，尾部带环纽。这种桃形的匜是第一阶段郭家庙 M8 匜形制的发展，其后在楚系青铜器中多见。

综合以上讨论，这一期曾国青铜器年代应当在春秋中期，其中 80 八角楼墓葬器组年代属于春秋中期偏晚阶段。

第二期：

75 刘家崖升鼎与和尚岭 M1 克黄升鼎近似（参见图 4.1－8，2），而连迁盖鼎以及 76 义地岗放鼎形制接近下寺 M1：58 鼎。放鼎的年代特征较复杂，鼎盖捉手为特征较早的圆盖形，而三足曲而较长，大体接近下期鼎的深腹高足。76 义地岗放盏盖顶为四纽取代捉手，形制与宜城骆家山盏完全相同③。

属于本期的随州鲢鱼嘴曾子原彝簠和曾孙无谌鼎分别与下寺 M4：1 簠、M4：5 鼎相同。

本期年代在春秋晚期偏早阶段，其中 76 义地岗放器年代略晚。

第三期：

本期四座墓葬随葬品的特征以及时代风格比较一致。盖鼎均作深腹曲足，器形特征与下寺 M10：48 鼎相同，簠的形制如扁体、简式的双耳等均较特殊，但其蟠虺纹特征与下寺 M10：44 簠仍然相同（图 2.3－20）。因此本期年代在春秋晚期偏晚。东风油库 M3 出土铜盘为悬环，略晚于东风油库 M1、M2 附耳盘，该墓出曾侯郧鼎，其年代或可晚至春战之际甚至战国早期。

应当说明的是，曾侯郧可能为曾侯乙的父辈，年代属于战国早期。将曾侯郧鼎、簠

① 河南博物院等：《辉县琉璃阁甲乙二墓》第 212 页，大象出版社，2003 年。

② 琉璃阁大墓年代有不同说法，参见李琴、杨式昭：《辉县甲乙二墓出土青铜器》，河南博物院等《辉县琉璃阁甲乙二墓》论述二，大象出版社，2003 年。

③ 张吟午、李福新：《湖北宜城骆家山一号墓出土的青铜器》，《江汉考古》1983 年第 1 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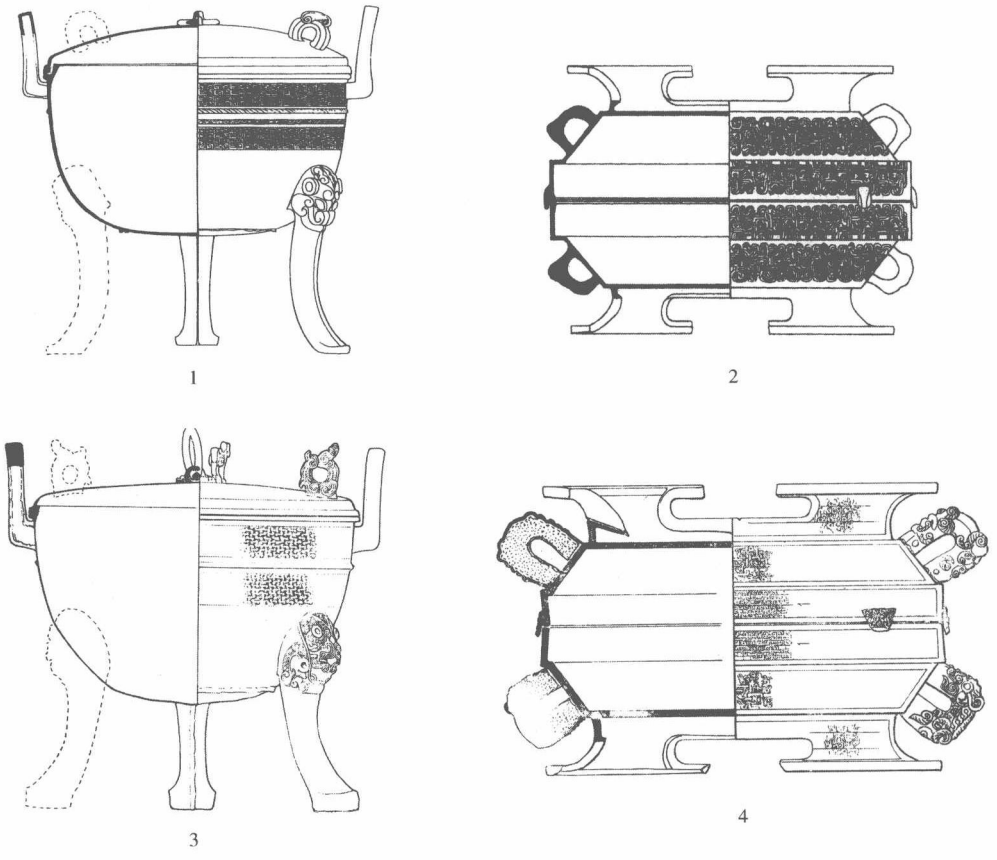


图 2.3－20　东风油库 M1 与下寺 M10 鼎、簠对比

1、2. 东风油库 M1 鼎、簠　3、4. 下寺 M10 鼎、簠

归入第三期，是基于该鼎、簠形制特征所作的类型学推断。

第四期：

如前所述，曾侯乙墓因为有文字材料可供推断，年代在公元前 433 年或稍晚，明确属于战国早期阶段。

第五期：

擂鼓墩 M2 年代亦无争议，属于战国中期偏早阶段，这一点刘彬徽已有论述①。此外，从铜器群的发展关系看，M2 青铜器与曾侯乙墓青铜器有十分近缘的关系，M2 盖鼎、甗、绳纹鬲、方尊缶、盥缶、小口鼎等器类与曾侯乙墓相应器类极为接近，M2 龙

① 刘彬徽：《随州擂鼓墩二号墓青铜器初论》，《文物》1985 年第 1 期。又收录于《早期文明与楚文化研究》第 112－114 页，岳麓书社，2001 年。

纹结构明显有承袭曾侯乙墓镶嵌龙纹的关系，这些说明两座墓葬年代相去不远。另一方面，M2 青铜器出现了铺首圆壶，一些器物的器形如升鼎、簠等有明显的变化，纹饰带乳突的蟠虺纹结构抽象化，这些特征接近战国中期偏晚阶段的天星观 M2 等墓葬青铜器。

（三）第二阶段曾国青铜器的特征

第一期：虽然组合信息受到盗扰等影响，但仍然可以看出本期的四群材料所形成的各不相同的组合形式：80 刘家崖出有升鼎，其级别较高，鼎、鬲、簋、圆壶的组合仍然保持了上一阶段的基本特征；而季氏梁墓葬、罗山高庙则是鼎、簠结合，体现了东周时期的主流组合形式。八角楼墓葬随葬鼎、盏各一，并伴有陶器，应是代表了较低级别贵族身份。总的来看，鼎、簠（或盏）是本期的基本器物组合，这种组合也是春秋中期及其后楚系青铜器的典型。本期器类上新出现深腹盖鼎和盏，平底鼎则可明确其作为升鼎的性质。鼎的平盖和弧顶盖兼有，说明了盖鼎出现之初的情形。大体而言，鼎的形制已开始分化为两大类：一类为带盖深腹尖圜底的盖鼎，一类为浅腹平底敞口的升鼎，并且升鼎在此后的楚系青铜器中占有重要地位。和鼎不同，盏只见于与楚文化相关的区域，其形制特点突出。本期另外一个突出特征是上一阶段某些器类如鬲、簋、壶和盘、匜在本期继续使用。纹饰方面，由蟠螭纹抽象而来的蟠虺纹在本期最为流行，但也有如 80 刘家崖升鼎、圆壶那样沿用上一阶段环带纹。

第二期：本期遗存、材料均甚少。75 刘家崖 A 铜器群组合关系残破，难以观察其主体特征。不过三件升鼎成列，显示出较高的等级。76 义地岗只见鼎、盏，也可能如上期八角楼墓葬一样，是较低贵族的器用形式。器形上，鼎向深腹高足变化，遵从了楚式鼎的发展方向。本期纹饰多为蟠虺纹，这是蟠螭纹的另一种演变形式。

第三期：本期发现墓葬较多，青铜器风格表现颇为一致。本期铜器的基本组合仍然是鼎、簠，较高级别墓葬加有方壶（壶）、盘、匜。东风油库 M2 随葬铜鼎 1、簠 1、方壶 1、盘 1、匜 1，M1 亦见上述诸器，但多出甗 1 及兵器，身份略高于 M2，其墓主是职位为“曾少宰”的黄仲酉。汪家塄墓葬随葬鼎 1、簠 2，另见有铅方壶，墓主身份为曾都尹。本期鼎趋于高足深腹、簠圈足趋宽，进一步表明了曾器器形演变趋势与楚系青铜器同步。不过曾国青铜器中方壶的形制和光素的作风为其他楚系青铜器所不见。细密的蟠虺纹是本期基本纹样，它已经是这种抽象的龙纹发展到极致的形态。

第四期：除了曾侯乙墓之外，本期未见其他遗存出土成组青铜器，而仅有少量零散出土铜器。曾侯乙墓出土的鼎有 20 件，其中在食具箱内的两件盖鼎不应该是礼器。由鼎形成的组合大约是 9 升鼎配 8 方座簋以及鼎形器和小鬲各 9 件，5 件牛纽盖鼎配 4 簠，其他礼器主要有甗 1、大鬲 1、豆 2、圆壶 2（联禁）、尊缶 2、鉴缶 2、尊盘 1、盘 1、匜 1，觚形尊是颇为特殊的器类，可能是来自东南地区的影响。另外曾侯乙墓还发现以

65 件编钟为中心的乐器组合。值得注意的是这是迄今所见先秦时期件数最多的一套编钟，但在此前曾国高级别墓葬中却少见真正意义上的编钟。器形方面，变化主要体现在鼎由前期的深腹曲足发展至本期的浅腹直足。由于等级较高的原因，曾侯乙墓纹饰多使用镶嵌手法，纹饰繁缛复杂。我们也因此对这一时期曾国一般贵族青铜器的情形缺乏了解。

第五期：本期除擂鼓墩 M2 之外亦未见其他成组青铜器。M2 出土的一套 36 件编钟，在迄今所见商周青铜编钟中单套规模上仅次于曾侯乙墓编钟。该墓青铜礼器组合也与曾侯乙墓近似，同为 9 升鼎 8 方座簋 9 鬲配置，但与 4 簠组合的似乎是 6 件牛纽盖鼎，其他器类有甗 1、大鬲 1、方壶 2、盥缶 2、豆 2、盘 1、匜 1 等。不过，可能因为国势的变化，无论是编钟的规模抑或是青铜礼器的品质，M2 都与曾侯乙墓相去甚远。本期器物形制表现出与上期紧密的关系而略有变化，升鼎、盖鼎腹部趋浅，器耳外曲。

较之第一大阶段，第二大阶段主要变化发生在器物组合和基本纹样方面。这一阶段青铜器的核心组合为鼎、簠。盖鼎鼎足趋高，虽然有第一、二期深腹和第三、四期浅腹扁体之别，但与楚式鼎相同的发展系列是清晰的。升鼎和簠的形制变化比较稳定：升鼎趋于扁宽而簠趋于方高。细密而抽象是第二阶段纹样的基本风格，在布局上呈单元格地拼合和重复，反映了这一阶段纹饰制作技术的变化。

第四节　戟与戈的年代系列

戟、戈[①]是曾国青铜兵器的主要类别。曾国青铜兵器中戈共见 102 件、戟 30 柄，它们主要出土于郭家庙墓地和曾侯乙墓两个地点，其他则为零星出现，并主要见于第一阶段第二期以后各器群，这些器物群往往伴出有其他青铜礼器。曾国戟、戈的较多出现，当然也是和当时其他国家一样，是东周时期纷争兵战社会背景的反映。正是因为如此，作为核心兵器的戟、戈又代表了当时曾国青铜文化的一个方面的水平。曾国的戟、戈多为曾侯等高级贵族所用，更说明了这一点。

在曾国青铜器分期一节，我们只是从青铜容器的角度观察曾国青铜器的阶段性发展。而戟、戈等青铜兵器在曾国具有什么样的特点，它们是否可能反映不同于青铜容器的文化特征，也是需要进行观察与分析的。另一方面，我们可以通过戟、戈的器形变化，定位一些曾侯的年代与早晚系列，比如 82 曹门湾曾侯絆伯戈属于采集品，曾侯絆伯的年代只有依靠戈的年代定位。又如，曾侯乙墓出土青铜器包括有曾侯郕、曾侯遻和

① 文中所谓戟、戈均指其前端青铜部分及戈头和戟头，而未包括柲杆等部分。

曾侯乙三代曾侯，除了作为墓主的曾侯乙可明确相对最晚之外，曾侯郕与曾侯遇孰早孰晚，戟的变化是一个重要的观察途径。

必须说明的是，对戟、戈进行类型学排比所列出戈戟和器主的年代只是相对的。这是因为在较小的年代范围内——比如从曾侯郕到曾侯遇或相反——排列某类甚至是某群器的相对早晚往往很困难。同时，戈与戟的形制变化更为复杂，不同功能或者相同功能的戈戟形制和发展系列都可能有所变化，我们所见的材料可能即处于这种不同系列之中。因此，仅据戈戟排列得出器主的年代有一定的局限性，考虑到这种情况，我们还会从其他角度再对这些器主年代进行分析。

周代戟、戈发展颇为复杂，特别是在春秋中期后不同区域戈戟发展表现出不同的体系。在楚系文化区域，过去只有金则恭对湖南地区东周戈进行过年代分期①。因此就楚文化戈戟的一般发展而言，目前尚无可靠的结论性意见可在讨论曾国戈戟时作参考。在曾侯乙墓发掘报告中，报告者按照三戈带刺戟、三戈戟、二戈戟的装配方式，将戟分为三式。但这样的分类显然并不能反映戟的形制在时间上的演变关系。日本学者吉开将人曾经对曾侯乙墓出土戈戟进行了专门的研究②，并且根据戟的年代早晚推断出曾侯遇早于曾侯郕的结论。但是，他的主要依据是认为戈与戟锋的演变是由长到短，就我们的观察，这一看法还存在较大的问题。另外，他以戈戟的内部是否有云状纹饰作为判断戈早晚的依据、将戟是否有内部作不同的分类标准、特别是将戈与戟放在同一系列进行演变分析等等作法，也都值得讨论。比如说，曾国的戟和楚式戟一样，一般是以多戈组成，一柄戟一般是由一有内戈和一件或两件无内戈组成，因此同一戟之不同戈，无论是否有内，形制和演变往往相同。因此如果观察戟的发展，在方法上将一枝戟上的不同戈拆开讨论，并无太大意义。

曾国的戈戟以戈延续时间较长，器形颇为复杂。以下先讨论较为明确的戟。

一 戟

戟早在中商时期即已出现。但戟的形制，在历史文献的记载中常常混同于戈③。因此戟与戈的分别，早年尚在讨论之中④，至曾侯乙墓出土大批带自铭的戟，“有枝兵”

① 金则恭：《湖南东周时期铜戈的分期及有关问题》，《湖南考古辑刊》第2辑，1984年。

② 吉開将人：《曾侯乙墓出土戟、戈的研究》，《東京大学文学部考古学研究室研究紀要》第12号，东京，1994年。

③ 相关评述见杨泓：《中国古代的戟》，《中国古兵器论丛》（增订本）第164页，文物出版社，1986年。

④ 郭沫若：《说戟》，《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科学出版社，1961年。

的特征才明确下来①。戟的形制在西周与东周之间变化颇大②，而春秋晚期之后才是戟的真正大的发展时期。在北方的三晋地区，战国时期的戟无论是数量还是类别都颇为丰富。相对而言，曾国所依从的楚文化体系，戟的发现数量较为有限。因此过去对楚系戟的演变关系缺乏研究，也未见根据戟的形制演变关系来排列墓葬或器主年代早晚的研究案例。

不过，近年新的考古发现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曙光。相当数量的楚系戟被发现在不同年代的墓葬中，可以使我们较为简便地观察该文化系统戟的形制变化规律。目前所知楚系戟在年代上主要集中在战国早期及前后，除了曾侯乙墓之外，年代明确较早的如淅川下寺 M11③、安徽舒城九里墩春秋墓戟④。近年发现的淅川徐家岭 M3、M9、M10 等几座年代较晚的墓葬又出土有较多的戟⑤，其中徐家岭 M3：80、31 戟器主为佻子受。在《青铜器的分期》一节中我们已经指出佻子受器年代约在战国早期偏早，徐家岭 M9、M10 年代则分别相当于曾侯乙墓及稍晚。这样，由春秋晚期到战国中期不同时期墓葬出土的戟，形成几组可靠的年代关系，大体可反映出楚系铜戟的发展。九里墩出土的戟锋与援之间过渡接近弧折，这一特点也见于春秋中晚期曾国戈，应当是较早的年代特征。下寺 M11 戟援部窄长，锋与援的过渡变得较缓和，其特征接近曾侯乙戟。不过，徐家岭 M3 佻子受戟仍然有接近九里墩戟的特征，大约说明其包含有较早的特性。徐家岭 M9 戟在锋与援的过渡上也较平缓，而援明显长而窄。徐家岭 M10 出土的玄镠戟，其形制与徐家岭 M9 相同。这样，我们基本可掌握楚式戟的主要变化是援趋于窄而长、锋与援之间过渡趋于平缓（图 2.4－1，4－6）。楚系戟这样的演变趋势也应可成为曾侯戟排序的参照。

曾国的戟目前只见于曾侯乙墓，共 30 柄，铭有器主的多是曾侯郕、曾侯遇和曾侯乙。这是三位曾侯唯一共生的同类器，因此，戟是判定这一组曾侯年代早晚最直接的依据之一。这需要对战国早期前后这一较短的时间段曾国戟的演变作审慎的观察。

观察曾侯乙墓报告发表戟的图像，曾侯乙所作的有铭戟均为四穿，锋与援之间过渡平滑，它们当是代表曾侯乙墓年代的较晚的标本。曾侯乙墓出土的其他部分戟亦有接近九里墩和徐家岭 M3 佻子受戟特点，其年代可能较早。这种情况说明，这一时期曾国戟的变化与楚系戟基本相同。

基于以上认识，可将曾侯乙墓出土戟分为如下三式（图 2.4－1，1－3）：

---

① 郭德维：《戈戟之再辨》，《考古》1984 年第 12 期。

② 郭宝钧：《关于戟之演变》，郭沫若《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附录二，科学出版社，1961 年。

③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淅川下寺春秋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 年。报告中图 232，1－2 应当为一套戟，发掘报告误认为是戈。

④ 安徽省文物工作队：《安徽舒城九里墩春秋墓》，《考古学报》1982 年第 2 期。

⑤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淅川和尚岭与徐家岭楚墓》，大象出版社，2004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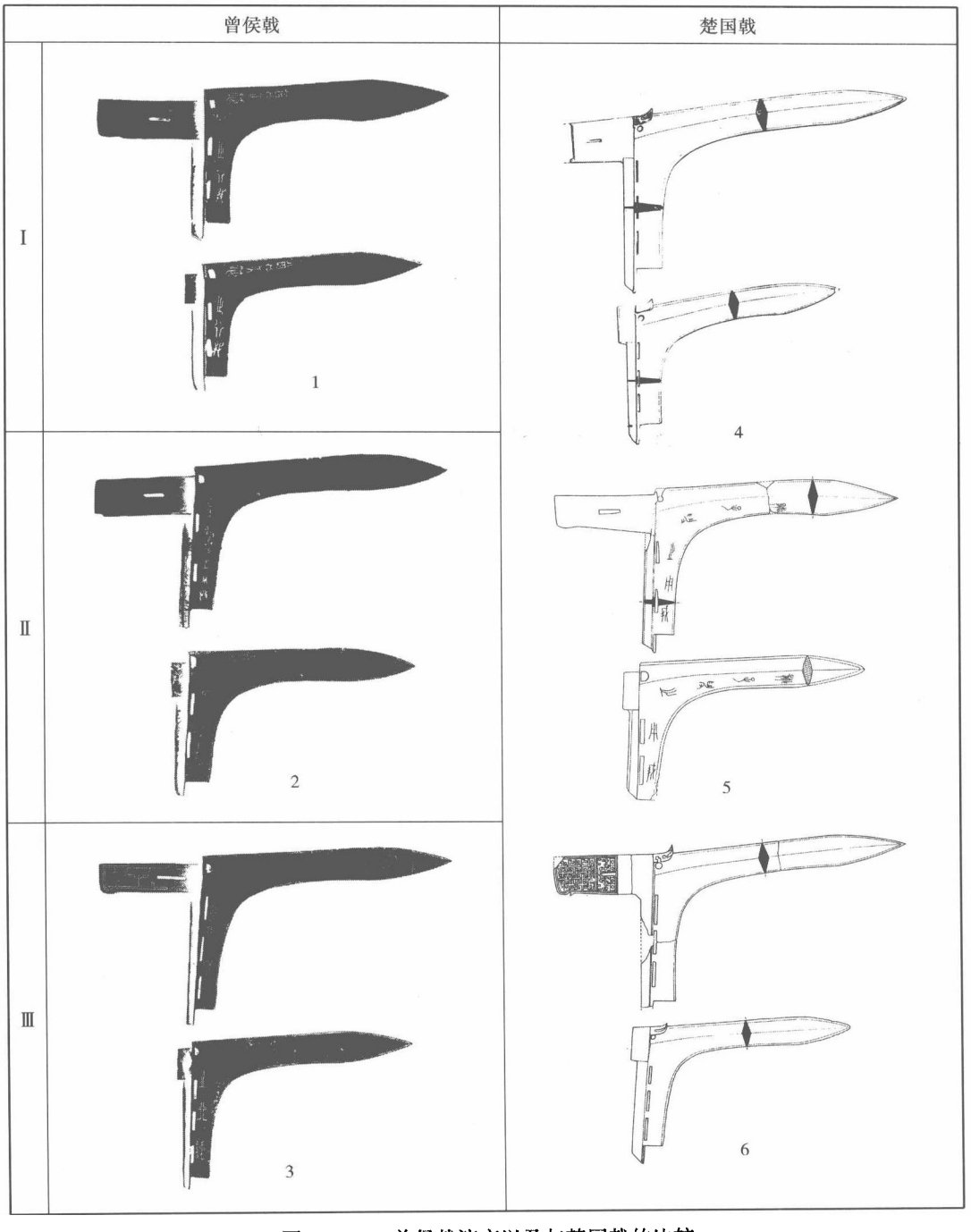


图 2.4－1　曾侯戟演变以及与楚国戟的比较

1. 曾侯郧之行戟 N. 130　2. 曾侯遇之用戟 N. 62　3. 曾侯郧之行戟 N. 184　4. 下寺 M11 戟　5. 徐家岭 M3：80、31 戟　6. 徐家岭 M9：156、73 戟

Ⅰ：三穿，锋与援结合处较宽，其间过渡弧折。如 N. 130 曾侯郕之行戟。

Ⅱ：三穿，锋与援结合处与援宽度大体接近，锋与援之间过渡较平滑。如 N. 62 曾侯遐之用戟。

Ⅲ：四穿，锋与援结合处与援宽度接近，锋与援之间过渡平滑。如 N. 184 曾侯郕之行戟。

按照这一型式变化，曾侯乙墓出土与曾侯郕、曾侯遐和曾侯乙相关的戟可统计如表 2. 4 - 1。

表 2. 4 - 1　　曾侯乙墓相关戟型式统计①

铭文	装配方式	总数	Ⅰ	Ⅱ	Ⅲ
曾侯遐之行戟	3	9	1	5	
曾侯遐之用戟	2	4		4	
曾侯郕之行戟	2	8	4		2
曾侯郕作	2	6			4
曾侯郕之戟	2	2			2
曾侯郕	2	3			1
曾侯乙之用戟	3	3			3
曾侯乙之用戟（鸟书）	3	3			3
无铭戟	3				6

根据列表所示，有铭的曾侯戟中的“行戟”、“用戟”等自铭的区别与年代关系无关，戟头的装配方式也无早晚的不同变化。而式别的演变在三代曾侯中变化比较明显：曾侯遐不见较晚的Ⅲ式戟而有Ⅰ、Ⅱ式戟，曾侯乙只使用较晚的Ⅲ式戟，而曾侯郕既有较早的Ⅰ式戟，又以Ⅲ式戟为主，这说明其较晚的年代背景。这样，戟的形态变化较清楚地反映的这三代曾侯的年代顺序：

曾侯遐→曾侯郕→曾侯乙。

曾侯乙墓出土的戟援与胡之间的夹角一般在 96°左右②，这与该墓出土的戈情况近似。不过戟均为长柲的车骑兵器，整戟的通长多在 310 - 340 厘米之间，戟的戈头相应的在援部较一般戈更长。曾侯乙墓出土戟中曾侯遐戟援部略短，其上部戈援长多在15 -

① 表中戟的装配方式依照发掘报告对戟的复原，装配方式的 2、3 是指该戟戈头的数量。总数和各式的数据是指戈头的数量，其中式别的数据统计是根据发掘报告发表的图像统计，并非是各位曾侯戟的总数。

② 不少学者认为戈戟的形制变化主要在援与胡的夹角趋大，但这一变化在较短的时间段内并不明显。

17 厘米。曾侯遇和曾侯乙戟援部较长，其上部戈援的长度多在 17.5 - 20 厘米之间①。在楚系戟之中，年代较曾侯乙墓略晚的徐家岭 M10 出土的戟②，援长多超过 20 厘米。徐家岭 M10 戟援与胡之间的夹角一般在 100°左右，体现了较晚的特征。相同的时代变化，也再次说明了曾、楚两国戟在战国早期前后较为一致的特征（图 2.4 - 1，4 - 6）③。

不过曾、楚两个铜戟可能也存在一些差别。下寺 M11 戟援部窄长，显示出较进步的特征，或说明这种戟在楚国出现较早。徐家岭 M9 戟援、胡部均窄长，援部逐步收分到锋，形制较曾侯乙墓Ⅲ式戟更为窄长。此外，徐家岭 M10 的戟均为三穿，又与楚国此前戟四穿不同。楚国戟演变这种复杂性警示我们，在不长的时间段之内判断器主年代关系仅仅依据戟形制的演变，依据尚不充分，还需要其他方面的证据支持。

如同青铜礼器一样，春秋晚期及其后戟的形制也有其地域性④。如上所述曾侯乙墓以及下寺地区出土的戟，戟一般均为多戈组装，或加以刺矛，形制以较平直的窄长援为突出特征，这些形成了南方的楚系戟的特性。但在战国中晚期如江陵天星观 M1 出土的戟⑤，又体现出楚式戟与中原系统的戟融合的特性。

二 戈

戈是中国青铜时代最早出现的兵器之一，其数量巨大而器形相对较简单，因此戈在早期的发展只可窥知大体的轮廓。因为社会环境的变化，春秋及以后时期戈的数量大增，形制相对比较复杂多变，其形制的变化除了反映年代的早晚之外，还可能与功能不同相关。在楚文化系统，戈同样有较大的数量，但其发展系列也不十分清晰。

曾国有若干属于曾侯等高级贵族使用的青铜戈，或零星出土，如 82 曹门湾出土的曾侯緐伯戈（图 2.4 - 3，B 型戈 2），或有伴出遗物但年代关系不一者，如鲢鱼嘴出土的曾仲之孙戈（图 2.4 - 2，1）和梁家老坟 M11 出土的曾侯昃戈（图 2.4 - 2，2）。厘清这些重要铜器的年代及地位，只有依靠那些出土关系明确的曾国铜戈，理顺它们的形制变化规律。

曾国的戈有不少出土于墓葬之中，属于第一阶段的在郭家庙墓地的材料较为集中，共出土戈 26 件，其中墓主可能为曾侯的 M21 出土戈 16 件，根据第一阶段曾国青铜器的分期，该墓年代属于第二期的两周之际。第一阶段的戈还在 82 曹门湾（曾侯緐伯戈）、枣阳段营和随州黄土坡 M1 有出土。这些戈年代清楚的，有枣阳段营、黄土坡 M1

① 只有属于 I 式戟的曾侯遇之用戟上部戈援长小于 17 厘米。

②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淅川和尚岭与徐家岭楚墓》，大象出版社，2004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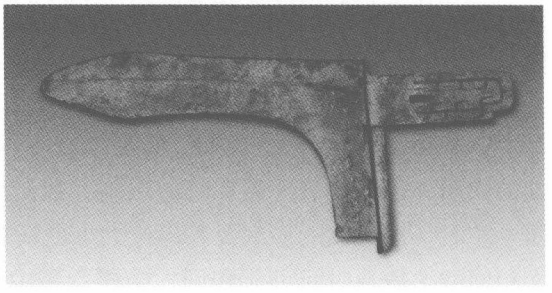
③ 图 2.4 - 1 中一些戟的图形作了水平翻转的处理，图 2.4 - 3 有关戈的图形亦如是。

④ 钟少异：《试论戟的几个问题》，《文物》1995 年第 11 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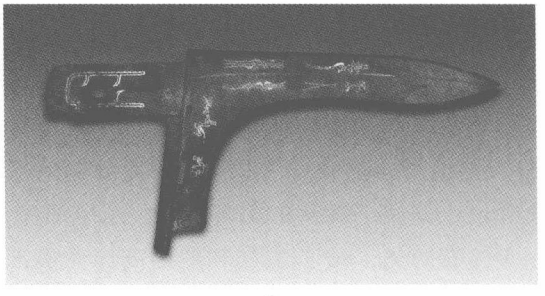
⑤ 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天星观 1 号楚墓》，《考古学报》1982 年第 1 期。

出土的戈，它们也都属于两周之际。

这一时期戈的形制，有一些仍然保持有西周中晚期中原周文化戈的形制，例如郭家庙 M22 出土的戈，或作长援短胡，带二穿或三穿，这种形制的戈在张家坡西周墓地多见①。不过，第一阶段曾国多数戈均作长胡，代表了当时戈的发展趋势，如郭家庙 M21 出土的戈，均为长援长胡，一般为三穿戈。郭家庙M21:18 戈甚至为四穿，可能暗示高级别戈特有的形制。以上长援戈一般通长在 24 厘米左右。除了长援之外，锋作较短的三角形，也是一个突出的时代风格。两周之际的虢国墓地 M2001 出土戈 15 件②，形制和时代风格与郭家庙 M21 上述戈是一致的。这种一致当是文化的共性所致。



1



2

图 2.4－2　曾仲之孙戈与曾侯昃戈

1. 鲢鱼嘴曾仲之孙戈　2. 梁家老坟 M11 曾侯昃戈

第二阶段曾国铜戈多见于曾侯乙墓，共出土 66 件。曾侯乙墓发掘报告将这些戈分为九式，但报告对这些式别的划分实际上只是为了说明戈的形制差异，对于它们的形制演变关系，我们需要重新分析。曾侯乙墓戈如计算包括柲杆及末端的镈，戈的总长度一般在 127－133 厘米，远短于戟的总长度，当时戈戟的主要分别应当在于步战或车骑战性质的不同。或因如此，曾侯乙墓中戈、戟的数量虽然都很多，但两类兵器的形制仍有相当大的差异。

曾侯乙墓戈中带铭文戈 48 件，除了 3 件作器者不明外，作器者明确的戈 45 件，他们分别是曾侯乙和曾侯郕，其自铭有别：

曾侯乙之走戈　35

曾侯乙之用戈　2

曾侯乙之寝戈　1

曾侯郕作時戈　5

曾侯郕之用戈　2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张家坡西周墓地》第 175－177 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 年。

②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三门峡虢国墓（第一卷）》第 79－85 页，文物出版社，1999 年。

上述诸戈形制接近，但不同铭文的戈在大小上略有分别。曾侯乙之寝戈通长仅14.3厘米，与其他戈的形制有较大差别，这种差别可能与其功能相关。曾侯乙之用戈通长23.6厘米，在曾侯乙墓出土戈中个体明显较大，不过，曾侯郕之用戈（通长20.5厘米）比曾侯郕作時戈（通长22厘米左右）个体却小一些，说明“用戈”并未必是指戈的性质，也不代表一类专门的形制。数量最多的曾侯乙之走戈绝大部分通长在21.5厘米左右，这类戈的形制及各部位大小也基本相同，表现出较强的规整性，说明这些铭文相同的戈铸造时间可能相同。曾侯乙墓中出土的个别的戈如E.121戈个体较大而形制不类，可能并非为曾国所生产①。无铭戈中多数通长不足21厘米，个体较曾侯乙之走戈还小一些。曾侯乙墓出土戈个体较小是该墓铜戈的一个显著特征，其中曾侯乙戈较曾侯郕戈也有趋短之势，这似乎也是战国早期戈的一个时代特征。

曾侯乙墓之外，其他属于第二阶段的戈还见于季氏梁墓葬、80刘家崖、东风油库M1、罗山高庙墓葬。依照青铜容器分期结果，季氏梁墓葬、80刘家崖墓葬和罗山高庙墓葬出土戈属于春秋中期略偏晚，东风油库M1戈属于春秋晚期偏晚阶段。这些戈的形制大体有两类，80刘家崖和罗山高庙戈援部略长，接近前述第一阶段长援戈。而季氏梁曾大功尹戈和东风油库M1戈援部较短，接近曾侯乙墓戈的形制。这个变化说明春秋中期前后戈的发展方向有别。

我们将以上所述的戈称为A型长援戈，以区别短援长胡戈（B型）。按照前面分析，可将第一、二阶段长援戈一并排序，其变化作如下划分：

A型：长援戈（图2.4－3）

Ⅰ式：郭家庙M22：14戈，短胡，锋为较短的三角形，三穿。通长17.7厘米。戈的年代在西周晚期或两周之际，形制则保持了西周中晚期特征。

Ⅱ式：戈援、锋如Ⅰ式，长胡三穿。此式戈在郭家庙墓地多见，如郭家庙M21：58戈，通长24.6厘米。此式戈年代多在两周之际。

Ⅲ式：锋作较宽长的三角形，锋与援之间过渡突兀。如季氏梁墓葬曾大攻尹戈，通长22.3厘米。相同形制的戈有鲢鱼嘴曾仲之孙戈、高庙车戈。曾大攻尹戈和车戈年代在春秋中期，由此可知曾仲之孙戈年代相同。

Ⅳ式：80刘家崖墓葬戈，援部略短，锋与援之间过渡舒缓。通长19厘米。年代在春秋中期。

Ⅴ式：东风油库M1：7戈，锋趋长，援略短而前部较窄。通长22厘米。年代在春秋晚期偏晚。

Ⅵ式：锋较长，窄援。如曾侯昃戈，通长22.3厘米。又如曾侯乙墓N.3曾侯郕戈，

① E.121戈通长30.5厘米，戈曲援斜长内，形制同中原地区戈。该戈形制见曾侯乙墓发掘报告图15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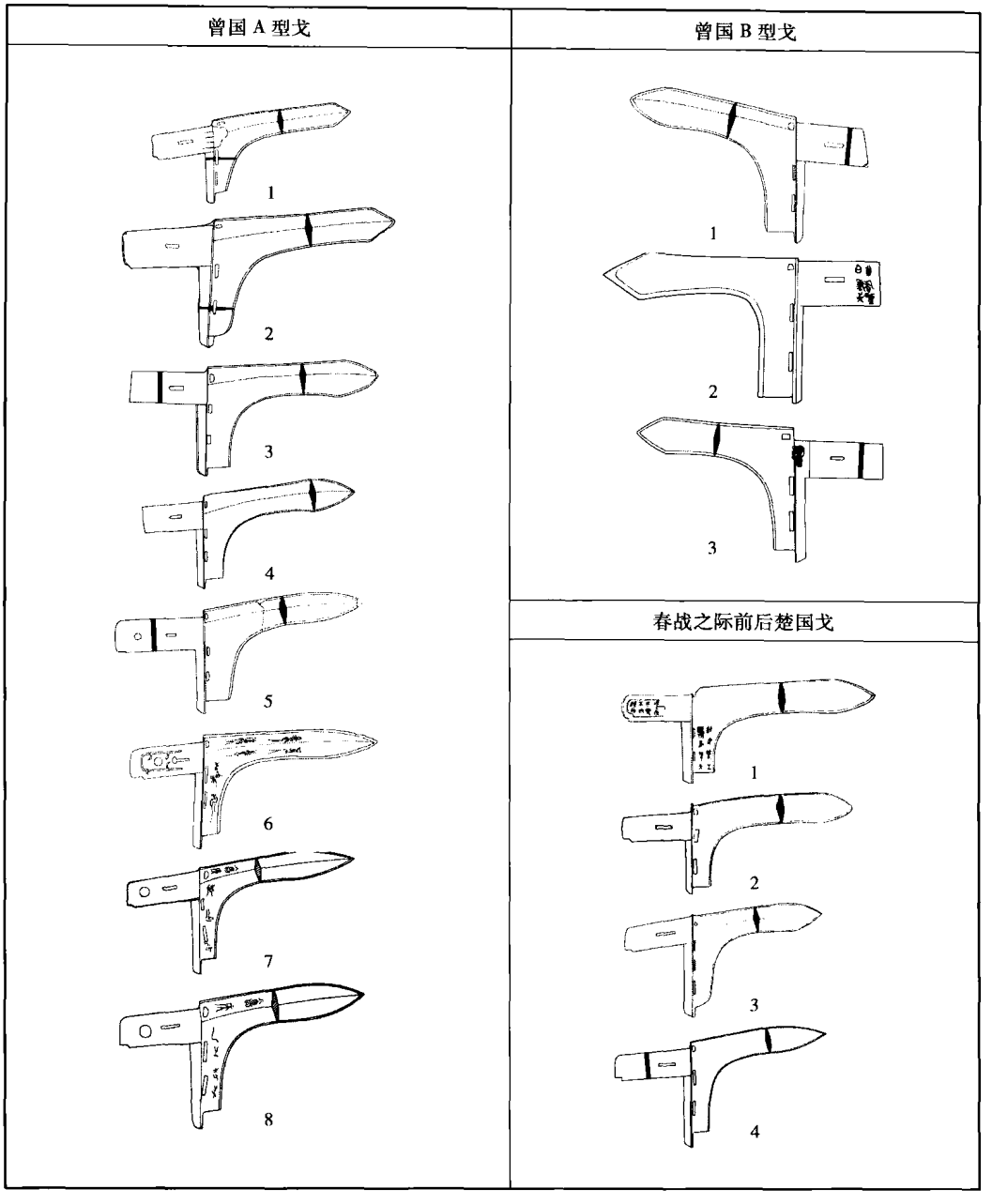


图2.4－3　曾国铜戈的演变以及与楚国戈的比较

曾国A型戈：1. Ⅰ式郭家庙M22：14戈　2. Ⅱ式郭家庙M21：58戈　3. Ⅲ式季氏梁墓葬曾大攻尹戈　4. Ⅳ式80刘家崖墓葬戈　5. Ⅴ式东风油库M1：7戈　6. Ⅵ式梁家老坟M11曾侯昃戈　7. Ⅵ式曾侯郕戈（曾侯乙墓N.3）　8. Ⅶ式曾侯乙戈（曾侯乙墓N.236）

曾国B型戈：1. 黄土坡M1：2戈　2. 82曹门湾曾侯緈伯戈　3. 季氏梁墓葬周王孙戈

楚国戈：1. Ⅰ式下寺M2：82倗戈　2. Ⅱ式下寺M10：85戈　3. Ⅲ式徐家岭M3：129戈　4. Ⅳ式徐家岭M10：220戈

通长 21.9 厘米。

Ⅶ式：援较短粗，长锋。曾侯乙墓多见戈作如此形制，如曾侯乙墓 N.236 曾侯乙之走戈，通长 20.2 厘米。

以上的Ⅵ式曾侯昃戈与东风油库 M1 戈、曾侯郕戈和曾侯乙戈都较接近，从锋的长度和锋援之间的过渡看，该戈年代早于曾侯乙和曾侯郕戈，大约在春战之际。

除了上述所谓长援戈之外，第一阶段还见一类援部略短而胡部特长的戈，戈胡颇长但仍然只有三穿。例如黄土坡 M1：2 戈通长 18.4 厘米，胡长 9.2 厘米。这类戈在中原地区同样可见，数量较为少见。形制相同者如应国墓地 M1：36 戈，通长 19.8、胡长约 10.3 厘米①。其年代在两周之际，与黄土坡 M1 相同。

B 型：短援长胡戈（图 2.4－3）

此类戈主要有如下三件：黄土坡 M1：2 戈，通长 18.4、胡长 9 厘米；季氏梁墓葬周王孙戈，通长 18.5、胡长 10 厘米；82 曹门湾曾侯絆伯戈通长 21.5、胡长 11.5 厘米。三戈中黄土坡 M1 属于两周之际，而出土周王孙戈的季氏梁墓葬属于春秋中期。这类戈三角形锋，援较宽而相对略短。周王之孙戈锋为较短的三角形，可知仍然保留了两周之际戈的形制因素。与周王之孙戈接近的曾侯絆伯戈锋与援之间突出，晚于黄土坡 M1 戈而接近有春秋中期戈的特征，因此曾侯絆伯戈的年代大约在春秋早期偏晚阶段。

以下再简略分析春战之际前后楚国铜戈的发展，以比较同时期曾国铜戈。根据我们对淅川下寺、徐家岭墓地墓葬年代的认识，可将其年代、发展较清楚的戈分四式：（图 2.4－3）

Ⅰ式：长援，形制如曾国 A 型Ⅲ式戈。如下寺 M2：82 倗戈，通长 28.2 厘米。

Ⅱ式：长援短锋，锋援之间变化舒缓。如下寺 M10：85 戈，通长 26 厘米。

Ⅲ式：徐家岭 M3 出土戈 12 件②，长度均在 22 厘米之内。这些戈援略短而宽，形制与曾侯乙戈基本相同。如徐家岭 M3：129，通长 21.8 厘米。

Ⅳ式：徐家岭 M10 出土戈 17 件③，长度均在 22 厘米之内。长锋，援窄长。如徐家岭 M10：220，通长 22 厘米。

将春战之际前后曾国铜戈与楚国戈比较可知，曾国铜戈大体与楚国戈有相同的演变关系。曾国戈以长援戈为主体，其基本形制为长胡三穿。楚国戈亦大体如此。在形制的演变方面，春秋中晚期两国戈体均较长，锋与援之间突起。春秋晚期及其后戈锋趋长，

① 此戈胡长系根据线图比例推算。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平顶山市北滍村两周墓地一号墓发掘简报》，《华夏考古》1988 年第 1 期。

② 其中大约有 4 件属于戟的戈头。

③ 其中大约有 7 件属于戟的戈头。

援部趋窄，锋与援之间的变化平缓，这一趋势延续至战国中期。战国早中期的戈形制演变关系与同时期的戟大体近似，不过，战国早期戈援部较短，则是一个较独特的演变。

我们再回头看如前所述吉开将人涉及的云纹装饰问题。戈内部饰云纹在楚系铜戈中常见。赵家湖楚墓①和九店楚墓②均见多件饰云纹戈。曾国的戈戟中曾侯乙墓戟有数器装饰云纹。其实这种云纹有很早的渊源，在曾国戈中，郭家庙 M11：5 戈已经可见这种云纹的雏形，鲢鱼嘴曾仲之孙戈云纹则已经比较成熟。无论如何，带云纹的戟、戈并无独立的形制发展系列，也不一定代表较晚的年代。

① 湖北宜昌地区博物馆等：《当阳赵家湖楚墓》第 130－133 页，文物出版社，1992 年。

②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九店东周墓》第 224－235 页，科学出版社，1995 年。

第三章　周文化体系之下的曾国青铜器

随着商周政权的交替，周文化继二里岗文化之后再次在广义上的中原地区形成高度一致的文化格局。西周早中期之际，这种格局向南一直覆盖到江汉地区。另一方面，西周中期周人器用制度的成形，青铜器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鼎、簋为器群的组合中心，新兴的壶、豆成对，盘与匜搭配为水器，如此等等的“重食的组合”①，不仅使青铜器更加直接地标明使用者的身份地位，也使西周晚期前后相当长时期青铜器的组合整齐而“规范”。这种规范还在不同程度上进一步影响到春秋中期之后秦、楚等不同区域文化的青铜器器用制度之中。

西周晚期随着周王室的式微，诸侯国青铜文化就是在上述文化背景之下在各地迅速地得到了发展。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以晋国为代表的山西西南、以鲁国为代表的山东地区、以噩、曾、楚为代表的豫南鄂北地区②，青铜器都有相当的数量出土。从春秋早期开始，东周不再拥有对诸侯国足够的政治控制能力，在此情形之下，各诸侯国青铜器普遍得到了膨胀式地发展。从晋西南以东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到河南以东以南的汉水、淮河一带③，不仅鲁、郑、虢、晋、秦、曾、申等实力较强的诸侯国青铜器体现出较高的水准，像纪、滕、薛、陈、番、樊、鄀、黄等等国力较小的诸侯国青铜器，也发展了起来。和当时诸侯林立的政治格局一样，青铜器的制作也出现了群芳竞艳的局面。不过，从文化面貌的角度观察，这些列国青铜器仍然较多地保持着早先西周文化传统。在春秋中期开始的大国称霸争雄局面形成之前，楚、晋、秦等区域文化体系亦尚未形成。

第一阶段曾国青铜器所属的两周之际前后正处于中国青铜时代发展的两个兴盛时期之间，青铜器表现出一种规范与稳定的发展。这一青铜器器类较固定地围绕于鼎、簋的搭配，在较高级别的铜器群中，往往以鼎、甗、鬲、簋、圆壶或方壶、豆、盘、匜为组

---

① 郭宝均：《商周青铜器群综合研究》第91页，文物出版社，1981年。

② 西周时期的楚器尚不多见，但从晋侯墓地发现楚公逆钟看，当时的楚国青铜文化也有较高的水平。参李学勤：《试论楚公逆编钟》，《文物》1995年第2期。

③ 也有学者将汉水到淮河中上游地区作为一个文化单元看待。参陈昭容：《从青铜器铭文看两周汉淮地区诸国婚姻关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七十五本第四分，2004年。

合形式。在器物形制方面，鼎多浅腹，器底流行圜形，簋作敛口双耳带盖。纹饰则几乎不出窃曲纹、重环纹、环带纹、垂鳞纹等几类抽象的装饰。这样一些特征，在第一阶段自公元前9世纪下半叶至公元前7世纪中叶历时近两个世纪的时间，青铜文化基本特征变化缓慢，“这一时期的青铜器，器型、花纹变化不大，很难区分”①。因此甚至被有的学者描述为“滞延期”② 或“延展期”③，来形容这一时期青铜器风格单一、发展频率较为缓慢的现象。

以上是第一阶段或曰两周之际前后周文化体系在青铜器方面的基本格局和特征。这样一个宏观概势，被许多学者作为中国青铜时代一个代表性阶段来论述。那么，如果从相反的角度，即从微观结构看，当时诸多方国青铜文化在这样的格局之下，是如何存在和发展的？这是我们考察这一阶段曾国青铜器的主要动机之一。

西周晚期方国青铜器的兴起，这些方国青铜器与中央青铜器从文化、政治上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例如，在诸侯国这些次一级的政治中心，青铜器是直接来源于中心区域的输入，抑或可能只是由中央在技术上对地方的传播④？甚至可能是由中央王室作坊向各诸侯国提供“订制”式的青铜器⑤？这样不同的方式，折射出王室与诸侯国之间的政治关系就会完全不同。春秋早期诸侯国青铜文化得到较为自由的发展环境，但因此失去了一个可依从的中心文化。因此两周之际诸侯国青铜器似乎都是基本上维持着此前的基本特征而没有如同政治形势般地分化，但从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这样大约二百年间的时间里，难道它们没有或者是否已经开始——无论零星地抑或系统地——出现个性特征？

上述两个方面，是我们试图以考古学研究的视角从这一时期曾国青铜器中探知的。

第一节　器类与器形

西周晚期诸侯国青铜器多承袭周文化青铜器作风，一般认为此时“青铜器很多和周王朝的器物形制相同，器形、纹饰和工艺上都看不出明显的特点”⑥。现在看来，虽

① 高明：《中原地区东周时代青铜礼器研究》（上），《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2期。

② 苏荣誉等：《中国上古金属技术》第2页，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年。

③ 华觉明：《中国古代金属技术——铜和铁造就的文明》第4－5页，大象出版社，1999年。

④ 罗森：《西周青铜冶铸技术的革命及其对各地冶铸业的影响》，《中国古代的艺术与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⑤ 松丸道雄：《西周青铜器制作的背景——周金文研究序章》，樋口隆康主编、蔡凤书翻译《日本考古学研究者·中国考古学研究论文集》，香港东方书店，1990年。

⑥ 李学勤：《西周时期的诸侯国青铜器》，《新出青铜器研究》，文物出版社，1990年。

然情况并非完全如此，但诸侯国青铜器总的特征与宗周青铜器一致是无可置疑的。就曾国青铜器而言，这一大局也是明确无疑的。从器类而言，第一阶段曾国青铜礼器可见鼎、甗、鬲、簋、簠、盆、豆、杯、罍、圆壶、方壶、方卣、盘、匜、盉等器类，除了少数类别之外，它们大都在周原青铜器中常见。在器物形制方面，大部分曾国铜器也都是对西周中晚期周文化青铜器的直接继承。同时，曾国作为诸侯国青铜文化，青铜器还表现出从属的文化地位。除了上述与周文化中心区域一致的特征以外，曾国青铜器还表现出器类单调、缺乏变化和创新的特征。如曾国青铜器器类常见者，不过鼎、鬲、簋、圆壶、盘、匜而已。在曾国漳河等主要区域出土的133件青铜容器中，以上主要器类的数量分别是：鼎35、鬲23、簋30、圆壶11、盘8、匜8件，即这六种主要器类总数共115件，共占有礼器总数的86%。即便在这些主要器类中，曾国也往往只是分别选择某种器形较多地使用，这使曾国青铜器的器物造型单调，缺乏变化。这种简单而从属的文化面貌，当然也反映出曾国青铜文化与周文化较为近缘的关系。

作为地域文化，曾国青铜器也有若干器类的器形与相应的周式器形略有变化，如折肩扁腹的鬲，与周式青铜鬲存在差异，形成对周式青铜器的一种变体。同时，数量极少的器类更具有鲜明的个性，其作风异趣于典型周式青铜器，这是曾国青铜器在周式文化格局下的一抹色彩。这些变化与前述的不变，构成了曾国青铜器共性为主并存在个性的基本特征。这种共性与个性的形成及其历时性的变化，需要在第一阶段不同时期作一“过程”式的观察。

一 周式器类的沿用

所谓对周式铜器的沿用，主要是指沿用西周晚期典型周文化青铜器器类与器形，但这并非是说生产于西周晚期的周式青铜器继续使用于春秋或更晚的历史时期，而是指西周晚期及其后时期的某些铜器形制继续保持西周晚期的周式传统。

如上一章《曾国青铜器的分期》中对早期曾国青铜器与典型周式青铜器所比较的那样，西周晚期曾国青铜器中，不少器物与典型周式青铜器几乎完全相同，它们包括饰弦纹垂腹直足鼎、一周重环纹的立耳蹄足鼎、分体方甗、直条纹带月牙形扉棱鬲、各式的簋、深腹盘、重环纹瓦纹匜等。这样一些周式传统因素为曾国青铜器所接受并保持，为其后得以继续沿用形成了基础。在西周晚期之后的第二期，继续维系周式铜器形制特征的成分已经有所减少。但是，这些继续沿用“旧制”的器类，在形制特征方面仍然保持原有风貌而少有变化。这些在第一期均可见的周式器类，包括有簋、方甗、盘与匜。以下分别对簋、方甗、盘的情形进行分析。

1. 簋

曾国青铜簋基本形制为圆形捉手盖、截面近似梯形的器腹、带珥的兽首形双耳、矮

圈足，大部分簋圈足下都带有三个小足。簋的这种器形特征少有变化，几乎是西周中期以来周式簋的定制。这一时期其他诸侯国铜簋，器形也大体是这种相同的造型。

但曾国青铜簋仍然包含有一些细部的变化，包括耳、足的形制，以及纹饰组合的变化：

耳：簋耳均作龙首形，耳下垂珥。形制变化在龙角，一种为螺旋状角，一种为扁体云状角。

足：曾国的簋圈足下绝大多数带小足，有扁体和象首形两种。

纹饰组合：簋的纹饰包括有瓦纹、窃曲纹、重环纹、垂鳞纹四种。其中瓦纹为主体纹饰，见于这一时期所有的簋。垂鳞纹是辅助性的，只见于簋圈足。

以上耳、足、纹饰不同的因素相互组合，构成簋形制的诸种不同变化。但是，这些变化并非为曾国青铜簋所独有，簋的耳、足、纹饰等不同部件，在西周时期周式青铜簋中都有其原型，曾国各期几乎所有样式的青铜簋，也都可以在周式簋中找到对应的形制。第1期曾国的铜簋，流行全瓦纹和重环纹，上一章《年代与特征》一节已经分析过它们与周式簋几乎等同的对应关系。第一期之后，全瓦纹簋和重环纹簋继续有少量出现，而新见的窃曲纹簋也同样在周式簋中有完全相同的对应物。例如旭光砖瓦厂簋、何家台簋龙首形耳上饰扁角、扁体三小足以及窃曲纹装饰等方面特征，与散车父簋（《周原》3、窖藏174）基本相同（图3.1－1，1、2）；而周家岗墓葬出土的曾太保簋扁角的龙首形耳、象首形三小足以及窃曲纹装饰，更与史颂簋（《夏商周·西周下》381）完全相同（图3.1－1，3、4）。西周晚期以后曾国铜簋仍然是沿用旧有的形制风格，在整个第一阶段青铜簋中，还未见一件簋与周式簋存在风格上的不同。

簋的这种保守的风格在两周之际到春秋早期并非为曾国所独有。虢国墓地出土青铜簋数量极多，除去一些简化的“明器”簋以外，簋的形制也仍然保持西周晚期风格，如M2001、M2012等出土的簋。与曾国铜簋略有不同的是，虢国墓地出土的簋多饰单目的窃曲纹。直至春秋早中期之际，近于东周文化中心的新郑祭祀遗址，出土的8件一套的5套簋[①]也都保持西周晚期簋的基本形制特征，将新郑祭祀遗址簋与晋侯墓地M62：83簋[②]比较，会发现它们的变化幅度不大（图3.1－2）。可能因为地域关系，这些簋与虢国墓地M2001簋在形制上也颇多共同之处。青铜簋这种迟缓演变的背景，一方面可能与簋作为西周晚期前后的青铜礼器组合中的核心地位相关，另一个更为可能的原因是这种敛口瓦纹簋在西周晚期周原地区正处于新兴的流行阶段，因此它是作为一种新的风尚为各个诸侯国所接受。乃至于在青铜器总体风格发生重大变化的春秋中期及以后，带

①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郑郑国祭祀遗址》第117－214页，大象出版社，2006年。

②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等：《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四次发掘》，《文物》1994年第8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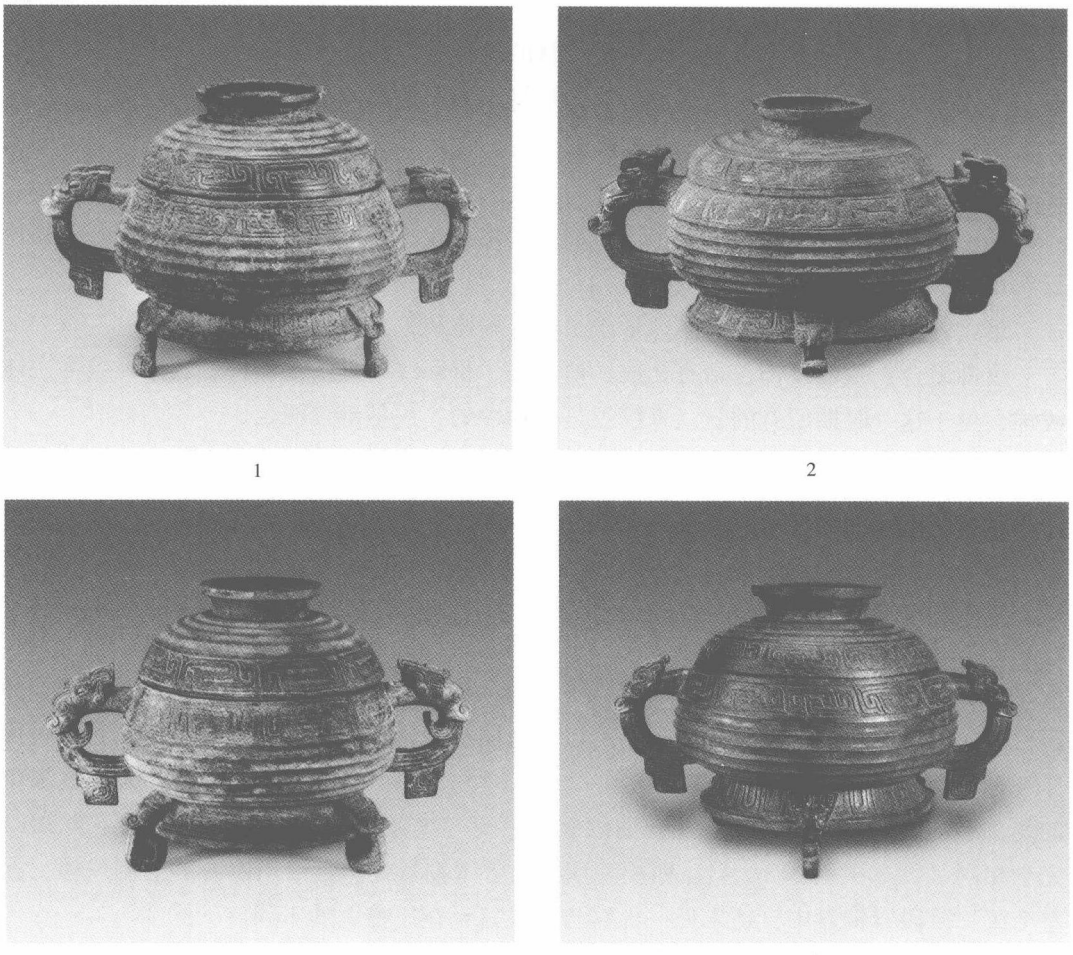


图 3.1－1　曾国铜簋与周式铜簋比较

1. 何家台簋　2. 散车父簋（《周原》3、窖藏 174）　3. 周家岗曾太保簋　4. 史颂簋（《夏商周·西周下》3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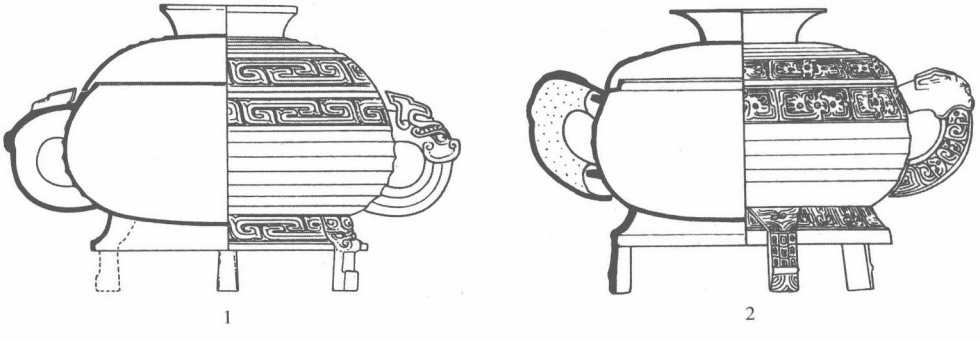


图 3.1－2　西周晚期铜簋风格在东周时期的延续

1. 晋侯墓地 M62：83 簋（《文物》1994 年第 8 期）　2. 新郑祭祀遗址 K15：22 簋（《新郑郑国祭祀遗址》图 124）

有西周晚期风格的双耳敛口簋仍然在高级别铜器群中常见，形成一种所谓的“复古”现象。这一点将会在下一章中讨论。

2. 方甗

方甗在曾国青铜器中也只是在第一、二期可见，3 件方甗中 2 件见于第二期。第二期方甗形制几乎与第一期方甗完全相同（参见附图 1 方甗）：均为分体、甑体立耳、鬲体附耳、四足作象首形。两期方甗都只在甑体装饰纹样，第一期方甗主体纹饰为环带纹，第二期方甗主体纹饰为龙纹，但与第一期方甗纹饰布局方式相同。如前所述，曾国的这些方甗形制又都与西周晚期晋侯墓地 M64 出土的叔钊父方甗①相同。至两周之际，虢国也颇为流行方甗，虢国墓地也有为数不少的方甗形制与曾国相同，如虢国墓地 M2001：65 方甗②亦作分体，甑体亦饰窃曲纹和环带纹，附耳的鬲体亦作象首状四分其足。这些共性说明该类形制的方甗都是承袭于西周晚期周文化，其实，类似的方甗在周原已经出现（《周原》974）。方甗在西周晚期及其后在曾、虢等诸侯国中流行的情形，与敛口簋非常相似，都是周式青铜器风格为诸侯国所继承、流行。

3. 盘、匜

和簋、方甗主要只见于第一、二期的情况不同③，盘与匜在第一阶段的不同时期均有沿用。以盘为例，第一阶段曾国青铜盘共见 7 例，其中 6 件盘均作附耳圈足，形制极为近似，均为典型的周式盘风格。只是从第二期起，原来的高圈足变矮，圈足下代之以附加的 3 个小足④，小足的作法是受到簋的影响，从西周早中期之际开始，簋就已经在圈足下加小足⑤，西周晚期此风颇盛。因此带小足的盘仍然是典型周式青铜器风格的延续。

第一期的桃花坡 M1 起右盘以槽形流应龙首鋬，这是唯一一件风格迥异于其他曾国盘的铜器，在形制整齐划一的曾国青铜器中也颇为突出。但这种形制的盘依然在周原西周晚期青铜器中可见形制相同者，因此它依然是周式盘的次生形态（图 2.3－9）。

方甗和圈足盘虽然是作为西周时期文化传统在春秋早期的延续，但和敛口簋不同的是，这一传统并没有继续沿用到春秋中期，而是分别被分体的圆体甗和三足盘所取代。

二　周式器类的变异

这里的变异是指诸侯国青铜器的某些器类在继承相应周式器类的基础上，在形制方

① 上海博物馆：《晋国奇珍——山西晋侯墓群出土文物精品》第 149 页，上海美术出版社。

②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三门峡虢国墓（第一卷）》第 44 页，文物出版社，1999 年。

③ 曾太保簋出土于属于第三期的周家岗墓葬，但簋的年代略早。

④ 周家岗盘圈足下原来也带有小足，已残失。

⑤ 周原青铜器中，盘圈足下带小足的现象并不普遍，且较簋带小扁足的时间约晚一阶段。

面对周式铜器加以改造从而部分或局部意义上形成一些自身特点。因此，变异不是指某些个别的特殊器形，而是某类器物已经定型的风格特征。在曾国，鼎、鬲、圆壶、簠、盆等不少器类，或多或少、不同程度地表现出这种变异。下面以鼎、鬲、壶为例来说明这一问题。

1. 鼎

第一阶段曾国青铜鼎有立耳鼎和附耳鼎两大类。其中立耳鼎包括传世品共16件，见于第一、二期；附耳鼎共21件，见于第二、三期，属于第二期的有16件。这一阶段附耳鼎数量超过立耳鼎，即便从类次的概念上作统计，第二期的附耳鼎有4个类次，超过立耳鼎的2个。附耳鼎占优势的现象在同一时期的诸侯国青铜器中并不多见。例如虢国墓地1956至1957年出土65件鼎①，立耳鼎有62件，而附耳鼎仅见3件。在20世纪90年代发掘的M2001、M2011、M2012三座高级别墓葬②中出土鼎30件，附耳鼎仅见8件，其中7件为M2001虢季列鼎。

从鼎的形制看，上述曾、虢的立耳鼎与周式鼎都有近缘的关系。西周晚期周原出土的铜鼎绝大多数为立耳鼎，常见为半球形腹蹄足、上腹凸弦纹以上饰一周重环纹，如毛公鼎（《全集》5－36）一类。这种弦纹之上一周纹饰的立耳蹄足鼎从两周之际到春秋早期在黄河流域的广大地区如鲁、晋、秦等国继续沿用。在曾国，立耳鼎如72熊家老湾鼎、桃花坡M2鼎都是重环纹的立耳蹄足形制，与周式鼎完全相同。曾国也有一些A型鼎如何家台鼎和83曹门湾鼎上腹饰一周窃曲纹，这种形制也渊源于周式鼎，如大祝追鼎③，年代属于厉宣时期。不过，曾国的这些立耳鼎多腹部较浅，腹径均明显大于口径，而不像同时期周式鼎那样作半球形。曾国立耳鼎中还有一类鼎腹部略深、上下腹部各饰一周纹饰，一般上腹为重环纹或窃曲纹，下腹为环带纹、龙纹或垂鳞纹。这类两周纹饰鼎在周原地区多见于垂腹鼎，如多件克鼎中，其两周纹饰组合为窃曲纹和环带纹。但周原地区罕见半球形腹鼎饰两周纹饰者，1963年扶风庄白李村征集到的一件窃曲纹鼎（《周原》10，征集2078）④，鼎足根伸张成圆盘状，上腹饰窃曲纹、下腹饰环带纹，纹饰组合和器形与曾国鼎接近，大约是曾国鼎的原型。唯该鼎足饰兽面、上腹有扉棱，仍然保留有西周中期的传统。类似腹部饰两周纹饰的立耳球腹鼎在西周晚期后的诸侯国青铜器中有较大的发展。在虢国墓地等地，此类鼎的两周纹饰组合多是颈部一周重环纹接下腹一周垂鳞纹，其西周晚期的时代风格浓厚，也应当是周式鼎的发展形式。在鄂北

①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上村岭虢国墓地》，科学出版社，1959年。

②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三门峡虢国墓（第一卷）》，文物出版社，1999年。

③ 陈佩芬：《新获两周青铜器》，《上海博物馆集刊》第8期，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年。

④ 此鼎又著录于《陕西出土青铜器·3》第134，该图录说明称与鼎同出有4件重环纹簋，簋的年代在西周晚期。《陕西出土青铜器·3》，文物出版社，1980年。

豫南地区，以曾国为代表的立耳鼎除了偶见虢国墓地那种带垂鳞纹的形式之外，器形上多作敛口，下腹的一周纹饰多作龙纹而不是垂鳞纹。类似曾国这种立耳鼎的形制，不仅在豫南地区较多见，如信阳吴家店出土的甫伯鼎①，还多见于山东地区，如邹县斗鸡台出土的费敏父鼎（《全集》9－79）、临朐出土的龙纹鼎②。这些情况表明，曾国的立耳鼎仍然是以沿用周式鼎因素为主，其形制与风格也与其他诸侯国立耳鼎有相近的特征，它们当是继承周式鼎并有所发展，但尚未形成代表曾国的风格特征。

曾国附耳鼎的情形与立耳鼎有所不同。其附耳鼎腹部截面近于长方形，下腹腹径较大，底部近乎于平，鼎的上腹饰一周窃曲纹，下腹光素。从器形上看，这类鼎的渊源与周文化中心区域的鼎仍然相关。我们知道，西周中期周原等中心文化区域的青铜鼎形制已经开始发生分化，前述半球形腹立耳鼎是一类新兴的形制，其器形与纹饰代表了当时简化的趋向，并在西周晚期成为鼎类器的主流。另一类立耳宽体垂腹鼎，其垂腹的器形承袭自西周早期的倾垂腹鼎。此类鼎下腹光素，上腹饰弦纹或者是一周窃曲纹③。至西周晚期，此类鼎出现不少附耳的形式，如蓝田草坪出土的㝬叔鼎（《断代研究》鼎63），鼎上部器形已经与苏家垅鼎接近。当然，周式这类宽体垂腹鼎三足往往瘦而直，其上饰扉棱，与曾器鼎足作较粗大的兽蹄形不同。兽蹄形足也不是曾国的发明而是周式的特征，曾国附耳鼎鼎足作法显然承袭自西周晚期周式半球腹鼎形制，如毛公鼎（《全集》5－36）、善夫鼎（《周原》3、窖藏446）等。因此，曾国附耳鼎实际上是周式鼎不同因素的组合（图3.1－3）。

两周之际晋、虢等诸侯国也已经出现附耳鼎。晋国西周晚期的附耳鼎如晋侯苏鼎等已有数见，其鼎作半球形腹，上腹饰一周重环纹，显然，这种鼎与当时周式球腹立耳鼎只是有立耳与附耳之别，它们仍然是球形鼎的延续形式。两周之际的晋、虢两国附耳鼎，例如晋侯墓地M93鼎④和虢国墓地M2001虢季鼎⑤（图3.1－4），形制近似，均作浅腹弧底，腹部饰两周纹饰，其器形还是此前球形鼎的发展，但吸收了同时期两周纹饰的做法，形成一种新的变化。不过，晋、虢等诸侯国的立耳鼎与附耳鼎并未形成不同的系列，附耳鼎往往只是立耳鼎的附属形式，如前统计的虢国附耳鼎数量颇少，也说明了这一点。

以上比较说明，宽体附耳鼎在两周之际及其后只是曾国最为常见的鼎类器，它虽偶见但并未流行于其他主要诸侯国，因之这是第一阶段曾国青铜器中拥有自身特点的器

① 信阳地区文管会：《河南信阳发现两批春秋铜器》，《文物》1980年第1期。

② 临朐县文化馆等：《山东临朐发现齐、鄩、曾诸国铜器》，《文物》1983年第12期。

③ 如《断代研究》鼎47－52、59等均如是。

④ 上海博物馆：《晋国奇珍——山西晋侯墓群出土文物精品》第199页，上海美术出版社，2002年。

⑤ 河南博物院：《群雄逐鹿——两周中原列国文物瑰宝》第173页，大象出版社，2003年。

图 3.1－3　曾国附耳鼎的来源

1. 苏家垅鼎　2. 㝬叔鼎（《断代研究》鼎 63）　3. 善夫鼎（《周原》3、窖藏 446）

图 3.1－4　两周之际曾国以外地区的附耳鼎

1. 晋侯墓地 M93 鼎（《晋国奇珍》第 199 页）　2. 虢国墓地 M2001 虢季鼎（《群雄逐鹿》第 173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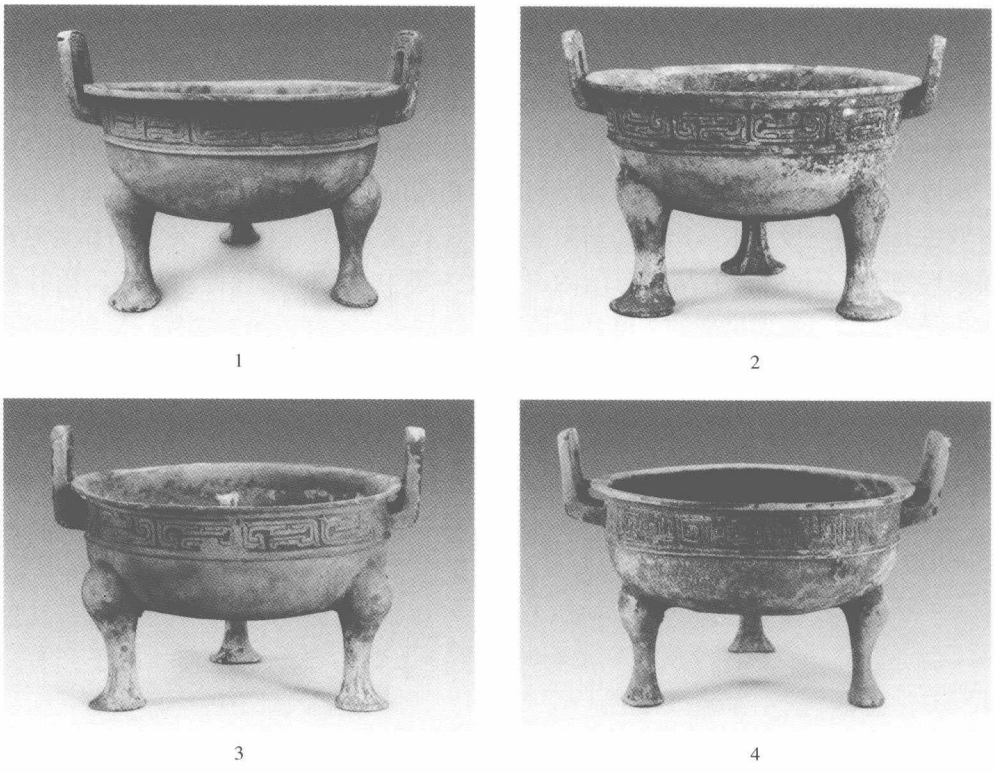


图 3.1－5　第一阶段第二、三期曾国附耳鼎比较

第二期：1. 郭家庙 M17 鼎　2. 段营鼎　第三期：3. 郭家庙 M6 鼎　4. 郭家庙 M02 鼎

类。从器形上看，曾国第一阶段的 21 件附耳鼎只有曾诸子鼎和庳季之伯鼎两件鼎形制、纹饰略异，其他 19 件鼎虽然分别属于第二、三期两个不同时期，但它们风格完全相同，形制极为接近。其历时性的变化，只是第三期鼎腹略为趋浅（图 3.1－5）。鼎作为最为重要的礼器器类，能够形成相对独立的发展系列，在两周之际的诸侯国青铜器中是不多见的。

2. 鬲

鬲也是第一阶段数量较多的器类，包括传世品在内，第一阶段共见鬲 25 件，其中 19 件鬲形制为折肩扁体鬲，另外 6 件为弧腹鬲。弧腹鬲都属于第一期，它们包括义地岗 M83 的直条纹鬲、桃花坡 M1 的龙纹鬲以及传世的曾伯宫父鬲，这些鬲纹饰各有差异，其中义地岗 M83 鬲饰重环纹和直条纹，与西周中晚期周原周式鬲纹饰完全相同，桃花坡 M1 鬲和曾伯宫父鬲腹部均饰龙纹，也与周式鬲风格接近。可见，曾国这些年代较早的鬲，是受到了西周周式鬲直接的影响形成的。

曾国青铜鬲中最大类别的折肩扁体鬲，其形制特征独成系列。这类鬲宽折沿，均在

颈部饰一周重环纹。年代较早的一些折肩鬲在肩部设新月形扉棱，这种扉棱来自于周文化，前类弧腹鬲中义地岗 M83 鬲和曾伯宫父鬲就带有这种扉棱。但折肩扁体的器形，以及与颈部重环纹组合而成颇为固定的形制，因此这种鬲彼此之间形制颇为接近（图 3.1－6），自第一期至第三期鬲形制变化颇小，以至第三期周家岗墓葬出土的两件伯毂鬲，难以判断它们的制作年代是否属于与墓葬相同的时期①。曾国的折肩鬲在曾国邻近的区域也有分布，豫南地区出土品信阳平西鬲（《全集》7－106）、传世品如番君鬲亦作类似形制②。不过，折肩鬲在曾国的出土最为集中，它的这种性质与曾国附耳鼎类似，也是曾国自身发展出来的、略具个性特征的器类。不过，对于这种特征突出的折肩鬲，我们尚不清楚其主体源头。

1

2

3

4

图 3.1－6　第一阶段曾国的折肩鬲

1. 檀梨树岗鬲　2. 何家台鬲　3. 郭家庙 M17 鬲　4. 周家岗鬲

① 周家岗墓葬墓主为庳季之伯歸壆，伯毂鬲铭文被刮磨，器主并非庳季之伯歸壆。

② 故宫博物院：《故宫青铜器》图 218，紫禁城出版社，1999 年。

3. 壶

由于铜器群社会等级的限制，曾国青铜器中圆壶的数量不多，但圆壶在第一阶段出现有8个类次，仍然是使用频率较高的器类。曾国圆壶的器形有两类，一是段营出土的一对环带纹圆壶，腹部低扁，颈部的长度超过腹部，这类圆壶与西周晚期周文化中心区域出现的几父壶等（《断代研究》壶5－8）完全相同，甚至圆壶纹饰作阳线凸起的风格也极为一致。曾国的其他圆壶绝大部分属于第二、三期，但形制与前类圆壶近似，具有西周晚期圆壶的时代特征。由于年代略晚，这些圆壶腹部的深度远大于颈部，纹饰多为平雕①，作多周的带状组合，多数圆壶在腹部留白而不作满花的装饰，因此这类深腹壶的作风与段营那种周式圆壶是有所发展的。

深腹圆壶的发展，除了少数圆形捉手盖的圆壶之外，在曾国形成了一种强调器物局部特征的做法：壶的口部以上作莲瓣形造型（图3.1－7）。曾伯陭壶和郭家庙M17出土的一对圆壶，莲瓣造型设在盖顶捉手处。像这些圆壶盖顶所展示的那样，所谓的莲瓣形，实际上是镂孔技术与环带纹纹饰的相互结合，也就是依照环带纹作镂空处理，形成莲瓣的造型。两周之际前后，这类壶盖的功能蜕化，成为顶部中通、只有装饰作用的壶冠，冠顶仍然装饰莲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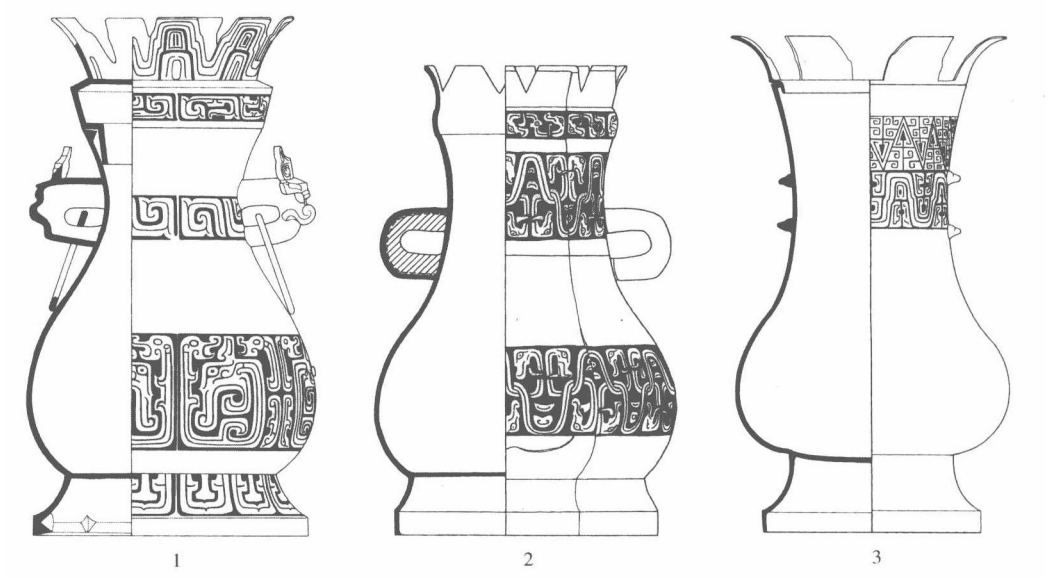


图3.1－7　曾国的莲瓣形装饰圆壶

1. 郭家庙M17圆壶　2. 周家岗墓葬圆壶　3. 80刘家崖墓葬圆壶

① 只有传世品曾伯陭壶纹饰作风与段营相同，作半浮雕处理。但曾伯陭壶形制仍然是属于深腹壶。

周家岗的一对圆壶，将莲瓣形饰直接浑铸在壶口上，在视觉效果上与莲瓣形冠相同。直到第二阶段，莲瓣装饰的壶仍有沿用，80 刘家崖一对壶的莲瓣形冠，制作已颇粗糙。曾国圆壶莲瓣形的作风还影响到方壶，苏家垅方壶器口承接的也是中通的壶冠。在这对方壶之后，莲瓣的造型似乎仍然在较晚的方壶上被强调，春秋晚期的 75 刘家崖方壶，壶冠上的镂孔无疑也是莲瓣造型的一种变化。战国早期以后，莲瓣形装饰在其他地区已经衰退，但这一作风在曾国并未消失。擂鼓墩 M2 方壶，壶冠与莲瓣结合的装饰仍然使用，莲瓣的轮廓仍然作成环带纹，可知这对方壶上莲瓣的装饰的确是由西周晚期的传统延续而来。在较擂鼓墩 M2 略晚的时间，地理上与曾国毗邻的枣阳九连墩 M1 楚墓出土的铜方壶①，壶口部以上承接装饰莲瓣形饰的壶冠。无疑，这种装饰已经形成为地域意义上的文化传统了②（图 3.1－8）。

上述深腹圆壶、莲瓣形壶顶当然并不是曾国所独有的特征因素。高崇文已经指出，深腹圆壶是在南阳盆地至随枣地区相对集中出土的器类，它们在晚些时期在郑地也有相当数量③。由第一期桃花坡 M1 深腹圆壶及其与晋侯墓地 M63 杨姞壶（《全集》6－51）相同的特征（图 3.1－9）可知，这类深腹圆壶同样也应该是发端于西周晚期的周式传统，其后的发展形成颇大的区域分布。此类圆壶在曾国之外有较长时间的流传，例如在郑国，新郑祭祀遗址礼器坑出土的圆壶④和郑公大墓出土的圆壶⑤，不仅长颈深腹的器形、而且纹饰中瓦纹夹窃曲纹的装饰方式，都保持了上述杨姞壶和桃花坡 M1 圆壶西周晚期的基本作风。莲瓣形壶顶也有类似的源流，西周晚期晋侯墓地 M8 晋侯断方壶顶部开始出现波曲纹状装饰⑥，此后的春秋中晚期，从郑国著名的莲鹤方壶（《全集》7－22），到晋国赵卿墓出土的圆壶和方壶（《全集》8－71～74），壶顶也都有莲瓣形装饰。莲瓣形装饰在春战之际还在较大的地域范围出现，晚至战国时期，这类装饰更扩展到其他器类⑦。不过，这些莲瓣形饰与上述曾国一带圆壶和方壶上的形制有所不同，也没有

①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枣阳市九连墩楚墓》，《考古》2003 年第 7 期。方壶图像见湖北省博物馆：《湖北出土文物精粹》图 82，文物出版社，2006 年。

② 九连墩楚墓出土的青铜器和漆器中，若干器类非其他楚墓所见，但在曾侯乙墓中可见类似器类。曾国文化传统在楚墓中有所体现，是一个颇为有趣的现象。

③ 高崇文：《两周时期铜壶的形态学研究》，俞伟超主编《考古类型学的理论与实践》，文物出版社，1989 年。

④ 如 K2：29、K3：29、K6：29 等等圆壶。见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郑郑国祭祀遗址》，大象出版社，2006 年。

⑤ 河南省博物院等：《郑国郑公大墓青铜器》第 118、119 页，大象出版社，2001 年。

⑥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等：《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二次发掘》，《文物》1994 年第 1 期。

⑦ 由莲瓣形造型还引发了佛教传入中国时间的争论。参见张正明等：《战国中期曾有佛教造像传入南楚》，《江汉论坛》2001 年第 8 期。邵学海：《历史不是橡皮泥——对“佛像入楚”再质疑》，楚文化研究会《楚文化研究论集》，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 年。

1

2

3

4

图 3.1－8　曾国一带方壶的莲瓣形装饰传统

1. 苏家垅方壶　2. 75 刘家崖方壶　3. 擂鼓墩 M2 方壶　4. 九连墩 M1 方壶（《湖北出土文物精粹》图 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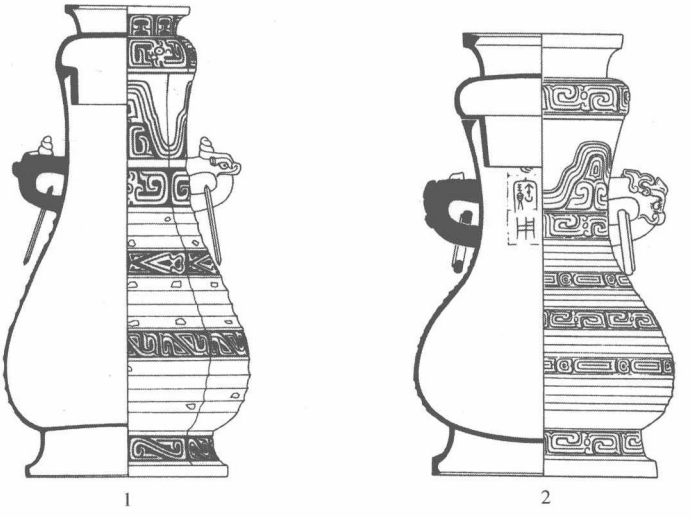


图 3.1－9 西周晚期曾国与晋国的圆壶

1. 曾国桃花坡 M1 圆壶 2. 晋侯墓地 M63 圆壶（《文物》1994 年第 8 期）

如曾国壶类器那样普遍出现并且形成鲜明的系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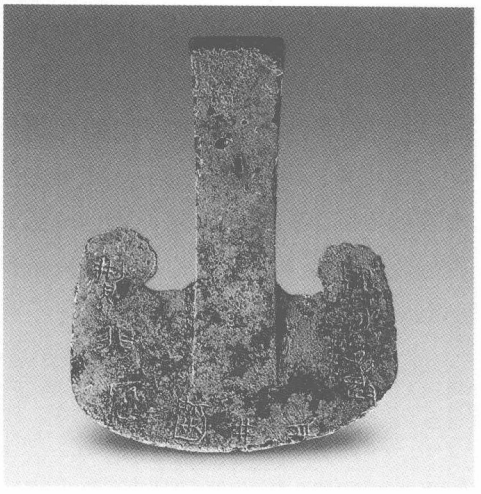
以上所举附耳鼎、折肩鬲、莲瓣壶三类所谓“变异”现象，与前述周式器类的沿用现象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是对周文化因素的继承，只是后者所继承的方式不同且流行范围有限。附耳鼎和折肩鬲看上去更为曾国特色，它们在曾地之外分别少见和所见不多，但都未形成只存在于曾国的排他性现象。和附耳鼎、折肩鬲不同，深腹圆壶作为周文化的变异成分，并不是仅仅在曾国形成的异化，而是西周晚期从诸侯国涌现出不同于周式青铜器的新作风，这种新作风还在第二、三期有较广泛的分布，并且延续到春秋中期及其后。这些“变异”现象，大约是在东周之初缺乏有强力辐射能力的文化中心的情形下，地方青铜文化发展的新气象。

三 周式器类之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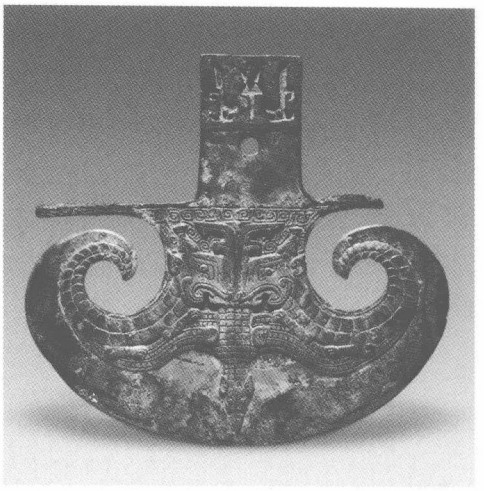
前已述及，晋国在西周晚期即已出现有地方特色的三足瓮等器类，这种非周式风格青铜器的存在，说明了周文化对于诸侯国文化控制的程度。在曾国，这种非周式因素也有出现，但未形成如晋国那样独立的器类，而只是作为单个器形零星出现。例如，在青铜容器中，72 熊家老湾鑐和 70 熊家老湾方卣是两个典型的例证。72 熊家老湾鑐虽然质地为青铜且有下腹设鋬等近似于西周晚期鑐的形制特征，但圜底曲颈的器形明显是陶器的作风，其曲折纹结合直条纹的装饰，也是模仿商周之际前后陶器纹饰。西周晚期周式青铜器中有仿陶的直条纹鬲，但不见类似仿陶的器类。70 熊家老湾方卣纹饰有垂鳞纹、

重环纹、龙纹等西周晚期风格，但其器形作方体、四角出扉棱以及四阿式盖顶，形似殷墟文化时期的方彝——实际上，过去学者常常将其误称作方彝，只是器侧的双纽，提醒我们该器原来设有提梁。无论如何，迥异于周式的风格，说明以上鐳和方卣不像其他器类那样，是直接受到当时周文化直接影响产生。当然，这两件器物也未必是曾国的典型铜器，而可能是受其他地区文化传播的结果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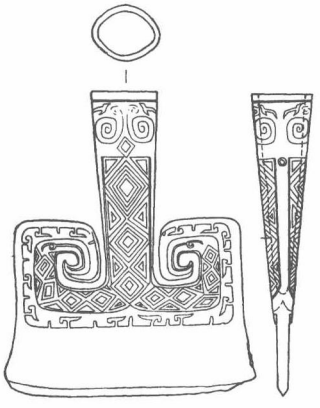
钺是周式器类之外的特异器形中明确属于曾国的器物。郭家庙 M21 出土有曾伯陭钺（图 3.1－10，1），同人所作之器还有曾伯陭圆壶②。钺铭文内容涉及曾伯陭治理政事，



1



3



2

图 3.1－10　曾伯陭钺与相关铜器比较

1. 曾伯陭钺　2. 殷墟妇好墓 M5：715（《殷墟发现与研究》图 166）　3. 兮钺（《欧洲所藏中国青铜器遗珠》图 66）

① 这一点将在本书第五章中详细讨论。

② 容庚：《商周彝器通考》图版 721，哈佛燕京学社，1940 年。

用罚百姓罪刑，这与 M21 带有墓道所反映的墓葬等级吻合，因此曾伯陭可能即 M21 墓主，身份应当是曾国国君。曾伯陭钺作卷云状刃，虽自铭为“钺”但顶带方銎，大约其装配是配以端部弯曲的柲。此钺形制特殊，为同时期罕见。钺流行于商文化时期，主要器形为直内的斧形，少量的銎内钺文化属于可能与北方地区文化相关①。西周中期后钺少见，中原文化系统的钺已属凤毛麟角，少见的实例如战国中期平山中山王墓钺（《全集》9－163），形制仍然作宽体的直内斧形。类似曾伯陭钺这种带方銎式卷云状刃的钺实为早期钺的遗型。妇好墓出土有 4 件卷云式铲（M5：715－718）②（图 3.1－10，2），器形作弧刃向两侧延伸作卷云状，圆銎，形制类似曾伯陭钺。宝鸡茹家庄 M1 乙室出土一件方銎弧刃的斧③，器形亦与曾伯陭钺有近似之处。商周之际还有一些直内卷云刃钺，如兮钺④（图 3.1－10，3）。卷云形刃的钺也有横式管銎的，如北京市拣选的带铃双首钺⑤、上海博物馆收藏的管銎钺⑥等。以上这些钺都是属于殷墟时期到西周早期一段时间，且其文化属性可能多与北方少数民族文化相关。曾伯陭钺与上述诸器之间在时间上存在较大的缺环，但近似的形制又显示出发展上的某种关联。这使曾伯陭钺显得格外异常，似乎它反映曾国国君可能的少数民族的族性，或者似乎可以将曾伯陭钺的出现理解为一种复古。这与两周之际国君一级墓葬所谓玉戈的复古之风⑦或许有一致之处。

四 变迁与选择

曾国青铜器在第一阶段的发展，从器类与器形上看是与周文化渐行渐远的过程。在上述讨论曾国青铜器与周文化青铜器的关系中，除了鑐与方卣之外，第一期大部分青铜器都是对西周中晚期器类与器形的承袭与沿用，一些器物的器形与中原地区同类器几无二致。第二期曾国青铜器中的周式器类的器形发生变异的数量较大，但第一期所见的一些周式的器形如直条纹鬲、高圈足盘等已经消失。到第三期，能够确定铸造年代属于这一时期的周式器类只有盘、匜等非核心器类。与此相对应的另一方面，各期出现的变异和新类型的器类与器形增多，第一期曾国青铜器中，在中原西周青铜器中没有可对应的

① 陈芳妹：《商后期青铜斧钺制的发展及其文化意义》，臧振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会议论文集之四·中国考古学与历史学之整合研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7 年，台北。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图版 67 之 4－7，文物出版社，1980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的发现与研究》图 166，科学出版社，1994 年。

③ 宝鸡市博物馆：《宝鸡強国墓地》图版 167 之 1，文物出版社，1988 年。

④ 李学勤等：《欧洲所藏中国青铜器遗珠》图 66，文物出版社，1995 年。

⑤ 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北京市新征集的商周青铜器》，《文物资料丛刊》2，1978 年。

⑥ 陈佩芬：《夏商周青铜器研究·西周上》第 290 器，世纪出版集团等，2004 年。

⑦ 杨美莉：《玉戈的研究》（下），《故宫学术季刊》第十六卷第二期，1998 年。

器形有折肩鬲。第二期出现有附耳鼎、单鋬杯、双耳盆。第三期青铜器材料不多，一些器类虽然在此前已经出现，但器物的风格普遍有较大的变化。例如簠在西周晚期即在周原和诸侯国青铜器中可见，曾国大约是在春秋早期开始使用簠，但第三期曾国簠如曾孙史夷簠、曾伯霥簠较高的直口、饰蟠螭纹的纹饰特征已经与周式簠存在较大差异，而几乎接近曾国第二阶段簠。郭家庙 M02 鑐、郭家庙 M8 匜，其形制特征则脱离了旧有的周式传统，与曾国第二阶段同类器近似①。因此从器物形制总体风貌看，第三期曾国青铜器可以说是处于向第二阶段青铜器发生质变之前的准备阶段。

以上的变迁不影响第一阶段曾国青铜器在宏观的文化面貌上与中原周文化一致的总的特征。即便是第三期的青铜器，无论其基本器类与器形、纹饰构图，仍然大体不出周文化风格的范围。正如学者们所注意到的那样，曾国这样的特征也是当时中原地区其他诸侯国如晋、虢、应、鲁等国的总体文化特征。但是，各个诸侯国青铜文化主体与周文化一致的同时，也如曾国青铜器一样，表现出各自自我的一些个性，这些个性为我们所谓的“沿用”、“变异”因素组合而形成：“沿用”因素虽然与周式青铜器一致，但在不同的地区可能对这些因素有不同的选择：比如西周晚期曾国的周式簋中多见重环纹簋，而晋国的周式鼎多见附耳球腹鼎，虽然它们都属于典型的周文化因素，但两地的鼎与簋却因此形成了不同区域之间的差异。“变异”因素也缘起于周文化，但各地将其改造的结果，也形成了不同的面貌，前述曾国的附耳宽体鼎与晋虢地区的附耳球腹鼎的不同，即是如此。

上述情况反映了地域文化常常发生的一种颇为有趣的文化现象，我们可称之为地域文化的选择倾向。即在大范围主体文化面貌较为一致的情况下，受文化等级、传统等等因素影响，一个区域性文化总是不可能与中心地区文化全盘一致，而是选择性地接受或重组中心地区文化因素。因此我们在观察这一区域文化时，会得出其特征与中心区域文化基本一致的结论。在不同的地理区域，类似性质的区域文化构成次一级文化单位，而当我们仔细比较这些单位的文化面貌时，又会发现它们彼此之间往往存在差别。周文化与其下的晋、虢、曾等地域文化的关系，大体就是如此。

因此，两周之际前后曾、虢、晋这样一些国家所代表的地域青铜文化彼此之间自然也出现这样一些选择性差异。比如，晋侯墓地青铜器少见鬲类器，西周中晚期高级别青铜器组合中使用方壶后少见圆壶；器形上的选择则已如前述。虢国墓地青铜器组合较多见甗、簠、豆，方壶与圆壶常常并用，水器有较多盘与盉的组合。晋与虢国国君一级铜器群使用编钟及独立的明器组合，但这些组合在曾国如苏家垅、郭家庙 M21 都不见使

① 鑐类器在第二阶段曾国青铜器中不见，但在中原如晋系青铜器中，春秋中晚期鑐有相当的数量，其形制作风与郭家庙 M02 这类鑐有直接的关联。

用。在所谓变异因素中，曾国折肩重环纹鬲与虢国墓地常常可见的带扉棱龙纹鬲形成了明显的对比。这种区域性文化差异我们可以用两个时代相同的铜器群，即虢国墓地M2001和曾国苏家垅铜器群的青铜礼器作为代表说明（图3.1－11）：两个铜器群的组成因素几乎都为典型周式风格，并体现出完全相同的时代作风，但将它们作一并列比较时，差异立见。

五 小 结

如前所述，学者们多将两周之际前后的第一阶段归入中国青铜时代发展较为缓慢和衰退的时期。从青铜器类与器形形制变化的频率而言，曾国青铜器显然也具有这种发展缓慢的时代特征。曾国青铜器滞缓的特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器物形制的历时性变化不大。无论是对周式青铜器沿用的簋、方甗、盘、匜，还是具有诸侯国个性特征的器类如附耳鼎、折肩鬲、深腹圆壶，它们在两个甚至是三个期别之间的器形变化多数不明显。二是新出现的器类以及有曾国个性的器类少见。以苏家垅铜器群为例，这种九列鼎的铜器群代表了诸侯国铜器中所用的最高等级。这种级别铜器群往往会有新颖的、富有独创性的器类或器形出现。但在苏家垅铜器群中，新兴因素的表现并不充分。以上观察，是基于由周文化青铜器到曾国青铜器的视角，或曰中心文化到地方文化的视角。

但如果我们作一逆向观察，即由地方文化到中心文化方向观察曾国青铜器，从此前我们所分析的方面，也可见曾国青铜器与周式青铜器的如下不同：

1）因对周式青铜器因素的沿用而形成曾国青铜器单一、缺乏多样性的器类、形态特征。这种特征也是不同于中心文化的一个方面。

2）对周式青铜器因素的改造，形成有限的个性，但是这样的变异因素在曾国却相当丰富。如在苏家垅铜器群中可见鼎的附耳宽体、鬲的折肩浅腹、盉的圆体四足、方壶的环带纹装饰特征等①。因此，学者们以周文化为中心的视角，如“曾国生产的青铜器从容器的组合到设计都是拷贝西周晚期的青铜器”② 的结论，并不完全确切。

3）出现少数不见于周式青铜器的特异因素如直条纹鑐、钺。

以上这些不同点，特别是占主体地位的第1）、2）项，正是反映地方青铜文化的一个普遍特性，即其变化幅度始终是在中心文化范畴之内进行。虽然曾国的附耳鼎、折肩鬲等“变异”因素在一些诸侯国如虢、晋青铜器中少见或不见，但它们仍然只是在曾国

① 西周中晚期周式盉或作三足圆体，或作四足椭方体有裆部，都与苏家垅盉不同。苏家垅方壶器形与周式方壶接近，但装饰风格却与一般的方壶不同。不过，这种纹饰却是简单地对圆壶的模仿，详见下节关于纹饰的讨论。

② Jessica Rawson, Chinese bronzes : Art and Ritual, p51. British Museum Publications Ltd, London, 19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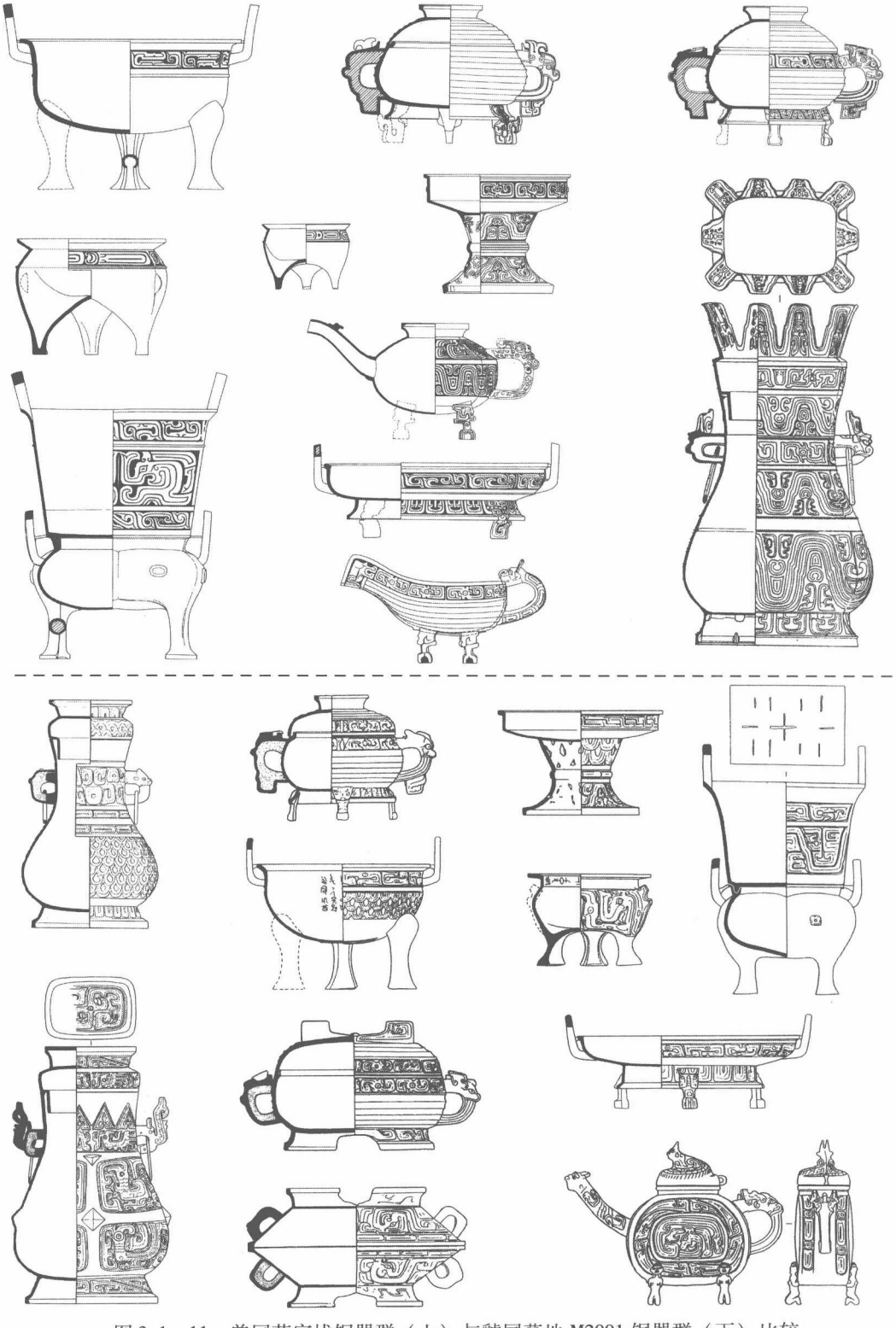


图 3.1－11　曾国苏家垅铜器群（上）与虢国墓地 M2001 铜器群（下）比较

更富有代表性，而不是排他性地不见于其他地域，表明曾国青铜文化仍然是从属于周文化体系，甚至从文化特征上难以总结出作为周文化一个地方类型的个性。这与前述曾国青铜文化从属于周文化的地位一致。

如果我们再着眼于各个不同诸侯国青铜器，上述“沿用”和“异化”所形成的变化，在各个诸侯国或不同区域，逐步形成了各自的个性特征。但同时由于这些“沿用”和“异化”是在周式青铜器风格之下进行，各地青铜文化的总貌，仍然未脱离周文化体系。

第二节 纹 饰

大约始自西周中期，青铜器纹饰开始发生全新的风格转变。其表现是此前以兽面纹和鸟纹为中心题材所形成的以中轴对称为基本布局的纹饰，蜕变为简洁的窃曲纹、重环纹等几何形所形成的每周连续重复性纹样，并一改此前繁缛、变化复杂的动物形纹饰风格。这一变化的意义，是“自周初起沿用了百年的基于宗教目的、以鬼神崇拜为核心的兽面纹体系已完全崩溃”①。

西周晚期诸侯国青铜器直接承袭了上述风格转变，并将这一风格保持到春秋早期。因此第一阶段各时期曾国青铜器纹饰，在种类上所见的窃曲纹、重环纹、瓦纹、直条纹、环带纹、垂鳞纹、龙纹等，都未出周原青铜器纹饰的范围。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曾国青铜器纹饰是对中心区域文化因素的完全照搬，而是有所变化。这种承袭与变化的情形已经在曾国青铜器器形上有明确的体现，但纹饰和器形所代表的文化背景，可能有所不同。

一 纹饰的基本情况

第一阶段曾国青铜器可见窃曲纹、重环纹、瓦纹、垂鳞纹、环带纹、直棱纹、龙纹等种类。此外还有扉棱、波折纹、“Z”形纹等数量很少的纹饰类别。这些纹饰在不同时期的结构，如《曾国青铜器的分期》一章所揭示，除了窃曲纹和龙纹之外，其他纹饰多缺乏明显的时代风格上的变化。例如曾国青铜器的重环纹（图 3.2－1，3），都是以两周阳带构成的重环，在两个大的重环单元之间，多带有同样是两周阳带构成的小桃形重环。重环纹这样的结构在其多见的第一期和第二期均无变化。重环纹中大的重环是否带有小桃形重环，也无早晚变化。在属于第一期的 72 熊家老湾、

① 马承源：《中国古代的青铜艺术》，《中国青铜器研究》第 27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当然，兽面纹是否是“基于宗教目的、以鬼神崇拜为核心”，则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

83 义地岗墓葬青铜器中均见上述两种重环纹在不同器类上分布，但在第二期的段营簋、郭家庙 M17 鬲等青铜器也包含有这两种不同的重环纹式样。由于和重环纹近缘的关系①，垂鳞纹的结构和特征也与重环纹的表现相同，出现在不同器物、不同时期的垂鳞纹，很少出现结构、形态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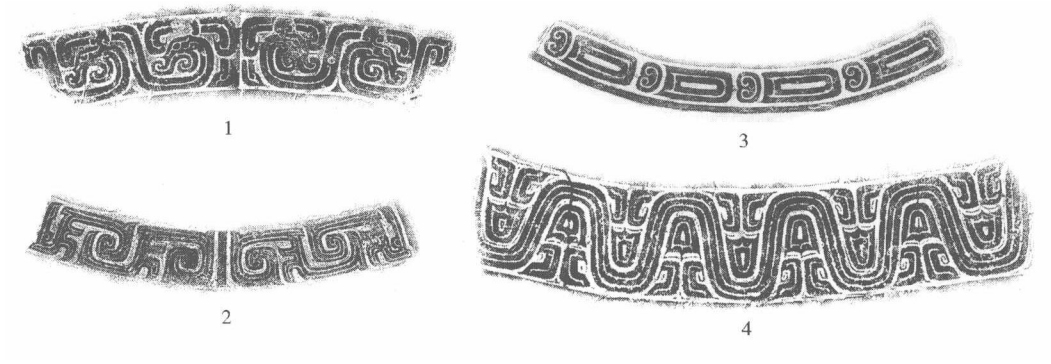


图 3.2－1　第一阶段曾国青铜器主要纹饰种类

1. 龙纹（72 曹门湾鼎）　2. 窃曲纹（72 熊家老湾盘）　3. 重环纹（83 曹门湾簋）　4. 环带纹（苏家垅盉）

结构较复杂的环带纹见于第一、二期，纹样作带状循环起伏之状，其间设以装饰性附件（图 3.2－1，4）。这种传统的环带纹在构图方式上表现颇为一致，且不见于第三期，因此其结构变化很难观察。龙纹在第一阶段的第一、二期多作团身，吻部向前伸出，龙的基本构图还表现出窃曲纹斜对称的意味，在布局上一般是两两相对（图 3.2－1，1）。龙纹及其布局也较复杂，可观察到其演变较快的频率，且第三期变化较此前更为显著。

窃曲纹的种类较多，其构图方式都是以“C”形和“S”形（“S”也可理解为由两个相反的“C”形组成）为基本结构单元。各种窃曲纹各有自身的构图方式，并多是两两正反成组。但同类窃曲纹构图则非常接近，缺乏变化。例如曾国青铜器单“C”形结构的窃曲纹在窃曲纹中数量较多，从第一期到第三期各期共 12 次出现。图 3.2－2 显示，自第一期至第三期这些窃曲纹构图均极为接近，属于第三期的“C”形窃曲纹与第一期的相应纹饰比较，难以看出它们在构图上的差异。

不过，不同类别的纹饰在各期分布的情况有所不同。为进行这一观察，我们可将第一阶段 88 个类次的曾国青铜器出现过的纹饰统计②如表 3.2－1。

表 3.2－1 所示，第一阶段曾国青铜器纹饰分别以窃曲纹、重环纹、瓦纹、龙纹和

① 上海博物馆青铜器研究组：《商周青铜器文饰》第 257 页，文物出版社，1984 年。

② 统计按器物所属期别进行。足、耳等附件纹饰未列入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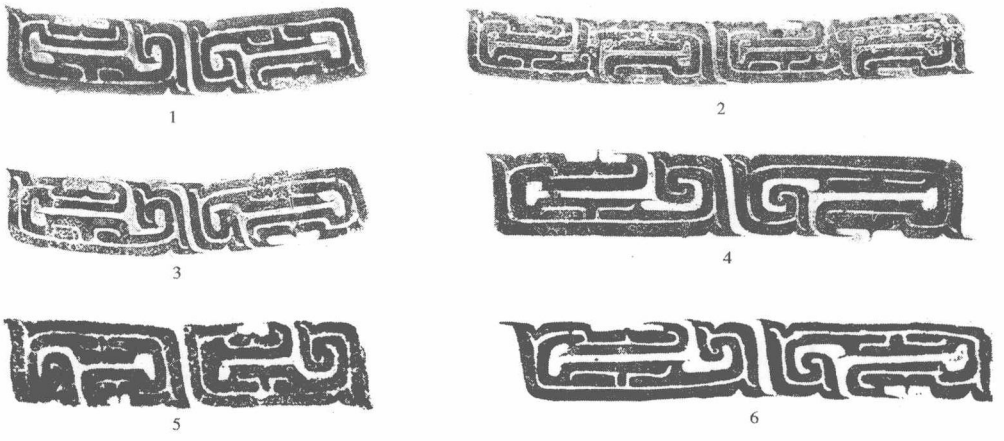


图 3.2－2 第一阶段曾国青铜器各期的“C”形窃曲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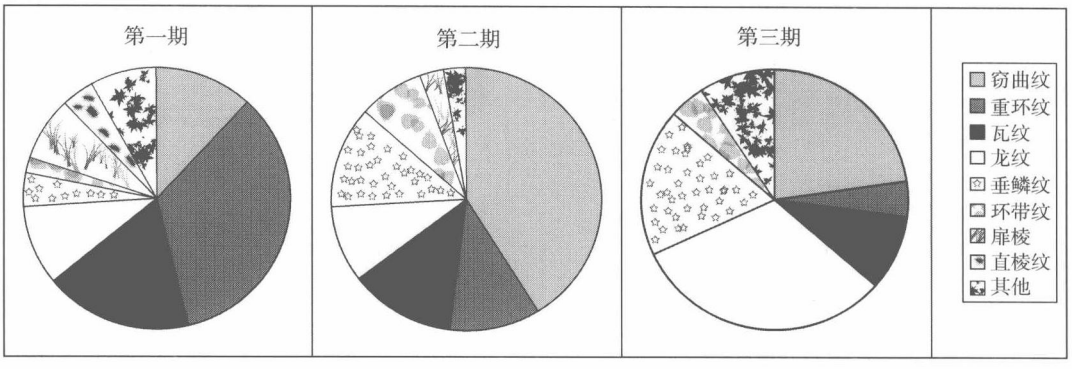
第一期：1. 桃花坡 M1 盘 2. 72 曹门湾鼎 第二期：3. 何家台簋 4. 苏家垅 1 号鼎

第三期：5. 郭家庙 M1 鼎 6. 郭家庙 M6 鼎

垂鳞纹较常见。这些纹饰在不同时期的数量分布上又有所不同。第一期的重环纹数量突出，其分布不仅在簋、鬲类器上，在鼎、甗、盘、匜等器上也较多见。第二期的窃曲纹数量大增，除了鬲一贯装饰重环纹之外，此期多数铜器均可见使用窃曲纹，可见窃曲纹流行之盛。第一、二期纹饰中，窃曲纹、重环纹、瓦纹、龙纹、垂鳞纹、环带纹都有一定数量，纹饰的类别和结构，都近似于周原青铜器，其中窃曲纹和重环纹数量接近半数，是这两个时期曾国青铜器最主要的装饰内容。此外，第一、二期还见扉棱、直棱纹、斜角云纹等装饰，也都与周文化系统相关。但在第三期，龙纹成为最常见的纹饰，一些铜器如簠、盆等，常满饰龙纹。此期龙纹的结构，多相互缠绕，在结构上已经演变成为蟠螭纹，较此前时期的龙纹有较大变化。龙纹并非西周时期青铜器的主要纹饰，其出现颇晚，不仅数量较少，并且多见于勺、匕等附属性器类之中。因此从纹饰的文化属性角度而言，在第一、二期这一大的时间段，曾国青铜器纹饰与周文化更为接近，而至第三期则开始了明显的分化。

表 3.2－1 第一阶段青铜器纹饰统计表

期别	窃曲纹	重环纹	瓦纹	龙纹	垂鳞纹	环带纹	扉棱	直棱纹	其他	总计
1	6	17	9	5	2	1	4	2	4	50
2	30	8	9	7	9	6	2		2	73
3	5	1	2	7	4	1			2	22
总计	41	26	20	19	15	8	6	2	8	145



二　周式纹饰的沿用

如前所述，第一阶段曾国青铜器常见的重环纹、窃曲纹等装饰，绝大多数与西周时期周文化中心区域青铜器纹饰——我们这里姑且称之为周式纹饰——相同，说明曾国青铜器的装饰，主要是对周文化铜器的承袭。这种情形也是两周之际前后其他诸侯国青铜器纹饰的基本特征。但是，这些诸侯国青铜器对周式纹饰的承袭方式是否也是相同？曾国青铜器纹饰在对周式纹饰的继承中，是否还具有其他特点？

曾国青铜器纹饰在单种纹样的构图上，对周式青铜器纹饰的沿用达到了很高的趋同程度，这一点在第一、二期表现得尤其突出。前述曾国青铜器两种重环纹、垂鳞纹都与周原青铜器相应种类纹饰的构图几乎完全相同。在结构相对较为复杂的窃曲纹中，曾国青铜器也与周原青铜器极为近似。

窃曲纹是第一阶段曾国青铜器最常见的纹饰。曾国青铜器几乎所有类别的窃曲纹，都能够找到结构几乎相同的周式纹饰（图3.2－3）。例如，由两个“C”形相叠构成的窃曲纹见于曾国青铜器苏家垅盘、何家台盘和周家岗曾太保簋，它们的结构与逨盘①（图3.2－3，1）、史颂簋（《断代研究》簋74）等器相同。单“C”形窃曲纹在周原西周晚期青铜器中数量较多，这类窃曲纹一般中部带有一目，如四十二年逨鼎（图3.2－3，2）、伯多父盨（《全集》5－80）、梁其盨（《全集》5－81）等，单“C”形窃曲纹也是曾国窃曲纹中常见的种类，但这种窃曲纹一般无目，如苏家垅鼎、桃花坡M1起右盘、郭家庙M6鼎等。可以看出，曾国与周式的单“C”形窃曲纹在构图上是相同的，曾国的单“C”形窃曲纹无目，大约是这种纹饰在曾国的装饰中，已经彻底失去其曾经包含动物形象的意味。曾国其他窃曲纹与周式相应窃曲纹的同一性亦如图3.2－3所示，它们的相似性往往难以相互区别。这里一个值得注意的情况是，这些周式窃曲纹都流行于西周中期和晚期，而在曾国青铜器中，不仅主要见于第一阶段第二期，即便在第三期

①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陕西眉县杨家村西周青铜器窖藏发掘简报》，《文物》2003年第6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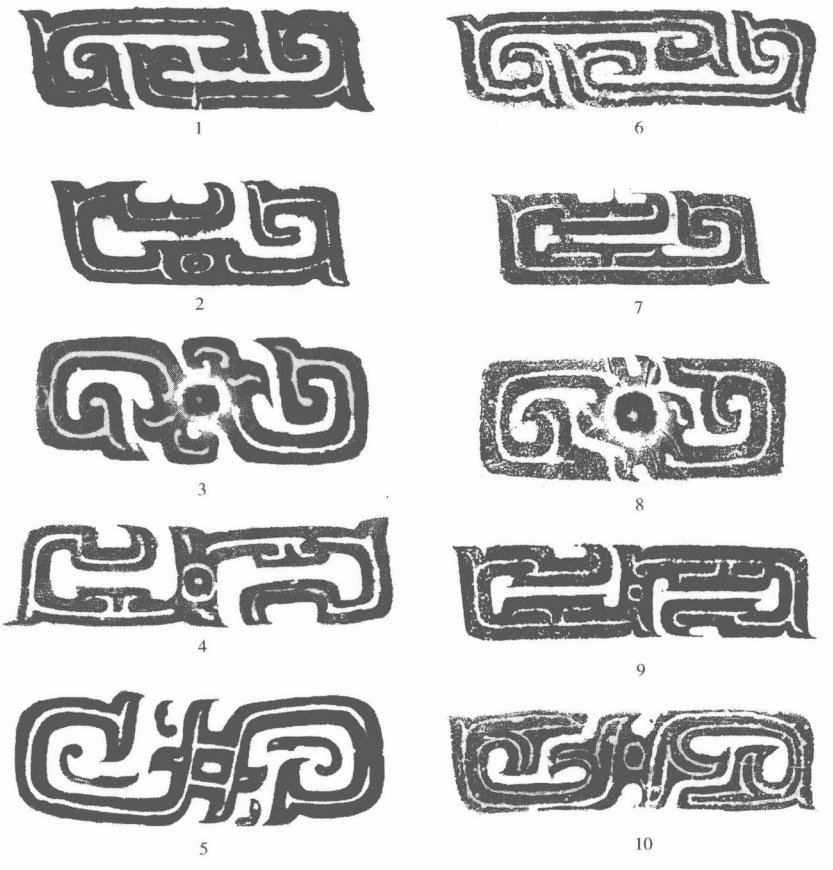


图 3.2－3 曾国青铜器窃曲纹与周式窃曲纹比较

周式窃曲纹：1. 逨盘 2. 四十二年逨鼎 3. 伯公父壶盖 4. 兽宰簋 5. 三年瘐壶

曾国窃曲纹：6. 苏家垅盘 7. 苏家垅 1 号鼎 8. 苏家垅豆 9. 郭家庙 M17 鼎 10. 周家岗盘

中也依然存在。属于第三期的周家岗盘装饰的并列双“C”形窃曲纹和郭家庙 M1、M6 鼎的单“C”形窃曲纹等，结构仍然相似于周式相应纹饰。这也就是说，曾国青铜器对于周式纹饰的沿用，是从第一到第三期一二百年的时间段内。这种沿用，基本多是不加改变的原形模仿而缺少创新和改进。

窃曲纹是“从动物形象变化而来”①，从周原青铜器可以明显观察到窃曲纹这一变化历程，即西周中期从兽面纹、鸟纹分化并作中轴展开、左右对称的布局，到西周晚期抽象为几何构图的对称布局，并最终发展到几何构图的连续、单向排列。曾国青铜器所继承的是周式窃曲纹最新的发展形式。除了 72 熊家老湾盘近于鸟纹的窃曲纹（图3.2－

① 容庚等：《殷周青铜器通论》第 115 页，文物出版社，1984 年。

1，2）仍然保持对称的做法之外，其他曾国青铜器纹饰都是作连续排列的。

但是，曾国青铜器纹饰在整器的组合上，又多遵从周式青铜器模式。比如，鼎、簋等器类器口往往为一周条状纹饰，在第一期，这周纹饰多为重环纹，第二期为窃曲纹。簋与匜的下腹一般为瓦纹，其他器类下腹多垂鳞纹和龙纹，器物圈足饰垂鳞纹等等。环带纹等幅面较大的纹饰，装饰在方甗、壶等这样一些大型的青铜器上，使纹饰与器形协调一致，并形成器形厚重、装饰复杂的豪华风格。

两周之际及前后其他诸侯国青铜器纹饰从类别到构图也多是沿用周式青铜器纹饰，但在一些具体的做法上有不同的选择。以虢国为例①，虢国青铜器也常见窃曲纹、重环纹、瓦纹、垂鳞纹、龙纹、环带纹，但这一时期少见的鸟纹在虢国青铜器中却有一定数量。虢国青铜器也高频率地使用某类别纹饰，但该类纹饰的构图存在较丰富的变化，而不像曾国青铜器纹饰那样单调地局限于某一形制。如虢国青铜器多见“S”形单目窃曲纹，但即便是在 M2001 的列鼎上，这种窃曲纹在不同鼎上的构图也仍然有所变化。虢国青铜器单种纹饰包含的变化较曾国青铜器纹饰为多，如虢国青铜器重环纹有从单环到三环的变化。虢国青铜器纹饰在器物上的布局和组合也与曾国青铜器有所不同。如分布在虢国青铜簋口部的窃曲纹经常是作左右对称的分布，这更接近周原青铜器西周晚期略早的形式，而区别于曾国青铜器。虢国的多数高级别铜器群也较多地使用窃曲纹，但整个虢国青铜器纹饰使用的多样性仍然要大于曾国。如果比较苏家垅和虢国墓地 M2001 青铜容器纹饰（表 3.2－2），会发现两个铜器群纹饰组合较为类似，但 M2001 青铜器使用纹饰种类较多，在单器上复杂程度和变化均略大于曾国青铜器。

表 3.2－2　　苏家垅与虢国墓地 M2001 青铜器纹饰组合比较

器类	苏家垅铜器群	虢国墓地 M2001 铜器群
鼎	窃曲纹	窃曲纹、垂鳞纹
鬲	重环纹	龙纹
方甗	窃曲纹、龙纹	窃曲纹、环带纹
簋（有铭）	窃曲纹、瓦纹	窃曲纹、瓦纹、垂鳞纹
簋（无铭）	瓦纹	
簠		龙纹、重环纹
盨		窃曲纹、瓦纹
方壶	环带纹、窃曲纹、垂鳞纹	背带纹、鸟纹
圆壶		重环纹、环带纹、重环纹

①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三门峡虢国墓（第一卷）》，文物出版社，1999 年。

续表 3.2－2

器类	苏家垅铜器群	虢国墓地 M2001 铜器群
豆	窃曲纹、环带纹	Z 形纹、重环纹、环带纹
盉	环带纹、龙纹	龙纹、窃曲纹
盘	窃曲纹、垂鳞纹	窃曲纹、垂鳞纹
匜	窃曲纹、瓦纹	

说明：空白栏目表示无该器类。

曾国与虢国青铜器纹饰这种不同，可能与虢国地处中原地区近于中心文化区域相关。同时，虢国青铜器纹饰较曾国为甚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也可能与两个国家青铜文化的发达水平不同相关。

三 纹饰的模式化组合

如上所述，曾国青铜器纹饰对周式纹饰的继承，具有较明显的单一性。这种单一性表现在纹饰类别变化较少、同类纹饰的构图变化较小、同类器形上纹饰组合搭配变化较少等方面，它不仅表现在同一时期的同一器群中，更表现在不同时期青铜器上。以下从纹饰在某一器类的组合上观察这种单一性。

周式青铜器纹饰在器物上的组合，常有一些较固定的搭配。曾国青铜器继承了这样一些搭配组合的基本原则，并进一步强化，构成更为稳定的装饰组合，即某种或某几种组合形式重复出现，变化单调，可以称之为模式化组合方式。

这种模式化在不少器类上表现突出。例如曾国的扁体附耳鼎，口沿下几乎都是饰一周单“C”形窃曲纹。曾国多数的鬲，或者说全部的折肩扁腹鬲，肩部均饰一周重环纹。这两种装饰模式与其器形结合，形成富有个性的形制特点，使该类鼎、鬲成为曾国青铜器近似独有的形制特征①。

上述鼎、鬲类铜器都只是装饰一周纹饰。在一件铜器装饰多周纹饰的情形下，其纹饰的组合可能会出现较多的变化。但是在曾国青铜器纹饰中，多周纹饰也往往形成相对固定的搭配。例如，瓦纹常常装饰在簋、匜的下腹，也就是说，簋与匜装饰变化不是体现在装饰幅面较大的腹部，而是在其器口。这是簋匜与其他器类的不同之处，当然这也是周式装饰的一个基本特征。簋的装饰幅面较大，两周之际簋往往是盖部纹饰两周、器体纹饰三周：口、下腹、圈足各一周（图 3.2－4）。曾国青铜簋的这五周纹饰，除了瓦

① 扁体附耳鼎和重环纹鬲最为曾国所见。因此王恩田认为山东出土的附耳窃曲纹的上曾太子般殷鼎属于湖北之曾。王恩田：《上曾太子鼎的国别及其相关问题》，《江汉考古》1995 年第 2 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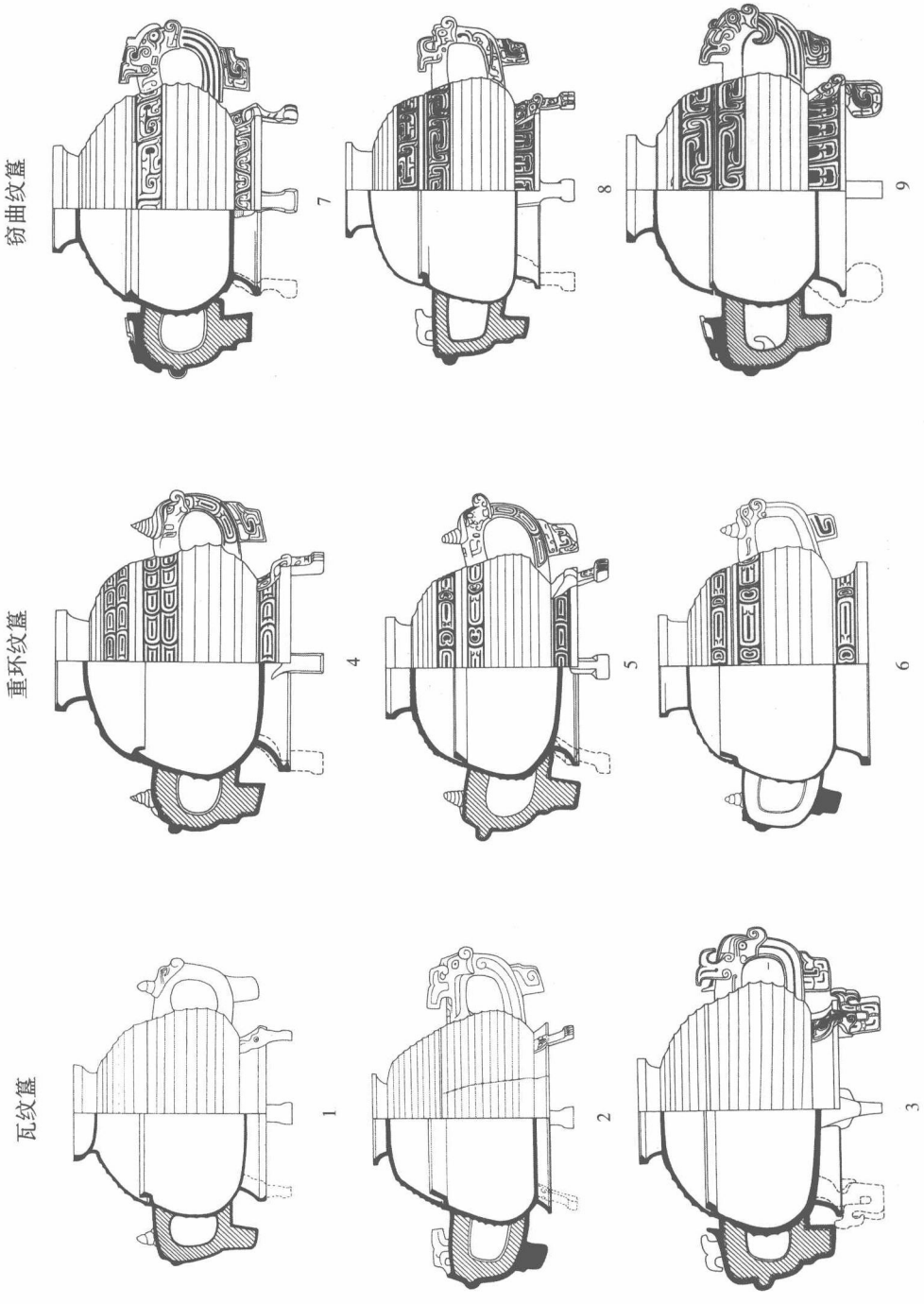


图3.2－4　第一阶段曾国青铜簋模式化装饰

1. 桃花坡M2簋　2. 72曹门湾簋　3. 苏家垅簋　4. 72熊家老湾曾仲大父簋　5. 70熊家老湾曾伯文簋　6. 段营簋　7. 苏家垅无铭簋　8. 何家台簋　9. 曾太保簋

图 3.2－5 西周晚期方壶的纹饰
（颂壶，《全集》5－151）

纹之外，由窃曲纹、重环纹、垂鳞纹相互组合，它们的搭配相对固定，由此形成几个不同装饰模式。这些模式可见两个方面的原则：其一，盖与器口纹饰一致。若器口纹饰为重环纹，则盖口纹饰亦为重环纹。这样，器口若为瓦纹，则形成全瓦纹簋。在周原青铜器中，全瓦纹簋均为环耳。根据曾国青铜簋的装饰原则，可知曾国全瓦纹簋的发展系列与周原青铜器并不完全相同。其二，圈足纹饰与器口纹饰相互协调。若器口纹饰为窃曲纹，则圈足多饰垂鳞纹；若器口饰重环纹，则圈足往往也饰重环纹；全瓦纹簋圈足均为素面。簋在装饰因素相互协调的做法还延伸到耳、足等附件。如重环纹簋双耳上装饰螺旋状角，相应的，窃曲纹和瓦纹簋双耳上兽角多作扉棱状。由图 3.2－4 可以看出，曾国青铜簋装饰风格的整齐划一。

曾仲斿父方壶的造型多为西方美术史家所推崇①。此方壶与两周之际前后周式方壶器形接近，因此其引人注目之处是其纹饰组合形式。我们知道周式方壶纹饰基本为龙纹和背带纹两种类别，这些纹饰充分利用方壶器形高大、装饰空间较大的优势，往往在方壶颈部以下形成构图完整、单元幅面很大的装饰，其作风粗犷有力（图 3.2－5）。但曾仲斿父方壶与周原地区出土方壶的纹饰不类，它看上去是一种全新的纹饰设计：以多周环带纹为主体纹饰，颈部以下空间被分割成三个不同的纹带。不难发现，曾仲斿父方壶纹饰虽然在周式方壶中十分独特，但它其实只是直接引用于曾国的圆壶。试比较曾仲斿父方壶与曾伯陭圆壶②各有的七周纹饰形

① Robert W. Bagley Transformation of the Bronze Art in Later Western Zhou, p248. The Great Bronze Age of China: an Exhibition fro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dited by Wen Fong.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New York, 1980. Robert L. Thorp, The Sui Xian Tomb: Re－Thinking the Fifth Century. Artibus Asiae, Vol, 43, No. 1/2. (1981), pp67－110. Jenny F. So, Eastern Zhou ritual bronzes from the 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s, p15, Washington, D. C. 1995.

② 杨新、张临生：《国宝荟萃·北京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品精华》第 21 页，商务印书馆，香港，1992 年。

1

2

图 3.2－6　曾仲斿父方壶与曾伯陭圆壶纹饰组合比较

1. 曾仲斿父方壶　2. 曾伯陭圆壶（《国宝荟萃·北京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品精华》第 21 页）

成的组合（图 3.2－6）：

曾仲斿父方壶			曾伯陭圆壶	
盖	环带纹	←－－ －－→	盖	环带纹
	窃曲纹			窃曲纹
器	环带纹		器	环带纹
	窃曲纹			窃曲纹
	环带纹			环带纹
	环带纹			环带纹
圈足	垂鳞纹		圈足	垂鳞纹

从以上对比可见，曾仲斿父方壶纹饰的种类、由盖至圈足各周纹饰的次序都与曾伯陭圆壶完全相同，两件壶的纹饰以阳线凸起的风格也都相同。曾仲斿父方壶这种纹饰组合在曾国并非是曾伯陭圆壶这一孤例，而是曾国其他圆壶纹饰组合的基本风格，曾国圆

壶从段营环带纹圆壶至周家岗圆壶也都是以类似环带纹为主体装饰。因此曾仲斿父方壶纹饰的设计方式与其说是直接引用自曾伯陭圆壶，不如说是受到曾国圆壶纹饰影响。圆壶的数量更多，其纹饰如上所述的组合方式已经颇为成熟。曾仲斿父方壶颇具视觉效果的装饰，仅仅需要对圆壶纹饰模式的简单复制而已。

由于一件器物往往可以装饰多种纹饰，同一纹饰又可能有多种结构变化，因此青铜器纹饰易于呈现多样性。但曾国青铜鼎、鬲、簋、壶等器类所表现出来的模式化作风，使同一构图形式的纹饰反复出现，也使一种或几种纹饰组合形式反复出现，它的表现形式具有单调、简化的趋向是明确的。它可能反映作为方国青铜文化受区域和等级所限，器物的多样性会远不及文化中心区域。纹饰模式化作为诸侯国青铜器制作水平局限性的一个表现，在这一点上，曾国青铜器器类与器形也有相似之处。另一方面，曾国铜器这一特征也正是两周之际时代特征的反映：各区域文化面貌的高度同一性，青铜器铸造趋于简易①。

当然，模式化装饰并不意味着所有器物纹饰的绝对统一。曾国青铜器不少铜器的装饰又有与该类器的主流装饰不符之处。出现这样的变化，有时可能是纹饰设计方面的问题。72 曹门湾鼎饰二周纹饰，上腹所饰每个窃曲纹的方向均相同，这与窃曲纹总是作正反相邻的布局模式不符，较为罕见。70 熊家老湾曾伯文簋盖、器口、圈足各饰一周重环纹，与一般重环纹簋纹饰组合相同。一般情况下，曾国青铜簋的盖、口、圈足三周重环纹往往方向相错②，但几件不同的曾伯文簋重环纹方向并不一致（图 3.2－7）。湖北省博物馆藏曾伯文簋三周重环纹凹入的一端，分别为左—右—左，方向相错。襄樊市博物馆藏曾伯文簋三周重环纹凹入的一端，分别为右—右—左，盖与器口纹饰方向相同。襄樊市博物馆藏簋盖部纹饰的不一致，出现在同一套器物当中，可能是设计纹饰时的粗疏所致。

四 纹饰的制作

两周之际前后青铜器纹饰以窃曲纹、重环纹、环带纹、垂鳞纹、龙纹占绝大多数，从制作技术的角度而言，这些纹饰可分两大类别，一类纹饰作阳线凸起，即以双阳线表示一条纹带；另一类纹饰以平雕的宽带表示。两类纹饰的制作方式应当不同。

阳线纹饰数量较少。曾国装饰此类纹饰的有曾仲斿父方壶（图 3.2－8）、段营环带纹圆壶、曾伯陭圆壶，年代均属于第二期即两周之际。周原青铜器中此类纹饰也主要见于圆壶（《断代研究》壶 5－8），但又偶见于方座簋（《周原》5、窖藏 1026）。这种凸

① 孙华：《中国青铜文化体系的几个问题》，《考古学研究（五）》，科学出版社，2002 年。

② 周式青铜器簋没有这样一个固定的设计方式。

1

2

图 3.2－7　曾伯文簋纹饰组合

1. 湖北省博物馆藏　2. 襄樊市博物馆藏

起阳线纹饰的圆壶与方座簋沿用时间很长，直至战国早期仍然可见，如陈喜壶等（《全集》9－26），因此形成了一种较独特的文化传统。在制作上，由于阳线纹饰在青铜器器表作弧面凸起，因此难于在模上塑出，这类纹饰应当是在泥范上阴刻而成的。如作仔细观察，在阳线凸起的纹带中间，另有与阳线平行的阴线。阴线若在泥范上制作，则需要塑出凸起的阳线。近年在周公庙发掘出的陶范表明①，单线的阳线可以通过在泥范上贴泥条的方式完成。曾仲斿父方壶阴线偶尔中断，即可能是贴出的泥条损毁所致。此外，曾仲斿父方壶范缝两侧纹饰或有错缝情况，也可能是因为在不同泥范上制作纹饰难以对齐。总之，上述几个方面情况，均指示凸起的阳线纹饰是范作的。

图 3.2－8　曾仲斿父方壶的范作纹饰

平雕阳带纹饰是一般窃曲纹、环带纹、重环纹等纹饰的装饰方式，占两周之际纹饰的绝大多数。这类纹饰线条简洁，既不作半浮雕凸起，也没有阳线的地纹作衬，风格与上述阳线纹饰差异较大，更与早些时期的兽面纹、鸟纹不同。阳带纹表面与器表平齐，纹路粗犷。在制作上，这种纹饰既可以在模上雕出，通过翻模方式制范，也可以直接在范上刻出。平雕纹饰的制作过程，如贝格立所推测的那样，在用墨线画出纹

① 陈阳：《周原铸铜遗址所出陶范的初步研究》，《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打印本），2005 年。

1

2

图 3.2－9 曾国青铜器的模作纹饰

1. 湖北省博物馆藏曾伯文簋 2. 曾子单鬲

样图形后，如果是范作，需要雕出纹样部分，而如果是模作，则只是雕出纹样周围空白部分①。西周中晚期及其后，广泛被采用的纹饰制作方式大约是模作，这在曾国青铜器中可见实例支持。一方面，大部分青铜器中阳带状纹饰与器表处于同一平面，说明制作时是在模上剔除纹饰周边的空白部分。另一方面，纹饰与范缝的位置关系也清楚地表明范作的迹象。重环纹数量在曾国青铜器中颇多，大部分重环纹的分组与范缝位置重合，但也常见范缝打破重环纹现象。湖北省博物馆藏曾伯文簋兼有这两种情况：簋器身重环纹按范缝分组，而簋盖出现范缝穿过一个纹饰单元（图 3.2－9，1）。在一般情况下，范缝位置往往会照应到纹饰的分组，即范缝往往位于各组纹饰之间。如果纹饰为范作，纹饰分组当然会协调与分范，绝不会形成同一组纹饰跨越两块陶范的情况。曾国不少的折肩重环纹鬲，如曾子单鬲（图 3.2－9，2）、苏家垅无铭鬲等，都有范缝穿过重环纹现象。这些都说明重环纹应当是在模上完成，出现范缝与纹饰单元不一致的情形，是制作纹饰时比较随意，未能按照范缝的位置设计纹饰的分布，因此在分范时同一纹饰部件被分在不同的范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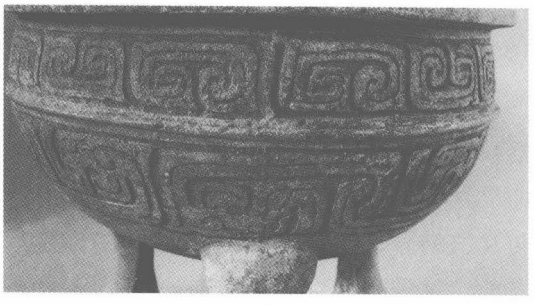
除了重环纹之外，平雕阳带纹饰在其他纹饰上也可见模作的例子。环带纹的构图往往是作循环式波曲，在环带纹与其上范缝交错处，范缝往往不是均衡地经过纹饰。例如苏家垅盉、83 曹门湾圆壶等铜器，这些痕迹也可能是模作纹饰的反映。

72 熊家老湾黄季鼎②下腹的龙纹为一周 5 组，这是较罕见的现象，因为一周纹饰的

① Robert W. Bagley, Shang Ritual Bronzes: Casting Technique and Vessel Design, pp6－20. Archives of Asian Art, 43, 1990.

② 黄季鼎系黄国青铜器，并非为曾国铸造，但其纹饰构图、结构与曾国青铜器均相同，制作方式也应当相同。

组数往往是合范数量的倍数。5 组纹饰在三分范铸形的鼎中无法做到纹饰在泥范上的均分，说明纹饰为模作，黄季鼎范缝打破纹饰即反映了这一现象（图 3.2－10，1）。其实在一般的情形下，模作纹饰应当是经过设计的，因此纹饰与范缝不吻合的情况并不多见。黄季鼎一周 5 组纹饰的布局可能为纹饰安排失当所致。根据该鼎龙纹布局推测，龙纹的制作是由模上刻出，其起始处在第一足处的范缝右侧，因此当龙纹行至第一足范缝左侧时，空间已不足，故最后一个龙纹被省略处理（图 3.2－10，2），没有能够表现出如同该鼎其他完整龙纹（图 3.2－10，3）那样由首及尾的部分。



1

2

3

图 3.2－10　黄季鼎模作的纹饰

1. 第 3 足以上的龙纹被范缝打破　2. 第 1 足以上右侧为龙纹的起始，左侧龙纹不完整　3. 第 2 与第 3 足之间完整的龙纹

通过对曾国青铜器纹饰制作过程的观察，现在我们可以理解西周中晚期纹饰由单元轴对称向单向连续性排列转变的技术背景：制作简化的趋向。西周晚期以来的连续性排列纹饰，其模作方式无需像早期模作纹饰那样，将模上纹饰单元精确地划分为三个部分，以便各纹饰单元准确地对应于三块外范。上举诸例纹饰的分组，都没有与分范单元对应。那些纹饰分组与分范单元对应者，各组纹饰也不规范，而是可能在一周纹饰中，各组纹饰的个数各不相同，或者各个纹饰单元大小不一。这些情况与其说是纹饰制作的随意性，不如说是对制作技术要求的降低。这一时期纹饰的制作者，只需顺沿器模的纹带，连续画出构图相同的纹饰单元，这些单元可能大小不一、无需左右对称、无需一定与分范对应。类似曾国这样的诸侯国青铜器，纹饰类别不多，纹饰制作自然可以不是一件高技巧性工作。

五 小 结

如同器类、器形与周式青铜器的关系一样，曾国青铜器纹饰也表现出与周式青铜器纹饰一致的特征。这种一致性表现在：纹饰单元构图与周式纹饰相同，如两者的窃曲纹鲜有不同；纹饰在器物上形成的组合与周式纹饰一致，如曾国青铜器窃曲纹常常与瓦纹结合；纹饰在各种器类上的出现基本一致，如壶类器常见环带纹等。在第3期之前，这种一致性如此之强，使曾国青铜器纹饰呈现出很强的单一性：极为有限的纹饰类别，这些类别形成少有变化的组合形式，并在器物上几乎固定地使用某类或某种组合形式。

上述的单一性，构成了第一阶段曾国青铜器纹饰的个性因素。曾国青铜器在一个时期反复、较多地使用某类纹饰，或者在某类器物上较多地使用某类纹饰，纹饰的变化不像周文化中心区域那样稍稍多样。而某些纹饰的频繁使用形成了曾国青铜器特有的装饰习惯，例如壶类器一般使用窃曲纹和环带纹组合。因此，曾国青铜器长时间地使用某些装饰手法而鲜有改变，也不能不说是一种个性特征。曾国青铜器纹饰表现出的这种单一、缺乏变化的特点，既是曾国作为诸侯国表现出来的文化单一性的特质，曾国青铜器装饰在类别上对纹饰的偏好，又说明曾国已经形成一些自身的装饰习惯或风尚。曾国青铜器纹饰的时代变化缓慢，则可能是因为西周文化中心的覆灭，诸侯国青铜器因之缺乏从技术到艺术设计因素的来源，青铜器水平的发展受到局限所致。

第三节 铭 文

第一阶段曾国青铜器铭文共见47类次，绝大部分为铸铭，其中1例为刻铭。铭文的基本情况可列如附表4。这些铭文中有曾国标识的可见36个类次。由于我们这里讨论的是“曾国”的青铜器铭文，黄、卫等国明确属于他国青铜器的5个类次青铜器铭文就不应该包括在内。其他未标明国别的6个类次铭文如起右盘、黿乎簋等，以及国别不可识别的2个类次如□伯鬲等，它们极可能属于曾国青铜器，这里将其铭文纳入本节考察对象。

受其时周式青铜器铭文风格的影响，特别是作为诸侯国青铜器，第一阶段曾国青铜器铭文尤其罕见记录历史事件等史料性内容。但铭文既是对其拥有者的表达，也会反映制作者（作坊工人）对其理解程度。因此作为一项文化因素，铭文外在形式的探究，也会揭示出曾国青铜器在当时大文化背景下的地位。

一　辞　例

西周早期及其后，青铜器铭文比较长篇的内容开始多见。这些铭文的内容，多是因为战争、册封、赏赐等事件而作的纪念性文字。其作用，既是用以树立贵族的权威，又是为加强宗法制度①。西周中期以后，强调作器者、表达传遗子孙愿望的铭文多了起来。例如曾国青铜器铭文中，“曾”这一称谓被特别强调。第一阶段曾国青铜器中，除了其他国家以及国族标识被破坏的铭文，只有起右盘和黿乎簋②这两例年代较早的铭文没有曾国标识。铭文内容也大量使用致福于被祝愿者的嘏辞。由于这一时期青铜器主要为自作器，嘏辞实际上往往是对器主本人及其后代的祝福，这些表达祝愿之意的套语构成这一时期铭文的主要内容。不仅如此，青铜器铭文作器的方式、器物的自铭，也往往是由一些搭配相对固定的套语组成。铭文这些辞例，在不同的级别、不同的诸侯国可能存在不同，它反映出一个地域或国家的语言习惯、社会风尚或者其他方面的信息。以下我们分别从嘏辞的使用、作器方式、自铭等方面进行考察。

1. 嘏辞

从嘏辞的角度看，第一阶段曾国青铜器铭文辞例大体可分为如下五种类型，它们在各期的出现情况如表3.3－1③。

表3.3－1　　第一阶段曾国青铜器铭文嘏辞登记表

期别	Ⅰ	Ⅱ	Ⅲ	Ⅳ	Ⅴ
第1期	3	5		1	1
第2期	5	4	2	3	3
第3期	1	3	3	2	2
总计	9	12	5	6	6

各类辞例格式如下：

第Ⅰ类：不带嘏辞，只标明作器情况。如曾仲斿父豆：“曾仲斿父自作宝甫”。

第Ⅱ类：带有“子孙永保用享”一类嘏辞。如曾仲子敔鼎：“曾仲子敔用吉金自作宝鼎，子孙永用享。”

---

① 马承源主编：《中国青铜器》第358－35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

② 黿乎簋的年代在苏家垅铜器群中较早，见第二章材料分析一节。

③ 统计时按该器所在单位归纳期别。如曾太保簋仍然归入第3期。

第Ⅲ类：带有“则永祜福”一类嘏辞。如曾孟嬴削簠：“曾孟嬴削自作行簠，则永祜福。”或曾孟嬭谏盆：“曾孟嬭谏作饔盆，其眉寿用之。”

第Ⅳ类：第Ⅱ类辞例再加入“眉寿黄考”一类嘏辞，是第Ⅱ类辞例的繁化。如曾伯文簋：“唯曾伯文自作宝簋，用赐眉寿黄耇，其万年子子孙孙永保用享。”

第Ⅴ类：是第Ⅳ类辞例的继续繁化，可称之为繁式嘏辞。如曾仲大父蟺簋：“唯五月既生霸庚申，曾仲大父蟺迺用吉攸（鉴），叙乃雒金，用自作宝簋。蟺其用追孝于其皇考，用赐眉寿黄耇霝终，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享。”

以上五类辞例以第Ⅱ、Ⅳ、Ⅴ类包含“子孙永保用享”一类嘏辞的数量占大多数。繁式嘏辞除了见于苏家垅铜器群中的鼋乎簋之外，其他均为曾子某或曾伯某所作之器，这些说明繁式嘏辞可能多为等级较高者所使用。但嘏辞的繁简，与社会等级并无绝对的关联，例如曾子伯沓盘有：“唯曾子伯沓用其吉金，自作旅盤。其黄耇霝（令）終，万年无疆，子孙永宝用享”。同人所作之器曾子伯沓匜句式简洁：“唯曾子伯沓自作尊匜”。此外，五类辞例在表 3.3－1 的分布显示，它们的使用情况在不同的时期变化不大，即这些习惯用语较长时期内在曾国具有相当的稳定性。

上述辞例格式大体反映了两周之际前后周文化青铜器铭文辞例特征。西周中期，周文化中心地区青铜器已出现“子子孙孙永宝用”辞例，西周晚期“某作某某器，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的辞例及其繁式已经常见①。曾国青铜器铭文所表达的意愿、辞例构成，都与其时的风格一致。当然，一些个性因素仍然存在，如曾国青铜器铭文“永宝用”或“永用”后常常加“之”，嘏辞中常用“眉寿黄考”之辞，这些辞例在中原地区都相对少见。当然，类似个性因素往往并非为曾国铜器铭文所独有，如“则永祜福”辞例又多见于黄国②。

2. 作器标识

第一阶段曾国青铜器铭文所反映的作器标识有如下几类情况：

第一类：某人“作”或“用作”某器，这种作器标识的辞例凡 6 类次。如曾太师鼎：“曾太师[illegible]作鼎。”又如曾太保庆盆：“曾太保庆，用作宝皿。”

第二类：某人“自作”某器，这种作器标识的辞例凡 9 类次，其铭文往往较为简洁。如曾子尿簠：“曾子尿自作行器，则永祜福。”

第三类：某人“用其吉金”或“择其吉金”等“自作”某器，这种作器标识的辞例凡 18 类次，其铭文多较繁复。如曾子仲谌鼎：“唯曾子仲谌，用其吉金自作鼒彝，

① 张振林：《试论铜器铭文形式上的时代标记》，《古文字研究》第 5 辑，中华书局，1981 年。

② 河南信阳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光山县文物管理委员会：《春秋早期黄君孟夫妇墓发掘报告》，《考古》1984 年第 4 期。

子子孙孙其永用之。”

第四类：其他情况，共5个类次，其中有一例为媵器，也有铭文漫漶不清的，亦归于此。

上述第一类的某人“作”某器，实际上就是自作之器，从第一类作器标识所举之例，可以看到这一点。第三类实际是第二类的繁式，如曾仲斿父豆：“曾仲斿父自作宝甫”。而曾仲斿父方壶：“曾仲斿父用吉金自作宝尊壶”。它们是以不同的语气表达器主作此豆、方壶。这样，第二、三类有27类次铜器明确为器主自作之器，自作之器占统计的全部38类次礼器中的71%。因此，第一阶段曾国青铜器，除了媵器之外，可判断作器者的铜器，都是器主自作之器。这里的自作，是器主强调对该器的所有权的一种标识。

以上作器标识反映了西周晚期以来青铜器作器目的的变化。西周早中期青铜器，或是为先辈所作，或是为纪念一次战争、赏赐等值得颂扬的活动而作，作器者往往居于相对次要的地位。西周晚期及以后，如同曾国青铜器这样器主自作之器的情况数量大增。虢国墓地M2001有铭铜器多为虢季作某器，方式如上述第一类铜器。这说明整个西周晚期及以后的青铜器，都在强调器主自我的地位和对该器的拥有。作器标识的这种变化，反映的是西周晚期前后青铜器铸造背景、铸器者价值观的颇大变化。

3. 自铭

第一阶段曾国青铜器铭文的自铭情况，可统计为表3.3－2。据此统计，曾国青铜器自铭最常见的形式，是器类名之前加“宝”、“尊”以及它们相叠称，形成自铭如“宝鼎”、“尊盘”、“宝尊壶”、“宝甫（豆）”等。这些自铭，也是西周青铜器常见的名称①。它们都只是对器物的一种泛称，并不指代器类的性质，因此上述自铭覆盖了食器、酒器、水器等全部青铜礼器。其他较常见的“旅”某器、行器、鼐彝等自铭，也都是可以指代不同类别铜器。学者或认为“行”、“行器”是“贵族专为出行时制作的用器”，器小而粗糙②。其实，曾国青铜器中自铭为“行器”的曾亘嫚非录鼎、曾子伯詣鼎、曾子尿簠，以及自铭为“行簠”的曾孟嬴削簠，铭文的一个突出特征是都带有“永祜福”这样的嘏辞，它们形成一个固定的辞例搭配。上述器物体量多较大，“行”并不代表有出行之意。这样，在曾国青铜器中表明器类性质的自铭只占少数，如鬲鼎、醴壶、饮鑐、盥盘等。

① 张亚初：《殷周青铜鼎器名、用途研究》，《古文字研究》第18辑，中华书局，1992年。

② 张亚初：《殷周青铜鼎器名、用途研究》，《古文字研究》第18辑，中华书局，1992年。

表 3.3－2 第一阶段曾国青铜器自铭登记表

自铭	鼎	甗	鬲	簋	簠	豆	方壶	圆壶	盆	鑐	盘	匜
宝	5		1	4		1			1		1	
尊			2									1
宝尊			1				1					
旅		1			1				1		1	
行器	2				1							
鼒彝	2				1							
其他	3				2			醴壶	饗盆	饮鑐	盥盘	

上述自铭绝大多数未体现出有明显的时代变化的迹象，如最常见的“宝”、“尊”形成的自铭均见于第一至第三期。不过，少数自铭的使用可能仍然具有时代意义。属于第三期的曾侯作叔姬簠的自铭使用“鼒彝”，系借用鼎的自铭，在同时期铜器中不多见。簠类器在曾国青铜器中均晚出，它们的自铭可能代表了一些新出现的因素。曾孙史夷簠和曾孟嬴削簠的自铭分别为“飤簠”、“行簠”，而以“飤”、“行”加器类名称作为自铭，正是第二阶段曾国青铜器和相应时期楚系青铜器最为常见的自铭形式。因此，第三期铜器自铭表明，此后的楚系青铜器铭文的一些因素已经开始露出苗头。

二 行 款

行款是铭文在青铜器上的总体布局、排列方式等，也是铭文在青铜器上的表现形式。曾国青铜器行款一般与周原青铜器相同，但有相对较多的特别、规范程度不高的因素，这些因素表现于铭文在青铜器上的位置、排列方式甚至铸造纰疵等方面。

1. 位置

铭文位置在商周青铜器不同时期不同的器类上，基本上都是有规律的、位置相对稳定的。春秋中期以前，青铜器铭文绝大多数是铸在青铜器内壁，但器物形制不同，铭文的位置也各有不同。簋、簠、壶等带盖器均为器与盖对铭，但簋、簠铭文位置在底部中央，而西周晚期及其后壶的铭文在盖子口和颈内。鼎铭一般在鼎第 3 足对应的腹部内壁，而盘的铭文在内底中央。如此等等。

总体来说，第一阶段曾国青铜器铭文的位置与周原等地青铜器相同，但相当多的器类铭文位置有特别之处。曾国的若干鼎铭文在腹部内壁的位置偏离第 3 足，或出现在第 1、2 号足之间的器内壁，如曾伯从宠鼎和曾仲子敌鼎；或对应在第 2 号足内壁，如曾太师鼎。这种不规范的做法，在诸侯国青铜器中有较多相似的例子，如襄阳王坡 M1 邓

公鼎铭文也作曲向排列①。类似的例子在豫南鄂北一带铜鼎中较为多见。

鬲的铭文位置，周原青铜鬲铭文多在与口沿相接的颈部内壁，虢国青铜鬲铭文也作如此安排②。曾国铜鬲铭文均在口沿沿面之上，这一做法在周原铜鬲上已经出现，如微伯鬲（《集成》516－520）。春秋早期之后诸侯国铜鬲铭文多作如此处理，如曾国的邻国黄夫人鬲（《集成》687）。铜鬲铭文位置，显示出诸侯国铭文制作分化的趋向。

2. 排列方式

文字由上及下竖行、各行从右向左排列，是商周青铜器铭文排列的基本定式，后世中文也承袭了这一行文传统。而鬲等铭文沿器口作圆形走向，则一般按顺时针排列。曾国青铜器铭文的排列也多作如上方式的排列，但有部分铭文作反向或不规律性排列。如曾子单鬲等作逆时针方向排列，与其他鬲铭文排列相反。曾伯陭圆壶的器、盖铭文内容相同，排列各异，盖铭分别铸在盖内、口外以及盖顶与捉手之间的外壁，殊为罕见。

图 3.3－1　曾子伯杳盘铭文不规范的排列（《集成》10156）

曾国青铜器铭文另一特别之处是竖向铭文的右行（由左向右）排列现象颇多。单器铭文右行如曾仲子敔鼎等。有的同人所作不同铭文均为右行，如曾子伯杳盘（图 3.3－1）与匜。但也有同人所作不同器物或同一器物的不同部分的铭文排列不同，黿乎簋一件器铭右行（《集成》4157），而该器之盖以及另外一器铭文左行。曾仲斿父方壶两件盖铭作正常的左行，但器铭均作右行。

铭文单字也存在如何排列的问题。曾国青铜器铭文常见有反书者，虽然青铜器铭文字形可以为左右互作，但曾国青铜器铭文不仅有部分文字为反书者，也有铭文为通篇反书，一些铭文的反书是和铭文的右行同时出现，如黿乎簋、曾师季鞈盘等。也有文字均为反书而铭文依旧左行换行的，如曾太师鼎。

在周原出土的诸多青铜器中，基本不见铭文这样反书、右行的现象。但在周文化中心区域，此类现象仍然可见于诸侯国青铜器。虢国墓地 M2001 出土的 4 件盨中，3 件盨

①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襄阳王坡东周秦汉墓》彩版 5，科学出版社，2005 年。

② 如虢国墓地 M2001 虢季鬲等。见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三门峡虢国墓（第一卷）》图 32，文物出版社，1999 年。

图3.3－2 虢国墓地M2001：86簋盖铭文的长方形布局（《三门峡虢国墓（第一卷）》图47－7）

盖铭文为反书，这些铭文也为右行①。不过虢国青铜器中这种铭文右行的情况罕见，远不及曾国青铜器那样频繁。类似曾国情况的比较常见于两周之际前后其他地理位置略为偏远的诸侯国，说明与文化中心区域相比，诸侯国制作铭文存在的差异。

商周青铜器铭文排列的另一个特点是整篇铭文的文字排列布局作长方形，使铭文总体呈现如方块的汉字，即便有时存在字数的局限，但制作者也会调整各行文字的疏密，以便使铭文的整体分布成为一个长方形，例如虢国墓地M2001：86虢季簋盖铭文②（图3.3－2）。曾国青铜器多数铭文也呈现长方形，但常有例外，这样就会使铭文最后的文字高出或低于铭文区域的底线。曾子仲谿鼎铭文三行，最后一字“之”低出其他二行铭文底线。曾仲斿父方壶壶冠铭文五行，最后一行只有一字“壶”，这与其他各行2字、3字的排列相比，显得颇无秩序感（图3.3－3）。如果上述铭文布局都只是多出一字，无碍长方形大局的话，曾子伯沓盘铭文情况就明显得多。这篇铭文五行28字，最后一行较其他行铭文少2字（图3.3－1）。由于这篇铭文字数较多，作出长方形布局是较容易的。看来，曾国青铜器铭文的制作者并无设计铭文长方形布局的意识。

铭文的各行排列成直线平行，这是文字外在的更为自然的一个特点。但因为青铜鼎腹壁弯曲呈球面，这给铭文制作增添了困难。西周长篇铭文分布在鼎内仍然绝多作直行，其例如毛公鼎（《集成》2841）。眉县杨家村③四十二年逨鼎和四十三年逨鼎铭文的排列，有曲行与直行的不同，曲行排列十分规整，是一种有意识的行为。曾国青铜鼎一些铭文有曲行现象，但排列不规则。如曾子㝬鼎铭文从第3行开始，就有愈来愈弯曲排列的趋向（图3.3－4）。其他曾国鼎类器如曾伯从宠鼎、曾仲子敔鼎、曾子仲谿鼎等也有类似弯曲排列的现象。这些排列不规整的现象，显然并非是有意为之，而是铭文制作时未能成功控制文字位置所致。

① 铭文反书与右行常常伴生，且在虢国青铜器中器铭和盖铭常常相反，但它们并非是左行铭文的翻转，而是互有区别。见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三门峡虢国墓（第一卷）》图47，文物出版社，1999年。

②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三门峡虢国墓（第一卷）》图47－7，文物出版社，1999年。

③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陕西眉县杨家村西周青铜器窖藏发掘简报》，《文物》2003年第6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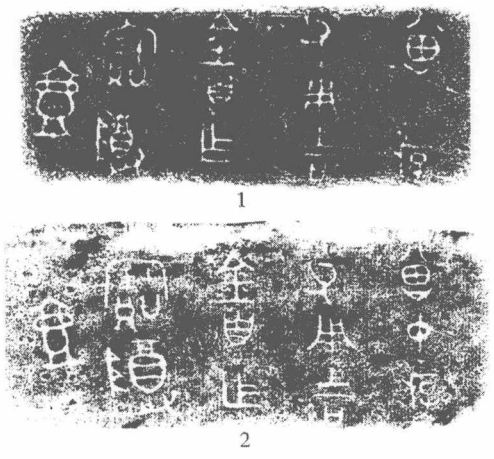


图 3.3－3　曾仲斿父方壶冠部铭文漏字和不规范的排列

1. 国家博物馆藏壶（《集成》9629－1）　2. 湖北省博物馆藏壶（《集成》9628－1）

图 3.3－4　曾子𨚕鼎铭文曲行现象（《集成》2757）

曾国青铜器铭文这些排列上的特别现象，有些可能是设计上的意识不足，有些可能是制作铭文时的设计问题。上述现象均出现在铸铭中，我们知道，铭文在铸造之前出现在陶范上时，是与出现在青铜器上呈镜像相反，即在青铜器上左行正书的铭文在陶范上为右行反书。相反，我们现在在曾国青铜器上所见的右行反书的铭文，在陶范上恰好为左行正书。如果当时铭文制作是在陶范上完成，作坊工人不能正确处理这种正反现象，就可能出现曾国青铜器铭文右行、反书的现象。铜鼎铭文的曲行，同样可能是与铭文制作相关①。

3. 纰疵

铭文的排列布局可能只是属于制作的不规范，而曾国青铜器有的铭文在制作上还存在缺陷，并造成文字与文意的问题。其典型者如起右盘②（图 3.3－5）：

唯起右自作用
其吉金宝盘，迺
用万年子子孙孙永
宝用享，永用之

① 关于铭文制作方式的讨论，参见张昌平：《商周青铜器铭文的若干制作方式——以曾国青铜器材料为基础》，《文物》2008 年第 12 期。

② 此盘底部破损，但根据铭文辞例仍然可推测出缺失文字。

图 3.3－5 文字、语法颠倒的起右盘铭文（《集成》10150）

图 3.3－6 漏字、排列不规整的曾伯霥簠铭文（《集成》4632）

该盘铭文字体、文字布局均较好，但文字的排列出现明显错误，体现出制作者文化知识的缺乏：1）文字倒排。第 3 行缺失的“子”字重文符号在上，该字和其下的“孙”一样被倒置。同样被倒置的文字还有最后一字“之”。2）全器铭文用词重复、语法混乱，显然是文字排列上的错误。如果按照曾国其他铭文辞例习惯，起右盘铭文当为：

唯起右迺用其
吉金，自作宝盘，
其万年子子孙孙
永宝用享

曾国青铜器铭文也见有漏铸文字现象。曾仲斿父方壶两件，冠部与冠部、颈部与颈部铭文行款分别相同。冠部铭文均为 5 行左行（图 3.3－3），湖北省博物馆收藏之壶冠铭为：“曾仲斿父用吉金自作宝尊壶”，共 12 字，国家博物馆收藏之壶冠铭 11 字，“曾”下无“仲”。无独有偶，曾伯霥簠两件铭文也有类似现象。传世曾伯霥簠铭文整体构图为长方形，有“曾伯霥遐丕黄耇”及“用享于我皇祖文考”之句，国家博物馆藏曾伯霥簠盖铭文（图 3.3－6）则分别作“曾霥遐丕黄耇”及“用享于我皇文考”，分别脱“伯”字及“祖”字。同时，此簠盖铭文构图也不是完整的长方形。上述两器所脱的“伯”、“仲”，并非是有意为之。两周之际前后曾国人名称谓方式，如“曾”和名、字之间，必定有带行辈和职官。如曾伯文不作曾文，曾子单不作曾单，曾太保庆不作曾庆。因此上述两器曾斿父、曾霥都应属漏字，应该都属制作铭文时的失误。

铭文所代表的社会层次较高，但铭文的制作完成则是由社会身份较低的匠人执行。

由于当时社会文化教育范围有限，制作者未必认识、理解其制作的铭文，出现上述错误也就在所难免。

三　铭文特点

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两周之际前后，是曾国青铜器发展的一个高峰期，属于这一阶段的青铜器和带铭文的青铜器数量都相对较多。这一时间段曾国青铜器铭文的一大特点，是表现出作为周文化之下一个诸侯国青铜文化的水准。

说春秋中期之前曾国青铜器铭文表现出诸侯国水准，首先当然是其铭文特征与周文化的一致性。春秋早期偏晚阶段的曾伯霥簠有“唯王九月初吉庚午”①，说明直至这一时期曾国仍然保持对于周王室的认同。曾国青铜器铭文总体特征，基本与典型周文化青铜器相同。曾国青铜器铭文强调作器者对器物的主导地位、铭文内容和基本格式、基本的辞例习惯、乃至于大多数器物自铭，都基本与周文化青铜器铭文一致。这一点比较明确，无须赘言。

同时，我们所谓“诸侯国水准”更是指曾国作为畿外诸侯国在青铜文化上的局限性。曾国青铜器铭文的局限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铭文内容的滞后性。曾国青铜器铭文句式、辞例有时会沿用宗周地区较早时期格式，如“曾太师[illegible]作鼎”，行文简洁。这种某某作某器的句式与同时常见的某某自作或用吉金自作某器的句式不同，当是西周中期形式的孑遗。同时，曾国青铜器铭文中一些人名或其他专称也经常采用宗周地区较早时期的形式。如曾国人名曾伯宫父，曾仲斿父等，在这种行辈＋某父的人名结构中，父为男子名，“仲斿父”犹“伯懋父”，人名结构流行于西周早中期，但至两周之际少见。再如“鼐彝”，主要流行于西周早中期周文化中心区域，多作为鼎铭，如丰方鼎（《集成》2275）、伯卫父鼎（《集成》2489），也见于簋，如扶风所出王簋（《集成》3389）。“鼐彝”一词至西周晚期数量趋少，出现在两周之际的曾仲斿父鼎、曾子仲谏鼎，都是较晚的例子了。而属于第三期的曾侯作叔姬簠仍自称鼐彝，在同时期铜器自铭中不十分多见。“鼐彝”一词直至春秋晚期在楚系铜器中仍然可见，如淅川下寺 M2 王子午鼎、襄阳团山墓地的郑庄公之孙缶（《近出》1042）、鄘子受镈（《近出》26），此时，“鼐彝”一词已经失却其本义，用作修饰词。曾侯作叔姬簠暗示出楚系铜器鼐彝的自铭一直是由西周时期流传下来的。这同样也是滞后性的表现。

2）铭文内容与格式的单一性。如前所述，曾国青铜器铭文基本都是作器标识或加

① 此时曾国当采用周历法纪年，此王当指周王而言。参屈万里：《曾伯霥簠考释》，《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三十三本，台北，1962 年。

祝愿嘏辞的格式，铭文少见反映其他方面内容。除了曾伯霥簠和曾子𨚕鼎之外，其他青铜器铭文固定地反复使用相同或相近的辞例，铭文格式几乎千篇一律。因此铭文所涉及的词汇量较小，这反映出一个诸侯国在社会等级、文化积累方面的限度，在同时期其他诸侯国，也存在类似的情形。

3）一些个性特点的存在。这主要表现在铭文辞例方面，曾国青铜器铭文较高频率地使用某些嘏辞，如多见“用（择）其吉金，自作”某器，等等。这些略具个性的因素，往往还见于曾国邻近区域，说明它们是一种区域共性而非曾国独有的特点。

4）铭文制作的不成熟。此类现象颇多，如前举文字反书、铭文右行、铭文“错位”现象等情况。此外，曾国青铜器铭文还存在有其他一些铭文制作规范性不强的方面。曾太师鼎口径14厘米，器形较小，但字体较大，“曾”字高2.2厘米，远大于其他铜器字体，器与铭的大小比例显得不甚协调。又如，曾国青铜器如果一套多器，各器铭文字体、行款往往有较大差异。两件曾仲斿父方壶颈部铭文所占幅面差别颇大，一器铭文字间疏松，而另一器铭文文字排列则相反。

5）铭文制作出现有失误之处。铭文反向排列、漏字等方面的失误如前述起右盘等多例。此外还存在其他方面的问题。曾孟嬴削簠铭文三行12字：“曾孟嬴削/自作行簠，/则永祜福”，其中第1行“作”与“行”之间、第3行“祜”与“福”之间各有垫片一块，两个垫片之间形成漏铸，并使“行”字只铸成一半。

两周之际，伴随着实力与地位的上升，诸侯国青铜器数量大增，但这些铜器毕竟是地方文化的产物，与中心文化区存在着诸多方面的差距。这在曾国青铜器铭文上当然也有所体现。因此曾国青铜器在文字方面表现出的不成熟、低水平，并非是不可理解的现象。如果从年代上看，那些不成熟、规范较差的铭文，其所属期别往往较早。这或许说明，青铜器铭文的制作在曾国尚处于起始的、较低的水平。曾国青铜器的发展，也可能处于早期阶段。

第四节　铸造工艺[①]

对青铜器铸造工艺的考察，需要借助于专门的工艺细节观察和研究报告。但有关第一阶段曾国青铜器铸造方面的信息，在二十世纪曾国青铜器的发掘简报中几乎无从获取。2002年发掘的枣阳郭家庙曾国墓地，出土青铜器大体与第一阶段涵盖的时间相同。

① 关于本节涉及的铸造工艺方面词汇和表述方式，在《前言·几点说明》中有简要的说明。

该墓地发掘者对出土青铜器作了工艺方面的观察分析①，这是对于早期曾国青铜器首次的工艺研究。不过，该研究涉及的曾国青铜器的数量和种类有限。笔者对于曾国青铜器铸造工艺的观察有年，并将工艺特征简要地表述于《曾国青铜器》中②。结合以上研究，可根据对各件铜器观察情况，将第一阶段保存大体完整的143件88件次曾国青铜器的铸造工艺列为附表5。这是本节对工艺技术讨论的基础。

本书对于曾国青铜器工艺研究的目的在于了解曾国青铜工业的独立性和技术一致性等问题，因此需要较多的比较材料。两周之际前后青铜器出土数量虽然较大，但这一时期相关的铸造工艺研究却不多，特别是关于西周晚期周原地区青铜器铸造工艺，迄今未见专门的研究报告。不过数十年来学者们对中原地区商周时期青铜器铸造工艺研究成果的积累，是我们比较研究曾国青铜器铸造工艺主要的参考信息。早在20世纪60年代，Gettens对弗利尔美术馆所藏青铜器进行了解剖式分析和研究③，他的研究特别是对于理解两周之际青铜器附件连接技术，对于随后中国学者的进一步研究有很大的帮助。万家保即在Gettens的研究基础上对附件连接技术作了专门的讨论④，他还对毛公鼎及其前后时期鼎的铸形进行了总结⑤。Gettens和万家保的工艺研究，为后续的研究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大陆学者最早对两周之际青铜器进行较系统观察的是郭宝钧，他选择张家坡、齐家村、上村岭虢国墓地等几个铜器群材料所作的研究⑥，使我们对这一时期青铜容器的铸形技术有一个轮廓性了解。不过，由于当时国内对铸造技术研究尚在一个起始阶段，郭宝钧的研究自然受到时代的局限。近年来一些新的材料和研究，可以让我们对这一时期铸造技术的知识得到延展。《周原出土青铜器》、《吉金铸国史》⑦ 虽然未有对周原青铜器工艺的专门研究，但大量的图片仍然可令人窥知许多工艺技术细节。吴坤仪等对于虢国墓地青铜器的研究⑧，可以为我们提供对比研究第一阶段曾国青铜器铸造技术

---

① 陈千万等：《枣阳郭家庙曾国墓地出土铜器铸造工艺探析》，襄樊市考古队等《枣阳郭家庙曾国墓地》附录三，科学出版社，2005年。

②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曾国青铜器》，文物出版社，2007年。

③ Rutherford J. Gettens, The Freer Chinese Bronzes, Volume Ⅱ, Technical Studies.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Washington, 1969.

④ 万家保：《试论中国古代青铜器的连接方法——中西古代金属技术发展比较之二》，《大陆杂志》第六十四卷第六期，1982年。

⑤ 万家保：《毛公鼎的铸造及相关问题》，《大陆杂志》第六十卷第四期，1980年。

⑥ 郭宝均：《商周青铜器群综合研究》之《西周后期铜器群》、《东周初年及春秋时期铜器群》，文物出版社，1981年。

⑦ 曹玮：《周原出土青铜器》1－10册，巴蜀书社，2005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吉金铸国史——周原出土西周青铜器精粹》，文物出版社，2002年。

⑧ 吴坤仪等：《虢国墓地出土青铜器铸造工艺分析与研究》，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三门峡虢国墓（第一卷）》附录二，文物出版社，1999年。

较具体的信息。除了以上涉及两周之际青铜器的工艺研究之外，苏荣誉对于強国墓地青铜器的深入研究①，也让我们对西周青铜器铸造技术的源流，有了纵深的理解。

上述研究中，吴坤仪等对20世纪90年代发掘的虢国墓地青铜器铸造工艺的研究，是学术界首次、迄今仍然是唯一在曾国青铜器之外专门针对两周之际前后青铜器铸造工艺的研究工作，因此对于第一阶段曾国青铜器工艺研究有重要参考价值。不过吴坤仪等的某些研究结论，也还需要作进一步讨论。例如他们提出虢国青铜器簋、壶的双耳为先铸法连接的看法②，就值得商榷。簋、壶耳与器物主体的连接是两周之际前后青铜容器连接技术的主要内容，但先铸法应用于壶与簋等器耳的技术罕见，因此这一结论影响到对两周之际前后附件连接技术的基本认识，需要作一专门的讨论。

虽然目前所知先铸法的运用至迟在殷墟时期的新干大洋洲③和殷墟妇好墓青铜器④中已经频繁可见，而且我们也确实可见两周之际青铜器有先铸的器耳和鼎足，但两周之际的簋和壶耳那种较大的附件大量地先铸，却未见其他学者提出类似的说法。吴坤仪等所理解的先铸，是指将先铸的簋耳和壶耳安置在器物的主体范腔中，在浇铸主体时，“铜水流入耳根部凹坑内”。根据吴氏等的描述，这些簋和壶耳部有凹坑、器物主体外壁上有凸起的榫头。因此他们所谓的先铸实际上是榫式后铸所表现出来的形态。“一般来说，簋体与簋耳铸接，只有簋体先铸，才会在簋体上设计接榫”⑤。也就是说，我们所见器表的榫头往往是在附件连接之前就已经成形，而非吴氏所谓铸造器物主体时“铜水流入耳根部凹坑内”、“使腹体外形成突块”。另一方面，先铸法需要将附件预置于器物主体范腔内，这样在浇铸时铜液会在主体器壁处对结合处的附件（器耳）形成包围之态；而后铸则相反，附件（器耳）只需连接在主体突出的榫头上，因此附件与器物主体器壁可能会形成间隙⑥。吴坤仪等所举虢季簋先铸之例，图示和文字描述都是

① 苏荣誉等：《強国墓地青铜器铸造工艺考察和金属器物检测》，卢连成等《宝鸡強国墓地》附录二，文物出版社，1988年。该研究又见于苏荣誉等《中国上古金属技术》第三章《青铜范铸技术》，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年。

② 吴坤仪等将所研究的簋耳连接称为“榫卯式铸接”，壶耳连接称为“榫卯销式铸接”，同时将一些榫式焊接的壶耳称为“榫卯式焊接”。但是，这些称谓在该研究的正文所举例证和列表所举例证两部分互有出入和不一致。

③ 苏荣誉等：《新干商代大墓青铜器铸造工艺研究》，江西省博物馆等《新干商代大墓》附录九，文物出版社，1997年。

④ 华觉明：《中国古代金属技术——铜和铁造就的文明》第四章《商周青铜器的范铸技术》，大象出版社，1999年。

⑤ 苏荣誉等：《強国墓地青铜器铸造工艺考察和金属器物检测》，卢连成等《宝鸡強国墓地》附录二，文物出版社，1988年。

⑥ 万家保在上举研究青铜器连接方法的论文中，以为这种有榫头和间隙的铸态，会有先铸或后铸两种可能。但由苏荣誉和华觉明的研究可知，这种铸态其实只是属于后铸。

“铸接处残留间隙”，这无疑是榫式后铸的典型。而他们所列其他一些簋、壶的“先铸”附件中，似乎榫式后铸和榫式焊接的情况都有。在实物观察中，榫式焊接技术比较容易与榫式后铸区别开来，这种技术在 CT 切片条件下观察更可清楚地了解其方式①。

一　主要器类的基本工艺

在进行讨论之前，我们先对第一阶段曾国青铜器一些主要器类的铸造工艺作一分类简述，以明晰其大体的技术手段。

1. 鼎、鬲、甗

鼎在第一阶段的基本铸形非常一致，为三块腹范、一块三角形底范和一块芯范。这在第一阶段曾国青铜器所有鼎中无一例外。三角形底范的这些鼎绝大部分鼎足为浑铸（图 3.4－1，1），腹范范缝与足相对（图 3.4－1，2）。但这种铸形也可以有一个变化，即鼎足先铸。这一工艺只见于少数鼎，它相应地使腹部外范铸形发生了变化：为了避开先铸的鼎足，腹部外范由原来的三足处改移到三足之间来拼合，腹范范缝错开鼎足，而与底范范缝垂直。因为这一变化，腹部纹饰的分组位置也相应地转移到三足间。鼎足先铸的情况见于第一期 72 曹门湾龙纹鼎（图 3.4－1，3、4）、第三期的周家岗廊季鼎（图 3.4－1，5）和郭家庙 M6 窃曲纹鼎（图 3.4－1，6）三例，数量上只占很小的比例。

曾国青铜器在第一阶段附耳鼎即在数量上超过立耳鼎。就技术难度而言，立耳可在不增加范块的前提下实现浑铸，故而附耳的处理难度大于立耳。这一时期的附耳鼎对耳的技术处理均采用了近乎模式化的工艺：浑铸附耳，在双耳与器外壁之间各设一块芯范（图 3.4－2，1）。另外，在耳与口之间设以圆形铜梗连接以加固附耳（图 3.4－2，2）。

这一时期鼎还表现出其他一些工艺特征，多数鼎的底范外凸，其上粗糙不平（图 3.4－2，3）。多数鼎足内侧不封闭而露出范土，如前举浑铸之郭家庙 M17：2 鼎足，这种鼎足也有范土无存者（图 3.4－2，4）。鼎足不封闭的处理是为了在合范时将足芯范与鼎底范连接为一体，如鼎足内侧封闭，合范时一般需要另外使用泥芯撑以固定鼎足内的芯范。两周之际前后鼎足内侧封闭的鼎，年代往往较早，曾国青铜鼎属于第一期鼎对足部也多如此处理（图 3.4－2，5）。当然，若鼎足先铸，则其内侧必然封闭，如前述周家岗鼎等。很多鼎在足端或底部见有密集的气孔（图 3.4－1，7），说明鼎是倒置浇铸的。鼎的底范范缝中部常各有一个较宽的凸起（图 3.4－2，6），这里应当是浇口或冒口所在，浇口设于鼎底与鼎倒浇的特征一致。

---

① Suzanne Hargrove, Technical Observations and Analyses of Chinese Bronzes, Fig. 10.8, Ancient Chinese bronzes in the Saint Louis Art Museum, St. Louis Art Museum. St. Louis, 19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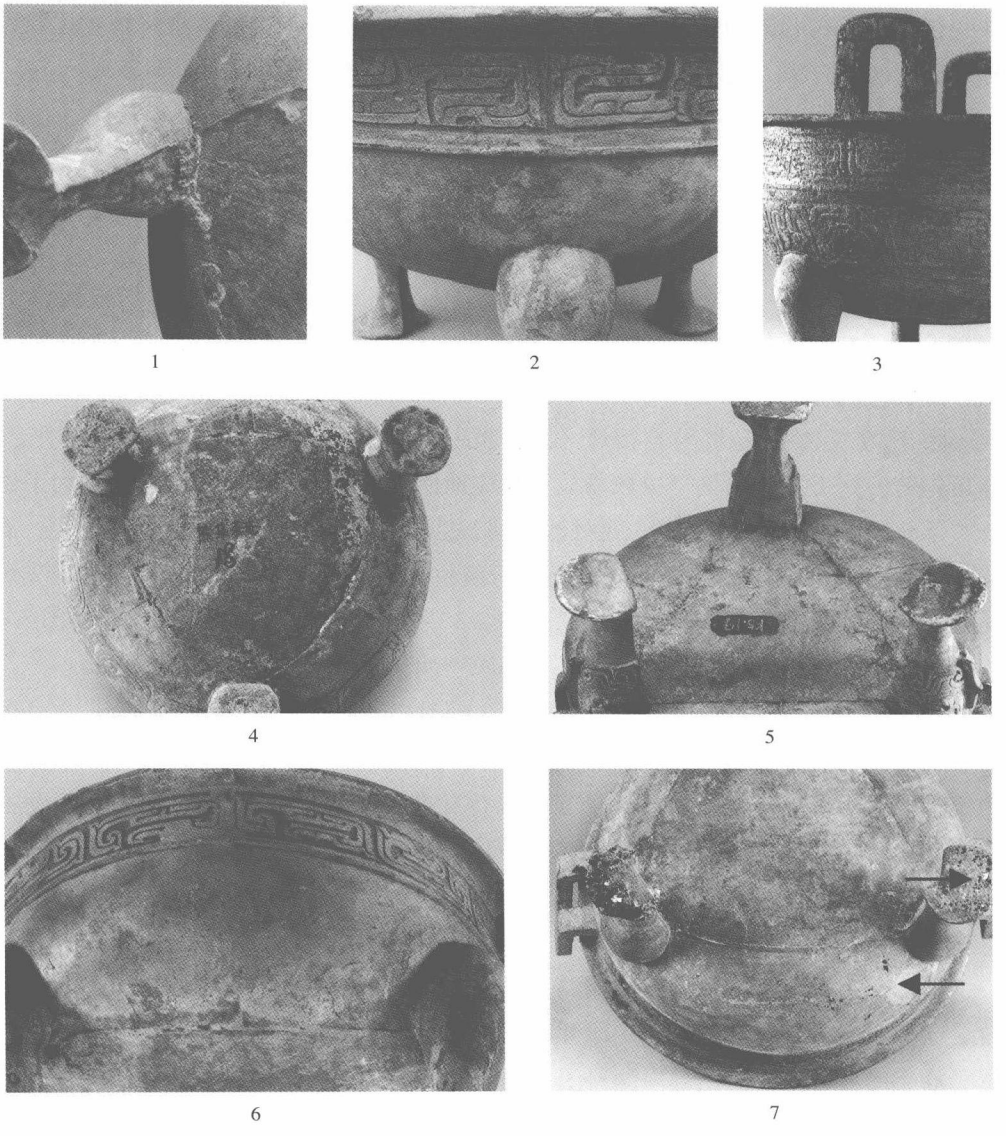


图 3.4－1 第一阶段曾国青铜鼎铸造工艺

1. 郭家庙 M17：2 鼎足浑铸 2. 郭家庙 M17：2 鼎腹范范缝与足对应 3. 72 曹门湾鼎足先铸 4. 72 曹门湾鼎腹范范缝位于三足之间 5. 周家岗鼎底范与腹范范缝对应情况 6. 郭家庙 M6 鼎底范与腹范范缝对应情况 7. 苏家垅 1 号鼎下腹与足端气孔

鬲在这一时期已无耳的设计，鬲腹内带凹入的足窝，这一特点也使鬲足没有像鼎足那样分铸的可能。有的鬲侧带有扉棱，扉棱的位置均与足对应，也就是处于范块的结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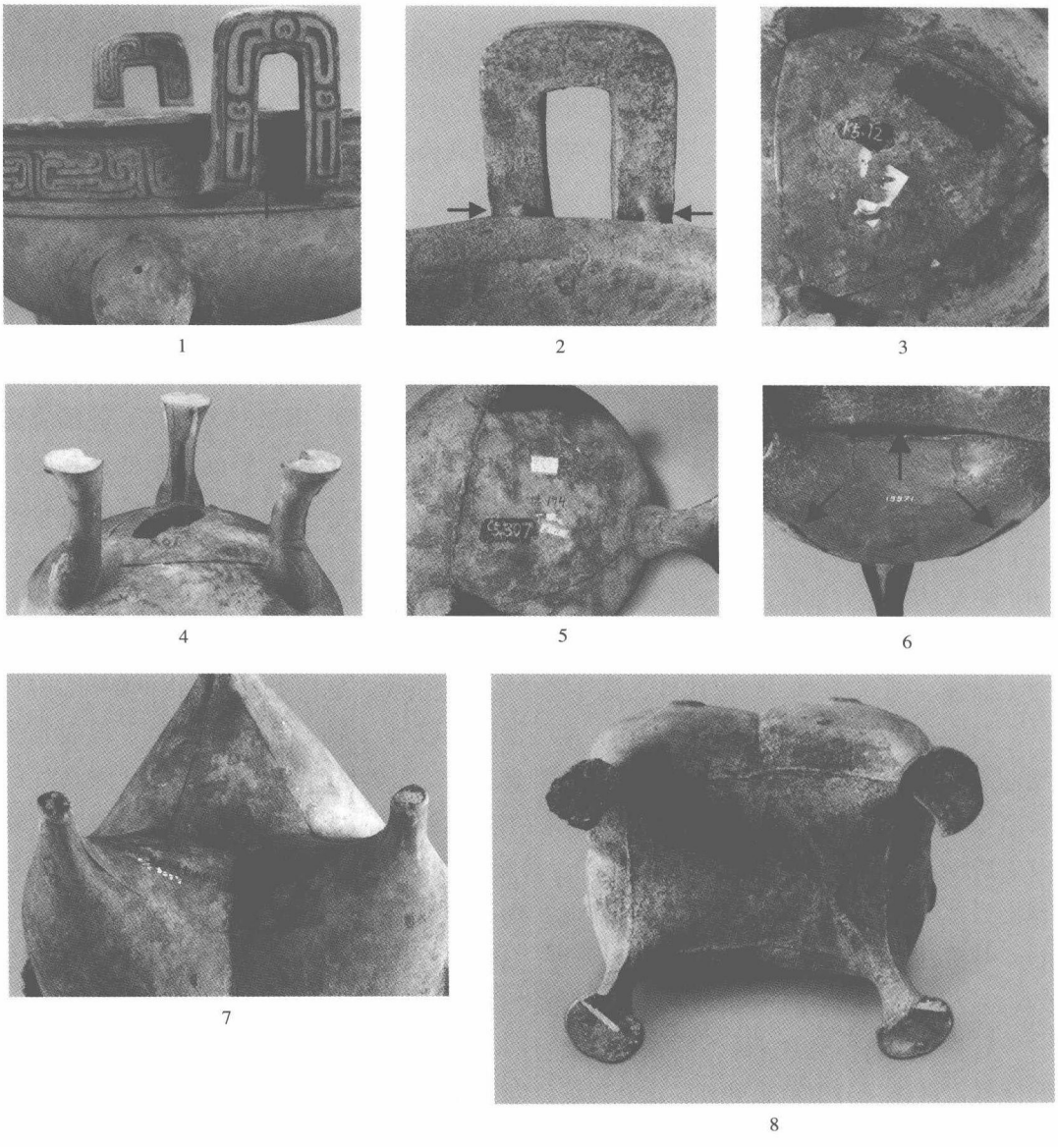


图 3.4－2　第一阶段曾国青铜器铸造工艺

1. 郭家庙 M6 鼎附耳内设芯范情况　2. 苏家垅鼎 2 号附耳设铜梗　3. 曾子仲谿鼎底范凸出情况　4. 桃花坡 M2 中号鼎足内侧不封闭　5. 曾仲子敔鼎足内侧封闭　6. 曾子伯詣鼎浇口与冒口　7. 苏家垅鬲三角形底范　8. 苏家垅甗长方形底范

部，因此扉棱都是浑铸的。鬲的铸形简单，绝大多数作 3－△＋1 式。因为形制关系，鬲的底范作弧线三角形（图 3.4－2，7）。可能同样因为形制的原因，鬲的下腹和底范处

常常可见若干组位置规律的垫片①。

甗均为分体。除了圆甗三分腹范之外，方甗的甑体和鬲体铸形均为4－□＋1式（图3.4－2，8）。甗足特征如鬲足，因此也无分铸的可能。甗的附耳亦多为浑铸，其技术处理方法与鼎的附耳相同，只是有的附耳未设圆梗。

2. 簋、圆壶、豆、盘

簋、圆壶等圆体圈足器铸形多是4－○＋1式，即用四块腹范、一块圆形芯范和一块圆形底范。这些器物铸造工艺的变化，主要是对附件的不同处理，从而引起铸形结构和附件连接方法的不同。

《周原》等铜器图录表明，周原西周晚期青铜器多数簋四分的范缝中两个重合于双耳，这些簋的双耳都是浑铸的。而少数簋范缝位于双耳两侧，耳为榫式后铸。曾国的簋也基本是这两种工艺形式（图3.4－3，1），浑铸双耳的簋较少，腹范范缝也是有在双耳之间的（图3.4－3，2）；而后铸双耳的簋占绝大多数（图3.4－3，3），情况与周原簋相反。曾国簋圈足下一般另外设有小足，这也是当时周式簋的作法，但其背景原因不明。小足的形制有扁体足和象首形足两种。扁体足均浑铸（图3.4－3，4），而象首形足均分铸，有个别的簋如苏家垅有铭簋足先铸，而其他的象首足均后铸，其例如周家岗曾太保簋（图3.4－3，5）。此外，簋外底常见网状阳纹，是一个颇为突出的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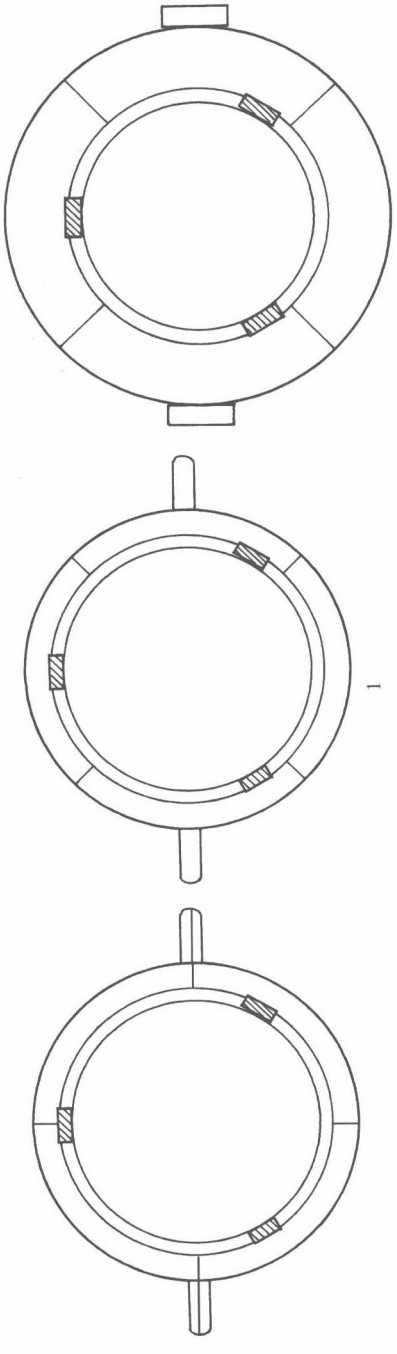
圆壶在器形结构上与簋完全相同，两类器的铸形和一些铸造特征也相同。但壶为重型的酒器，对于持重的双耳连接的处理常常异于簋。西周晚期的三年瘐壶（《周原》4、窖藏665）（图3.4－4，1）、几父壶等都采用铆式后铸连接双耳，这一做法为段营环带纹壶所继承并改进（图3.4－4，2）。第一阶段曾国铜圆壶双耳连接方式各异，但榫式焊接是其主流技术（图3.4－4，3）。榫式焊接往往在耳根部设有销孔（图3.4－4，4），焊料注入销孔以增加连接的牢固程度。茶庵环带纹壶耳根也见销孔（图3.4－4，5），显示出过渡的特征。和簋一样，壶耳的连接也较周原地区青铜器有较大变化。

豆只有2件，也是4－○＋1式铸形，应该是受圈足器四分范的传统影响。这种纯圆体器也可作三分腹范来处理，簋和壶盖的器形结构与豆完全相同，其外范作三分或四分，并无定制，即说明了这一点。

盘体结构如簋，但有鼎一样的横式附耳。因此盘的附耳绝大多数是浑铸（图3.4－4，6），第二、三期盘附耳像附耳鼎一样设圆梗与器口相连，相应的也会在耳与器壁之间设置芯范。盘体、圈足和小足的处理与簋相同，但因为盘耳是横式，盘的腹范范缝就不能如同浑铸的簋一样以耳应缝，而是在合范时将范缝错开附耳，分列于附耳两侧（图3.4－3，1）。

---

① 鬲下腹和底部安置成组垫片的传统，始见于二里岗文化时期的盘龙城铜鬲。这从侧面说明鬲多用垫片可能确与其斜侧的裆部相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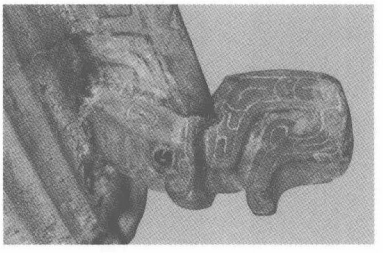


1

2

3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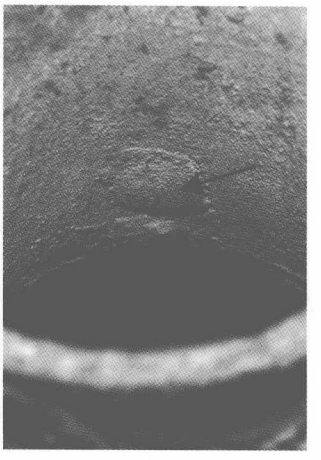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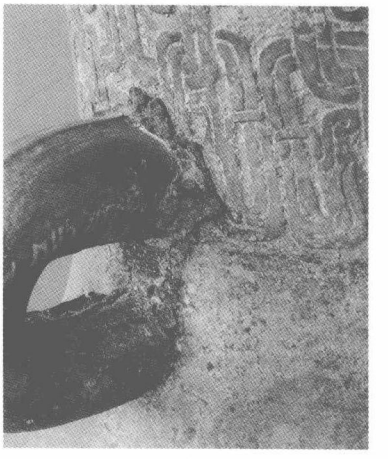
图3.4-3　第一阶段曾国青铜器铸造工艺

1. 簋、盘基本范型示意（左. 簋耳浑铸，中. 簋耳铸接，右. 盘耳浑铸）　2. 桃花坡M1簋腹范范缝在双耳之间　3. 苏家垅无铭簋铸接的双耳　4. 桃花坡M1簋扁足浑铸　5. 周家岗曾太保簋足后铸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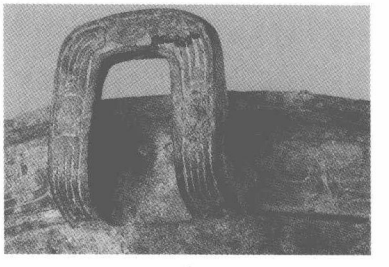
2



3

4

5



6

图 3.4－4 第一阶段曾国青铜器铸造工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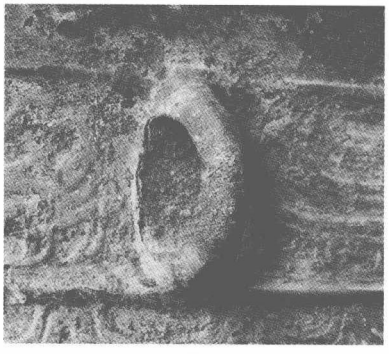
1. 三年瘐壶（《周原》4、窖藏 665）铆式后铸双耳 2. 段营环带纹壶耳的铆式焊接 3. 周家岗壶焊接的耳 4. 郭家庙 M17：5 壶焊接耳的销孔 5. 段营环带纹壶焊接耳的销孔 6. 何店盘附耳浑铸

3. 簠、方壶、方卣

簠等方形圈足器铸形为 4－□＋1 式，其底范和芯范都是长方形。四块腹范一般合缝于四角，但郭家庙 M1 方壶范缝对应于浑铸的贯耳，也即重合于背带纹，这大约是背带纹方壶的一个共同的铸形特征。方壶的贯耳、方卣的纽形耳都是浑铸（图 3.4－5，1），曾仲斿父方壶和几件簠为竖式的龙形耳，耳的位置设在合范范缝之间，因此这些龙形耳都是榫式焊接的（图 3.4－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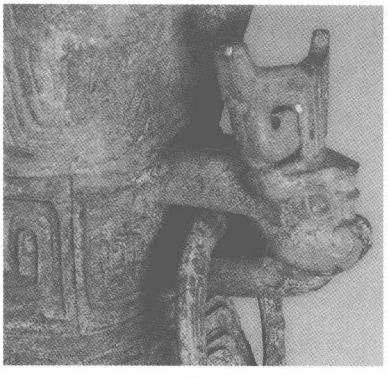
4. 鑐、盆、杯

鑐等圆体圜底器结构与簠不同，但铸形相似，均为 4－○＋1 式。带耳器与范缝的位置关系模式也和簠一样，例如 72 熊家老湾波折纹鑐双耳浑铸，耳与两条范缝重合。其他器耳均为榫式后铸或焊接，范缝位于耳的两侧，如郭家庙 M02 龙纹鑐四条范缝均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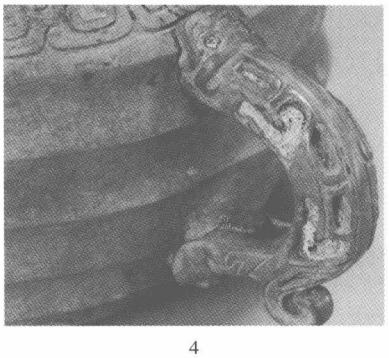
1

3



2

5



4

图 3.4－5　第一阶段曾国青铜器铸造工艺

1. 70 熊家老湾方卣环耳浑铸　2. 苏家垅曾仲斿父方壶榫式焊接双耳　3. 郭家庙 M02 龙纹鐳耳与腹范范缝错开　4. 郭家庙 M17 杯榫式后铸的鋬　5. 苏家垅盉先铸浑铸足

双耳错开（图 3.4－5，3）。郭家庙 M17 杯单鋬为榫式后铸（图 3.4－5，4），范缝也布置在鋬的两侧①。

① 陈千万等认为杯鋬为榫式焊接（即所谓“榫卯焊接”），疑误。该杯鋬斜压于杯体榫头，呈后铸之态。参见陈千万等：《枣阳郭家庙曾国墓地出土铜器铸造工艺探析》，襄樊市考古队等《枣阳郭家庙曾国墓地》附录三，科学出版社，2005 年。

5. 盉与匜

盉与匜均四扁足，有流对鋬。因为四足的关系，器底皆设方形或长方形底范。但盉、匜的铸形与其他长方形器有颇大差异，这主要是受附件连接方法和时代演进风格的影响。苏家垅盉的流（图 3.4－5，5）、鋬先铸，则四腹范范缝在流鋬两侧，对应于四足。匜的腹范有二分、三分和四分的不同（图 3.4－6，1），其中第 2、3 期的匜均作四分腹范，各范缝分别垂直于底范范缝（图 3.4－6，2）。匜鋬多为浑铸，鋬与匜尾外壁之间设一芯范（图 3.4－6，3）。但也有匜鋬如簋耳一样采用榫式后铸。

二 技术特征

第一阶段曾国青铜器的基本工艺，可从如下几个方面讨论。

1. 基本铸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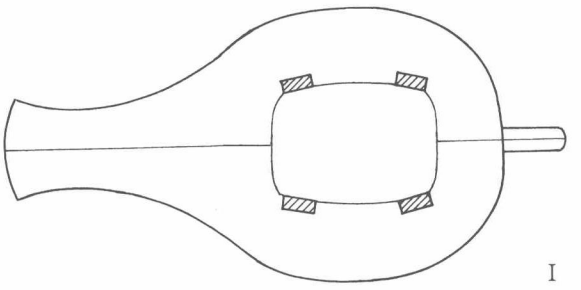
从制范形式而言，这一时期主要器类的铸形大体有三类：鼎、鬲等圆体三足器均三分腹范，一般为一块三角形底范。而簋、壶、豆、盆、盘等圆体圈足或圜底器，腹范一般为四块，底范为圆形。方壶、方卣、簠等四分腹范，底范为长方形。这些铸形特征规整、简单而明了，是与两周之际前后器物造型的风格吻合一致的。

特殊的铸形结构也有不少，且表现各异。在器形不大、器表光素或纹饰简单的情况下，簋、壶等圆体圈足器就可能将四块腹范简化为两块。72 曹门湾瓦纹簋、何家台龙纹壶、83 曹门湾环带纹壶均采用二分腹范，应当就是因为上述原因。因为设有双耳的关系，簋、壶的腹范一般应当为双数，但周家岗龙纹壶却只设三腹范，至为罕见。底范在西周早期以后的鼎、鬲等三足器中成为主流铸形设置，但郭家庙 M17 鬲不用底范，三块腹范深入腹底中央，形成如殷墟及以前时期鼎、鬲那种“Y”形底部范缝（图 3.4－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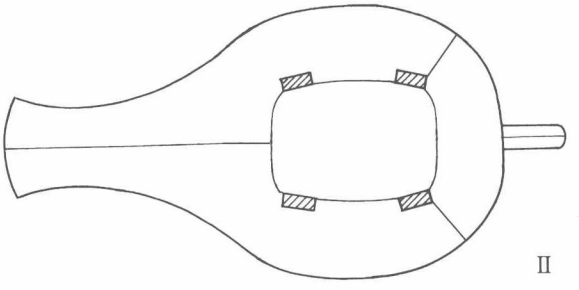
另外一个较为特殊的铸形技术是水平分范。水平分范问题在过去工艺研究中似乎未予足够重视。现在已知，二里岗文化时期的盘龙城爵腹与足之间的制范形式是水平分范①，殷墟青铜器更是较多使用了水平分范技术②。水平分范在功能上是为了解决造型较复杂的青铜器的分范问题，因此器物形制相对较为简单的西周中期以后，水平分范技术运用较少，但体形高大的壶类器仍然有使用这一技术的，例如郭宝钧很早就注意到扶

① 胡家喜等：《盘龙城遗址青铜器铸造工艺探讨》，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盘龙城》附录七，文物出版社，2001 年。该研究认为爵“足部和腹部范为分段制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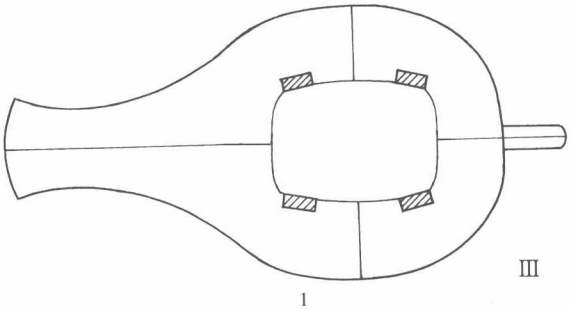
② Yung－ti Li, The Anyang Bronze Foundries: Archaeological Remains, Casting Technology, and Production Organization. A Doctorial Dissertation from Harvard University, 20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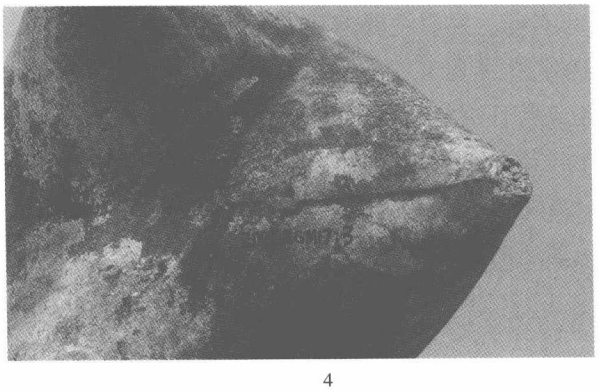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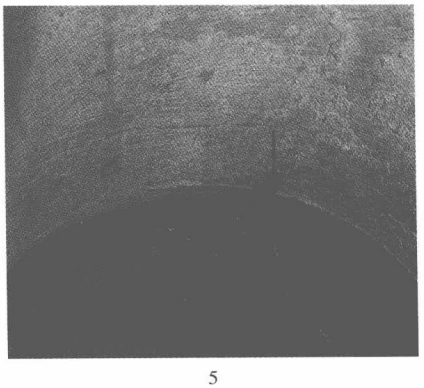
3



1



4



5

图 3.4－6　第一阶段曾国青铜器铸造工艺

1. 铜匜范型示意　2. 何店匜腹范与底范的对应　3. 义地岗 M83 匜浑铸的鋬　4. 郭家庙 M17 鬲腹范范缝延伸至底部　5. 周家岗壶芯范的分段

风齐家村方壶可能使用水平分范①。曾国青铜器中郭家庙 M1 出土的幻白隹方壶背带纹顶端水平，是水平分范的位置所在。另外，该方壶贯耳浑铸，器壁一周的四分范范缝在背带纹处，这是背带纹方壶铸形与其他青铜器的不同之处，这一技术特征一直延续到很晚的战国时期。幻白隹方壶在国族属性上并非属于曾国，上述水平分范也都是指外范而言。在曾国青铜器中，一个突出的现象是器身芯范作水平分段。72 熊家老湾波折纹罍、苏家垅曾仲斿父方壶（图 3.4－7，1）、83 曹门湾环带纹壶、郭家庙 M02 龙纹罍、周家岗龙纹壶（图 3.4－6，5）等在腹部内壁形成明显范缝，表明其芯范都为上下两分，芯范分段处往往与壶外颈部或上腹弦纹对应。这些水平分范的铜器包括第一至第三期，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不过，芯范的水平分范现象容易被考察者忽视，因此我们尚不能确定曾国青铜器的水平划分芯范技术是一个个性特征还是在其他地区也同时已有使用。

2. 附件连接技术

浑铸仍然是这一时期占主导地位的工艺，立耳或横式的附耳、器足多数或绝大多数地使用浑铸法一次成形，说明自商时期以来青铜器附件浑铸为主流的技术传统尚未改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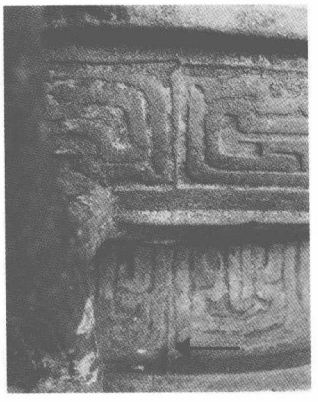
不过，分铸技术已经常用于附件的铸造之中。在第一阶段曾国青铜器可统计的 88 个件次青铜容器中，有 34 个件次青铜器使用了分铸技术连接附件，其中在第三期的 17 个件次中，有 11 个件次青铜器使用了分铸技术，显示出分铸法使用增加的趋势。分铸法主要用于连接簋、壶、簠等竖式的龙形耳，其方式主要包括有先铸、后铸或焊接等不同工艺。

先铸法除了应用于前述的 3 件鼎足之外，还见于苏家垅盉流与鋬、盘的附耳和象首足等少数附件的连接。西周早中期青铜器如強国墓地中虽有较多使用先铸法②，但在周原地区西周晚期青铜器中，先铸法所见不多，一般主要运用于盉流的铸造，例如它盉（《周原》2、窖藏 252）。因此曾国青铜器中所见鼎足先铸的技术来源，可能就与铸盉相关。苏家垅盉除了流先铸之外，鋬也先铸，这与其他鋬浑铸或榫式后铸不同，大约也是受先铸盉流的影响。无论如何，鼎足先铸是开春秋中期及其后鼎足普遍先铸之先河，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由于两周之际前后青铜器的铸造技术研究项目开展不多，我们目前还看不到同时期其他青铜鼎有使用这一技术的报告。但相信鼎足先铸技术绝非曾国的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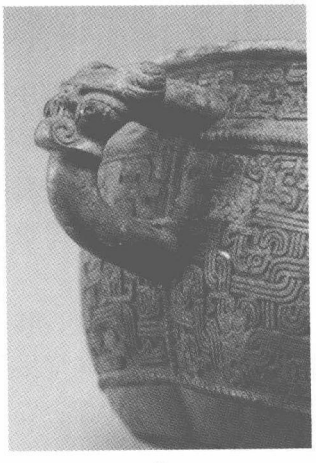
① 郭宝钧认为齐家村方壶“似分两截铸”。郭宝均：《商周青铜器群综合研究》之《西周后期铜器群》，文物出版社，1981 年。

② 苏荣誉等：《強国墓地青铜器铸造工艺考察和金属器物检测》，卢连成等《宝鸡強国墓地》附录二，文物出版社，1988 年。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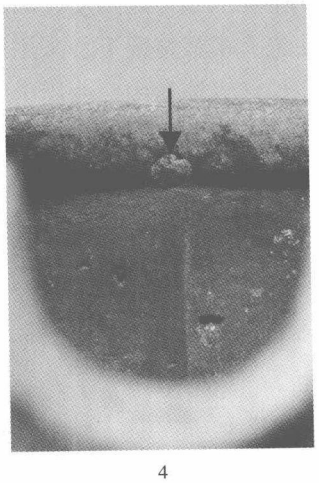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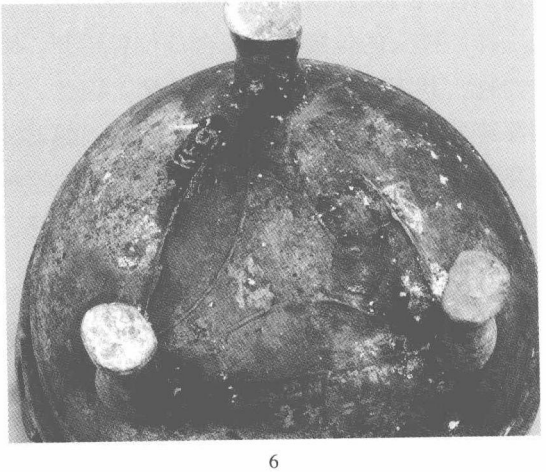


3

5



4



6

图 3.4－7　第一阶段曾国青铜器铸造工艺

1. 曾仲斿父方壶芯范的分段　2. 桃花坡 M1 起右盘鋬错开腹范的情况　3. 郭家庙 M8 匜鋬焊接情况　4. 郭家庙 M8 匜鋬的铆式焊接　5. 72 熊家老湾盘浑铸的附耳　6. 72 熊家老湾重环纹黄季鼎底范内凸起的阳线

例，特别是在周文化中心区域会有所发现①。不过，曾国青铜器几件先铸鼎足的情况仍然是值得充分注意的。

榫式后铸也有较早的源头，但在西周青铜器中只是不多地使用于簋、盨等盛食器的竖耳连接。在曾国青铜器中，榫式后铸是应用最广的连接方法，绝大部分的簋、少数的壶、罍、匜、杯等都有使用。这种铸接的方式，使附件与主体器的榫头和器壁都可以形成包接，往往比较牢固。

无榫后铸只有桃花坡 M1 盘和周家岗曾太保簋等少数的两例。新干大洋洲青铜容器器耳上的立虎②，为这种后铸方法的典型例证。这种铸接方式可以临时性地使用于器物主体，虽在商周不同时期都偶有所见，但就连接方式而言，所表现出的文化特征不多。

铆式焊接在周原地区只是运用在不多的壶中，而这一技术在曾国青铜器中除了用于茶庵环带纹圆壶之外，还见于郭家庙 M8 蟠螭纹匜（图 3.4－7，3、4 匜尾器壁内外）。这表明铆式焊接技术的应用由大型器物向小型器物的转变。如果说茶庵壶是对西周中晚期连接技术的继承的话，那么郭家庙 M8 匜则是开启了这一技术新的应用途径，春秋晚期之后许多器纽由此方式焊接。

榫式焊接技术大约出现在两周之际前后，主要运用对象是壶耳的连接，其后发展到簠、盆等器，并在本阶段之后成为连接竖式龙形耳的主流技术。从这个角度来说，榫式焊接是对铆式焊接技术的一个继承。但是，榫式焊接连接的附件并不牢靠，春秋中期前后常见附件脱落器壁露出榫头的现象，多是这一技术的表现。

无论是榫式后铸抑或是榫式焊接，其共性是在器物主体上预留连接附件的榫头。和先铸法一样，榫头的位置需要与合范位置错开。因此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采用榫式连接方法的器物，其腹范范缝位于耳之两侧。因此，在周原地区青铜器中，西周中晚期居于多数的浑铸器耳的簋，四分范的两条范缝与簋耳重合；而少数采用榫式后铸双耳的簋，四条范缝位置均与双耳相错。曾国青铜器中，这种铸形与附耳连接方式的关联在簋和壶类器中同样存在：浑铸的器耳必定对应腹范范缝，带榫头的器耳往往为铸接或焊接。这

① 虢国墓地追缴被盗青铜器中，发掘报告彩版 47－1 和图版 156－1 所示的 SG：01 凤鸟纹鼎，彩版 47－2 和图版 157－1 所示的 SG：08 环带纹鼎，图版 156－4 所示的 SG：010 凤首纹鼎，图版 156－3 所示的 SG：011 凤鸟纹鼎腹部纹饰在鼎第 1、2 号足之间分组，与先铸鼎足的特征吻合。特别是图版 156－3 中的 SG：011 凤鸟纹鼎，有腹部包裹鼎足的铸态，说明该鼎足应当为先铸。但吴坤仪等的工艺报告认为鼎足均为浑铸。笔者未能目检上述标本，志此存疑。

② 苏荣誉等：《新干商代大墓青铜器铸造工艺研究》，江西省博物馆等《新干商代大墓》附录九，文物出版社，1997 年。

种现象的一个极端例证是起右盘，该盘带流，这种情况下合范必须经过槽形流，而相对应的另一范缝就一定位于鋬的位置。为了避开范缝，该盘将预留铸接的榫头偏离范缝约2厘米（图3.4－7，2）。由此可以理解，匜与盉因为范缝对应于流，从而又对应于鋬，因此连接鋬往往不使用榫式后铸或焊接。据此技术，曾伯陭壶有两条范缝对应于双耳，耳的焊接可能采用的是铆式而非榫式。

对比周原地区西周青铜器，分铸技术较多采用是曾国青铜器一个显著的变化，而这一变化，往往又会影响到器物铸造的铸形和器形。相比之下，两周之际前后的虢国青铜器对附件的处理方法与曾国类似。

3. 相关技术

浇口设置位置在多数青铜器中痕迹不明，但在一些鼎中则可清楚地观察到。苏家垅有铭鼎、周家岗鼎等多件鼎的浇口是设在底部各个底范范缝的中部。一般三条范缝中部都有较宽的凸起，其中一个应当是冒口。个别的例外如曾太师鼎，浇口设在足端。浇口设在足端的做法多见于虢国墓地青铜鼎①，这是虢国青铜器与曾国的一个不同。曾国青铜器还有鑐、匜等器类浇口设在底范范缝处，说明这已形成了一个工艺习惯。

垫片在曾国青铜器中当然也被广泛使用，但每件单器所使用垫片的数量似乎不多。鬲是一个例外，其垫片分布规则，说明当时的工艺相当规范。许多青铜器如簋、壶的盖顶中央置垫片一个，苏家垅器群则有在底部中央安置一个垫片的习惯做法，这一做法特别见于多件鼎和簋。

关于泥芯撑。第一阶段曾国青铜器鼎足、耳上泥芯撑留下的痕迹不多。因为许多鼎足内侧不封闭，无需芯撑。而耳的情形较为复杂。黄土坡M1鼎耳见泥芯撑痕迹，其分布是耳顶部2、内上侧1个，痕迹明显。而桃花坡M1鼎耳部泥芯撑只是在X光的探视下才发现。大量使用泥芯撑在西周青铜器中有较早的传统②，虢国墓地青铜器的工艺研究认为鼎与足都使用了泥芯撑③，发掘报告图版显示鼎耳泥芯撑设在旁侧④。这似乎说明了这一传统的继续。但鼎的附耳是否如此？Gettens对这种形制的附耳解剖表明，耳

① 吴坤仪等：《虢国墓地出土青铜器铸造工艺分析与研究》，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三门峡虢国墓（第一卷）》附录二，文物出版社，1999年。

② 強国墓地青铜器多见泥芯撑痕迹。苏荣誉等：《強国墓地青铜器铸造工艺考察和金属器物检测》，卢连成等《宝鸡強国墓地》附录二，文物出版社，1988年。

③ 吴坤仪等：《虢国墓地出土青铜器铸造工艺分析与研究》，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三门峡虢国墓（第一卷）》附录二，文物出版社，1999年。

④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三门峡虢国墓（第一卷）》下册图版173－4，文物出版社，1999年。

是实芯的①。综合这些情况，目前对曾国青铜器使用泥芯撑的情况，还难以作出确定的判断。

第一阶段曾国青铜器包括了从国君到基层贵族不同级别的青铜器。铜器群所反映的等级不同，在器物体量、厚重程度明显有别，例如苏家垅器群和郭家庙 M17 出土的鼎、壶，明显不同于同期何家台器群同类器。不过，还没有迹象表明不同级别的贵族使用了不同的铸造工艺。但是，一些铜器群的技术特征在某些方面比较突出。比如，苏家垅器群中后配的 7 鼎、7 鬲和 5 簋等铸造比较粗糙，这些铜器都没有铭文，但一些技术细节又与原配器协调一致，比如苏家垅后配器也有像有铭器一样在底部中央安置一个垫片的习惯。又如何家台铜器群铸造粗糙、器物造型协调性差，反映了较低下的技术水准。这些现象与青铜器铸造的技术组织，是否有某种关系？

4. 时代特征及其变化

第一阶段曾国青铜器铸造工艺在早晚不同时期有较明显变化，其中一些早的特征往往与西周晚期周原青铜器相同。如前所述，鼎、盘、甗等横式的附耳多有铜梗与器口相连，并带芯范以便浑铸之。但这一特征并不见于第一期青铜器。第一期 72 熊家老湾甗、盘（图 3.4－7，5）和义地岗 M83 盘为浑铸或先铸，但未设加固的圆梗，因此也无需耳腹间的芯范，这是周原青铜器常见的做法。

由《周原》等青铜器图录可以观察，周原西周晚期簋双耳以浑铸为多，曾国青铜器中 72 曹门湾簋和桃花坡 M1 簋也是浑铸双耳，簋腹部中轴处可见范缝。茶庵环带纹壶双耳采用铆式焊接，也是周原壶龙形耳的连接方法，茶庵壶底带“十”字带形纹，同样也是西周晚期的传统。

据郭宝钧观察②，扶风齐家村窖藏出土的匜，均为由流及鋬二分腹范。曾国匜可见这一铸形技术及其发展形式。义地岗 M83 匜就是这种二分腹范铸形。桃花坡 M1 匜腹范变为三块，除了腹部两侧之外，在匜尾部加设一芯范。至苏家垅窃曲纹匜，腹范已经发展为四分，腹范分别在流、尾及两侧。

第一阶段曾国青铜器表现出一些与周原地区西周青铜器相异的特征，又说明了诸侯国青铜器可能存在的一些个性，以及春秋早期铸造技术的发展。

《周原》等图录显示，周原西周青铜鼎三角形底范之内，多有如毛公鼎类似的弧形三角形阳线，这几乎是西周青铜器的一个时代特征。这一特征在虢国墓地青铜器中仍然

① Rutherford J. Gettens, The Freer Chinese Bronzes, Volume Ⅱ, Technical Studies, Fig 111.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Washington, 1969.

② 郭宝均：《商周青铜器群综合研究》之《西周后期铜器群》，文物出版社，1981 年。

多有保留①。但在曾国青铜器中，曾伯从宠鼎和72熊家老湾重环纹黄季鼎（图3.4－7，6）底部有此阳线，其他鼎三角形底范多粗糙外凸，也成为一个不为周原青铜器所见的突出特征。同时，曾伯从宠鼎和72熊家老湾黄季鼎也像周原地区鼎的鼎足内侧封闭，这与其他足部浑铸的曾国鼎不同②。

分铸法的快速发展是这一阶段铸造工艺的一个突出特征。在第一阶段可统计的青铜容器中，以下三组数据分别是第一、二、三期使用分铸法的容器件次和该期容器总件次：8/30，15/40，11/17。即第一至三期青铜器使用分铸法的比例分别是26.7%、37.5%、64.7%。分铸技术中，又以榫式焊接技术发展迅速，并成为第二阶段分铸法的主流技术。

铸造工艺在不同时期表现出的时代变化，也反证了本文对于这一阶段曾国青铜器分期的基本合理。

三　小　结

第一阶段曾国青铜器的工艺特征，可说明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这一阶段青铜器铸造技术的主体方面，即铸形特征与西周晚期周原青铜器基本相同。以鼎为例，其铸形配置基本都为3－△＋1，即3块腹范、1块三角形底范、1块芯范，腹范范缝与鼎足相应，足、耳浑铸。虽然在各期偶尔可见变化，但这种基本格局在第二阶段之前一直未曾改变③。其他器类，如簋、壶等常见形制，所使用的铸形与周原地区几无二致。不过，曾国不同时期青铜器在同一器类上采用规范的工艺技术，又说明其技术的单一性，说明其技术发展水平不高的实际。曾仲斿父方壶底部出现补铸、契入榫头形成的裂缝等现象，说明曾国在处理大型铸件时还存在技术缺陷。

2）附件连接技术的变化是东周时期青铜铸造工艺最重要的变化。在第一阶段曾国青铜器中，除了少数青铜器的耳、鋬等附件的连接技术之外，多数青铜器采用了与周原青铜器不同的技术，其表现是簋耳普遍采用后铸连接、壶耳的连接方式多样、出现鼎足先铸技术。这些与周原青铜器工艺的不同在第一期青铜器中即已表露。曾国青铜器附件连接技术的多样性以及对新技术的采用，都反映了诸侯国青铜器在铸造技术方面发展较为迅速。在这一方面，虢国青铜器具有近似的特征，铸造技术这种一致性在当时诸侯国之间较大区域范围的存在，说明青铜铸造技术在当时仍然有着同步的发展，这也是值得重视的现象。

---

①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三门峡虢国墓（第一卷）》图版173，文物出版社，1999年。

② 其他曾器中，曾仲子敔鼎和另一件黄季鼎足内侧封闭。

③ 在第二阶段曾国青铜器中，这种格局完全被打破。

3）不同诸侯国的铸造技术在总体一致的大局之下，出现有局部细节技术的差异。这种差异不仅如前所述地表现在与周原青铜器的对比中，也存在于同时期诸侯国之间。例如在选择浇口位置方面、在鼎底部特征方面，虢国与曾国鼎存在明显的不同。但由于资料的限制，目前能够作横向对比的项目不多，目前很难在这一方面得到更多的认识。同时，由于西周中期开始的青铜器铸造工艺简化的技术趋向，诸侯国青铜器之间也难以存在较多、较大的技术差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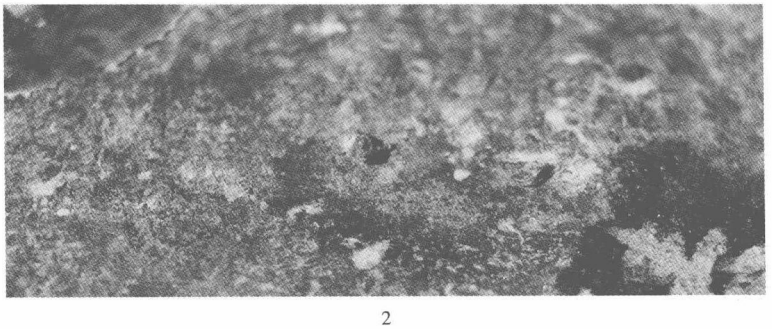
4）一些在春秋中期及以后出现和流行的分铸技术在这一阶段已经成形，其典型者如鼎足的先铸、壶耳的榫式焊接技术等。正如我们在下一章将讨论的那样，分铸技术的形成背景之一是简化技术难度的趋向。简化技术难度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技术的大的倾向，因此这一倾向在西周晚期还表现在其他一些技术环节。比如前述簋耳由混铸到后铸，比如鼎足内侧不封闭，从而可以免设鼎足芯范等等，都是简化技术的体现。正如我们此前在《纹饰》一节所述，西周晚期纹饰连续性排列方式也是便于纹饰制作的简便。这也是何以曾国青铜器在工艺技术方面出现较多不同于周原青铜器的背景：诸侯国青铜器的工艺更可能首先采用简化的工艺技术，这是西周中晚期诸侯国青铜器兴起的一个社会背景。另一方面，诸侯国简化的技术趋向又可能会对王室以及时代技术趋向产生影响，使简化工艺技术成为整个社会青铜工业生产的发展方向。

5）曾国青铜器各器群内还存在一些特殊的技术手段。前面列举的一些特殊的铸形技术，说明曾国青铜器范铸技术的运用上已经具有一定的灵活性，而在特殊铸形条件下成功完成铸件，则反映了铸造者对技术的掌握比较成熟。曾国青铜器特殊因素也表现在器群中，苏家垅器群中鼎、簋、鬲等多件器物有在底部中央设置垫片的现象（图 3.4－8，1），这种现象如此集中出现，似乎暗示了一种技术习惯。何家台铜器群表现出另一方面的特殊性，该群青铜器制作较为粗糙，纹饰多滞涩而无流畅之感，多数器物造型的协调性较差。我们现在还不能确定，这是否说明曾国当时可能存在不同的作坊系统、服务于不同的贵族集团。此外，72 熊家老湾盘外底中央可见先铸的器纽残断部分，参考西周晚期其他青铜器，可知这是用作悬挂铜铃之用（图 3.4－8，2）。容器外底悬铃是商周时期某些地区的特别设计①，由于悬纽需先铸，这种个性化的设计不应当在其他国家或地区的铸造作坊体系下完成。

综合考虑各方面曾国青铜器的铸造技术特征，特别是一些特殊技术环节的特征，可以大体推定的一点是，曾国当时已经拥有独立的、生产水平较高的青铜工业。

① 张昌平：《商周时期带铃铜容器》，周边与中心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台北，2006 年。

1



2

图 3.4－8　曾国青铜器的特殊设计

1. 苏家垅 4 号鼎外底中央垫片　2. 72 熊家老湾盘外底悬铃纽痕迹

如果我们再回到此前已经讨论的两周之际前后的“滞延期”① 或“延展期”②，会发现“滞延”或“延展”所形容这一时期青铜器风格单一、发展频率缓慢，其实更适合于理解器形、器类和纹饰的演变。从技术的角度，分铸和焊接技术的开始成形，已经开此后技术之先河，暗示出中国青铜时代最重要的技术转变即将形成，因此这一时期的技术变化是重大而革命性的。

最后必须强调，由于可供对比研究材料的极度局限，同时也由于目前研究水平的限制，目前所作铸造工艺的研究在可供研究区域、研究领域都只能在较小的范围进行。例如，曾国与虢国青铜器工艺的异同表现在那些方面？这种相似和差异是区域性的抑或是社会等级的背景原因？我们还不得而知。

第五节　器物群

西周中期，标榜新礼制的器用制度形成③，其在考古学文化中的表现形式，是那些曾经出现在下葬、祭祀等礼仪场合的器物群。因此，器物群是青铜器研究中衡量器主的社会等级、反映器主所代表族群文化特性的最有价值的标志。他们与其他诸侯国或地区相应铜器群在等级和文化上的异同，是我们所关注的。

鼎是西周、春秋时期礼制和反映等级的标志性器物。按照鼎的多寡，我们将第一阶段曾国青铜器划分为三个级别：五鼎或以上级别的铜器群；二鼎到四鼎级别的铜器群；一鼎或见其他铜礼器的铜器群。

一　五鼎以上的铜器群

第一阶段曾国青铜器明确出土五鼎或更多鼎数的铜器群只有苏家垅一个，但可推定出土相应等级铜器群的墓葬还有郭家庙 M17 和 M21。

1. 苏家垅铜器群

1966 年京山苏家垅出土青铜器 97 件，其中铜容器有鼎 9、鬲 9、甗 1、簋 7、豆 2、方壶 2、盉 1、盘 1、匜 1 共 33 件。除容器之外，还出土有车马器等 64 件青铜器。在 33 件容器中，除两件较大的鬲为黄国之器外，在鼎、豆、壶等 6 件器上有序地出现“曾（侯）仲斿父”铭文，因此斿父应该是这批青铜器的所有者。

苏家垅铜器群中处于核心地位的是 9 件鼎（图 3.5－1）。这九鼎是考古所见反映用

① 苏荣誉等：《中国上古金属技术》第 2 页，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 年。

② 华觉明：《中国古代金属技术——铜和铁造就的文明》第 4－5 页，大象出版社，1999 年。

③ 曹玮：《从青铜器的演化试论西周前后期之交的礼制变化》，《周秦文化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 年。

鼎制度的最早实例，也是周代诸侯国青铜器所代表的最高级别，故一直被学者们视为西周、春秋列鼎制度最重要的例证，并为研究者所珍视①。由于在两周之际前后高等级墓葬中常有一套以上礼器随葬的现象，墓葬出土全部的鼎并不意味着都是组合成一套，例如虢国墓地 M2001 出土的 10 件鼎是 7 件和 3 件的两套，但也曾被认为是有九列鼎②。苏家垅九鼎包括有 2 件有铭鼎和 7 件无铭鼎，它们是否是同一套，需要具体分析。

苏家垅所出的 9 件鼎器形、纹饰、铸造等特征接近，鼎均作附耳宽扁腹、圜底，上腹饰一周结构相同的窃曲纹。九鼎形制相同，大小也大体构成一列。依大小尺寸，可制出反映各鼎口径与高递减关系的折线图表：

表 3.5－1　　苏家垅九鼎大小登记表

器物 / 项目	1（有铭）	2	3（有铭）	4	5	6	7	8	9
口径与高折线图（◆：口径；□：通高）									
口径（厘米）	38.2	35.4	33.6	31	30.2	28.5	26.5	23.5	23.1
通高（厘米）	32.7	31.5	29.3	27	25.3	23.6	21	19	18.7

如表中所示，这九鼎大小相次的差别都不超过 3 厘米，且递减的速率接近。较之两周之际前后其他列鼎③，系列是相对规整的。但是苏家垅九鼎中第 1、3 号有铭文，其他鼎无铭，这为列鼎所罕见。若我们假定有铭的第 1、3 号鼎为另外的一套，那么在无铭的 7 鼎中，较大的两件即第 2、4 号鼎口径和高度之差均大于 4.4 厘米，彼此难以构成系列。同时，有铭的两件鼎也难以形成组合。这样看来，九鼎原来是同一套列鼎是可以肯定的。

① 俞伟超、高明：《周代用鼎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学报》（社哲版）1978 年第 1 期。

② 《虢国墓地再次出土大量珍贵文物》，《中国文物报》1991 年 1 月 6 日第 1 版。

③ 有关两周之际前后一些列鼎大小差别，参周亚：《关于晋侯苏鼎件数的探讨》，上海博物馆《晋侯墓地出土青铜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书画出版社，2002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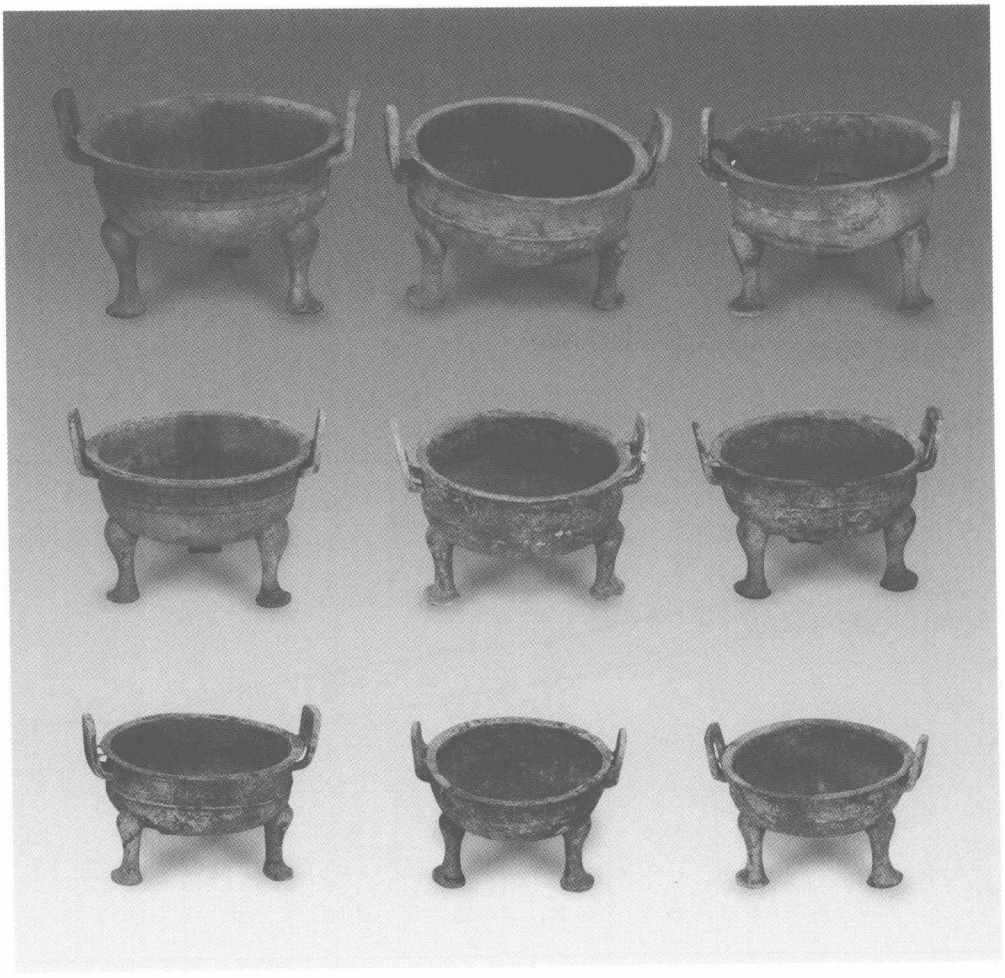


图 3.5－1　苏家垅铜器群九鼎

但苏家垅铜器并非是同一时间制作的。除了黄朱柁鬲和鼋乎簋，有曾仲斿父铭文的6件铜器铭文是这样的：

鼎2：	曾侯仲子	游父	自作彝
豆2：	曾仲	斿父	自作宝甫
方壶2：	曾仲	斿父	用吉金自作尊壶

以上豆与方壶铭文的辞例不同，鼎与豆、方壶的称谓不同。另外，两件方壶中一件

冠铭无“仲”字①。“斿”为作器者私名，鼎铭中“㣇”较豆、方壶多了“彳”旁②。这些说明鼎、豆、壶三种器类铸造时间并不一致。

即便是同一套的鼎，铸造时间也是先后有别。苏家垅九鼎中2件有铭鼎和7件无铭鼎实际上存在一望而知的差别（图3.5－2）。比如，两件有铭鼎器表光洁，色泽较艳；无铭鼎胎色较为灰暗，器表较为粗糙，可能不具备有实用的功能。器形上第2、5、6号鼎器腹较有铭鼎扁宽，鼎足与器腹的结合僵硬；而7、8号鼎腹壁内收，接近于半球形。无铭鼎纹饰漫漶不清，构图远不及有铭鼎清晰、细致。无铭鼎铸造较粗，器形不够规整。推测苏家垅九鼎分两次铸造，无铭鼎晚于有铭鼎，是围绕2件有铭鼎补做的一套列鼎③。

1

2

图3.5－2　苏家垅3号有铭鼎与5号无铭鼎比较

苏家垅鬲、簋同样存在后配现象。苏家垅九鼎与鬲、簋形成九鼎九鬲七簋一套组合④。但和鼎的情况一样，九鬲和七簋也都是由两部分组成，即无铭器配两件形制接近的有铭器。7件重环纹无铭鬲配2件黄朱柁鬲，后者较大⑤，且腹外设扉棱。5件无铭簋配2件鼋乎簋，簋的大小、器形接近，但有铭簋三小足作象首状，全瓦纹，其圈足无纹饰，无铭簋三扁足，口外饰一周窃曲纹，圈足饰一周垂鳞纹。有铭和无铭器形制相互接近，说明鬲、簋的情况与鼎一样，也是无铭器围绕有铭器配置的。7件小鬲纹饰也较模糊，铸造较粗糙，这种情况与九鼎的类似。

---

① 考虑到方壶铭文为器、冠对铭和另外一件方壶铭文，此处“仲”字更有可能为漏铸。此意见参见《铭文》一节。

② 金文中“彳”旁常可省。因此“㣇父”与“斿父”是同一人无疑。

③ 这套鼎不可能为先铸7件无铭鼎，而后补2件有铭鼎。如前所述，7件无铭鼎大小不成系列。

④ 因出土背景的原因，苏家垅所见7簋，已难以判断是否原来为8簋而有1簋遗失。

⑤ 两件黄朱柁鬲大小基本相同，口径为25.8厘米。7件无铭鬲大小也基本相同，口径为14.2－15厘米。

苏家垅铜器群临时组合的做法在两周之际前后高等级青铜器群中不乏其例。晋侯墓地的晋侯青铜器往往出现在同组的夫人墓葬之中，甚至也出现在几代不同的组别墓葬之中。同时，晋侯墓葬也较多有使用他人青铜器现象，例如 M64 晋侯邦父墓见有叔钊父方甗、休簋 4、楚公逆编钟 8 等外来器①。周亚认为，不同器主的铜器同葬于一墓的现象，或可能是赗赙制度的体现②。

苏家垅器群外来青铜器的情况似乎并不似晋侯墓地情况那样复杂。两个件次外来器有黄朱柁鬲和鼋乎簋各两件。这些鬲、簋各与其他无铭的鬲、簋搭配，形成如同九鼎有铭与无铭同样的系列。黄朱柁鬲出土在曾国的背景，与当时曾、黄两国关系密切有关，除了苏家垅以外，72 熊家老湾、郭家庙 M1 出土青铜器都有反映曾、黄两国交往的信息。鼋乎簋与无铭簋的搭配，到底是反映类似曾仲斿父鼎与无铭鼎的搭配关系，抑或是类似黄朱柁鬲与无铭鬲的搭配关系，难以判断。但鼋乎无疑也与曾国有近缘的关系。鼋乎簋铭文末有族徽“⊥”，是商周青铜器中年代极晚的族徽例证。“⊥”或释为“束”，作为族徽可从殷墟西区出土的束乙爵（《集成》8013）、束觚（《集成》6744）等，串联到西周早中期陕西长安花园村 M15、M17 出土的䜌䢅所作的群③，由此可以确定“⊥”族为商人的性质④。又，在商代甲骨文中也可见“束”作为地名或族名⑤，因此鼋乎的先祖应当为商人。

下面再来讨论苏家垅器群中围绕有铭鼎、鬲后配铜器的性质。

苏家垅这些后配铜器制作略为粗糙，未见使用痕迹，但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之下，是否可将其归入明器一类，并非是一个简单的问题⑥。两周之际前后诸侯国高等级墓葬青铜器按照制作情况大体可分为三类：一是生活实用器，铸造较精；二是类似于实用器，但铸造略粗糙，往往未见使用痕迹；三是仅具器形的所谓明器，铸造更加粗糙。

上述三类铜器在晋侯墓地和虢国墓地也都有发现（表 3.5－2）。出土第三类明器的墓葬在晋侯墓地只见于 M8 和 M93⑦ 两代较晚的晋侯墓，在虢国墓地只见于 M2001 虢季

① 簋、编钟见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等：《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四次发掘》，《文物》1994 年第 8 期。方甗见上海博物馆：《晋国奇珍——山西晋侯墓群出土文物精品》第 149 页，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 年。

② 周亚：《晋韦父盘与盘盉组合的相关问题》，《文物》2004 年第 2 期。另外也可能存在其他如掠夺他人之器等复杂情况。

③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西周镐京附近部分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86 年第 1 期。

④ 李学勤：《论长安花园村两墓青铜器》，《文物》1986 年第 1 期。

⑤ 王长丰：《束、亚束方国氏族徽源流考》，《文物研究》第 14 辑，2005 年。

⑥ 巫鸿：《“明器”的理论和实践——战国时期礼仪美术中的观念化倾向》，《文物》2006 年第 6 期。

⑦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等：《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五次发掘》，《文物》1995 年第 7 期。

墓和 M2012 梁姬墓①。这说明使用这类明器的葬俗出现于西周晚期，而使用明器似乎表明增加了随葬礼器的套数，因此往往是代表了较高的级别。梁姬墓出现明器而晋侯夫人墓未见，与虢国使用的鼎制高于晋国的情况相吻合。

表 3.5－2　　苏家垅铜器群与虢国等高级别铜器群比较

墓葬	礼器													明器	其他
	鼎	甗	鬲	簋	簠	盨	豆	方壶	圆壶	盉	盘	匜	编钟		
苏家垅	9	1	9	7			2	2		1	1	1			车马器
虢国墓地 M2001	7	1	8	6	2	4	2	2	2	1	1		8	鼎3、簋3、盘3、盉2、方彝3、尊3、爵3	钲、兵器、工具、车马器
虢国墓地 M2012	5	1	8	4	2		2	2		1	1			鼎6、簋6、盘6、匜1、盉5、方彝5、爵4、觚1、觯6	罐2、方盒1。车马器
虢国墓地 M2011	9	1	8	8			1	2	2		1	1			盆1、钲。兵器、工具、车马器
晋侯墓地 M93	5	1		6				2			1	1	16	鼎、簋、盘、尊、卣、爵、觯、方彝各1	兵器、工具
宝相寺 G1	2						2	2			1	1			鑐2、兵器、工具

上述两国墓葬使用第二类较粗糙的青铜器作为随葬品的情况，见于晋侯墓地 M102② 夫人墓、虢国墓地 M1052③、M2011④ 两座虢太子墓。虢国墓地 M2011 成列的组合为 7 鼎、6 鬲、8 簋，该墓还出土 2 件鼎、2 件鬲，分别与其他 7 鼎、6 鬲略有差别，但是这 4 件鼎、鬲也不像虢国墓地 M2001 明器那样粗陋，它们可能形成另一套组合。无论如何，这两个诸侯国随葬第二类青铜器的墓葬，所体现的等级略低于随葬第三类明器青铜器的墓葬。

①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三门峡虢国墓（第一卷）》，文物出版社，1999 年。

② M102 出土列鼎 3，“器底外壁留有范痕，足部浇铸时残留铜渣尚未剔除”。该墓其他多件器亦较粗糙。见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等：《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五次发掘》，《文物》1995 年第 7 期。

③ 发掘报告未报道青铜器是否精陋。见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上村岭虢国墓地》，科学出版社，1959 年。但根据郭宝钧观察，“这些器制工都较粗糙，花纹亦不精细，且大半属于明器”。郭宝均：《商周青铜器群综合研究》之《东周初年及春秋时期铜器群》第 76 页，文物出版社，1981 年。

④ M2011 出土的 8 件窃曲纹簋“铸造均较粗”，该墓其他器多有近似特征。见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三门峡虢国墓（第一卷）》第 327 页，文物出版社，1999 年。

苏家垅后配铜器如鼎明显也属于第二类器物的情形，但器群同时较多使用第一类铜器，与虢、晋两国情况略为不同。但苏家垅器群不仅不见虢、晋两国国君墓中的明器，也不见反映等级身份的乐器。不见明器当然可以解释为区域特征的不同，但未出现乐器则是值得注意的。即便在其他礼器组合中，苏家垅也不见虢国墓地 M2001 的簠、盨，其组合的复杂程度远不及 M2001。

从用鼎的角度看，两周之际前后诸侯国国君一级的情况差异较大。晋侯墓地的发现表明，西周晚期晋侯用五鼎四簋，且其用鼎不同于西周早中期①。在虢国，M1052、M2011 等虢太子用七鼎，但身份为虢君的 M2001 也为七鼎，与太子墓的器用差异是在组合的复杂程度上。在晚些时候，新郑祭祀遗址出土的成套礼器中，鼎均为九件②，暗示郑国国君用九鼎，这与郑公大墓的情况一致。但也有一些国君用鼎数量较少。光山宝相寺黄君用二鼎③，其他还有不少可能为国君一级的墓葬也出二鼎。但从历史文献和考古发现看，春秋早期的黄国并非为一小国。这样，如何理解周代可能的诸侯用鼎的器用制度？或者“列国国君有所谓大国之君、次国之君和小国之君的区别”④？眉县杨家村出土的青铜器中⑤，四十三年逨鼎 10 件，同出又有形制相同的四十二年逨鼎 2 件。这种不同时期所铸鼎的情况对于理解鼎制更增加了复杂的情况。综合这些用鼎情况，不同诸侯国、同一诸侯国的不同时期、甚至同一贵族在不同礼仪场合都可能使用不同器用。周代贵族用鼎问题，可能远较我们设想的更为复杂。

苏家垅铜器群同样反映出较大的复杂性。苏家垅九鼎虽然高于上述诸侯国等级，但九鼎也为两次铸造，第一次所铸的两件有铭鼎，所代表的级别明显颇低，现存的九鼎是否可能是历史文献记载的葬制加等的结果？苏家垅器群使用鼎制虽然与虢、晋相比更高，但还很难说是代表曾国最高的等级。

关于苏家垅铜器群所代表的器主身份，出土之初即被视为曾侯⑥，这一意见仍为多数学者所坚持，如李学勤认为墓葬出 9 鼎⑦，与曾侯乙墓相同，属诸侯一级。不过俞伟超等认为两件黄朱柁鬲“当为黄国媵器。墓中既有此媵器，墓主可能是曾侯夫人，但

① 孙华：《关于晋侯𩰫组墓的几个问题》，《文物》1995 年第 9 期。

②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郑郑国祭祀遗址》，大象出版社，2006 年。

③ 河南信阳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光山县文物管理委员会：《春秋早期黄君孟夫妇墓发掘报告》，《考古》1984 年第 4 期。

④ 王世民：《关于西周春秋高级贵族礼器制度的一些看法》，文物出版社编辑部《文物出版社成立三十周年纪念文物与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6 年。

⑤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陕西眉县杨家村西周青铜器窖藏发掘简报》，《文物》2003 年第 6 期。

⑥ 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商周考古》第 206 页，文物出版社，1979 年。

⑦ 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第十章，文物出版社，1984 年。

曾侯同其夫人的鼎制是相同的”①。从铭文内容看，我们并没有判断苏家垅铜器群主人为曾侯的直接依据。从前面分析苏家垅器群情况看，苏家垅器群代表的身份是否为曾侯，还难以确定。

2. 郭家庙 M17 和 M21

郭家庙 M17 为带墓道一棺一椁墓，墓底长 5.63、宽 3.76 - 3.8 米。墓室早期被盗。墓葬及墓坑之南的器物坑出土有铜鼎2、鼎足1、鬲1、壶2、杯1、方座形器1。其他铜器有小铃、“Y”字形器等，陶器有鬲等。M17 出土玉石佩 139 件，在墓地中极为突出。根据墓葬结构与规模、随葬品的类别，我们在材料分析一节推测 M17 为曾侯夫人墓。

M17 两件完整的鼎形制相同，大小不一，可知原来为列鼎。两件鼎口径分别为 31.8、28.4 厘米，足高分别为 12、12.5 厘米。墓室另外残存的鼎足足高 14 厘米，形制与现存两件鼎完全相同，它们应当是同一套鼎。按照列鼎大小呈等差的特征推测，残鼎足与现存鼎之间还可能另外有二件鼎。如此则 M17 原来至少为五鼎。若这一推测不误，残存鼎足的口径约在 40 厘米，大于曾仲斿父第 1 号鼎，为第一阶段所见曾国最大的鼎。从这个角度看，M17 墓主曾亘嫚非录为曾侯夫人是可靠的。

M21 位于郭家庙墓区北部最高的台地偏东处。为带墓道的重棺一椁墓。郭家庙墓地发掘报告已经指出，M21 为一代曾侯墓②。根据郭家庙墓地布局和 M21 规模，我们在材料分析一节中也有相同的认识。这一点还可以从随葬青铜器得到印证。

M21 早期被盗，墓室被扰严重。残存随葬品包括：铜器 2085 件，有编铃 7、钺等兵器 160、车马器 1887 等，其他有玉戈等玉器等，总计出土随葬器物 2355 件。墓内青铜容器显然被扰一空。不过，出土的曾伯陭钺（GM21：9）与传世青铜器曾伯陭壶③可相互对应，属于同一人所作的铜器，曾伯陭当为 M21 墓主。曾伯陭钺涉及有刑罚和政令的铭文内容，象征着君权④。M21 残余随葬品还有这样两个特点：1）车马器数量较大，兵器亦较多，而玉器则极少，饰玉仅为珠等串饰，说明墓主可能为男性。2）出土青铜钺和玉戈等礼仪兵器，玉戈在两周之际一般只见于国君一级墓葬⑤。曾伯陭钺形制特殊，为同时期罕见。西周晚期以后中原文化系统出土钺的例子，其他只见于战国中期平山中山王墓钺（《全集》9 - 163）。综合这些情况，M21 曾伯陭墓为一代曾侯墓应当无疑。

---

① 俞伟超、高明：《周代用鼎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学报》（社哲版）1978 年第 1 期。

② 襄樊市考古队等：《枣阳郭家庙曾国墓地》第五章《结语》，科学出版社，2005 年。

③ 容庚：《商周彝器通考》图 721，哈佛燕京学社，1941 年。

④ 黄锡全：《枣阳郭家庙曾国墓地出土铜器铭文考释》，《枣阳郭家庙曾国墓地》附录一，科学出版社，2005 年。

⑤ 杨美莉认为：“西周晚春秋早，在各诸侯国间，似乎兴起一股复古风潮，仿殷盛期的玉戈再度出现在一些诸侯王间。”杨美莉：《玉戈的研究》（下），《故宫学术季刊》第十六卷第二期，1998 年。

二 二鼎至五鼎的铜器群

第一阶段铜器群中属于二鼎到五鼎级别的铜器群，其组合关系较完整者有表3.5－3所列的8个。从年代上看，属于第一期的铜器群数量明显较多。

这8个器群可能都属于墓葬所出，但大多数为偶然发现。不过这些器群都属于20世纪80年代及以前发现，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组合关系可能受到的破坏较小。比如，二鼎以上级别的铜器群一般会出有一套水器，上述器群未见水器者容易被认为组合受到了晚期破坏。但实际上8个器群中盘、匜均伴出，并未出现单件器的扰乱现象。同时，这些铜器群中有的还变化车马器等小件，说明器物收集比较齐全。这些器群多数可能反映的是原来的组合面貌。

表3.5－3　曾国青铜器二鼎至五鼎铜器群登记表

出土区域	出土单位	出土铜器									同出其他铜器	期别
		鼎	甗	鬲	簋	圆壶	罍	卣	盘	匜		
滚水	72曹门湾	2			1							一
均水	70熊家老湾				4		1	1				一
均水	72熊家老湾	3	1		2		1		1	1		一
涢水	桃花坡M1	2		4	4	1			1	1	车马器	一
涢水	桃花坡M2	4		2	1							一
滚水	段营	3			4	2					兵器、车马器	二
均水	何家台	2	1	4	2	2			1	1	车马器、工具	二
漂水	周家岗	2			2	2			1	1	兵器、车器	三

8个器群中除了72曹门湾之外，其他器群所代表的社会等级大约差别不大。70熊家老湾、桃花坡M1和段营使用四簋，而72熊家老湾和桃花坡M2分别使用三鼎和四鼎。几个二鼎的器群组合比较齐全，它们多有盘、匜一对水器，何家台和周家岗都见有成对的圆壶。8个器群有一半见有兵器或车马器，这也为这一阶段级别较高贵族墓葬中常见。一些未见兵器和车马器的器群可能与发现的背景有关。

虽然曾国铜器群的总的数量发现有限，但二至五鼎的铜器群仍可见8个，这在曾国不同级别的铜器群中所占比例最高。这8个器群中可能为五鼎的器群约有3个，这些暗示出曾国中高层贵族构成较大。另一方面，上述8个器群在地域的分布上比较分散，考虑到苏家垅器群出土于漳河流域，在曾国青铜器的几个重点分布区域，如滚河、均水、涢水以及漂水等，基本都有较高级别器群发现。曾国青铜器没有仅仅集中分布于中心区

域，既反映出当时曾国国家实力比较强大，同时也说明曾国贵族势力的强盛状态。

上述器群是目前所见仅次于曾国国君一级的高级别贵族礼器。但是这些器群反映的组合关系并不整齐，表3.5－3中所列各器群器类及数量有明确的反映，比如鼎、鬲、簋、壶这些常见器类在各个器群中的出现似乎没有必然的规律性。同时，这种不整齐还突出的反映在鼎类器中。在这些器群中唯有桃花坡M2中有三鼎形成列鼎，但该组器仅同出鬲2、簋1，另外一件鼎是完全不同的较早形制，可能是临时拼凑的。另外的72熊家老湾和段营两个三鼎器组，各组鼎的形制都不相同，无疑也是临时组合的①。从各期的发展来看，曾国较早器群组合不及较晚组合整齐，属于第一期的72曹门湾、70熊家老湾、桃花坡M2的青铜器组合都显得残破。显然，这种情况不会都是出土后破坏所致。这些即便等级较高的铜器群，缺乏水器的现象颇为常见，即便是第二期段营器群见四簋而不出盘、匜等水器，也是很特别的。

像曾国一样，虢国青铜器也体现出其数量较大的高级贵族群体。在虢国墓地相应级别的铜器群中（表3.5－4），即便有两座墓葬被盗，但仍然折射出曾国青铜器组合的不规整。在虢国二鼎以上器群必定有一套水器，其中一套为盘与盉的组合。有鼎无簋搭配的情形只是出现在一座二鼎墓葬之中，鬲、簋、圆壶必成对出现，而圆壶往往代表较高级别。如果没有被盗的因素，高级别墓葬中也都出有兵器、车马器或工具。

虢国高级别铜器群组合这种特征似乎说明虢国这一层次贵族的实力较曾国更为强大。在两国最高级别贵族用鼎级别类似的情况之下，这种差别可能代表两个方面不同的背景。一是因为郭家庙墓地的早期被盗，曾国墓地高级别墓葬受到破坏。二是曾国与虢国还存在文化实力上的差距，联系到苏家垅器群的铜器组合与虢季墓之间的差别，实际存在的后一种可能性较大。

表3.5－4　　虢国墓地二鼎至五鼎墓葬青铜器登记

出土单位	出土铜器										同出其他铜器	备注
	鼎	甗	鬲	簋	豆	圆壶	小罐	盉	盘	匜		
M1602	3		2	4					1	1	工具、兵器、车马器	盗
M1689	4			5			1	1	2	1		盗
M1705	3			4		2	1		1	1	工具、兵器、车马器	
M1706	5		4	4	1	2			1	1	兵器、车马器	
M1711	2								1	1	兵器、车马器	
M1810	5	1	4	4	1	2		1	1		兵器、车马器	
M1820	3	1	2	4	1	2	1		1	1	簠2、罐1。兵器	

① 这种零乱现象甚至在更高级别的苏家垅也有所体现，如苏家垅九鼎七簋的搭配，特别是盘、匜、盉各一而不是两周之际流行的盘与匜或盘与盉的规整的组合方式。

三 一鼎的铜器群

第一阶段铜器群中出土一鼎的单位，其性质均可确定为墓葬。这些单位出土青铜器及同出其他器物的情况，可总结为表3.5－5。

表3.5－5 曾国青铜器一鼎青铜群登记

出土单位	随葬品			单位性质	期别
	铜容器	其他铜器	其他质地器物		
义地岗M83	鬲1、盘1、匜1		玉环2	墓葬	一
黄土坡M1	鼎1	戈1、钺1	鬲、壶等陶器	墓葬	二
旭光砖瓦厂	簋2	铲1、矛1、镞12		墓葬	二
郭家庙M6	鼎1	戈1、矛1、镞10	陶罐1	墓葬	三

表3.5－5反映的是曾国基层贵族的器用情况。除了义地岗M83情况比较特别之外，其他墓葬均只见单类容器，伴出铜器均见有兵器，其身份当为一般贵族墓葬。

四 小 结

苏家垅铜器群仍然是迄今所见春秋早期之前诸侯国中使用列鼎数量最多的铜器群。不过，虽然苏家垅器群的用鼎数量超过虢、晋等一些诸侯国，但其礼器组合的复杂程度则有不及。曾国的一些高等级器群器物组合也不及虢国相应铜器群规整。除了出土原因之外，这些可能与曾国青铜器的文化背景相关。苏家垅器群代表较高的社会等级，但并不能代表其青铜文化到达相应的发达程度，曾国青铜器显示出的文化和经济方面不足的底蕴。

曾国青铜器在若干不同的地区都见较高级别器群，又说明第一阶段的曾国具有较强的政治实力，这与前述组合情况形成正反两个方面的特征。这或许反映了一个诸侯国文化的复杂性。

第六节 结 语

第一阶段曾国青铜器文字涉及史实的材料不多，但铭文中的记时用语为曾国的性质提供了一点线索。属于第一期的曾伯从宠鼎有“唯王十月既吉”，属于第三期的曾伯霥簠又有“唯王九月初吉庚午”，此时的曾国尚未在政治上附庸于楚，两器中的王均应当是指周王。这说明晚至春秋早期偏晚阶段，曾国仍然是采用周历纪年，当时曾国政治、

意识形态等领域仍然是在周天子体系之下。曾国上层建筑状态与其物质文化的性质颇具一致性。

第一阶段曾国青铜器迄今共见14批，在两周之际前后诸侯国青铜文化中颇为突出。上述铜器群中包括规模较大的苏家垅和级别较高的郭家庙M21铜器群。郭家庙墓地未能完全发掘，特别是墓葬绝大部分遭到严重盗扰。可以料想，未经破坏的郭家庙墓地所展现的青铜器风貌会完全不同。因此，第一阶段曾国青铜器在规模上大约处于当时诸侯国青铜文化发展的前列，这样的水平同时与曾国所在的鄂北豫南地区青铜文化的发展相关。两周之际前后的鄂北豫南地区国家林立，所出的青铜器颇众，这里是周文化中心之外青铜文化较为发达的地区。

如果我们回到开始讨论之前设定的初始目的，在经过对第一阶段曾国青铜器器类与器形、纹饰、铭文、工艺、铜器群等方面的考察之后，我们得到了对曾国青铜文化地位怎样的认识？

（一）诸侯国青铜文化的一般特性

如本章开篇所述，第一阶段曾国青铜器是具有一致于其上层的青铜文化——周文化青铜器的特征，这一总的特征，不同程度但清楚地反映在曾国青铜器器类和器形、纹饰、铭文、工艺、铜器群等各个方面。曾国青铜器的常见器类及其核心组合、纹饰种类及其搭配方式、铭文字形与辞例、基本铸造工艺技术、基本器用方式等等都与周文化体系青铜器相同。这也是周文化体系之内各地域青铜文化的基本特征。

两周之际前后周文化青铜器发展相对缓慢，是该时期青铜器的另一特性。曾国青铜器同样具有这一特性，其主要表现在器物形制变化频率缓慢，某些器物形制特征延续较长时间。这一阶段纹饰中重环纹、窃曲纹，难以观察到它们明确的演进逻辑。文化发展较缓慢的现象在当时普遍存在，也是当时社会政治格局的体现。这种相对平静的状态，是其后物质文化出现革新和区域分化的酝酿和准备。

上述两个方面是两周之际前后青铜文化的一般特征。曾国青铜器还表现出作为一个诸侯国青铜文化的特性。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作为诸侯国青铜文化，其社会等级水平受到限制。青铜器作为青铜时代标榜社会等级、地位的标志物，自然也会是一个诸侯国等级、地位的缩影。曾国如苏家垅铜器群使用九鼎为核心的青铜器组合，表现出曾国较突出的社会地位，曾国也有相当数量等级较高的铜器群，显示出曾国较大的贵族群体和社会实力。但是，曾国只是一个地方诸侯国，曾国的高等级器物群数量不多，少见或不见如中心文化区域那样体现高等级水平的器类。曾国青铜器铭文简短，既是时代风格的体现，也是其社会地位的反映。不难注意到，即便在西周晚期，曾国青铜器铭文也不见反映与王室的关联、或者有颂扬于世的历史性事件的记载。

作为地方青铜文化，表现出单一的文化结构水平。曾国青铜器从器类、纹饰直至器物群等方面，均表现出单一文化因素的特征。如铜器群中器类变化较小，同一器类中器形变化较小。纹饰中纹饰组合变化不多，纹饰结构变化甚微。铭文辞例单调，词汇量较小。青铜器因素缺乏多样性，缺乏创造性。

作为地域青铜文化，发展水平受到地域局限。西周晚期以来，南阳盆地到随枣走廊一带政治与经济地位提升，青铜文化得到发展，并达到较高的水准。但曾国青铜文化并未表现出与它的九鼎或大国身份相匹配的发展水平，与中心文化或近畿地区诸侯国如虢、郑、晋等的青铜文化水平相比，曾国仍然存在一定差距。曾国青铜器如苏家垅这样的铜器群，较虢国墓地 M2001 铜器群组合结构仍显简单。体现较高文化层次的纹饰、铭文制作水平有限，曾国青铜器纹饰设计多作简单地抄袭与重复，铭文制作出现较多的不规范或缺陷。

曾国青铜器这样的一些特征，同时也是当时其他地方青铜文化特征的一个缩影。无论是关系密迩于王室的虢国，还是边远于东部的鲁国，其青铜器或多或少地具有上述特性。

（二）诸侯国青铜文化的个性与独立性

曾国青铜器的个性特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上述曾国青铜器作为诸侯国青铜文化的一般特性中包含着多种个性因素。由于曾国青铜器器类、器形或纹饰的单一性，就会形成既区别于周式青铜器多样的变化，其单一地侧重于某一因素，又会形成不同于其他诸侯国青铜器的特点。例如，曾国青铜簋常常简单地装饰瓦纹，因此常见全瓦纹簋即成为曾国青铜器的一个特点。曾仲斿父方壶拷贝圆壶纹饰组合方式，形成方壶的装饰特色。又如曾国青铜器铭文特别流行少数几种辞例，因此像某人“用（择）其吉金自作”某器这样的熟语，就成为曾国青铜器铭文的一个特色。一些青铜器制作瑕疵也是曾国青铜器个性之一，例如曾国青铜器较多见纹饰分组与陶范分范不协调的情况，铭文常见反书与右行等情况，都属于此类。

曾国青铜器也并非是完全照搬周式青铜器的造型与技术，而是有所变化与发展。例如曾国青铜器器形上形成比较有个性的附耳宽体窃曲纹鼎、折肩扁腹重环纹鬲。值得注意的是，曾国青铜器这些独立因素主要是通过对周式青铜器因素进行重组来完成，并且主要是体现在器形的发展方面，反映出曾国青铜器追求变化的趋向。但是在对于设计和文化水准要求较高的装饰、文字，曾国青铜器则鲜见有独立发展的因素。与上述方面不同，曾国青铜器工艺技术表现出更强的活力，虽然新的技术环节不多，但对新的技术使用频率特别是分铸技术的使用，自第 1 期开始就远较传统周式青铜器为多，其背景是作为地方青铜文化要求简单的技术取向。

曾国青铜器上述个性与独立性都是在周式风格体系下体现出来的，也就是说，这些

个性或独立性的构成，基本上都是周文化因素。曾国青铜器这种情形在当时诸侯国青铜器中有相当的代表性，因此，我们观察两周之际前后青铜器，应当在当时所谓一致性极强的时空特征之下，注意到那些区域性因素的存在。

（三）独立生产青铜器的能力

由于曾国没有与铸造甚至是冶炼相关的遗迹或遗物发现，曾国是否具有自铸青铜器的能力，只能从曾国青铜器本身来寻找线索。

由于可供与曾国青铜器铸造工艺研究的对比材料不多，我们对曾国青铜器工艺技术的个性方面情况还了解不够。从两周之际前后周文化系统青铜器图像材料如周原青铜器、虢国与晋国青铜器来看，似乎当时主流技术一致性较强。曾国青铜器与周原青铜器相比，更多地采用了简化技术难度的工艺，与虢国青铜器相比也存在一些技术细节上的差异，比如曾国青铜鼎浇口多在腹底而非足端等，但曾国青铜器显然并不存在一个独立的技术体系或者是某一工艺环节的技术个性特征。这些差异无疑说明了曾国青铜器的独立生产，但理由似乎仍然不够充分。

不过，曾国青铜器形制等外在特征还提供有丰富的、说明其为曾国铸造而非王室或其他某地生产的依据。这些依据中以曾国青铜器铭文最为明确。

曾国青铜器铭文制作常常出现的不规范以及偶尔的失误现象，说明这些青铜器的制作并非是由规范的王室作坊完成，而是铸造工艺尚存缺陷的地方作坊的产品。另一方面，曾国青铜器铭文辞例特征，如常用某人“用（择）其吉金，自作”某器的辞例，或者“永宝用”或“永用”后常常加“之”的辞例习惯，形成近似如方言的特征。这一语言特征说明了制作者存在一个地域范围，这一范围接近曾国，而不可能为中原或周王室。

曾国青铜器形制也表现出这些青铜器为曾国本地生产的特性。例如附耳宽体鼎、折肩扁腹鬲在不同时期形制的一致性，装饰中对一些组合形式的特别偏好，暗示曾国青铜文化已经形成一些具有个性因素的风格特征。这说明，曾国青铜器的器形、纹饰是由曾国控制的作坊设计完成。曾国青铜器如果由其他地区生产，不可能形成这样一些带有曾国特色或传统的因素。

本阶段第一期青铜器中，出现如直条纹罍、方卣等与周式青铜器风格不类的器形与纹饰，不管这些青铜器是否为曾国铸造，但它们不是周王室体系下的作坊产品，则似乎是无疑的。

我们或许可以以曾仲斿父方壶这种“重量级”青铜器为典型，说明曾国青铜器的独立铸造的存在。该方壶器形大体与周式方壶相同而略有变化：其冠部造型更为夸张。方壶纹饰是复制当时在曾国圆壶上广泛流行的组合形式，它既体现的是曾国的视觉品位，也显示曾国青铜器在装饰上简单的处理方式。方壶铭文构图和文字制作都略有缺

陷，暗示出曾国在高层次文化上的欠缺。两件方壶都存在裂缝和补铸，说明曾国青铜铸造作坊在处理大型铸件上的能力不足。这些特征的指向，都是曾国青铜作坊完成曾仲斿父方壶的明确表达。

曾国存在自铸青铜器的能力，但不意味着曾国能够形成自身的铸造技术系统，曾国青铜器的技术来源，仍然是周文化青铜铸造体系。

第四章　楚文化体系之下的曾国青铜器

第二阶段的曾国青铜器包括自春秋中期至战国中期这一时段，时间上大体与中国青铜时代的新兴时期重合。这一时期正是处于社会急遽变革和文化快速发展的阶段。

西周灭亡后，迁至王城的周王室迅速失去了对各个诸侯国的政治控制能力，诸侯国各自相对独立地发展，在政治上实际形成了分裂之势。这样的分化逐步形成一些其后如“五霸”、“七雄”等实力较为强劲的国家。

东周时期诸侯国文化的发展，经历了与当时政治格局颇为近似的变化。如上一章所示，由于西周的倾覆，失去中心文化这一可以仿效的典范，春秋早期诸侯国青铜文化较多地延续了西周晚期周文化特征，新的文化因素形成和发展缓慢。但在没有中央控制的“宽松的环境”① 之下，诸侯国青铜文化终于在春秋中期挣脱了周文化传统的桎梏，开创出新的风格特征。春秋中期即便是在东周文化中心区域，从郑公大墓青铜器中②，这种新的风格已经表露无遗③：盖鼎、盏、鉴、铷等新器形的出现，传统器类如鼎、簠、方壶形制有了大的变化，纹饰中以蟠螭纹或蟠虺纹为主体，铸造技术上广泛使用分铸法。如果考虑对其后青铜器的影响，我们可以从这样一些方面来标志春秋中期的新风格：盖鼎的出现、与模印技术相关的蟠螭纹或蟠虺纹为主体纹饰、分铸工艺的广泛应用。

由于春秋中期铸造技术的发展，青铜器在春秋晚期达到了中国青铜时代的第二个高峰。在中原地区，侯马铸铜作坊遗址、太原赵卿墓和浑源青铜器可以作为这一高峰的表现。从曾侯乙墓出土青铜器来看，青铜铸造的高峰一直延续到战国早期。也许自战国早期开始，社会生产处于一个大的全面发展时期，其结果是标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大型城垣建设、墓穴等大型化趋势。此时的青铜器及青铜器生产，其处于社会生产核心的地位

---

① 朱凤瀚：《古代中国青铜器》第 859 页，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 年。

② 河南博物院等：《新郑郑公大墓青铜器》，大象出版社，2001 年。

③ 不过年代略早的新郑金城路郑国祭祀坑青铜器，却仍然是以周文化传统为主体。这可能与这些青铜器以祭祀为中心功能的性质有关。参见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郑郑国祭祀遗址》，大象出版社，2006 年。

开始受到影响，至战国中期，铁器的广泛使用意味着中国青铜时代的结束①。

春秋中期青铜文化的另一个显著变化是区域特征的形成②。当时“围绕着几个诸侯大国的地缘集团，……存在着晋、秦、楚、齐、燕几个亚文化”③。其实，晋、秦、楚这些诸侯国在第一阶段同曾国一样，都是处于周文化体系之下、文化面貌上并未形成突出的区域特征。经过春秋早期的发展，这些“原先的第二层次的文化，至春秋中期以后，特别是到了战国时期，实际已具有第一层次的性质”④。晋、秦、楚等大国为代表的区域文化，同化了相关的不同国族性质的小国青铜文化，并使这些小国一同保持着相似的发展轨迹。也就是说，这些势力较小的诸侯国仍然保持着它们次一级文化的地位，只是其上一层次文化由周文化转变为晋、楚等文化。

楚国所代表的地域文化特征的形成，一般以淅川下寺楚墓青铜器⑤为标点展开讨论。下寺楚墓作为楚国高级贵族墓葬的性质和年代均较清楚，因此学术界将下寺青铜器的起始年代即春秋中期偏晚作为楚文化特征的形成时间⑥。当然这实际上是基于目前所见材料的认识。其实从春秋时期青铜器发展的逻辑顺序上看，我们认为楚国灭黄之年（前648年）可作为楚文化形成时间的标志点⑦。此后的春秋中晚期，楚文化的一统之势迅速扩展到江汉地区：在东部的湖北麻城李家湾发现的春秋晚期铜器群，文化面貌与下寺M10几乎完全相同⑧。南部的湖南岳阳春秋晚期墓葬出土鼎、簠、盏、盉、盘、匜等青铜器，也基本为楚文化特征⑨。至战国早中期，楚系青铜器已在长江和淮河流域的大部分地区都有分布。

在楚文化体系之下，包含着一些不同国族性质的政治实体。除了性质和青铜器都较明确的曾国、蔡国之外，其中还包括一些过去常常被认为是楚封君一类的政权。例如，谷城过山出土有春秋晚期的蠡儿缶（《近出》983）、襄王孙盏⑩，郧县肖家河出土有春

① 孙华：《中国青铜文化体系的几个问题》，《考古学研究（五）》，科学出版社，2002年。

② 李学勤：《新出青铜器研究·导论》，文物出版社，1990年。

③ 孙华：《中国青铜文化体系的几个问题》，《考古学研究（五）》，科学出版社，2002年。

④ 俞伟超：《考古学中的汉文化问题》，《古史的考古学探索》，文物出版社，2002年。

⑤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淅川下寺春秋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

⑥ 赵世纲：《楚文化的形成时间》，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淅川下寺春秋楚墓》第338页，文物出版社，1991年。

⑦ 这一看法理由有二：春秋早期偏晚阶段豫南鄂北地区青铜文化已经萌显出其后的楚文化特性；楚灭黄，也标志着该地区面貌异常于楚的青铜文化消失。

⑧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麻城市李家湾春秋楚墓》，《考古》2000年第5期。

⑨ 岳阳市文物工作队：《湖南省岳阳县凤形嘴山一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93年第1期。

⑩ 熊北生、李广安：《湖北谷城过山出土春秋有铭铜盏》，《文物》2002年第1期。

秋晚期的“申王”[①] 以及“唐（?）子”[②] 青铜器。这些青铜器特征与楚国青铜器大致相同，但青铜器铭文暗示，这些国家的政体未必已经为楚国所灭。又如，春秋中期之后，邓公乘鼎（《集成》2573）、邓子午鼎（《集成》2235）等多件邓器的出现，即可能说明公元前678年楚灭邓之后，复存其社稷[③]。楚国在春秋时期的扩张过程中，“对那些沦为附庸的小国，也曾暂时或者长时期的存而不灭”[④]。这些国家政治上附庸于楚，从出土材料情况看，在文化面貌上也与楚文化极为近似。

曾国和上述这些国家一样，在文化面貌上与楚国一致，并由此构成包括楚系青铜器在内的楚文化。正如李学勤所言：“到春秋中期以后，（汉淮间——引者注）青铜器的造型、工艺以及铭文字体，都显示出一定特点，逐渐形成以楚为中心的新的传统。这时，即使是姬姓的曾（随）国、蔡国，也不能不归入这一文化传统的范围。我们研究‘楚文化’，必须注意青铜器所体现的这一历史过程。”[⑤]

如上所述的是楚文化或楚系青铜器形成的概要情形，这也是学术界倾注足够注意力的方面。但是，如果从小国例如曾国的视角出发，经过第一阶段的发展，曾国青铜文化是如何融入楚文化这一体系以及在楚文化体系的形成中是如何发挥作用？这应当从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曾国青铜器延续的过程进行考察。同时，楚文化体系之下的曾国青铜文化所扮演的角色如何？也是以下需要探讨的。

第一节　器类与器形

除了曾侯乙墓和擂鼓墩M2，第二阶段其他曾国青铜器器群等级不高，青铜器器类与器形都较为单调。但是，如果从楚文化体系的视角考察曾国青铜器，曾国与楚国青铜器的趋同过程中，器类和器形是曾国青铜器在楚系铜器之下体现其共性和个性特征最为鲜明的方面之一。

一　曾国青铜器与楚式青铜器的趋同

我们将春秋早中期之间视为曾国青铜器性质变化的分界，并将春秋中期纳入楚文化

① 郧阳地区博物馆：《湖北郧县肖家河春秋楚墓》，《考古》1998年第4期。
② 郧县博物馆：《湖北肖家河发现春秋唐国青铜器》，《江汉考古》2003年第1期。
③ 徐少华：《论近年出土的几件春秋有铭邓器》，《古文字研究》第25辑，中华书局，2004年。
④ 何浩：《楚灭国方略述评》，《楚灭国研究》第95页，武汉出版社，1989年。
⑤ 李学勤：《论汉淮间的春秋青铜器》，《文物》1980年第1期。

体系的起始时间①，高崇文在更早时间已有类似的认识②。不过，更多的学者则认为曾国青铜器楚式化的时间要晚一些。陈振裕、杨宝成、朱凤瀚、李学勤等均认为曾国青铜器在春秋中期仍然与中原文化属于同一体系，至春秋晚期才实现与楚文化的交融③，罗泰也认为春秋晚期楚文化才一统长江中游地区的文化④。舒之梅等更以为“进入战国以后，曾国文化确已纳入了楚文化的范围”⑤。因此，曾国青铜器何时纳入楚文化系统，需要加以明确。

曾国青铜器何时纳入楚文化体系，首先应该观察曾国青铜文化传统何时发生大的质变。如前一章所述，两周之际前后曾国青铜器表现为周文化性质，器类以鼎簋为核心。但是，以周家岗铜器群为标点，此后的曾国青铜器不再可见曾国特色的宽体附耳鼎等器类，青铜器装饰从纹样结构到制作手段都有改变，铸造工艺也发生了较大变化。

曾国青铜器在性质上何时归入楚系青铜器，这一问题还应当放在如前所述的春秋中期青铜器发展大势中考察。在春秋中期，大国地缘集团已经成形，而此时曾国青铜文化则并未因为脱离周文化体系而形成独立的文化单元。这样，曾国青铜器要么属于某一新的文化，要么处于一种过渡文化状态。从地理位置上看，曾国在地缘文化上处于西南的楚文化和北部以郑国为代表的东周中心区域文化之间，无论是在空间距离还是文化差异方面，曾郑之间比曾楚之间有更大的差别。例如在郑地，无盖的附耳或立耳鼎仍然占鼎类器的主体，新兴的器类中铷和鑐都较为多见⑥，这些器类恰恰罕见于同时期的曾，也罕见于楚地。因此从情势而言，春秋中期的曾国青铜器只能归属于楚文化。

最后也是最为主要的一点是，春秋中期曾国青铜器主要特征与同期楚系青铜器相同。在曾国青铜器分期一章分析春秋中期及其后曾国青铜器年代时，我们已经列举有多个类似例证。这里再作申述如下。

第二阶段第一期八角楼墓葬出土鼎、盏两件青铜器，两器已经全无第一阶段曾国青

---

① 张昌平：《曾国铜器的分期及其相关问题》，《江汉考古》1992 年第 3 期。

② 高崇文：《东周楚式鼎形态分析》，《江汉考古》1983 年第 1 期。

③ 陈振裕等：《试论曾国与曾楚关系》，《考古与文物》1985 年第 6 期。杨宝成：《试论曾国铜器的分期》，《中原文物》1991 年第 4 期。朱凤瀚：《古代中国青铜器》第 894 页，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 年。李学勤：《楚青铜器与楚文化》，《缀古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

④ Lothar von Falkenhausen, The Waning of the Bronze Age, p513.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 Edward L. Shaughnessy and Michael Loewe, editor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⑤ 舒之梅、刘彬徽：《从近年出土曾器看楚文化对曾的影响》，《楚史研究专辑》第一期，武汉师范学院学报 1982 年。又见《楚史论丛》，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 年。刘彬徽：《曾侯乙墓青铜礼器初步研究》，《湖北省考古学会论文选集》1988 年第 1 期。两文均收录于刘彬徽：《早期文明与楚文化研究》，岳麓书社，2001 年。此外，在杨宝成的另外一篇论文中，他又认为楚文化对曾国的影响是在战国早期，见杨宝成：《试论随枣地区的两周铜器》，《中国考古学会第七次年会论文集·1989》，文物出版社，1992 年。

⑥ 参见河南博物院等：《新郑郑公大墓青铜器》，大象出版社，2001 年。

铜器传统，而无论器形或纹饰都与楚国或楚系同类青铜器相同（图4.1－1）。这说明至春秋中期偏晚阶段，曾国青铜器已经明确属于楚系青铜器无疑。类似八角楼墓葬鼎、盏的青铜器，除了在下寺楚墓可见相同器类之外，在当阳赵家湖楚墓中的金家山M9和赵家塝M8①、公安石子滩②均可见。甚至八角楼墓葬鼎盖与腹部带圆纽的细部特征，在赵家塝M8、公安石子滩鼎上也完全相同，这说明当时楚系青铜器文化的特征在较大的地域范围内具有相当的一致性。这一时期形成的楚文化强势的影响，对曾国青铜器也形成了较强的作用力。

属于第一期的春秋中期曾国青铜器的材料不多，不过这一时期出土鼎的数量相对较多，它们的形制也可充分说明它们与楚系青铜器的关联。在第二阶段曾国青铜器的几件鼎中，除了上述八角楼墓葬鼎之外，见于季氏梁和刘家崖采集的平盖鼎，器形特征与下寺M7同类鼎完全相同（图4.1－2）。春秋中期平盖鼎多见于山东地区和早期楚系青铜器中③，但曾国平盖鼎饰蟠虺纹和三角纹的特征，则具有楚系青铜器的特征。80刘家崖平底束腰鼎在第一期显得形制独特，但其恰恰与楚式的升鼎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这也可以反映与楚式因素的一个方面。这一点我们在后面有专门的讨论。

在第一期曾国青铜器中，只有罗山高庙铜器如鼎、圆壶、盘保留有春秋早期青铜器传统特征，在《材料出土背景分析》一节中已经说明，曾关臣器组出土在罗山，可能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该组青铜器不能完全反映同时曾国青铜器特征。

虽然曾国青铜器已经在第二阶段开始楚式化，并由此造成曾国青铜器在春秋中期前后两个阶段之间的明显区别，但曾国青铜器在第一和第二阶段之间仍然有一些因素存在明显的承接关系。例如，在上章《器类与器形》一节中我们已经指出，80刘家崖圆壶从形制到莲瓣状冠的作风，是第一阶段曾国圆壶的延续，这从两周之际的郭家庙M17圆壶、春秋早期周家岗圆壶可以明确这一发展脉络。

这样看来，曾国青铜器由春秋中期开始的楚式化可能经历了一个过程。在春秋晚期及以后，楚文化特性的表现更为浓烈，因此在第三期青铜器中，曾国青铜器形制上的个性特征只是残存在极为局部上的了，这一点我们将在其后阐述曾国青铜器个性特征中可以看到。总体而言，曾国青铜器在第二阶段的不同时期一直都存在一些非楚式的因素，这说明，曾国青铜器与楚国青铜器是一种趋同但又非等同。但是，自春秋中期开始曾国青铜器纳入楚文化系统，则是没有问题的。过去学者们之所以将这一时间放在春秋晚期

① 湖北宜昌地区博物馆等：《当阳赵家湖楚墓》，文物出版社，1992年。

② 荆州地区博物馆：《湖北公安石子滩春秋遗址及墓葬》，《文物》1993年3月。

③ 高成林：《长沙市博物馆所藏一件深腹矮足鼎浅析》，《青年考古学家》（北京大学文物爱好者学会编辑）第16期，2004年。

1

2

3

4

图 4.1－1　春秋中期曾国青铜器与楚系青铜器比较

1. 八角楼墓葬鼎　2. 八角楼墓葬盏　3. 下寺 M4：1 鼎（《淅川下寺春秋楚墓》图版 90）　4. 当阳金家山 M9：11 盏（《全集》10－29）

或战国早期，可能主要是基于曾侯乙墓青铜器作出的判断。其实曾侯乙墓青铜器从编钟到容器，都仍然可见一些不同于楚系青铜器的特征，这一点学者已有论述①。

① 郭德维：《曾侯乙墓并非楚墓》，《江汉论坛》1980 年第 1 期。

1

2

图 4.1－2　春秋中期曾国与楚国平盖鼎比较

1. 八角楼墓葬采集鼎　2. 下寺 M7:6 鼎（《全集》10－4）

二　由曾国青铜器看楚式鼎的形成

鼎是楚系青铜器中最为重要、最有代表性的器类。关于楚式鼎①，从形制、类别、性质到制度都多有学者讨论，其中对楚式鼎的形制和类别研究，高崇文按楚鼎的形制变化将楚式鼎分为四类②，李零则分有五类，意在“兼顾形态、鼎实和自名三者的复杂关系”③。由于楚式鼎历经春秋中期到战国晚期较长的历史时期，在形制、功能、自名等方面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因此寻找出一个公式性质的分类实际上是困难的。如就形制而言，楚式鼎大体可分为盖鼎、平底束腰的升鼎、无盖而形体较大的镬鼎三类④，其中镬鼎与升鼎只出现在高级贵族的青铜器组合之中⑤。

从形制的角度而言，在春秋中期成形的这些楚式鼎与春秋早期及以前流行的鼎大相径庭，给人以质变之感。但从文化发展过程来看，楚式鼎无疑都与周文化青铜鼎有一定

① 这里不包括楚鼎中属于水器的小口鼎和具有越文化特征的“越式鼎”。

② 高崇文：《东周楚式鼎形态分析》，《江汉考古》1983 年第 1 期。

③ 李零：《楚鼎图说》，《文物天地》1995 年第 6 期。

④ 李零亦有类似认识，而与他的《楚鼎图说》之论不同，参见李零：《再论淅川下寺楚墓》，《文物》1996 年第 1 期。

⑤ 楚式镬鼎出现时间可能较晚，往往有炊炙痕迹，它可能与历史文献中的镬鼎相关。但镬鼎、升鼎等分类方式是否与历史文献记载的礼制相符，却是大有疑问。相关讨论参见林沄：《周代用鼎制度商榷》，《林沄学术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 年。

的渊源关系。春秋早期前后的楚国青铜器材料匮乏，从楚国青铜器探索楚式鼎的形成过程最多只是片断性线索。但春秋早、中期的曾国青铜器则都有一定数量，从曾国青铜器的视角探讨楚式鼎的形成，对于理解楚文化形成的机制，当有一定帮助。以下以楚式鼎中最重要的盖鼎和升鼎两类器为例，讨论楚式鼎的形成，并由此观察曾国青铜文化在楚式鼎形成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

1. 盖鼎

鼎盖在殷墟时期青铜鼎中即已出现（《全集》2－14），并在西周时期鼎特别是方鼎中有一定数量。但盖鼎成为一种压倒性的时代风格，却是始自春秋中期。无论是从形制的变化方面还是从工艺技术的变革方面考量，春秋中期开始流行的盖鼎无疑是中国青铜时代鼎形制发展的最大变革。同其他列国一样，楚国的盖鼎也在鼎的数量中居绝对的多数，且多成组出现。不过楚式盖鼎的形制有别于中原青铜文化，而形成自身独立的发展系列。但关于早期楚式盖鼎的渊源，目前尚不明晰。

图4.1－3　山东地区的平盖鼎
（临淄高阳乡鼎《全集》9－4）

春秋中期盖鼎最早的源头大约来自山东地区。春秋早期在山东中部、西南部的齐、滕、杞等国出现较多的平盖鼎，例如山东新泰出土杞伯每亡鼎①。因此刘彬徽认为豫南鄂北地区盖鼎可能接受了来自山东地区的影响②。不过，山东地区的这些平盖鼎，器体多作附耳浅腹（图4.1－3），器体的形制与春秋早期的无盖附耳鼎完全相同，也就是说，山东地区的平盖鼎是传统西周周式鼎加上平盖发展的结果。

豫南鄂北地区的平盖鼎多属于春秋中期，它们已经表现出楚文化青铜器的特性，如下寺M7：6鼎、谷城下辛店鼎③、南阳西关八一路M1鼎④，以及季氏梁墓葬出土和八角楼采集的两件曾国平盖鼎。这些鼎形制完全相同，均作敛口深腹，显示出相同的文化风格。同时，上述鼎盖均带三个扁纽和一个环纽，盖的形状与山东地区鼎盖相同，这由八角楼采

① 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图录27，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
② 刘彬徽：《山东地区东周青铜器研究》，《中国考古学会第九次年会论文集·1993》，文物出版社，1997年。
③ 襄樊市博物馆、谷城县文化馆：《襄樊市、谷城县馆藏青铜器》，《文物》1986年第4期。相同报道又见于襄樊市博物馆：《湖北谷城、枣阳出土周代青铜器》，《考古》1987年第5期。
④ 南阳市文物工作队：《南阳市西关三座春秋楚墓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92年第2期。

AⅠ：80 刘家崖盅鼎，两件形制相同，大小接近，较大的一件口径 27 厘米。腹部纹饰分上下两周，上腹饰环带纹，下腹饰垂鳞纹（图 4.1－8，1）。

AⅡ：和尚岭 M1 克黄鼎，两件大小相同，口径 38 厘米。耳侧立于口内，束腰与足相对处设附饰。纹饰仍然为两周，只是上腹纹饰为蟠螭纹（图 4.1－8，2）。

AⅢ：75 刘家崖连迂升鼎，三件大小相次。最大的一件口径 21.5 厘米。器形、纹饰特征接近于克黄鼎，但腹部无附饰，足上部不带扉棱（图 4.1－8，3）。

AⅣ：徐家岭 M9 佻子受升鼎，两件形制、大小相似，另外同出一件无铭升鼎，形制、大小亦近似。最大的一件口径 31.6 厘米。形制接近上述二式，纹饰也是蟠螭纹和垂鳞纹的组合形式（图 4.1－8，4）。佻子受升鼎一件带附饰与扉棱，一件则无。

AⅤ：徐家岭 M3 升鼎，四件形制相同，大小相次。最大的一件口径 38.5 厘米。腹部只饰一周蟠螭纹，不带附饰和扉棱。工艺较为粗糙（图 4.1－8，5）。

AⅥ：徐家岭 M10 升鼎，五件形制基本相同，大小相次。最大的一件口径 39.1 厘米。腹部主体纹饰为一周蟠螭纹，腹部带附饰，足无扉棱（图 4.1－8，6）。

上述 A 型升鼎自春秋中期发展到战国中期偏早，器形上耳趋于外撇，鼎腹部变浅，纹饰和装饰风格趋于简化。

B 型　上下腹部之间、腹部与底部之间作直折过渡，器体厚重。

BⅠ：下寺 M1、M2 王子午升鼎，M1 出土 2 件、M2 出土 7 件，形制应当相同，大小略异。较大的一件口径为 66 厘米。纹饰繁缛，耳、口、足均有纹饰。腹部主体纹饰以绹纹为界，上下各为蟠螭纹和垂鳞纹（《全集》10－3）（图 4.1－9，1）。

BⅡ：寿县蔡侯墓蔡侯申升鼎，七件形制相同，大小相次。较大的一件口径为 43.2 厘米。腹部饰蟠虺纹（《全集》7－62）（图 4.1－9，2）。

BⅢ：曾侯乙墓曾侯乙升鼎，九件形制、大小相同，口径 46 厘米。腹部纹饰为镶嵌龙纹（《全集》10－109）（图 4.1－9，3）。

BⅣ：擂鼓墩 M2 升鼎，九件形制接近，大小不一。最大的一件口径 35 厘米。饰蟠虺纹（图 4.1－9，4）。

BⅤ：天星观 M2 升鼎，五件形制接近，大小相次。最大的一件口径 51.6 厘米。器表主要饰蟠虺纹①。包山 M2 升鼎，两件形制可能相同，大小相同。口径 39 厘米。铸造粗糙，饰蟠虺纹②（图 4.1－9，5）。

BⅥ：寿县朱家集铸客升鼎，九件形制接近，口径 49.5 厘米（图 4.1－9，6）。饰蟠虺纹（《全集》10－10）。

---

① 湖北省荆州博物馆：《荆州天星观二号楚墓》图版 6－7，文物出版社，2003 年。

② 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墓》彩版 5－1，文物出版社，1991 年。

1

2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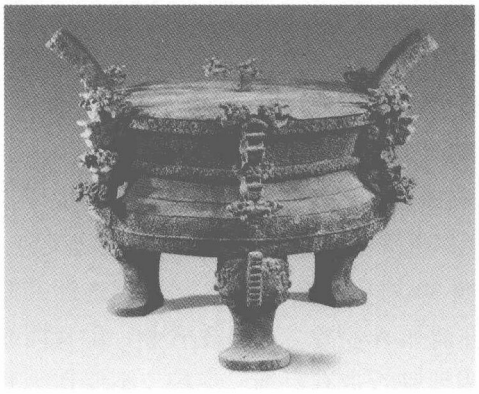
4

5

6

图 4.1－8　A 型升鼎的演变

1. 盅升鼎　2. 克黄升鼎（《全集》10－1）　3. 连迂升鼎　4. 伽子受升鼎　5. 徐家岭 M3：34 升鼎　6. 徐家岭 M10：45 升鼎（4－6 分别为《淅川和尚岭与徐家岭楚墓》图版 40、31、63）



1

2

3

4

5

6

图 4.1－9　B 型升鼎的演变

1. 王子午升鼎（《全集》10－3）　2. 蔡侯申升鼎（《全集》7－62）　3. 曾侯乙升鼎（《全集》10－109）
4. 擂鼓墩 M2 升鼎　5. 包山 M2：137 升鼎（《包山楚墓》）　6. 朱家集铸客升鼎（《全集》10－10）

上述B型升鼎多是个体较大，器形厚重华丽，过去较为多见，且不少出土于王、侯一级的墓葬之中。此类鼎一般腹部带有附饰，但擂鼓墩M2鼎不见，足上部的扉棱多见于早期，战国中期及其后基本消失。鼎总的演变趋势是鼎耳趋于外撇，腹部趋于浅宽。

A、B型升鼎两个系列的存在，可加深对楚式升鼎的理解：

1）A、B两型升鼎的存在，说明楚式升鼎有简化、繁复等不同类别，并形成了不同的发展系列。因此，国君一级的铜器群，均使用厚重华丽的B型升鼎，以彰显其级别。

2）A型升鼎延绵至战国中期，进一步证明80刘家崖盅鼎、75刘家崖连迂升鼎这种无附饰的简化形鼎也确为升鼎。晚期若干升鼎如A型徐家岭M3升鼎、B型擂鼓墩M2升鼎均无附饰，多件鼎足部亦不带扉棱。因此是否带有附饰、扉棱，不能作为判定是否为升鼎的标准。

3）早晚不同时期升鼎形制变化不大，早期升鼎的不少特殊的因素仍为晚期升鼎所继承。由升鼎的渊源可知，升鼎中所谓附饰、足部扉棱，实际上是周家岗鼎腹部扉棱和足扉棱的延续，由此可知这种装饰的源头实际上是来自西周中晚期周式鼎上腹和足上部的扉棱，因此楚式升鼎的此类装饰都只是周式鼎的遗型。鼎下腹垂鳞纹作风在A型升鼎中有较多保留，这一因素至战国时期已不多见，但天星观M2：128升鼎中仍然保持这一传统。楚系升鼎虽然与其他文化系统鼎类器特征差异颇大而具有楚文化标志，但它其实仍然是周式鼎的延续并保持较多的传统因素。

4）B型升鼎器形厚重，是西周晚期周式垂腹鼎至周家岗鼎厚重风格的延续。早期的升鼎如80刘家崖升鼎、克黄升鼎都是大小相同的一对，这是第一阶段低级别贵族用鼎方式的延续。楚式升鼎与周文化鼎的渊源关系暗示，升鼎从功能上可能在较早时期就已经独立于其他类型的鼎。这是我们研究周代用鼎制度应当注意的一点。

以上以盖鼎、升鼎为例说明了曾国青铜器在楚式青铜器一些特征形成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这里并不是强调曾国青铜文化影响到楚国或者是楚系青铜文化，而是展示曾国以楚文化之下亚文化的地位，仍然在楚青铜文化形成过程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三 所谓“复古”——楚系青铜器中的周式传统

楚式升鼎足上部带扉棱、下腹饰垂鳞纹的风格，令人直接联想到西周晚期青铜器时代特征。因此，罗泰认为淅川下寺青铜器如升鼎、敛口簋、背带纹方壶包含有西周晚期或春秋早期特点，是一种复古（Archaism）的体现①。其实，罗泰所谓这种复古现象，并不只是在下寺青铜器中存在，在楚系其他国家青铜器如蔡器、曾器中也有相同情形。

① Lothar von Falkenhausen, The Bronzes from Xiasi and Their Owners.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考古学研究（五）·庆祝邹衡先生七十五寿辰暨从事考古研究五十年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3年。

但是，所谓复古是否是春秋晚期或更晚时期对两周之际前后青铜器风格的模仿？

从前面对楚式升鼎发展系列的讨论中可知，春秋晚期之后楚式升鼎腹部附饰、足上部扉棱实际上是对西周时期鼎带扉棱作风的继承，升鼎下腹垂鳞纹也是从西周垂鳞纹发展而来。但是，扉棱、垂鳞纹这些因素在升鼎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都有所体现，也就是说，它们是从西周晚期至战国中期一步步得到延续传承，而并非是在春秋晚期或战国时期直接对西周晚期鼎的“复古”。

方壶是战国时期楚文化保留早期作风较多的器类，在曾国不同时期的青铜方壶中，早期的形制特征同样也多被保留。我们可举如下以曾国为主的楚系青铜器为例，看看方壶在如下不同的几个阶段中对周式青铜器风格的承袭：

Ⅰ：西周中晚期的郭家庙 M1 幻伯隹方壶（图 4.1－10，1），此方壶并非为曾国所作，但可反映这一时期方壶的基本特征。方壶开始流行于西周中晚期的周文化中心区域，口部横截面为椭方形，长颈而鼓腹，器形特征和视觉效果突出，仅仅出现在高级别的铜器群之中。西周中晚期方壶纹饰常见幻伯隹方壶这种背带纹，如 1960 扶风齐家村窖藏出土的方壶（《周原》1－57、60）。另外方壶还流行装饰环带纹和龙纹，其例如颂壶（《全集》5－151）。

Ⅱ：春秋早期宜城楚皇城出土方壶①（图 4.1－10，2）。方壶颈部饰环带纹，腹部饰背带纹夹龙纹。背带纹夹龙纹的装饰风格也是西周晚期中原地区青铜器流行样式，《断代研究》就列有梁其壶、晋侯邦父壶等类似装饰的方壶 4 件。

Ⅲ：春秋中晚期之际的郑公大墓方壶（《集成》7－23）（图 4.1－10，3）。这一时期郑国青铜器有与楚国青铜器近似的特征②，与郑公方壶形制几乎相同的还有年代略晚的下寺 M1 出土方壶、75 刘家崖方壶（图 4.1－10，4）。此类方壶仍然继承了此前环带纹和背带纹的风格，但突出了春秋中晚期流行的附饰，特别是双耳作爬兽状，为其后的壶类器所广泛沿用。此外，壶盖演变成为只有装饰作用的冠部，其实也是西周晚期一些方壶突出盖部装饰做法的延续，曾仲斿父方壶就已是使用出莲瓣形的冠而非盖。

Ⅳ：战国早期的曾侯乙墓联禁圆壶（图 4.1－10，5）。此例并非方壶，但这对圆壶的装饰风格无疑是仿照同时期方壶的。稍早的寿县蔡侯墓方壶（《全集》7－74）仍然如上一阶段方壶形制特征而几乎少有变化。

Ⅴ：战国中期的擂鼓墩 M2 方壶（图 4.1－10，6）。延续了稍早的爬兽、冠等装饰，方壶最突出的背带纹也仍然沿用。在稍晚时期的楚系青铜器中，曾姬无卹方壶甚至保留有颈部环带纹的作风，九连墩 M1 出土的方壶③腹部形制特征还依然近似于郭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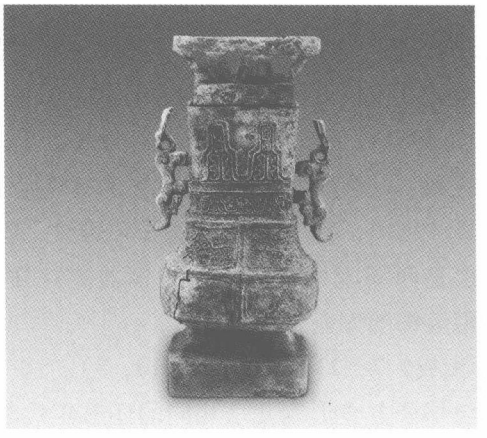
① 楚皇城考古发掘队：《湖北宜城楚皇城勘察简报》，《考古》1980 年第 2 期。

② 夏志峰：《新郑器群三考》，河南博物院等《新郑郑公大墓青铜器》第 44 页，大象出版社，2001 年。

③ 湖北省博物馆：《湖北出土文物精粹》图 82，文物出版社，2006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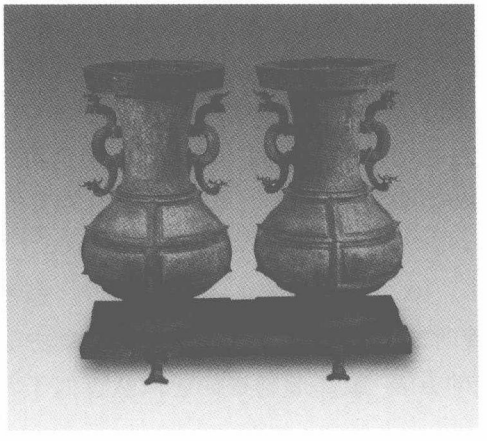
1

2



3

4



5

6

图 4.1－10　方壶的“复古”风格

1. 郭家庙 M1 方壶　2. 宜城楚皇城方壶　3. 郑公大墓方壶（《郑公大墓青铜器》第 111 页）　4. 75 刘家崖方壶　5. 曾侯乙墓联禁圆壶（《全集》10－126）　6. 擂鼓墩 M2 方壶

庙 M1 方壶。

由上可见，所谓“复古”其实是西周晚期周文化类型的青铜器在东周时期的沿用和发展。升鼎、方壶等类器中的早期风格，与其说是复古，不如说是传统文化因素在各个不同时期的延续。这种延续，主要又是西周中期以来形成的器用制度仍然在不同程度地发挥作用。理解到这一点，还可以进一步推知：其一，方壶在东周时期的流变，可以明确不只是“从春秋早期到战国中期一直在楚文化范围内传承”①，在其他对周文化传统有所继承的铜器群中，同样可能出现这类“复古”铜器。太原金胜村 M251 赵卿墓出土同样类型的方壶（《全集》8－71），即为其例。其二，带有“复古”意味的器类并非仅限于方壶、升鼎、敛口簋诸器，在楚系青铜器中，其他如带扉棱鬲、方座簋亦可归入“复古”器类。例如曾侯乙墓中带扉棱鬲、方座簋成组出现，其形制在西周中晚期青铜器中都可以找到近似的特征。而带扉棱鬲还在新郑祭祀坑②、属于战国早中期的徐家岭 M9、M10 等地点也有发现。

在春秋中期，社会、文化各类因素处于新兴时期，郭宝钧将东周时期青铜器中新出现的新兴因素称之为“新制”，而保持旧有传统的则为“旧制”③。在郑公大墓④、辉县甲乙墓⑤铜器群中，类似“新制”、“旧制”因素均有明确反映。其中的“旧制”，当然也在春秋中晚期以后继续有所保留，这些“旧制”青铜器，亦即所谓“复古”青铜器。

上述“复古”、“旧制”器类都只出现在高等级贵族使用的铜器组合之中。因此在曾国青铜器中，只有类似曾侯乙墓、擂鼓墩 M2 这些高等级墓葬出土有这类青铜器。从这个角度而言，75 刘家崖方壶与连迁升鼎级别相配，可能属于同一铜器群。从本文前述升鼎、方壶的发展与演变过程可知，这类青铜器在楚文化中也只是较少地见于那些高等级铜器群。郑公大墓、辉县甲乙墓铜器群中的“复古”或“旧制”作风，也不见于同时期较低级别铜器群。高等级贵族对于传统礼制和传统的保留较多，应当是周文化一个突出的特征⑥。

从广义上讲，楚青铜文化实际上也可视为周文化的一个类型。如上所述，楚系包括曾侯乙墓和擂鼓墩 M2 青铜器器类及器类特征保留有较多的周文化传统，相对于晋系地区如太原赵卿墓⑦青铜器，这一特点颇为突出。

---

① 夏志峰：《新郑器群三考》，河南博物院等《新郑郑公大墓青铜器》第 44 页，大象出版社，2001 年。

②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郑郑国祭祀遗址》，大象出版社，2006 年。

③ 郭宝均：《商周青铜器群综合研究》之《东周初年及春秋时期铜器群》，文物出版社，1981 年。

④ 河南博物院等：《新郑郑公大墓青铜器》，大象出版社，2001 年。

⑤ 河南博物院等：《辉县琉璃阁甲乙二墓》，大象出版社，2003 年。

⑥ 因此对于东周时期礼制的研究，应当充分注意到不同等级贵族对于礼制的遵循可能存在着不同。

⑦ 山西考古研究所等：《太原晋国赵卿墓》，文物出版社，1996 年。

四 曾国青铜器的器类与器形的个性特征

曾侯乙墓发现后，围绕该墓是否属于楚墓曾经有过一场讨论①。郭德维从葬制上论证曾侯乙墓不带墓道、未设台阶、墓室积炭、棺具悬底较小等方面特征与楚墓的差别，在随葬品方面，他认为曾侯乙墓不见楚墓常见的敦、镳壶、剑等铜器以及虎座鸟架鼓、镇墓兽等漆器，因此曾侯乙墓并非楚墓②。此后，赵世纲还从乐律的角度讨论了曾侯乙编钟与楚国编钟的差异③。

实际上，曾国青铜器与楚国青铜器相异的个性特征还不止是见于曾侯乙墓，而是在第二阶段的不同时期都有所表现。

春秋中晚期曾国青铜器器类与器形都与楚国青铜器有一定区别。春秋中期曾国青铜器处于趋同于楚文化的初始阶段，一些曾国青铜器的传统特征还有所保留，例如80刘家崖墓葬出土的一对环带纹圆壶，器口带冠，是对第一阶段具有曾国青铜器自身传统的延续。季氏梁墓葬出土的簠，器盖为陈公子庆所作，器形与纹饰特征为春秋早期器，器身当是据陈公子仲庆簠盖而配的，器圈足饰蟠螭纹，年代已大约晚至春秋中期。此簠整器特征与春秋中期簠仍然有较大差别而有较多春秋早期传统。

在材料比较丰富的春秋晚期偏晚阶段，在东风油库M1、M2出土方壶为椭方体，器表光素，造型简洁。这种风格的方壶与75刘家崖带爬兽的方壶不同，且为曾国以外地区少见，过去只在邻近的安陆伏水镇死土岗采集到相同特征方壶④（图4.1－11）。两件方壶均自铭“行盐”，与过去楚器中盏类器“盏盐”的自铭含意不同⑤。东风油库M2和汪家塄曾孙定墓中出土一类扁体的簠（图4.1－12，1），双耳简洁较小，无同时期簠耳繁缛的装饰，如果作更早的追溯，这种扁体的簠还见于罗山高庙所出的曾子季夨臣簠。在楚系青铜器诸多的簠类器中，扁体的簠只见于与罗山高庙同时的江陵岳山⑥。春秋晚期曾国的盘腹部极浅（图4.1－12，2），口侧附方形的横耳，它们与同时期楚国悬环的盘形制不同，曾国此类盘仍然保持附耳风格并一直沿用至曾侯乙墓。这些说明，第二阶段曾国青铜器对于一些传统因素较楚国有更多的保留。

---

① 曾昭岷、李瑾：《随县擂鼓墩一号墓年代、国别问题刍议》，《武汉师范学院学报》1979年第4期。郭德维：《曾侯乙墓并非楚墓》，《江汉论坛》1980年第1期。

② 不过，郭氏所举的某些因素可能与级别、时代差异相关，而并非简单地属于曾、楚之别。如曾侯乙墓积炭属于诸侯之制，而考古发掘中并无相应级别楚墓。

③ 赵世纲：《曾侯乙钟与楚钟》，湖北省博物馆等《曾侯乙编钟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

④ 余从新：《安陆馆藏的几件青铜器》，《江汉考古》1984年第2期。死土岗方壶双耳已失，残存榫头可知耳为榫式焊接，这与曾国素面方壶浑铸的双耳不同。

⑤ 如楚王酓审盏（《近出1022》）、王子申盏（《集成》4643）等。

⑥ 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岳山大队出土一批春秋青铜器》，《文物》1982年第10期。

楚国青铜器中甗罕见①。在曾国，除了曾侯乙墓和擂鼓墩 M2 曾侯一级的墓葬出土铜甗之外，东风油库 M1、季氏梁墓葬这种规模并不大的墓葬中也有甗的出土。值得注意的是，铜甗在中原文化级别较高的铜器群中多见②，甗类器的使用体现的是近中原文化的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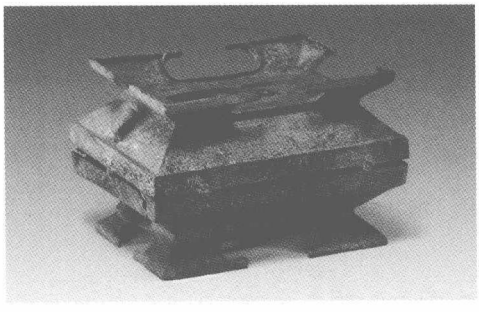
曾侯乙墓和擂鼓墩 M2 均出土铜绳纹鬲（图 4.1－13），鬲的形制完全仿自陶鬲，甚至可能就是以陶鬲翻范铸造。这类鬲作大口瘪裆，形制与同时期楚式鬲不同③。在今

1

2

图 4.1－11　春秋晚期曾国的素面方壶及其近似者

1. 东风油库 M1 方壶　2. 安陆死土岗采集方壶



1

2

图 4.1－12　春秋晚期曾国的簠与盘

1. 汪家墙曾孙定簠　2. 东风油库 M1 盘

① 刘彬徽：《楚系青铜器研究》第 140－143 页，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 年。

② 高明：《中原地区东周时代青铜礼器研究》（中），《考古与文物》1981 年第 3 期。

③ 张昌平：《楚鬲研究》，《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论文集》，湖北科技出版社，2001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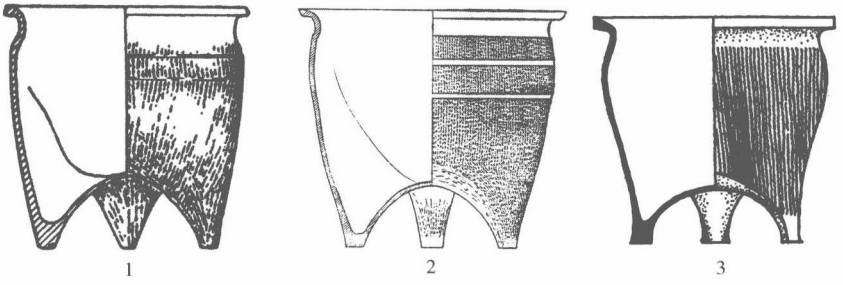


图 4.1－13 曾国的绳纹鬲

1. 庙台子 H2：1 陶鬲 2. 曾侯乙墓绳纹铜鬲 3. 擂鼓墩 M2 绳纹铜鬲

随州一带的遗址中，仍然可见春秋中晚期直至战国早期的大口瘪裆鬲（图 4.1－13，1）①，这种陶鬲也具有曾国的个性特征。

从类别和形态而言，曾侯乙墓和擂鼓墩 M2 编钟与楚系编钟有较大区别。我们知道，西周中期开始出现的成编钟类悬乐是以甬钟为基础，春秋早期，编纽钟和编镈出现，此后成编的纽钟和镈钟成为高级别铜器群常见的组合显示②，新郑祭祀遗址乐器坑出土编钟即为这种组合形式③。春秋中期以后的楚系编钟也开始使用这种组合形式，或者是单独以编镈、编纽钟的形式出现。下寺 M1 出土的是一组 9 件的纽钟，稍晚的下寺 M10 出土镈钟 8、纽钟 9。镈钟 8、纽钟 9 的组合成为春秋晚期开始直至战国中期楚系编钟最为常见的搭配④。楚系编钟较晚的编甬钟形式，是春秋晚期偏早的下寺 M2 的 26 件一套的王孙诰钟。

但使用成编甬钟的传统并未在春秋晚期以后消失。在中原地区特别是一些晋系墓葬中仍然可见成组的编甬钟，但多与编镈、编纽钟形成组合形式。如春战之际的山西潞河 M7 出土甬钟两组各 8 件⑤，同出镈钟 4、纽钟 8 件；战国早期的寿县后川 M2040 出土甬钟 15 件，出土镈钟 4、纽钟 7 件⑥；战国中期的长治分水岭 M25 出土甬钟 5、纽钟 9、镈钟 4 件⑦。寿县蔡侯墓出土有镈钟 8、纽钟 9、甬钟 12 件，甬钟为吴王光所作，但仍

① 武汉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等：《西花园与庙台子》，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 年。

② 东周编钟的发现情况，可参见陈振裕：《中国先秦青铜钟的分区探索》，湖北省博物馆等《曾侯乙编钟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1992 年。

③ 新郑祭祀遗址出土编钟 11 套，绝大多数“以 4 件组编镈与 10 件组的双组纽钟配套”。参王子初：《郑国祭祀遗址出土编钟的考察和研究》，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郑郑国祭祀遗址》附录一，大象出版社，2006 年。

④ 其他出土镈钟 8、纽钟 9 的例子如蔡侯墓、侯古堆 M1、和尚岭 M2、徐家岭 M3、M10 等。

⑤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山西省潞城县潞河战国墓》，《文物》1986 年第 6 期。

⑥ 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1957 年河南陕县发掘简报》，《考古》1958 年第 11 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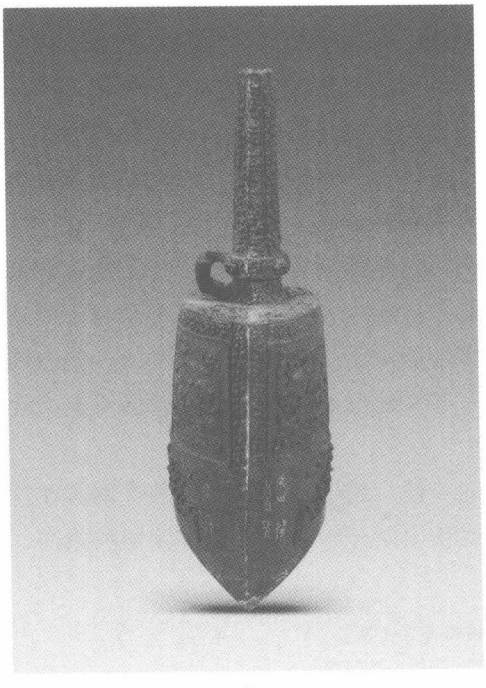
⑦ 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山西长治分水岭战国墓第二次发掘》，《考古》1964 年第 3 期。

然表现的是蔡侯墓编钟的组合形式。因此蔡侯墓编钟既体现了中原文化的关联与传统，又有楚系编钟组合形式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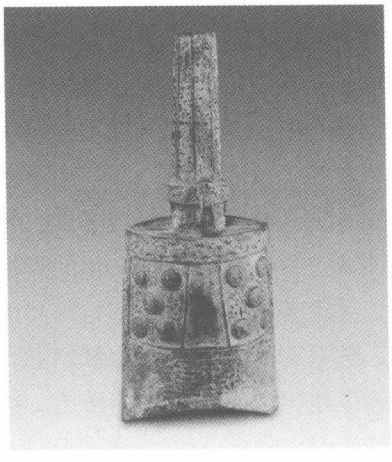
曾侯乙编钟见甬钟5组45件、纽钟3组19件，此外有临时加入的一件楚王酓章镈钟。出土所见编钟的组合与楚王酓章镈钟之后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整架编钟以甬钟、纽钟为组合是无疑的。擂鼓墩M2整套编钟2组36件，均为甬钟。曾国这种以甬钟为主体，不见使用镈钟的现象，与上述楚系编钟、中原地区编钟组合都有不同，而是较多地表现出两周之际前后的传统。

曾侯乙编钟和擂鼓墩M2编钟形制也有一些个性特征（图4.1－14）。这些曾国钟钟体修长，甬钟的甬部、纽钟的纽部均较其他文化系统钟略长。两座墓葬的甬钟枚颇有特点，曾侯乙编钟中层甬钟一组11件短枚钟，枚高不足1厘米；中层两组12件甬钟未设枚，为无枚甬钟。在擂鼓墩M2甬钟的枚继续了曾侯乙甬钟的蜕化趋势，在其28件小型甬钟中，钲部两侧也不像一般甬钟设9个枚，而是5个乳状圆突。甬钟枚的蜕化大约来自纽钟和镈钟枚体演变趋势的影响，擂鼓墩M2甬钟5个乳突的设置与春战之际前后楚式镈钟的乳突状枚设计相同。

除了上述因素之外，等级很高的曾侯乙墓未见青铜剑也曾经被视为曾国不同于楚的



1



2

图4.1－14　曾国的编钟

1. 曾侯乙编钟中层第2组第1号

2. 擂鼓墩M2编钟下层小钟

个性特征之一①。剑是西周时期才出现的青铜兵器，曾国青铜器虽见较多兵器，但剑少出，仅仅在郭家庙墓地采集到一件属于两周之际的铜剑。在属于春秋晚期偏晚至战国中期之前的几座高级贵族墓葬包括曾侯乙墓中均不见青铜剑。在楚系较高级别的墓葬中，一座墓葬常常出土有数柄、数十柄青铜剑②。如江陵天星观 M1 出土剑 32 柄③，望山 M2 出土剑 7 柄④，与曾侯乙墓同属于附庸国的蔡侯申墓出土剑 4 柄⑤。因此曾国不见青铜剑是一个颇为特别的现象。青铜礼乐器类别与组合的有无和差别或可反映文化和地域的差别，但东周时期作为实用器的剑应当不会成为一国文化的禁忌物。在曾侯乙墓编钟架的两个铜人腰间，均佩带有铜剑，或许表明青铜剑不见于曾国只是考古发现的问题。

当然，从总体而言，曾国青铜器中的个性因素，只是曾、楚青铜器大体同一特性之下的较少成分。即便在上述具有个性因素的簠、盘等器类中，与楚文化青铜器形制相同者，仍然居多数。

五 小 结

曾国青铜器自春秋中期开始即纳入楚文化青铜器系统，说明曾国与楚国形成所谓楚系的共同文化特征时间大体相当。从楚系青铜器一些器类的文化渊源上看，楚系青铜器甚至是楚国青铜器的源头并不是单纯地由楚国文化凝集而成，而是汇入了该区域文化因素的结果——换言之，楚文化形成独立体系的区域文化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我们并不能因为楚式升鼎在曾国青铜器中找到较早的因素，从而认为曾国青铜器对楚国形成影响；或者相反，我们亦不能因为楚国作为强势文化，因此结论为春秋中期之前的楚国青铜文化就已经决定了当时曾国青铜器特征。

从渊源上看，楚系青铜文化的直接源头仍然是西周青铜文化。在楚系青铜器的核心器类中，无论盖鼎抑或升鼎都与西周鼎形制差异颇大，但其渊源又都来自于周式鼎。另一方面，楚系青铜器中的高等级器群，较多地继承了周式的器用制度，一些西周晚期周式青铜器风格得以在东周时期沿用。这样一些文化发展趋向，也是曾国青铜文化所共有的特征。

春秋中期的楚文化已经表现出强大的同一性，属于楚文化性质的青铜器在这一时期辐射到相当大的地域范围。曾国青铜器在春秋中期开始与楚文化青铜器的趋同，是当时

① 郭德维：《曾侯乙墓并非楚墓》，《江汉论坛》1980 年第 1 期。

② 郭德维：《楚系墓葬研究》第 277 页，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 年。

③ 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天星观 1 号楚墓》，《考古学报》1982 年第 1 期。

④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望山沙冢楚墓》，文物出版社，1996 年。

⑤ 安徽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安徽省博物馆：《寿县蔡侯墓出土遗物》，科学出版社，1956 年。

江汉地区文化发展的大势。但同时，第二阶段曾国青铜器器形个性特征依然有较大比重地存在，这些个性特征并未体现出趋弱的态势，而是在各个不同时期都有体现，这反映出当时在大的文化地域共性之下，以诸侯国为文化单元特性的存在。

第二节　纹　饰

春秋中期及以后，由于铸造技术发生的变革，青铜器从形制到纹饰相应的都有很大的变化。容庚很早就注意到这一时期青铜纹饰是以反复、连续的方式表现出来，认为"纹样是印在镕范上，范铸出来的"①。贝格立曾以浑源出土的犀尊为例，指出犀尊纹饰是用侯马出土那样的纹饰模板模印出相同的纹饰泥片，再修剪粘贴到犀尊外范上②。这种纹饰制作方法在当时有比较广泛地应用。但是，由模印技术制作的青铜器纹饰往往细密而肤浅，因之在考古报告中既难以墨线图客观忠实地表达纹样原貌，又少有拓片材料可供分析。这给青铜器纹饰的研究造成了很大的困难。第二阶段曾国青铜器纹饰材料，以及可供对比研究的淅川下寺、和尚岭与徐家岭等楚文化青铜器纹饰材料，也都存在类似问题。

以下主要简要地考察第二阶段曾国青铜器纹饰的基本构成及其与同时期楚文化青铜器纹饰的关系。

一　不同时期的基本纹饰

从装饰手段而言，第二阶段曾国青铜器纹饰可分为铸造纹样和镶嵌纹样两大类。铸造纹样是以细密为特征的蟠螭纹和蟠虺纹为主要题材。镶嵌纹样是在第二阶段开始新流行的装饰手法，纹样题材多为龙或龙的变体，主要集中出现在曾侯乙墓。在第二阶段的不同时期，这些纹样又表现出不同的变化。

第一期青铜器纹饰的成分较为复杂。一些纹饰是第一阶段纹饰风格的延续，如罗山高庙附耳鼎饰垂鳞纹，形制和纹饰风格都近似第一阶段青铜器。80 刘家崖附耳平底鼎上腹饰环带纹、下腹饰垂鳞纹（图 4.2－1，1），虽然环带纹与垂鳞纹的层次和部件与第一阶段同类纹饰有所不同，但其基本构图仍然是表达环带纹、垂鳞纹的性质，同样是第一阶段纹饰的延续。另外一些纹饰则是第一阶段纹饰的变体，如 80 刘家崖圆壶环带纹与三角云纹的结合（图 4.2－1，3），三角云纹是春秋中期新出现的因素，更多的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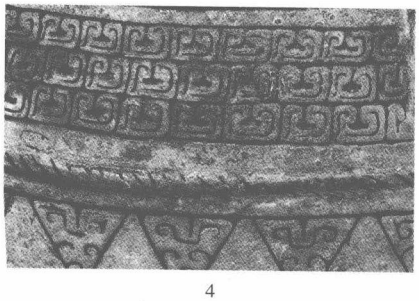
① 容庚、张维持：《殷周青铜器通论》，文物出版社，1984 年。该书 1958 年由科学出版社初版。

② Robert W. Bagley, What the Bronzes from Hunyuan Tell Us about the Foundry at Houma, Orientations, January 1995.

1

2

3



4

图 4.2－1　第二阶段第一期曾国青铜器纹饰

1. 环带纹、垂鳞纹（80 刘家崖附耳平底鼎）　2. 蟠虺纹（八角楼墓葬盖鼎）　3. 环带纹、三角云纹（80 刘家崖圆壶）　4. 蟠虺纹（八角楼采集平盖鼎）

作为蟠螭纹或蟠虺纹的边栏出现。本期数量较多的则是新风格的蟠虺纹，其形式有两类，一是作“U”字构形，似单体的龙（图 4.2－1，4）；一是以交体的龙构形（图 4.2－1，2）。两类蟠虺纹分别见于八角楼墓葬和另外两件平盖鼎，纹饰构图抽象，但它们都仍然可见龙纹的因素。即便是在新风格的纹饰中，也仍然延续旧有传统，如这一时期蟠虺纹常以蜕化的重环纹作为纹饰的边栏（图 4.2－1，2），这一做法一直沿用到春秋晚期。罗山高庙簠纹饰显示出蟠虺纹形成之前的过渡形态。另外，本期曾国青铜器未见蟠螭纹，这显然只是受材料的限制。

第二期青铜器材料较少，但这一时期的主体纹饰仍然为蟠螭纹、蟠虺纹无疑。此期的 75 刘家崖连迂盖鼎（图 4.2－2，1）、升鼎饰有蟠螭纹，而 76 义地岗放鼎（图 4.2－2，2）与盏均饰蟠虺纹。本期的蟠虺纹不再见上期流行的“U”字形结构，而交体结构的蟠虺纹和蟠螭纹构图与上期相比变化不大，但纹饰线条不甚规整，结构较为松散。同时，延续传统的纹饰在“旧制”青铜器上仍然有所体现，如 75 刘家崖升鼎饰垂鳞纹、

1

2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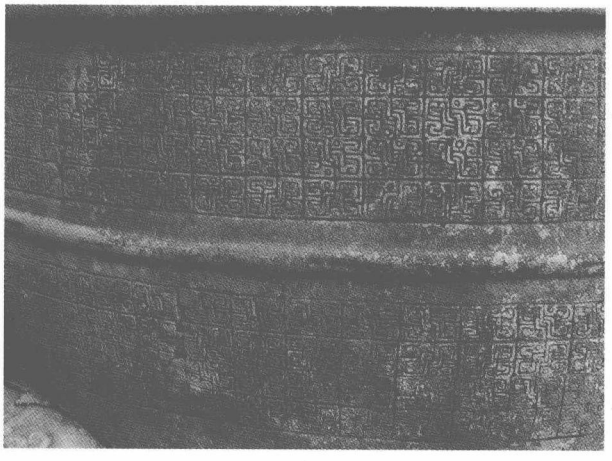
图 4.2－2　第二阶段第二期曾国青铜器纹饰

1. 蟠螭纹（75 刘家崖连迁盖鼎）　2. 蟠虺纹（76 义地岗放鼎）　3. 环带纹（75 刘家崖方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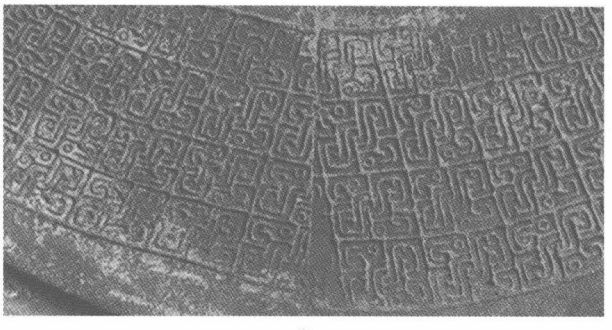
方壶饰环带纹（图 4.2－2，3）。

第三期青铜器有东风油库和汪家墉等几座墓葬出土器，这一时期一些青铜器如方壶、匜光素无纹，盘也只是在器足饰兽面纹。这一风格与春秋晚期部分青铜器开始流行的光素作风相同。鼎、簠等核心器类均饰结构细密的纹饰，显示出模印纹饰的广泛使用。东风油库 M2 鼎饰“S”形纹饰，属于外来的文化风格。东风油库 M1 簠饰蟠螭纹，构成蟠螭的龙躯体纤细，纹饰有如蟠虺纹的细密风格。其他鼎、簠均饰蟠虺纹，这些蟠虺纹仍然是交体结构，与此前蟠虺纹变化不大。东风油库 M3 曾侯鼎铸造较精，蟠虺纹纹路清晰（图 4.2－3，1），鼎盖模印的蟠虺纹可见模具形成的叠印交叉痕迹（图 4.2－3，2）。本期见有镶嵌类纹饰，如东风油库 M3 的曾仲姬壶和淅川和尚岭 M2 出土的曾仲俅君臆器座，这两件铜器镶嵌物已失，纹样凹入处可见用于粘连镶嵌的漆类物质（图 4.2－3，3）。此外，东风油库 M3 鼎器盖所饰的龙纹，也是来自镶嵌纹饰的影响。

第四期曾侯乙墓青铜器装饰纹饰频率很高。在曾侯乙墓出土的 48 件次乐器、食器、酒器和水器中（附表 6），装饰铸造类纹饰的青铜器 23 件次，装饰镶嵌类纹饰的有 24 件



1



2

3

图 4.2－3　第二阶段第三期曾国青铜器纹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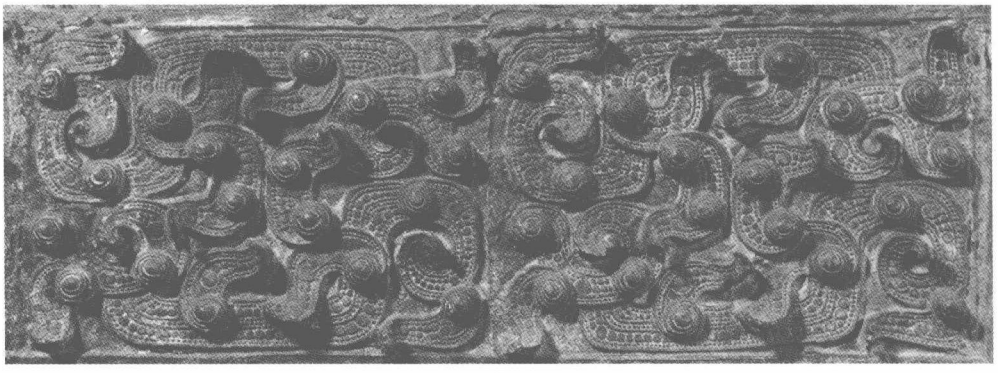
1. 蟠虺纹（东风油库 M3 曾侯郕鼎）　2. 蟠虺纹（东风油库 M3 曾侯郕鼎鼎盖）　3. 镶嵌类纹饰（曾仲姬圆壶）

次①。但由于曾侯乙升鼎、曾侯乙鬲、鼎形器等装饰镶嵌类纹饰的器物都包括多件个体，因此曾侯乙墓装饰镶嵌类纹饰（详后）的青铜器在绝对数量上要多于饰铸造类纹饰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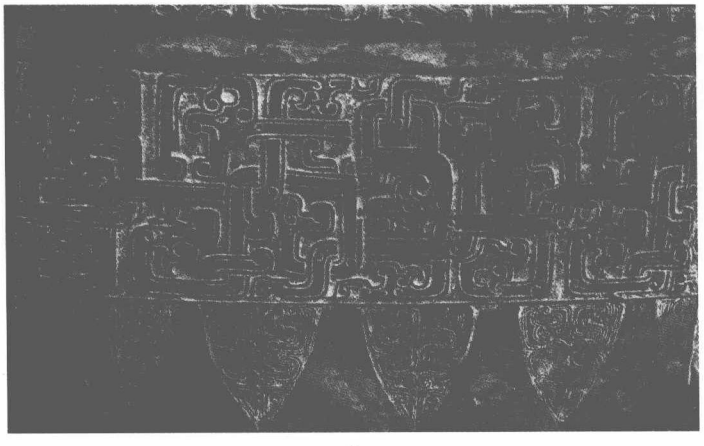
曾侯乙墓青铜器铸造类纹饰主要有三种，蟠螭纹、蟠虺纹和蟠龙纹。由于曾侯乙墓的高等级和规格，其青铜器纹饰构图规整而严谨，纹饰在铸造中脱范完整，纹路清晰。纹饰由模印工艺形成的相同的构图也有清楚的反映（图 4.2－4，1）。整个曾侯乙墓青铜器群特别是曾侯乙编钟纹饰层次分明，动感强烈，纹饰的制作和铸造水平高超。

蟠螭纹主要装饰于曾侯乙墓青铜礼器特别是食器和酒器当中，其形态已经分化为两类，一类与春秋早中期的蟠螭纹类似，龙形为较宽的带状，构图规整，但龙的躯体已图案化，如曾侯乙 C235 镬鼎（图 4.2－4，2）。这种蟠螭纹在风格上与镶嵌类变形龙纹有接近之处。另一类为龙躯带星点纹的蟠螭纹，纹饰构图较细密，但龙的

① 其中有两个件次同时饰铸造和镶嵌类纹饰，另外三个件次为素面青铜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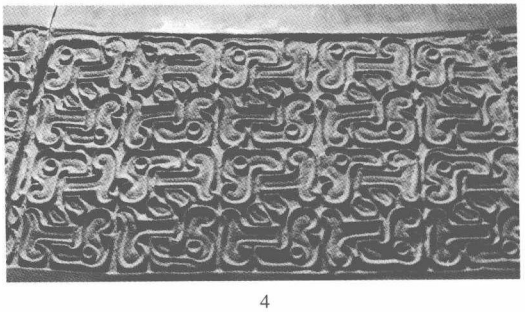


1



2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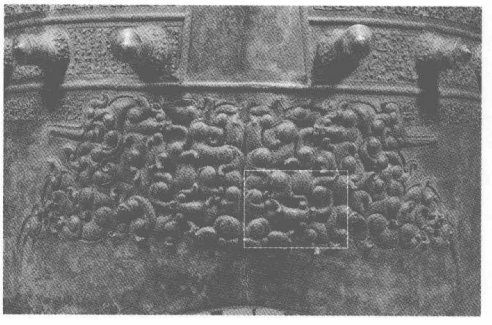


4

图 4.2－4　第二阶段第四期曾侯乙墓青铜器纹饰

1. 蟠虺纹（曾侯乙编钟架纹饰）　2. 蟠螭纹（曾侯乙 C235 镬鼎）　3. 蟠虺纹（曾侯乙编钟下 1、2 甬钟）　4. 蟠虺纹（曾侯乙大尊缶）

形状较上类蟠螭纹清晰。此类蟠螭纹多呈带状分布，见于曾侯乙大尊缶颈部、食具盒内出土的鼎、罐腹部。



1

2

3

图 4.2－5　第二阶段第四期曾侯乙墓青铜器的蟠龙纹

1、2. 曾侯乙编钟下 1、2 甬钟鼓部纹饰及其局部　3. 曾侯乙编钟钟架纹饰

蟠虺纹亦可见两类，一类为带乳突的蟠虺纹，极为多见。在曾侯乙编钟的镈钟和甬钟（图 4.2－4，3）上均饰此类蟠虺纹，此外礼器中的连禁大壶、方尊缶、尊盘也装饰这类带乳突的蟠虺纹。显然，带乳突的蟠虺纹已经成为铸造纹样中的主体。另一类蟠虺纹宽体，饰于曾侯乙大尊缶（图 4.2－4，4），抽象的龙形图案中仍然保留有目等动物部件，宽体的设计可能与大尊缶的体量相关。

蟠龙纹是曾侯乙墓青铜器十分突出的装饰，多见于乐器，主要装饰在甬钟的鼓部（图 4.2－5，1）。这类蟠龙纹夸张地表现龙的大嘴和爪部（图 4.2－5，2），纹饰的构图是若干层次的龙在一起的纠结，即以一条大龙为主干，在龙身、爪上又有较小的龙咬合，小龙又可能再有更小的龙咬合。这种构图理念的蟠龙纹在曾侯乙编钟架与座、曾侯乙编磬架、曾侯乙建鼓座均可见，有的蟠龙纹视觉效果极强（图 4.2－5，3）。同类蟠龙纹也是同时期楚国青铜器蟠龙纹的构图方式。曾侯乙墓出土的楚王酓章镈钟，其上所饰蟠龙纹与曾侯乙甬钟所饰蟠龙纹几乎完全相同。徐家岭 M9 出土的铜兽，也是以不同层次咬合的龙构成，说明这种设计是当时颇为风行的一种模式。

曾侯乙墓青铜器铸造类纹饰还有一些细线构成的云纹，装饰于鹿角立鹤、磬架和一

些匕、勺之上，这类装饰与受体纤细的造型相称。此外，箕饰席纹、大鬲饰绳纹，是一种写实性的纹饰。鬲的绳纹与陶鬲纹饰完全相同，可能就是直接以陶鬲为模翻制的。

青铜器纹饰的繁缛程度常常反映器主的社会地位①，因为复杂的设计和工序过程只有那些高级别作坊才可能完成。曾侯乙墓青铜器不仅大量使用镶嵌类装饰，即便是铸造类纹饰，其类别之丰富、铸造之精良，在同时期楚系青铜器中罕有可比者。

第五期擂鼓墩 M2 青铜纹饰均属于铸造成形，纹样类别同样是以蟠螭纹和蟠虺纹居绝大多数。蟠虺纹延续了上期带乳突的蟠虺纹风格，这类蟠虺纹见于全部的编钟（图 4.2－6，1）、大部分的升鼎、方座簋、方壶、盥缶（图 4.2－6，2）、圆尊缶、小口鼎、炉，成为 M2 最主要的纹饰。不过，带乳突蟠虺纹结构松散，纹饰构图难以反映主体，这与纹饰所在主体的铸造质量相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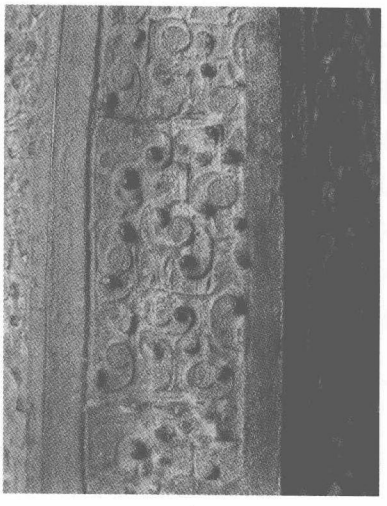
蟠螭纹则包含有一些不同的形态，并装饰在不同的青铜器中：星点细带蟠螭纹装饰于两件较小的立牛纽盖鼎（图 4.2－6，3），这是上期曾侯乙墓青铜器同类纹饰在本期的沿用。细带蟠螭纹装饰于簠（图 4.2－6，4）和簋盖，这大约也是早期蟠螭纹的一种发展形式。填圆形、三角及星点的宽带状蟠螭纹装饰于两件较大的立牛纽盖鼎（图 4.2－7，1）和两件卧牛纽盖鼎，是一种新出现的装饰形式，其风格来源于晋系青铜器，这一点将在下一章中讨论。

除了蟠螭纹和蟠虺纹外，上期在曾侯乙墓编钟中广泛运用的蟠龙纹，在擂鼓墩 M2 编钟装饰中仍然可见蟠龙纹的意味，但纹饰造型已经大大蜕化，龙的形象已不再具象（图 4.2－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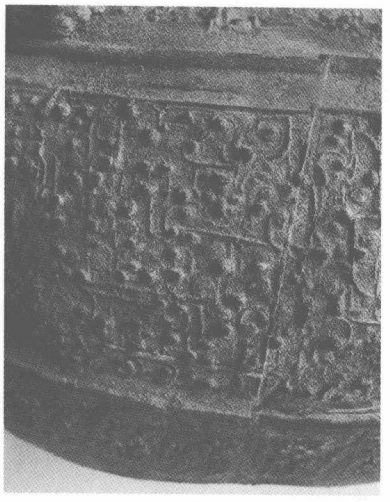
上期流行的镶嵌类纹饰仍有影响。在擂鼓墩 M2 的一件升鼎、甗的甑体（图 4.2－7，3）和方尊缶上可见龙纹及变形龙纹，纹饰结构也仍然接近于曾侯乙墓镶嵌类龙纹。不过，M2 这些青铜器纹饰显然不再镶嵌任何饰物。

与曾侯乙墓青铜器纹饰的精良相反，擂鼓墩 M2 青铜器铸造质量较为低劣。整个铜器群纹饰多是平面模印，纹路不甚清晰，有的纹样甚至已经缺失。纹饰质量较差的另一表现是同一套器物之中纹饰相互不同。方座簋中器身饰蟠虺纹，而盖饰风格不同的细带蟠螭纹，簋盖或可能是后配的。两件大立牛纽盖鼎器形、大小相同，两器器盖纹饰相同，而腹部纹饰有异：一鼎腹部素面无纹，大约是铸造前纹饰制作的遗漏所致。M2 九件升鼎不仅形制有所不同，即便在器形相同的升鼎中，纹饰也有差别。这样，擂鼓墩 M2 青铜器纹饰不仅不像曾侯乙墓青铜器那样体现出墓主高级别的身份和等级，而是体现出一种青铜文化的颓势。这固然反映出曾国当时的国势与政局的衰败，同时也是战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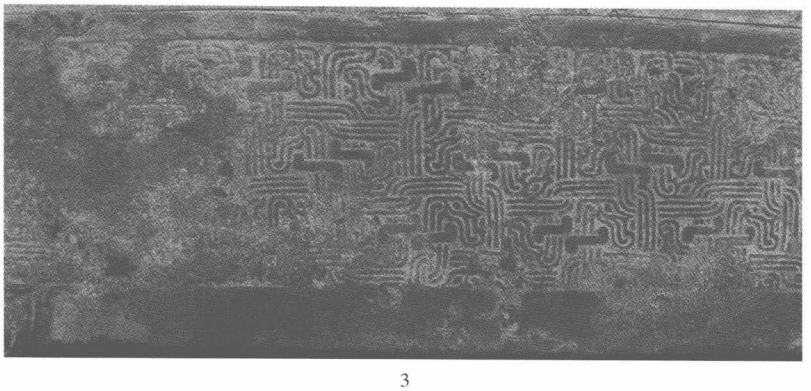
① Lothar von Falkenhausen, The Bronzes from Xiasi and Their Owners.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考古学研究（五）·庆祝邹衡先生七十五寿辰暨从事考古研究五十年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3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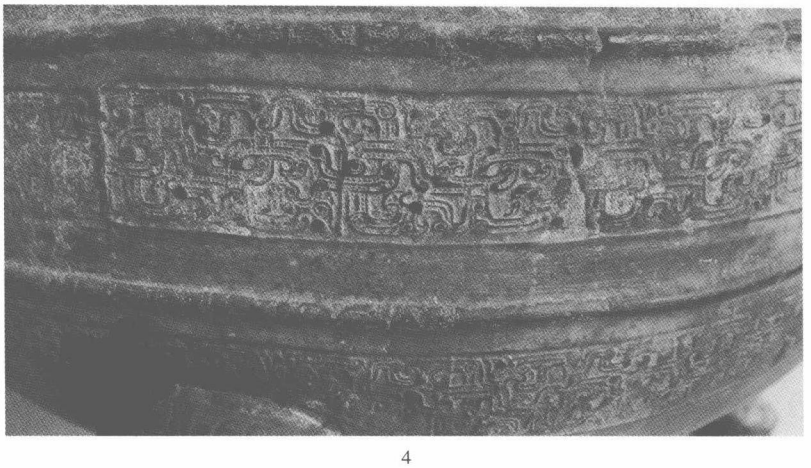
1



2



3



4

图 4.2－6　第二阶段第五期擂鼓墩 M2 青铜器纹饰

1. 蟠虺纹（擂鼓墩 M2 甬钟甬部）　2. 蟠虺纹（擂鼓墩 M2 盥缶）　3. 星点细带蟠螭纹（擂鼓墩 M2 小立牛纽盖鼎）　4. 细带蟠螭纹（擂鼓墩 M2 簠）

1

2

3

图 4.2－7　第二阶段第五期擂鼓墩 M2 青铜器纹饰

1. 宽带状蟠螭纹（擂鼓墩 M2 大立牛纽鼎）　2. 蟠龙纹（擂鼓墩 M2 甬钟）　3. 变形龙纹（擂鼓墩 M2 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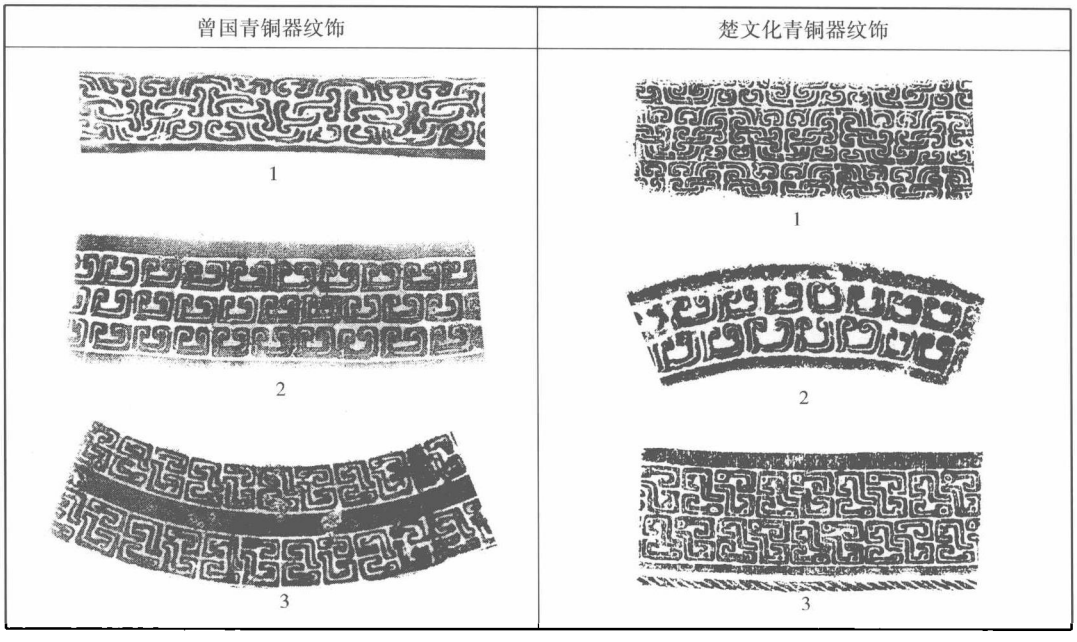


图 4.2－8 春秋中期曾国与楚文化青铜器纹饰比较

曾国青铜器纹饰：1. 罗山曾兴臣簠 2. 八角楼采集平盖鼎 3. 八角楼墓葬平盖鼎

楚文化青铜器纹饰：1. 江陵岳山簠 2. 下寺 M7：6 鼎 3. 江陵岳山鼎

中期中国青铜时代趋于尾声大局下青铜器铸造水平的下滑。

综观第二阶段曾国青铜器纹饰，第一至三期和第四、五期之间存在较大变化，其变化主要表现在蟠螭纹和蟠虺纹的结构上。第一至三期蟠螭纹中双首的龙及其躯体构形清楚，龙虽相互缠绕，但走向和布局明晰。这一时期蟠虺纹构成长方形造型单元，交体的龙虽然抽象但仍然可见龙的意味。而在第四、五期曾侯乙墓和擂鼓墩 M2 青铜器中，蟠螭纹造型多样化，龙的形象不再具象，纹饰构图也趋于几何图案化。蟠虺纹中长方块状的交体蟠虺纹消失，带乳突的蟠虺纹流行。同时在属于第四、五期的战国中晚期，一些青铜器更有风格光素的趋向，而许多日用品如镜、奁等装饰华丽而繁缛，形成新的装饰风格。

上述变化与楚文化青铜器纹饰一致。在第二阶段各时期曾国青铜器纹饰中，第一至三期纹饰种类、风格、造型与楚国青铜器纹饰几无二致。以春秋中期青铜器纹饰为例，这一时期曾国青铜器蟠虺纹出现了若干变体，相同纹饰在楚文化青铜器中均可见（图 4.2－8）。擂鼓墩 M2 青铜器多种纹饰在徐家岭 M10 青铜器中也可见相同特征者。楚文化中虽然无年代、等级相称的铜器群与曾侯乙墓青铜器对比，但曾侯乙墓青铜器镶嵌类纹饰之外的铸造类纹饰如带乳突蟠虺纹仍然与楚文化风格相同。因此，总体而言，第二阶段曾国青铜器的装饰，表现出与楚文化相当强的一致性，还难以总结出曾国青铜纹饰的个性特征。

二　蟠螭纹与蟠虺纹

蟠螭纹与蟠虺纹是第二阶段曾国、同时也是春秋晚期前后其他地区青铜器的主要装饰纹样，这种布局细密的装饰是模印纹饰手段之下的产物。不过它们的起源，却与第一阶段青铜器纹饰相关，也是第一阶段少数的作为主体纹饰延续至第二阶段的纹样。图4.2－9可以清楚地反映出西周晚期龙纹演变、发展而至蟠螭纹的这一流变关系：西周晚期龙的造型均作顾首团身，至两周之际如郭家庙M17圆壶的龙纹已出现双首共身的构图，春秋早期的龙纹相互纠缠，即已形成真正意义上的蟠螭纹了。

图4.2－9表明蟠螭纹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时期，除了这一演变关系揭示的第一阶段青铜器发展缓慢的时代特征之外，就纹饰而言，还说明了如下几点：

1）蟠螭纹的源头——早期团身的龙纹仍然是来自周文化因素。在西周晚期周原青铜器以及晋国青铜器上均可见数量不多的团身龙纹，但这种纹饰多是作为辅助纹样装饰在壶、簋等器盖的捉手之内或车马器上，同时在其他的质地器如玉器上可见。因此在西周晚期青铜器之上，团身龙纹并不是一种重要纹样。

2）第一阶段曾国青铜器上已经多见团身龙纹及其变身形式，反映出龙纹在诸侯国青铜器上的发展。这一时期的龙纹装饰在鼎、壶等器腹部，作为主题纹样已经较为多见。至春秋早期偏晚阶段，相互缠绕的龙纹形成不同的构图，除了蟠螭纹之外，例如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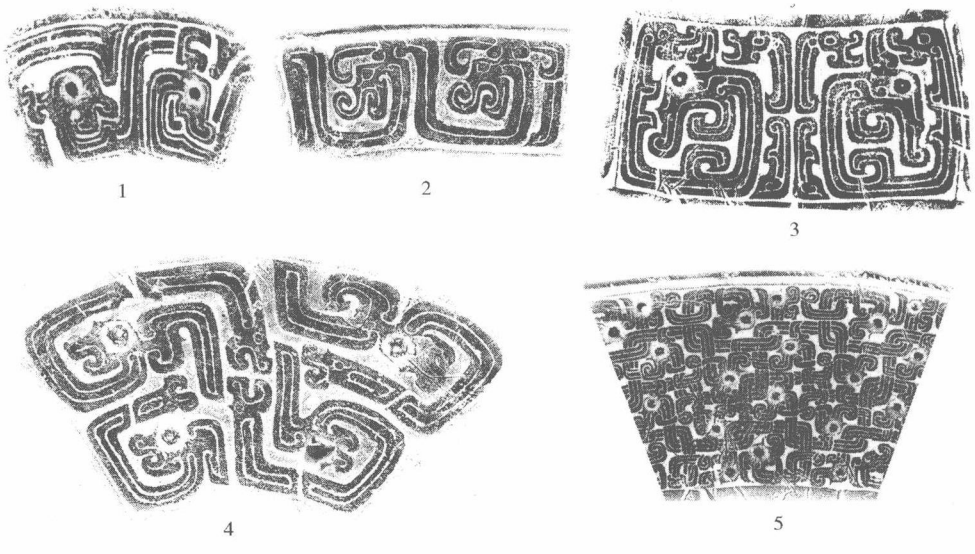


图4.2－9　蟠螭纹的形成

1. 岐山75董家村窖藏豆（《周原》图469－3）　2. 曾仲子敔鼎　3. 郭家庙M17：2圆壶　4. 郭家庙M02鐳　5. 曾孟谏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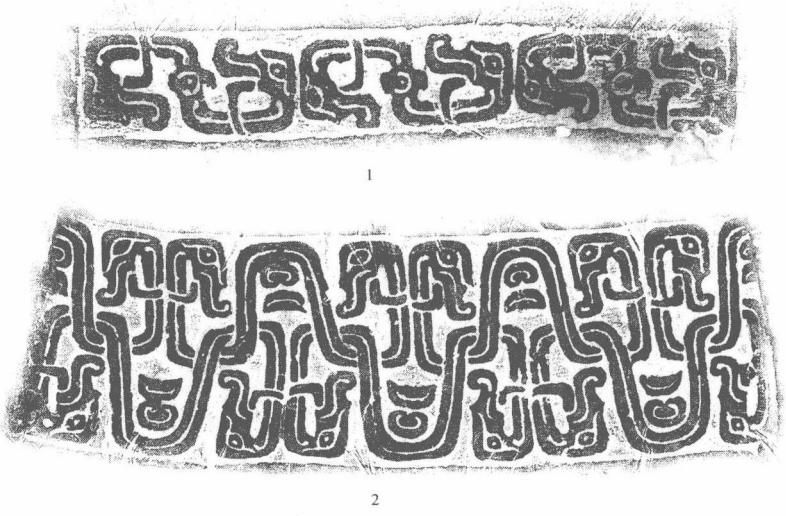


图 4.2－10 龙纹形成的其他纹样

1. 周家岗圆壶冠部 2. 周家岗圆壶腹部

家岗圆壶还可见龙纹构成的窃曲纹和环带纹式样（图 4.2－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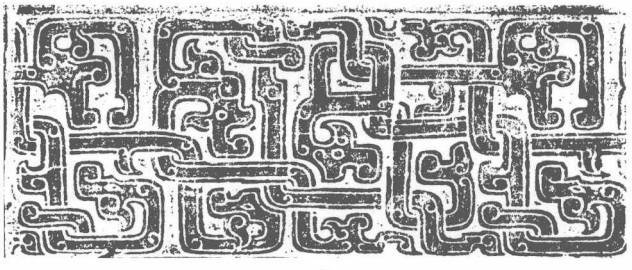
3）第一阶段龙纹向细密、相互缠绕的方向发展，至春秋早期偏晚阶段形成蟠螭纹。此时的蟠螭纹奠定了其后蟠螭纹和蟠虺纹几何形构图的范式，但真正应用模印技术制作蟠螭纹，大约在第一阶段并未开始，而是始自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青铜器不仅是在曾国，而且在其他许多地区也表现出与第一阶段青铜器的质变之别。在青铜纹饰方面，这种质变的情形依然存在。例如第一阶段流行的窃曲纹、垂鳞纹、环带纹、重环纹等等在第二阶段均已罕见或偶尔以变形的面貌出现。与第一阶段青铜器其他纹饰不同，蟠螭纹在春秋早期开始较多出现，并在第二阶段进一步流行。因此，蟠螭纹是第一阶段为数不多的为第二阶段青铜器所承袭的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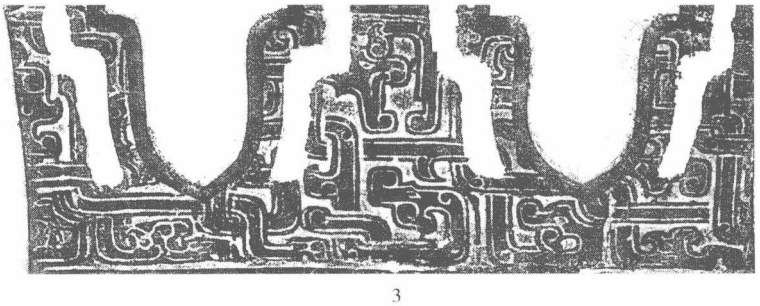
蟠螭纹在第二阶段曾国青铜器中沿用时间颇长。虽然在春秋中期曾国青铜器因为材料所限未见蟠螭纹，但在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期各时期青铜器上均可见（图 4.2－11）。蟠螭纹在第二阶段曾国青铜器中的发展，似乎存在两个方向不同的系列。一类为粗带蟠螭纹，如图 4.2－11 所示，纹样线条平直，结构规整，蟠螭纹中的龙仍然如第一阶段龙纹作顾首之状。另一类蟠螭纹为细带状线条，其出现大约在春秋晚期，如东风油库 M1 簠，至战国中期擂鼓墩 M2 簠、簋盖均见细带的蟠螭纹，但它们与早期蟠螭纹是否以及存在怎样的演变，目前并不明了。

蟠螭纹的装饰风格形成后，至第二阶段第一期即开始分化出更为抽象的蟠虺纹。第一期八角楼墓葬的鼎、盏的蟠虺纹（图 4.2－12，1），仍然可以分辨出龙形，这种蟠虺纹其后趋于更加细密，至春秋晚期成为各类青铜器最为常用的装饰，汪家塄墓葬

1



2



3

图 4.2－11　蟠螭纹的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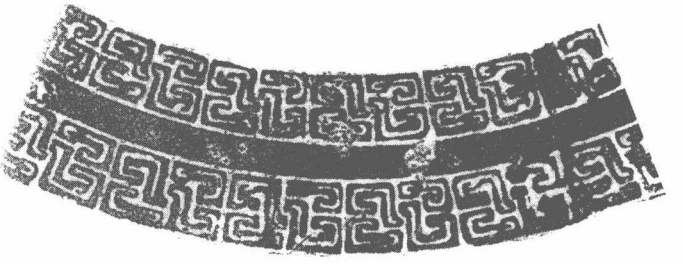
1. 75 刘家崖连迂盖鼎　2. 曾侯乙墓 C98 镬鼎　3. 擂鼓墩 M2 方壶

簠盖口纹饰（图 4.2－12，2）即体现了蟠虺纹的几何形图案化。因此在战国早期之前的楚式青铜器，尤其青铜鼎、簠等器类，绝大多数均饰蟠虺纹。第二阶段曾国青铜器的一些零星出土和传世青铜器，绝大部分也饰细密的蟠虺纹。但是，春秋晚期之后这种图案化构图的蟠虺纹消失，蟠虺纹形式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其主要类别，是带乳突的蟠虺纹。例如，在寿县蔡侯墓①，带乳突蟠虺纹装饰在从编钟到容器等各类青铜器之中。曾侯乙墓和擂鼓墩 M2 铸造类纹饰以蟠虺纹占绝大多数，与楚系青铜器这种装饰背景吻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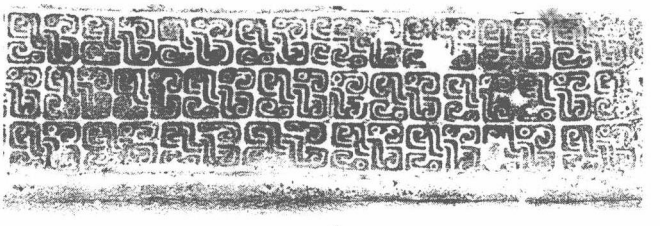
综观各时期蟠虺纹的形态，其所表现的是变形龙纹的意味，因此它们不是一个单一的发展脉络，而是不断呈现出变化的构图形式。

---

① 安徽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寿县蔡侯墓出土遗物》图版 44、45、48－69、78－105，科学出版社，1956 年。



1



2

图 4.2－12 蟠虺纹的发展

1. 八角楼墓葬平盖鼎 2. 汪家塄墓葬簠

三 镶嵌式龙纹

镶嵌式纹饰包括有镶嵌纹饰和铸镶纹饰两种。前者是在器壁上预铸出纹带凹槽，再在凹槽内镶嵌绿松石等纹饰材料。铸镶纹饰均为红铜纹饰，是将预先铸好的红铜纹带嵌入器物范腔内，浇铸时将纹带包铸为一体，其铸造过程与先铸法相同①。

曾国青铜器中镶嵌纹饰主要见于曾侯乙墓青铜器，是曾侯乙墓中最主要的装饰形式，主要涉及甬钟、磬架等乐器和食器、酒器等。曾侯乙墓镶嵌纹样有龙纹和变形龙纹两大类，各不同器类所饰龙纹或变形龙纹结构基本相同，大约都是在同一时间段内生产的。大部分器物镶嵌纹饰中镶嵌物已经脱落，因此现在所见曾侯乙墓镶嵌纹饰的青铜器，均作褐黑色器表②，凹槽的纹带处显露出白色物质。不过一些青铜器凹槽中还保留有绿松石，因此可知这类纹饰都是镶嵌绿松石的（图 4.2－13，1、2）。因为技术的不同，铸镶红铜纹饰未有脱落，红铜均保留在器壁内。曾侯乙墓铸镶纹饰数量不多，只见于盥缶、甗、炉和漏铲，铸镶纹饰也为龙纹和变形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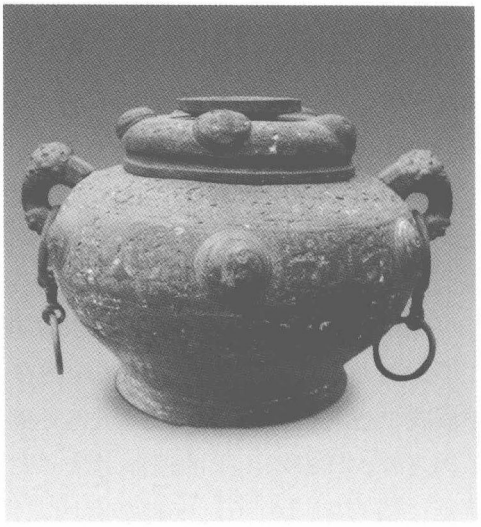
① 贾云福等：《曾侯乙墓青铜器红铜纹饰铸镶法的研究》，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附录一二，文物出版社，1989 年。此文亦见其他较早版本。

② 由于随葬青铜器长期处于曾侯乙墓泡水环境中，青铜器器表形成黑色氧化层。类似现象见于楚墓青铜器。

1

3

2



4

图 4.2－13　曾侯乙墓青铜器镶嵌类纹饰

1、2. 镶嵌纹饰盖豆　3. 铸镶红铜纹饰盥缶　4. 镶嵌纹饰盥缶

纹，构图与镶嵌纹饰相同。曾侯乙墓出土盥缶 4 件，运用铸镶和镶嵌手法装饰各 2 件，它们的盥缶大小、形制、纹带的构图均基本相同（图 4.2－13，3、4），这说明铸镶和镶嵌装饰手法虽然不同，但它们的含意、铸器作坊、铸器时间都是一致的。因此我们将这两类不同技术手法、装饰龙纹和变形龙纹的纹样视为同一类型，通称为镶嵌式龙纹。

曾侯乙墓大部分青铜礼器、编钟与编磬架均装饰了镶嵌式龙纹（参见附表 6），且

这些饰镶嵌式龙纹的青铜器铭文均作“曾侯乙祚時用终”，说明这些礼器与编磬等青铜器的铸造是在同一时间段内完成的。这对于评估曾侯乙时期曾国青铜生产水平和方式极有参考价值。

在整个青铜时代青铜器中，镶嵌类纹饰特别是在容器中镶嵌绿松石并不多，这种纹饰工艺技术的复杂和难度要求较高，在周代，往往是使用者身份等级较高的反映①。楚文化系统的青铜器中，像曾侯乙墓青铜器如此之多地使用镶嵌类纹饰的例子未见，与楚文化高等级墓葬发现较少相关②。战国时期青铜器高频率使用镶嵌技术的铜器群，如洛阳金村③、平山中山王墓④，其级别都在国君一级。

在曾侯乙墓之外，曾国青铜器发现镶嵌式龙纹的青铜器还有曾仲姬壶、曾仲𠈌君臆器座。这两件铜器均为曾国女子所作，铜器上镶嵌纹饰已经脱落。这说明至迟在春秋末期开始曾国已经开始运用这类新的纹饰加工工艺。

镶嵌式纹饰多使用独体的龙纹或其变体，龙形构图方式与这一时期铸造类蟠螭纹或蟠虺纹细密、抽象的风格不同。由于镶嵌类纹饰青铜器多代表较高的社会等级，此类龙纹可能对其他青铜器铸造类型的纹饰形成影响。76 义地岗出土敃所作的鼎、盏各一，鼎盖的捉手外围、盏盖顶部均铸有一周4 条龙纹（图4.2－14，2、3），4 条龙纹造型相同，各以盖顶捉手中央为核心，龙首作向心形展开。四龙环绕的形象，颇富动感。敃鼎与盏的年代在春秋晚期偏早阶段，所饰铸造类龙纹在同时期的下寺 M2：51 尊缶盖顶可见相同的构图，只是下寺 M2 尊缶为铸镶的红铜纹饰（图 4.2－14，1）。敃鼎、盏纹饰，可能来自于下寺 M2 这种镶嵌纹饰的影响。

上述四龙作一周环绕的向心式构图在春秋晚期偏晚阶段仍然在曾国流行，其形式既有镶嵌式，也有铸造成形的。除了曾仲𠈌君臆器座镶嵌式纹饰（图 4.2－14，4）作这种结构之外，汪家塄出土的曾孙定鼎（图 4.2－14，5）、淅川和尚岭 M1 出土的曾太师鼎鼎盖（图 4.2－14，6）中央都有四龙作向心式环绕。两件鼎都是铸造类纹样，所饰独体龙纹仍然可能是来自镶嵌龙纹的影响。这种向心式龙纹构图的装饰，最初的发端可能在楚国，但作为一种装饰的风尚则流行于曾国。

由于曾侯乙墓大量使用镶嵌式纹样装饰青铜器，镶嵌式独体的龙纹对铸造类纹饰的影响，当然在擂鼓墩 M2 青铜器中也会有体现。M2 的一件升鼎、甗和方缶都见有铸造

---

① Lothar von Falkenhausen, The Bronzes from Xiasi and Their Owners.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考古学研究（五）·庆祝邹衡先生七十五寿辰暨从事考古研究五十年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3 年。

② 寿县蔡侯墓也属于楚文化系统附庸国国君墓葬，并且与曾侯乙墓年代相当，但蔡侯墓墓葬规模和随葬品均不堪与曾侯乙墓相比。可见楚附庸国国君的器用，仍然各有分别。

③ 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第 24－27 页，文物出版社，1984 年。

④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㽙墓——战国中山国国王之墓》，文物出版社，1996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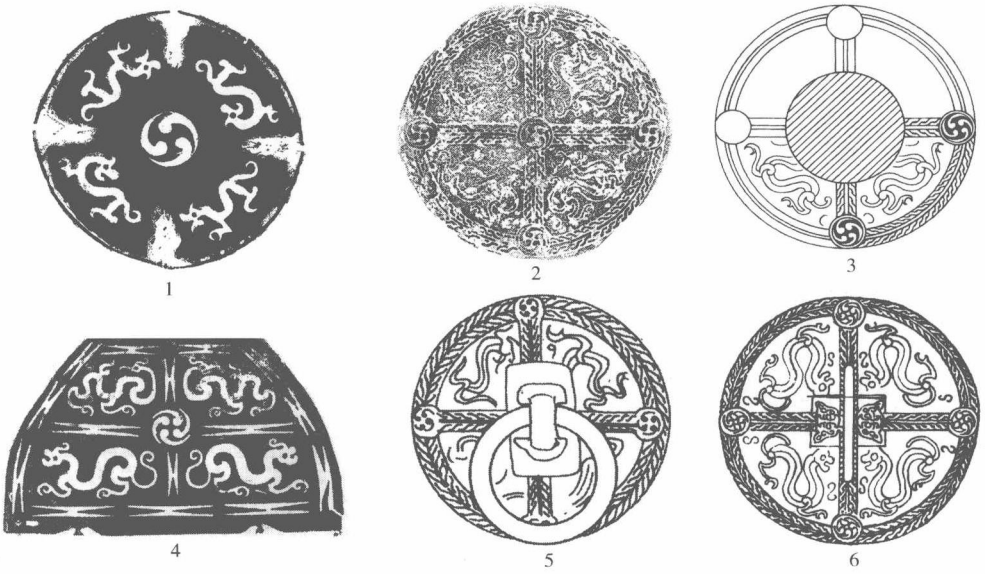


图 4.2－14　龙纹向心式构图

1. 下寺 M2：51 尊缶　2. 76 义地岗放盏　3. 76 义地岗放鼎　4. 和尚岭 M2：66 曾仲郤君臆器座　5. 汪家塄曾孙定鼎　6. 和尚岭 M1：5 曾太师鼎

的独体龙纹，这种龙纹作阴文凹入，构图明显也有镶嵌式纹饰的影响。

如果对镶嵌式龙纹及其类似铸造龙纹作一历时性考察，可排列出这类龙纹的演变关系如图 4.2－15。不能不注意到的是，春秋晚期偏早阶段的龙纹，仍然如春秋中期的蟠螭纹构图，龙作顾首之状。春秋晚期偏晚阶段的龙首前望，这一造型延续到战国时期，与同时期中原地区一些镶嵌类纹饰中的龙造型相同①。但在曾国，此后的龙形多见附饰，造型又向抽象的方向发展。

四　小　结

单元图案往往略似于长方形、以龙或龙的变体为母题构成粗细不同的蟠螭纹和蟠虺纹，在与曾国青铜器第二阶段大体相同的时间段内，成为中国青铜时代后期青铜器最主要的装饰纹样。这类纹饰的早期形式是龙形较具象的蟠螭纹，其源头是西周中晚期的龙纹。由曾国青铜器所揭示的蟠螭纹的形成、蟠螭纹和蟠虺纹的发展，都只是这些纹样在当时使用的一个缩影。因此，和器形、器类不同，在纹饰方面曾国与楚文化青铜器表现

① Charles D. Weber, Chinese Pictorial Bronze Vessels of the Late Chou Period, Fig36－37, Artibus Asian, Switzerland, 19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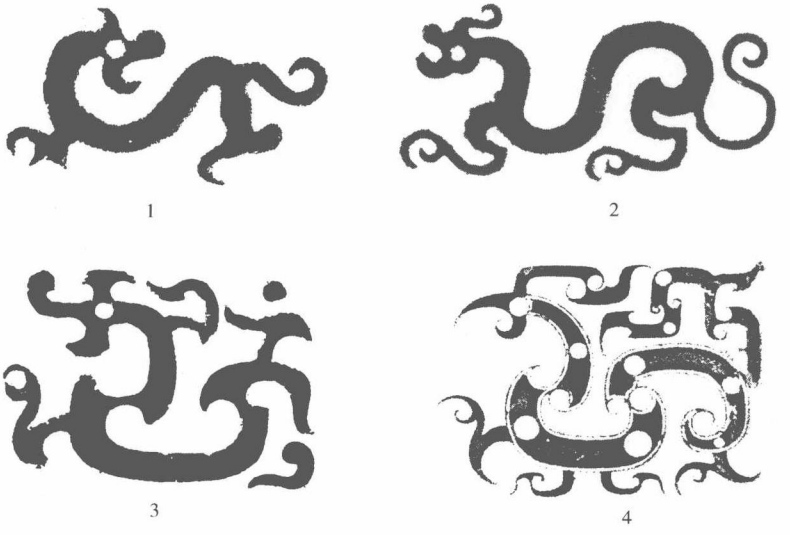


图 4.2－15 镶嵌式龙纹的演变

1. 下寺 M2：51 尊缶 2. 和尚岭 M2：66 器座 3. 曾侯乙墓 C97 鼎 4. 擂鼓墩 M2 方壶

出极强的一致性，如果说有一定区别的话，则是楚文化一些青铜器纹饰尚未见于曾国青铜器之中，这既有考古发现和材料的限制原因，也可能与曾国作为附庸国，青铜器纹饰种类较为单一相关。另一方面，曾侯乙墓青铜器广泛使用的镶嵌类纹饰，这与迄今所见楚文化青铜器也有相当的分别，这种现象当与曾侯乙的身份等级相关。在相同时期楚国王室墓葬中，相信有反映其等级的类似纹饰的使用。

第三节 铭 文

第二阶段曾国青铜器铭文属于第一至三期者共有 46 类次，其中属于礼器①类有 38 类次；属于曾侯乙墓中有铭青铜器 187 件，其后的战国中期青铜器铭文 3 个类次。这些青铜器中，明确为其他国家如陈国、楚国（楚王酓章镈）以及盛君青铜器 3 类次，另外，曾姬无卹壶和曾姬盘也不是曾国铸造的青铜器。这些青铜器铭文不能表达曾国青铜器铭文特征，它们将不被纳入曾国铭文的讨论范畴。上述铭文的基本情况，参见附表 6、附表 7。

曾国等楚文化系统的国家，其文字和青铜器一样，也深受楚文化影响，并形成与楚

① 春秋中期后青铜器已经出现日用品性质的容器，但曾国青铜器中日用品未见带铭文。因此这里仍然使用礼器概念。

国文字基本相同的特征①。从曾侯乙墓材料看，至迟在战国早期，曾楚文字已经基本属于同一体系②。但是，曾国青铜器铭文是否也如青铜器一样，在战国时期之前就已经同化于楚国青铜器铭文？或者曾国青铜器铭文在第二阶段表现出什么样的特征？

一　辞　例

第二阶段曾国青铜器铭文辞例中，兵器与礼乐器存在较大差异，兵器的情况在分期一章中已经有讨论，其铭文辞例一般与礼乐器有所不同，似乎已经形成了一个独立的系统。在礼器与乐器中，乐器铭文只见于曾侯乙墓，其款识性质的铭文与礼器铭文类型相同。

第二阶段曾国青铜器铭文辞例大体可分为五类，各类辞例在不同时期出现的类次如表4.3－1。

表4.3－1　　第二阶段曾国青铜器铭文辞例登记表

期别	Ⅰ	Ⅱ	Ⅲ	Ⅳ	Ⅴ
一	2	4	3		
二	2		4		
三	2		17	2	
四				47	38
五			2		
总计	6	4	26	49	38

各类铭文的概况如下：

第Ⅰ类：内容与第一阶段曾国青铜器铭文辞例完全相同，其构成也是包含纪时用语、作器方式、嘏辞等几类。可见此类辞例是对第一阶段的沿用。试比较第二阶段不同时期铭文：

第一期曾□□簠：

唯正□初吉丁亥，曾□□择其吉金，自作饋簠。其眉寿无疆，子子孙孙永宝用之。

第二期曾孙无谌鼎：

曾孙无谌自作飤鬲。眉寿无疆，子孙永宝用之。

① 黄锡全：《楚系文字略论》，《华夏考古》1990年第3期。

② 裘锡圭：《谈谈随县曾侯乙墓的文字材料》，《文物》1979年第7期。

第三期曾子⊠簠：

唯正月初吉丁亥，曾子⊠自作飤簠。子子孙孙永宝用之。

此类辞例在第一至三期各见2例，除上举各例之外，还见于曾季㚇臣盘、曾子原彝簠、曾子义行簠，它们的辞例及其构成与第一阶段铭文完全相同。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辞例的作器者均为带族氏称谓的“曾子”某①，凡以私名作器，则未见使用这类辞例。这可能说明“曾子”这些社会等级较高的贵族所作之器较多使用传统铭文方式。高等级贵族多使用传统器类，与此类似。

第Ⅱ类：辞例较第Ⅰ类简化，但仍然保留有第一阶段嘏辞特性。只见于80刘家崖，如盅鼎：“盅之登鼎，其永用之”。有的铭文甚至也有纪时用语，但方式较第一阶段铭文辞例略有改变，如盜叔壶：“择厥吉日丁，盜叔之尊壶，永用之”。

第Ⅲ类：出现于第一期，至第三期成为最常见辞例式样。此类辞例结构简单，均为某人之某器的格式，人名多为私名，如可盘：“可之行盘”，人名也有用族氏和职位称谓，如曾少宰黄仲酉鼎：“曾少宰黄仲酉之行鼎”。此类辞例的使用一直延续至战国中期，“邵”所作的两件礼器的铭文与此类铭文完全相同。

第Ⅳ类：为某人作時的形式，主要见于曾侯乙墓，凡47例，又第三期见2例，如曾侯郕簠：“曾侯郕作時”，又如曾嫚嬞朱姬簠：“穆穆曾嫚嬞朱姬作時”。

第Ⅴ类：为某人祚時用终的形式，只见于曾侯乙墓，共38例，均为“曾侯乙祚時用终”。

以上各类铭文分别反映出不同的文化背景。第Ⅰ类铭文是传统因素在青铜器铭文中的延续，此类辞例的源头始自西周晚期的周式青铜器铭文。第Ⅱ类铭文既保留有第一阶段铭文的嘏辞，又使用某人之某器的新的格式，反映出它的过渡特征，因此此类铭文只见于第一期。第Ⅲ类铭文是第Ⅱ类的继续简化形式，并成为春秋晚期及其后铭文的主流辞例，其格式简洁，文辞表达的性质明确。第Ⅳ类与第Ⅴ类铭文只见于曾国②，颇有特色，虽然这些铭文绝大多数见于曾侯乙墓，但由其使用于曾嫚嬞朱姬簠可见，此类辞例不仅仅局限于曾侯青铜器范围，而可能在曾国贵族青铜器中流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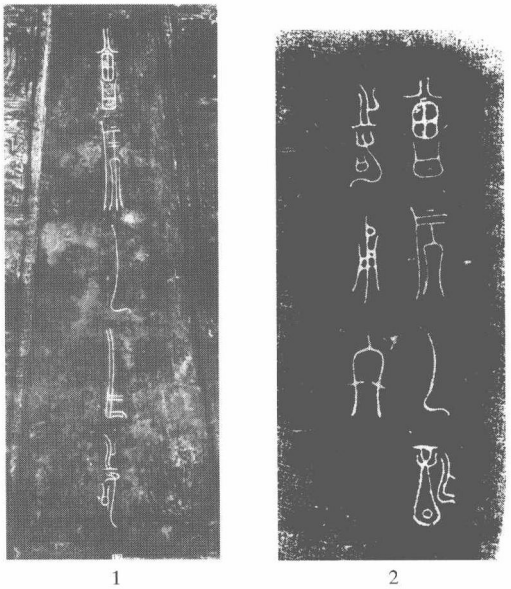
以下再看第Ⅳ类与第Ⅴ类铭文在曾侯乙墓青铜器中的具体情况（附表6）。曾侯乙青铜乐器中编钟、磬架、建鼓鼓座、鹿角立鹤③见铭文。除了楚王酓章镈钟之外的64件编钟，19件纽钟铭文只涉及乐律，无铭记；甬钟45件，既记乐律，也有铭记，甬钟

① 曾季㚇臣盘又称曾子季臣㚇盘，详见下文。

② 当然，由于除徐家岭铜器群之外属于战国早期的楚国高等级青铜器群发现不多，目前还很难排除此时期楚国青铜器铭文不使用这一辞例的可能性。

③ 鹿角立鹤是否为乐器，并无确切依据。这里采用立鹤为鼓座之说。参见方酉生：《有关曾侯乙墓的几个问题》，《武汉大学学报》（社哲版）1981年第6期。

全部铭记均为第Ⅳ类铸铭："曾侯乙作時"。鼓座铭文也是铸铭："曾侯乙作時"，而磬架、鹿角立鹤铭文均为第Ⅴ类"曾侯乙𠭯時用终"铸铭。曾侯乙青铜礼器可见铭文37类次，其中第Ⅴ类铸铭"曾侯乙𠭯時用终"共见32类次，主要分布在食器和水器上，酒器亦见4类次。此外，铸铭"曾侯乙作時"见1类次，刻铭"曾侯乙𠭯時用终"见4类次，它们均分布在酒器中。刻铭为青铜器铸后添加的铭文，刻铭所示器主往往与原来铸造青铜器的器主并不一致。曾侯乙墓青铜器酒器中较多刻铭，曾侯乙盘原有"曾侯遗之尊盘"，其后改刻为"曾侯乙𠭯時用终"。曾侯乙尊也为相同的刻铭，可见这一对装饰复杂的酒器原来都并非为曾侯乙所作。



1　　2

图4.3－1　曾侯乙青铜器不同的铭文

1. 曾侯乙编钟下1.1（《集成》287）　2. 曾侯乙簠铭文（《集成》4496）

在曾侯乙墓中，第Ⅳ类与第Ⅴ类铭文（图4.3－1）"曾侯乙作時"与"曾侯乙𠭯時用终"辞例大约只有繁简之别，并不表示含义的差别。曾侯乙编钟与磬架分别使用这两种不同的辞例，曾侯乙方尊缶铭文为"曾侯乙𠭯時用终"，而方尊缶的附件过滤器铭文为"曾侯乙作時"，说明两类铭文的性质相同。但在另一方面，"曾侯乙作時"与"曾侯乙𠭯時用终"的使用范围比较固定，在曾侯乙编钟中均作"曾侯乙作時"，在礼器如食器中多为"曾侯乙𠭯時用终"。两类铭文都使用特别的字形，如𠭯時二字，在"曾侯乙作時"铭文中，"作"字字形一概为常见的字形"[illegible]"，而在"曾侯乙𠭯時用终"铭文中，"作"字一般为增繁的字形"[illegible]"①。这两类铭文辞例与字形多不混淆，暗示它们之间存在明确的区别。目前我们不能确定，这种区别是辞例格式在使用年代上的变化，抑或有其他背景。

二　铭文的时代变化

1. 第一至第二阶段的变化

① 只有三环纽盖鼎（C.102）、联禁大壶（C.132）铭文的"作"字未增繁。

曾国青铜器铭文的时代变化大体与青铜器的形制变化接近。但青铜器铭文从文字的书写到铭文的铸前制作，有可能是游离于铸造青铜器的工匠系统之外。因此铭文的时代变化，未必完全与青铜器的形制变化同步。

反映铭文时代变化的因素包括多个方面，比如铭文形体、内容、排列方式、制作过程及方法等等。这些因素中铭文的形体和内容意义比较明确，前者是铭文的外在形式，后者是铭文的内在构成。以下我们仅从这两个方面观察曾国青铜器铭文的变化。

首先从铭文形体方面来看，西周晚期及其后的曾国金文，基本延续着宗周金文的写法，字形方正，线条比较平直规整，文字的排列多数比较整齐（图4.3－2，1）。这种情形到春秋早期偏晚阶段才开始发生一些变化，虽然有曾伯霥簠那样书体较规整而秀丽的铭文，但这时文字的字形和排列都趋向于随意（图4.3－2，2）。虽然文字材料不多，但我们似乎还是可以认为春秋中期这样随意的作风在进一步发展，曾子原彝簠（图4.3－2，3）、均川刘家崖墓葬盅组青铜器铭文都是这种散漫的风格，有些铭文和书体结构有时甚至比较扭曲，铭文还可见制作拙劣之处。不过，整个春秋早中期，曾国文字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因此在这一时期之前，我们还难以从字形上看出曾国铭文与中原周文化体系文字的分别。春秋晚期的曾国青铜器部分铭文仍然延续有一定的散漫之风（图4.3－2，4），但也有已经书体工整、作风一变的铭文（图4.3－2，5）。这种新的文字特征明显接近楚系铭文：字形狭长，线条均匀而宛曲，整体风格纤秀而趋于美术化。春秋晚期偏晚阶段曾国文字的纤细长体字形特征在曾侯乙墓青铜器铭文中更有充分的体现（图4.3－2，6）。曾国青铜器铭文也有少数采用鸟虫书，这是金文美术化的极致，它发生在曾国大约是在春战之际如曾侯昃戈，在曾侯乙墓编钟和青铜戟的铭文中都有一定数量。战国中期青铜器分析不多，从邵器铭文看，似乎与战国早期变化不大。

以“曾”字为例，图4.3－3显示出曾国青铜器铭文字形的变化。同时，在这一变化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曾”字存在的一个增繁趋向。

如果从曾国青铜器铭文字形来观察其时代变化，大体可以将铭文的发展划分为两周之际前后、春秋中期前后、春秋战国之际前后三个不同阶段。可观察到的文字发展轨迹，似乎较其他青铜器因素略为滞缓。

再看铭文内容的变化。受时代和社会等级等局限，曾国青铜器铭文内容基本都是以记载作器和祝愿为主要内容，很少有纪事性内容。在作器方式上，绝大多数铜器都是自作器，也见少量的媵器。此前我们已经以辞例的方式分阶段讨论了曾国青铜器铭文构成及其在各时期的变化。如果将曾国青铜器铭文内容作从早至晚的通盘观察，铭文内容的时代变化十分清晰。各时期所流行句式如下：

两周之际前后，铭文可能由如下部件构成：A、纪时用语。B、作器方式，某某自作某器，或某某用（择）其吉金自作某器。C、嘏辞，如“眉寿黄考”或“子子孙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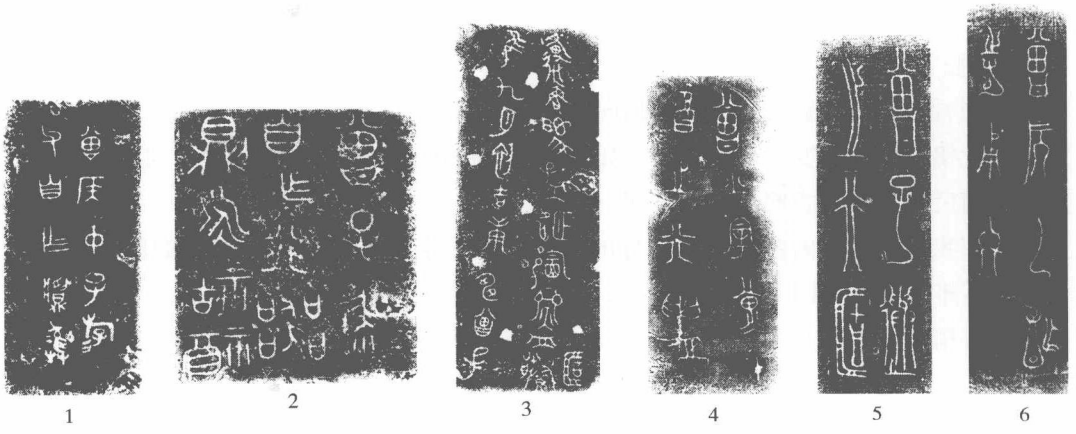


图 4.3－2　曾国青铜器铭文在不同时期的字形变化

1. 曾侯仲子斿父鼎　2. 曾子尿簠　3. 曾子原彝簠　4. 黄仲匜　5. 曾子遐簠　6. 曾侯乙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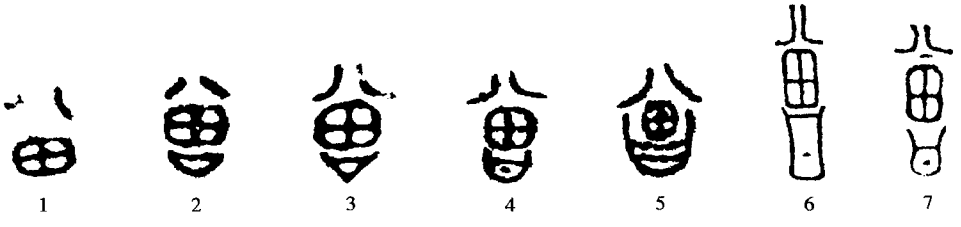


图 4.3－3　“曾”字字形在不同时期的变化

1、2. 曾伯文簋　3. 曾侯仲子斿父鼎　4. 曾孟嬭谏盆　5. 曾子原彝簠　6. 曾子遐簠　7. 曾侯乙鼎

永宝用享”等。这些部件核心为作器方式 B，再加入 A、C 构成繁、简不同的铭文。如简式：“曾仲斿父自作宝甫”，或繁式：“唯五月既生霸庚申，曾仲大父蠢廼用吉鋚，叙乃雒金，用自作宝簋。蠢其用追孝于其皇考，用赐眉寿黄耇霝终，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享”。以上不同程度的繁、简格式，在第一阶段第一至三期铭文中均见。因此在第一阶段时间内，铭文内容的时代变化不明显。由于铭文资料发现较多，这一结论是比较明确的。

春秋中期至春秋晚期，铭文辞例风格大变，铭文内容仅为简短的作器方式，即某人之某器，一器铭文可短至 4 字：“放之行鼎”。在较早和较晚时期，铭文内容又分别出现了过渡形式。春秋中期一些铜器仍然保留有嘏辞，但作器方式的辞例是新的格式，如：“盅之登鼎，其永用之”。而至春秋晚期偏晚时期，曾嫚嬗朱姬簠、曾侯郕簠出现了战国早期的格式，即为某人作。曾侯郕簠的绝对年代应当已经进入了战国早期。战国早期，曾侯乙墓青铜器铭记式铭文均为“曾侯乙作時”、“曾侯乙祚時用终”。这种格式可能只是在较短时期较小范围内流行，但这种辞例是否只是曾国独有而不见于楚国青铜

器，目前还难以确定。战国中期铭文格式可能又回归到春秋晚期某人之某器形式，如："邵之御盨"。当然，战国早中期铭文材料有限，目前还难以作出明确的判断。

总的看来，曾国铭文内容总的趋向是结构简化。各时期句式和辞例都比较规范和稳定，因此铭文格式的变化较为缓慢。如果将铭文格式总结为阶段性变化，则可归结为两周之际前后、春秋中晚期、战国早期三个阶段。

尽管我们对铭文内容变化所划分的阶段与铭文字形风格的变化划分的阶段大体近似，但不难发现，曾国青铜器铭文字形的变化与铭文格式的变化并不同步，铭文字形的变化频率稍快，而铭文格式变化较为缓慢，同一铭文辞例所使用的时限较长。而如果同青铜器形制变化相比，铭文的变化频率还较青铜器更为迟缓一些。

2. 曾侯遗及曾侯郕青铜器铭文的早晚关系

曾侯乙墓出土青铜器中有带曾侯遗和曾侯郕铭文的青铜器，这两位器主当然早于曾侯乙，但他们之间孰早孰晚则不明确。如果通过比较曾侯遗和曾侯郕铭文特点，或者可以窥知他们早晚关系的一些线索。

迄今所见曾侯遗及曾侯郕青铜器分别如表 4.3－2 和表 4.3－3。这些青铜器就类别而言分属兵器和容器两大类。

表 4.3－2　　曾侯遗青铜器列表

来源	器类	数量	铭文	铭文著录
曾侯乙墓	戟	9	曾侯遗之行戟	《集成》11180、11181
曾侯乙墓	戟	4	曾侯遗之用戟	《集成》11178、11179
曾侯乙墓	盘	1	曾侯遗之尊盘	《曾侯乙墓》图 129
传世品	簠	2	曾子遗之行簠	《集成》4488、4489
传世品	缶	1	曾子遗之行缶	《集成》9996

表 4.3－3　　曾侯郕青铜器列表

来源	器类	数量	铭文	铭文著录
曾侯乙墓	戈	5	曾侯郕作時	《集成》11094、11095
曾侯乙墓	戈	2	曾侯郕之用戈	《集成》11174
曾侯乙墓	戟	3	曾侯郕作時	《集成》11097
曾侯乙墓	戟	6	曾侯郕之行戟	《集成》11175、11176、11177
曾侯乙墓	戟	2	曾侯郕之戟	《集成》11098
曾侯乙墓	戟	3	曾侯郕	《集成》10981
曾侯乙墓	殳	3	曾侯郕之用殳	《集成》11567
东风油库 M3	鼎	1	曾侯郕之飤鼎	《曾国青铜器》第 364 页
私人收藏	簠	1	曾侯郕作時	《曾国青铜器》第 375 页

我们先看曾侯遐和曾侯郕铭文辞例是否存在变化。周代青铜器铭文的辞例格式，兵器往往与容器有所不同，因此我们需要将曾侯遐和曾侯郕的兵器与容器铭文区别对待。在曾侯遐和曾侯郕兵器中，曾侯遐只见戟，其辞例格式为“曾侯遐之行戟”或“曾侯遐之用戟”两种。曾侯郕的兵器有戈、戟、殳三种，辞例格式也较多样，除了戟上的“曾侯郕”铭文系不完整的辞例、可忽略不计外，常见铭文一类为“曾侯郕之用戈”、“曾侯郕之行戟”等近似于曾侯遐兵器的铭文辞例，实际上，曾侯乙兵器也多见曾侯乙之用戈或戟这样的辞例，类似辞例的铭文还见于春秋中期以来的楚系兵器之中，因此某之用（行）某器是春秋晚期前后流行的兵器铭文辞例。曾侯遐和曾侯郕此类兵器铭文难以判断出辞例的早晚之别。

值得注意的是，曾侯郕戈与戟还各有一类铭文为“曾侯郕作時”，相同铭文也见于曾侯郕簠。这种铭文辞例在兵器和容器中通用，说明这是曾侯郕颇常用的铭文辞例。如前所述，曾侯乙全部甬钟和鼓座等青铜器铭文都作“曾侯乙作時”，而大部分容器铭文则为“曾侯乙祚時用终”，因此结合曾侯郕和曾侯乙二者的铭文可知，某某“祚時用终”辞例是某某“祚時”的发展。与此相反，曾侯郕较早制作的曾侯郕鼎铭文作“曾侯郕之飤鼎”，这种某之某器的辞例是春秋晚期常见格式，春秋晚期曾国青铜器多组铭文辞例作如此格式，曾侯遐簠、缶铭文分别为“曾子遐之行簠”、“曾子遐之行缶”，也是春秋晚期流行格式。这样，曾侯郕青铜器更接近曾侯乙青铜器而应当稍晚于曾侯遐所作青铜器。

再从字体角度看，曾侯遐、曾侯郕青铜器铭文字体都各有一些不同，这些差异与曾侯乙青铜器铭文可相互比勘。以这些曾侯青铜器铭文共有的“曾侯”二字为例①，其类别可分四型（图4.3－4）：

A 型：字形不甚规整，近似春秋中期青铜器铭文那种漫漶之风。见于曾侯遐戟及曾子遐缶。

B 型：字形方正，其中竖笔较夸张。多见于容器铭文中，尤以曾侯乙所作青铜容器铭文多见。曾侯郕容器少见，此类字形不够典型。

C 型：字形较规整，“曾”字笔道夸张地卷曲，带有装饰意味。典型者见于曾侯郕和曾侯乙青铜器中。

D 型：字形近似鸟篆书风格，与 C 型字有渊源关系。字体瘦长、笔道纤细。数量较少，见于曾侯乙戟和曾侯郕簠，两器中“曾”字字长分别为 3.2、4.5 厘米，远大于一般“曾”字约 1.5 厘米的长度。

从以上分类可见，曾侯郕字体更加接近曾侯乙，如 C 型字的典型形式以及 D 型字

① 曾子遐器亦计入曾侯遐铜器。

只见于曾侯郕和曾侯乙青铜器中。曾侯遝则有较早时期的字体特征，且 A 型字不见于曾侯郕和曾侯乙青铜器中。

不过如上所述，曾国青铜器铭文在辞例和字体方面的变化频率较为缓慢，仅仅根据铭文特征来排定曾侯遝与曾侯郕年代的早晚，还需要其他方面的依据。

	A	B	C	D
曾侯遝	曾侯遝戟 《集成》11179－2	曾子遝簠 《集成》04489		
曾侯郕		曾侯郕戟 《集成》11175－1	曾侯郕戟 《集成》11176－1	曾侯郕簠 《曾国青铜器》
曾侯乙		曾侯乙鼎 《集成》02295－1	曾侯乙戈 《集成》11168	曾侯乙戟 《集成》11173－2

图 4.3－4　曾侯遝、曾侯郕、曾侯乙之“曾侯”字体比较

三　铭文的异常现象

如上一章《铭文》一节所述，第一阶段曾国青铜器铭文存在较多的不规范乃至谬误之处，其表现在：一些铭文总体布局不作规整的长方形，一些铭文不作常见的左行排列而是右行，常见反书文字，出现语句、文字排列错误，出现漏字错误等等。

第二阶段曾国青铜器同样存在第一阶段铭文类似问题，且较为常见。这一时期铭文仍然存在右行和反书现象，如在第一至三期铜礼器铭文中，行款右行的现象凡7个类次可见，它们多见于第一期，也存在于第三期如曾子⊠簠。即便在曾侯乙墓青铜器铭文中，右行与反书的铭文也不少见（附表6）。第二阶段铭文的布局似乎也无意识规划为长方形，“曾侯乙祚時用终”7字如果作两行排列，则第一行末尾的“祚”字对应的第二行为空白（图4.3-1，2），此类现象在曾侯乙墓青铜礼器中常见，在视觉上颇为异常。

第二阶段曾国青铜器铭文一般句式简单，许多铜器铭文只有4-7字，铭文内容只是标识器主和器名，或者仅仅标明器主，如“可之行盘”、“曾侯乙祚時用终”等。这种简单的铭文辞例，使这一时期铭文基本没有如第一阶段铭文句法混乱的现象。但在本阶段的第一期铭文文字多草率，这一时期铭文行款也较为多见随意的情况。罗山高店出土的曾子季关臣铜器群，铭文多右行，文字或反书，器主称谓也各不相同：

簠1：曾子季关臣

簠2：曾子季关

盘：　曾　季关臣

匜：　曾　　关臣

曾国贵族称谓中见曾子某、曾仲子某，但罕见曾子与曾仲、伯等混称者。曾关臣这些很难理解的称谓现象，可能与铭文制作不规范的原因有关。

第二阶段曾国青铜器铭文确有一些制作上的不规范甚至错误现象。东风油库M2出土的簠、方壶、盘、匜均为“可”所作之器，一般铭文均作常见的阴文，但方壶铭文则为东周时期罕见的阳文，字体也与“可”所作其他铜器铭文有异。第二阶段铜器也存在漏铸铭文现象，曾子义行簠器铭“曾子义行自作飤簠，子孙其永保用之”，盖铭则漏一“自”字。80刘家崖出土的两件盜叔壶，铭文分别为（图4.3-5）：

壶1：择厥吉日丁，盜叔尊壶，永用之。

壶2：择厥吉日丁，盜叔之尊壶，永用之。

壶1“尊壶”之前“叔”字作铭文时遗漏，补加在铭文之侧。尽管如此，铭文还是漏铸了“之”字，即“盜叔尊壶”辞例应当同于壶2，为“盜叔之尊壶”。

曾侯乙墓青铜器铸造颇精，但铭文的制作则存在较多问题，例如不少铭文出现缺笔现象，大约是因为铭文在铸造之前作阳文，容易损毁之故。曾侯乙盖豆（C194）铭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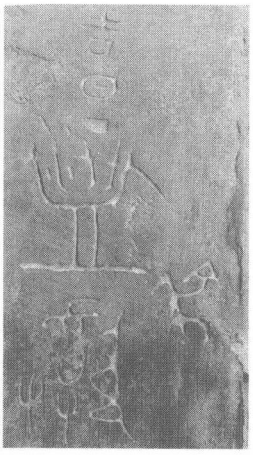


图 4.3－5 盠叔壶铭文局部（其中“叔”字侧加于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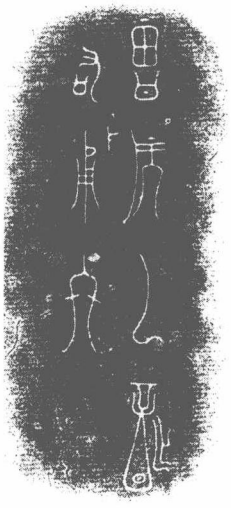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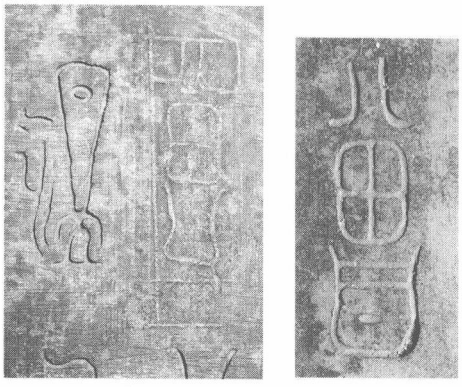


图 4.3－6 曾侯乙盖豆铭文笔画缺失和位移现象（《集成》4670）



1 2

图 4.3－7 曾侯乙墓青铜器中特殊的“曾”字

1. 曾侯乙折盘豆（C196）的阳文“曾”字
2. 曾侯乙盘的“曾”字

“曾”、“時”均缺笔画（图 4.3－6），其中“時”字部分“乍”笔位移至“用”侧，它们大约是铜器铸造之前铭文在陶范上受到破坏所致。曾侯乙一件浅盘豆（C196）在阴文“终”下、“詐”侧另有一倒置的阳文“曾”（图 4.3－7，1），此“曾”字下部尚缺横笔，属于未完成的铭文，这一特别现象暗示该铭文经过制作被放弃、再重新开始的过程①。

曾侯乙盘（C.38）铭文一周 7 字：“曾侯乙詐時用终”，此铭文系根据曾侯遇的铭文改刻，原铭为曾侯遇所铸，其中“曾”字特别（图 4.3－7，2）：其下“口”有二道横笔，与正常的“曾”字下部一横笔不同，曾侯乙墓中“曾”字出现 200 余次，均不见这种多笔现象，显然这个多余的一划并非增繁所致，而是一个误笔。

第二阶段曾国青铜器铭文的异常现象背景可能比较复杂。某些异常在当时的楚国青铜器铭文中也有发生，淅川下寺与徐家岭墓地楚国青铜器铭文也存在有类似的反书、右行、铭文布局不是长方形的现象，只是数量极少。而上述铭文制作方面的瑕疵，更罕见于楚国青铜器中。看来和第一阶段一样，曾国在铭文制作方面存在一些技术障碍，铭文制作的水平相对较低。

① 张昌平：《商周青铜器铭文的若干制作方式》，《文物》待刊。

四　铭文特点

战国早期的曾国青铜器铭文趋同于楚系文字的特征①，但完成这一趋同的过程，大约从春秋中期就已经开始了。至第三期的春秋晚期，可以看到曾国和楚国青铜器铭文从字体到辞例的共性。但同时，曾国青铜器铭文也一直可见一些个性因素。这种共性和个性构成的相似性是第二阶段曾国青铜器铭文的特点。如果将曾国青铜器铭文与楚系青铜器铭文作一具体比较，其相似性如下：

1）相似的铭文句式。春秋中期以后曾、楚铭文均趋于简洁，至春秋晚期最为流行的铭文句式是某人之某器寥寥数字。试比较：

曾国铜器	下寺楚墓铜器
连迁之御鼎	倗之飤鼎
曾子遗之行缶	郘子倗之尊缶
曾仲之孙𠦪𢽾用戈	王子午之行戟

曾楚两国使用这种句式在春秋中期都已开始出现，如曾器有“曾兴臣/之锜”，楚器有“楚王酓审之盖”（《近出》1022）。但其后两国铜器在自铭上略有区别，楚器多“飤鼎”、“鯀鼎”、“尊缶”、“盥盘”等界定器物功能或性质之类用词，而曾器使用“行鼎”、“行缶”、“行盘”等宽泛的用词频率较高。某某“之行”某器的辞例使用频率在曾国尤高，东风油库 M1、M2 黄仲、可两人所作 10 件有铭铜器全部为这一辞例。此外，曾国某人“作時”、“詐時用终”等辞例也不见于楚系青铜器。但曾国青铜器多数自铭可在楚国铜器中找到相同或相似者，如春秋晚期及以前曾国铜鼎自铭有“行鼎”、“行升”、“飤鼎”、“飤鯀”、“脰鼎”、“御吉”等类，只有“御吉”尚未见于楚国青铜器。

2）常用相似的辞例。李学勤先生认为春秋时期南方吴、越、徐、陈等国铭文的一个特征是多见“某人之孙、某人之子”等名号②。其实这一特征在曾、楚同样存在，如曾大工尹季怠自称“穆侯之子、西宫之孙”，类似称谓如“曾仲之孙”、“曾孙”定、“曾孙”无谌等。楚国铜器如下寺楚墓多次见“楚叔之孙倗”。又如，春秋早期以来，

① 裘锡圭：《谈谈随县曾侯乙墓的文字材料》，《文物》1979 年第 7 期。黄锡全：《楚系文字略论》，《华夏考古》1990 年第 3 期。

② 李学勤：《春秋南方青铜器铭文的一个特点》，《吴越地区青铜器研究论文集》，两木出版社，1997 年。

曾、楚金文都有多用“子子孙孙永保用之”、“永用之”之类嘏词的习惯。曾国青铜器一些辞例如曾伯霥簠“哲圣元武，元武孔致”、周王孙季怠戈“孔臧元武”、曾子倗鼎“惠于刺曲，㑹屖（迟）下保，……，事于四国”等，也应用在楚国铜器中——下寺楚墓王孙诰钟铭文有“惠于政德，淑于威仪，㑹恭舒屖，肃哲臧武，闻于四国”，王孙遗者钟“肃哲圣武，惠于政德”等。另外，从使用率较高的辞例“择其吉金”、“择厥吉金”等，我们更可以看到曾、楚之间始自春秋早期的文字关联，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下一章中再作专论。

3）相似的文字习惯。这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一些器物自铭构成曾国和楚系青铜器相同的、作为专名的字，如“盖”（黄仲方壶、可方壶）、“脰”（曾孙定鼎、曾太师奠鼎）、“鬲”（曾者子鼎）、“盘”（可匜）等。二是出现一些字形和写法特殊的字，关于这一点，黄锡全在论及楚系文字特征时，列有楚与曾国文字的特殊字形，可作参证①。三是在春秋晚期后，曾国也出现楚系文字中多见的鸟虫书，同楚国铜器一样，其应用范围也主要集中在戈戟类兵器上。

4）文字中体现出来的文化的相似性。例如春秋中期以来曾国青铜器中所出现的职官，都可以发现他们与楚系国家的联系。如“曾少宰黄仲酉”，“少宰”，职官名，金文首见，而据文献，楚设有少宰，如“少宰如晋师”（《左传·宣公十二年》）。“大工尹”为曾国职官名，由鄂君启节可知，楚国设有相同的官位。某尹为楚国职官常见的称谓，曾国也还有“曾都尹”一职。

5）两者还同时继承西周时期以来某些宗周文化因素并保持到春秋晚期前后，形成一种“滞后”现象。如前述曾国铜器在两周之际常用“鼒彝”辞例，而春秋晚期楚国青铜器，如淅川下寺M2王子午鼎、淅川和尚岭M2佻子受钟还延用“鼒彝”。前述曾国青铜器在春秋中期及其后沿用两周之际前后铭文辞例，在楚国青铜器铭文中也有相同的习惯，例如：

春秋中期以邓鼎：“唯正月初吉丁亥，楚叔之孙以邓，择其吉金，铸其鐈鼎，永宝用之。”（《近出》348）

春秋晚期：“唯正月初吉丁亥，楚屈子赤角媵仲芈璜飤簠，其眉寿无疆，子子孙孙永保用之。”（《集成》4612）

战国早期楚王酓章镈钟：“唯王五十又六祀，返自西阳，楚王酓章作曾侯乙宗彝，奠之于西阳，其永持用享。”

这种带“唯正月初吉丁亥”等纪时用语、“子子孙孙永保用之”等嘏辞的传统辞例，在东周时期的使用都相当规范。东周时期其他文化如越、晋、齐等国青铜器，也可

① 黄锡全：《楚系文字略论》，《华夏考古》1990年第3期。

见相似的传统因素。这种文化现象，与我们在《器形与器类》一节中所述的“复古”之风相同，它们都是对周文化传统的一种保留。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传统因素多见于较高级别的铜器群之中，似乎礼制乃至思想意识较为保守的社会阶层，往往总是地位较高的贵族阶层。

第四节　铸造工艺①

对第二阶段曾国青铜器铸造工艺的研究，过去主要集中于曾侯乙墓青铜器。曾侯乙墓发现后，来自不同领域的学者对其出土青铜器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墓葬发掘报告对青铜器的文字描述中，这些工艺技术的研究成果已有所反映②。同时，学者们还主要就曾侯乙尊与盘的失蜡法工艺、曾侯乙编钟的铸冶技术以及红铜纹饰铸镶法进行了较多的讨论。这些研究不仅对曾国乃至整个战国早期及前后青铜器工艺水平有了大体的了解，更推动了学术界对中国古代青铜器铸造工艺研究走向成熟③。

曾侯乙墓之外的曾国青铜器未见工艺方面的报道。笔者对包括曾侯乙墓在内的第二阶段曾国青铜器作了逐件的实物观察④，这里将其保存大体完整的198件曾国青铜器的铸造工艺列为附表（附表8）⑤。这是本节研究的基础。

第二阶段曾国青铜器铸造工艺特征，可以比勘特征类似的楚国及楚系青铜器。学术界对于楚国青铜器铸造工艺的研究开展较多，一些重要的楚墓出土青铜器如淅川下寺、当阳赵家湖、荆门包山、淅川和尚岭与徐家岭都有专门的铸造工艺研究报告，铸造工艺研究也因此不断深入。下寺楚墓青铜器的出土，吸引了一批工艺研究专家，其研究成果很快以下寺M1青铜器为研究对象作了发表，并提出下寺M1升鼎和盏附件使用了分铸

---

① 关于本节涉及的铸造工艺方面词汇和表述方式，在《前言·几点说明》中有简要的说明。

② 《曾侯乙墓》是我国少数较早在青铜器描述中逐件叙述铸造工艺的发掘报告，不足的是报告对一些铸造工艺术语的使用以及工艺特征的理解有误。例如报告中所谓“芯撑”，应该是指浇铸器体时为焊接预铸的榫头。参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文物出版社，1989年。

③ 按照笔者的理解，20世纪70年代后至80年代初对殷墟妇好墓和曾侯乙墓出土青铜器的铸造工艺研究、复原试铸等，极大地提升了大陆学者铸造工艺研究的水平。这些研究成果，可参华觉明：《中国古代金属技术——铜和铁造就的文明》第四、五、六章，大象出版社，1999年。

④ 对于战国早期之前的曾国青铜器工艺，参照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曾国青铜器》，文物出版社，2007年。笔者文中会引用对曾侯乙墓和擂鼓墩M2青铜器以及一些东周时期楚国青铜器的观察，以比较说明一些工艺特点，不另注。

⑤ 表中关于曾侯乙墓青铜器的一些工艺的理解与曾侯乙墓发掘报告有所不同，不另注。罗山高庙青铜器群工艺参见列表，但该器群除簠、匜表现为第二阶段特征外，其他器工艺与第一阶段青铜器相同。因此本节的工艺总结和讨论不涉及该器群。

焊接、镂空纹饰采用了失蜡法技术①。在其后正式的发掘报告中，赵世纲主要就鼎、禁和钟的铸造工艺，进一步阐述了各种连接技术和失蜡法技术在这些器类中的运用②。由此，我们可基本了解春秋中晚期楚国青铜器分铸连接的工艺技术。吴坤仪注意到赵家湖楚墓青铜器较多使用分铸法③，但研究报告对一些附件的连接技术的理解则是错误的。例如将焊接（JM9：11 盏捉手）和先铸（ZHM8：2 鼎足）技术作为浑铸技术处理等等。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学术界对楚国青铜器工艺技术的理解已较成熟，李京华对包山楚墓出土青铜器以连接技术和芯撑为主要对象进行了考察④，他在随后对淅川和尚岭和徐家岭楚墓出土青铜器的工艺研究中，继续在这一方面作出了强调⑤。李京华的研究使我们对战国时期楚国青铜器的铸造工艺认识大致明晰。

东周时期其他一些铜器群铸造工艺方面的研究，可以让我们对这一时期铸造技术变化有更好的理解。郭宝钧对新郑郑公大墓铜器群的研究，强调了器群所开创的分铸技术风格及其意义⑥，他还对楚系的寿县蔡侯墓青铜器进行了观察。万家保对辉县及汲县出土铜鼎的研究，注意到鼎的附耳和鼎盖环等大量采用的先铸法⑦。以上学者的研究，使我们对于曾国青铜器工艺水平的认识，可以站在楚系文化和中原文化等不同层面来进行评估。

一 主要器类的基本工艺

1. 盖鼎

第二阶段曾国青铜盖鼎腹范范型有二分（图 4.4－1，1）、三分（图 4.4－1，2）、四分（图 4.4－1，3）不等。但大多数鼎仍然是传统而规整地三分腹范，其下接圆形底范。二分和四分范型的鼎只见于第二、三期，体现了这一时期范型的多样化特征。

---

① 汤文兴：《淅川下寺一号墓青铜器的铸造技术》，《考古》1981 年第 2 期。

② 和《曾侯乙墓》一样，下寺报告中也有少数工艺方面的用词问题，其“后铸法”即现今所谓“先铸法”，其“先铸法”实指后铸。另外，报告中似乎将模印纹饰痕迹作为范缝处理了。参赵世纲：《淅川下寺春秋楚墓青铜器铸造工艺》，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淅川下寺春秋楚墓》附录二，文物出版社，1991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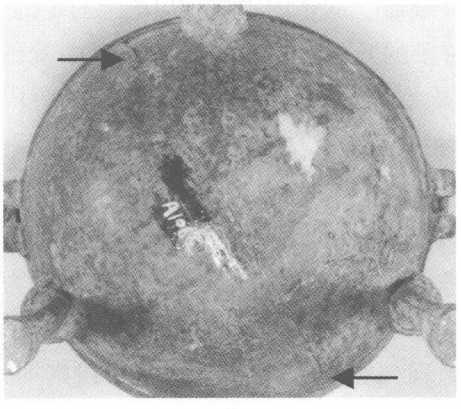
③ 吴坤仪：《当阳赵家湖楚墓铜器铸造工艺》，湖北省宜昌地区博物馆等《当阳赵家湖楚墓》附录二，文物出版社，1992 年。

④ 李京华：《包山楚墓青铜器制造技术的初步考察》，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墓》附录五，文物出版社，1991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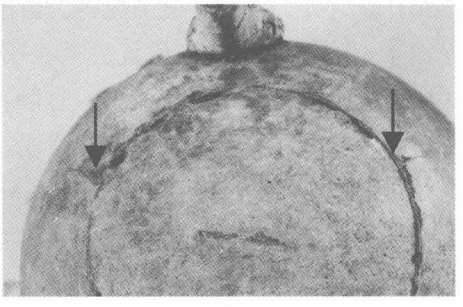
⑤ 李京华：《淅川和尚岭楚国青铜器与编钟的铸造技术》，《中原古代冶金技术研究》（第二集），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 年。黄克映、李京华：《淅川和尚岭、徐家岭楚墓青铜器铸造技术》，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淅川和尚岭与徐家岭楚墓》附录二，大象出版社，2004 年。

⑥ 郭宝均：《商周青铜器群综合研究》之《东周初年及春秋时期铜器群》，文物出版社，1981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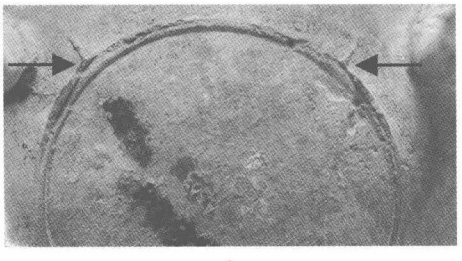
⑦ 万家保：《辉县及汲县出土东周时期青铜鼎形器的铸造及合金研究》，《大陆杂志》第 50 卷第 6 期，1975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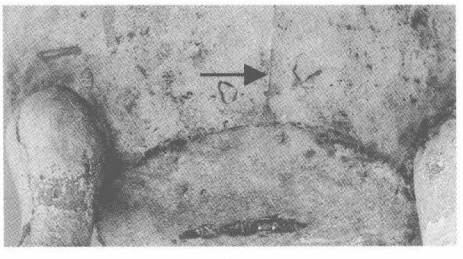
1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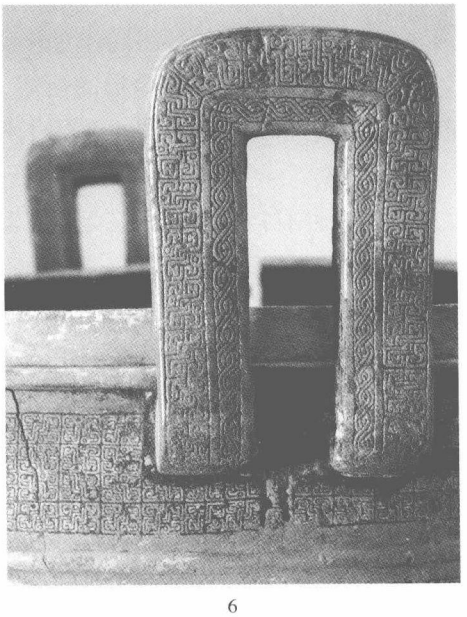


3



4

5



6

图 4.4－1　第二阶段曾国青铜鼎铸造工艺

1. 76 义地岗放鼎的二分腹范范缝　2. 汪家墓曾孙定鼎的三分腹范范缝　3. 75 刘家崖连迁盖鼎的四分腹范范缝　4. 八角楼采集平盖鼎腹范范缝与先铸的足错开　5. 八角楼墓葬蟠虺纹鼎浑铸的附耳　6. 东风油库 M3 曾侯郾鼎先铸的附耳

除升鼎之外，鼎足一概为先铸，由于这一特征，腹范的范缝相应的都与足的位置错开（图4.4－1，4），这一位置关系在第一阶段的几件鼎足先铸的青铜器中就已明确。鼎耳在第二阶段第一期仍然像第一阶段青铜鼎一样为浑铸（图4.4－1，5），耳与器腹之间同样设芯范，但器耳不再带有圆梗。这种过渡的形态在新郑郑公大墓青铜器中也有所见①。因此在不久后的第二期，耳也一概为先铸（图4.4－1，6）。这样，第二期及其后，盖鼎的耳、足均为先铸（图4.4－2，1），成为鼎类铜器铸造工艺最为突出的特征。

盖顶之上的附件情况也比较复杂。春秋晚期之前盖顶多设捉手，多数捉手为焊接，但76义地岗放鼎捉手为先铸（图4.4－2，2），显然是受到鼎类器附件先铸技术的影响。鼎盖、腹的环纽也都是先铸（图4.4－2，3），至第四、五期的兽形纽则均为焊接（图4.4－2，4）。但盖中央的桥形纽情况不明。

先铸的鼎足外范多数是左右对开，曾侯乙墓鼎足还将铸造铸足的浇口设在足端（图4.4－2，5）。鼎耳的外范也都是内外两侧对开的双合范，但外范范型有两种，一种是耳孔处器壁不闭合，即耳内与耳孔之间可能不必设芯范，如东风油库M1曾少宰鼎（图4.4－2，6）、曾侯乙墓出土各种鼎等，这样，一耳共用范3块。另一种范型是耳孔处器壁封闭，器耳和耳孔处必须各自设芯范，即一耳共用范4块，如76义地岗放鼎（图4.4－3，1）。先铸的环纽同样对开合范，纽内应当不设芯范。

除了盖鼎之外，甗如作鼎形的鬲体，则足先铸（图4.4－3，2）。曾侯乙墓出土的三足匜、匜鼎、小口鼎等鼎足也采用了先铸法，同样是受鼎形器工艺的影响。

2. 甗、鬲

甗和鬲这种有裆和足窝的三足器，其足必须浑铸，因之范型仍然多为3－△＋1式，其底范作弧边三角形。这与第一阶段甗与鬲范型大体相同，寿县蔡侯墓鬲也作如此分范②，说明鬲形器因其简单的铸型而时代变化不大。但鬲也有不设底范的，曾侯乙墓出土的9件带扉棱鬲，三条腹范范缝汇集于器底（图4.4－3，3），作商周之际及前后鬲那样的“Y”形，这些鬲还有一个特别设置，即将范缝汇集处设为冒口，浇口则设在足端。擂鼓墩M2的9件小鬲中有3件范型特别，鬲外范在中腹水平分范，上部外范2块，下部及裆部共1块外范（图4.4－3，4、5）。

3. 升鼎、鼎形器、盏、三足盘

这些圜底或平底的三足器结构与盖鼎接近，范型也与鼎大体相同，多为三分腹范，器底设一圆形底范。但和盖鼎的不同之处是，升鼎和盏等类器的足均为榫式焊接。这些器的耳也多为焊接，少数横耳如曾侯乙三足盘也像鼎耳一样先铸，但年代较早的80刘家

① 郭宝均：《商周青铜器群综合研究》之《东周初年及春秋时期铜器群》，文物出版社，1981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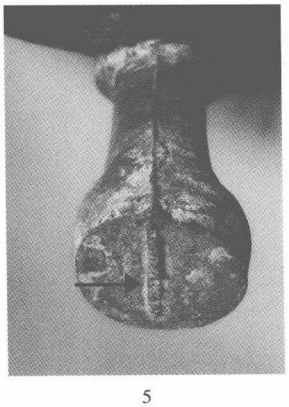
② 郭宝均：《商周青铜器群综合研究》图版69－5，文物出版社，1981年。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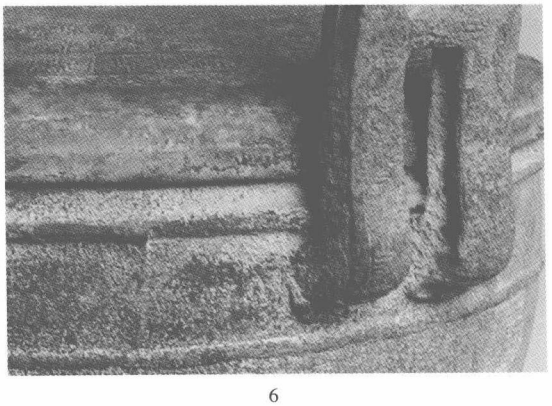
2

3

4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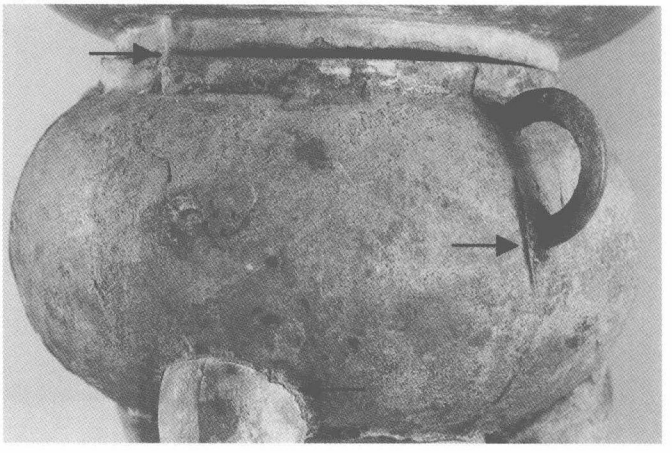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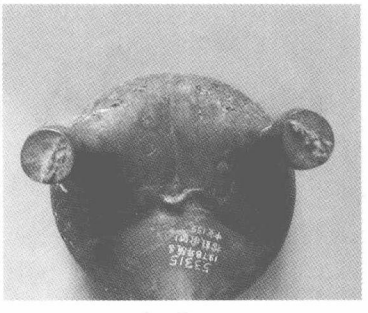
图 4.4－2　第二阶段曾国青铜鼎铸造工艺

1. 汪家墓曾孙定鼎先铸足、耳　2. 76 义地岗放鼎先铸捉手　3. 75 刘家崖连迁盖鼎先铸环纽　4. 曾侯乙墓 C101 牛纽盖鼎兽纽焊接于盖　5. 曾侯乙墓 C101 牛纽盖鼎足部浇口　6. 东风油库 M1 曾少宰鼎附耳的范型

1



2



3

4

5

6

7

8

图 4.4－3　第二阶段曾国青铜器铸造工艺

1. 76 义地岗放鼎耳间设芯范情况　2. 季氏梁云纹甗先铸的足、甑与鬲体的结合　3. 曾侯乙 C159 鬲腹范汇集于底部　4. 擂鼓墩 M2 鬲腹范与底范在腹部结合　5. 擂鼓墩 M2 鬲腹部水平分范　6. 80 刘家崖洛叔鼎浑铸的耳和焊接的足　7. 擂鼓墩 M2 方座簋范缝由腹部延至方座　8. 擂鼓墩 M2 方壶范缝在四角

崖鼎，耳仍然像同时期鼎一样浑铸（图4.4－3，6）。

4. 方座簋、簠、方豆、方壶、圆壶、缶、盥缶

这些圈足器在器形上包括方体（或长方体）和圆体两类，一般来说，方体器用四分范，底范长方形或方形。而圆体器腹范三块，底范圆形。但两类器又都有一些变化。一些方形器范型简化，如东风油库M1、M2方壶素面无纹，范型作二外范对开。圆体器体形较大时，则一周四分腹范，如曾侯乙大缶。

同时，饰背带纹的方壶和圆壶，腹范纵向的范缝对应于背带纹中央，这与第一阶段背带纹方壶分范方法一致。另外，这些方壶和圆壶、曾侯乙大缶①采用了水平分范铸造。但曾侯乙方座簋是否水平分范，则难以定论。擂鼓墩M2方座簋腹、座不仅浑铸，而且未采用水平分范（图4.4－3，7）。

擂鼓墩M2方壶铸造简化，该方壶既未水平分范，纵向的范缝也不像其他方壶设在中部背带纹处，而是如其他方形器设在四角（图4.4－3，8）。晚一些时候的曾姬无卹方壶的合范又像其他方壶一样，说明擂鼓墩M2方壶合范形式只是背带纹方壶中的一个特例。

5. 豆、器盖

圆体的豆细柄高圈足，因此形成与其他圈足器不同的范型：豆盘以下的柄作榫式焊接②。柄的外范作对开，而豆盘则由外范和芯范两块合范而成。

鼎、簋等不少器盖不见范缝，大约也是用外范和芯范两块范的。

6. 曾侯乙尊盘

曾侯乙尊盘特指曾侯乙墓葬青铜器中带细密附饰的尊与盘各一件（图4.4－4，1）。尊盘出土不久，即被华觉明等学者认定为失蜡法（熔模铸造）成形③，这一看法很快为学术界广泛接受。当然并非所有学者都同意尊盘为失蜡法铸造的意见。例如李志伟曾提出曾侯乙尊盘可能为漏铅法铸造④。近年周卫荣等又提出尊盘为范铸法铸造、通过分铸焊接技术成形的看法⑤，并进一步认为中国青铜时代不存在失蜡法工艺。为此，不同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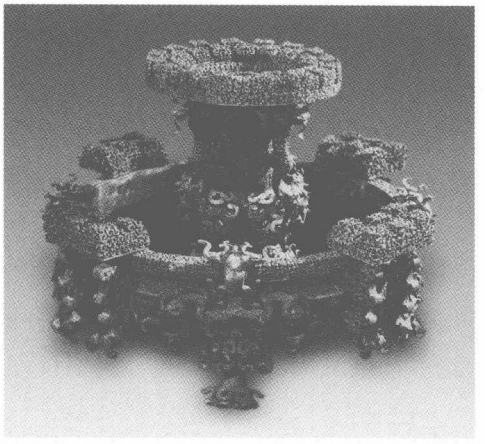
① 曾侯乙墓发掘报告认为大缶“器体两次铸接，即先铸上半截，再接铸下半截，内壁上可见两模合接处有凸起的箍带”。但若如此，则后铸的下半截必定有包裹先铸的上半截铸态，但缶上下结合处可见明显范缝，可知是浑铸无疑。

② 这种焊接是将豆柄内芯注满铅锡焊料并与豆盘凸出的榫头连接，豆的重量因此较大，如一件曾侯乙折盘豆口径21.4厘米，重4.5千克。

③ 华觉明、郭德维：《曾侯乙墓青铜器群铸焊技术和失蜡法》，《文物》1979年第7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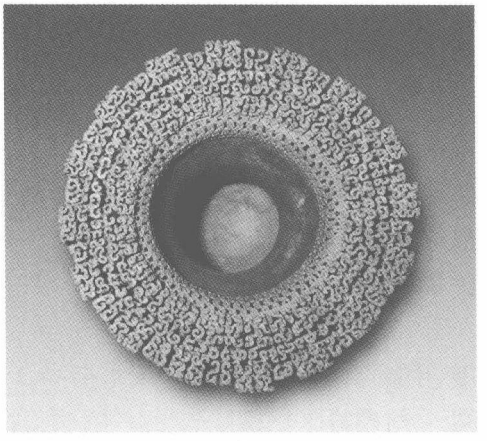
④ 李志伟：《曾侯乙墓编钟及尊、尊座铸造方法新探——兼论先秦青铜铸造工艺》，《楚史论丛》，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

⑤ 周卫荣等：《中国青铜时代不存在失蜡法铸造工艺》，《江汉考古》2006年第2期。周卫荣等：《失蜡工艺不是中国青铜时代的选择》，《中国文物报》2006年7月21日第7版。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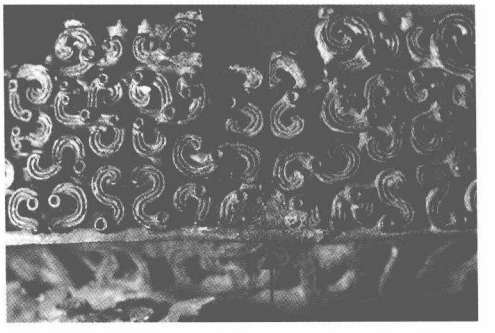
2



3

4

5



6

图 4.4－4　曾侯乙尊盘附饰铸造工艺

1. 曾侯乙尊盘　2. 曾侯乙尊　3. 曾侯乙尊附饰（Kyle Steinky 摄）　4. 曾侯乙盘附饰花纹侧面　5. 王子午鼎鼎足焊接痕迹　6. 曾侯乙尊附饰部件的连接

见展开了讨论①。我们倾向性认为尊盘为失蜡法铸造。以下分别阐述华觉明等学者的论据以及我们的补充看法。

华觉明等主张曾侯乙尊盘均采用了失蜡法铸造，其中曾侯乙尊失蜡法更为复杂，因此他的论证是以尊为例。他认为曾侯乙尊由尊体、尊颈部4条爬兽、尊腹部4条双身龙、尊圈足4条双身龙、尊颈镂孔附件、尊颈镂空附饰组成（图4.4－4，2）。其中尊颈镂空附饰为失蜡法铸造（图4.4－4，3），其他部件为范铸法铸造。其失蜡法结论的依据有如下几个方面：

1）尊颈镂空附饰：由四个部件焊接而成，各部件整体铸就，包含有花纹单元、铜梗、连接花纹和铜梗的铜撑。花纹单元的图案19种，可形成12种组合结构（图4.4－5，1），空间变化复杂。一个单元“就至少需用约10块铸范才能成形”②，这种复杂的结构不可能使用组合范范铸。

2）花纹、铜梗、铜撑相互之间都没有焊缝和铸接结构，也没有发现焊接合金痕迹。因此它们不是焊接或铸接的。

3）铜梗金相组织表明为铸态，排除了锻制的可能性。

4）采用CT切片方法观察河南叶县出土的许公宁透空蟠虺纹青铜饰件，说明该饰件也为失蜡法铸造，由此证明失蜡法在春战之际前后的运用以及曾侯乙尊盘附饰等铸件使用失蜡法铸造③。

华觉明等对于尊盘铸造工艺的论述是在30年前作出的，受到时代的局限，该项论证过于简略，同时也的确是因为“经过铸后加工的器件有时很难判断是用失蜡法还是用块范铸造的”④。因此失蜡法的结论现在受到质疑也是可以理解的。实际上，关于曾侯乙尊盘附饰的铸造工艺，还有一些特征是支持失蜡法成形的结论：

1）曾侯乙尊盘附饰是由附饰顶端花纹与铜梗连接构成，这些铜梗之间、铜梗与附饰花纹之间的连接形态，找不出符合当时焊接工艺的特征（图4.4－4，4）。当时的焊接往往以榫卯卡锁或包裹铸件的方式连接两个铸件，如曾侯乙尊盘爬兽和龙的舌、圈足上的龙都是这样焊接到主体铸件之上的，同时当时连接的媒介为低温焊料如王子午鼎腹与足之间的焊料（图4.4－4，5）。曾侯乙墓铜器也偶尔出现类似于铜焊的铸接方式，

---

① 华觉明等：《中国失蜡法的研究、鉴定和著述记略》，《中国文物报》2006年9月15日第7版。李志伟：《有关曾侯乙尊盘铸造方法的证明——与〈中国青铜时代不存在失蜡法铸造工艺〉文之商榷》，《中国先秦史》（网络版）2006年7月10日。

② 华觉明：《中国古代金属技术——铜和铁造就的文明》第173页，大象出版社，1999年。苏荣誉更认为需要“十数块铸范”，见苏荣誉等《中国上古金属技术》第315页，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年。

③ 李元芝等：《许公宁透空蟠虺纹青铜饰件——先秦失蜡法之一器例》，《中原文物》2007年第1期。

④ 华觉明：《中国古代金属技术——铜和铁造就的文明》第164页，大象出版社，1999年。

如曾侯乙尊四块附饰之间的连接（图4.4－4，6）。这些不同方式的连接，一方面难以在曾侯乙尊盘过于密集与纤细的铜梗与附饰之间实施，另一方面若有焊接等工艺也会存在易于辨识的焊料，而实际上曾侯乙尊盘铜梗之间不见任何形态的焊料。

2）曾侯乙尊盘附饰均为独立铸件，再通过焊接和铸接到尊盘主体，盘口沿的附饰通过先铸连接到盘体（图4.4－5，2）。如果盘附饰为焊接而成，不可能作为先铸铸件。盘口附饰先铸恰好说明其为失蜡法铸件。

3）曾侯乙盘兽形饰顶部附饰有若干脱落残件。这些残件的铜梗表面光洁，不见范缝。特别是在其中一件附饰的铜梗一侧和纹饰单元底部，分别可见若干褶皱（图4.4－5，3）。这些褶皱应当是较稠浓的流体冷却后的形态，它或者反映的是蜡模加热后形成的流态。失蜡法使用的蜡模并非都是整体成形，而可能会将不同蜡模部件通过加热粘连。因此这一现象应当是曾侯乙盘附饰为失蜡法铸造的直接证据。

除了曾侯乙尊盘之外，春战之际前后还出现不少青铜器带有相互勾连的铜梗，如下寺M2铜禁（《全集》10－76、77）、金银错铜丝网套壶（《全集》9－122）、凤翔雍城出土的凤鸟悬环熏①等等，这些青铜器过去多被认为是失蜡法铸造。其实类似的铜梗结构有的与曾侯乙尊盘有较大的不同，它们未必都是失蜡法铸件。Loveday的研究表明②，带铜梗的铸件有的采用了失蜡法，有的则是属于范铸后焊接。显然，并不是看上去无法范铸成形的铸件就一定是失蜡法铸造的。学者们过去指认出大量失蜡法铸件，其中不少是有疑问的。比如曾侯乙建鼓鼓座曾被认为是失蜡法铸件，已有学者指出其误③。因此对于失蜡法铸件的认定，应当特别谨慎从事。

二 技术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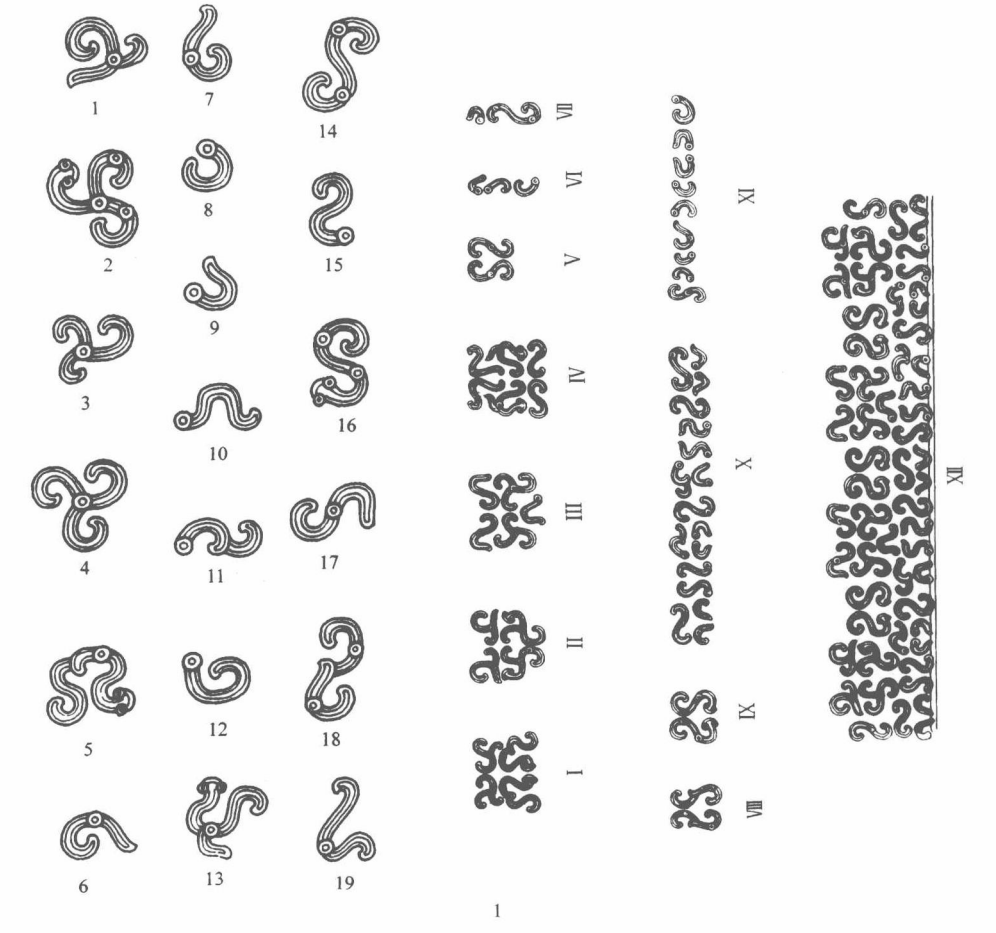
1. 基本特征

这一阶段最为突出的特征是分铸焊接技术的广泛运用：几乎每一件容器、每一件容器几乎每一个附件，都采用分铸焊接技术。除器物的圈足部分之外，一件容器包括其足、耳、鋬、纽、提链、附饰，都是单独铸造，然后通过先铸或焊接技术与器物主体连接。附件细小如环纽，也都是通过先铸而后与主体连接的（图4.4－6，1）。分铸焊接技术的普遍运用在第二阶段曾国青铜器中不仅从附表8可得到明确的反映，从淅川和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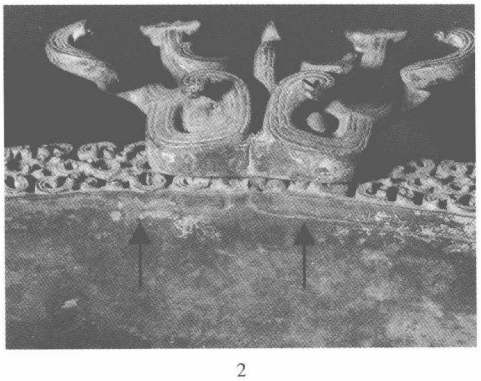
① 《三秦瑰宝——陕西新发现文物精华》，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

② Helen Loveday, Diversity in Eastern Zhou Bronze Casting: A Look at a Group of Openwork Vessels, Journal of East Asian Archaeology, Vol. 4 1－4, 20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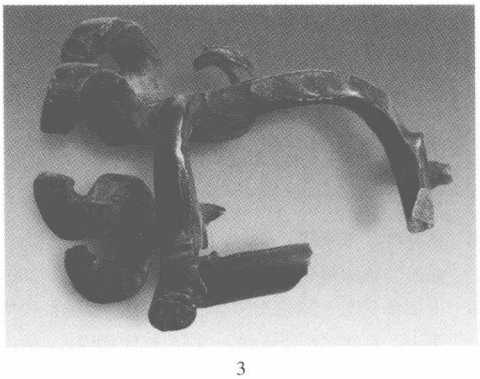
③ 苏荣誉已经说明曾侯乙建鼓鼓座为分铸成形。苏荣誉等：《中国上古金属技术》第175页，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年。



1



2



3

图 4.4－5　曾侯乙尊盘附饰

1. 曾侯乙尊附饰花纹单元与组合（引自华觉明《中国古代金属技术》图 5－11）　2. 曾侯乙盘附饰先铸痕迹

3. 曾侯乙盘残脱附饰铜梗

岭和徐家岭楚墓青铜器中，同样可见这一技术在同一程度的使用①。

分铸焊接技术的广泛使用实质上意味着铸造技术的重点由器物主体向附件的转移。这包含了三个方面的含义。一是铸造工作量向附件的转移。春秋中期及其后容器腹和盖的纽、耳等附件增多，这些纽、耳和器足等各需独立铸造，附件所需的制范数量和工作量往往超过了器物主体。附件数量的极致是曾侯乙尊盘，据研究，曾侯乙尊有尊口部失蜡法附饰4件，腹部和圈足的爬兽和龙共由32个铸件铸、焊而成②，而尊的主体仅为2腹范、1底范、1芯范合范铸成。曾侯乙盘附件与主体亦有相似的情况，由此可以设想铸造尊盘的附件和主体各自所用工作量。二是铸造技术复杂程度向附件的转移。许多附件本身即是通过分铸焊接技术完成的，曾侯乙墓尊盘、方鉴等多见器物的爬兽、龙等附件的舌、尾都使用了分铸焊接技术（图4.4-6，2）。曾侯乙墓许多青铜容器上的爬兽等单个附件的制范数量已经超过其容器主体，一些附件使用了水平分范等较复杂的合范技术，即便是铸造比较粗简的擂鼓墩M2方壶，也是其爬兽首、身分铸，再将兽首焊接到兽身（图4.4-6，3）。三是附件铸造的装饰性增强、附件铸造质量精良，这一点在级别较高的铜器群中尤其明显，一些器类——以曾侯乙尊盘最为典型——甚至在器物之侧开始设置纯装饰性的附饰（图4.4-6，4）。不难注意到，鼎足上部出现半浮雕的兽面纹是发生在春秋中期鼎足大量分铸的技术背景之下。因为分铸焊接技术的运用，簋、壶等附耳纹饰趋于繁缛，至春秋中期以后附耳演蜕为以装饰为主的爬兽。

分铸焊接技术使足、耳这类带芯范的附件单独铸造成形，在工艺上足、耳相应的普遍使用泥芯撑。这一现象尤其多见于分铸法兴盛的春秋中晚期之际，曾器中连迁升鼎（图4.4-6，5）、敃鼎足、耳都明显可见泥芯撑痕迹。分铸焊接技术也促使器物主体对垫片的依赖加强，这一点在平面面积较大的簠类器中尤为突出，第一期青铜簠如季氏梁和八角楼、第三期铜簠中尤其突出，有的簠器身或盖使用垫片都在30片以上。下寺楚墓青铜器亦有如此特征，如下寺M2:34王子午鼎盖垫片也超过30片③。大量使用垫片的做法一直延续到战国中期，擂鼓墩M2一件立牛纽盖鼎之盖的垫片已失，盖表留下密集的漏孔（图4.4-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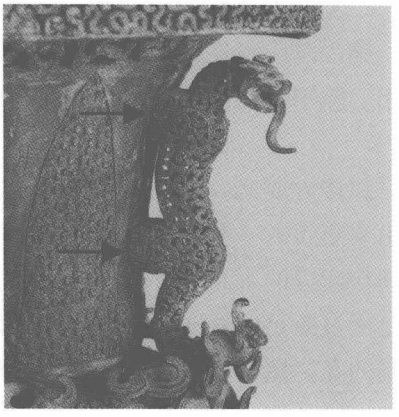
---

① 黄克映、李京华：《淅川和尚岭、徐家岭楚墓青铜器铸造技术》表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淅川和尚岭与徐家岭楚墓》附录二，大象出版社，2004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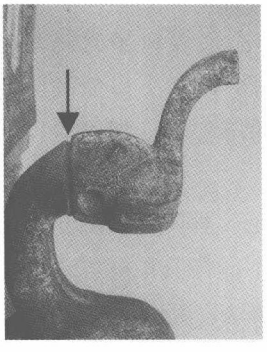
② 上引华觉明、苏荣誉两著作和曾侯乙发掘报告均认为尊“由34个部件、通过56处铸焊构成”（华氏著作第167页作“6处铸焊”，应为打印错误）。他们都未解释34个部件的构成。按笔者的观察和理解，这34个部件应当是指圈足4条双身龙及其8条龙舌、颈部4条龙形爬兽及其4条龙舌、爬兽下焊接的4条龙及其双身的8龙等共32个部件，另外2件指尊主体1、口部失蜡法附饰1。另外，盘的分铸附件和尊相同，但上述著作的理解略有差异。

③ 赵世纲：《淅川下寺春秋楚墓青铜器铸造工艺》，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淅川下寺春秋楚墓》附录二，文物出版社，1991年。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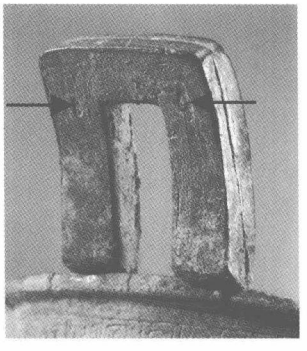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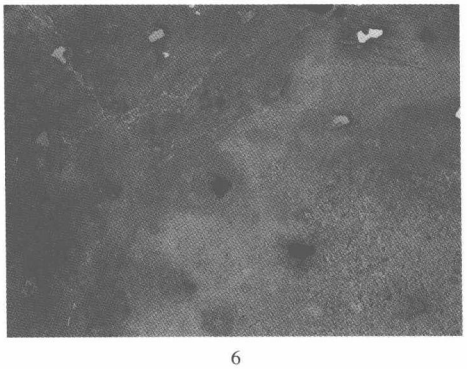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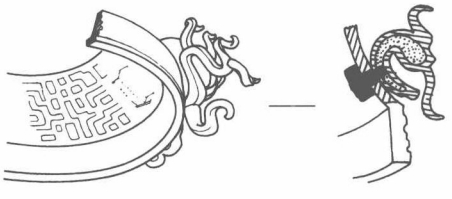
4



5



6



7

图 4.4－6　第二阶段曾国青铜器铸造工艺

1. 擂鼓墩 M2 方尊缶先铸的纽　2. 曾侯乙尊焊接的爬兽　3. 擂鼓墩 M2 方壶爬兽身、首焊接　4. 曾侯乙墓尊盘之盘足侧的装饰性附件　5. 75 刘家崖连迂升鼎耳部铸形及芯撑情况　6. 擂鼓墩 M2 小立牛纽盖鼎密集的垫片　7. 曾侯乙尊圈足爬兽的铆式焊接（据《中国古代金属技术》图 5－4 改绘）

2. 焊接技术

第二阶段附件的连接技术类别较第一阶段单一，第一阶段常见的榫式铸接技术不再沿用。除了鼎类器的足、耳使用先铸法之外，一般附件均采用焊接的方式连接于器物主体。

焊接方式又以榫式焊接为主，这种技术主要应用于簋、簠、壶等竖形的耳，以及器物由肩至腹的一些附件和附饰。曾侯乙墓、下寺楚墓一些青铜器的附件又再使用焊接技术连接爬兽的舌和爬兽身上的附饰。曾国青铜器中铆式焊接不甚多见，曾侯乙尊下腹附兽是通过圈足的镂孔作铆式连接（图4.4－6，7）。但在战国早期及前后，一些可能是锻制的盘、匜，多使用铆式焊接连接器耳，一些器盖的环纽也有以这一方式连接的。淅川和尚岭和徐家岭楚墓青铜器的盖纽都是以铆式后铸的方式成形①，这一方式在曾国青铜器中不见。

这一时期所使用的焊料多为低熔点的镴焊，经检测的曾侯乙墓焊料多为锡基的镴焊②，这与下寺楚墓青铜器焊料一致③。曾侯乙墓发掘报告谈到炉盘、小口鼎和匜鼎有使用铜焊的情况④，但未见检测方面的依据。从铸造技术发展的历程看，战国时期使用铜焊似乎是无疑的⑤。

当时焊料的使用情况有助于理解鼎何以采用先铸技术。鼎足、耳先铸，对于合范的技术要求较高，这与当时简化的技术倾向相背。但鼎为炊器，不能像其他盛器一样采用熔点较低的焊接技术⑥。曾国青铜器中鼎足如分铸，亦采用先铸法。楚式升鼎的足、耳均为焊接，第二阶段曾国升鼎亦为焊接，可知升鼎并不能用作炊器。与升鼎相同情况的还有类似的鼎形器如盏、三足盘等，这些容器也不作炊器之用。

3. 水平分范

如前所述，水平分范技术在方座簋、大缶和饰背带纹的壶上使用。背带纹壶绝大多

---

① 即所谓“附件范补铸附件连接法”。黄克映、李京华：《淅川和尚岭、徐家岭楚墓青铜器铸造技术》，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淅川和尚岭与徐家岭楚墓》附录二，大象出版社，2004年。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曾侯乙墓青铜器所用低熔点焊料化学成分的检测》，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附录一三，文物出版社，1989年。

③ 李敏生：《淅川下寺春秋楚墓部分金属成分测定》，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淅川下寺春秋楚墓》附录三，文物出版社，1991年。

④ 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177页，文物出版社，1989年。但是小口鼎和匜鼎足等附件实际上是先铸的。炉盘是否使用铜焊，亦存疑。

⑤ 据笔者所知，战国中期楚墓中出土的一些铜剑，剑身中部折断后焊接，接口为长不足0.1厘米的缝状，似乎确为铜焊所致。

⑥ 但黄克映等认为淅川徐家岭M1：2、M1：5两件盖鼎耳、足均焊接，疑误。参黄克映、李京华：《淅川和尚岭、徐家岭楚墓青铜器铸造技术》表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淅川和尚岭与徐家岭楚墓》附录二，大象出版社，2004年。

数为方壶，在曾国青铜器中，此类方壶有75刘家崖C型方壶、曾姬无卹方壶这样不同时期的延续使用。曾侯乙墓背带纹圆壶实际也具有方壶的意义。这类壶是西周中晚期背带纹方壶在东周时期的延续和发展，使用水平分范技术也有第一阶段幻白隹方壶的传统：水平分范处设在背带纹的顶端，腹范之间在纹饰带处分范而不是像一般方形器那样在四角分范。这一技术及其传统并非是曾国的，而是在相当广大的区域和时间段内存在：从下寺M1方壶（《全集》10－35）到蔡侯墓方壶（《全集》7－74），从新郑郑公大墓方壶（《全集》7－23）到赵卿墓方壶（《全集》8－71），这些形制近似的方壶都采用了大体相同的水平分范技术。影响所及，淅川徐家岭M10两件圆壶也从颈与腹之间水平分范①。如本章第一节《器形与器类》所述，背带纹方壶是西周晚期传统器类在东周时期的延用，铸造方壶的合范技术也同样得到延续。擂鼓墩M2方壶铸造工艺简陋，未使用这一传统合范形式。

附件的铸造使用水平分范技术是这一阶段的另一特点。春秋中期偏晚阶段开始，附件的装饰性加强，附件的形制日趋复杂，以一般的对开外范的方法已经难以铸造带角的爬兽和圆雕的附兽。曾侯乙墓一些器类的爬兽首、身、尾等作多段水平分范，例如曾侯乙墓方座簋爬兽的兽首、身、尾三段分范，分别用外范2、3、2块（图4.4－7，1），附件的合范技术较一些器物主体更为复杂。下寺楚墓M2的王子午升鼎和禁的爬兽，是分兽角、身、腰、尾四个部分焊接而成②，附件的铸造技术同样较复杂。

水平分范与第二阶段青铜器范型简化的发展趋向相背。但不难注意到，使用水平分范的青铜器或附件，都是代表了较高社会等级的器类。由此可见，社会等级往往可以超越技术层面的限制，使青铜器在视觉效果上表现出更强的影响力，以此体现器主的社会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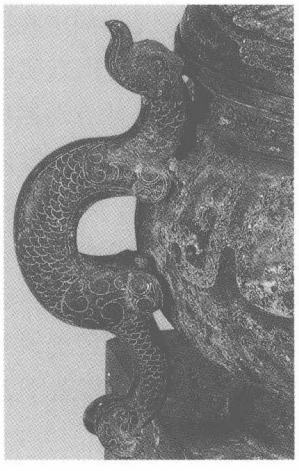
4. 曾侯乙墓与擂鼓墩M2青铜器工艺特征比较

曾侯乙墓和擂鼓墩M2两座墓葬等级相同，两群青铜器均为九鼎八簋，墓主可能都是曾国国君。两座墓葬的年代相去不远，但两个铜器群组合复杂程度、总的体量差别都很大。那么，两个铜器群铸造技术是否大体相同？

总的来说，两个铜器群所使用的铸造技术在大的方面具有相同的特征。他们对于一般的青铜容器采用了相同的范型，比如盖鼎都是先铸足、耳，三分腹范。一般器物的耳、鋬等附件均采用后铸焊接的连接方法，一些附件的分范方式相同，如盖鼎兽形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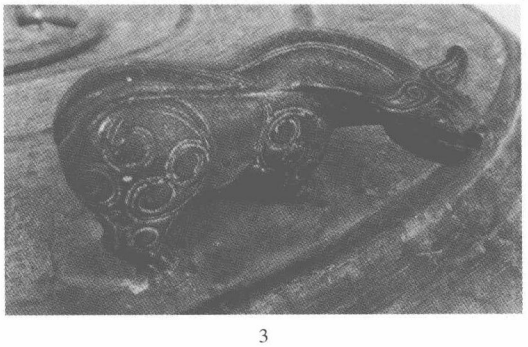
① 黄克映、李京华：《淅川和尚岭、徐家岭楚墓青铜器铸造技术》，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淅川和尚岭与徐家岭楚墓》附录二，大象出版社，2004年。

② 赵世纲：《淅川下寺春秋楚墓青铜器铸造工艺》，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淅川下寺春秋楚墓》附录二，文物出版社，1991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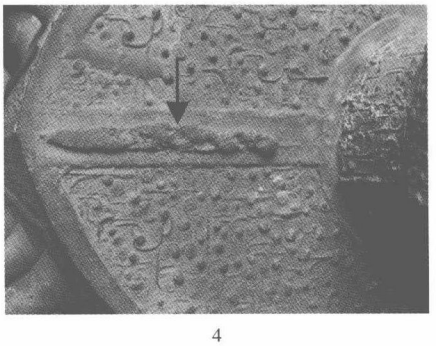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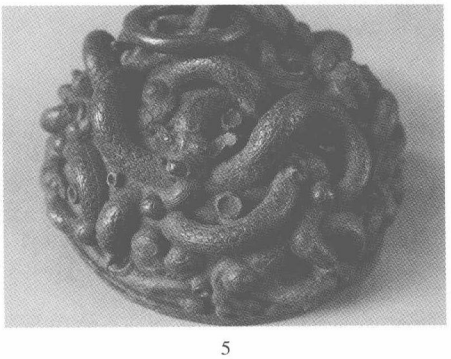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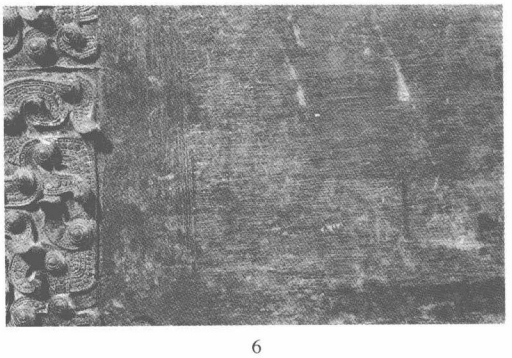
3



4



5



6

图 4.4－7　第二阶段曾国青铜器铸造工艺

1. 曾侯乙簋爬兽的铸形　2. 曾侯乙墓 C101 牛纽盖鼎的铸形　3. 擂鼓墩 M2 大立牛纽盖鼎的铸形　4. 擂鼓墩 M2 甬钟舞部浇口　5. 曾侯乙墓铜镇活块范嵌铸　6. 曾侯乙编钟架空白处的打磨情况

合范（图4.4－7，2、3）。不过，两个铜器群这样一些共性，实际上是这一时期一般青铜器都具有的技术特性。两个铜器群在一些工艺细节上、在铸件质量方面还是存在诸多的差异。

编钟特别是甬钟反映了两个器群最高的合范技术。曾侯乙编钟的下层大型甬钟先铸甬部，再和钟体铸接，这与先秦其他甬钟甬部与钟体浑铸的技术特征不同①。而曾侯乙中层甬钟系浑铸而成，整钟共用范、芯136块，其中枚范72块②。这要求极高的合范技术。擂鼓墩M2甬钟均为浑铸，甬钟的甬部浑铸③，舞部内壁中部设泥芯撑以支撑甬部芯范。曾侯乙下层大型甬钟、擂鼓墩M2的8件大型甬钟浇口和冒口均设在舞部（图4.4－7，4），但曾侯乙其他甬钟和纽钟、擂鼓墩M2小型甬钟浇口设在下部。两架钟的铸造技术有较多的相同之处，擂鼓墩M2小型甬钟不设枚，合范复杂性大大减小，铸造技术要求降低。

曾侯乙其他青铜器也同样较多像甬钟一样使用组合范和嵌范技术。曾侯乙方尊缶底部相互套合的设计结构复杂，铸形需要通过多套组合范技术成形。曾侯乙建鼓鼓座、日用品中4件铜镇（图4.4－7，5）的蟠龙作浮雕凸起，也无疑采用嵌范技术，其他一些铜器如曾侯乙编钟架、磬架等都采用了复杂的组合范技术。这类将不同层次的制范拼装组合技术，正是为商末周初前后青铜器铸造高峰阶段所常用。但在擂鼓墩M2青铜器中，此类技术罕见。

曾侯乙青铜容器中附件造型复杂，要求附件铸造技术较高。一些铜器附件的爬兽水平分范，也是采用组合范技术。许多附件的不同部位采用分铸焊接之法连接。相对而言，擂鼓墩M2青铜器采用水平分范技术的铸件较少，附件造型多较简单，对于铸造技术亦要求不高。

曾侯乙青铜器除了镶嵌类纹饰之外，铸造类纹饰常常作浮雕凸起，这类纹饰在曾侯乙编钟和钟架尤其多见。如曾侯乙钟架蟠龙纹、柿蒂纹接近圆雕，这对于铸造之前的纹饰制作技术要求极高。这些浮雕纹饰脱范完整，纹饰纹路清晰，体现了极高的铸造水平。

相对而言，擂鼓墩M2青铜器铸造质量较为低劣，器物造型缺乏生气，器形常有变形现象，铸件错缝现象普遍。铸件脱范水平较差，故纹饰多漫漶不清，一些纹饰已经残缺而难以辨别。在同组或成对器物中，往往因为铸造技术问题而形成形制差异。

---

① 华觉明、郭德维：《曾侯乙墓青铜器群铸焊技术和失腊法》，《文物》1979年第7期。

② 华觉明：《中国古代金属技术——铜和铁造就的文明》第222－225页，大象出版社，1999年。

③ 有学者认为擂鼓墩M2甬钟的甬部均为先铸，这是不对的。此说参见《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总编辑部：《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湖北卷》第31页，大象出版社，1999年。

如两件较大立牛纽盖鼎器形、大小相同，原应为一对，两器器盖纹饰亦相同，但一鼎腹部饰蟠螭纹，另一鼎腹部则素面无纹，大约是遗漏制作纹饰所致。M2 九件升鼎不仅形制各有所不同，即便在器形相同的升鼎中，纹饰也有差别。这种差异并非说明九鼎原来不是属于一套，而是铸造技术要求不高、或者是管理水平较低所致。比如 M2 有的升鼎三足呈不等边三角形、不规则地分布，有的升鼎腹部与足部纹饰风格不同，如此等等。

曾侯乙青铜器铸后器表经过处理。较明显的方式是打磨，不仅打磨范缝错缝以及铭文之处，器表、器内壁也往往经过打磨。甚至有些打磨位置令人颇为不解，例如曾侯乙编钟钟架纹带之间的留白处，有经过纵、横不同方向的打磨（图 4.4－7，6），打磨痕迹深而纹路清晰、走向颇为规则，说明这并非是一种随意的行为。而在擂鼓墩 M2，器表鲜见打磨现象，即便是一些铜器有错缝严重之处，也保留其原貌。

曾侯乙墓和擂鼓墩 M2 两个铜器群铸造技术的差异，一方面说明了擂鼓墩 M2 青铜器铸造技术较为粗糙、简陋。但在另一方面，作为等级相当年代接近的铜器群，他们之间的技术差别仍然令人难以理解。从曾侯乙墓而言，使用组合范等技术要求较高的工艺，说明在分铸时代的高级别铜器群中，传统的高难度合范技术仍然可以保留。但就擂鼓墩 M2 铜器群而言，器群铸造者甚至可能是与铸造曾侯乙铜器群为同一批工匠，何以二者之间存在如此明显的差异？是否是因为曾国经济实力明显下降的原因？

三　分铸技术的发展及其背景

分铸（分铸和焊接）技术在中国古代青铜器铸造中占有重要地位。华觉明甚至认为在中国青铜器兴盛时期的商代青铜器“之所以能得到高度复杂化的器形，关键是使用了分铸法”①。那么，分铸技术在商周青铜器中的应用，是否是在青铜器复杂化的趋势下得到发展？抑或是有其他的文化背景？

相比于东周时期青铜器，分铸法在殷墟青铜器中的使用频率其实并不高，且主要集中在一些重器或带有活动提连附件的青铜器中。我们可以看到，分铸法滥觞于西周中期之后，而其广泛应用于几乎每件青铜容器，则是在春秋中期及以后。因此郭宝钧总结商周铜器群器物铸造的进展，将春秋中期至于战国早期归结为“分铸阶段”②。分铸的技术趋势，使青铜器的铸造技术和生产系统都相应地产生了重要的变化。

分铸技术首先使器物主体的范型和合范技术变得简单起来。一件器体的制范数只需由器体自身的腹范、底范和芯范组成，这样，即便是比较复杂的器物主体如方形器或

① 华觉明：《中国古代金属技术——铜和铁造就的文明》第 136 页，大象出版社，1999 年。

② 郭宝均：《商周青铜器群综合研究》124－127 页，文物出版社，1981 年。

鼎，5－6件范块便可形成器体范型，有的器体更只需要2－3件范块即可成形。范数较少，意味着合范技术难度的降低，整器铸造的难度相应地得到降低。

以下分别以年代在两周之际的苏家垅曾仲斿父附耳鼎和春秋晚期的刘家崖连迁升鼎为例，说明分铸技术在青铜器的铸造中所产生的变化。这两件鼎的用范数如下①：（图4.4－8）

曾仲斿父鼎	耳：耳与腹壁之间芯范1	2×1＝2	制范10	铸件1
	足：芯范1	3×1＝3		
	器身：腹范3、芯范1、底范1	5		
连迁升鼎	耳：外范3、芯范1	2×4＝8	制范23	铸件6
	足：外范2、芯范1	3×3＝9		
	器身：腹范3、芯范1、底范1	5		

1

2

图4.4－8　曾仲斿父鼎与连迁升鼎的范型比较

1. 苏家垅曾仲斿父鼎　2. 刘家崖连迁升鼎

从器形而言，大量采用分铸焊接法的连迁升鼎并不复杂于通体浑铸的曾仲斿父鼎。实际上，中国青铜器兴盛的商末周初时期青铜器，是以其繁多的器类、多变的造型、厚重的器形、繁缛的纹饰给人以“复杂”之感，支撑这一体系的是高超的合范和嵌范（或称活块范、复合范）技术。而分铸焊接技术发达的春秋中期至战国早期，这一时期青铜器造型并不复杂，纹饰亦已模具化。分铸所形成的“复杂”，不是器物本身的复杂化而是器物附饰的复杂化。这是因为春秋中期及其后分铸的发达，实际上主要是焊接技

① 这里未计两器可能有的单独的铭文范。曾仲斿父鼎未计附耳内可能存在的芯范。

术的发达。这一时期可见怪异的附兽、精密的镂空、多变的盖顶装饰，都是焊接技术的结果。曾侯乙墓最为“复杂”的青铜器如曾侯乙尊，尊的主体造型简单，而且一共只用4块范铸造而成。但曾侯乙尊主体的口、腹、圈足周边焊接上的附件达到32个部件（包含4个失蜡法附饰），从而形成繁缛而复杂的装饰。这也是何以殷墟时期青铜器和春秋中期及以后青铜器的复杂给人不同的感受。分铸对于处理一些复杂的造型当然是必然的选择，分铸焊接当然也可以铸造出极度复杂的造型①，但在春秋中期至战国早期时期，造型复杂的青铜器并未因为分铸技术的发达而多见。这些说明，分铸技术的发达，应当另有背景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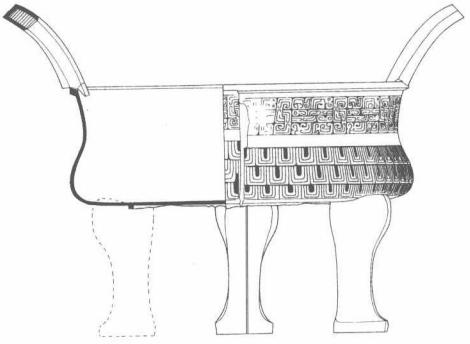
至少在东周时期，分铸技术的发展，并非是为了制造出复杂的器形而分铸，而可以说是为了简化技术难度而分铸。前述两鼎从制范数量而言，连迁升鼎比曾仲斿父鼎多得多。但就技术难度而言，曾仲斿父鼎则较连迁升鼎要高得多。曾仲斿父鼎从附耳芯范与外范的拼合到附耳所带圆梗的设置，或者是从耳至足整器所需要浇铸满足的工艺要求，都是连迁升鼎所无需面对的技术难度。连迁升鼎每个部件的制范，都不超过5块，也就是说，连迁升鼎每次浇铸活动的合范技术，都远较曾仲斿父鼎简单。连迁升鼎的简单，是因为铸造分器、耳、足三部分共6次完成，从而分解了曾仲斿父鼎合范和浇铸两个方面的技术难度。

曾仲斿父鼎和连迁升鼎实际上分别代表了中国青铜时代青铜器铸造技术发展大势中的两个不同的阶段。如果我们从宏观的角度考察中国青铜时代几个主要时期合范技术的发展，就不难注意到就单个铸件而言，合范数趋少、合范技术趋易的方向。殷墟至西周早期鼎盛期青铜器常采用嵌范和水平分范技术，单个铸件制范数量常见二十块以上者②。西周中期至春秋早期转变期青铜器器形简化，虽然同是浑铸，但制范数量大减；春秋中期到战国早期的复兴期，单个器物制范数量虽然极多，但分铸技术使器物各个铸件用范数量多在5、6块或以下。

合范技术的简化，亦即意味着技术要求的降低。因此这一简化的直接表现是此时的铸件中范缝不再像殷墟青铜器那样细浅难以辨识，而是凸出显眼，范缝之间也不像殷墟青铜器那样严密，而是错位频频。连迁升鼎腹范错缝达0.3厘米（图4.4－9，1）、器形亦不规整。即便是曾侯乙墓青铜器，器形较大者如鼎（图4.4－9，2）、器形较小者如折盘豆（图4.4－9，3），器物主体的错范现象也普遍存在。这种现象当然并非曾国

① 浙川徐家岭M9出土的一对青铜怪兽，可作为分铸所铸造复杂器形的最好例证。参《全集》10－84。但值得注意的是，商周时期各阶段造型最为复杂的动物形尊，往往都少见使用分铸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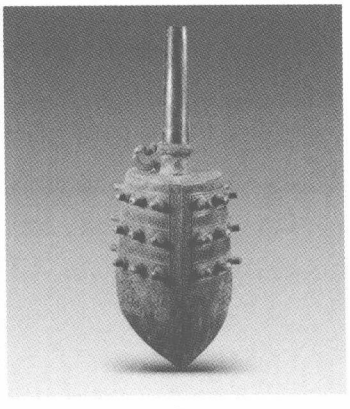
② 例如強国墓地簋。见苏荣誉等：《強国墓地青铜器铸造工艺考察和金属器物检测》，卢连成等《宝鸡強国墓地》附录二，文物出版社，1988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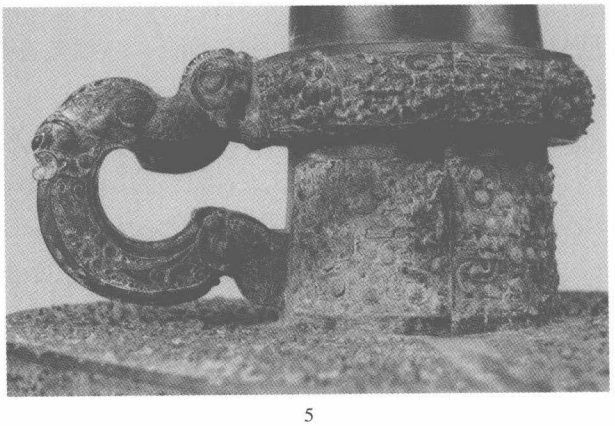
1

2

3



4



5

图 4.4－9　第二阶段曾国青铜器合范情况

1. 刘家崖连迂升鼎纹饰的错位情况　2. 曾侯乙牛纽盖鼎错范情况　3. 曾侯乙 C196 折盘豆错范情况　4、5. 曾侯乙编钟及甬局部

青铜器所专有，从西周晚期至春秋战国青铜器都可见类似现象。错缝现象一方面是如上所述工艺简化、技术要求较低青铜工业的伴生现象，同时又反映当时社会对于青铜器审美风尚的变化，即不再特别如殷墟时期青铜器那样强调外观效果。而一旦制作者认为其作品必须强调合范的严密性之时，他们当然可以做得到这一点，曾侯乙编钟的合范情况即说明这一点（图4.4-9，4）。

我们再回头看曾仲斿父鼎和连迁升鼎所代表的劳动力组织上的区别。这两件鼎由制范到浇铸成形，连迁升鼎可以将耳、足、器以及它们的拼合作为4个相对独立的工序分别由四个工作小组完成，而曾仲斿父鼎则只能一次完成。铸造连迁升鼎的难度降低，而工效却可以大大提升。在大规模生产中，“劳作趋向于分工，即区别并划分工作为更多相对独立的步骤”①。这样看来，分铸技术的发达，其实是为适应规模化青铜工业生产而将工艺过程划分为更多相对独立步骤的分工要求。分铸技术广泛应用的意义，是在降低铸造技术难度的同时，提高了生产效率，为春秋中晚期诸侯国青铜器的大规模生产提供技术条件。

上述简化技术难度和大规模生产两个方面的社会需求背景，到底哪一个是分铸技术产生和发展的初始原动力？如上一章《铸造工艺》一节所述，曾国青铜器在西周晚期即已经较周原地区更多地采用分铸技术，并在两周之际至春秋早期相当频繁地运用这一技术。而两周之际其后虢国青铜器也有类似的趋向。也就是说，分铸技术的最初发展，更多的是基于诸侯国青铜器而非王室青铜器。我们不难设想，规模化生产对于春秋中晚期之后的诸侯国如晋、楚铸造作坊来说会是一个生产需求，但对于两周之际前后的诸侯国而言，显然不会有这方面的考虑。两周之际前后王室的衰微，如曾国这样的诸侯国可能缺乏来自中心文化区域的技术支持，维持和发展其规模不大的青铜器生产，简化技术的发展趋向应当是在工作过程中合理的一个选择。因此，诸侯国青铜器更多地出现分铸技术，当然是一个容易理解的现象。

从曾国青铜器发展的角度看，西周晚期分铸技术已有相当的采用，而两周之际之后更有大的发展，至春秋中期及以后盛行于几乎每一件青铜容器。宏观地看，这大体也是其他诸侯国青铜器技术层面的共同过程。基于前述的认识，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西周晚期及其后诸侯国青铜器的发展，至春秋中期楚、晋等几个区域文化体系的形成，不仅有其社会背景，同样也有技术因素的背景。

四 圆鼎的范型发展

鼎特别是圆鼎是中国古代青铜器中最为重要的器类，从铸造技术的角度而言，鼎也

① 雷德侯著、张总等译：《万物——中国艺术中的模件化和规模化生产》第8页，三联书店，2005年。不过，雷德侯将中国青铜时代范铸技术视为形成大规模青铜器生产的原因，这一结论是存在很大问题的。

是最富有代表性的器类之一。因此对于鼎的范型技术研究，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郭宝钧对商周青铜器群的研究中对鼎的范型技术分阶段地进行了观察①。万家保以毛公鼎为切入点，对殷墟至东周时期鼎的范型进行了分析②。苏荣誉着重对春秋晚期及前后几个典型铜器群鼎的范型进行了总结，强调了这一时期分铸焊接技术的新风格③。但由于材料所限，从过去这些研究中很难看出商周时期鼎范型演变的逻辑关系。

曾国青铜鼎是否有如同时期其他鼎相同的发展脉络？笔者在以上学者研究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理解，多以曾国青铜鼎为模本，将圆鼎器体的基本范型演变发展表述如图4.4－10，以对比曾国青铜鼎的发展，并试图解析鼎范型所代表的技术和文化背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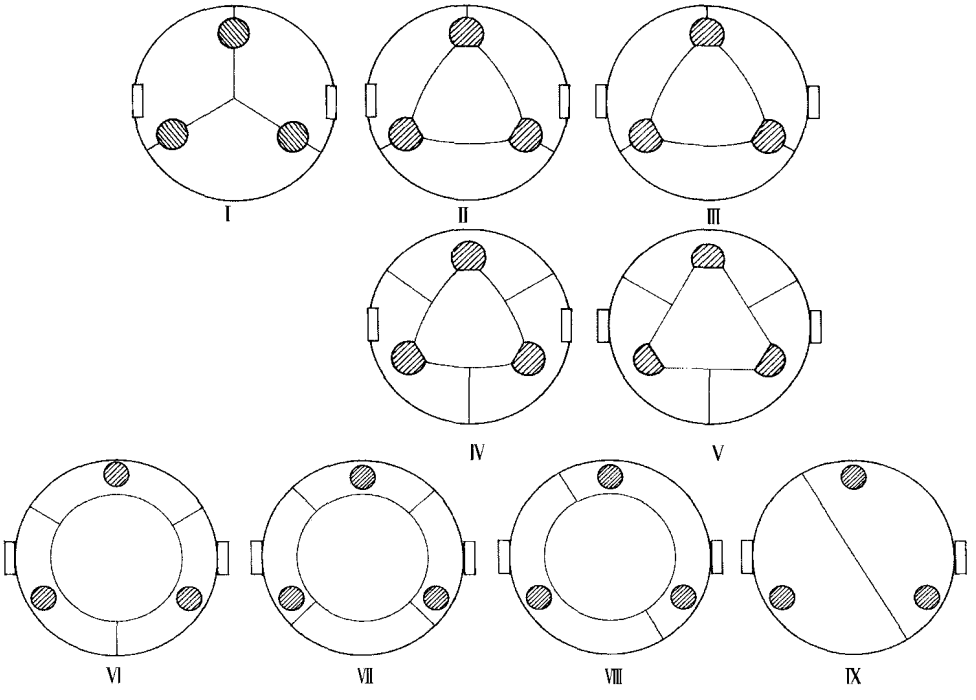


图4.4－10　圆鼎范型演变

Ⅰ式：3－Y＋1式。代表了从二里岗文化至殷墟文化时期鼎的范型，其中二里岗文化时期鼎一耳与一足相对，与殷墟文化时期鼎双耳与两个足形成平行关系不同。

Ⅱ式：多为3－△＋1式。代表了从殷墟时期至春秋早期鼎的范型。鼎设底范与殷

① 郭宝均：《商周青铜器群综合研究》，文物出版社，1981年。

② 万家保：《毛公鼎的铸造及相关问题》，《大陆杂志》第六十卷第四期，1980年4月。

③ 苏荣誉等：《中国上古金属技术》之《第三章青铜范铸技术》第161－168页，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年。

墟时期鼎足变为柱形相关，从此底范多为鼎范型中不可少的部分。此式范型又存在若干变化。殷墟时期和西周早中期一些体形较大或腹部带扉棱的鼎，在两足之间的扉棱处再分范，形成6－△＋1式范型。鼎的底范也有变化，殷墟时期鼎底多光洁，而西周中晚期周原鼎底范多见弧线三角形阳纹①。两周之际前后曾国鼎底范多作糙面微凸。曾国第一阶段此式鼎有一定数量，但不及Ⅲ式鼎。

Ⅲ式：即Ⅱ式立耳鼎演变为附耳，是Ⅱ式鼎的一种孪生，附耳的出现则是为满足承盖的需求，当然此时的盖未必是青铜的。这类鼎在西周中期以宽体足带扉棱的形制出现，西周晚期如晋侯墓地又见有深腹附耳鼎。Ⅲ式鼎使用的高峰期是两周之际及其前后，例如第一阶段曾国大量的附耳鼎。

Ⅰ－Ⅲ式鼎耳、足俱为浑铸，范型代表了商周时期鼎浑铸的漫长时期。其中三单元划分外范的不变方式，缘于腹范与三足的对应：对于圆体三足的鼎而言，三分外范是最为经济合理的做法。至春秋中期，此类鼎为分铸鼎所取代。但是在长江下游地区，鼎的浑铸技术传统直到战国时期仍有所见，形成一个突出的滞后现象，其背景详后。

Ⅱ－Ⅲ式鼎在两周之际前后特别是春秋早期因为诸侯国青铜鼎兴起的背景而多被采用，其中一个铸型的变化是鼎足内侧不封闭，这样在合范时足芯范与鼎底范相连，简化了足芯范的合范技术。

Ⅳ式：由Ⅱ式鼎发展而来的分铸形式。例如曾国青铜器72曹门湾龙纹鼎。

Ⅴ式：由Ⅲ式鼎发展而来的分铸形式。例如曾国青铜器周家岗廓季鼎。

Ⅳ、Ⅴ式均为鼎足先铸而耳仍然为浑铸，它们只是分铸鼎范型发端的一个短暂的过渡形式，大约都偶见于两周之际前后，罕见于已有报道的材料。但它们无疑是由浑铸鼎到Ⅵ式鼎及其后范型的必经的发展形式。

Ⅵ式：绝多为3－○＋1式。由Ⅳ－Ⅴ式范型发展而来，并自春秋中期开始迅速成为分铸鼎范型的主流。春秋中期至战国中期的曾国青铜鼎绝大多数亦为此种形式，特别是战国时期鼎基本稳定地使用这种范型②。

此式范型包括有附耳和立耳鼎两种。春秋中期及其后特别是在楚系青铜器中，圆鼎主要为带盖的附耳鼎，而中原地区特别是晋系青铜器多为立耳鼎，也多使用此式范型③。附耳鼎的早期多是足先铸而耳仍然为浑铸，表现出早期的分铸特性。这种情况见

---

① 参见《周原》1－10册。这一现象在虢国墓地青铜鼎中也多有所见。

② 战国时期一类圆形盖鼎三足与腹壁之间可见有近似焊接的痕迹，但非升鼎那种低温焊接特征。颇疑此时一些鼎已经采用铜焊技术连接盖鼎足与腹。

③ 晋系青铜器中有弧裆接近于鬲的“鼎”（参《全集》8－25～27），铸型亦如鬲设弧线三角形底范，参吴坤仪：《太原晋国赵卿墓青铜器制作技术》，山西考古研究所等《太原晋国赵卿墓》附录四，文物出版社，1996年。这类器形制与性质都不类于鼎，从组合上看似应归入簋类。

于新郑郑公大墓铜器群[①]和第二阶段曾国青铜器第一期鼎。

楚系的升鼎也绝大多数使用3－○＋1式范型，但在附件的连接技术上与一般鼎不同。升鼎的耳在春秋中期为附耳，至春秋晚期以榫式焊接方式斜接于鼎口，战国早期后又以铆式焊接方式连接。升鼎足均为榫式焊接，也与一般作为炊器的鼎不同。战国早期之前升鼎底范如一般鼎一样，作圆形设在三足之间，但此时升鼎腹、底之间变作尖锐的折分，因此底范扩大到整个底部，三足包含在底范范围之内。

Ⅵ式还有作6－○＋1式的，则是为适应鼎腹部设的扉棱[②]。

Ⅶ式：即4－○＋1式。是Ⅵ式鼎的繁化形式，几乎与Ⅵ式范型同时出现，如见于新郑铜器群。此式并非主流范型，春秋晚期稍多，至战国时期数量较少，多设一块腹范一般是为满足形体较大的鼎。曾国青铜器中如曾孙无谌鼎、连迂盖鼎使用此范式，但鼎形体均较小，成为一种例外。这种四分腹范的范型有时还有两个腹范位置的变化，4条范缝不是如图例所示有2条范缝位于第1和第2足之间，而是各有一条范缝对应于双耳不同方向的两侧，即有一条范缝与第1第3号足（或者第2第3号足）平行，形成不同的位置关系，但这种范型更为少见。

Ⅷ式：即2－○＋1式，这是Ⅵ式鼎的简化形式，腹范范缝亦可能变化为平行第1第3号足的设计。亦不多见，见于新郑铜器群、辉县琉璃阁铜器群[③]。淅川徐家岭M3升鼎亦见此范型[④]。

Ⅸ式：即2－N＋1式，腹范范缝亦可能变化为平行第1第3号足的设计。范型如Ⅷ式鼎的二分范而不设底范，因此大约与琉璃阁鼎那种二分范的做法有渊源关系。曾国青铜器76义地岗放鼎、蔡侯墓出土的深腹带盖列鼎都作此式范型[⑤]。

Ⅷ和Ⅸ式二分外范，也是鼎的范型的一种简化，它形成的背景是这一时期纹饰为范作，不存在此前的两块外范不能脱范的问题。但战国中期前后明器鼎的制作也采用这种极度简化的范型，包山和望山楚墓一些明器鼎可见较多实例。明器往往采用简单的技术方式。

综上所述，正如学者们已经注意到的那样，如果以鼎足是否分铸为衡量标准，圆鼎

---

① 郭宝均：《商周青铜器群综合研究》第80页，文物出版社，1981年。

② 见于蔡侯墓升鼎。参苏荣誉等：《中国上古金属技术》之《第三章青铜范铸技术》第161页，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年。

③ 万家保：《辉县及汲县出土东周时期青铜鼎形器的铸造及合金研究》，《大陆杂志》第50卷第6期，1975年。

④ 黄克映、李京华：《淅川和尚岭、徐家岭楚墓青铜器铸造技术》表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淅川和尚岭与徐家岭楚墓》附录二，大象出版社，2004年。

⑤ 郭宝均：《商周青铜器群综合研究》之《东周初年及春秋时期铜器群》第88页，文物出版社，1981年。

范型可以概括为浑铸和分铸两个大的发展阶段。浑铸阶段底范作三角形或不设底范，腹范范缝与足对应。分铸阶段腹范范缝不与足对应，故底范绝多为圆形。Ⅳ－Ⅴ式范型则显示了三角形底范由浑铸到分铸的过渡性①。上述不同阶段圆鼎范型的变化，实质上是铸造工艺技术变化的反映。

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总结上述鼎的范型，可以注意到Ⅰ－Ⅲ浑铸式范型历经自公元前17世纪至公元前7世纪大约千年的历程。而Ⅳ－Ⅸ变化多样的分铸式范型则由公元前7世纪延续到公元前3世纪大约四百年时间。两个阶段范型变化的频率大大不同，特别是Ⅳ－Ⅸ各式的变化都集中出现在公元前6世纪前后，这无疑是分铸技术刺激的结果：先铸或焊接的鼎足成为独立的铸件，实际上是解放了鼎的器体的铸型——腹范的分范位置不再需要对应于鼎足，因此形成了鼎外范多变的分割形式。这种变化，实际上反映的是技术上的一种随意性，它没有代表多少技术进步的因素：范缝平行于第1第3号鼎足与范缝平行于第2第3号鼎足的技术、效果均相同。恰恰相反，它仍然是分铸技术所暗示的方向之一：简化。因此，上述范型在春秋晚期之后基本稳定，战国时期鼎的范型实际上不再有新的范型变化形式。

在鼎的范型变化过程，可以注意到两周之际前后铸造技术处于承前启后的变化之中，新的技术因素在这一阶段开始出现，新的技术趋向已经明确。从这个角度而言，这一阶段绝非青铜器发展的停滞时期，而恰恰是较为活跃的时期。

曾国青铜器既反映出两周之际前后由浑铸技术向分铸技术的转型，又历经分铸技术走向定型的过程。在这些过程中曾国青铜器范型既反映出各时期的变化，又是各时期时代风格的体现，从特征上表现出与楚系和中原青铜器的一致性。

五 个性特征与区域

至少自二里岗文化时期就已经开始而春秋中期盛行的青铜分铸技术，在广义上的中原地区及其周边流行，并在广大区域表现出较青铜器器形更强的一致性。而这种技术上的一致性，又对器物形制的一致性产生影响，从而使春秋中期至战国时期大区域文化特征的一致性日趋强烈。

某些时代风格形成的共性，在曾国这样较小的诸侯国甚至表现得更加明确。例如，第二阶段曾国青铜器容器的铸造技术规律性较强，特别是器体的范型少有变化。曾侯乙墓出土各类青铜鼎20件，铸形均为3－○＋1式，足、耳先铸。相比之下，中原地区如

① 承蒙许杰先生盛情，笔者在芝加哥艺术馆（Art Institute of Chicago）库房得以观察到一件两周之际窃曲纹鼎，其足先铸，底范形状为弧边三角形，正是处于三角形底范向圆形底范过渡的状态。

辉县琉璃阁鼎范型特征和足、耳分铸的技术更为多样化①。和器物形制特征一样，曾国青铜器技术的这种单一性，是蕴藏于区域共性之中的个性特征。它所反映的是与其地理位置和文化地位相关的历史背景。

但是，曾国青铜器自身也的确存在不少个性因素。如前所述，曾侯乙和擂鼓墩 M2 编钟的铸造技术显示，这两套编钟虽然器主等级、时代接近，甚至可能为同一个作坊系统铸造，但曾侯乙中层、下层甬钟，以及擂鼓墩 M2 大、小甬钟，其合范、浇口设置等技术环节各有不同。这说明当时铸造技术中解决问题的手段已经相当丰富，并已为匠人运用自如。这一条件下的技术体系当然易于产生个性特征。当然，这些个性特征更多地会表现在高等级铜器群之中。比如曾侯乙墓等高级别铜器群颇有一些特别之处。前已叙及九件曾侯乙扉棱鬲都不设底范，在“Y”形范缝汇集处设浇口，这种简化处理鬲的范型做法也在擂鼓墩 M2 鬲中运用，可见是一种技术倾向，但擂鼓墩 M2 鬲的处理手法不同。曾侯乙墓青铜器对附件的连接方式也有一些不同于楚或郑地的个性特征，曾侯乙青铜器一些爬兽和龙形饰采用活块范浑铸，而楚国青铜器如下寺青铜器附件采用分铸焊接这种技术上较简单而工序更为复杂的方法②。当然，这种技术变化也可能有社会等级不同的背景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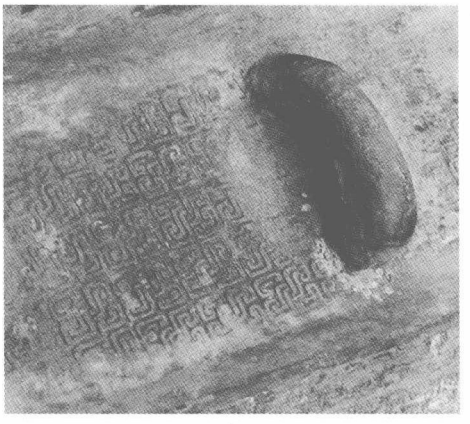
某些技术难度较高的因素常常出现在高等级铜器群如曾侯乙墓青铜器之中，以满足其造型较复杂的器形或结构较复杂的装饰。如前所述，曾侯乙墓青铜器铸造采用较多的组合范技术运用于编钟、镇等器类，曾侯乙墓和擂鼓墩 M2 青铜器都采用有水平分范这种较复杂的合范技术，曾侯乙盘、匜鼎还采用不同于鼎足的先铸技术。上述技术环节，不仅不见于曾国其他铜器群，在两周时期其他等级不高的铜器群中也颇为鲜见。曾侯乙墓、擂鼓墩 M2 和其他等级较低的铜器群，不仅铜器群规模、青铜器品质相差较大，它们各自所采用的工艺技术也颇为不同。也就是说，青铜器技术运用的复杂及优良程度，是随着不同社会等级、或者相同社会等级但不同的经济实力的变化而变化。

在社会等级较低的铜器群中，分铸技术存在一些变化。第二阶段青铜器附件绝大多数为分铸焊接或铸接，但第三期的一些簠，附耳不像同时期其他簠那样粗大且饰半浮雕的兽面纹，而是近似于环纽状，这类簠耳在耳、腹壁之间设芯范，浑铸成形，见于汪家塄曾孙定簠和东风油库 M1、M2 簠（图 4.4－11，1）。这种浑铸器耳的簠不同于曾侯遗、曾侯郧与曾侯乙各位曾侯之簠，也不同于同时期其他楚式簠，其背景是什么？如前

① 万家保：《辉县及汲县出土东周时期青铜鼎形器的铸造及合金研究》，《大陆杂志》第 50 卷第 6 期，1975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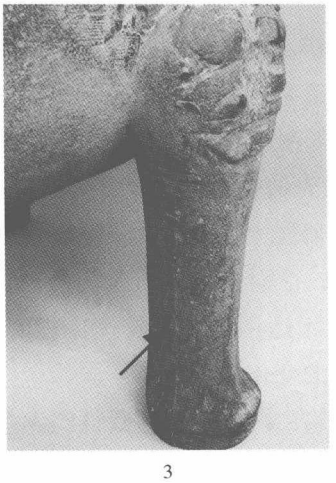
② 赵世纲：《淅川下寺春秋楚墓青铜器铸造工艺》，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淅川下寺春秋楚墓》附录二，文物出版社，1991 年。

所述，分铸焊接技术因为分解工序环节而扩展劳动力分工，从而扩大生产规模提高生产效率，这是春秋中期以来青铜器广泛采用分铸焊接技术的一个社会背景。但另一方面，曾国这样的小诸侯国一般的需求只是小规模的青铜器生产——如果曾国拥有自己的青铜器生产的话，也无需多环节的劳动分工，因此分铸焊接技术并非是绝对的技术选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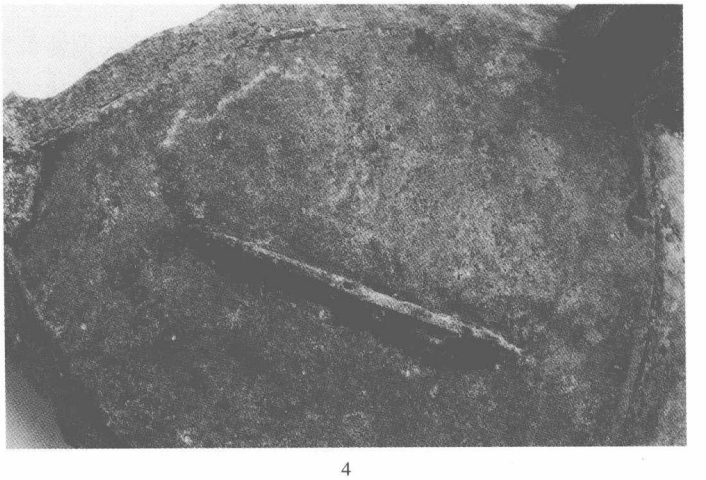


1

2



3



4

图 4.4－11　第二阶段曾国青铜器铸造工艺

1. 东风油库 M2 簠浑铸的耳　2. 东风油库 M2 方壶芯撑情况　3. 擂鼓墩 M2 卧牛纽盖鼎足部侧分范情况　4. 东风油库 M2 鼎的三足浑铸、三角形底范

曾国青铜器一些铸造工艺特征与楚国或楚系青铜器表现出较多的共性，类似的共性在春秋晚期前后在更大区域范围同样存在。不过在一致性较强的前提下，不同区域仍然有所差异，这种差异往往存在于不同的考古学文化之间。例如，第二阶段铜鼎鼎足先铸是因鼎作为炊器的特殊处理，其他非炊器器类足往往为焊接。但在太原赵卿墓中盘、炉

等分铸的蹄足一并先铸①，将铸鼎技术延展到炊器之外。而楚系青铜器中即便是升鼎，也仍然焊接鼎足。这与焊接的技术难度小于先铸相关。曾国的地理和文化背景更为接近中原文化，因此在某些方面较楚文化更早接受或同步于中原文化。例如辉县琉璃阁、新郑祭祀坑和郑公大墓青铜器壶类器常在圈足处设较大的泥芯撑，铸后在圈足处形成镂孔。第二阶段曾国青铜器第二、三期的75刘家崖方壶、东风油库方壶（图4.4－11，2）都有这一技术特征，而楚国壶类器则不见。又如在辉县琉璃阁甲墓一些青铜鼎中②，先铸的鼎足范型为前后合范，范缝在鼎足两侧。大约在春秋晚期③，这一技术流行于郑洛地区及其周围。而楚系包括曾国青铜器鼎足范型绝大多数为左右对开，范缝在足之前后中轴线上。至战国中期偏晚阶段，在包山和望山楚墓青铜器中，才可见一些范缝在足侧的做法④。但在曾国，擂鼓墩M2卧牛纽盖鼎已经出现了这一技术特征。（图4.4－11，3）包山和望山鼎的做法或可能是通过曾国接受中原文化的影响。

东风油库M2鼎足、耳浑铸，范型作3－△＋1式（图4.4－11，4），与同时期曾国青铜器迥异而表现出西周中晚期青铜鼎的铸型特征。在长江下游地区，许多春秋时期青铜器的工艺特征还包括一些形制特征仍然保持有西周中晚期风格而少有变化，许多青铜鼎范型均作3－△＋1式⑤。东风油库M2鼎器形、纹饰乃至铸型特征都与长江下游地区一些鼎相同，当为该地区产品。

长江下游地区因为西周灭亡而使这一地区在春秋晚期之前“铜器工艺得不到中原地区新技术和新艺术信息的补充，铜器的形态和纹饰呈现出明显守旧的趋势”⑥。这一滞后性如上所示，在铸造技术方面的表现更为充分。蔡侯墓受长江下游文化影响较大，其升鼎圆形底范又专门作出象征三角形底范的凸起，是西周鼎范型的一种遗型⑦。丹羽崇史以长江下游地区与江汉地区鼎范型特征作对比，从而认为春秋时期鼎的范型特征存

---

① 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晋国赵卿墓》图32－34，文物出版社，2004年。

② 河南博物院等：《辉县琉璃阁甲乙二墓》如Z甲－1、Z甲－3：1～3：8鼎，大象出版社，2003年。这些鼎均为简单的蹄形足，足上部无扉棱或半浮雕兽面纹。

③ 琉璃阁大墓年代有不同说法，参见李琴、杨式昭：《辉县甲乙二墓出土青铜器》，河南博物院等《辉县琉璃阁甲乙二墓》论述二，大象出版社，2003年。

④ 可参湖北省博物馆：《图说楚文化——恢诡谲怪　惊采绝艳》130页望山1号墓汤鼎、131页包山2号墓螭纽鼎、环耳环纽鼎等，湖北美术出版社，2006年。

⑤ 这些情况在皖南一带青铜器即多有反映。参安徽大学等：《皖南商周青铜器》，文物出版社，2006年。

⑥ 孙华：《中国青铜文化体系的几个问题》，《考古学研究（五）》，科学出版社，2002年。

⑦ 苏荣誉等：《中国上古金属技术》第161页，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年。另外，在江陵天星观M2包括升鼎的几件鼎底，报告线图也绘有“Y”形结构，但在报告文字部分未作相应说明，其性质不明。参见湖北省荆州博物馆：《荆州天星观二号楚墓》，图23、25、28，文物出版社，2003年。

在区域差异①。由前面我们对鼎范型的发展分析可知，这一结论并没有代表性。我们当然不能以技术滞后的长江下游地区为典型说明区域差异的广泛存在，更不能因此认为江汉地区与中原地区之间铸造技术方面存在范型特征这样的系统差别。

六 小 结

1）第二阶段曾国青铜器处于分铸焊接技术广泛应用这一技术变革的历史大势之中，因此这一技术特征在曾国青铜器中也有充分的表现。在各个不同时期，曾国青铜器都与主流技术保持着一致。大而言之，这种一致性在当时各个不同的地域文化系统之间，如楚系与晋系青铜器之间，也一并存在。因此，所谓楚系或晋系青铜器之间的文化差异，更多的是表现在青铜器外在形式的不同，而在技术上并未形成系统的差异。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不同地域文化之间技术交流所形成的一致性，是其后秦国从政治上统一中国的一个重要的内在因素。

2）由于分铸焊接技术广泛的应用并因此使铸造工艺技术要求降低和工作效率大大提高，春秋中期及其后诸侯国青铜器得以有突破性发展并形成了一些区域青铜文化系统。当时曾、蔡等小国青铜器也得益于此，同样在分铸焊接技术下得到发展。

分铸焊接技术当然也影响到青铜器器物形制，并使青铜器形态分化为器体和耳鋬等附件两个大的铸件类别，铸造技术的重心较大地转移到附件部分。同时，分铸焊接流行之初的春秋中晚期因为技术的刺激，使青铜器铸型和连接方式出现多样性的变化，这一点从鼎的范型变化可以清楚地体现。如果说，第一阶段曾国青铜器因其处于特殊的历史变革时期而导致青铜器变化频率缓慢，那么，第二阶段曾国青铜器则是因其处于特殊的技术变革时期而导致青铜器变化频率加快。

3）西周晚期前后多被学者视为中国古代青铜器发展的一个衰落期，这一时期青铜器铸造技术草率简单，“呈现一种衰颓的趋势”②。即便是毛公鼎等重器，工艺亦“无特异足观之处”，㝬簋甚至“合范的接口处有明显的错动，以致花纹不相连接”③。但是，如果我们审视被视为青铜器新兴时期的春战之际前后青铜器，这种错范等现象仍然比比皆是，这一点在新兴期代表性器群——曾侯乙墓青铜器中有充分的体现。形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由西周中期开始青铜器趋于分铸焊接的大趋势，导致在分铸、简化技术难度之后合范技术的降低。这样看来，我们并不能简单地理解西周晚期青铜器的“衰落”。

---

① 丹羽崇史：《春秋战国时代青铜器生产体制复原的基础研究——铸造技术的地区比较》，湘鄂豫皖楚文化研究会第九次年会论文打印稿，2005年。日本中国考古学会编：《中国考古学》第6号，2006年。

② 邹衡、徐自强：《整理后记》，郭宝均《商周青铜器群综合研究》第201页，文物出版社，1981年。

③ 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青铜器》第222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

4）同第一阶段一样，第二阶段曾国青铜器工艺方面大的个性特征表现不多，而只是在一些细节方面略有差异。其表现如曾侯乙墓青铜器中对鬲底范的特殊设置、爬兽与下寺楚墓青铜器的不同做法以及曾国青铜器保留有一些浑铸技术传统等等。曾国与楚国青铜器铸造技术差异表现于细节，是因为这一时期“铸件的个性逐渐消失，共性逐渐增强，……产品就越来越趋于规格化了”①。如果我们从总体上观察像曾侯乙墓这样的铜器群，会发现其工艺整体风格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又表现出不同于其他器群的特性。从这个角度而言，这一时期曾国青铜器同样为曾国所生产，或者进一步说，曾国拥有较大的青铜器生产能力，可能性仍然较大。

5）曾侯乙墓青铜器铸造技术中常见采用水平分范等多块范型合范技术、组合范技术，此类复杂的合范技术多运用于第一阶段及此前时期，与第二阶段合范技术趋于简化的时代风格不同。显然，这是对曾侯乙墓这种高等级青铜器相对复杂的造型所作的技术选择。古代生产技术传统往往是经验式的代代相传，技术难度较大的合范技术传统可能在当时为高等级贵族服务的铸铜作坊中一直得以保留。而对于相同时期级别较低或实力略差的贵族，青铜器技术复杂性和产品质量都会有明显较低，那么，这种生产形式和对产品的调整如何组织？是否在当时像曾国这样的附庸小国，也存在不同的铸铜作坊系统？此外，曾国如何获取并高水准地运用失蜡法这种铸造工艺？当时的技术传播或匠人如何服务于作坊？这些生产组织问题都是有待深入研究的。

第五节　器物群

第二阶段的曾国在政治上已经依附于楚。楚国虽然在族群上以蛮夷自居，但在政治上逐鹿中原的同时，其礼制及其表征——青铜文化——仍然是和其他诸侯国一样以传统周文化为基础的。当然，在新的社会阶段楚青铜文化除了继续以鼎为中心，其器用制度也发生有若干变化。在楚的体系之下，曾国青铜器是否有其自身的组合体系？其组合又反映了怎样的贵族群体？

在第二阶段的曾国青铜器中，组合关系大体清楚的铜器群共 12 组，这 12 组铜器群等级分明，明显可分为曾侯和一般贵族两个级别。

一　曾侯铜器群

第二阶段曾侯一级铜器群包括有曾侯乙墓和擂鼓墩 M2 两个。这两个铜器群器物组合都比较复杂，需要进行分类分析。

---

① 邹衡、徐自强：《整理后记》，郭宝均《商周青铜器群综合研究》第 202 页，文物出版社，1981 年。

1. 曾侯乙墓铜器群

曾侯乙墓青铜器可分为乐器（包括乐器支架如鼓座、磬架等）、用器（这里是指包括食器、酒器、水器、日用品和工具的青铜器）、兵器、车马器几大类。其中用器的性质较为复杂，且涉及对于这一时期曾国国君一级贵族器用制度的理解，需要重点分析。

春秋晚期之后，日用品开始出现在一些高等级铜器群之中且其地位日益突出，至战国中期，日用品的数量大增，甚至出现日用品的制作较礼器更加精美的情况。因此，这一时期不再是所有的容器均自动归入礼器，甚至也并非所有青铜鼎均可归入礼器之列。在一些高等级墓葬中，哪些青铜器属于传统的礼器，哪些属于日用品，有时甚至难以判别。但从研究当时器用制度的角度，这一问题却不能回避。

曾侯乙墓也有若干青铜器属于日用品，这一点已被发掘报告和一些学者指出。但是有些器类性质的划分，仍然需要加以讨论。按照我们的理解，这里将曾侯乙墓用器的性质列如表4.5－1。这一划分与发掘报告以及一些学者的观点不同，这里略作申述。

表4.5－1　　曾侯乙墓用器器类登记表

食器													数量
镬鼎2	升鼎9	牛纽盖鼎5	四纽盖鼎	三纽盖鼎	绳纹鬲	小鬲9	甗	簋8	簠4	浅盘豆2	盖豆	鼎形器10	54
鼎钩2、匕	匕	鼎钩5				匕2						匕10	21

酒器							数量	水器								数量
圆壶2	提链壶2	方鉴2	方尊缶2	尊缶2	盘	尊	12	小口鼎	盥缶4	圆鉴2	炉	匜鼎	三足盘	平底匜	三足匜	12
禁		过滤器、勺2					4		斗		箕、漏铲				钩形器	4

日用品							数量	工具			数量
角形纽盖鼎2	素面盒2	蟠虺纹罐	炉盘	镇4	熏	镂空杯	12	削刀4	刻刀	凿	6
		勺					1				

说明：各类别的第二栏指相应器的配件。

青铜器性质认定的标准应当考虑器物形制、铭文以及器物位置关系几个方面因素。曾侯乙墓纹饰中镶嵌式龙纹或变形龙纹特征突出，在本章纹饰一节认为装饰这类纹饰的青铜器可能属于同一批铸造，它们的性质接近，多属于礼器。曾侯乙墓铭文在相同类别青铜器中也明显具有一致风格，是否带有铭文也往往和器类性质相关。此外，纹饰与铭文的特征也往往相互关联。例如，曾侯乙甬钟饰蟠龙纹，均有“曾侯乙作時”铭文，而纽钟均素面，亦无铭记式铭文。曾侯乙两件镬鼎纹饰分别为铸造和镶嵌，两件镬鼎及

配套鼎钩铭文相应地不同：铸造纹饰的镬鼎（C96）铭文2行左行，“侯”反书，鼎钩铭文一周逆旋，“侯”字亦反书；镶嵌纹饰的镬鼎（C97）铭文2行右行，“侯”正书，鼎钩铭文一周顺旋，“侯”字亦正书。类似的情况还很多，这说明纹饰、铭文和器物性质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关系，是判断青铜器性质的重要依据。

曾侯乙墓青铜器的摆放位置规律性也较强。例如尊盘、方鉴缶、联禁大壶、酒器多放置在中室中部偏东，只有一对大尊缶可能因为体量过大而放置在北室。小口鼎、盥缶、鉴、盘、匜放置在中室西南角，彼此邻近。青铜器配件与主体的位置也极为一致，如鼎钩都放置在鼎耳之旁，不同的匕都放置在相应的容器内。依据这样的位置关系，基本可将多数青铜器的性质廓清。

发掘报告将炭炉及相关的箕、漏铲归入青铜用具（即日用品），李零也作相同的认识①。青铜箕、漏铲自商时期开始即只见于高级别贵族墓葬，周文化继承了这一传统。在楚系墓葬中青铜箕、漏铲亦只出土于高级别铜器群。曾侯乙墓箕、漏铲置于炉内，3件铜器内在关系明确。炭炉和漏铲都饰镶嵌类变形龙纹，暗示其与礼器的关系。箕饰席纹，为仿实物纹饰，较为特别。这几件铜器都有“曾侯乙𠭯時用终”铭文，与其他礼器铭文相同。再考虑到炭炉的位置在两件镬鼎之间，这组铜器的性质无疑是用作炊器的，其功能可能是配合镬鼎的使用。

发掘报告将出于中室两件食具箱内的角形纽盖鼎、素面盒、蟠虺纹罐分别归入食器和酒器，这一分类同样不妥。素面盒放置在盖鼎三足之间，拼合后再卡入食具箱。食具箱这样的设计如同战国中期及其后青铜套盒和套杯的做法，可能是方便旅行之用。这几件铜器均不饰曾侯乙墓礼器最常见的镶嵌式纹饰，同时也都不见铭文——这与曾侯乙墓除炊器少见铭文、其他礼器一般带有铭文的情况明显不同，因此不能将食具箱内包括鼎在内的容器归入礼器之列。

同样，钩形器带有“曾侯乙𠭯時用终”铭文，且置于三足匜内，发掘报告将其归入日用品之类不妥；双层炉盘无纹饰、铭文，发掘报告将其归入炊器类礼器也不合适；按上述依据判断，鹿角立鹤亦显非日用品，其功能或可能用作乐器②。

2. 擂鼓墩M2铜器群

擂鼓墩M2青铜器可分为乐器（编钟、鼓座）、用器（包括食器、酒器、水器）、车马器几大类。墓葬出土的另外一些青铜构件可能附属于棺椁。

擂鼓墩M2青铜器在墓室内摆放位置的规律性，与曾侯乙墓极为接近。一些性质相同的器类位置接近，如编钟、磬、鼓座等乐器单独列于墓室西、南侧边，升鼎、簋、簠

① 李零：《论楚国铜器的类型》，《出山与入塞》第321页，文物出版社，2004年。

② 方酉生：《有关曾侯乙墓的几个问题》，《武汉大学学报》（社哲版）1981年第6期。

等核心食器横列于墓室中部。M2 青铜器配件与容器的组合关系也与曾侯乙墓青铜器相同，如匕依附于升鼎和小鬲，箕、钩形器分别出土于炉、匜之内，漏斗放置于方尊缶旁等等。据此，位置关系不明确的勺应当附属于方尊缶。根据上述情况，可以将擂鼓墩 M2 用器的组合关系整理如表 4.5－2。

表 4.5－2　　擂鼓墩 M2 用器器类登记表

食器													数量
镬鼎	升鼎 9	大立牛纽盖鼎 2	卧牛纽盖鼎 2	大立牛纽盖鼎 2	绳纹鬲	小鬲 9	甗	簋 8	簠 4	浅盘豆 2	方豆	盂	43
	匕、鼎钩	鼎钩 2				匕 2							6

酒器				数量	水器					数量
方壶 2	圆壶 2	方尊缶 2	尊缶 2	8	小口鼎	盥缶 2	炉	盘	匜	6
		漏斗、勺		2			箕		钩形器	2

说明：各类别的第二栏指相应器的配件。

擂鼓墩 M2 出土有铭铜器只有盛君簠，或据之以为即 M2 墓主①，但一般认为盛君为楚国封君，并非 M2 墓主。例如，何浩认为盛君即成君，封地即《左传》之成臼，地望在今钟祥境②。无论如何，仅仅依靠个别铭文而判断墓主是危险的。根据我们对擂鼓墩墓群墓葬性质的分析，擂鼓墩 M2 应当也是曾侯一级墓葬③，M2 墓主也是一代曾侯。

3. 曾侯乙墓与擂鼓墩 M2 铜器群比较

比较曾侯乙墓和擂鼓墩 M2 铜器群，会发现它们在反映社会等级的类别构成上颇为近似。两座墓葬青铜器在大的类别构成上均可分为乐器、用器、车马器等大类，只是 M2 未见日用品与兵器。在乐器方面，M2 和曾侯乙墓一样包括编钟、编磬、建鼓④等。M2 编钟 36 件一套，仍然是周代编钟中迄今所见仅次于曾侯乙墓编钟、件数第二的编钟。擂鼓墩 M2 用器的组合和核心器类的数量，与曾侯乙墓青铜器接近。例如两座墓葬的炊器均见升鼎 9、甗 1、小鬲 9，并配以簋 8、簠 4、豆 2，M2 以方豆替代曾侯乙盖豆。两座墓葬的酒器用方形和圆形的壶、尊缶各 2 套，曾侯乙未见方壶，但其联禁圆壶

① 饶宗颐：《谈盛君簠——随州擂鼓墩文物展侧记》，《江汉考古》1985 年第 1 期。吴郁芳：《擂鼓墩二号墓簋铭“盛君縈”小考》，《文物》1986 年第 2 期。

② 何浩：《楚国封君封邑地望续考》，《江汉考古》1991 年第 4 期。

③ 张昌平：《关于擂鼓墩墓群》，《江汉考古》2007 年第 1 期。

④ 擂鼓墩 M2 不见曾侯乙墓青铜编磬架，但出土石磬 12 件。M2 也不见曾侯乙墓漆木类乐器，这与该墓保存条件相关。M2 保存较差，棺椁等有机物已朽烂。

明显均有方壶的性质。曾侯乙使用的水器较 M2 略为复杂，但以小口鼎、盥缶、盘、匜为基本组合的布局是相同的。两座墓葬青铜器共有一些少见于其他文化的个性特征，如方尊缶配有漏斗，匜带有钩形器等等。这些既反映出两个铜器群相同的器用制度和享受相同的级别，同时也说明它们具有相同的文化背景和传统。

但是在体现经济实力的因素方面，两座墓葬则较多差异。一方面，两个铜器群相同类别、相同数量的铜器存在体量、精致程度上的差别。另一方面，两座墓葬器类特别是非礼器类器物存在差异，如曾侯乙墓出土的日用品、兵器、工具均不见于 M2。战国中期青铜器一个发展方向，是日用品的数量和精致程度增加，从中原地区到南方的楚国，高级别铜器群中日用品都占有一定的比例，如包山 M2 出土有樽、套盒、人形灯具等日用器具①，这些器类铸造质量颇精，而同墓出土的许多青铜礼器则有漏铸、器内带范土等近乎明器的特征。曾侯乙墓的日用品有鼎、盒等青铜容器和镇、熏杯等，鼎、盒、罐等容器以卡、扣等方式紧凑地盛放在食具箱内，器物设计和铸造独具匠心。曾侯乙镇两对，其表面蟠龙缠绕，蟠龙的铸造需运用难度很高的嵌范技术。这些情况说明日用品虽非礼器，但在当时青铜器中占有重要地位。相比之下，擂鼓墩 M2 较曾侯乙墓为晚，日用品的数量应当有所发展而实际却未见，明显与当时的时代风尚不合。究其原因，可能与当时曾国去灭国不远，政治、经济均较曾侯乙墓时期有较大的下降。

二　一般贵族铜器群

第二阶段曾国一般贵族铜器群组合稍完整的共见 10 个，它们在年代上只属于第一至三期，属于战国时期的曾国青铜器只见有零星铜器，器群则未见。因此这里只能讨论属于战国早期之前的贵族礼器的使用情况。

第一至三期曾国铜器群按器物类别可列如表 4.5－3。

从器形、纹饰乃至铸造技术来看，第二阶段第一期曾国青铜器有从第一阶段过渡而来的特性，这一特性在器物组合上也有明显的表现。第一期中只有八角楼墓葬为全新的组合形式：鼎与盏的组合，盖鼎和盏也都是第二阶段新出现的器类。第一期其他几群青铜器组合形式都不甚完整，其全貌已难窥知，但其过渡性质依然可见。80 刘家崖鼎、鬲、簋、圆壶从器形到组合都仍然保持了第一阶段的基本特征；而季氏梁墓葬、罗山高庙鼎、簠的搭配，虽然体现了第二阶段的组合形式，但季氏梁墓葬簠、罗山高庙鼎、圆壶俱为第一阶段形制特征，过渡性仍然存在。

---

① 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 年。此现象在战国中晚期高等级墓葬中尤为常见。

表 4.5－3 第二阶段曾国青铜器器类登记表

期别	器类 / 器群	盖鼎	升鼎	甗	簠	盏	圆壶	方壶	盘	匜	兵器	车马器	其他器类	组合值
一	80 刘家崖		2				2				√	√	鬲 4、簋、扁铃 5	Ⅱ
	季氏梁墓葬	1		1	2						√	√	编纽钟 5	Ⅱ
	八角楼墓葬	1				1								Ⅰ
	罗山高庙				2		2		1	1	√	√	鼎 1	Ⅱ
二	75 刘家崖 A	1	3											Ⅱ
	76 义地岗	1				1								Ⅱ
三	汪家墩	1			2						√			Ⅰ
	东风油库 M1	1		1	1			1	1	1	√			Ⅰ
	东风油库 M2	1			1			1	1	1				Ⅰ
	东风油库 M3	1					1		1	1			方豆 1	Ⅰ

说明："√" 表示有此类器物。

第二期材料甚少且残破，但仍然可反映若干组合信息。75 刘家崖 A 铜器群 3 升鼎成列，其等级较高。76 义地岗只见鼎、盏。这两个器群均反映出同时期的时代风格。

第三期的几组铜器群组合完整，一般为食器、酒器、水器各一套。各类器的构成简单，如食器为鼎 1、簠 1 或 2 件，东风油库 M3 不见簠，但代之以方豆。各器组中酒器仅见一件壶，素面方壶是有曾国个性特点的器类。有水器则必为盘、匜各一。这一时期曾国青铜器组合大约形成了较规整的定式。

以上各组铜器器物群的构成，还可以通过与楚系其他一些级别相当的铜器群比较，以明确曾国铜器群的构成特征。这里选择与第一至三期曾国青铜器年代相近、等级相当的楚系铜器群列如表 4.5－4。

相比曾国青铜器，表 4.5－4 显示，春秋中期楚国或楚系青铜器已经具有与春秋晚期基本相同的组合特征，而不见像曾国青铜器那样明确为周文化的残留成分。也就是说，楚系青铜器较曾国青铜器更早、更彻底脱离周文化体系。而如果将第一期曾国青铜器组合中的一些过渡性特征视为与其时的楚文化的区别的话，则从第二期开始曾国与其他楚系青铜器组合之间基本不见这种不同。曾国青铜器器类中周式传统的部分，也只是楚式青铜器组合中的一部分。换言之，曾国青铜器基本不再独立拥有自身传统因素，而是遵从楚文化青铜器以鼎簠或鼎盏为中心、外加个别酒器和一套水器的组合方式。

当然，曾国青铜器与楚系青铜器组合方式存在较明确的细微差异。以第三期青铜器

表 4.5－4　　春秋时期楚系贵族铜器群器类登记表

期别	器类 / 器群	盖鼎	簠	盏	敦	尊缶	盥缶	盘	匜	兵器	其他器类
一	淅川下寺 M7	2	2	1			2	1	1		勺
	江陵岳山	1	1	1			1	1	1		
二	淅川下寺 M4	1	1				1	1	1		
	襄阳山湾 M15	1		1			1	1	1		
	岳阳凤形嘴山	2	1	1				1	1	√	盉 1、匕
三	淅川下寺 M11	3	2		1	2		1	1	√	车马器
	襄阳山湾 M14	1	1				1	1	1	√	工具
	麻城李家湾 M14	1			1						圆壶
	麻城李家湾 M16	1			1	1				√	

说明：期别指对应于曾国青铜器的分期，“√”表示有此类器物。

为例，同一级别的楚系青铜器不仅不见具有曾国个性特征的素面方壶，也不见圆壶、甗等器类。相反，如学者们已经注意到的那样①，曾国青铜器包括曾侯一级铜器群中不见敦类器。不过，敦的前身——盏却在第一、二期见于曾国铜器群的组合之中。一些楚系青铜器器类不见于曾国青铜器，可能还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曾国的个性特征。另一方面，曾国一般贵族铜器群中不见楚系铜器常见的盥缶，也不见略晚出的尊缶。但在楚墓之中，即便级别较低的墓葬也往往随葬尊缶或盥缶，麻城李家湾 M1、M16 均未随葬水器，但都随葬尊缶②，它们代表的是楚国较低级别的贵族③。有趣的是，盥缶与尊缶在曾侯乙墓和擂鼓墩 M2 中不仅都有出土，而且与楚系高级别铜器群成对出现的情形也相同。是什么原因形成曾国与楚系青铜器在组合上这样一些不同？

下面我们会谈到，第三期曾国铜器群几个所谓“一般贵族”——它们均只使用一鼎，往往在曾国属于地位接近曾侯的上层贵族。这些铜器群组合中使用方壶、圆壶、甗等器类，可能是标志它们在曾国较高的等级，因为壶与甗类器往往在周代标榜较高的等级。但是使用一鼎暗示这些贵族并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如同楚贵族那样使用尊缶或盥缶。由尊缶或盥缶等更多的酒器组成较复杂的铜器群，在曾国只有曾侯的级别才可能拥有。

曾国使用盏的组合不同于楚，也说明曾国可能以不同器类来区别社会等级。八角楼墓葬和 76 义地岗两组青铜器均为鼎、盏组合而未见其他青铜器，说明这种组合可能等

① 郭德维：《曾侯乙墓并非楚墓》，《江汉论坛》1980 年第 1 期。

②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麻城市李家湾春秋楚墓》，《考古》2000 年第 5 期。

③ 王然、丁兰：《麻城李家湾楚墓考析》，《江汉考古》2000 年第 4 期。

级较低。但楚系青铜器相反，出土铜盏的器群往往铜器组合较为齐全，除了表4.5－4所示之外，盏还见于当阳金家山M9、赵家塝M8等墓葬，传世楚国王子申盏（《集成》4643）、楚王酓审盏（《近出》1022）等形式，盏常为楚高级贵族所用。看来曾国青铜盏可能属于等级较低的贵族使用①。

曾国青铜器所反映的曾国贵族等级及贵族构成情况如何？以组合保存较好的第三期几座墓葬为例，这些墓葬墓主身份较为清楚，其社会地位在曾国应当属于上层贵族。东风油库M1墓主是职位为“曾少宰”的黄仲酉，据文献，楚设有少宰，如“少宰如晋师”（《左传·宣公十二年》），“少宰”之职，应当略低于卿士或令尹，大约是政府中第二级次的职官。东风油库M2随葬铜鼎1、簠1、方壶1、盘1、匜1，M1亦见上述诸器，但多出甗1及兵器，因此M2墓主“可”的身份接近于“黄仲酉”。东风油库M3随葬鼎1、方豆1、圆壶1、盘1、匜1，组合上以方豆代替簠，所出圆壶铸造极精美，墓主地位大约与东风油库M1相当。该墓墓主可能为“曾仲姬”，M3出土有曾侯郕鼎，大约是曾侯郕赠送曾仲姬的礼物，曾仲姬可能为曾侯郕之次女。汪家塄墓主身份为曾都尹，曾都尹定又称曾孙定，属于曾国公族。汪家塄墓葬以一件铅方壶代替铜器，也不出这一时期极常见的水器，地位略低于东风油库几座墓葬。由曾都尹定到曾少宰黄仲酉，他们的器用变化不大，这一级曾国贵族从社会地位到铜器组合都是很明确的。

这几组高级别的曾国贵族铜器均用一鼎，而如果前面的推测正确的话，鼎、盏组合所代表的大约是地位低于他们的贵族群体。这些说明曾国贵族构成空间不大。实际上，目前也未发现春秋中晚期级别更低的曾国铜器群。显然，曾国以附庸之国，贵族的分层和群体的数量都很有限。

东风油库所在的义地岗墓地是春战之际前后曾国社会等级仅次于擂鼓墩墓群的墓地，是埋葬曾国国君之外的公族和高级贵族之处。东风油库等几座曾国墓葬墓主身份明确，但它们在楚系国家这一大的平台之下的位置如何？我们可以将这些曾国贵族与其他楚系贵族作一比较，来衡量当时曾国国家力量、政治地位情况。

表4.5－4所列楚系三鼎及以下的部分贵族铜器群，它们中的一类如下寺和襄阳山湾②明确属于楚国贵族铜器。下寺楚墓可能是楚国邡氏家族墓地③，其等级最高的M2，墓主可能是曾经担任楚国令尹的邡子倗。下寺其他墓葬如M7、M11的级别均低于M2，在楚国的地位相当于中级贵族。这一级别的铜器群在赵家湖、山湾均有相当数量的发现。如出土二鼎的山湾M33、赵家塝M8、金家山M9等等。它们代表了这一时期楚国

① 曾侯乙墓出土有金盏。该墓金器有盏、杯等，但未与青铜器形成组合。

② 湖北省博物馆：《襄阳山湾东周墓葬发掘报告》，《江汉考古》1983年第2期。

③ 李零：《再论淅川下寺楚墓》，《文物》1996年第1期。

中等贵族的器用情况。山湾 M14 与山湾墓地的 M23 青铜器组合相同，均为鼎、簠、盥缶、盘、匜各一，李家湾 M14、M16 情况近似，它们与下寺 M11 相比，鼎等数量较少，组合中或不见尊缶和敦——此时楚国墓葬中多以敦替代了此前的盏，或不用水器，因此等级较 M11 略低。山湾、赵家湖和李家湾春秋墓还有一些一鼎墓，一般不随葬水器，这些墓葬代表了楚国下层贵族的情况。因此从下寺 M11 到李家湾 M14，大体体现了楚国中下层贵族的分层情况。

表 4.5－4 所列另一类为楚系铜器群，江陵岳山为养伯之器①，岳阳县凤形嘴山 M1 以盉替代了楚系墓葬中常见的盥缶②，其墓主可能为罗子国国君③。这几组铜器群的组合与相应的曾国铜器群等级近似，有的甚至略低于曾国贵族铜器群。

很明显，楚国、曾国、其他一些较小的附庸国政治实力不同，由此影响到经济、文化领域，因此各国贵族的器用呈递减的梯次，或者说相同的铜器群在不同的政体中代表的是不同的社会等级。

再从历时性的角度看曾国铜器群的变化。从春秋中期至春秋晚期，曾国贵族墓葬的器用等级呈现出下降的趋势。第一期的 80 刘家崖和季氏梁墓葬器群保存不全，但季氏梁墓葬出土有 5 件一组的编纽钟，80 刘家崖也出土体现较高等级的编铃。第二期 75 刘家崖也出土成列的连迁升鼎 3 件，可见连迁享用的等级也较高，75 刘家崖一对方壶不能确定是否属于连迁，但方壶也是代表较高社会等级的器类。而属于第三期的几座墓葬均为一鼎，组合简单。这一变化过程大约暗示了曾国由一个政治独立的诸侯国颓变为附庸国而国力渐衰的情况。曾侯乙墓年代与第三期相去不远，虽然作为国君的曾侯乙与作为曾国少宰的黄仲酉社会地位相差的档次不多，但他们的铜器群组合却差别颇大，这无疑说明曾国国君和国内贵族的分化较为严重。曾侯所拥有的社会财富，远非贵族所能企及。贵族群体及其财富构成，均处于较小的数量。这种社会结构，或许能够部分解释义地岗曾国贵族墓地何以鲜见战国时期曾国贵族墓葬，也能够部分理解何以曾侯乙墓拥有如此规模的铜器群。

三　小　结

曾侯乙墓和擂鼓墩 M2 是东周时期不多见的铜器群保存完好的诸侯国国君墓葬。这两个铜器群器用等级相同，说明它们代表的社会身份都是曾侯一级。曾侯铜器群所代表的楚系高级别铜器组合，其酒器、水器单独成组，食器亦可能存在不同组合形式，例如

① 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岳山大队出土一批春秋青铜器》，《文物》1982 年第 10 期。

② 岳阳市文物工作队：《湖南省岳阳县凤形嘴山一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93 年第 1 期。

③ 张春龙等：《湖南出土的两件东周铜器铭文考释》，《中国历史文物》2004 年第 5 期。

曾侯乙镬鼎、炭炉、甗、绳纹鬲以及两件盖鼎可能形成以镬鼎为中心的组合，而升鼎、簋、小鬲则组成一组盛食器中心组合。这种多组多套的铜器群与曾国其他贵族依靠器类的变化体现身份的不同形成鲜明的对比。

我们已经讨论过曾国青铜器在器形、器类、纹饰、铭文、工艺诸方面存在的个性特征。如果从器物群的角度作综合的观察，曾国与楚系青铜器之间的差别也依然存在，只不过这种差别可能是因为社会等级变化而形成。

曾国贵族在整个春秋时期处于积弱的过程，至春秋晚期，东风油库墓葬所代表的曾国高等贵族所享用的鼎制均为一鼎。几座墓葬墓主身份颇高，但器用等级较低，既说明在春秋晚期曾国的贵族集团构成较小，也反映曾国高等贵族享受的器用甚至还略低于楚国中等左右级别的贵族，这与曾国作为附庸国地位吻合。由此说明，和第一阶段一样，青铜器器用所反映的等级，与器主所处的社会环境相关。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仅仅以墓葬出土材料直接比照历史文献记载而将墓主定位为大夫、士等不同级别，结论的可靠性往往是值得怀疑的。

第六节 结 语

伴随着楚国在政治上的强势，春秋中期开始以传统周文化为基础的楚文化体系形成。而曾国明确自春秋中期开始，在政治和文化等方面都处于楚国的控制之下，属于非常典型的附庸国。不过，从曾国青铜文化的角度看，附庸国地位的形成，经过了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

（一）曾国青铜文化地位及作用的变迁

第二阶段曾国青铜器早晚不同时期的变化，首先表现在曾侯和曾国其他贵族实力的转化上。一方面，曾国的贵族群体经历了一个由大及小的衰弱过程。第二阶段较早时期，曾国在曾侯以外的贵族群体还有一定数量，高级贵族拥有较强的实力。例如第一期青铜器可见使用编钟或编铃的 80 刘家崖和季氏梁铜器群，第二期可见使用 3 件升鼎的 75 刘家崖铜器群。显然，这种等级之下还存在其他地位更低的贵族群体，曾国贵族的构成是多层次的。但春秋晚期之后的情况变化较大，不仅战国时期曾侯之外的其他贵族铜器群未有发现，属于第三期社会地位接近曾侯的贵族仅仅使用一鼎等简单的青铜器组合，其经济实力其实较低。这种层次的贵族之下，社会分层的空间已经很小，整个曾国的社会层次构成较为简单。另一方面，曾侯乙铜器群庞大而复杂的组合，甚至远远不是春秋时期一般诸侯国国君所能够拥有的。无疑，战国时期曾国国君财富较此前有明显的膨胀①。因

① 当然，晚至曾侯乙之后的擂鼓墩 M2，曾侯的实力大减，可能与曾国接近衰亡相关。

此在较晚的战国时期，曾国国君可能相对越来越多地掌握着社会财富。而这一时期地域和人口有限的曾国，社会层次的构成较为简单，因此曾国贵族和平民占有财富的份额相对较小。这样，曾侯掌控的社会财富与其他社会阶层的财富成反比，曾国的实力实际上是比较衰弱的。

曾国青铜文化在第三期前后的文化地位也相应地发生如上趋势的变化。在包括第三期在内直至曾国青铜器存在的最后阶段，曾国青铜文化几乎湮没在楚文化的背景之中，即便像曾侯乙铜器群，其体现曾国文化个性的成分也不多见。这是楚文化体系形成之后，楚国直接控制区域乃至周边区域的文化发展趋同现象的一个表现。这一现象大约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的作用力：一是楚国政治力量作用于文化而形成的凝聚力，二是这一时期青铜铸造技术成熟性并由此产生的一致性趋强，从而推动了文化面貌的一致性。而从曾国青铜器的角度而言，则表现为强烈的文化面貌的单一和次生现象。

但是在春秋中期一段时期，曾国青铜文化在楚文化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却颇为显然。楚系青铜器中的一些典型器类如楚式升鼎、带盖深腹鼎，楚系青铜器流行的蟠虺纹，甚至楚系青铜器铭文的一些特征性辞例，都可以在曾国青铜器中发现其滋生的过程。当然，曾国也不是这些楚文化因素形成的唯一区域，而是作为豫南鄂北地区一个代表，参与酝酿和形成楚文化中的那些共同因素。显然，楚文化并非只是楚国的物质文化发展结果，而是在楚国国势日益强大的基础上，在一个更加广泛的地域范围区域文化因素共同融合作用的结果。曾国作为鄂北豫南地区西周晚期以来的大国，其作用力虽然最终的表现形式为楚文化，但其意义是不可忽视的。就像其他诸多类似曾国的国家，它们对于春秋中期前后晋、齐鲁等文化区系形成的意义一样不可忽视。

（二）青铜器个性因素的存在与青铜器的独立生产

第二阶段曾国青铜器产地问题比较复杂。虽然我们已经有较为充足的理由说明，第一阶段曾国青铜器是曾国本地独立生产，这可能表明第二阶段曾国会继续延续其青铜器生产。但是，第一阶段曾国独立生产青铜器并不能成为第二阶段曾国生产青铜器的直接理由，因为曾国在第一、二两个不同阶段所面临的政治形势完全不同。第一阶段周王室在西周晚期就处于较衰微状态，其后对诸侯国的政治控制力不断下降。因此无论是从政治局面还是从曾国青铜器个性特征，都可以较明确判断曾国青铜器产地背景。但第二阶段控制曾国的楚，在春秋中期已经处于强势并保持着上升的势头，楚对其附庸之国在经济上的控制，我们还没有可供参考的范例。对于曾国青铜器生产，一种可能是楚国会终止曾国这类经济活动。以战国时期曾国微弱的地位而出土曾侯乙墓那样数量惊人的青铜器，如果考虑到如前所述楚国对于曾国文化控制较严格的情况，似乎第二阶段曾国青铜器确有可能生产于楚国。

当然，我们并不能因为曾侯乙墓出土数量大、品质高青铜器而否认曾国生产青铜器

的可能性。以玉器为例，曾侯乙墓出土的同样数量大、品质高，其16节挂饰如同曾侯乙尊盘一样代表了商周时期治玉业的发展水平。但曾侯乙墓出土玉器包括玉料、半成品和改制品，特别是如金缕玉璜经过多次改制，暗示玉器拥有者与制作者近密的关联。这种情况显示曾侯乙墓玉器为曾国自身的玉器作坊生产①，同时也说明曾国拥有高水平的手工业作坊。实际上，春秋中晚期及以后，古代中国青铜器和玉器的生产都已经达到了成熟而发达的水平，它们也不大可能成为最高政府控制的专权。因此，第二阶段曾国青铜器是否也是曾国生产，还是需要从曾国青铜器特征中比照是否存在不同于楚国青铜器的因素，来观察曾国是否可能独立生产青铜器。

第二阶段曾国青铜器的个性因素在不同时期表达在不同方面。第一期80刘家崖铜器群圆壶仍然保持着第一阶段的传统，这一时期铭文辞例、内容也保持着与上一阶段的关联，文字制作和书写水平都颇为低劣。第三期素面方壶非楚式青铜器而是曾国一带的独特器形，此期盘、匜等器形也都有一些不同于楚式青铜器的特别之处。铸造工艺方面有时会采用非时代潮流的混铸器耳，也不是一种常规的选择。这些表现也和第一阶段曾国青铜器一样，既是亚文化青铜器的一种单一、较低社会层次文化的表现，同时又反映出青铜器制作方面非楚中心作坊产品的特性。

曾侯乙墓铜器群异常的规模和品质，值得我们单独关注其生产性质问题。该群铜器有如下一些不同于典型楚式青铜器之处：器类方面出现有个性的仿陶铜鬲，以甬钟为主体的编钟不同于楚系的编镈形式，修长的钟体形制亦不同于楚式钟。纹饰中广泛采用镶嵌绿松石或红铜工艺②，铸造工艺技术娴熟，但分范特别是鼎的分范技术过于整齐划一，不如楚式鼎可能在不同鼎体采用不同的分范技术。铭文布局有所欠缺，也常见反书、漏笔等特别现象。这些个性既说明曾国青铜器不能等同于楚式青铜器，又同样表现出诸侯国青铜器可能在某一方面或某一细节出现的较低水准的景象。尤其是后一点，较充分地说明曾国青铜器为曾国独立生产。实际上，曾国独立生产高水准青铜器的能力，显然并非仅仅限于曾侯乙青铜器群这一特例。曾侯乙盘原来的作器者为曾侯遗，曾侯乙尊最初可能也为曾侯遗所制作③，也就是说，在曾侯乙的先辈，曾国就已经拥有失蜡法制作尊盘这样体现古代中国青铜时代青铜铸造水平的代表作。看来在战国早期，曾国青铜器的生产水平的确已经达到了与这个小国不相匹配的水平。

---

① 张昌平：《曾侯乙墓玉器的改制》，《中国历史文物》2008年第1期。

② 曾侯乙青铜器使用镶嵌纹饰还很难说是一种个性，而更可能为其等级地位使然。

③ 曾侯乙尊盘铭文“曾侯乙𠭯時用終”均为刻铭，系铸后添加，曾侯乙盘原有铸造铭文“曾侯遗之尊盘”，即盘原系曾侯遗所作。

第五章　区域文化之下的曾国青铜器

对外交流和影响能力是一支文化活力和实力的体现。亚文化之下的曾国青铜器与邻近区域、与远距离的其他区域的青铜文化的关系，是检验这一能力的主要途径，也是衡量曾国青铜文化地位的另一个重要标尺。实际上，曾国对外的文化关联，当然是分别与其中心文化——周文化和楚文化的交往为主流。我们从区域文化的角度分析文化关系，目的是观察曾国与其他地区文化之间的交流情况。这需要考察周文化或楚文化因素之外的一些非主流的特殊文化因素。

地理上，秦岭及相关山脉向东迤逦至淮河一线，成为区分中国南北自然地理的界线，也是先秦时期中原文化与南方文化大的分水岭。处于这一地理分界中段的桐柏山，更是南北文化常常交汇地带。西周早期较晚阶段，周文化通过南阳盆地及随枣走廊进入江汉地区，昭王南征失败后，周人退出江汉平原，但周文化传统在桐柏山南麓的随枣走廊则仍然保持未变。约在春秋早期，桐柏山是楚人逐鹿中原需要突破的屏障，历史文献常常可见楚人围绕这一地区与邓、申、息、随、黄等等国家斗争的记载。其后，楚人北出之锋更向东、北的蔡、郑。在西周晚期至春秋中晚期，曾国所在的随枣走廊一直处于不同的政治力量冲突边缘，从这个角度而言，曾国亦即处于频繁的文化交流之中。

我们考察曾国在区域文化中的地位，可以从与曾国相邻区域和不同区域文化关系两个方面入手。

第一节　与相邻区域青铜文化的关系

西周中晚期，周人在东南地区的政治对手主要是淮夷或南淮夷，周王室所倚靠的军事前沿与屏障是桐柏山北麓的诸侯国，其中先后有今南阳一带的噩国、申国①。由于这一文化背景，随枣走廊地区的青铜文化既与其北的宗周文化势力交往密切，同时也与东北的淮河流域形成较多的文化关联。因此，也有一些学者直接将文化联系紧密的随枣走廊一带即汉水以东地区、今信阳地区一带的淮河中上游地区划归为一个文化地带，称之

① 刘翔：《周夷王经营南淮夷及其与鄂国之关系》，《江汉考古》1983 年第 3 期。

为汉淮地区①。“夹在汉淮两水间的今河南、湖北交界地区……，春秋时民族众多，不同类型的文化在此交流融会，有特别值得研究的特点”②。曾国在第一、第二两个阶段，除了分别与其中心地区的文化关联之外，与淮河中上游地区的文化关系也一直较密切。我们分别以黄国、蔡国作为这一地区的代表，比较观察它们与曾国青铜器关系的状况。

一 黄 国

第一阶段的曾国在政治上没有像噩国、申国那样与周王室有频繁的接触，相反，曾国与黄国关系颇为密切。黄国位于今光山、潢川一带③，其见诸历史文献的记载主要是春秋早期与楚国的交恶情况，并于公元前648年灭于楚。曾国与黄国在地理和政治上近密的关系，为我们观察它们的文化关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标尺。

黄国青铜器也以春秋早期者多见，一些青铜器见于传世。较集中的几批黄国青铜器有：

1983年光山宝相寺发现黄君孟夫妇墓，出土数量较多的青铜器和玉器④。

1988年在黄君孟墓之北发现黄季陀父墓，出土铜鬲等青铜器⑤。

上海博物馆近年收集黄国青铜器5件计壶2、鑐、盘、铷⑥。

上述黄国青铜器中黄君孟夫妇墓年代在春秋早中期之际，墓葬身份性质清楚。以下以其为重点阐述黄国与曾国青铜器的关系。

黄君夫妇墓为单穴双椁室（G1、G2）合葬墓，墓葬保存较好，两间椁室南北排列，根据G1椁室枕木叠压于G2之上的关系，G1下葬稍晚。此外，简报称墓葬带有封土和一条向东的墓道。

G1：出土青铜器14件，其中包括容器（图5.1－1）鼎2、豆2、壶2、鑐2、盘1、匜1以及兵器戈1件，铜器上均铸有“黄君孟”铭文。因此G1墓主为“黄君孟”没有问题。

G2：出土青铜器22件，计有鼎2、鬲2、豆2、壶2、鑐2、盉形器2、小鑐1、盘1、匜1、方座形器1件，工具4件以及残器2件。上述容器（除一件盉之外）均铸有“黄子作黄夫人”铭文，G2主人为黄夫人无疑。

---

① 张正明：《汉淮之间——周代的一个文化交错地带》，《中原文物》1992年第2期。

② 李学勤：《光山黄国墓的几个问题》，《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2期。

③ 徐少华：《周代南土历史地理与文化》第三章第四节，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

④ 河南信阳地区文管会、光山县文管会：《春秋早期黄君孟夫妇墓发掘报告》，《考古》1984年第4期。

⑤ 信阳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光山县文物管理委员会：《河南光山春秋黄季佗父墓发掘简报》，《考古》1989年第1期。

⑥ 周亚：《伯遊父诸器刍议》，《上海博物馆馆刊》第十期，上海书画出版社，2005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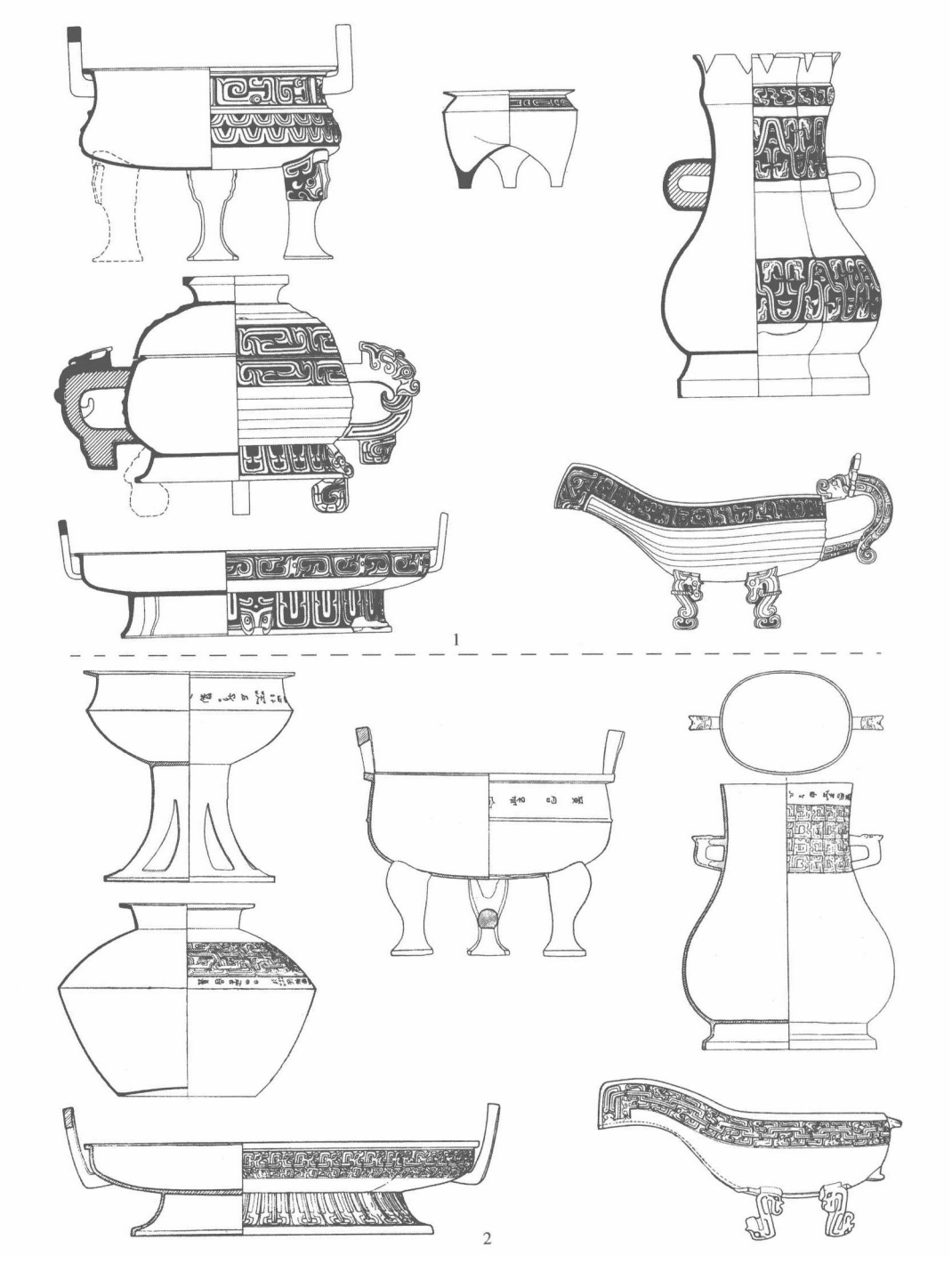


图 5.1－1　曾国与黄国铜器群比较

1. 周家岗铜器群　2. 黄君孟铜器群

G1 与 G2 均出土大量玉器，其中 G1 出土 54 件，G2 出土 131 件。此外 G2 出土有竹器、漆木器等。值得注意的是 G2 黄夫人墓随葬品无论是青铜器还是玉器都远较 G1 的黄君丰富，当然这在两周之际前后并非孤例，但仍然暗示黄夫人地位的重要性。

G1 与 G2 青铜器形制几乎相同，其年代相当，相对年代在春秋早中期之际也很清楚①。

曾、黄两国在地理位置上作西南—东北向毗邻，两国之间穿越桐柏山的交通孔道颇为便利②。两国的联姻，反映其在政治上有类似结盟的紧密关系。黄国嬴姓，曾国姬姓，青铜器铭文常见黄、曾婚嫁相关内容。

反映黄国之女嫁于曾国者如：

72 熊家老湾黄季作季嬴鼎："黄季作季嬴宝鼎，其万年子孙永保用享。"

72 熊家老湾黄季小鼎："黄季作⊠⊠⊠，其万年永宝用。"

苏家垅铜器群两件较大的鬲："唯黄朱柁用吉金作鬲……"

熊家老湾两件鼎当为黄季为嫁其女入曾国所作的媵器，苏家垅鬲也应与黄女嫁入曾国相关。苏家垅鬲如为黄国女子所作之器，从称谓看，则器作于出嫁之前，否则多会称作"曾×嬴"了。按照曾、黄两国通婚的关系，郭家庙 M1 出土的簠"曾孟嬴削自作行簠，则永祜福"，也可能系嫁曾之黄女所作之器。

反映曾国女子嫁入黄国的，传世曾侯作叔姬簠有："叔姬霝作黄邦，曾侯作叔姬邛嬭媵器鼒彝"。此器曾侯如何媵叔姬与邛嬭二女，学者多有说。但曾女嫁入黄国之实，则是无疑的。黄国青铜器中或有姬姓女子，如考虑这一时期曾黄关系，她们也极可能来自于曾国。如 G2 出土的鬲、豆、鑐、盉、匜，均为黄子作其夫人之器，如"黄子作黄夫人孟姬器，则永宝霝冬"，此孟姬就可能为曾女。

黄与曾的密切关系，一直持续到黄国灭亡前夕。属于第二阶段的曾子季㚇臣铜器群发现于黄国的势力范围罗山高店，就反映了这一背景。

曾、黄两国在地理与政治上的近缘关系，是否表明他们在文化上会形成同样近似的特征？

黄国青铜器基本上仍然属于周文化体系，其组合以食器加酒器和水器的搭配是周文化高级铜器群的基本形式，食器和酒器成对、盘与匜相配，也在西周晚期以来的周文化序列中常见。黄君孟夫妇铜器群器形、纹饰等基本因素与同时期青铜器也基本相同，如

---

① 李学勤：《光山黄国墓的几个问题》，《考古与文物》1985 年第 2 期。刘翔：《论黄君孟铜器群》，《江汉考古》1988 年第 4 期。

② 由随州顺沿溳水北部支流上行，穿越桐柏山进入信阳一带的淮河上游，至今仍然为交通线路。实际上，溳水北部一些支流源头距淮河南部一些支流源头的直线距离都只有数公里。

立耳蹄足鼎、龙纹鬲以及盘与匜的基本形制，均与周式青铜器近似。但是，这两个铜器群个性成分颇多，也是十分突出的现象。在器物组合上，以豆替代簋，少见于当时的青铜器组合①，常见的盉形器、罍或来自东部地区的影响，或不是中原文化的主流器类。多数容器基本器形虽然为周式，但都有一些个性之处，如鼎腹部较宽而底部略平，与中原地区常见的立耳鼎有所不同。虽然最常见的蟠螭纹代表了这一时期的新风格，但纹饰在黄国青铜器中所占的幅面较小，器物表面给人以光素之感。有些器物如豆、盉形器以及部分的鼎器表的确未作装饰。或因为如此，不少青铜器将铭文铸在器表，这一做法也实际上是一个较突出的个性特征。总体来看，黄国青铜器特征大体处于中原文化边缘，文化性质具有较多的淮河中下游地区倾向。

毫无疑问，黄国青铜器上述这样一些特性，说明它们为黄国本国独立生产的产品而非外地输入。

上述黄国青铜器较强的个性特征另一方面的背景可能是黄君孟夫妇两个铜器群年代较晚。在较早时期，黄国青铜器似乎与中原文化的一致性稍强一些。以青铜器铭文为例，72 熊家老湾出土的两件西周晚期黄季鬲，铭文、结构辞例完全与周式铭文相同。而黄君孟夫妇铜器群铭文地域特性则颇为突出。G1 容器铭文内容均为相同的“黄君孟自作行器，子子孙孙则永祜福”，各器铭文内容的变化在子、孙是否有重文上。铭文布局除了盘、匜作三行的长方形构图之外，其他铭文均作一行布局。G2 铭文内容有两类，一类为：“黄子作黄夫人孟姬器，则永宝霝冬”，另一类为：“黄子作黄夫人行器，则永祜福，霝终霝后”。两类铭文各有漏字、不全等现象。从两件形制相同的鼎、鬲分别铸有这两类铭文看，铭文内容虽然不同但这批青铜器仍然为一套，其制作时间可能也是大体相同的，即都是代表春秋早中期的年代。上述铭文的个性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1）辞例“祜福”、“霝终”不是周文化青铜器铭文辞例特点而是个性特征②。2）一些铭文作单行布局；或者一些铭文虽作多行布局，但其整体未呈长方形构图。这些现象是铭文制作不规范的反映。3）漏字、文字不全反映了地方青铜器铭文制作水平较低的情况。

黄君孟夫妇墓两个铜器群年代相当于曾国青铜器第一阶段第三期偏晚的阶段，铜器群中包含春秋中期出现的新的因素已经较多，比如青铜器纹饰普遍为构图较细密的蟠螭纹。曾国青铜器中只有曾孙史夷簠、曾伯霥簠等几件簠作如此装饰③，其他青铜器纹饰

---

① 黄君孟夫妇铜器群均有带盖素面豆，可能仿自陶豆。豆作为青铜礼器开始流行于春秋中期之后。

② ［法］麦里筱《彝鼎套语程式与春秋铜器铭文释读举隅》，中国文物学会等编《商承祚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文物出版社，2003 年。

③ 曾国与黄国青铜器纹饰的相似性，参见第二章《曾国青铜器分期》第二节《分期》第一阶段第三期的纹饰分析。

如本书第四章所述，更多的是一种过渡性质。黄君孟夫妇墓均出土横截面为椭圆形的壶，黄夫人壶器耳作爬兽状，也都是此后春秋中晚期流行的爬兽耳壶的早期形式。

黄国与曾国青铜器在文化特征上的差异是一望而知的，这一点在黄君孟（G1）与周家岗两个铜器群上表现得十分明确（图5.1－1）。其实这两个铜器群礼器的组合大体接近：

黄君孟铜器群组合：鼎2、豆2、壶2、鑐2、盘1、匜1。

周家岗铜器群组合：鼎2、鬲2、簋2、圆壶2、盘1、匜1。

黄君孟铜器群以豆代簋，同时多出鑐两件。周家岗铜器群多出鬲两件，但黄君夫人铜器群也见一对鬲，可知这一时期黄国器群鬲的组合也是存在的。除了前述黄国青铜器非周式因素较多之外，黄国和曾国青铜器的差异主要在器物形制上，如黄国鼎均作立耳，与曾国以附耳鼎为主不同，两国的盘与匜大体接近，但在圈足或足部采取了不同的处理方式。这一方面说明黄国青铜器和曾国青铜器一样，个性因素在器形方面发挥得较为充分，另一方面又暗示曾国与黄国之间虽然存在频繁的文化交流，但未形成特别强烈的区域共性。

黄国青铜器当然也有与曾国青铜器明确一致之处。如果略去两国青铜文化作为周文化体系之下的那些共性，仍然可见若干因素反映两国或者是两个地区之间的内在关联。这主要反映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曾黄两国都出现某些较特殊的器类。黄夫人孟姬墓中出土的方座形器，形制独特，相同的器类又见于年代略早的郭家庙M17。如第二章所述，M17为曾国国君夫人墓。方座形器在春秋中期之前见于黄、曾两国，且均出于夫人之墓，说明两国对方座形器性质的认同。此类器在春秋中期之后还有进一步发展，我们会在下一节中谈到。

其二，曾黄两国都流行或较多见某些非主流文化的器类。京山苏家垅铜器群出土的两件黄朱柁鬲，根据铭文可知为黄国所铸。鬲形制为折肩扁体，饰重环纹，与曾国流行的重环纹扁体鬲形制相同。这两件鬲肩侧的新月形扉棱装饰，也见于曾国的京山檀梨树岗鬲和随州何家台鬲。曾、黄两地共同出现这类我们称之为周式变异特征的青铜器，应当是地域文化共性的一个反映。相似形制的重环纹扁体折肩鬲，还见于信阳平西（《全集》7－106）以及这一区域背景的番国①。不过，此类重环纹鬲在曾国更为流行，黄国青铜鬲的形制除此之外，还见龙纹鬲，鬲的器形变化可能略多一些。除了折肩鬲之外，鑐也在曾、黄两国特别是黄国流行。

其三，曾黄两国青铜器铭文都可见一些较特殊的辞例或字形。曾国青铜器中曾子伯

① 例如番君鬲也作相同形制。参见故宫博物院：《故宫青铜器》图218，紫禁城出版社，1999年。

諳鼎："曾子伯諳铸行器，尔永祜福。"又如曾孟嬴削簠："曾孟嬴削自作行簠，则永祜福。"（图5.1－2，1）此种以"行器"为类别、嘏辞为"祜福"的铭文辞例，还见于曾亘嫚非录鼎、曾子尿簠。黄君孟夫妇青铜器也多见类似辞例铭文，黄君孟青铜器常见"黄君孟自作行器，子子孙孙则永祜福"。黄国夫人孟姬墓多件青铜器则有"黄子作黄夫人行器，则永祜福，需终需后"（图5.1－2，2）。上述铭文辞例只见于曾、黄两国，其格式为周文化体系青铜器铭文不见。"祜福"有大福之意，在曾国青铜器铭文中，此二字均作正常的"祜福"写法，即在"礻"侧加各自的声旁。但在黄君夫妇青铜器铭文中，"祜福"写法与曾国铭文均不相同，而是出现一些变化："祜福"常作相似字形，有时在其上另加"宀"部首。我们知道，文字字形的个性特征在春秋中期之前颇为罕见，曾国与黄国这类铭文表达的文意相同，黄国铭文以特殊的字形来表达，既说明这两个国家某些特殊的文化关系，又表明它们在文化个性上不同的强烈程度。

1

2

图5.1－2　曾国与黄国青铜器特殊的铭文辞例

1. 曾孟嬴削簠　2. 黄子鼎（《集成》2566）

二　蔡　国

蔡国与曾国并未直接相邻——实际上，第二阶段很难有典型材料来反映与曾国毗邻的国家之间的文化关系。蔡国是楚系文化国家中另一个为数不多的青铜器性质较清楚的国家。安徽寿县和淮南分别发现的两处蔡侯墓，年代与墓主都比较清楚，也是楚系墓葬中等级接近于曾侯乙墓者。虽然它们在年代上与曾侯乙墓有一定距离，但仍然不妨碍将两处蔡侯墓葬出土青铜器与曾侯乙墓青铜器作文化性质和地位的比较。

寿县蔡侯申墓[①]于1955年发现于安徽寿县县城西门内，墓葬未见墓道[②]。墓葬底部长8.45、宽7.1米，葬具、人骨已朽，墓底东南角发现另外葬有一人，可能为殉人。随葬品以青铜器为主，共486件，其中青铜容器有镬鼎、升鼎7、盖鼎10、鬲8、方座簋8、簠4、敦2、盖豆2、浅盘豆2、爬兽方壶2、尊3、盉2、扁体壶、尊缶2、方尊缶2、盥缶2、鉴、方鉴、盘4、匜、小口鼎、套钵3。其他如乐器有编钟32、钲、錞于；兵器有剑4、戈13、矛8[③]。随葬品放置较有规律，性质相同的器类如编钟、升鼎、方座簋均放置在一起。青铜器中有数十件带有蔡侯申铭文，墓主为申无疑。一般认为，此申即蔡昭侯[④]，墓葬下葬年代约在公元前496年即春秋晚期偏晚阶段。

淮南蔡家岗蔡侯墓共两座[⑤]于1958年发现于淮南市蔡家岗，墓葬有封土，南北向均带墓道。M1墓口长5.05、宽4.25米，M2大小近似。两座墓葬早年均被盗，残存青铜器主要为兵器、车马器。其中M2出土铜剑10件，3件有错金“蔡侯产”铭文，另有1件为吴器。M2墓主可能为蔡侯产，墓葬年代在战国早期偏早。

学术界一般认为，上述蔡侯墓出土青铜器一个突出的特征是青铜器基本属于楚系青铜器，但青铜器中吴文化因素也占相当比例。春秋晚期蔡国与吴国关系密切，蔡侯申出土有吴王光鉴，蔡家岗M2也出土吴国铜剑，这与历史文献记载蔡国与吴国政治关系情况一致。但蔡侯申青铜器铭文有“左右楚王”、“敬配吴王”之语，说明蔡国游离于楚、吴两个大国之间的政治处境。

没有证据显示曾国与蔡国之间曾经存在过密切的政治关系，但这并不妨碍它们之间存在文化交往。曾侯乙墓青铜器中尊与盘组合，尊从器类到形制都与同时期楚系和中原青铜器不同。不难注意到，曾侯乙尊除去器口与腹侧的装饰，其基本器形是典型的觚形尊，这类商式尊在西周中晚期之后只有长江下游地区继续沿用。曾侯乙尊盘的铸造年代早于曾侯乙，按照盘内底铸造的铭文，作器者是曾侯遗，为曾侯乙的先辈。尊与盘为一对，故盘也可能为曾侯遗所作。尊盘的年代应当在春秋战国之际前后，与蔡侯申的年代非常接近。蔡侯申墓出土尊3件，基本形制与曾侯乙尊相同（图5.1－3），只是没有后者繁缛的装饰，这些尊都是受到长江下游地区特别是吴国青铜器的影响。蔡侯申墓3件尊中，一件尊带有92字长铭，铭文内容与另外一件盘除自铭之外完全相同，它们原来是一对器。有趣的是，这件长铭尊出土时放置在另外一件盘内。由此看来，蔡侯申墓的

---

① 安徽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安徽省博物馆：《寿县蔡侯墓出土遗物》，科学出版社，1956年。由于报告的简略和出版时不少器物尚未修复，我们对蔡侯申墓青铜器的详细情况还了解甚少。

② 不过由于发掘之前治淮工程在墓葬处取土挖有深沟，很难肯定如报告所说是没有墓道。

③ 8件矛中至少有1件为殳。曾侯乙墓发现之前学术界尚不能分辨殳的形制。

④ 陈梦家：《寿县蔡侯墓铜器》，《考古学报》1956年第2期。

⑤ 安徽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安徽淮南市蔡家岗赵家孤堆战国墓》，《考古》1963年第4期。

1

2

图 5.1－3　曾侯乙尊与蔡侯申尊

1. 曾侯乙尊（《集成》10－140）　2. 蔡侯申尊（《集成》7－69）

3 件尊可能都与盘相组合①。在曾侯乙墓，尊出土时放置在盘内，其组合关系与蔡侯墓相同。显然，曾侯乙尊盘无论形制还是组合，都可能是承袭蔡国的影响。此外，上述两座墓葬中尊缶与鉴相配、方尊缶与方鉴相配，也是相同的做法。

曾国和蔡国青铜器除了属于楚文化青铜器系统的共同特征之外，它们还都较其他楚系青铜器具有更多的中原文化因素。以编钟为例，曾侯乙编钟 65 件见甬钟 5 组 45 件、纽钟 3 组 19 件，此外有临时加入的 1 件楚王酓章镈钟，相信曾侯乙编钟原来并不包括镈钟。擂鼓墩 M2 整套编钟 2 组 36 件，均为甬钟。曾国以甬钟为主体，是中原青铜文化西周时期的传统。蔡侯申墓出土编钟中甬钟 12 件、纽钟 9 件、镈钟 8 件，除了 8 件镈钟是典型楚式镈钟组合之外，以甬钟、纽钟和镈钟搭配，是同时期北方如晋系青铜器常见的组合形式，而有别于同时期典型楚国墓葬如徐家岭墓葬的楚国编钟。曾蔡的中原文化因素，与这两个国家的历史背景相关。

战国早期前后曾国的社会地位较蔡侯略高。属于战国早、中期的曾侯乙墓和擂鼓墩 M2 的规模，分别大于属于春秋晚期和战国早期的寿县和淮南蔡侯墓。但两国国君墓葬在历时性上均由大及小，而春战之际楚国高等级贵族墓葬的规模正经历由小及大的发展过程。附庸国与宗主国之间实力正反不同的发展方向，是当时政治、文化格局的体现。

---

① 蔡侯申墓出土盘 4 件，三件与尊组合，另外一件可能与匜组合。蔡侯申墓报告所发表的盘均为西周晚期前后圈足盘的形制，也如尊一样具有滞后的特征，类似情况较常见于东周时期的长江下游地区。

三 小 结

第一阶段曾国青铜器与淮河中上游地区青铜文化在两周之际前后都属于周文化系统，具有周式青铜文化的一般特性，因此这一地区“春秋时期的文化本来是上承西周的，在周平王东迁后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西周的文化传统仍在延续。直到春秋中期，新的风格和特点才告形成。汉淮地区列国的文化，也是如此”①。不过，通过对比黄国与曾国青铜器，仍然可以得到一些新的认识。

1）黄国与曾国相比，青铜器所占典型周文化因素的比重略小，这与黄国在地理上处于文化边缘地带的位置一致。而黄国青铜器的个性特征比曾国青铜器更明确地演示，在春秋中期之前的不同阶段不同地域区域文化的个性特征多有一定程度的存在。两周之际前后周文化的文化面貌较强的一致性，只是一个自中心文化而下观察方式的总体的大势，此大势之下，共存的是不同程度的个性特征构成的诸多地方青铜文化。

2）作为文化关系密切的“汉淮地区”中的两个国家，曾、黄在地域上相邻，政治关系密切，但它们在文化上的一致性却并非如想象中那样强烈。特别是在可塑性较强的器形方面，两国青铜器的相似之处也不太多见②。曾黄两国文化关系说明，所谓的“汉淮地区”并未形成压倒性的文化共性。显然，地域文化圈的形成机制颇为复杂，汉淮地区民族纷杂，可能是制约文化共性发展的一个因素。如果联系到其后不久楚文化在这一地区的成形，可知政治实力在文化发展中仍然占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3. 黄、曾之间从一些器类到铭文的一致性，一方面显示出两个国家所在的同一区域的文化共性，某些因素如特殊铭文还暗示曾黄两国之间超越文化共性的内在的密切关系，这与青铜器铭文所记载两国联姻关系一致。

曾黄两国的文化关联，只是第一阶段曾国青铜文化与邻近区域文化的一个缩影。在整个第一阶段，曾国体现出较强的外张力，与邻近地区的文化交往，除了北部、东北部地区之外，亦有向西的交往，襄阳太平店出土的曾孟嬭谏盆显示出曾国与西部嬭姓国家之间的密切关系。另外，曾国青铜器也分布于大洪山以南的漳河流域，以及地处南下江汉平原通道的何家台，暗示曾国同样十分重视与其南地区的联系。

如上一章所示，第二阶段楚文化在楚系国家中文化趋同日益突出，并在春秋晚期达到很高的程度，因此春秋晚期开始曾国青铜器的个性特征已经非常少见。本节我们讨论的曾、蔡两国青铜器均属于诸侯一级较高社会阶层，这些青铜器反映出楚系国家文化依

---

① 李学勤：《光山黄国墓的几个问题》，《考古与文物》1985 年第 2 期。

② 这其中的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迄今所见黄国青铜器多以春秋早期偏晚阶段为主，这已经是各诸侯国青铜文化开始分化、出现个性的阶段。

然存在一些相对独立的因素。

1）曾、蔡两国都具有较深的中原文化政治和文化传统，直至春秋晚期和战国早期，这一传统仍然有所保留，并且是体现在礼制中心的青铜乐器——编钟之上。由此说明，楚人在对其附庸国的政治、文化控制上，仍然保留有一定的开放程度。

2）曾、蔡两国如尊盘这类非楚系文化因素的关联，在楚文化同一性特别强势的背景下，显得比较突出。另外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曾侯乙尊盘采用的铸造工艺极其复杂，尊盘的视觉效果具有很强的冲击力。尊盘的制作超乎一般青铜礼器所耗费的人力与物力，暗示其超常的性质。因此，尊盘无论是在曾侯遗还是在曾侯乙的礼器群中，都占有突出的地位。但尊与盘这两类器物无论从器类的角度还是从文化因素的角度，都在当时的礼仪文化中不占中心、主流地位。这一时期出现尊盘现象还值得我们进一步注意。

第二节　与跨区域青铜器的关系

西周中期，周文化特征开始形成，此后周原以外的各诸侯国青铜文化面貌的一致性趋强①。在各地区与周文化中心之间的交流处于文化交流主导地位的情况之下，不同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往往难以显现。另一方面，春秋中期开始的区域文化的分化，又似乎彰显地缘集团之间的文化隔阂。曾国在第一阶段作为一个非中心文化区域的诸侯国、第二阶段作为楚国之下的附庸国，在当时的文化格局之下，与周边之外的区域发生文化关联或交流是否有可能？如可能，这种关联或交流是何种形式？

一　第一阶段与山东地区的文化交流

曾国与山东地区诸侯国之间发生直接的文化交流，是一个颇值玩味的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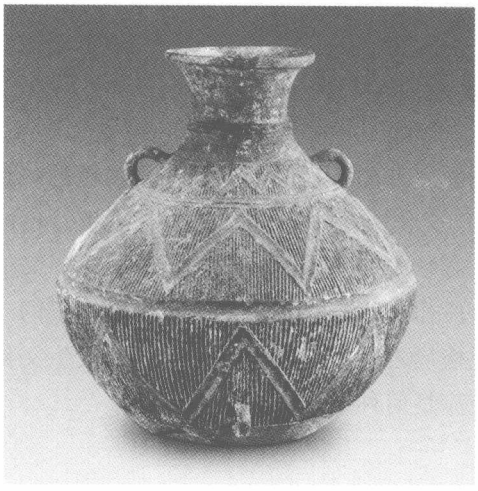
属于第一阶段的72熊家老湾出土有鼎3、方甗1、簋2、罍1、盘与匜各1件，整个铜器群各类铜器多为较典型的周文化风格，唯有罍的形制较为特异（图5.2－1，1）：该器圆体，侈口而底凹圜，其肩上的双耳和腹下的单鋬说明其为罍类器，但基本器形又类似于西周时期的双耳陶罐②。罍的纹饰也殊为特别，颈部以下饰三周波折纹，其间夹直条纹，纹饰风格与这一时期其他青铜器不类。72熊家老湾罍形制颇异于江汉地区青铜文化风格，苏芳淑早已经注意到③，该罍与山东烟台上夼村出土罍形制、纹饰完全相

① 李学勤：《西周时期的诸侯国青铜器》，《新出青铜器研究》，文物出版社，1990年。

② 西周时期周文化中心区域可见一类侈口折肩深腹罐，其肩上附双耳，形制大约为罍类器的前身，其例如沣西张家坡M197：12罐，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张家坡西周墓地》图90－12，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

③ Jenny F. So, Eastern Zhou ritual bronzes from the 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s, Fig, 5. Washington, D. C. 1995.

同（《全集》9－85）（图5.2－1，2）。资料表明，这类风格的罐应该是山东地区的文化产物，在山东其他地区也可见类似风格的罐，如莱阳前村出土的己国铜器中一件罐①，器形、纹饰与72熊家老湾这件罐近似，前村罐下腹也饰波折纹和直条纹，唯其肩部饰窃曲纹。曲阜鲁故城还数见此类波折纹与直条纹结合的卵形壶，典型者如侯母壶（《全集》6－69），日照崮河崖M1两件壶②与侯母壶相同，也都饰波折纹夹直条纹。壶与罐的形制接近，它们类似的纹饰风格暗示山东地区是此类因素的原创之地。实际上，熊家老湾罐与上夼村罐的直条纹与陶器的绳纹相同，上述罐与壶所饰的波折纹夹直条纹显然是仿照西周早中期簋和折肩罐上的三角划纹，而类似的三角划纹也在山东地区的陶器中可见③。几乎可以肯定，72熊家老湾罐应该是从山东地区输入的产品。



1

2

图5.2－1 曾国罐与山东地区罐

1. 72熊家老湾罐 2. 烟台上夼村出土罐（《全集》9－85）

曾国所在的江汉地区北部与山东半岛之间直线距离超过500千米，地理上阻隔颇多。这两个地区区域文化之间形成交流，看似颇为异常，却有其历史背景。在地理位置上，上述两个地区分别位于淮河流域以西以北，但都处于与淮夷的接触地带。西周至春秋中期淮夷是周文化圈之外最为活跃的民族之一，他们与周人势力接触频仍。这些接触

① 李步青：《山东莱阳县出土己国铜器》，《文物》1983年第9期。

② 杨深富：《山东日照崮河崖出土一批青铜器》，《考古》1984年第7期。

③ 例如临淄后李遗址可见相关陶器。济青公路文物考古队：《山东临淄后李遗址第一、二次发掘简报》，《考古》1992年第11期。

在西周早中期常常发生在山东地区①，而在西周晚期之后则在淮河上游以西区域如噩、黄、曾等国家。曾伯霥簠有“克逖淮夷，抑燮繁阳”之语，是这一背景的反映。由于曾国以北的南阳盆地西接周文化中心，由南阳地区连接上述两个文化接触地带，形成了两周之际前后的一个重要的文化通道。这一通道的存在还可以通过陈、黄等国青铜器在山东的发现得到反映：

1）1977 年沂水刘家店子 M1 出土黄太子伯克盆②。

2）1963 年肥城小王庄出土陈侯壶，根据铭文，壶为陈侯所作媵器③。

属于春秋早中期之际的陈公子庆簠出土于随州季氏梁，黄国青铜器也多见于曾地。陈国地处上述两个接触地带之间④，陈国和黄国一样对两个文化区域起着桥界作用。在两周之际前后，山东地区和江汉地区以北的南阳至信阳一带青铜器的一些器类如盆、鑐具有类似特点，甚至两个地区的少数陶器如浅腹扁体鬲等也存在某些共性，这些都说明两个区域的紧密关系。

曾国与山东地区文化存在关联的另外一个背景是后者也有一个鄫国。据《左传》等历史文献记载，鄫国为姒姓，春秋早期附庸于鲁国。1981 年山东临朐泉头村齐国墓葬发现一件上曾太子般殷鼎⑤，鼎铭文有“上曾太子般殷乃择吉金，自作鬻彝”等语，这里“上”是表示方位，用“上曾”是为区别另外一个曾国，周代诸侯国如上都即为类似称谓。显然，这个“上曾”就是历史文献记载中的鄫国⑥。上曾太子鼎饰一周窃曲纹，宽体附耳蹄形足，形制与苏家垅鼎几乎完全相同（图 5.2－2）。如我们在第三章所述，两周之际前后类似的鼎以曾国最为常见，类似器形在邻近的豫南地区偶见。下面我们还会谈到“乃择吉金，自作鬻彝”的铭文辞例在两周之际流行于以曾国为代表的鄂北豫南地区。有学者注意到上曾太子鼎具有这些相似于湖北曾国青铜器的特性，因此认为此鼎也应该属于湖北之曾⑦。如果我们认识到上述两个区域、两个国家之间的文化关联，则上曾太子般殷鼎出土于山东，与 72 熊家老湾鑐、陈公子庆簠出土于湖北一样不足为奇。其实，在上述南阳至山东的文化通道之间，还偶见少量形制大体类似于苏家垅

① 黄盛璋：《淮夷新考》，《文物研究》第 5 辑，1989 年。

②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山东沂水刘家店子春秋墓发掘简报》，《文物》1984 年第 9 期。

③ 齐文涛：《概述近年来山东出土的商周青铜器》，《文物》1972 年第 5 期。

④ 徐少华：《陈国铜器及其历史地理与文化综论》，《江汉考古》1995 年第 2 期。

⑤ 临朐县文化馆等：《山东临朐发现齐、鄩、曾诸国铜器》，《文物》1983 年第 12 期。

⑥ 孙敬明等：《山东临朐新出铜器铭文考释与有关问题》，《文物》1983 年第 12 期。李学勤：《试论山东新出青铜器的意义》，《文物》1983 年 12 期。又载于《新出青铜器研究》，文物出版社，1990 年。

⑦ 王恩田：《上曾太子鼎的国别及其相关问题》，《江汉考古》1995 年第 2 期。

1

2

图 5.2－2 曾国与山东曾国鼎

1. 苏家垅 1 号鼎 2. 上曾太子般殷鼎（《文物》1983 年第 12 期）

的宽体附耳鼎，如陈侯鼎①、戴叔鼎②等。

二 楚文化背景下与东部地区的文化交流

与曾国青铜器相关的青铜器及其因素，在春秋晚期前后还可以在长江下游和山东地区见到相应的反映。曾国与东部地区的文化联系，既有直接发生的联系，也有在楚文化大势之下的间接关联。以下分别讨论这些不同的文化交流形式。

1. 曾国与长江下游地区的直接联系

春秋晚期前后，曾国与长江下游地区发生直接文化接触。1988 年江苏六合县程桥中学 M3 吴国墓葬中，出土曾子义行簠③。与曾国青铜器流入吴国的情况相反，曾国也出现有吴地的青铜产品。在义地岗墓地东风油库 M2 出土有“S”形纹鼎（M2：4），鼎器形与楚式鼎相同，但器壁较薄，鼎腹部、器盖均饰“S”形纹。如第四章《铸造工艺》一节中指出，此鼎的三足与腹是浑铸的，相应地，鼎底设有三角形底范，鼎的铸形特征与西周至春秋早期鼎完全相同，而与第二阶段曾国鼎分铸的特征不同，表现出滞后的技术特点。吴越地区东周时期青铜鼎铸形常常使用浑铸鼎足并留三角形底范④，如我们在第二、三章的《铸造工艺》所述，浑铸鼎足是春秋早期及以前的铸造工艺，但

① 故宫博物院：《故宫青铜器》图 221，紫禁城出版社，1999 年。

② 李学勤等：《欧洲所藏中国青铜器遗珠》图 115，文物出版社，1995 年。

③ 南京市博物馆、六合县文教局：《江苏六合程桥东周三号墓》，《东南文化》1991 年第 1 期。

④ 谭德睿等：《吴越青铜技术考察报告（之一）》，《吴越地区青铜器研究论文集》，两木出版社，1997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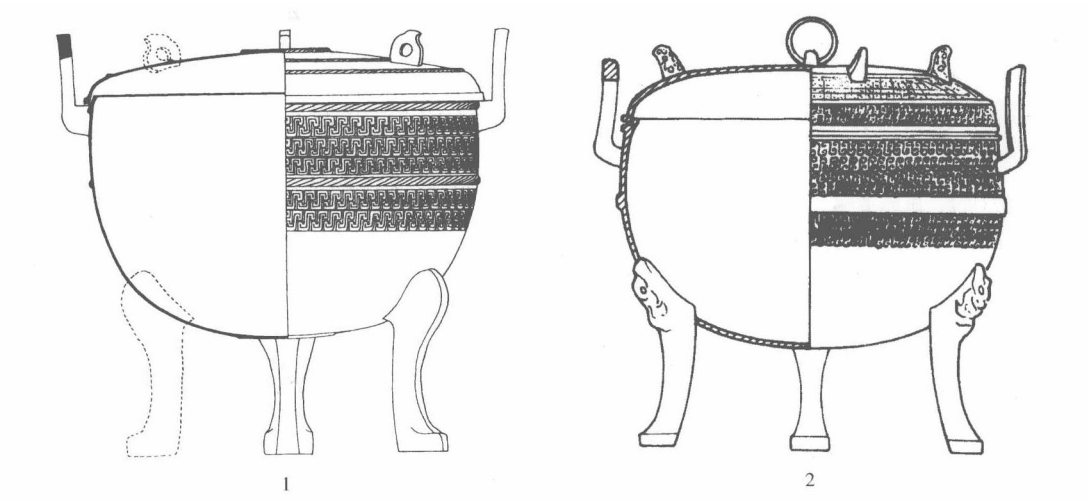


图 5.2－3　曾国鼎与长江下游地区鼎

1. 东风油库 M2　2. 青阳龙岗 M1（《考古》1998 年第 2 期）

在长江下游地区青铜鼎在春秋晚期前后仍然沿用这一滞后技术。类似东风油库的“S”形纹饰鼎也在江淮的广大地区常见，其例如皖南青阳龙岗 M1“S”形纹鼎①（图 5.2－3）、丹徒北顶山出土“S”形纹鼎（《集成》11－5）等等。因此东风油库“S”形纹鼎无论从形制还是工艺特点来说，都表现为典型的长江下游地区鼎特征，该鼎的产地极可能来自于东南地区。

曾国与长江下游地区的联系可能与楚吴争战的历史背景相关，作为楚系国家之一，曾国可能也参与了春秋晚期的楚吴战争。因此吴器出土于曾国，或者曾器为吴人所有，可能是当时战争造成的直接结果。

2. 铭文辞例所反映的与东部地区的交流

铭文在楚系青铜器中具有某些特点，很早为学者们所注意。胡小石谈楚国青铜器铭文辞例时认为“楚人好用之韵，多用‘万寿无期’、‘永宝用之’等语”②。李学勤根据文字特征将战国时期各国文字划分为不同的系统，并将江淮地区鸟虫书等共性的题铭归属为楚系文字③。他还注意到长江下游地区的南方青铜器“一部分春秋时期铭文，器主常在自己的名字前面冠以先世的名号，最多见的是某人之孙、某人之子”④。其实长江下游地区青铜器铭文的某些特点与楚系铭文类似，例如吴越地区特别流行的鸟虫书，在

① 青阳县文物管理所：《安徽青阳县龙岗春秋墓的发掘》，《考古》1998 年第 2 期。

② 胡小石：《古文变迁论》，《胡小石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

③ 李学勤：《战国题铭概述》（上），《文物》1959 年第 7 期。

④ 李学勤：《春秋南方青铜器铭文的一个特点》，《吴越地区青铜器研究论文集》，两木出版社，1997 年。

包括曾国的楚系国家也颇为常见①。某人之孙、某人之子这种辞例的熟语，同样在楚地多见，曾大工尹季怠戈就有“穆侯之子、西宫之孙，曾大工尹季怠之用”。有些青铜器铭文辞例，甚至很明确是由楚地向东传播至吴越乃至山东地区。曾经在曾国青铜器中颇为流行的“用其吉金”等辞例即为一典型例证。

曾国青铜器是迄今所见使用“用其吉金”或“用吉金”辞例最多的国家，共在14器次铭文中出现，它们是：曾子单鬲、曾伯宫父鬲、曾仲子敔鼎、起右盘、曾仲斿父壶、曾子仲谏鼎、曾子仲谏甗、曾太保簋、曾太保盆、曾子伯沓盘、曾师季鞮盘、曾子仲宣鼎、廓季鼎、廓季盘。这些铭文的句式大体有两类，即某人用其吉金自作某器，或者后面再加缀祝愿辞。如：

曾子单鬲：“曾子单用吉金，自作宝鬲。”

廓季鼎：“廓季之伯歸塞用其吉金，自作宝鼎，子子孙孙永保用之。”

以上使用“用其吉金”辞例的曾国青铜器流行时间都是在两周之际前后，最晚使用“用其吉金”的一组器物是廓季鼎和盘，属于春秋早期偏晚阶段，年代较早的如曾子单鬲、起右盘等属于西周晚期。“用其吉金”辞例的源头同第一阶段曾国青铜器因素的来源一样，也仍然是西周文化，金文中最早使用“吉金”的辞例大约是西周中期的鲜簋（《集成》143）：“王赐鲜吉金，鲜……用作朕皇考林钟”。这里的“吉金”作为王的赏赐之物，其义为“好的铜”，或解作“坚实的品质好的铜”②，“赐吉金”和稍晚出现的“俘吉金”一样，都是西周早期以来“赐金”、“俘金”用法的衍生。在鲜簋稍后不久的西周晚期，青铜器铭文中就开始出现有某某“用吉金自作”某器，或某某“择其吉金自作”某器的辞例。如：

羌仲无簠：“唯羌仲无择其吉金，用自作宝簠，其子子孙孙永宝用享。”（《集成》4578）

伯家父簋：“唯伯家父郜迺用吉金，自作宝簋，……子孙永宝用享。”（《集成》4156）

以上两器均系传世品，年代在西周晚期。从作器者人名和铭文内容判断，似应是西周晚期周文化中心地区产品。若如此，由羌仲无簠可知西周晚期的宗周文化应该是“择其吉金”辞例的最早源头。如果从“吉金”一词在西周金文中使用和功能变化的角度考虑，这一结论也应该是合乎逻辑的。另外，羌仲无簠、伯家父簋铭文中常见“子子孙孙永宝用”一类的祝愿辞，同样常见于其后使用“用其吉金”等辞例青铜器。因此可以确定羌仲无簠、伯家父簋的辞例就是其后流行“用其吉金”等辞例的早期形式。

---

① 曹锦炎：《鸟虫书通考》第5页，上海书画出版社，1999年。

② 裘锡圭：《戎生编钟铭文考释》，《保利藏金》，岭南美术出版社，1999年。

在曾国之外，楚系青铜器使用“用其吉金”辞例的也有相当数量：

樊夫人鬲：“樊夫人龙嬴用其吉金，自作行鬲。”（《集成》675、676）

樊夫人壶：“樊夫人龙嬴用其吉金，自作行壶。”（《集成》9637）

樊君盆：“樊君夔用其吉金，自作宝盆。”（《集成》10329）

番昶伯盘：“唯番昶伯者君用其吉金，自作旅盘，子孫永宝用之。”（《集成》10140）

孝感出土𠦪鼎：“唯𠦪用吉金，自作宝鼎，其子子孙孙永用享。”（《集成》2539、2540）

天门出土叚仲履盘：“叚仲履用其吉金，自作宝盘，子子孙孙其永用之。”（《集成》10134）

黄朱柁鬲：“黄朱柁用吉金作鬲。”（《集成》609、610）

鄦公鼎：“唯王八月既望，鄦公汤用其吉金自作薦鼎，其万年无疆，子子孙孙永宝用享。”（《集成》2714）

鄦公簋：“鄦公白盡用吉金自作宝簋，子子孙孙永用享，万年无疆。”（《集成》4016、4017）

以上使用“用其吉金”辞例青铜器都有鄂北和豫南地区的地域背景①：樊国和番器铜器均出土于信阳市，鄦公鼎、簋出土于随州三里岗，黄朱柁鬲出土于曾国墓葬中，而黄国地望在今光山、潢川一带。只有天门的地理位置延伸至今湖北中部，但与京山相邻仍然处于大洪山脉南麓。

有趣的是，春秋中期之后，曾国等鄂北豫南国家青铜器使用“用其吉金”辞例已经少见，而此前未发现这种辞例的楚国青铜器中却反而可见其例：

江陵出土䣄伯受簠：“䣄伯受用其吉金，作其元妹叔嬴为心媵餘簠，子子孙孙，其永用之。”（《集成》4599）

淅川下寺 M7 仲妃卫簠：“仲妃卫用其吉金，自作旅簠，子子孙孙永宝。”（《近出》524、525）

仲爾鼎②：“樊季氏孙仲爾堇，用其吉金，自作磉沱。”（《集成》2624）

与“用其吉金”有一望而知关系的辞例是“择其吉金”，后者的流行模式与“用其

① 这一地区还有一些“用其吉金”的变体形式，如襄阳出土两周之际的邓子鼎有“邓公孙无忌选吉金铸其⊠鼎”。见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襄阳王坡东周秦汉墓》，科学出版社，2005 年。潢川出土春秋早期的番君番（《集成》10136）有“用其青金”例，它们的性质与“用其吉金”是相同的。

② 此器藏于上海博物馆，见陈佩芬：《夏商周青铜器研究·东周卷（上）》第 557 器，世纪出版集团等，2004 年。该书中定仲爾鼎年代为战国早期，恐误。该鼎作附耳平盖深腹，腹部饰粗体蟠螭纹，下寺楚墓及鄂北地区春秋中期青铜鼎多见相同形制，年代应属春秋中期无疑。

吉金”基本相同。“择其吉金”辞例在曾国也有较多的发现，加之其他国家，在春秋中期之前的主要例证可列举如下（未注明年代者均属两周之际）：

曾子𠭯鼎：“曾子𠭯择其吉金，用铸舄彝……”（《集成》2757）

曾□☑簠：“唯正□初吉丁亥，曾□☑择其吉金。自作饋簠。”（《集成》4614）

曾伯霥簠：“曾伯霥……择其吉金黄铝，余用自作旅簠。……万年眉寿无疆，子子孙孙永宝用之享。”（《集成》4631、4632，春秋早中期之际）

襄阳出土𨭎盏：“𨭎择其吉金，自作䌛鼎，其眉寿万年无疆，子子孙孙永保用之。”（《近出》1026，春秋早中期之际）

彭子仲盆盖：“彭子仲择其吉金，自作饋盆，其眉寿无疆，子子孙孙永宝用之。”（《集成》10340，春秋早期）

王孙寿甗：“王孙寿择其吉金，自作飤甗，其眉寿无疆，万年无期子子孙孙，永保用之。”（《集成》946）

叔朕簠：“叔朕择其吉金，自作薦簠。……万年无疆，叔朕眉寿，子子孙孙永宝用之。”（《集成》4620－22）

上曾太子鼎：“上曾太子般殷乃择吉金，自作鼒彝……”（《集成》2750）

同样，上列诸器大体都属于鄂北豫南地区：曾国主要范围在今鄂北；彭子仲盆为传世品，彭国地望大约在今南阳一带，南阳西关曾出土有彭伯壶①。叔朕簠器物特征如装饰粗体蟠螭纹，也在鄂北豫南青铜器中极为常见。王孙寿甗难以确定其产地，但该器铭文内容与其他鄂北豫南青铜器完全相同。唯一的例外是属于山东地区的上曾太子鼎，不过种种迹象表明，两周之际山东曾国与湖北曾国有着特别的关系，上曾太子鼎铭文辞例的出现可能是因为受到来自鄂北的影响，这一点我们在下面还会谈到。

“择其吉金”也同样出现于春秋中期之后的楚国青铜器之中，不过这次流行的程度和范围远大于“用其吉金”。它最集中的发现是在淅川下寺墓地，现将其例按墓葬条列如下：

M8：以邓鼎：“楚叔之孙以邓，择其吉金，铸其䌛鼎，永宝用之。”（《近出》348）

以邓匜：“楚叔之孙以邓，择其吉金，铸其會（浍）匜，子子孙孙永宝用之。”（《近出》1019）

上都公簠：“上都公择其吉金，铸叔嫺番妃媵簠，其眉寿万年无期，子子孙孙永宝用之。”（《近出》536）

何次簠3件：“毕孙何次，择其吉金，自作饋簠，其眉寿万年无疆，子子孙孙永保用之。”（《近出》533－535）

---

① 尹俊敏：《南阳出土的彭伯壶》，《文物》1997年第12期。

M2：王子午鼎7件。器铭："王子午择其吉金，自作……鼎……"（《集成》2811）

王孙诰钟26件："王孙诰择其吉金，自作龢钟……"（《近出》60－84）

M3：倗鼎："楚叔之孙倗，择其吉金，自作浴⊿，眉寿无期，永保用之。"（《近出》341）

M1：孟滕姬缶2件："唯正月初吉丁亥，孟滕姬择其吉金，自作浴缶，永保用之。"（《集成》10005、《近出》1039）

M10：黻钟8件："黻择吉金，铸其反钟……"（《近出》51－59）

黻镈8件："黻择吉金，铸其反钟……"（《近出》98－105）

下寺墓地的年代在春秋中期偏晚至春秋晚期。另外，何次簠的形制与纹饰略早于墓葬，其年代在春秋中期偏早阶段。但下寺墓地的情况无疑说明春秋中期至春秋晚期是"择其吉金"辞例在楚国的主要应用阶段。

其他性质明确为楚国青铜器且带有"择其吉金"辞例的，年代与下寺墓地的基本相同，这类青铜器的数量也很多，如传世的中子化盘（《集成》10137）、王子昃鼎（《集成2717》、王孙遗者钟（《集成》261）[①]、南阳出土的楚子弃疾簠（《近出》517）、襄阳余岗出土的子季嬴青簠（《集成》4594）等等。

下寺楚墓出土的青铜器当然未必都是楚国的青铜器，上述何次簠、孟滕姬缶等器可能就属于这种情况。不过这些青铜器表现出的特征与楚国青铜器基本无异，即属于我们现时所称谓的"楚系青铜器"。正如楚系青铜器其他因素在楚国以外诸侯国可以见到相似物一样，现在我们看到"择其吉金"辞例也在这些楚系国家青铜器中使用，这类青铜器如：

许国：许子妆簠（《集成》4616）、许子镈钟（《集成》153）、许公买簠2件[②]；

应国：应侯之孙丁儿鼎（《近出》351）；

鄀国：上鄀府簠（《集成》4613）、上鄀公簠（《近出》536）。

此外，谷城出土的襄王孙盉[③]和蠡儿缶（《近出》983）、枣阳出土的发孙虏簠（《近出》523）、郧县出土的申文王之孙州臺簠[④]使用"择其吉金"辞例也都属于同一性质。"择其吉金"辞例有时在楚系其他国家又会发生一些变化，如有的铭文作"择厥

① 对于王孙遗者钟等传世楚国青铜器年代等问题有一些不同看法，参见刘彬徽《楚系青铜器研究》第六章《楚系青铜器铭文编年考述》，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

② 许公买簠二件，一件原藏于武汉市文物商店，今属武汉市博物馆，见《集成》4617。另一件出土于黄州禹王城，见吴晓松、洪刚：《许公买簠》，《中原文物》2004年第1期。

③ 熊北生、李广安：《湖北谷城过山出土春秋有铭铜盉》，《文物》2002年第1期。

④ 郧阳地区博物馆：《湖北郧县肖家河春秋楚墓》，《考古》1998年第4期。

吉金”——这在楚国青铜器中极为少见[①]，和楚国文化关系略为疏远的许国，两件许公买簠都有“择厥吉金”，而许国的另外两件器均作“择其吉金”。可见，“择厥吉金”只是“择其吉金”的变体或发展形式。就字义而言，“其”、“厥”均作代词，“厥”常常用作“其”义，如义仲方鼎：“义仲作厥父周季尊彝”（《集成》2338），“择其吉金”与“择厥吉金”在用法上并无分别。

春秋中期之后，“择其吉金”与“择厥吉金”辞例又进一步扩散到与楚系青铜器铭文书法和文体风格接近的长江下游地区如徐及群舒、吴、越等国。这里仅列徐、吴两国青铜器说明其“择其吉金”辞例使用情况：

徐国：沇兒鎛（《近出》203）、徐王之孙钟[②]、徐王义楚盘及剑（《集成》10099、11668）；

吴国：丹徒北山顶出土的次尸祭缶[③]、者减钟（《集成》193－198）、吴王光鉴（《集成》10298、10299）。

同时，徐、吴两国使用“择厥吉金”的辞例也比较多：

徐国：丹徒北山顶出土的甚六鼎和甚六编钟[④]；

吴国：吴王夫差鉴（《集成》10294－10206）、罗儿匜（《近出》1018）、臧孙钟（《集成》93－101）、配儿勾鑃（《集成》426、427）。

除了在上述广义的楚系青铜器范围之外，在今山东地区的齐、邾等国也比较常见“择其吉金”一类辞例。在齐国，这种辞例只是偶见，如齐鲍氏钟（《集成》142）。但邾国此类青铜器颇为常见，如邾太宰钟（《集成》86）、邾公牼钟（《集成》149－152）、邾公华钟（《集成》245）、邾公孙班镈（《集成》140）等等。这种情况应该是由于来自于徐和吴越文化的影响的结果。邾国青铜器铭文“择其吉金”与“择厥吉金”俱见，其载体多见于钟类乐器，都表明了这一点。从历史背景的角度看，邾国地望在鲁国之南今山东邹城[⑤]，这一带与位于淮泗之间的徐国近邻，又是春秋晚期吴、越北上争霸的主要路径。据《左传》哀公八年、哀公二十二年记载，邾国与吴国、越国之间都发生过密切的关系。因为这种原因，山东地区国家出现有“择其吉金”等金文辞例，也就不足为奇了。

春秋晚期之后，楚系青铜器铭文辞例趋于简洁，“永保用之”之类辞例自此鲜见，

---

① 楚国青铜器中，迄今只在淅川徐家岭M1 佣子辛戈见“择厥吉金”辞例。见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淅川和尚岭与徐家岭楚墓》，大象出版社，2004年。

② 孔令远、陈永清：《江苏邳州市九女墩三号墩的发掘》，《考古》2002年第5期。

③ 江苏省丹徒考古队：《江苏丹徒北山顶春秋墓发掘报告》，《东南文化》1988年第3、4期。

④ 江苏省丹徒考古队：《江苏丹徒北山顶春秋墓发掘报告》，《东南文化》1988年第3、4期。

⑤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工作队：《山东邹县滕县古城址调查》，《考古》1965年第12期。

相应地，“择其吉金”一词的使用也迅速衰退，并在战国时期楚系青铜器中基本不见。但在原来并不流行这一辞例的国家青铜器中却反而偶尔可见类似辞例，如战国中期中山王嚳壶有“择燕吉金，铸为彝壶”（《集成》9735）、战国晚期魏国梁十九年亡智鼎有“择吉金，铸鼒”（《集成》2746）。只不过，这些辞例的结构已经发生了改变，它们只是原有形式的一种孑遗了。

至此我们可以对上面讨论的几种金文辞例的源流作如下总结：“用其吉金”和“择其吉金”大约首先形成于周文化中心地区，两周之际前后得以在以曾国为代表的鄂北豫南地区发展，其中“用其吉金”流行略早，并且在春秋中期之后消亡。而春秋中期后“择其吉金”在楚系国家大为盛行，并衍生出“择厥吉金”辞例，两者都影响到长江下游及山东部分地区。因此，金文辞例“择其吉金”及其相关形式，其发生、发展和流变过程，为我们展现了东周时期诸侯国特别是楚系国家考古学文化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交流。

3. 方座形器所反映的与东部地区的交流

1978 年淅川下寺 M1 出土大量青铜器，其中被发掘报告归入杂器类的有一件方座形器①，器座近方体、盝顶，顶中央有一竖立之残管，其上原应连接有他物。器座通体饰蟠虺纹，座长 18.7、高 11.4 厘米。发掘者已经注意到，该器座形制与江陵地区楚墓的镇墓兽座相同，可能也属于镇墓兽之类。

下寺 M1 方座形器并非孤例，距离下寺墓地不远的和尚岭 M2 也出有同类器。和尚岭 M2 方座形器（M2：66）的器座部分完整（图 5.2－4，2），座也是方形平顶，但顶部向下作弧形过渡。顶上立管状柱，柱中部有两个对穿方孔，当为穿插销钉之用，显然，柱顶原插有部件。根据发掘报告的墓葬平面图②，器座旁出土有鹿角，可知柱顶当是插鹿角之处。方座侧面饰相同的纹饰，上层为两个相对的曲体凤纹，下层为两个相背的曲体龙纹，龙纹与凤纹之间以连三角纹为间隔，中央饰一涡纹，纹饰内原当镶嵌物。座顶部铸有铭文一周 8 字：“曾仲𠑇𢓊臆之祖埶”，可知此为嫁到曾国的𠑇姓女子所作之器。座边长 19、座高 9.6、柱高 12.4、通高 22 厘米。此器在发掘报告中被直接称之为镇墓兽，李零也持相同看法③。

和尚岭 M2 的年代在战国早期，曾仲𠑇𢓊臆方座形器年代可能略早，属于春秋晚期偏晚，但晚于春秋晚期偏早的下寺 M1。可以明确，春秋晚期前后楚系墓葬中随葬这类

①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淅川下寺春秋楚墓》图 78，文物出版社，1991 年。

② 报告文字部分并未提及 M2 出土鹿角，但据发掘报告图 24，鹿角正对应于器座。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淅川和尚岭与徐家岭楚墓》，大象出版社，2004 年。

③ 李零：《论中国的有翼神兽》，《出山与入塞》，文物出版社，2004 年。

器座当不属少数。这一时期还可能已经出现了漆木器座，在一些春战之际的楚系墓葬中如下寺 M10、郧县乔家院 M5 与 M6[①] 等墓葬均发现成对的鹿角而未见器座，可能与漆木器座易于腐朽而未及保存有关。

上述资料表明，春秋晚期前后方座形器的出现不限于楚国墓葬中，而是成为楚系墓葬的一个代表性器类。这些器座无论是否属于早期镇墓兽，它们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更早则是无疑的。在 1983 年发现的黄君孟夫妇墓中[②]，属于黄夫人的 G2 出土一件方座形器（《全集》7－93），器形与下寺 M1 方座形器完全相同，座顶立有方管状柱，柱侧设销孔，柱顶插接之物不详。该座侧饰垂鳞纹、窃曲纹和龙纹等。座顶铸有铭文“黄子作黄夫人孟姬器”（《集成》10355）。座长 21、通高 13.6 厘米。

黄夫人器座属于春秋早中期之际，更早的方座形器已经出现在两周之际的曾国墓葬中。郭家庙墓地 M17 出土龙纹器座（M17：16），其座方形（图 5.2－4，1），上小下大呈阶状，座顶中部作弧形凸起一方形插孔。座饰龙纹、勾云纹。底边长 24、宽 23.6、高 22 厘米。器座侧旁出土有鸟形首柱（M17：44），柱由圆筒形杆和圆雕立鸟组成，鸟立于柱端，鸟下柱头侧面有四个销孔[③]。柱杆上部饰斜角云纹，柱高 28 厘米。柱杆下部和器座插孔各有对穿的销孔，可知它们原来应当为一器的上下两个部分，中间以木杆连接，并以横向的插销加以固定。

按照我们在第二章《材料分析》一节所述，郭家庙 M17 墓主可能为曾侯夫人，这与黄夫人方座形器情况相同。曾仲偲君臆方座形器铭文说明器主为嫁曾的女子。因此除了性别不明的下寺 M1 器主之外，其他方座形器均为女性所使用，也是这一时期方座形器的一个特点。

约在春秋晚期，方座形器开始出现在长江下游以及山东地区。与楚地的器形相似，方座形器在这两个地区也存在鸟柱和管柱两种形制。

鸟柱指方座形器的柱顶或柱中安设鸟形。山东仙人台邾国墓葬出土春秋晚期方座器（《全集》9－92），方座形制与下寺 M1 方座相同，亦饰蟠虺纹，座顶竖一素面圆管形柱，柱中部和顶部各塑一振翅之鸟。器座边长 16、通高 48.5 厘米（图 5.2－4，3）。据说，出土该器墓葬的墓主亦为女性。1982 年绍兴坡塘 M306 出土所谓“房屋模型”（《全集》11－105）[④]，其座亦为方形斜坡状顶，座饰勾连云纹，座顶立八棱形柱，柱顶

①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北郧县乔家院春秋殉人墓》，《考古》2008 年第 4 期。

② 河南信阳地区文管会、光山县文管会：《春秋早期黄君孟夫妇墓发掘报告》，《考古》1984 年第 4 期。

③ 如发掘报告所指出，有四件叉状器出土于方座形器近旁，它们原来应该是插在这些销孔之中的。这些叉状器或可能为战国时期镇墓兽鹿角的原型。

④ 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绍兴 306 号战国墓发掘简报》，《文物》1984 年第 1 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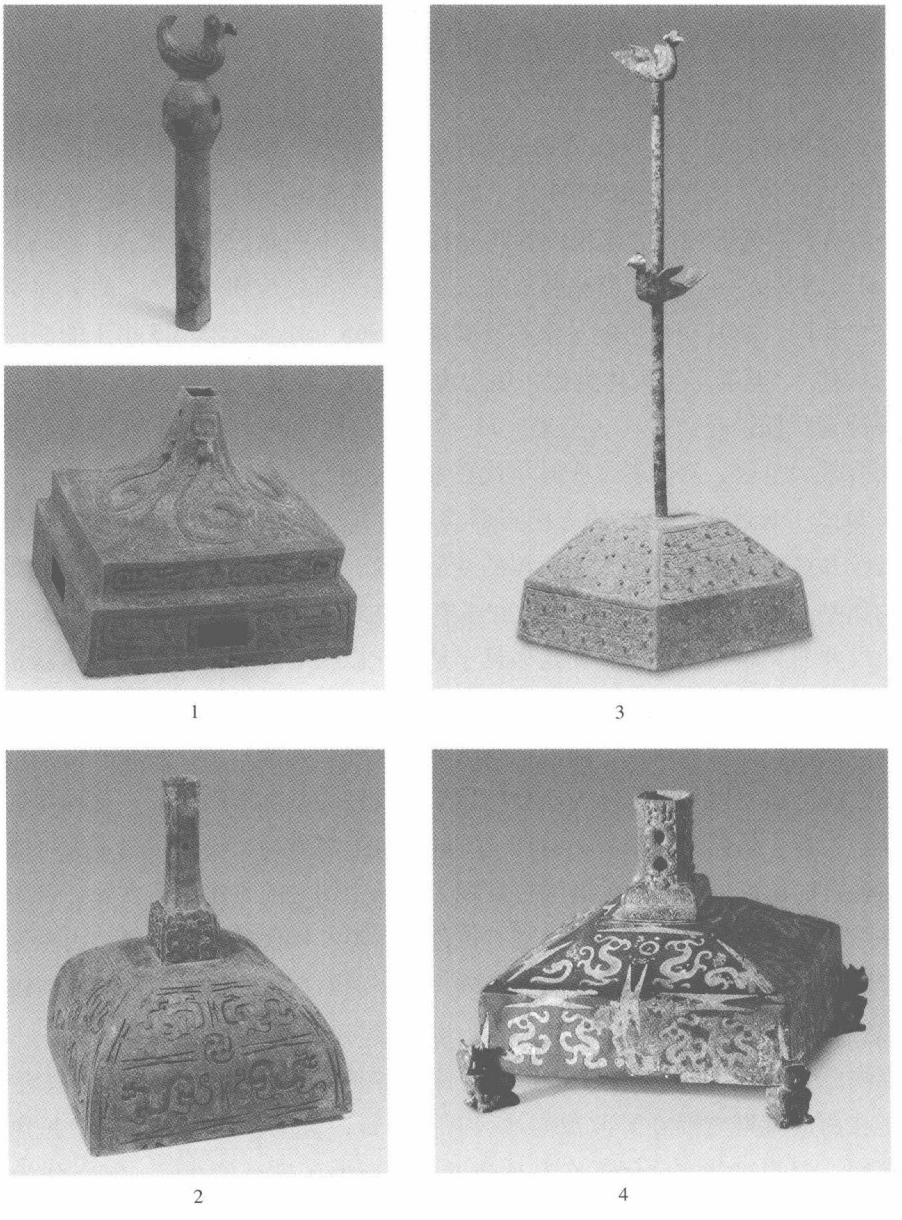


图 5.2－4　曾国与东部地区出土的部分方座形器

曾国方座形器：1. 郭家庙 M17：16　2. 和尚岭 M2：66（《淅川和尚岭与徐家岭楚墓》图版 15）

东部地区方座形器：3. 长清仙人台墓葬（《全集》9－92）　4. 绍兴坡塘墓葬（《全集》11－107）

附有鸟一只。座边长13、高17厘米。坡塘M306为战国早期越墓①，“房屋模型”形制与纹饰亦有越器风格，其造型的特别之处是座立面镂空，一侧开窗立柱如房屋状，但该器器物基本形制、立柱附鸟等造型乃至其含义，仍然与其他方座形器有关。

另一类柱顶为管状、柱顶插接其他附件的方座形器。此类器在东部地区主要见于吴越文化系统的墓葬。绍兴坡塘M306出土的另外一件方座形器（《全集》11－107），器座也与下寺M1同类器相似，座顶设管状立柱，唯座下四角设跪坐铜人。座边长6、通高16厘米（图5.2－4，4）。器座装饰的龙纹和连三角纹与和尚岭M2的曾仲郤君腚方座形器完全相同，故其年代可能早至春秋晚期。1965年屯溪奕棋M3出土的两件方座形器均带管状柱②，其器形也大体类似，座均为弧壁的方柱体，顶部较小，其中一件饰鸟纹，座顶圆管状柱带有销孔（《全集》11－106）。座边长11、通高14厘米。屯溪墓葬年代向来有较大争议，有学者主张其年代在春秋晚期③。

山东和长江下游地区出土的方座形器多已具有本区域形制特征，如“房屋模型”的勾连云纹和跪坐人物、奕棋方座形器的变形鸟纹，又如长江下游地区方座形器个体较小等等均如是。不过坡塘M306的龙纹方座形器的文化因素则较复杂，其器座所饰龙纹和连三角纹并非吴越文化传统，而是多见于楚文化以及中原文化青铜器。该器立柱和人像为后铸铸接到器座，铜质和色泽均与器座不同，尤其立柱和人像纹饰为当地文化作风。颇疑该器器座为楚地输入，而后在越国加铸立柱和人像，并在座底灌铅。

上述方座形器均以方形斜壁为座、座顶中央设柱为基本形制特征，这种器类与商周以来容器、兵器、乐器为基本器类的传统不同，其形制颇为特异，因之不大可能在不同区域存在各自的源流。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春秋中期之前方座形器在曾、黄两国较早运用，并随即成为春秋晚期楚文化中富有特色的器类，年代稍晚的吴越、山东等东部地区方座形器显然是受到了楚地同类器的影响。方座形器在鄂北豫南地区的发展以及向东部地区的传播脉络清楚，向东传播的背景，也显然与其时楚文化的强势相关。

不难注意到，无论是“用其吉金”等铭文辞例，还是方座形器，这些青铜文化因素都是在西周晚期之后在鄂北豫南地区开始流行，曾国在其形成过程中起到了较为重要的作用。但当这些文化因素在春秋晚期对东部地区进行传播时，却是作为楚文化特质的一个部分，传播的完成也是在楚文化背景之下，曾国青铜文化的作用已经十分模糊。

---

① 牟永抗：《绍兴306号越墓刍议》，《文物》1984年第1期。

② 殷涤非：《安徽屯溪周墓二次发掘》，《考古》1990年第3期。李国梁主编：《屯溪土墩墓发掘报告》第18－20页，安徽人民出版社，2006年。

③ 李国梁：《从青铜兵器看屯溪八墓的时代》，《吴越地区青铜器研究论文集》，两木出版社，1997年。

三　小　结

第一阶段曾国青铜器所反映的曾国对外文化交流颇为活跃，其中的一个方向是向北而后顺沿淮河流域对东部特别是与山东地区的联系。因此，曾国与黄国密切的政治关系，也是这一个大的文化交流背景下的一个反映。另外，曾国向东北方向交流的线路，又映射出两周之际前后由南阳盆地至淮河中上游地区再以东北及于山东地区这一西南—东北方向的交通线路。这一线路可能起始于西周晚期周王室对淮夷的征伐，但延续时间直至第二阶段，随州季氏梁墓葬出土的陈公子庆簠，可能还是反映这方面的背景，因为陈国就是居于联系山东与汉淮一带文化的过渡地带的国家。

第二阶段曾国青铜器仍然可见与东部地区的文化交往，也仍然顺沿淮河中上游地区，只是进而向南至吴越地区，其活动主要集中在春秋晚期一段时间。这可能与当时楚和吴越等大国之间的政治交往相关，特别可能是当时楚国频频与吴国政治斗争而形成的文化交流的结果。换言之，第二阶段曾国青铜器所反映的对外交流，只是楚文化对外交流中的一个附属产物。如第四章所示，第二阶段曾国青铜器个性因素趋少，但在文化交流上，曾国还是存在一些相对个性的因素，如吸收来自蔡国青铜器的影响等，虽然这种文化行为仍然是在楚文化背景之下完成。

比较第一、第二阶段曾国青铜文化对外交流的情况可知，第一阶段曾国文化所表现出来的活力和影响力明显强烈于第二阶段，这与曾国在两个阶段所处的大的政治文化环境相符。而两个阶段曾国对外的文化交流，都受到其时政治格局的影响，反映了文化常常关联、从属于政治的社会地位。

第三节　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上述两节讨论的与曾国相关的文化因素在不同区域之间的交流情况，都可以观察到交流是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之下进行的。例如，黄季作季嬴鼎等青铜器可能是黄国嫁女的媵器，曾国与黄国青铜器共存铭文“祜福”辞例、多见折肩鬲等等，这些是邻近区域之间文化互动交流的结果，类似情况往往是发生在相邻区域或文化关系较密切的区域之间。政治实力也常是驱动文化交流的重要因素。两周之际的曾国文化势力较强，曾国的典型器形如附耳宽腹鼎传播影响到豫东和山东一带。春秋中期之后，楚文化的强势对江淮地区青铜文化形成很大的影响，并在这一广大地区形成文化面貌接近的楚系文化圈，春秋晚期前后“用其吉金”等铭文辞例的向东传播，也是楚文化对外影响的一个方面。政治冲突也是促使文化交流的重要因素，东风油库 M2 出土东南地区的“S”形纹鼎、曾子义行簠出土于吴地，都与此相关。

但是，文化交流的背景复杂而多样，我们目前显然远不能了解古文化传播的全部。对于某些文化传播现象，我们甚至也不能说明传播源与目的地之间有何文化关联。70熊家老湾垂鳞纹方卣及相关的一些青铜器即是这一问题的反映。

70熊家老湾出土有曾伯文簋4、曾伯文鑐1、方卣1。其中方卣（图5.3－1，1）器表色泽与同出其他青铜器略有不同。卣横截面作长方形，子口承四阿形盖，弧腹下垂，下接宽大的圈足。器、盖的四角出有云状的扉棱。短边的颈部设有半环形的双耳，可知原提梁已失。卣主体纹饰是下腹的六周垂鳞纹，口部、器盖则饰勾云状变体龙纹，圈足的纹饰是重环纹和波折纹。卣口径12×12.7、通高33厘米。

1980年，湖北京山西北台出土一群青铜器，有鼎2、方卣1、盘1，器物群的年代在西周晚期，其中卣的形制与熊家老湾卣几乎完全相同①（图5.3－1，2），卣尚存兽首形提梁。西北台卣与熊家老湾卣装饰略有差异，其四角出勾云状扉棱，盖顶、腹部饰勾云状龙纹，盖侧饰垂鳞纹，圈足饰波折纹及云纹，此外器底悬有一铜铃。卣口径10.5×11.5、通高31.7厘米。

1978年，河南潢川刘砦也见有形制相同、风格类似的卣（《全集》7－121）（图5.3－1，3），与方卣同出的青铜器有鼎、簋、罍、盘，其年代在春秋早期②。刘砦卣盖、提梁均失。卣腹部饰龙纹和勾云状龙纹，圈足饰波折纹。卣口径9.5×11.5、通高24厘米。

2001年，山东沂源姑子坪M1出土70余件青铜器，其中包括鼎5、簠2、簋2、方卣等青铜礼器15件③，器物群的年代在两周之际。方卣盖如盝顶，高圈足，四角出有较直的扉棱，腹侧有双环耳，可知原来的提梁已失（图5.3－1，4）。方卣盖及腹部饰垂鳞纹，上腹饰勾云状窃曲纹，下腹饰叶脉纹，圈足饰与熊家老湾、西北台卣相同的波折纹。卣口径18.5×15.5、通高45.3厘米。

1969年，湖北枝江百里洲王家岗发现一群铜器，有鼎3、簠2、盘、匜以及方卣④，器物群的年代在春秋早期。卣圆角方体，四角扉棱较直，盖、提梁俱失（图5.3－1，5）。上腹饰重环纹，腹部饰垂鳞纹。卣口长14、通高31.3厘米。

方卣⑤在卣类器中是少见的器形，而上述诸卣形制、纹饰均较为特别，与其同出的青铜器风格不类，它们的产地可能都与同出青铜器不同，而是由其他文化区域传入。另

① 熊学兵：《京山发现一批西周铜器》，《江汉考古》1983年第1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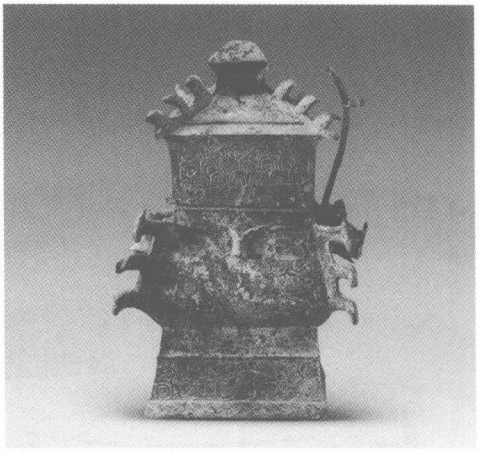
② 郑杰祥、张亚夫：《河南潢川县发现一批青铜器》，《文物》1979年第9期。

③ 山东大学考古系等：《山东沂源县姑子坪周代墓葬》，《考古》2003年第1期。

④ 湖北省博物馆：《湖北枝江百里洲发现春秋铜器》，《文物》1972年第3期。图像又著录于谭维四等：《湖北出土文物精华》第59页，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

⑤ 此类器口部均带环纽，均为子口承盖，是典型的卣类器。过去不少著述中称为方彝或壶，是不确的。

1



2

3

4

5

图 5.3－1　不同区域的扉棱方卣

1. 70 熊家老湾方卣　2. 京山西北台方卣　3. 潢川刘砦卣（《全集》7－121）　4. 沂源姑子坪 M1：10 方卣（《考古》2003 年第 1 期）　5. 枝江百里洲方卣（《湖北出土文物精华》第 59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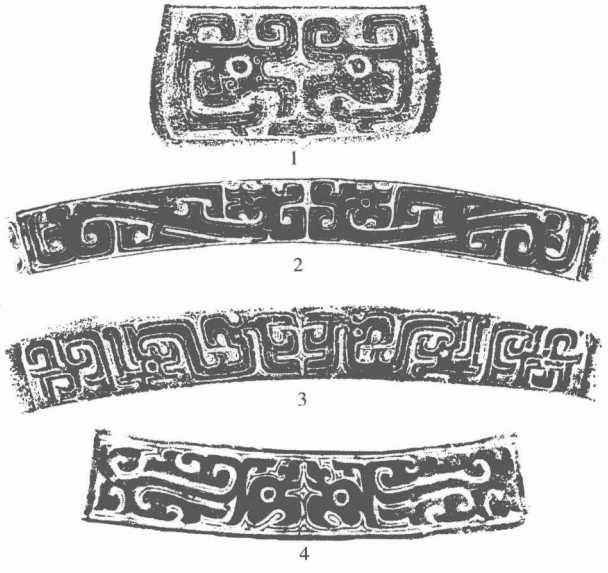


图 5.3－2 不同地区的勾云状龙纹

1. 潢川刘砦卣（《文物》1979 年第 9 期） 2. 繁昌汤家山龙纹盘（《皖南青铜器》第 104 页） 3. 南京浦口夔纹鼎（《文物》1980 年第 8 期） 4. 扶风齐镇村 M2 鼎（《周原》6.1129）

一方面，这些卣彼此风格近似，例如多数方卣均带扉棱，器形上作较长的子口，高圈足均饰波折纹，纹饰多见勾云状龙纹和波折纹。可以推测，这些卣同为某一区域铸造。有学者据姑子坪卣叶脉纹等装饰，认为卣的渊源与岳石文化相关①。不过岳石文化与姑子坪卣在年代上间隔较长，似乎难以直接关联。虽然这些卣的形制缺乏可追溯其源头的对比材料，但纹饰则可见风格类似者。上述方卣共存的两类纹饰颇有特点，一类是波折纹，不同的波折纹彼此平行分布，形成几何形构图。这种纹饰不见于其他青铜器，而多见于长江下游地区原始瓷器中②。同时，姑子坪卣的那种叶脉纹其实在硬陶中更为常见。上述方卣所饰的另一类特别的纹饰是勾云状龙纹（图 5.3－2，1），这种纹饰均作阳纹宽带状，纹带边缘辅以阳线，结构与两周之际其他纹饰不同；同时这些纹带的边缘不似一般纹饰作陡直的折转，而是作圆弧的过渡，因此纹饰往往较为模糊且难以施拓。与此相似的青铜器纹饰出现在其他两个不同的地区。长江下游地区周时期青铜器常见此类纹饰，如《皖南青铜器》中多见著录③（图 5.3－2，2），向东如江苏地区亦有所见④（图 5.3－2，3）。这样，联系到方卣波折纹的形制，它们极可能均为长江下游地区的产品。周原地区也偶见这类勾云状龙纹，扶风齐镇村 M2 鼎龙纹为勾云状（《周原》1129）（图 5.3－2，4）。虽然齐镇村 M2 鼎年代较早，但纹饰风格迥异于周原其他青铜器，因此这类装饰风格的源头可能为外来。

---

① 任相宏：《山东沂源县姑子坪周代遗存相关问题探讨》，《考古》2003 年第 1 期。

② 安徽屯溪墓葬原始瓷器和硬陶中常见波折纹，如 M1：58、M1：47 原始瓷尊，M3：54、M3：91 硬陶罐。参见李国梁主编：《屯溪土墩墓发掘报告》第 43、30 页，安徽人民出版社，2006 年。

③ 《皖南青铜器》著录如繁昌孙村出土的窃曲纹鼎，第 8；南陵西枫村窃曲纹鼎，第 18；繁昌汤家山出土窃曲纹盉，第 56。参见安徽大学等：《皖南青铜器》，文物出版社，2006 年。

④ 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南京浦口出土一批青铜器》，《文物》1980 年第 8 期。

如果上述诸卣为长江下游地区某一地点产品的推测无误，则其传播的文化背景令人寻味。一方面，这些卣的出土地点分布范围广大，除了随州向北与潢川、向南与京山可能存在文化上的关联之外，其他如长江之滨的百里洲、沂蒙山之西的姑子坪，其间不见明确的文化联系。另一方面，作为方卣产地的长江下游地区，在两周之际青铜文化的发展处于相对封闭的环境，该地区许多青铜器表现出文化滞后的特点。在此背景之下，一些形制与性质相同的青铜器却远距离传播到文化性质不同的区域，文化传播的形式远远超出目前我们的理解。

不同形式的文化交流——不管是否为我们所理解，是形成文化融合的主体力量。此前我们所讨论的文化交流，在形式上往往是某一区域文化因素施加于另一区域文化，并使后者的面貌发生趋向于前者的变化。“用其吉金”铭文辞例等等楚文化因素对江淮地区的影响，使这一地区文化融合而形成特征接近楚文化的楚系文化圈。某些文化因素的融合，又可能是超然于政治格局之上形成。上述扉棱方卣在不同区域的出现，并没有明确的内在背景。曾国青铜器中还有一些因素，接近于中原地区某些文化特征，也应当是类似文化融合的体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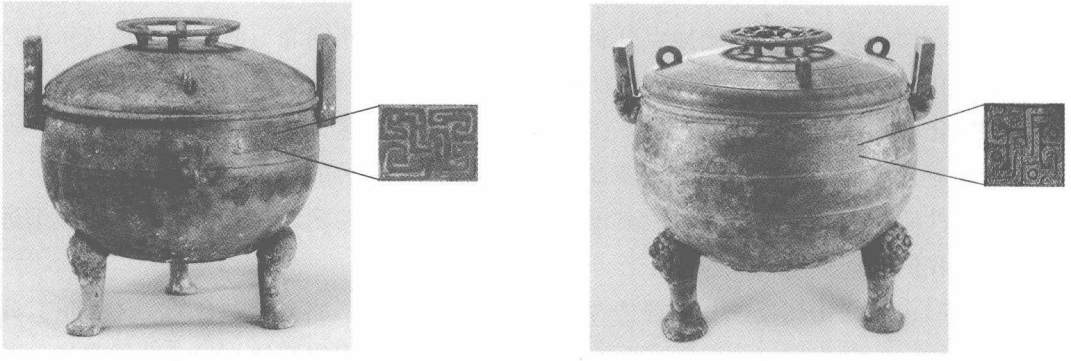
春秋中期，不同地区诸侯国文化分化加剧，并形成三晋、秦、楚等一些特征明确的文化区域。但这一时期的曾国青铜器和楚国一样仍然与中原文化存在较多的共性。年代在春秋中晚期之际的新郑郑公大墓，出土青铜器器形、纹饰多有与楚系青铜器相同之处。不仅郑公大墓中一些所谓“旧制”[①] 青铜器，如带扉棱鬲、带爬兽方壶、长颈圆壶等在楚系青铜器中可见类似形制铜器。同时，一些“新制”的盖鼎、簠、盏器形与纹饰都接近于第二阶段第一期曾国青铜器（图 5.3－3）。在装饰方面，新郑大墓青铜器纹饰除了继承西周晚期“旧制”的环带纹、重环纹等纹饰之外，主要运用蟠螭纹和蟠虺纹，这两类纹饰的构图也与楚系青铜器同类纹饰相同。因为郑楚之间的这些文化共性，有学者认为新郑青铜器受到楚文化影响[②]。

其实，所谓“旧制”是楚、郑青铜器不约而同地对传统因素的继承，而一些“新制”因素则不仅仅存在于郑楚之地，而是在黄河流域都广泛地分布。随州季氏梁墓葬出土的甗分体，盆形的甑体带立耳，鬲体如罐形，该甗鬲体与甑体的结合部分别有凸起和凹入的子母槽形设计，以便套卡甑体与鬲体。与季氏梁墓葬形制相同的甗在辉县甲乙两座墓葬都有出土[③]，甗的甑、鬲体子母槽的设计也完全相同。这种甗其后又传播至长

① 郭宝均：《商周青铜器群综合研究》之《东周初年及春秋时期铜器群》，文物出版社，1981 年。

② 夏志峰：《新郑器群三考》，河南博物院等《新郑郑公大墓青铜器》第 44 页，大象出版社，2001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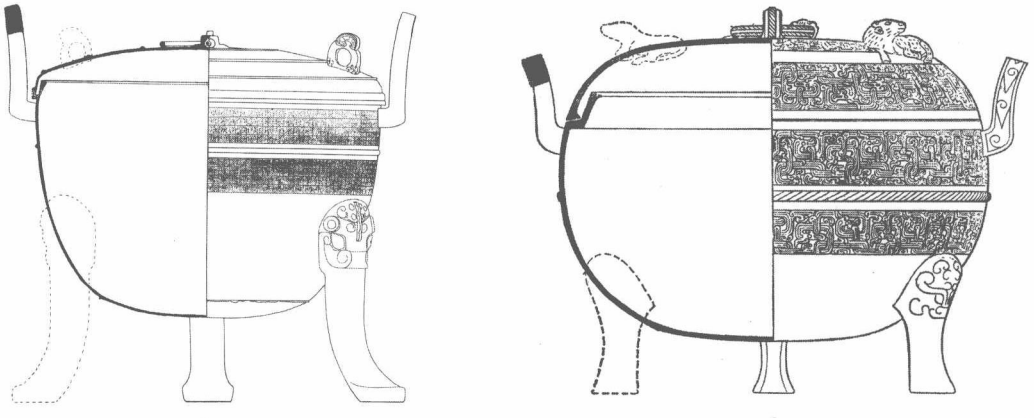
③ 河南博物院等：《辉县琉璃阁甲乙二墓》第 91、212 页，大象出版社，2003 年。



1 2

图 5.3－3 春秋中期曾国与中原地区青铜器的共性

1. 八角楼墓葬盖鼎 2. 郑公大墓盖鼎（《郑公大墓》第 80 页）



1 2

图 5.3－4 楚系与晋系盖鼎的差异

1. 东风油库 M3 曾侯遗鼎 2. 太原赵卿墓 M251：559 蟠螭纹鼎

江中下游地区，湖北黄石大冶罗桥①、安徽铜陵出土有多件分体甗②，其子母槽设计与季氏梁、辉县甗相同，但铜陵一些甗的纹饰特征显示它们为皖南地区产品。

春秋晚期，楚文化特征与中原文化进一步分化，包括曾国青铜器在内的楚系青铜器个性特征也更为突出。以青铜盖鼎为例，楚系盖鼎向高足深腹发展，而中原式盖鼎却趋于矮足（图 5.3－4）。在纹饰方面，楚系青铜器多见构图近似几何形的蟠虺纹，而晋系

① 大冶县文教局、文化馆：《湖北大冶罗桥出土商周铜器》，《文物资料丛刊》第 5 辑，1981 年。

② 安徽大学等：《皖南商周青铜器》图 66－69，文物出版社，2006 年。

青铜器如侯马铸铜作坊遗址陶范常见左右对称的兽面纹。但是，这一时期楚系青铜器中的一些铸造工艺、装饰纹样却与晋系青铜器有颇多相同之处。这一时期青铜器普遍采用分铸和焊接技术来解决器物部件的连接问题，例如炊器如青铜鼎的足与耳一概采用先铸法，而壶、簠等盛器的鋬与耳则均为焊接。春秋晚期曾国方壶如东风油库 M1、M2 和 75 刘家崖采集环带纹方壶盘形口实际是壶的冠部，冠及圈足各有 8 个镂孔或未镂空的盲孔，这种盲孔是铸造壶所用顶范及底范在与外范定位时遗留，其性质与泥芯撑形成的孔洞相同。楚式方壶未见这一特征，但在辉县一些青铜器如甲墓蟠龙纹方壶①圈足的盲孔与前述曾器如出一辙。又如，楚系青铜器中极为流行的蟠虺纹，在晋系青铜器中也有不少形态类似的例证（图 5.3－5）。虽然春秋晚期晋系铜器的蟠螭纹多以单首龙为构图元素，而楚系的蟠螭纹多使用双首龙，但无论如何，两类蟠螭纹的风格无疑极为接近，它们之间的关联是显而易见的。因为这种关联，罗泰认为晋国与楚国春秋晚期青铜器的相似性达到貌似同一作坊生产的程度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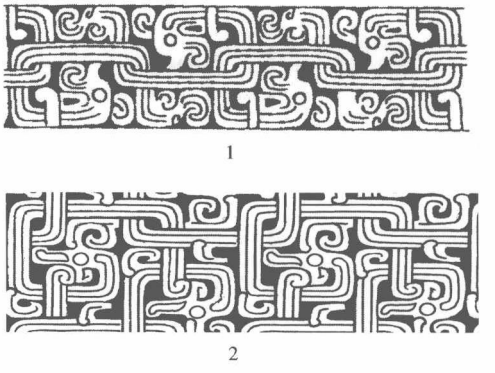


图 5.3－5　楚系与晋系蟠螭纹的相似性

1. 75 刘家崖连迂盖鼎蟠螭纹　2. 侯马陶范蟠螭纹（《侯马陶范艺术》图 356）

战国时期，不同区域文化在分化的大势下仍然可见许多相似性。和春秋时期一样，这些相似性的表现仍然在纹饰、技术层面较多，而在器形、铭文方面较少。这说明，整个东周时期各区域文化的融合，呈现出多样化的形式。一方面，由于地理位置和政治关系，使一些区域文化表现出对周边区域文化的影响力，形成如南方的楚系、中原地区的三晋两周地区这样一些较大的文化区。另一方面，某些超乎地缘政治的因素推动着文化融合的发展，使融合进行在技术这种层面的范畴内。

两周时期的青铜文化，既是在各诸侯国政治势力分裂背景下的文化分化，也存在着不同文化之间的融合。文化融合可能在两周时期文化大局中处于弱势，但其积累无疑又是其后秦汉文明统一的基石。

① 河南博物院等：《辉县琉璃阁甲乙二墓》第 92、94 页，大象出版社，2003 年。

② Lothar von Falkenhausen, The Bronzes from Xiasi and Their Owners.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考古学研究（五）·庆祝邹衡先生七十五寿辰暨从事考古研究五十年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3 年。

第六章　曾国青铜器所反映的曾国历史

曾国既然在历史文献中有不确定性，曾国历史就只能依照曾国青铜器等出土材料来勾勒。实际上，由曾国青铜器所映射出的曾国历史，比历史文献所能够提供的信息要丰富得多。

曾国青铜器发现以来，学者们关注的曾国历史，是这个曾国的族姓以及曾国所对应的到底是历史文献中的哪一个国家。随着曾国青铜器材料的丰富和研究的深入，不仅曾国青铜器所反映的考古学文化面貌大体得到廓清，而且我们已可以从政体的角度来了解曾国的历史。对于曾国疆域、都城即文化中心区域，甚至对于曾国国君世系的认识，不再是无由地推测，而是可以得出相对客观的结论了。

当然，由物质文化材料去推演国家政治等方面原貌，自然有许多局限和盲点，对于一些问题，更只能窥知其片断信息。对曾国而言，其中的局限之一甚至是我们对曾国存灭情况特别是曾国的早期历史都不能确定。因此我们所谓曾国的历史，主要是指曾国青铜器所代表的西周晚期至战国中期一段时期。西周晚期之前的曾国，我们只能提出一些线索。

第一节　曾国的疆域及中心区域

对曾国的历史地理研究，只有先大体确定曾国的疆域，在此基础上才可能探寻曾国的中心区域。

曾国青铜器出土范围广大，东至江苏六合，西及成都新都。即便在曾国青铜器出土相对集中的鄂北地区，曾国青铜器涉及区域也颇为宽泛（图6.1－1）。如果按照出土曾国铭文青铜器的地点即为曾国疆域的标准，即便不计明确出土在他国墓葬的青铜器，可能纳入曾国疆域范围的区域仍然有如下区域：

1）襄阳太平店代表的汉水中游地区；

2）新野小西关代表的唐河流域；

3）桐柏、罗山高店以及潢川高稻场代表的淮河中上游地区；

4）枣阳段营和东赵湖代表的滚水流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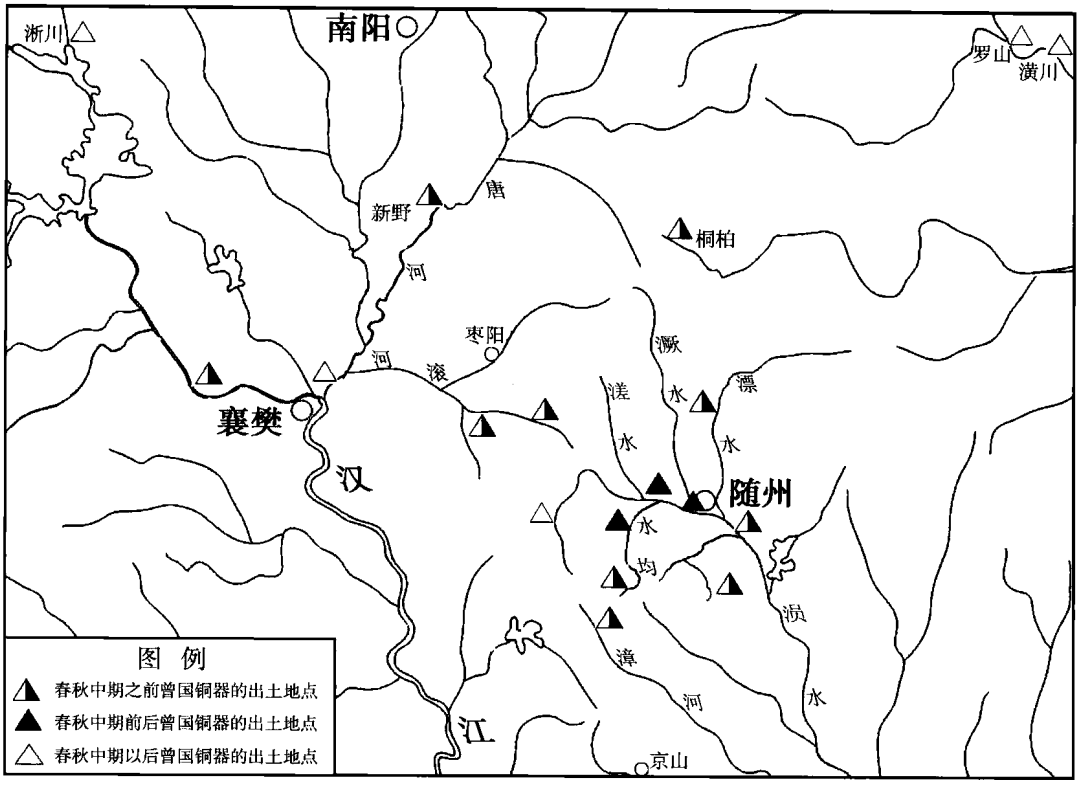


图 6.1－1　曾国青铜器出土位置示意图

5）京山苏家垅和檀梨树岗代表的漳河流域；

6）随州均川代表的均水流域；

7）随州擂鼓墩和义地岗等代表的涢水中游地区。

上述范围东西直线距离超过 200、南北直线距离超过 100 千米。显然，如此广大的区域并非都属于曾国的疆域范围，换言之，某地出土有带曾国铭文的铜器，并不一定就等同于该地地域属于曾国。如何根据青铜器材料判断曾国疆域，需要适当的分析。

判断曾国疆域范围，需要考虑如下四个方面的因素。

其一，有铭曾国青铜器出土情况。如果一个铜器群中包含有几件带有相同性质曾国铭文的铜器，则该铜器群可能为曾国青铜器，该地域有较大可能属于曾国疆域。如果曾国青铜器在某一区域有若干次出土，则该区域往往属于曾国疆域。相反，如果某曾国铜器出土在他国性质的遗存中，该铜器一般不具备确定曾国疆域的价值。

其二，地理因素。如果某一地点可确定属于曾国，那么同一较小的地理单元的其他地点出土的青铜器往往也是曾国青铜器，该地理单元在这一时期可能都属于曾国疆域范围。相反，某一地点出土有曾国铭文铜器，但该区域与已确定的曾国疆域在地理上阻隔

颇大，就可能说明该地点并非曾国疆域范围。

其三，政治格局。若某一出土曾国青铜器的地点已经被确认为他国地域，则该地点不应当为曾国范围。这样，在已经推定为曾国疆域范围附近区域发现若干他国青铜器、或特征与已知曾国青铜器风格差异较大的青铜器，可能说明该区域已不属于曾国疆域，由此可反推曾国疆域范围。若某一出土曾国青铜器的地点与已经确认的曾国疆域地理间隔较大，其间更有他国阻隔，则该地点不应当为曾国范围。

其四，文化面貌。曾国的不同地点的铜器群应当具有相同的文化面貌，相反，某地出土青铜器形制特征不同于已知的曾国青铜器，则说明该地可能并非曾国疆域。从考古学研究的角度讨论一个国家的疆域问题，相同的文化面貌应视为判断一个国家疆域的重要的条件。但由于曾国相关区域可对比的材料往往是集中在鄂北这一区域，其文化共性在第一、第二两个阶段都较强，因此不能认为与已知曾国青铜器群特征相同，就判断它们的性质也可能为曾国铜器群。

如果综合考虑上述原则，我们应当首先确定性质明确为曾国疆域的区域，然后以此为出发点，逐一肯定或否定各出土曾国铜器地点的性质。但必须指出的是，由于出土材料在量度上的局限性，对曾国疆域的推论往往是保守的，某些可能属于曾国的疆域，因为没有发现曾国青铜器而可能被忽略。

减小上述局限性的一条途径是排除法。通过考察已经确定曾国疆域范围的邻近地区出土青铜器情况，当确定这些青铜器非曾国青铜器的性质，即可排除该区域为曾国疆域。这也相应地明确了曾国的疆域范围。

在确定曾国疆域后讨论中心区域，结论相对更为客观。除了可利用青铜器材料之外，高等级墓葬或墓地、城址等高级别遗存，都是可明确遗存性质的依据。

一 鄂北一带曾国的性质

既然鄂北地区出土曾国青铜器的范围广大，是否这些青铜器在性质上属于不同的曾国？过去已经有学者提出这种可能性。

曾侯乙墓发现之前，曾国青铜器出土地点见于随州、京山、枣阳、新野等不同区域，其中带有曾国铭文的青铜器包括“曾子”、“曾伯”、“曾侯”等不同称谓。因此，俞伟超等认为不同称谓的曾国青铜器分别属于爵称不同的曾国：“京山、安陆、随县一带的曾国，诸侯称‘曾侯’，枣阳到新野一带的曾国，诸侯称‘曾子’，两个曾国所封的爵等是不一样的”①。可能因为“曾伯”称谓的青铜器也见于带“曾侯”称谓的随州一带，因此未被上文单列为一国而被视为行辈称谓。曾昭岷等也认为不同的曾国青铜器

① 俞伟超、高明：《周代用鼎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学报》（社哲版）1978 年第 1 期。

代表着多个不同的国家①，曾国青铜器中“曾子”、“曾伯”、“曾侯”分别代表三个爵称不同的曾国，称谓为曾子某的曾国对应历史文献中的山东之曾，即所谓“东海曾国”；称谓为曾伯某的曾国对应历史文献中郑地的曾国；而称谓为曾侯的曾国对应灭周之缯。之所以这些曾国青铜器多出土于湖北地区，是楚人将这些曾国青铜器作为战利品攫取而置于楚墓之中的。今天看来，将曾国青铜器一概视为楚人的战利品显然为不经之谈，但“曾子”等不同的称谓是否代表不同的曾国仍然需要辨析。

我们可以将京山、随州、枣阳一带出土带“曾子”、“曾伯”、“曾侯”称谓的青铜器列为表6.1－1，如表中所示，漳河流域只发现曾国青铜器二批，就有“曾侯”、“曾子”两种不同称谓。滚水、涢水地区“侯”、“伯”、“子”俱见。下节我们还会谈到，以上称谓中，只有“曾侯”为爵称，“曾伯”、“曾子”都只是曾国公族内不同的称谓，与国家属性无关。显然，鄂北地区没有出现过几个爵称不同的曾国并存的局面。

表6.1－1　　不同区域的曾“侯”、“伯”、“子”称谓比较

区域	侯	伯	子
漳河流域	曾侯中子斿父		曾子单
滚水流域	曾侯緐伯	曾伯陭	曾子仲谌
涢水流域	曾侯郳、曾侯乙	曾伯文	曾子原彝

此外，李先登认为不同的曾国青铜器铭文中“曾”字字形不同，主要是“曾”字下部“口”旁的写法有尖、圆之别，他将这一区别作为判断山东曾国与湖北之曾的标准之一，并进而认为曾伯霥簠属于山东曾国②。陈振裕等沿用此方法，来证明鄂北一带的曾国属于同一国家③。

总的看来，“曾”字确有将下部作尖、圆不同的写法，不同的写法在不同区域似乎有所偏重。比如漳河流域曾国青铜器“曾”字多尖口，而滚水流域曾国青铜器“曾”字多圆口。但同一区域不同写法是共存的。如表6.1－2所示，第一阶段曾国青铜器铭文“曾”字的写法较多，不仅同一区域“曾”字有不同字形，而且同人所作之器、同一套青铜器“曾”字的写法也有不同。以“曾”字的写法来判断不同的青铜器是否代表不同的曾国并无意义。

① 曾昭岷、李瑾：《曾国和曾国铜器综考》，《江汉考古》1980年第1期。

② 李先登：《曾国铜器的初步分析》，《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6年第9期。

③ 陈振裕等：《试论曾国与曾楚关系》，《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6期。陈氏所引李先登论文首见于1980年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论文。

表 6.1－2　　第一阶段曾国青铜器铭文中“曾”字的写法

	漳河流域	滚水流域	溳水流域	其他来源
下部尖状的写法				
	曾侯仲子斿父鼎	曾子仲谏甗	曾伯文簋（《集成》）4053	桐柏曾子伯杳盘
下部圆状的写法				
	曾侯仲子斿父方壶	曾子仲谏鼎	曾伯文簋（《集成》）4052	临朐上曾太子鼎
其他写法				
		曾伯陭壶	曾伯文簋（《集成》）4051	传世曾伯霥簠

必须指出的是，将两周之际前后金文字形作区域差异的分析，在研究方法上也存在问题。我们知道，春秋时期各国金文直到春秋中期以后才发生地域性分化①，两周之际前后豫南鄂北地区、山东地区诸国青铜器铭文都与西周晚期保持着一致特征，这种一致性尤其在铭文字形方面较为明显。“曾”字的字形，在两周之际前后确有一些不同的构形，这种不同，有两周之际“曾”字写法自身的分化，但这种分化在曾国不同区域、在上曾太子般鼎都一并存在。此外，“曾”字还存在不同时期字形的变化，这一点在第四章《铭文》一节已有阐述，例如传世曾伯霥簠（表 6.1－2）“曾”字字形代表了春秋早期偏晚至春秋中期的时代特征，据此字形而将其判断为山东之鄫青铜器显然欠妥。简言之，我们不能因为“曾”字字形的不同而将湖北之曾划分为不同的国家，也不能因为山东之曾“曾”字字形与湖北之曾相同而将其合而为一。

以上分析了鄂北一带的曾国不是几个称谓不同的国家。这一认识实际上还基于如下

①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第 47 页，商务印书馆，2005 年。

现象：1）鄂北一带出土青铜器虽然位于不同的地理单元，但这些区域在地理上呈片状彼此毗邻。在当时不大可能有不同的曾国处于同一地域。2）曾国青铜器特征说明，不同区域出土的曾国青铜器某些具有曾国个性的装饰或器形特征，在不同地域均有表现，暗示它们的国族性质可能是相同的。3）不同区域的曾国青铜器反映出的国家政治特性具有相同特征。例如几个不同区域曾国青铜器均表现出与黄国密切的政治关系，漳河流域的苏家垅出土有2件黄朱柁鬲，涢水流域的熊家老湾出土有2件黄季鼎，而滚水流域的郭家庙M1出土曾孟嬴削簠，器主也可能是嫁到曾国的黄国女子。看来，鄂北一带出土的曾国青铜器确实代表的是同一个曾国。

二　曾国的疆域

对于曾国的疆域，学者们很早就表现出极大的关注。由于出土资料有限，20世纪三、四十年代讨论这一问题的方法，主要是利用文献资料，学者们讨论的对象，也与我们今天的认识不尽一致。最早对曾国疆域进行研究的是刘节，20世纪30年代寿县李三孤堆铜器群发现后，他将历史文献中郑地之鄫与曾伯霥簠、寿县出土的曾姬无卹壶等出土资料信息结合起来，认为曾国先附庸于郑，后南徙附庸于楚。因此“曾人之足迹北起郑郊，南及光州，西起西阳，东抵睢州”①。吴其昌根据历史文献更认为历史上的曾国东境在今山东西南的古峄县，西境在今河南东部的睢州②。吴其昌所指，实际上是山东之鄫，这与当时学术界将出土青铜器代表的曾国地望关联于历史文献中山东之鄫的主流看法是一致的。

1966年京山苏家垅铜器群发现后，曾国青铜器在京山、随州、枣阳、新野等地都有发现，使曾国青铜器出土地点的分布形成一个片状范围。这个范围自然会被学者们与曾国疆域关联起来，因此认为曾人活动范围“主要是在湖北北部的汉水以东，以新野为其北限”③。因为北宋年间楚王酓章钟出土于安陆与孝感一带、曾子仲谏甗出土于新野、曾孟嬭谏盆出土于汉水东岸的襄阳，姚政更认为曾国的疆域“北起河南新野，西沿汉水，南到安陆、孝感”④。1996年，罗山高店发现成组的曾关臣铜器，因此这里也被视为曾国的疆域⑤。甚至有学者以曾国疆域包括襄阳为依据，再据淅川和尚岭出土的曾太师鼎和曾仲伽君臆器座，故而认为“襄阳离淅川很近。种种迹象表明，春秋中晚

① 刘节：《寿县所出楚铜器考释》，《古史考存》，人民出版社，1958年。

② 吴其昌：《金文历朔疏证》第18页，上海商务出版社，1936年，又版于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

③ 李学勤：《曾国之谜》，《光明日报》1978年10月4日，后收入《新出青铜器研究》，文物出版社，1990年。

④ 姚政：《古曾国考》，《南充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4期。

⑤ 左超：《关于曾国问题的补遗》，《楚文化研究论集》（第五集），黄山书社，2003年。

期，有曾国人来到今豫鄂交界西段，入了楚籍，在这里居住下来”①。学者们以曾国青铜器出土地点等同于曾国疆域的方法，构建出的这个“强大的”曾国，当然并非曾国疆域的原貌。

单件带有曾国铭文的青铜器，未必能够说明同出整个青铜器群均属于曾国青铜器，该铜器群出土地域当然也未必一定属于曾国疆域，而是需要具体分析其文化背景。因此，过去将带有曾国铭文铜器的铜器群及其所在区域都归入曾国青铜器和曾国疆域，这一做法明显存在方法问题。比如，那些出土在其他国家墓葬中的曾国青铜器，就不能反映曾国的地域范围，这些情况在曾国青铜器中多见，襄阳梁家老坟墓地战国中期楚墓出土年代在春秋晚期的曾侯昃戈，淅川和尚岭、徐家岭春战之际楚墓中出土曾太师鼎、曾仲伽君臆器座和曾嫚嬇朱姬簠，江苏六合程桥吴国墓地 M3 出土曾子义行簠，四川新都马家乡战国中晚期蜀国墓葬出土邵鼎，这些曾国青铜器出土地点当然都不属于曾国范围。同时，对于那些单件带曾国标识的青铜器，如其出土地域性质不明，尤应谨慎地分析该地的文化背景，而不能贸然与曾国疆域联系在一起。

除了青铜器出土背景涉及曾国疆域的判定之外，曾国疆域还可能存在历时性变化。曾国的立国至少跨有西周晚期至战国中期，曾国的疆域范围当然不是固定不变的。特别是在春秋早期前后豫南鄂北地区政治格局动荡，楚人的壮大而使楚国疆域迅速扩张，这也必定影响到包含曾国在内的小国疆域。

考虑到这些情况，按照前述探讨曾国疆域的原则，我们可分阶段讨论曾国的疆域问题。

1. 第一阶段曾国的疆域

以青铜器讨论曾国疆域问题，首先需要确定铜器群是否为曾国青铜器，再由此分析该器群出土地点是否属于曾国疆域。另一方面，否定一些铜器群作为曾国青铜器的性质，即可排除该出土地点作为曾国疆域的可能。通过这样的确定与排除，曾国疆域的轮廓就大致可定。因此，讨论曾国疆域范围的基本方法，是首先明确那些依据充分的区域属于曾国疆域的性质，再以此为依据，判断邻近区域出土青铜器的性质，确定邻近区域的疆域性质。

曾国的西部地区可确定包括枣阳中南部的滚水地区。滚水西流入注汉水支流唐河，其南北两岸为较低平的岗地。1972 年熊集段营墓葬中出土有鼎 3、簋 4、壶 2 等铜容器，同时出土有 200 余件车马器和兵器，可见此墓葬规格较高。容器中一件鼎有“曾子仲谏”铭文。1982 年在段营之东约 15 千米的吴店镇曹门湾又采集到“曾侯絆伯”

① 赵平安：《河南淅川和尚岭所出镇墓兽铭文解读》，www. bsm. org. cn 简帛网·楚简专栏，2006 年 5 月 17 日。

戈，年代较段营墓葬略晚，属春秋早期偏晚。这一地区先后出土有铭曾器，说明滚水流域当时可能是曾国的疆域范围。2002 年，襄樊市考古队在曹门湾之北约 300 米的郭家庙墓地发掘了 25 座墓葬。这些墓葬或早期严重被盗，或现代破坏严重。出土有铭青铜器主要都是曾国青铜器，如郭家庙 M1 出土曾孟嬴削簠，M17 出土两件曾亘嫚非录鼎，M21 出土有曾伯陭钺。这些表明郭家庙墓地性质属于曾国是无疑的。该墓地较早墓葬年代在两周之际，与段营墓葬年代相同，墓地使用下限在春秋早期偏晚，与曾侯絆伯戈一致。这样看来，滚水一带约在春秋早期一段时期作为曾国的疆域，是没有疑问的。枣阳曹门湾和郭家庙一带还多次发现墓葬并屡出铜器，1972 年曹门湾出土鼎 2、簋 2；1983 年 1 月，曹门湾之东一座墓葬中发现铜鼎 1、簋 2、圆壶 1；1983 年 4 月，郭家庙发现一座墓葬（郭家庙 M02），出土鼎 1、鑐 2。这些发现分别属于曹门湾和郭家庙墓地，它们虽然未见标识为曾国的文字依据，但性质与上述曾国青铜器当然是相同的。由此我们可以确定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滚水流域属于曾国疆域。

襄阳太平店出土曾孟嬭谏盆，曾国的西部疆域是否可远及襄阳？曾孟嬭谏盆清光绪年间出土于襄阳太平店，出土背景已不明。太平店位于汉水东岸的襄阳与谷城交界处，距离东赵湖一带有百公里之遥。目前至少已知这两地之间尚有邓、鄀等国家分布。从地理位置、政治格局考虑，曾国疆域不可能远及于此。

曾国的西部疆域甚至并未向滚水流域以北今枣阳城关一带延伸。1977 年枣阳王城出土有阳飤生簋与匜①，当非曾国青铜器。枣阳吉河南街村出土一件立耳柱足鼎②，鼎形制略接近桃花坡 M2 弦纹鼎，但吉河鼎腹部作类似瓦纹的凸起，作风特异，与曾国铜器鼎风格差异较大。这种文化面貌上的差异说明两地文化性质的不同。

曾国的南部地区可确定包括京山北部的漳河上游谷地。漳河河谷地处大洪山脉南麓，河水东南流向并在今云梦境内入注涢水，其上游地区是宽不足 500 米的狭窄河谷。1966 年京山镇苏家垅出土的 97 件青铜器中，容器有鼎 9、鬲 9、簋 7，方壶和豆均成对，盘、盉、匜构成水器组合，这些青铜器组合有序，同时出土有车马器等小件铜器，因此这批铜器应该出自一座高级别墓葬。在 10 件有铭铜器中，鼎、豆、方壶等 6 件有“曾（侯）仲斿父”铭文，九件列鼎中只有两件斿父鼎带有铭文，且斿父鼎最为精致，可知余下七鼎是围绕斿父鼎制作的。豆和方壶铭文均成对出现，斿父器在整个器群中占有核心地位。因此斿父应该是这批青铜器的所有者无疑，也就是说，苏家垅器群性质为曾国青铜器。1973 年距苏家垅不远的檀梨树岗发现曾子单鬲、曾大师鼎各 1 件，两器年代约在西周晚期。此次发现，说明苏家垅铜器群在漳河流域的出现并非偶然，漳河上

① 襄樊市博物馆：《湖北谷城、枣阳出土周代青铜器》，《考古》1987 年第 5 期。

② 徐正国：《湖北枣阳市博物馆收藏的几件青铜器》，《文物》1994 年 4 月。

游地区应当为曾国的疆域无疑。苏家垅和檀梨树岗两个地点出土曾国青铜器所反映的社会等级都很高，说明漳河上游在西周晚期至两周之际时期为曾国的一个重要区域。

京山一带的漳河中上游为曾国地域，但京山西南出土的相应时期青铜器是否属于曾国青铜器，仍然需加讨论。20 世纪 80 年代京山城关西北台出土过属于西周晚期的青铜鼎、提梁方卣、盘①，这批铜器颇有特点，卣、盘圈足下有悬铃现象。过去我们曾将其也归入曾国青铜器范畴②。但严格地说，这一认识依据不足。就文化特征而言，西北台铜器特征与曾国铜器相同，例如，西北台提梁方卣与 70 随州熊家老湾方卣形制、纹饰几乎完全相同，唯后者圈足下未有悬铃。西北台盘与 72 熊家老湾盘形制相同，两器盘内均饰蟠龙，圈足下均有残存的悬铃之环。可见西北台一带与曾国有着密切关联。但从地理位置上看，京山城关向北距漳河地区直线距离近 50 千米，其间多有绵延西北－东南走向的大洪山余脉阻隔，而由城关向东南与江汉平原的北麓联系更为便利，很难说曾国疆域范围可能延伸至京山中部。西北台青铜器器物形制、带铃风格来自北部即曾国的影响，但并不意味着该地属于曾国。

曾国的中部地区可确定涢水支流为其疆域范围。随州中部涢水中上游地区属于随枣走廊的东段，涢水夹桐柏山和大洪山东流，地势较为开阔。涢水支流南北分布，形成有若干较小的地理单元，其间常出土有青铜器。在这些区域中，南部支流均水流域首先可确定为曾国疆域。均水中上游河谷今均川一带两次发现有曾国青铜器。1970 年熊家老湾出土铜器，包括有曾伯文簋 4、曾伯文鑐 1、方卣 1，曾伯文簋 4 件相同，原来为一套，这批青铜器未见鼎，组合已不完整。但 4 件簋和 1 件鑐都属于曾伯文，铜器群的器主是很明确的。1972 年熊家老湾又出土铜器，有鼎 3、方甗 1、簋 2、鑐 1、盘 1、匜 1，2 件鼎和 2 件簋上分别有“曾仲大父蛸”和“黄季”铭文。黄国铜器在苏家垅也有发现，大约都是用作黄女嫁曾的媵器。72 熊家老湾器群可能属于曾仲大父蛸。曾伯文和曾仲大父蛸两批青铜器，说明均水一带当时属于曾国疆域。熊家老湾附近还发现有年代相当的黄土岗遗址③，和熊家老湾铜器群的性质是相关的。

明确上述漳河上游、滚水流域、均水流域几个区域属于第一阶段曾国疆域，我们可由此进一步推定其他相关地域的性质。

前述涢水中上游今安居至随州一线，是较宽广的河谷地带，并构成同一地理单元。这一区域出土的青铜器，除了均水流域熊家老湾之外，其他地点铜器多未见带曾国标识，这些区域有：1）在涢水之北与淫水交汇地带的安居一带，1979 年安居桃花坡发现

① 熊学兵：《京山发现一批西周铜器》，《江汉考古》1983 年第 1 期。

② 张昌平：《曾国铜器的分期及其相关问题》，《江汉考古》1992 年第 3 期。

③ 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地图集·湖北分册》上册第 250 页，下册第 565 页，西安地图出版社，2002 年。

两座西周晚期墓葬，M1 出土青铜鼎、鬲等 13 件容器以及 157 件车马器和玉器等。M2 出土有铜鼎 4、鬲 2、簋 1。两座墓葬只有 M1 盘带有铭文，器主为起右，其国属不明。2）在今随州城区即涢水与北部支流溲水交汇地带，分布有义地岗墓地。1993 年墓地 M83 出土西周晚期铜鬲 1、盘 1、匜 1 及玉环 1，鬲口沿有铭文，但其国属亦不明。与义地岗同属一个墓地的八角楼还采集有两周之际的铜鼎、盘及车马器等青铜器。这两批青铜器年代在西周晚期至两周之际。3）随州城区之北约 2 千米的黄土坡出土有两周之际的铜鼎 1、钺 1、戈 1 及陶鬲 1，铜鼎作深腹，形制较为独特，是新出的器形。4）在随州城区东北的涢水北部支流漂水左岸，万店周家岗一座墓葬中出土青铜器 16 件，其中容器组合为鼎、鬲、簋、圆壶、盘、匜，墓葬年代在春秋早期偏晚阶段。一对簋为“曾太保”所作，其铭文均被刮削，且簋的年代早于其他铜器，可见“曾太保”为墓主掳取之物，它不能证明周家岗墓葬为曾国的性质。鼎、盘为“庳季”所作，年代与墓葬一致，因此“庳季”应为墓主。这里的“庳季”之“庳”未必是国名，第二阶段曾国铜器中如均川刘家崖墓葬的盜叔、义地岗墓地东风油库 M1 的黄仲酉称谓均与此结构类似，“盜”、“黄”都不是代表国名，而可能是某贵族族氏名。

上述地点出土的青铜器，都没有直接依据表明它们与曾国青铜器的关联。不过，我们认为上述青铜器均属于曾国青铜器，安居至随州一带地域在两周之际前后属于曾国疆域。主要基于这样一些考虑：1）从地理位置上来说，明确为曾国疆域的漳河和滚水流域两个区域地理间隔较大，它们直接的地理联系较为困难。而安居至随州一带西通滚水流域，南连漳河上游，是滚水和漳河两个区域的中间地带。2）既然涢水中游支流均水一带为曾国疆域范围，作为均水对外联系的主要区域涢水中游一带也应当属于曾国疆域。3）漂水是涢水中游向北联系黄国的线路，曾国与黄国的密切关系暗示，周家岗墓葬的存在是联系两国之间的中继点。“庳季”应当为曾国某支贵族称谓。4）义地岗墓地还发现有多批第二阶段青铜器，它们的性质可确定为曾国青铜器。义地岗墓地是第二阶段曾国高级贵族墓地，在此之前墓地可能已经作为曾国的性质。

明确涢水中上游地区为曾国的疆域范围，这一范围的主要地点为均川、随州、安居三地，它们构成地缘接近的三角形区域。由此我们可进一步推定该区域及附近其他一些零星出土青铜器也属于曾国，也就是说，那些文化特征与已知曾国青铜器相同、在地域上明显有与已知曾国疆域范围活动相关的青铜器，它们的出土地点可能也属于曾国疆域。例如，在南部地区，涢水之南的何店何家台河沙中出土一批两周之际青铜器，包括有鼎、方甗、鬲、簋、圆壶、盘、匜等容器 13 件，这批铜器组合有序，应当是作为墓葬随葬品。何家台位于大洪山北麓，与涢水中游处于同一地理单元，在位置上何家台地处涢水中游对东南地区交通通道，因此这里也应是当时曾国活动范围。

但是，并非在曾国疆域邻近区域出土青铜器，即可将其归入曾国疆域范围。1974

年随州三里岗尚店出土1件鄦公汤鼎和2件鄦公伯盡簋①，鼎、簋的特征与曾国青铜器完全相同。尚店亦位于大洪山脉北麓，但这里并不便于对溳水以外的区域联络，而是僻于山地与丘陵过渡地带。尚店出土的几件铜器虽非同一人所作，但均属于鄦公之器。两周之际常有小国之君作器称谓为“某公”②，鄦公可能是僻处于曾国之侧的一个小国，其文化深受曾国影响，但三里岗一带并非曾国地域。

溳水中上游地区的曾国疆域可能向北延伸多远呢？第一阶段曾国青铜器北至桐柏和新野等两个地点各有出土。在地理上两地都与滚水、溳水一带隔有桐柏山脉。新野多被视为曾国地域，缘于新野小西关一座墓葬中出土曾子仲谌甗③。曾子中谌所作之鼎又见于枣阳茶庵，其年代在两周之际。小西关墓葬中簠等铜器年代应当在春秋早期偏晚，它代表了墓葬的年代。曾子中谌甗的年代早于墓葬年代一个阶段，这样，小西关墓主不可能为曾子中谌。从地理位置上看，小西关位于汉水支流唐白河流域，这里与距离最近的滚水中上游一带的联系，需要南下经汉水流域今襄樊一带，而后顺滚水流域东进到达滚水中上游地区。这一线路之间在两周之际前后可能隔有邓、鄀、楚诸国，显然，新野小西关一带不可能作为曾国疆域。

桐柏位于淮河上游，位置靠近溳水流域。这里出土的曾国青铜器是曾伯沓盘，出土情况不明。不过，曾伯沓所作的匜又见于传世（《集成10207》），可见曾伯沓之器也比较分散。桐柏一带多次出土两周之际前后青铜器④，青铜器特征与曾国存在一定差别，而与黄国青铜器接近。此外，两周之际前后桐柏一带可能属于昶国⑤。和新野一样，桐柏向南与随枣走廊的联系还有桐柏山相阻隔，这里可能作为曾国向北联系的线路，但曾国的势力范围应不会远及于此。

不过，我们目前还难以明确溳水中上游地区的曾国疆域向东延伸的范围。1987年位于随州东北的广水（原应山）吴店一座墓葬中出土铜鼎2、鬲2、甗、簋2、壶2、盘、匜⑥，年代相对于第一阶段第二期即两周之际时期，青铜器形制特征与同时期曾国青铜器完全相同。但我们并无其他依据证明这一带属于曾国疆域。

通过上述分析，曾国青铜器反映的第一阶段曾国疆域范围大体集中在三个区域

① 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县新发现古代青铜器》，《考古》1982年第2期。

② 王世民：《西周春秋金文中的诸侯爵称》，《历史研究》1983年第3期。

③ 郑杰祥：《河南新野发现的曾国铜器》，《文物》1973年第5期。

④ 王儒林：《河南桐柏发现周代铜器》，《考古》1965年第7期。南阳市文物研究所等：《桐柏月河一号春秋墓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97年第4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河南桐柏月河墓地第二次发掘》，《文物》2005年第8期。

⑤ 陈昭容：《从青铜器铭文看两周汉淮地区诸国婚姻关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七十五本第四分，2004年。

⑥ 应山县文化观文物组：《湖北应山吴店古墓葬清理简报》，《文物》1989年第3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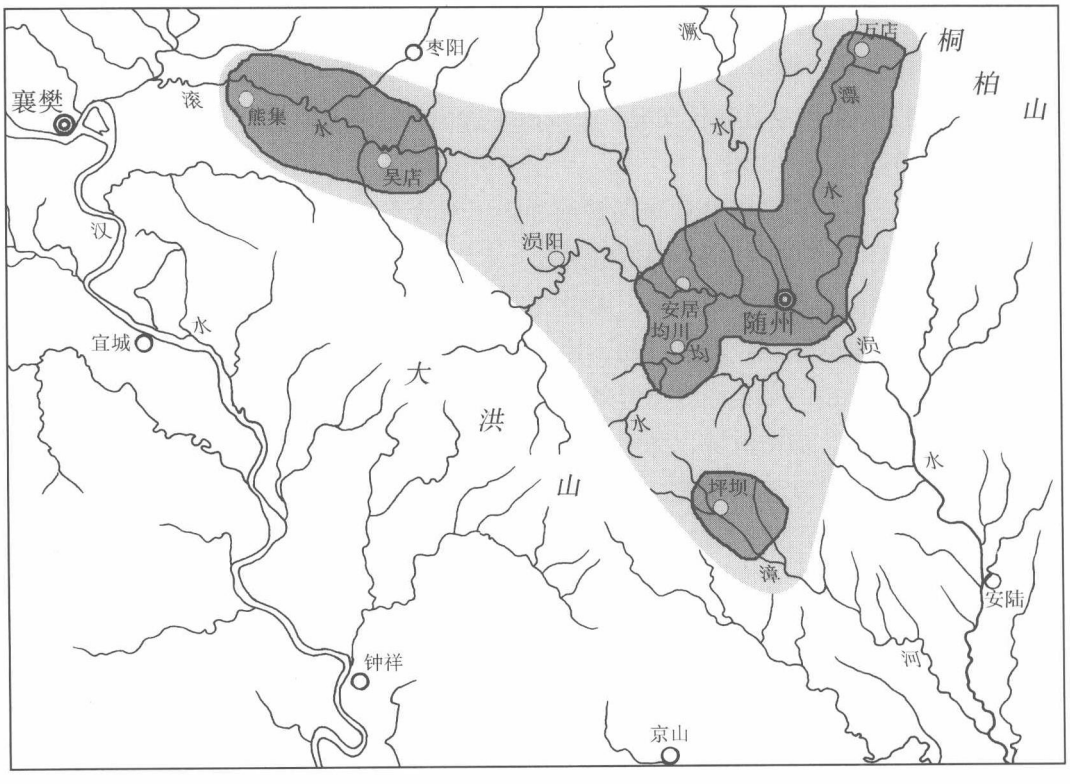


图 6.1－2　第一阶段曾国的疆域示意图

(图 6.1－2)：漳河上游地区、滚水中上游地区、涢水中上游及其支流地区。这些区域分布在三个不同的小水系，是互为阻隔的独立地理单元。漳河上游河谷狭窄，向北有大洪山脉与涢水中上游相隔；滚水和涢水之间的岗地是这两条水系的分水岭，其间罕有周代遗存分布。一个方国地域同时分布在彼此相对独立的三个地理单元内，这种现象十分少见。

那么如何理解曾国疆域占有这样三个独立的地理单元？我们知道西周文化中心在商文化中心区域之西，早在殷墟文化时期由随枣走廊经南阳盆地，就是连接周文化中心与长江中游地区的地理通道。具体而言，滚水流域与涢水中上游地区在随枣走廊西、东相对，并顺沿大洪山形成渐行渐窄的地理通道，这一通道既可东南顺涢水而下、亦可越过大洪山垭口至漳河流域。由于西周时期南北文化交流是以周文化势力对南施加影响为主流，因此曾国青铜器分布所暗示的地缘政治关系，是曾国作为周文化势力控制南方的前哨。直至春秋早期之后楚文化势力的崛起，随枣之间的分水岭才成为分隔楚、曾两国的界线，但两地的文化关系仍然密切。

从曾国内部的政治结构上看，曾国的三个区域可能为不同族氏分布相关。周代不少

诸侯国如晋、郑、宋、鲁诸国存在由国君诸子、诸公子形成的支系，曾国不同地区可能也曾经有“曾伯”、“曾子”等不同支系的存在。曾子仲宣鼎有“宣尚用饗其诸父、诸兄”，意为曾子仲宣燕享其诸位父兄，正反映了曾国公族存在不同族系的情况。

2. 第二阶段曾国的疆域

根据历史文献的记载，春秋早期楚国加强了对今豫南鄂北一带的扩张，楚国先后伐、灭了申、邓、黄等曾国邻近地区的国家。《左传》记载表明，楚国同时也对位于今天随州一带的随国进行了多次讨伐。无论曾、随国家如何对应，位于曾国之西的楚国对今随州及其西部地区采取过军事行动，是确定无疑的。这是我们考虑第二阶段曾国疆域变化时，应当注意的一个大的政治背景。

春秋早期之后，漳河流域、滚水流域都未再见与曾国相关的遗存。滚水上游的郭家庙墓地年代下限在春秋早期偏晚，这大体就是曾国在滚水流域活动的最后阶段。根据文物普查资料①，春秋早期之后的滚水及周边地区的文化面貌表现出楚文化的特征，这与历史文献记载当时楚人东进的背景吻合②。郭家庙墓地之西约 1 千米的九连墩墓群③，即当是形成于楚人进据原来的曾国地域之后。

但曾国在涢水中游一带的活动仍然延续。涢水与漷水交汇区域即今随州城区一带是第二阶段曾国疆域的核心区域。这一区域发现的第二阶段曾国遗存，包括有漷水左岸的随州城郊义地岗、蒋家岗等墓地以及右岸的擂鼓墩墓群。义地岗墓地多次发现春秋中期至战国时期高等级铜器，当时应当是曾国高级贵族墓地。1979 年，义地岗墓地春秋中期季氏梁墓葬发现有铜鼎 1、甗 1、簠 2、编钟 5、戈 2 以及车马器等器物 44 件，其中两件戈分别有“周王孙季怠”及“曾大攻尹季怠”铭文，季怠可能为墓主。1990 年，在义地岗墓地东风油库发现春秋末期墓葬 3 座，出土有多件铜器及陶、玉器。M1 全部 6 件青铜器均为“曾少宰黄仲”所作，黄仲当为墓主，M3 出有“曾仲姬”圆壶和“曾侯郕”鼎，墓主可能为曾仲姬。这些文字材料可确定义地岗墓地为曾国贵族墓地。义地岗墓地使用的年代，上限如第一阶段 M83 年代在西周晚期，下限当晚于东风油库墓葬，在义地岗墓地采集到战国早期偏晚阶段鼎等青铜器④，说明墓地的使用至少晚于战国早期。

擂鼓墩墓群是战国时期曾国国君陵园区，墓群面积南北延续 1 千米，已经发掘的重要墓葬有 1978 年在墓群东南部东团坡发掘的曾侯乙墓，1981 年在距离东团坡仅 102 米

① 叶植：《襄樊市文物史迹普查实录》，今日中国出版社，1995 年。

② 《左传》桓公六年、八年都记载有楚武王伐随国。

③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枣阳市九连墩楚墓》，《考古》2003 年第 7 期。

④ 随州市博物馆：《随州东城区发现东周墓葬和青铜器》，《江汉考古》1989 年第 1 期。

的西团坡发掘的随州擂鼓墩二号墓，M2 出土器物包括编钟 36 件及升鼎 9 件，年代在战国中期。1997 年，经调查与勘探，擂鼓墩墓群又发现有擂鼓墩土冢、王家包、蔡家包、王家湾等四个带封土墓葬①，有的墓葬规模与曾侯乙墓接近，根据这些墓葬规模、布局等方面情况分析，它们也应当是曾侯一级墓葬②。

均川一带也与随州一带情况相同，一直比较稳定地属于曾国疆域。距离第一阶段两次发现曾国青铜器的熊家老湾不远，刘家崖在 1975 年多次发现第二阶段青铜器。这些发现包括一批春秋晚期青铜器，其中有三件成列的“连迂”升鼎和一件“连迂”盖鼎，这说明连迂的社会地位颇高。同属于春秋晚期的还有一对爬兽耳方壶，但不能确定与“连迂”器同出。1975 年刘家崖出土的还包括两件战国中期“昭”所作的方豆，同人之器见于四川新都蜀国墓葬。1980 年，刘家崖同一地点一座被盗墓葬中发现铜器 27 件以及玉器、陶器、金箔等。其中铜器有鼎 2、鬲 4、圆壶 2、编钟 5、勺 2、车马器等，鼎、圆壶、戈有“盅”、“盜叔”等铭文，墓葬年代在春秋中期。此外，刘家崖还采集有年代在春秋中期之后的铜鼎、簋等，结合调查情况可知，刘家崖是一处春秋中晚期至战国中期的墓地。从铜器及铭文特征看，其性质应属于曾国。墓地未出土带“曾“字铭文铜器，应当与春秋中期后铜器铭文辞例多私名少国族名的情况相关。例如同时期义地岗墓地出土的铜器见有“敉”、“可”等私名，即不带任何族氏和职官称谓。

除了以上两个区域之外，第二阶段曾国在涢水中上游一带的活动已经发生了较大变化。在东部的安居一带，春秋中期之后曾国遗存剧减。1988 年，位于安居与随州城区之间的安居汪家墓一残墓中出土春秋晚期铜鼎 1、簠 2、铅方壶、陶罐等。鼎、簠分别有“曾孙定”、“曾都尹定”铭文，这是春秋中期以后曾国遗存分布最西的地点。春秋中期之后曾国大约逐步退出安居一线，这显然与来自西部楚国的压力相关。

在涢水上游，1975 年随州鲢鱼嘴出土春秋中晚期曾子原彝簠、曾仲之孙戈等曾器 2 件，同出的有年代相当的楚屈子赤角簠、息子行盆。考虑到当时的政治格局以及曾国在鲢鱼嘴以东安居的活动已经消退，这一组青铜器的器主不可能为曾人而应当属于楚人。也就是说，春秋中晚期曾国疆域不及涢水上游。

第二阶段曾国青铜器出土地点还涉及淮河上游。罗山高庙所在的罗山高店砖瓦厂位于淮河支流泻河北岸，1989 年罗山高店出土有成组的曾季关臣铜器，其中包括曾子季关簠 2、曾季关盘 1、曾关臣匜 1，属于同一批的青铜器可能还有鼎、圆壶以及兵器和车马器，这些青铜器出土于一座墓葬之中。由于曾季关臣所作之器成批出现，曾关臣应当是这座墓葬的墓主。但罗山一带在第一阶段为黄国之地，过去数次出土有黄国、蔡国

①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北随州市擂鼓墩墓群的勘查与试掘》，《考古》2003 年第 9 期。

② 张昌平：《关于擂鼓墩墓群》，《江汉考古》2007 年第 1 期。

青铜器①，考虑到地理位置、当时的政治格局诸因素，曾兴臣当属于客死他乡的曾国贵族。1996 年在河南潢川高稻场也发现曾国青铜器，这里发现有 40 座春秋中晚期墓葬，其中属于春秋晚期的 M9 盘有曾姬铭文。有关高稻场的发掘未见详细的报道，从春秋中期政治格局分析，春秋中期之前潢川属于黄国，这批墓葬年代当在楚灭黄之后。曾姬盘应当不是属于曾国而是夫国所作之器，因此潢川一带当然也非曾地。

这样，第二阶段曾国的疆域（图 6.1－3），大约在春秋中期西据有安居，其后东撤，但一直保有溇水与涢水交汇的随州一带和均水一带，其方圆之地已不足 25 千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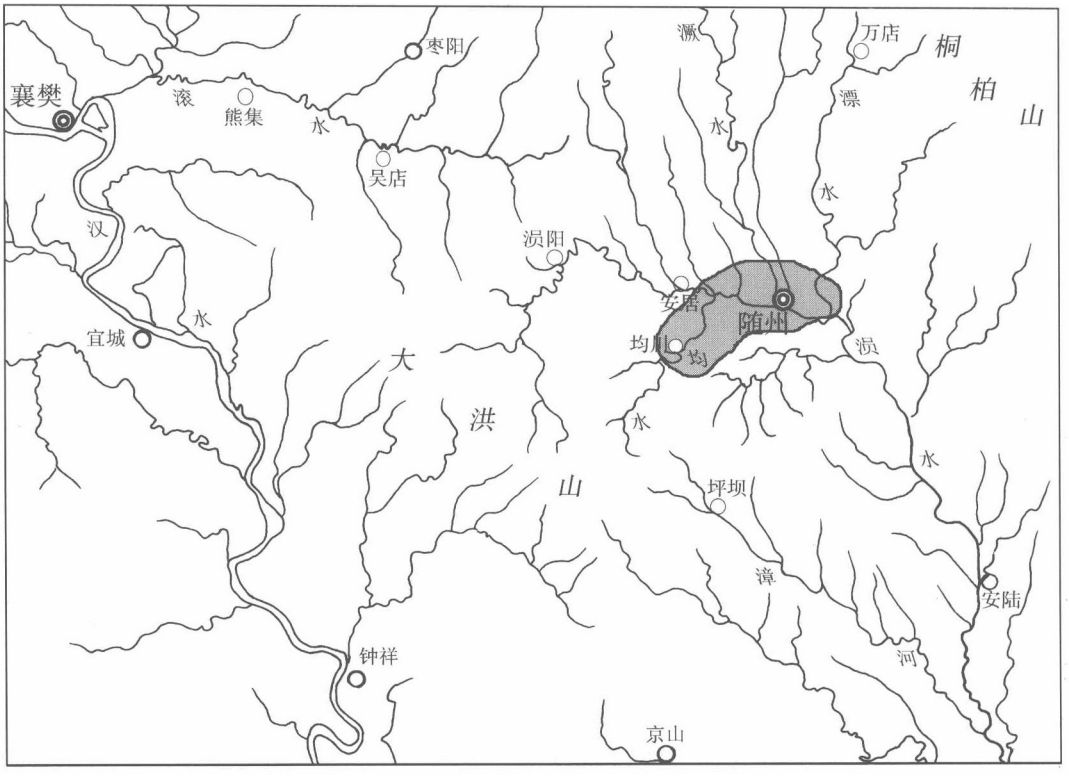


图 6.1－3 第二阶段曾国的疆域示意图

总括第一和第二阶段曾国疆域，可见西周晚期至战国时期的巨大变化。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曾国共包括漳河上游、滚水中上游、涢水中上游三个不同区域，其范围跨有方圆约百公里，说明这一时期曾国的实力十分强大。春秋早期之后，曾国势力范围退出了漳河、滚水一带，大约只局限在涢水中游一带。这一时期曾国实力衰退，青铜器及相关遗存的数量和等级都偏低，这与当时正值楚国强力向东扩张的背景吻合。春秋晚期及

① 信阳地区文管会等：《罗山县高店公社又发现一批春秋时期青铜器》，《中原文物》1981 年第 4 期。

其后，曾国据有涢水中游均川、随州一带较小的区域，此后局面相对比较稳定，这样的情形大约一直延续到曾国灭亡。

三　曾国的中心政治区域

曾国的中心区域，是从地理位置上对曾国都城作考古学表述。之所以作如此表述，首先是因为商周时期“都城”常常被关联于“城”或“城墙”的形式，成为考古学研究中的一大诟病，而其实都城遗址并不意味一定带有城墙①。确定一个国家的都城位置，并不一定是通过都城遗址本身来实现的。通过对高等级遗存如墓地或墓葬性质的判断、通过对聚落群分布规律的整合等等手段，都可以确定都城的大体位置，但未必一定能够发现都城。典型的例证如早期晋国都城，邹衡推定天马—曲村遗址为早期晋都并进行多年的大规模考古工作，但这一推论却是多年之后才通过晋侯墓地的发现、发掘来确定的②。

过去学者们是以都城的认识来探究曾国政治中心问题的。楚王酓章镈钟铭文：“唯王五十又六祀，返自西阳，楚王酓章作曾侯乙宗彝，奠之于西阳，其永時用享。”此西阳，应当就是当时的曾国都城。因此，刘节认为西阳为曾国国邑，其地望“处于汝阳南郡之间”③。屈万里认为曾国都城原在西阳，即今襄阳境内，后来迁往他处④。1966年京山苏家垅出土曾侯仲子斿器群，联系到宋代安陆出土的楚王酓章钟（《薛氏》6.69），简报认为“西阳很有可能就是在今京山和安陆之间”⑤。1978年曾侯乙墓的发现，为曾国都城的确定提供了直接的依据，因为“国君的墓葬应在其国都”⑥，李学勤因此认定曾国都城在今随州。1980年义地岗墓地发现有季氏梁墓葬，“墓主是曾国大攻（工）尹，系朝中显官，再次证明随县应为曾国国都所在”⑦。石泉根据《水经注》等

① 张昌平：《早期楚文化中心区域的考古学观察》，《楚文化研究论集》第六集，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

② 邹衡：《论早期晋都》，上海博物馆编《晋侯墓地出土青铜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书画出版社，2002年。

③ 刘节：《寿县所出楚铜器考释》，《古史考存》，人民出版社，1958年。

④ 屈万里：《曾伯霥簠考释》，《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三十三本，台北，1962年。屈万里认为这个在楚王酓章钟中的曾，是申及西戎邻近的缯国。

⑤ 湖北省博物馆：《湖北京山发现曾国铜器》，《文物》1972年第2期。两件楚王酓章钟的出土地点，《薛氏》谓两钟“皆得之安陆”。

⑥ 李学勤：《曾国之谜》，《光明日报》1978年10月4日。后收入《新出青铜器研究》，文物出版社，1990年。

⑦ 李学勤：《论江淮间的春秋青铜器·再论曾国之谜》，《文物》1980年第1期。又收入《新出青铜器研究》，文物出版社，1990年。

历史文献考证曾国都城所在即为汉随县故城，地望在今涢水中游安居一带①。安居附近也调查发现有东周时期的安居遗址②。根据安居汪家垮发现的曾都尹定墓葬，左德田亦支持安居说③。不过，枣阳郭家庙曾国墓地发现有级别较高的 M21，发掘者因之认为该地为曾国都城④。

上述看法，虽然未尽一致，但学者们所列曾国中心区域的地理位置，基本包括了曾国地域范围的重要处所，因此为曾国中心区域的探索提供了清晰的线索。观察曾国中心区域，首先应当考虑到曾国疆域范围的变化。如上所述，自西周晚期至战国时期曾国疆域经历了极大的变化，其主要反映之一是西部边疆的东移，这有可能促使曾国的中心区域发生变化。其次，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格局也是影响中心区域位置的重要因素。春秋早期前后，楚国连续对曾国一带进行征伐，考虑到当时实施军事打击主要是针对都城进行的，这极有可能也迫使曾国改变其都城位置。这样，我们对曾国中心区域的考察，应当分不同时期进行分析。

两周之际曾国青铜器折射出曾国国力较为强盛，但由于这一时期考古发现只是集中于墓葬方面，曾国中心区域只能从墓葬等遗存以及其他方面信息来作出推测。第一阶段曾国疆域较为重要的三个区域中，涢水中上游地域范围和曾国青铜器的分布范围都较大，在交通上分别与漳河、滚水之间的联系较为近便，不过，这里未见春秋早期之前任何高等级的遗存。相反，漳河上游和滚水中上游都发现较高等级曾国青铜器群。漳河上游京山苏家垅出土有使用九鼎的曾侯仲子斿父器群，不少学者都倾向于器主为曾国国君或夫人，如此则曾国都城应当距苏家垅不远。但如我们在第三章中分析的那样，目前并无直接的证据证明曾仲斿父为曾侯的身份，而且漳河上游位置和地理偏狭，似不具备中心区域的地理条件。

滚水流域出土的两周之际曾国铜器级别最高、最为集中。曾侯舒伯是身份明确而迄今所知年代最早的曾国国君。郭家庙 M21 为一椁重棺带墓道墓葬，位置在墓地至高处，核心地位明确，这种葬制在西周春秋时多为国君所用。M21 出土的曾伯陭钺铭文有“用为民刑，……用为民政”，用语也是国君的口吻。东赵湖一带可能存在不止一处贵族墓地，且如第二章材料分析一节所述，郭家庙墓地与虢国墓地布局近似，可能也类似于公墓地性质。

郭家庙 M17 随葬品还表现出墓主为女子的特点，如多见玉器等装饰品而不见兵器，

---

① 石泉：《古代曾国—随国地望初探》，《武汉大学学报（社科版）》1979 年第 1 期。该文后收入《古代荆楚地理新探》，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 年。石泉认为曾国即随国，据文献记载，随国都城地望在今安居。

② 武汉大学荆楚史地与考古教研室：《随州安居遗址初次调查报告》，《江汉考古》1984 年第 4 期。

③ 左德田：《曾都刍议》，《江汉考古》1990 年第 1 期。

④ 襄樊市考古队等：《枣阳郭家庙曾国墓地》结语，科学出版社，2005 年。

出土方座形器等等。随葬的两件鼎为曾亘嫚非录所作，曾亘嫚非录应当就是 M17 墓主。曾亘嫚非录用鼎可能在 5 件或以上，其身份应当是曾侯夫人。郭家庙 M1 还出土曾孟嬴削簠，曾孟嬴削和曾亘嫚非录分别是嫁到曾国的嬴姓和嫚姓女子，这也暗示出郭家庙所在的吴店东赵湖一带为曾国政治中心的地位。郭家庙墓地还出土有卫、幻国铜器，也表达出同样的信息。这些现象说明东赵湖一带或者就是两周之际前后曾国的政治中心。

但是，春秋早期之后滚水一带纳入楚国疆域，曾国的中心区域势必东徙。我们能够明确的是曾国最后一处中心区域应当在今随州城区一带。

这一判断也是基于墓葬等方面的信息作出的。如前所述，随州城区的义地岗墓地为曾国高级贵族墓地，墓地出土“周王孙”及“曾大攻尹”季怠戈、东风油库 M1 和 M3 出土的“曾少宰”器和“曾侯郕”鼎、“曾仲姬”圆壶，这些文字材料表明，义地岗墓地不仅为曾国贵族墓地，而且应当是曾国国君以外埋葬曾国公族的贵族墓地。结合擂鼓墩墓群为战国时期曾国国君陵园的性质，可以断定，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的曾国的中心区域当距此两处墓地不远，只能是在附近的某一区域。

在今随州城区一带，早年调查发现有五眼桥遗址，当年估计的遗址面积约为 1.5 万平方米，时代在东周时期①。但此遗址已为现代建筑物所覆盖，无法对其作深入了解。从地理位置上看，五眼桥遗址东部毗邻义地岗墓地，向南隔溳水与擂鼓墩墓群相望，有可能作为晚期曾国都城。

曾国的中心区域由滚水流域未必直接东迁至随州城区一带。擂鼓墩墓群用作曾国国君陵园应当是始自战国早期②，而义地岗墓地多见高等贵族墓葬在春秋晚期。这些显示，约在春秋中期曾国的中心区域可能还另在其他地域。

1997 年，经遥感和勘探，在安居遗址发现南北长 190、东西宽 170 米的夯土城墙，确定这里是一处城址，主要遗存约在春秋时期③。安居位于滚水流域至随州一带的中间环节，第一阶段曾发现有青铜器墓葬分布。从曾国受到楚人的压迫东迁考虑，这处城址可能就是春秋早期后曾国的都城。该城址堆积较薄，其使用时间可能较短，这与春秋晚期前后迁都随州一带的情况恰好吻合。1988 年，安居汪家塄发现春秋晚期“曾都尹定”墓，墓葬位于安居至随州城区之间，“曾都尹”应当是管理都城一类的官员。该墓的位置也似乎暗示着春秋中晚期曾国都城的变迁。

根据以上推论，曾国的中心区域在两周之际前后位于滚水流域的吴店东赵湖一带，其后迁至今安居，至春秋晚期左右再迁至今随州城区一带，此即楚王酓章钟“奠之于

① 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地图集·湖北分册》上册第 250 页，下册第 566 页，西安地图出版社，2002 年。

② 张昌平：《关于擂鼓墩墓群》，《江汉考古》2007 年第 1 期。

③ 张昌平：《安居周代城址的发现及其意义》，《中国文物报》1998 年 8 月 26 日第 3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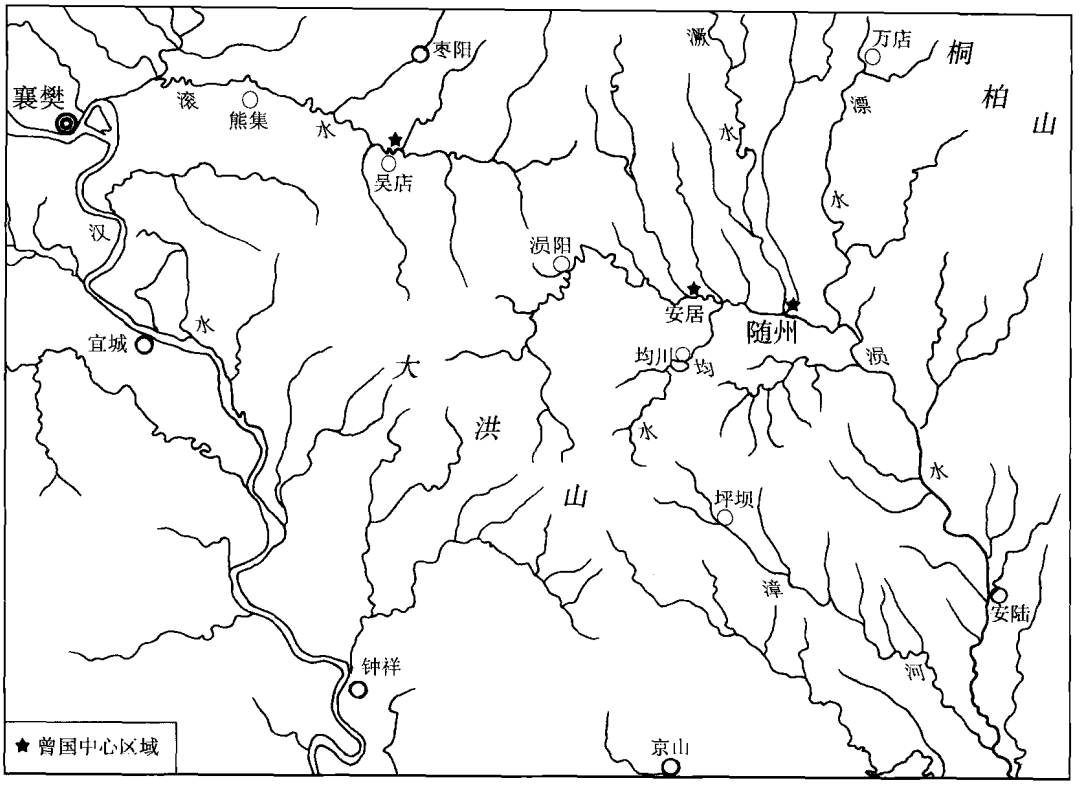


图 6.1－4 不同时期曾国的中心区域位置示意图

西阳”的西阳。曾国中心区域的不断东移（图 6.1－4），当然与来自西部楚国的崛起和楚向东的发展相关。

我们认为不同阶段的曾国中心区域不同，并非是试图调和前述学者们提出的各个说法。自西周晚期至战国中期曾国历时约四个世纪，两次迁都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之下并非是频繁之举①，甚至可以说，这些迁徙还未必是曾国中心区域移动的全部。

第二节 青铜器所反映的曾国政治体系

青铜器铭文等出土文献材料，可以让我们了解到一些具体的史实。同其他诸侯国的情况一样，曾国青铜器铭文内容多为简洁的套语，但仍然可见一些颇有价值的信息。如

① 例如晋国在西周时期有三次迁都。参李伯谦：《天马－曲村遗址发掘与晋国始封地的推定》，《迎接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考古学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98 年。

曾伯从宠鼎见“唯王十月既吉”的记时用语，“既吉”过去只见于周原甲骨文①，在金文中则为首见，是否为月相词语，值得研究。当然，曾国青铜器铭文材料涉及史事的内容不多，略为系统的，或有称谓中反映的职官、族氏等信息，抑或有媵器中涉及的国与国之间的联姻情况。由这些曾国政治体系方面的内容，也可以大体推知曾国的一些深层政治结构。但限于材料，目前能够揭示出来的情况仍然是片断而不连贯的。

一　职官、联姻等政治信息片断

1. 职官

第一阶段曾国青铜器铭文中职官信息不多，较常见的有太师、太保之职，这暗示曾国职官有类似周王室“三公”的设置，颇为引人注目：

檀梨树岗曾太师鼎：“曾太师[illegible]作鼎。”

周家岗两件曾太保簋：“曾太保□用吉金自作宝簋……”

传世曾太保𩰫叔盆：“曾太保𩰫叔亟，用其吉金，自作旅盆……”

传世曾太保庆盆：“曾太保庆，用作宝皿。”

三件太保器年代接近，但不能确定是否为同人所作。韩自强等认为两件盆为同一人之器②。“太保”在西周时期一般指称召公奭及其后人③，那些太保器的年代往往在西周早期。曾国是诸侯国中唯一设太保职位的。太师亦为职官名，周代铭文及历史文献俱多见。张亚初等以为西周时期的太师为地位显要的武官，仅限于王官④。故“太师”在西周诸侯国也殊为少见，如郑太师小子侯父甗（《集成》937）。像周王室一样，曾国也在太师之下设置“师”一职，传世曾师季韩盘：“曾师季韩用其吉金……”，曾国的太保一职也应是与太师相对。这一官制是否反映了当时曾国非同寻常的政治地位，抑或是另有其他原因，值得注意。

第二阶段曾国的职官体系发生了较大变化。虽然仍然有曾太师一职（曾太师奠之脰鼎），但这一时期诸侯下设太师已是常见，其职可能是如《周礼》、《左传》所记载为较低下的乐官⑤。东风油库 M1 墓主黄仲酉为曾少宰，楚国也设有少宰，如“少宰如晋师”（《左传·宣公十二年》）。这一时期曾国其他职官名称也与楚国相同。季氏梁墓葬出土戈，记季怠之职为“曾大工尹季怠”，大工尹即大攻尹，由鄂君启节（《集成》12110、12111）可知，楚国也设有相同的职官。楚国职官常称作某尹，如令尹。汪家墣

① 曹玮：《周原甲骨文》H11：26、48、54，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2 年。

② 韩自强等：《近年所见有铭铜器简述》，《古文字研究》第 24 辑，中华书局，2002 年。

③ 殷伟璋、曹淑琴：《周初太保器综合研究》，《考古学报》1991 年第 1 期。

④ 张亚初、刘雨：《西周金文官制研究》，中华书局，1986 年。

⑤ 张亚初、刘雨：《西周金文官制研究》，中华书局，1986 年。

曾孙定为“曾都尹”，形式上也类似楚国职官称谓。看来，第二阶段曾国的职官体系，可能是依照楚国设立的。

第二阶段曾国的职官常为曾国公族成员所担任。曾大工尹季怠的家族背景为“穆侯之子、西宫之孙”、“周王孙”，曾都尹定的出身为曾孙。曾孙的称谓又见于曾孙无谌鼎、曾孙史夷簠。这些贵族多属公族的情况，或说明曾国公族是曾国贵族的主要构成部分。由此推知，曾国贵族构成在数量上，是较为有限的。这与我们在第四章铜器群一节分析的情况恰好是吻合的。

2. 族姓

曾国的族姓问题曾经是一个争论热点。多数学者认为曾为姬姓①，也有认为是姒姓者②。由于青铜器铭文中有不少涉及曾国姓氏的材料，围绕这些材料又产生了不同的理解。例如对曾姬无卹方壶铭文中“曾姬”的理解，既有学者据此认为曾国非姬姓③，也有学者认为这说明曾国为姬姓无疑④。近年来学者对青铜器铭文中女子姓氏问题的研究已经明确，铭文中女子称姓核心模式为母姓⑤。但是，由于铭文中的国名既可能是夫国，也可能是妇国（出生国），因此单一的青铜器铭文称谓只能确定该女子母姓，而不能直接确定该国之姓。例如曾国青铜器既有“曾孟嬭谏”（曾孟嬭谏盆），也有“曾仲姬”（曾仲姬之壶）的称谓。理论上而言，“曾孟嬭谏”可能是“嬭”姓、名“谏”的曾国女子外嫁他国，也可能是“嬭”姓、名“谏”的女子嫁到曾国。讨论曾国的族姓，其实更需要相关的文化背景。

曾国有如下青铜器涉及族姓：

曾侯作叔姬簠：“叔姬霝作黄邦，曾侯作叔姬邛嬭媵器䵼彝。”

周王孙季怠戈：“周王孙季怠孔臧元武，元用戈。”

曾仲姬壶：“曾仲姬之䣄壶。”

曾姬盘：“☐夫人䕫姬之盘。”

曾姬无卹方壶：“唯王廿二又六年，聖趄（桓）之夫人曾姬无卹……”

上述材料中直接说明曾国族姓的是周王孙季怠戈，季怠既是“周王孙”，又是“穆侯之子、西宫之孙”（曾大工尹季怠戈），这两条文献显示曾国公族为周王后裔，因此

① 李学勤：《曾国之谜》，《新出青铜器研究》，文物出版社，1990年。

② 杨宽、钱林书：《曾侯之谜试探》，《复旦大学学报（社哲版）》1980年第3期。

③ 徐扬杰：《关于曾侯问题的一点看法》，《江汉论坛》1979年第3期。

④ 王育成：《从两周金文探讨妇名“称国”规律》，《江汉考古》1982年第1期。任伟：《〈无匹壶〉的定名及江汉曾国的族姓问题》，《文博》2002年第1期。

⑤ 曹兆兰：《周代金文嵌姓的称谓结构模式》，《古文字研究》第24辑，中华书局，2002年。

这是“曾国为姬姓的铁证”①。

3. 联姻

联姻活动为两周青铜器铭文所常见②，是当时诸侯国邦交政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因此青铜器铭文中的联姻也可以说是国家政治命运的晴雨表。

第一阶段曾国与黄国关系最为密切，曾黄联姻之例屡见于两国青铜器铭文，详情见上一章《区域文化之下的曾国青铜器》。曾、黄通婚的时间大体从两周之际延续到春秋早中期之际，这一段时间恰逢历史文献记载楚国向其东北发展的势态，曾与黄的政治联合可能与他们对抗楚国的日益崛起相关。同时，曾国出东北与淮河流域国家的联系，以及如上一章所述与山东地区包括山东之曾的联系，在地理上应当经由黄国。曾伯霥簠：“曾伯霥哲圣元武，元武孔黹（致），克狄（逖）淮夷，印（抑）燮繁汤（阳），金道锡行，具既卑（俾）方”，是曾国当时政治地理的反映。

曾国也见其他国家女子嫁入的情况。襄阳太平店出土曾孟嬭谏盆：“曾孟嬭谏作𩰫（饔）盆，其眉寿用之”，“嬭”即历史文献中的“芈”姓，楚、邛、都等国皆嬭姓，如考虑这一时期曾国与楚、黄敌友关系的格局，以及曾侯簠有“曾侯作叔姬邛嬭媵器”，此嬭姓女子必非楚女，而很可能来自邛，当然也还不能排除来自邻近都国的可能。

郭家庙 M17 两件鼎有：“曾亘嫚非录为妳行器，尔永祜福”，邓国嫚姓，且地望在今襄阳一带，距离曾地不远，故此器可能为嫁入曾国的邓女所作。

第二阶段多见曾女嫁出之例。潢川高稻场 M9 盘有：“⊠夫人薯姬之盘”，曾女所嫁之国不详，可能为某楚系国家。淅川徐家岭 M9 簠作“穆穆曾嫚嬞朱姬作時”，和尚岭 M2 还见有“仲姬”敦，是否为曾国女子，不能确定。但曾女常嫁楚贵族大约是明确的。最晚嫁入楚国的曾女，可能是寿县李三孤堆出土方壶中的“聖趄（桓）之夫人曾姬无卹”，李家浩认为，方壶铸铭时的曾国大约已经灭亡③。当然，联姻往往是相互的，楚贵族当然也有女子嫁往曾国。淅川和尚岭 M2 器座有：“曾仲𠈌君䏰之祖埶”④，这说明曾国与淅川氏联姻的情况是清楚的。此外，曾仲𠈌君䏰、曾嫚嬞朱姬的称谓，说明第二阶段的妇称结构可能有了一些变化。

曾国与他国的联姻，第一阶段曾国多见他国女子嫁入，应当与曾国具有较为强大的实力相关。而第二阶段曾国沦为附庸之国，联姻情况大变，曾女屡屡见嫁于楚国，且多

---

① 舒之梅、刘彬徽：《论汉东曾国为土著姬姓随国》，《江汉论坛》1982 年第 1 期。

② 陈昭容：《从青铜器铭文看两周汉淮地区诸国婚姻关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七十五本第四分，2004 年。

③ 李家浩：《从曾姬无卹壶铭文谈楚灭曾的年代》，《文史》第 33 辑，中华书局，1990 年。

④ 不少学者认为曾仲𠈌君䏰为嫁入𠈌氏的曾女，误。

嫁入楚国贵族而非王室，反映出当时曾国的地位。或者如罗泰所论①，楚臣娶附庸国国君之女，是楚国已自居这些国家之上了。

二 曾国“子”、“伯”、“仲”等称谓的性质

西周至战国时期金文中常见“子”、“伯”、“侯”等称谓与国氏组合构成的人名，他们涉及周代爵制及贵族称谓，因此历来为研究者所重视。关于周代爵称，《礼记·王制》记载有：“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而且在《春秋》经传特别是《公羊传》中，对侯、伯、子、男诸爵的称谓也都比较严格，少有混淆。但如果根据金文与历史文献作对比研究，就会发现文献和金文多有不合的现象，鉴于这种情况，过去学者多对周代是否存在五等爵称持怀疑态度②。随着金文材料的日益丰富，学者们注意到，西周特别是春秋时期包括王在内的公、侯、伯、子、男等国君称谓在不少诸侯国是相当稳定的③，例如秦、楚等国称公，燕、鲁、晋国等称侯，郑国称伯等等，这些至少说明很多诸侯国有着相对固定的爵称。可是在另一方面，金文中同一国、氏之内又往往兼有“侯”、“伯”或“子”等不同的称谓，说明历史文献中所显示的整齐划一的称谓并不那么合乎实际。这种情形下，有学者认为“伯”、“子”可能为行辈，或为美称之类④。但也有一些学者持不同意见，如认为“西周金文中诸侯的称号确有公、侯、伯、子、男。但从金文内容看，这些诸侯称谓先后或者同时存在，并没有等差的区别。只是诸侯国君的一种通称”⑤。这种不同的看法，反映到具体诸侯国的称谓问题上，形成了很大的矛盾。如西周春秋的楚国既有楚公某（楚公逆钟、楚公豪钟等）、也有楚子某（楚子赵鼎、楚子弃疾簠等）的不同称谓。大家除了一致认同楚公是国君之称外，对楚子的性质看法完全不同：或将楚子某视为楚国国君⑥，或认为楚子可能只是楚之王子、王孙的后裔⑦。类似的歧见在对周代诸侯国金文中的称谓的理解中非常普遍。

这种歧见当然也会对曾国政治体制的理解产生影响。曾国青铜器铭文中“子”、

---

① Lothar von Falkenhausen, The Bronzes from Xiasi and Their Owners.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考古学研究（五）·庆祝邹衡先生七十五寿辰暨从事考古研究五十年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3年。

② 关于早期对周代爵称的研究概况，参见王世民：《西周春秋金文中的诸侯爵称》，《历史研究》1983年第3期。

③ 王世民：《西周春秋金文中的诸侯爵称》，《历史研究》1983年第3期。

④ 李学勤：《先秦人名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1991年第5期。

⑤ 吴镇烽：《金文人名研究》，《周秦文化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

⑥ 许多学者将楚子某与楚王对应，如认为楚子暖（楚子暖簠）为楚考烈王熊元，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168。又如认为楚子赵为楚康王，见夏渌等：《楚子超鼎浅释》，《江汉考古》1983年第1期。又如认为楚子弃疾为楚平王，见徐俊英：《南阳征集“楚子弃疾簠”》，《中国文物报》1989年5月26日。

⑦ 黄锡全：《楚器铭文中“楚子某”之称谓问题辨正》，《江汉考古》1986年第4期。

“伯”、“侯”等都比较常见，此外还见与此相关的“仲”或“仲子”。称谓如此之多，在各诸侯国青铜器铭文中并不多见。据统计，在曾国青铜器的自作器中，铭文中不同的带“子”的称谓凡11见，带“伯”的凡5见，“侯”凡6见，“仲”或“仲子”凡6见①（表6.2－1）。这些称谓哪一个或哪些是爵称，不同的定位对曾国历史的理解自然会大有不同。以下我们尝试对曾国这些称谓作一清理。

表6.2－1　　曾国青铜器铭文不同称谓年代关系表

年代	称谓			
	子	伯	侯	仲（仲子）
两周之际前后	曾子单 曾子仲宣 曾子仲谡 曾子伯杳 曾子伯諳 曾子𨚕	曾伯文 曾伯宫父 曾伯从宠 曾伯陶	曾侯仲子游父	曾仲子敌 曾仲大父蛸 曾仲游父
春秋早期 春秋中期	曾子尿 曾子原彝	曾伯霥	曾侯緟伯	曾仲之孙
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	曾子义行 曾子⧄ 曾子遇		曾侯昃 曾侯遇 曾侯郙 曾侯乙	曾仲佖𢍰䏰

1. 一般情况

曾子、伯和曾侯等称谓有他称和自称两种，他称如“曾侯仲子游父”中的“曾侯”（曾侯仲子游父鼎）、“穆侯之子”中的“穆侯”（季怠戈），这些他称情况出现较少，这里不作讨论。曾子、伯等自称相对多见，其名称结构相同，都是曾子、曾伯、曾侯后缀私名或字（有时为名和字），如曾子仲宣、曾伯文、曾侯遇等等。在时间的分布上，曾器铭文的不同称谓在两周之际前后密度较大②，例如这一时期曾侯在京山、枣阳都有出现，曾伯在随州和枣阳都有出现，而曾子在京山和枣阳都有出现，这些说明不同称谓

① 仲即仲子，如曾仲游父又作曾侯仲子游父。李学勤认为商末周初的中子为王之支子，见李学勤：《长子、中子和别子》，《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此外，传世曾国青铜器是否属于同一个曾国，学术界有不同意见。本文将其一概视为豫南鄂北之曾，限于本文主旨，这里对此问题暂不加以论证。

② 主要原因是此阶段曾国青铜器发现的数量较多。

在曾国曾经是同时并行的。但是不同的称谓所沿用时间有所不同。曾子和曾伯的称谓均见于西周晚期，但曾子一直沿用到战国早期，而曾伯之称在春秋早期之后即不见。曾侯的称谓出现略晚，始见于两周之际的曾侯仲子斿父，但真正的曾侯自作器是在春秋早期后段的曾侯絆伯，至春秋晚期及其后的战国早期，曾侯作器频见。当然此前侯的称谓少见可能与考古发现的局限有关。

以上曾国青铜器称谓的使用情况大体与同时期其他诸侯国情形相同。西周中期之后，各诸侯国有铭青铜器绝大部分都是自作铜器，同时为他人作器如媵器也有一定数量，铭文结构程式化，此前因赏赐、册封等纪事性铭文少见。在铭文人名的构成方式上，商周之际流行的直接以名或字为称谓的方式已经少见。因为宗法制度的影响，国氏成为人名构成中常见的部分，尤其在两周之际人名以国氏加行辈、爵称或官名的结构方式较此前更为流行，并且，西周中期之前的某伯、某子的称谓方式不再常见，而代之以某伯某、某子某的结构。曾国铜器铭文所见的称谓恰是当时这一大的时代背景的产物。周代贵族称谓法则大体相同的特征，既为我们讨论曾国子、伯等称谓时将其他诸侯国的相关材料作为相互比照参考的背景成为可能，又使我们对曾国称谓的讨论具有相当普遍的意义。

曾国青铜器铭文的几种称谓中，侯为爵称是可以确定的。“侯”作为爵称字义明确，在金文中作为国君的性质明确①。曾国青铜器铭文中无论是两周之际的“曾侯仲子斿父”（曾侯仲子斿父鼎）、春秋中期的“穆侯之子”（季怠戈）的称谓，还是曾侯乙墓所反映的身份、等级，“侯”作为一国国君确可无疑。曾国青铜器带有“曾侯”称谓，从两周之际一直延续到战国早期，曾国的爵位在侯一级，应当没有问题。但表6.2－1表明：侯的称谓在曾国青铜器铭文中出现在两周之际（曾侯仲子斿父），自称侯是在春秋早期偏晚阶段（曾侯絆伯），而曾侯之称比较固定是在春秋晚期之后。这样，我们就不能贸然排除在此之前的两周之际频繁出现的子、伯等称谓也曾经为曾国爵称的可能性。因此，我们需要将讨论的重点放在子、伯的性质这一关键问题上。

2. 关于“伯”

伯在先秦文献中可用为爵称已如前所述，同时，伯也是兄弟行辈之首，《尔雅·释诂》：“伯，长也”。《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载王子朝言：“亦唯伯仲叔季图之”。《左传·文公十八年》：“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奋、仲堪、叔献、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金文中某伯、某伯某的称谓十分多见，因而相应地，有的学者将其视为爵称②，有的学者将其视

① 王世民：《西周春秋金文中的诸侯爵称》，《历史研究》1983年第3期。

② 如马承源等持这一看法，他们一般也将子视为国君之称。参见马承源主编：《商周青铜器铭文选》第三、四卷，文物出版社，1988年。

为行辈[①]。对于曾国青铜器，我们倾向于后一种意见。

曾国青铜器铭文中的伯也有表现为爵称的表象。一方面伯在曾国铜器铭文中多见于春秋早期之前，大体与侯的称谓早晚衔接，似乎曾国早期称伯而晚期称侯。另一方面，曾伯某的青铜器有时表现出较高的社会等级，如西周晚期的曾伯文簋共出土4件，其原组合可能为5鼎4簋，与同时期晋侯的用鼎相同，学者或认为“器主曾伯文可能是曾国国君”[②]。枣阳郭家庙随葬曾伯陭钺的墓葬带有单墓道，与两周之际诸侯国国君墓葬带墓道的情况相同。曾伯霥簠有“曾伯霥哲聖元武，元武孔黹，克狄淮夷，印（抑）燮繁汤（阳）”，其语气似乎为一代国君。这些似乎暗示“曾伯”也是国君的称谓。不过曾国称侯的现象在两周之际的曾侯仲子斿父鼎中就已经出现，亦即在曾伯霥簠之前曾国已经为侯爵。曾侯的礼器组合，曾仲斿父器群见9鼎7簋，原组合可能为9鼎8簋，因此曾伯文用4簋当低于曾国国君享用的用鼎制度。在枣阳郭家庙墓地既见有曾伯的称谓（曾伯陭），也几乎同时有曾侯之名（曾侯緐伯戈），曾伯与曾侯不可能同时作为国君的称谓。另外应当注意的是，曾伯某有时可能会位至国君或享受国君一级礼制，但不能因此而得出伯必定是爵称的结论。

不难注意到，曾伯作为行辈，恰有曾仲[③]与其相比邻，由伯及仲，形成相次的排行。表6.2－1显示，两周之际前后曾伯某的称谓多见，同时相对应的是曾仲某的称谓，两种称谓的语法结构都是氏＋行辈（伯、仲）＋名或字：

曾伯文、曾伯陭、曾伯宫父、曾伯从宠

曾仲子敔、曾仲大父蛸、曾仲斿父

除此而外，类似伯、仲的行辈排列还在曾子某之中出现，例如：

曾子伯沓、曾子伯詣

曾子仲宣、曾子仲諆

其称谓结构为：曾子＋行辈（伯、仲）＋字。因为这里的伯和仲处于另一称谓——子的层次之下，显然不可能为爵称。

西周春秋时期的鲁国情况相似。鲁国为侯爵，相应爵称的铜器如西周早期的鲁侯熙鬲、泰安出土春秋早期的鲁侯鼎、簠等可以与爵称印证[④]。不过几乎同时，鲁国青铜器铭文亦见伯、仲等称谓：

---

① 李学勤：《先秦人名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1991年第5期。其文认为：“金文中常见有‘某伯’，伯每每是排行，不是爵称。”

② 李学勤：《曾国之谜》，《光明日报》1978年10月4日，后收入《新出青铜器研究》，文物出版社，1990年。

③ 仲即仲子，曾侯仲子斿父又称曾仲斿父即其例。

④ 程继林、吕继祥：《泰安城前村出土鲁侯铭文铜器》，《文物》1986年第4期。

鲁伯愈父器组：共见鬲5、簠3、盘3、匜1，属于春秋早期。1830年滕县出土①。

鲁伯念器组：见鼎、盨、壶、盘、匜。曲阜鲁故城M30出土②。

鲁仲齐器组：见鼎3、甗1、簋2、簠2、盘2、匜2，属于春秋早期。曲阜鲁故城M48出土③。

鲁伯某称谓的铜器还有其他一些。不同鲁伯器组的铜器反映的社会等级高低不一，如鲁伯念的地位明显低于官职为司徒的鲁仲齐。很明显，鲁伯是作为行辈而非爵称，并且有时也会形成鲁伯、鲁仲的顺次。

不少爵称为王、公或侯的诸侯国，同时还见有伯的称谓，并且相应地会出现仲，甚至有叔、季的称谓。如：

吕称王，吕国铜器铭文有吕伯（吕伯簋、吕伯尊）、吕仲（吕仲生匜）。

晋为侯爵，同时见晋伯（晋伯隆父甗）、晋仲（晋仲韦父盉）、晋叔（晋叔家父方壶）。

类似的例子还有一些，这类伯、仲、叔、季当然不可能都是爵称。伯、仲、叔、季等称谓在各个诸侯国中经常伴出的情况也说明，和曾国青铜器的情况一样，他们都应该是行辈之称。

3. 关于“子”

与伯相比，子作为称谓在金文中含意似乎更为复杂。除了天子、公子、太子等称谓之外，子或作为美称④，如“子庚”（王子午鼎）。根据历史文献，子可能为较低一等国君的爵称⑤；同时还有故君未葬则新君称子的情况⑥。这样，如果子作爵称或者是新君之称，他们所表示的都是国君。商末周初出土有数批规格较高的带子称的铜器，如长子口、长子狗以及北子等器组，这里的某子也被多数学者认定为国君之称⑦。

但是，在西周中期之后特别是春秋时期，金文中常常有某子某与该国公、侯一类爵称的铜器同见，除了前述楚国见有楚子与楚公的例子之外，类似的情况如：

黄国称君如黄君孟（黄君孟器组），同时还见黄子（黄子鲁天尊、黄子鼎等）；

---

① 马承源主编：《商周青铜器铭文选》第四卷鲁伯愈父鬲条下，文物出版社，1988年。

②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曲阜鲁国故城》，齐鲁书社，1982年。

③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曲阜鲁国故城》，齐鲁书社，1982年。

④ 李学勤：《先秦人名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1991年第5期。他认为：“金文有‘曾子仲宣’，就是在字前加美称的例证，并非爵称。”

⑤ 子爵有金文与历史文献相对应的例子，如沈子簋中的沈子，见王世民：《西周春秋金文中的诸侯爵称》，《历史研究》1983年第3期。

⑥ 王世民：《西周春秋金文中的诸侯爵称》，《历史研究》1983年第3期。此类情况历史文献多有记载，如《礼记·杂记》：“君薨，大子号称子，待犹君也”。

⑦ 不过西周中期前后的称谓可能存在较大变化。

薛国侯爵（薛侯戚鼎，薛侯壶、盘及匜），同时又见薛子（薛子仲安簠）；

郑国伯爵（郑伯筍父鬲），同时又有郑子（郑子石鼎）。

由于“子”的文意不能像“伯”一样理解为行辈，因之多被判断为与侯、君、伯同时并行的爵称。但何以一国常常见不同的爵称？若旧君未葬而新君称子，何以子的称谓如此多见？难道新君每每在服丧期间铸器？

根据曾国青铜器铭文可以确定，子并非为国君或爵位的称谓。

曾国青铜器中曾子某共见11人，其中仅仅在两周之际前后即有6位，其数量超过曾侯某的总数。设若曾子都是曾国国君的话，即使不计入同时期的曾侯，在此不长的时间内曾国也不可能有如此之多的国君。另一方面，除曾子遻外，曾子某铜器均未见组合级别较高的器组，曾子某铜器反映出的社会等级没有与国君一级相匹配的例证。这种情形也是其他诸侯国中称子铜器的普遍共性，例如在楚国青铜器中，楚子某从铜器组合到出土墓葬，等级均较低①。曾国青铜器中曾子遻铜器见有簠2、缶1，簠与缶字体迥异，作器显然并非在同一时间，因此，这里的曾子遻作为新君称子的可能性不大，而应当是在未登国君之位时、和其他曾子某性质一样的称谓。

如果曾子不是爵称，那又应属于什么性质？如前所述，曾国青铜器中伯、仲的行辈之称存在着并行的两套系统：一是曾伯某、曾仲某；一是曾子伯某、曾子仲某。两套称谓的伯、仲都较常见，所代表的行辈身份无疑是不同的。也就是说，曾子的一支与曾伯曾仲的另一支在时间上并行，在地位上应该有所不同。相对而言，前述曾伯文所使用的礼器组合可能为5鼎4簋，而曾仲斿父器组见有9鼎，曾伯曾仲某所代表的群体地位明显高于曾子某。因此，曾伯曾仲和曾子可能分别代表着曾公族大、小不同的宗族，即伯仲属于曾侯直系的大宗，而曾子某则是旁系的小宗，身份可能是非嫡出的曾侯之子或者是曾侯的后裔。在其他诸侯国，青铜器铭文中的某子某也往往反映出较低的身份等级，他们的性质可能与曾子相同，楚子即为其例②。

我们推测伯仲、子的称谓代表曾侯家族内部的不同组织结构，还考虑到如下因素：苏家垅器组中曾仲斿父又称为曾侯仲子游父，表明斿父为曾侯之仲子即次子的身份。又，季怠戈有：“穆侯之子西宫之孙，曾大工尹季怠之用”，又说明行辈在伯仲之下的“季”，身份也是曾侯之子。由此我们确知曾伯某、曾仲某为曾侯直系的性质。虽然目前缺乏说明曾子某性质的直接材料，但周代不少诸侯国内如晋、郑、宋、鲁诸国的确存

① 黄锡全：《楚器铭文中“楚子某”之称谓问题辨正》，《江汉考古》1986年第4期。

② 黄锡全：《楚器铭文中“楚子某”之称谓问题辨正》，《江汉考古》1986年第4期。

在由国君诸子、诸公子形成的支系①，曾子仲宣鼎有“诸父、诸兄”，铭文称曾子仲宣燕享其诸位父兄，正反映了曾国公族存在不同支系的情况。

当然，两周之际前后青铜器铭文中，不缀私名的某伯、某仲、某子的称谓，其代表的身份可能与缀有私名的某子某、某伯某、某仲某有所不同。虢国的虢季、虢仲，秦国的秦公、秦子，其后多不缀私名，其称谓是以泛称作为特指，可能是指称国君。例如几件秦子戈、矛，据其铭文内容可判断为秦国国君之器②。此类称谓形式虽然比较少见，但仍然值得注意。

4. 称谓的变化

在理解金文中的子、伯、仲等称谓的性质时，还应该注意到的一个可能性是称谓可能因为时间的变化而发生某些变化。比如，历西周而至于春秋战国，贵族的称谓形式可能会发生变化。又如，子伯仲的称谓反映的身份，并不一定与该器主终极的身份完全等同。再如，伯、仲等可能会由代表个人的行辈之称发展成为代表族系的称谓，如虢季、虢仲等。曾仲之孙戈中“曾仲之孙”，也应该属于这种情况。以下我们重点讨论第一、二种情况。

先看第一种情况。实际上，由表6.2－1可知，曾国第一、二阶段称谓发生了明显变化。春秋早期之后，此前多见由族氏＋行辈构成的称谓“曾伯”、“曾子伯”、“曾仲”、“曾子仲”之称消失③，这意味着曾侯之外原“伯”、“仲”与“子”等标榜公室身份的组织结构发生了变化。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曾侯”、“曾子”等传统称谓之外，春秋晚期出现有“曾孙”之称，如曾孙无谌（曾孙无谌鼎）、曾孙定（曾孙定鼎）。“曾孙”与“曾子”文义相对，这一时期，“曾子”与“曾孙”应当是曾侯后裔等曾国公族的专有称谓。在楚国，楚公族称谓有“王孙”、“王子”或“楚子”，情况与曾国近似。如果再检索其他诸侯国青铜器铭文，很容易注意到春秋中期前后称谓变化的普遍性，此前的“伯”、“仲”等缀于国名之后的行辈称谓已经少见。与此同时，强调个人和各自族氏的称谓多见。在曾国，不加族氏、名号而单独使用私名的称谓较多，如盅

① 朱凤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增订本），天津古籍出版社，2002年。诸侯公族不同支系的情况，可参见该著第二章第三、四节，第三章第一节。

② 秦国有“秦公”（秦公钟）、“秦子”（秦子戈）不同的称谓，秦子多被认为是国君，如在王辉与陈平的两组讨论文章中他们都认为秦子为秦国国君。王辉并认为秦子之子当是“诸侯在丧称子”。见陈平：《秦子戈、矛考》，《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2期；王辉：《关于秦子戈、矛的几个问题》，《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6期。陈平：《〈秦子戈、矛考〉补议》；王辉：《读〈“秦子戈、矛考”补议〉书后》。后二文均见《考古与文物》1990年第1期。李学勤也持相似见解：《“秦子”新释》，《文博》2003年第5期。当然，他们对秦君何以称子的解说不同。

③ 春秋中期及其后仍有“曾仲”之称，似乎已转变为氏称或一种妇称，氏称如“曾仲之孙”，妇称如“曾仲姬”、“曾仲𠈌君䏰”。

（80 刘家崖盅器组）、可（东风油库 M2 可器组）、攽（76 义地岗攽器组）等等。同时，行辈之称新出现在国族之下的氏称中，如黄仲（东风油库 M1 曾少宰黄仲器组）、洛叔（80 刘家崖盅器组）、廓季（周家岗器组）① 等。这些现象与当时的社会结构发生变化的背景相关。

上述的第二种情况，是指贵族自身身份的变化而可能引起称谓的变化，即一个贵族如果身份发生变化，那么他在身份变化前后不同时间段所作铭文的称谓就可能会不同。曾仲斿父作有三类不同的铭文铜器：

曾斿父鼎：曾侯仲子斿父自作鬻彝。

曾仲斿父豆：曾仲斿父自作宝甫。

曾仲斿父壶：曾仲斿父用吉金自作宝尊壶。

三类铜器字体、辞例都不相同，显然不是同时所作之器。其中铭文称谓“曾侯仲子”与“曾仲”的不同，可能反映斿父地位的变化。

称谓变化的典型是遇，其所作铜器或作曾子遇（曾子遇缶、曾子遇簠），或作曾侯遇（曾侯遇戟），曾子遇与曾侯遇之“遇”字形有所不同（图 6.2－1），但曾子遇簠与曾侯遇戟之“遇”均从“辶”从“舆”，同时曾子遇簠形制反映的年代也在春战之际，曾子遇与曾侯遇所处的时代相同，因此曾子遇与曾侯遇实为同一人，是没有问题的。由此可知，曾侯遇原来的称谓为曾子遇，他以曾侯后裔的身份继承曾国国君之位，其称谓即由“曾子”而变为“曾侯”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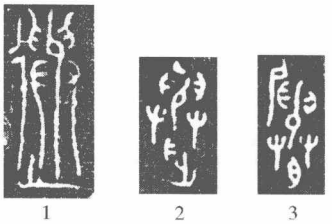


图 6.2－1　曾子遇、曾侯遇字形比较

1. 曾子遇簠（《集成》04488）
2. 曾侯遇戟（《集成》11181－3）
3. 曾侯遇戟（《集成》11179－1）

另一方面，器主的身份变化可能直至入葬时才得以体现。如曾伯陭，其钺、圆壶铭文表明作器时身份为曾伯，其墓葬郭家庙 M21 葬制则显示他可能是作为国君或者是享受国君级的待遇，亦即其墓葬反映的社会等级也可能与作器时不同。由于周代实行嫡长子继承制，《左传》：“昔先王之命曰：‘王后无适，则择立长。年钧以德，德钧以卜’”，因此“伯”往往就会成为一国国君。曾伯陭反映的正是由“伯”及君的变化。

三　曾侯世系推测

曾侯世系的探讨，是与曾侯身份的确定相关联的。除了一些身份明确的国君之外，曾侯世系还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是如何理解曾国青铜器中一些称谓，即“曾

① 周家岗廓季器组年代属于春秋早期偏晚阶段，是开称谓变化之先河。

子”、“曾伯”、“曾侯”等貌似爵称或国君的称谓。这种称谓问题在上一节我们已经讨论，这里直接引入“曾子”、“曾伯”非爵称的结论，不再讨论。其二是如何理解一些貌似国君的青铜器群器主的身份问题。曾国可能与国君身份相关的有曾伯陭、曾仲斿父、擂鼓墩M2墓主等，在第四章《器物群》一节中，我们已经说明擂鼓墩M2应当为一代曾侯陵墓①，在第三章《器物群》一节中，也已经论述曾伯陭最后下葬时应当为曾侯的身份，而曾仲斿父铜器群则很难说一定代表了曾侯的身份。如果结合上节所述曾国在当时的中心区域，曾仲斿父所在的京山苏家垅不可能为曾国中心区域，曾仲斿父也不应该为曾侯，而可能只是曾侯仲子的身份。曾仲斿父与曾伯陭所处同一时期，但现在还不能确知曾仲斿父是否为曾伯陭之次子。

其他称谓明确为曾侯的国君还有：曾侯絆伯、曾侯昃、曾侯遇、曾侯郕、曾侯乙，此外还有他称的穆侯。曾侯絆伯只出土一戈，年代在春秋早期偏晚，晚于曾伯陭。穆侯名字出现在春秋中期的季氏梁墓葬季怠戈中：“穆侯之子西宫之孙，曾大工尹季怠之用”，曾穆侯的年代应当晚于曾侯絆伯，穆侯与絆伯不大可能为同一人。迄今所知春秋战国之际前后的曾侯最多，其中曾侯昃根据其戈的形制，确定年代在春秋晚期。而名字在曾侯乙墓中同时出现的曾侯遇、曾侯郕，他们的性质需要略加讨论。

曾侯乙墓出土文物中出现有三个不同曾侯名称：“曾侯乙”、“曾侯遇”、“曾侯郕”②。曾侯乙为墓主，学者无异议。但曾侯遇与曾侯郕是谁，则是一个问题。发掘报告认为这两个曾侯为曾侯乙的先君③。不过李学勤很早就提出过另外一个看法，他认为“郕”字的声旁与“乙”字相同，而其义通于“遇”字，这样，曾侯乙墓中曾侯的“三个名字，有可能实际是一个曾君”④。因此，上述三个名字其实只是一代曾侯，曾侯遇和曾侯郕都是曾侯乙的别称。现在看来，将三个曾侯名字合一的认识存在问题。在著名的曾侯乙尊盘中，盘的腹内底部有两种形式的铭文，一种是铸造的曾侯遇铭文一周6字：“曾侯遇之尊盘”⑤。另一种是我们现在命名该盘所依据的曾侯乙铭文一周7字：“曾侯乙詐時用终”，曾侯乙的铭文系根据曾侯遇的铭文改制（图6.2－2）。毫无疑问，

① 擂鼓墩墓群另外还有4座墓葬为曾侯陵墓，但其相对年代难以判断，这里不纳入曾侯世系讨论。

② 本文关于这些曾侯青铜器的材料，出土于曾侯乙墓者，参见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文物出版社，1989年。其他材料见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曾国青铜器》，文物出版社，2007年。如无特别需要，将不另注。

③ 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第460页，文物出版社，1989年。

④ 李学勤：《曾国之谜》，《新出青铜器研究》146－150页，文物出版社，1990年。有关几个曾侯身份的讨论最早发表在多位学者联名的《笔谈〈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文物展览〉》，《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总2期，1980年。

⑤ 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第229页，文物出版社，1989年。盘铭文被刮磨的三字中，“遇”、“尊”仍然可辨识，“盘”字不能确定。

改制的曾侯乙铭文要晚于曾侯遐的铸造铭文。我们知道，同一件青铜器上先后出现两个器主名字，这往往是器物归属发生变化所致，类似的情况常见于战国时期青铜器特别是兵器。显然，曾侯乙盘也是曾侯乙将其先君的青铜器据为己有。曾侯郕与曾侯乙也不大可能是同一人。1994 年随州城区东风油库 M3 出土有曾侯郕鼎，其盖、腹各有相同铭文："曾侯郕之飤鼎"。鼎饰细密的蟠虺纹，器形作深腹带盖，足弯曲而瘦长。这种形制的鼎在下寺楚墓 M10、M11 均可见①，其年代特征明确，在楚系青铜器中属于春秋晚期偏晚阶段。具体到曾侯郕鼎，其年代可能已经接近战国早期了，但这仍不应是战国早期的曾侯乙所及的年代范围②（图 6.2－3）。东风油库属于义地岗墓地，这里是一处曾国贵族墓地而非曾君陵区③。M3 墓葬规模颇小，其长度仅 3.45 米，墓葬的地理位置和规模都说明该墓墓主不是曾侯郕，考虑到与鼎同出的还有曾仲姬提链壶，M3 墓主的名字可能是曾仲姬。曾侯郕鼎大约是曾侯郕在世时赠与曾仲姬而后所随葬之用，这在周代属于所谓的赗赙④。看来，曾侯乙墓发掘报告对几个曾侯名称的认识是确切的。这样的话，曾侯乙墓中气势磅礴的随葬品，至少有部分是用其先君"曾侯遐"、"曾侯郕"的青铜器来装点门面，这可以成为解释何以曾侯乙以当时附庸小国国君的身份而随葬品充满恣肆之风的部分理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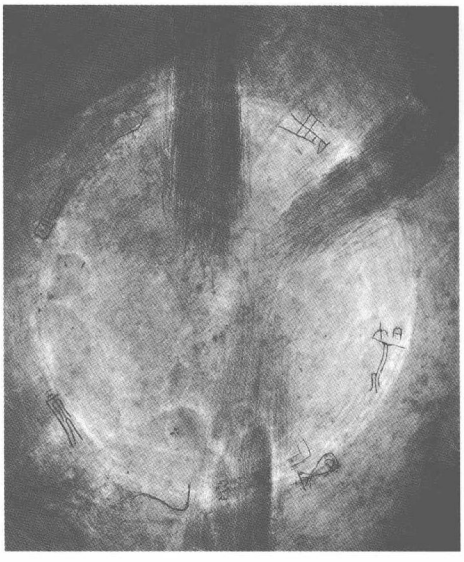


图 6.2－2　曾侯乙盘改制的铭文

曾侯乙墓中曾侯遐和曾侯郕的青铜器都有相当的数量，这说明他们应当是距曾侯乙时间较近的父祖辈。但接下来的问题是，曾侯遐和曾侯郕哪一个较早？或哪一个是曾侯乙可能的父辈？刘彬徽认为曾侯遐早于曾侯郕⑤，但未提出理由，或许他考虑的是因为曾侯乙墓中曾侯郕的青铜器数量多于曾侯遐故而较晚？日本学者吉开将人根据对曾侯乙

①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淅川下寺春秋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 年。

② 曾侯乙墓下葬年代在公元前 433 年或稍晚，其时曾侯乙年龄在 42－45 岁之间。参见莫楚屏、李天元：《曾侯乙墓人骨研究》，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附录四，文物出版社，1989 年。

③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北随州义地岗墓地曾国墓 1994 年发掘简报》，《文物》2008 年第 2 期。

④ 曹玮：《东周时期的赗赙制度》，《考古与文物》2002 年第 6 期。

⑤ 刘彬徽：《楚系青铜器研究》第 76 页，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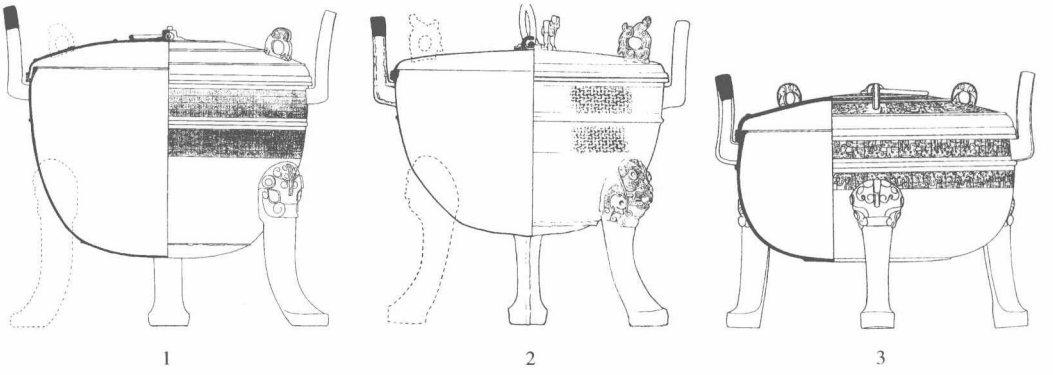


图 6.2－3 曾侯郕鼎比较图

1. 东风油库 M3 曾侯郕鼎 2. 下寺 M10 鼎 3. 曾侯乙墓 C. 102 盖

墓出土戟、戈的研究认为曾侯遐早于曾侯郕①，如《曾国青铜器的分期》一章已经指出，吉开的具体方法尚有可商之处。

必须说明的是，从曾侯郕到曾侯遐或是相反，这是一个较小的年代范围，因此根据类型学方法对他们的遗物进行年代早晚分析会有很大困难。不过由曾侯乙墓可确定，这三位曾侯的年代以曾侯乙最晚。这样，以曾侯乙为支点进行三代曾侯年代系列的分析，会有稍优的条件。另一方面，如果仅从单项因素的变化来确定上述曾侯的年代先后，依然有较大的风险。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分别建立一个三位曾侯共存的平台，由此比较几个曾侯相应因素的早晚序列。在《曾国青铜器的分期》一章中，通过分别对曾侯遐、曾侯郕和曾侯乙簠和戟的形制发展分析，在《楚文化体系之下的曾国青铜器》一章《铭文》一节中，通过对曾侯遐、曾侯郕和曾侯乙铭文辞例、字体演变的分析，都得出了曾侯遐早于曾侯郕的结论。这一结论与过去学者的看法相同，但是在较为客观的类比条件下取得的。

综上所述，我们目前所知的曾侯的年代系列为：

曾伯陭

曾侯絆伯

曾穆侯

曾侯昊

曾侯遐

曾侯郕

① 吉開将人：《會侯乙墓出土戟、戈的研究》，《東京大学文学部考古学研究室研究紀要》，第 12 号，1994 年，东京。

曾侯乙

擂鼓墩 M2 墓主

这些远远不是完整的曾侯世系，相信通过将来的考古发现，会不断得到补充与完善。

第三节　曾国的早期历史探索

西周晚期至战国中期是曾国青铜器所涵盖的曾国历史时段，但曾国立国的时间，较此时间段更为长久。

曾国的灭亡时间大致可定。由于擂鼓墩 M13[①] 出土敦、铁足铜鼎等楚式青铜器，墓葬出现墓道等楚墓葬俗，刘彬徽等据此认为 M13 为楚墓，并推断曾国灭亡于擂鼓墩 M2 到 M13 之间的战国中期偏晚阶段[②]。李家浩根据曾姬无卹方壶“唯王廿二又六年”所指为楚宣王二十六年即公元前 344 年，也认为此时曾国已经灭亡[③]。除此之外，曾国的灭国时间还可以从擂鼓墩墓群和义地岗墓地性质变化中得到确证。擂鼓墩墓群约于战国早期作为曾国国君陵园，但墓群中还发现有由中小型墓葬组成的 5 个墓地，其年代在战国中期偏晚阶段，说明此时墓群已成为平民墓地[④]。1987 年和 1988 年义地岗墓地北部发现 50 余座战国中晚期墓葬[⑤]，性质与擂鼓墩中小型墓葬相同，多为小型陶器墓，也说明义地岗作为曾国贵族墓地的性质完结。擂鼓墩、义地岗墓地在战国中期偏晚阶段性质的变化，应当是曾国灭亡这一历史事件的反映。

但曾国早期历史如何？曾国的立国时间在何时？根据甲骨文材料，李学勤认为曾在商时期就已经存在[⑥]。这个曾是否与其后两周时期的曾国相关？其地望如何？我们可以依照出土的文字材料，将商时期的曾向下追寻其发展脉络，看看它是否与已知的西周晚期曾国相关。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观察曾国青铜器出土范围内商与西周早中期的考古学材料，看看它们是否与晚期曾国相关。

一　出土文献所见早期曾国的线索

种种迹象表明曾国的历史应当可以追溯至商时期。

---

① 随州市博物馆：《随州擂鼓墩砖瓦厂十三号墓发掘简报》，《江汉考古》1984 年第 3 期。

② 刘彬徽、王世振：《曾国灭亡年代小考》，《江汉考古》1984 年第 4 期。不过刘氏某些关于楚国特有因素的结论可商。如铁足铜鼎并不只见于楚国。

③ 李家浩：《从曾姬无卹壶铭文谈楚灭曾的年代》，《文史》第 33 辑，中华书局，1990 年。

④ 张昌平：《关于擂鼓墩墓群》，《江汉考古》2007 年第 1 期。

⑤ 王善才等：《随州市师范学校战国墓群》，《中国考古学年鉴 1989》，文物出版社，1990 年。

⑥ 李学勤：《盘龙城与商朝的南土》，《新出青铜器研究》，文物出版社，1990 年。

商时期甲骨文中已见曾字，其义约有三：“一、祭名。……二、地名或方国名。……三、可能为人名”①。作为地名或方国的曾，主要有如下一些卜辞②：

（1）乙未［卜］，□，贞立事于南，右［从我］，中从舆，左从曾。《合集》5504

（2）贞勿立事于南。

乙未卜，□，［贞］立事［于南］，右从我，［中］从舆，左从曾，十二月。

《合集》5512正

（3）□辰，贞咸奏于曾，又［伐］。《合集》32164

（4）惟壬往曾征，无灾。《屯南》1098

（5）□□卜，㱿，贞王次于曾。《合集》6536

（6）葵巳卜，㱿，［贞］王勿次于曾。《合集》7353

（7）弗克曾？《合集》31821

以上第（1）、（2）例卜辞可互补，它们也就是李学勤所论商时期之曾。李学勤认为“舆”即“举”，地望与商南土方国如虎方相关，再根据“立事于南”等依据，认为“举和曾是商朝南土的两个封国，……反映出商王武丁对南土的统治”③。上述（1）至（7）各例甲骨文中，第（1）、（2）、（5）、（6）各例属于甲骨文第一期，第（3）例属于甲骨文第四期，第（7）例属于甲骨文第三期，第（4）例出土于小屯南地H24，年代属于文丁时期④。综合甲骨文文献，晚商时期的曾既有作为地名，又有作为方国名出现。作为国家的曾在与商王朝的关系上，武丁时期应当是臣服于商，而廪辛、文丁时期则可能出现交恶的情况。

西周早中期之际，曾作为地名和方国又频繁出现在一些青铜器铭文中。在地理位置上，这时的曾与商时期甲骨文的曾也应是相关联的。这类青铜器有中甗、静方鼎、易鼎等。

中甗（《集成》949）：“王令中先省南国，贯行，设居，在曾。……余令汝使大小邦，……中省自方、邓、溃、□邦。在噩师次，伯买父迺以厥人戍汉中州。”

中甗是北宋末年出土于今湖北孝感，为著名的“安州六器”之一。周王南巡，学者们均认为是与昭王南征的史事相关，因此中甗等安州六器的年代在西周中期偏早阶

① 徐中舒主编：《甲骨文字典》第69页曾条下，四川辞书出版社，1990年。

② 以下释文主要参考文献有：胡厚宣主编：《甲骨文合集释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姚孝遂主编：《殷墟甲骨刻辞类纂》，中华书局，1989年。引文简称：《合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甲骨文合集》，中华书局，1978－1982年。《屯南》：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小屯南地甲骨》，中华书局，1980年。

③ 李学勤：《盘龙城与商朝的南土》，《新出青铜器研究》，文物出版社，1990年。

④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小屯南地甲骨》第19－22页，中华书局，1980年。

段，论者无异议。与中甗同出的中方鼎、中觯铭文中有相关的方国名，如“虎方”、“厉”等，它们与中甗中“噩”、“邓”等方国都在周之“南国”，其中“噩”、“邓”地望分别在今南阳和襄阳一带①，“厉”在今随州之北②，由此推之，曾地在汉水中游一带，位置是明确的。

静方鼎③：“王在成周大室，命静曰：俾汝□司在曾、噩师。”

静方鼎浅腹高足，纹饰中已不见商周之际前后的乳丁纹，而是饰两周兽面纹，兽面纹以四隅为中轴展开，其躯、体抽象，特别是上腹一周兽面纹的两侧以勾云状展开，是西周早中期之际的典型作风。正如张懋镕所指出，静方鼎人物、事件均与中甗可相互关联，年代同属于昭王时期④，这一分析与方鼎形制特征吻合。铭文中曾、噩再次并列，说明它们彼此邻近。噩国是西周中晚期大国，是西周抗御淮夷的主要力量，但宣王时叛周而被灭国，其地位为申国所取代⑤。

易鼎（《集成》2678）：“唯十月，使于曾，宓伯于成周休眔小臣金。”

该鼎图像著录于《颂续》⑥，器形为立耳垂腹柱足，上腹饰三组长尾鸟纹，各组纹饰左右对称。器形特别是纹饰特征属于典型的西周中期偏早阶段。联系到中甗、静方鼎等反映出周王朝与曾地的频繁交往，易鼎中的曾也应当是今鄂北之曾。如果中甗、静方鼎中的曾是指曾地的话，易鼎中的曾就应当是作为方国的曾了。这个曾国因其较重要的地理位置，在西周早期的政治格局中地位颇为突出。

由曾国与甲骨文、金文中相关联的地名、方国可知，自晚商时期开始，曾国地域一直居于汉水中游一带，而未有过大的位移⑦。这样，从地理位置上而言，商时期和西周早中期的曾国，就应当是西周晚期及其后的曾国。

甲骨文及西周早中期金文中的曾字字形，与西周晚期及其后金文字形不同，曾字这种早晚的不同是否可能指代不同的国家，需要分析。在上举甲骨文诸例中，（1）至（4）例均作“[illegible]”、（5）至（6）例作“[illegible]”、（7）例作“[illegible]”。中甗、静方鼎中也应当隶定为“㫃”，这些字均不从曰。于省吾谓：“㫃为曾之初文，断可识矣。”⑧ 因为“㫃”像蒸气由其下的圆形箅孔中溢出，故学者皆将上述甲骨文相关文字释为“曾”而

① 徐少华：《周代南土历史地理与文化》第10－28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

② 李学勤：《盘龙城与商朝的南土》，《新出青铜器研究》，文物出版社，1990年。

③ 徐天进：《日本出光美术馆收藏的静方鼎》，《文物》1998年第5期。

④ 张懋镕：《静方鼎小考》，《文物》1998年第5期。

⑤ 张昌平：《噩国与噩国铜器》，《华夏考古》1995年第1期。

⑥ 容庚：《颂斋吉金录续录》6，考古学社专集第十四种，1938年。

⑦ 李学勤已有这一看法。李学勤：《续论曾国之谜》，《楚学论丛——江汉论坛专刊》1990年9月。

⑧ 于省吾：《甲骨文字诂林·释㫃》第27－28页，中华书局，1979年。《释㫃》首次发表于1941年，收入《双剑誃殷契骈枝》。

无异议。“㝬”即“曾”还可从该字字形发展中进一步得到证明：

甲骨文　　中甗　　易鼎　　曾伯文簋

此外，曾伯文簋共4件，其“曾”字多作“”，其中一件簋盖作“”（《集成》4051、1），左上一笔不甚明晰，或可能为漏铸。但曾伯文簋仍然保留了曾字早期字形，也直接说明了曾字的增繁过程。

传世青铜器中一件商时期铜觚（《集成》6760）带有族徽“”，字形与甲骨文“曾”字相同，族徽可能就是指代曾国之曾，此器也很可能为商时期的曾国青铜器。惜该器未能传世。

综上，甲骨文中的曾、西周早中期的曾，与西周晚期及其后的曾在字形的发展上前后承接，早期的“㝬”即“曾”字。“曾”字字形早晚的不同，只是反映文字的早晚变化，而没有不同国家的背景。这样，早期曾国与其后的曾国一致、相互延续的关系是比较清楚的。

二　考古文化遗存所见早期曾国的线索

在两周之际前后曾国的疆域范围，即漳河、滚水和溳水地区都相应地发现有西周早中期及商时期文化遗存。

在京山苏家垅青铜器地点东南约8千米的严家畈，农民曾发现爵2、觚3等青铜器①。这些青铜器可能出于同一座墓葬之中，其中一爵鋬内铸铭“酉戊”。这些青铜器年代约在殷墟文化晚期，其特征亦与殷墟青铜器特征基本相同。商末周初前后带有“酉”或“酉”族徽的青铜器，在长江流域颇为多见，其活动与商人可能相关②。严家畈出土青铜器也是大洪山南麓迄今所见唯一一处商时期青铜器地点。

滚水流域也发现有商时期至西周早期遗存。在枣阳东赵湖以东约10千米的滚水支流新店出土有殷墟文化时期的大口尊③。尊大口高圈足，饰分体兽面纹，肩部带扁体鸟形饰，这些特征与殷墟时期南方尊、罍特征完全一致，新店尊的原产地可能就是在长江

① 京山县博物馆藏资料。

② 拓古：《望城高砂脊与酉族》，《江汉考古》2001年第3期。

③ 徐正国：《湖北枣阳发现一件商代铜尊》，《文物》1990年第6期。

中下游地区①。距新店不远的枣阳王城官营村出土一件铜鼎②，鼎立耳截锥形足，器盘形口。鼎腹部饰线状兽面纹，腹、足对应有勾云状扉棱。鼎器形高大，通高65厘米。这种类型的鼎属于中商文化晚期，形制类似的鼎在不同地区多有出土，如江苏、陕西、内蒙古等地均见，反映了这一时期商文化影响范围的广大③。

滚水流域还发现有毛狗洞遗址④，遗址隔滚水与茶庵墓葬邻近，属于同一个小的文化单元。毛狗洞遗址属于西周早期的遗存丰富，遗物多见鬲、甗、罐、缸等陶器，器物形制如鬲等类似于周文化风格，但红陶缸则主要为江汉地区商时期文化传统。毛狗洞遗址还出土有方凿的卜骨，带方凿的卜骨与周人圆钻卜骨方式不同⑤，说明毛狗洞遗址文化特征近似于周文化，但其族属可能并非与周人是同一系统。

在涢水中游地区，商至西周早中期遗存也有多处发现。

在随州城区之东旭光砖瓦厂附近的淅河梁家畈，发现有年代在中商文化时期偏早的铜器群，包括觚、爵、斝以及锸、斧、凿工具等13件青铜器⑥。青铜器特征略接近盘龙城出土的较晚时期青铜器，在性质上属于中原文化系统。

1975年在安居桃花坡侧旁的羊子山出土有西周早期兽面纹鼎、兽面纹簋、鱼父乙爵及噩侯弟曆季尊⑦。1980年羊子山发现一座西周早期墓葬⑧，出土有鼎、爵、觯、尊、卣、戈等青铜器18件，其中爵、觯分别有“戈”、“子”族徽。羊子山这两批青铜器特征也与中原文化青铜器特征相同。

在涢水支流的均水流域，也发现有早期青铜器。

1975年，熊家老湾发现有商周之际的涡纹双耳罍⑨，罍的形制特征与同时期双耳罍相同，属于中原文化系统。位于均水上游支流的三里岗毛家冲发现有一件镈钟⑩，镈钟腔体饰双目突出的兽面纹，两侧铣棱处饰勾云状扉棱，扉棱上应对双鸟。这种形制及装饰的镈钟为南方系统青铜器，相似形制的镈钟如赛克勒美术馆镈⑪、石首九佛山镈⑫，

① 张昌平：《论殷墟时期南方尊与罍》，《考古学集刊》第15辑，文物出版社，2004年。
② 徐正国：《湖北枣阳市博物馆收藏的几件青铜器》，《文物》1994年第4期。
③ 唐继根：《中商文化研究》，《考古学报》1999年第4期。
④ 襄樊市博物馆：《湖北枣阳毛狗洞遗址调查》，《江汉考古》1988年第3期。
⑤ 张昌平：《论湖北襄樊地区两周甲骨》，《考古与文物》1996年第5期。
⑥ 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县发现商代青铜器》，《文物》1981年第8期。
⑦ 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县发现商周青铜器》，《考古》1984年第6期。
⑧ 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县安居出土青铜器》，《文物》1982年第12期。
⑨ 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县发现商周青铜器》，《考古》1984年第6期。
⑩ 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州出土西周青铜镈》，《文物》1998年第10期。
⑪ Robert W. Bagley, Shang Ritual Bronzes in the 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s, Fig. 104, Washington, 1987.
⑫ 戴修正：《湖北石首出土商代青铜器》，《文物》2000年第11期。

年代约在商周之际。毛家冲位于大洪山北麓，是涢水中上游经过大洪山垭口向南交流的孔道。这件镈钟可能就是南方青铜文化对涢水中游地区传播的结果。

涢水中游地区也发现有若干商和西周时期遗址①，经过正式发掘的遗址有随州庙台子遗址②。庙台子遗址商时期遗存较丰富，出土遗物则基本为陶器，其器类主要有鬲、甗、瓮、豆、红陶缸等，其鬲或饰较细的绳纹，裆部较高，鬲体长方，豆见较深的假腹，红陶缸多直口，其年代上限可早至二里岗上层文化偏晚阶段，其年代下限可能在殷墟文化第二期③。庙台子商时期文化面貌，总体是与商文化接近，但存在一些个性因素。庙台子遗址西周时期遗存甚少④，其年代约在西周前期，面貌接近今孝感地区西周早期文化。

上述地区商时期至西周中期之前遗存的文化特征有所不同。殷墟文化晚期之前的青铜器及陶器，面貌与中原商文化较为一致。而殷墟文化晚期，南方青铜文化因素在随枣地区有较强的反映，其例如大口尊、镈钟等。但同时中原商文化因素如严家畈青铜器也有相当的表现，说明这一时期该地区较复杂的文化格局。西周早期青铜器特征主体属于周文化，但保留有较多的商文化传统。这些说明，以上地区文化一方面与中原地区保持有密切的关系，另一方面又有相对独立的发展。这种格局与甲骨文、金文反映出早期曾国的文化背景有相似之处。

以上漳河、滚水、涢水流域商、西周早期遗存的发现地点，恰好与西周晚期至战国时期曾国疆域范围内发现第一大阶段青铜器的地点重合。同时，在漳河、滚水、涢水中游流域并未发现其他商至西周时期青铜器或遗址，因此这些区域早期遗存与其后的曾国遗存有着相对较稳定的对应关系。以上两个方面的情况，暗示曾国历史文化在随枣地区应该可以上溯到商时期，并在西周早中期继续在当地延续。这是我们从考古学文化材料中可见的反映曾国早期历史文化的线索。当然，上述早期遗存都与两周之际其后曾国疆域范围重合，并不意味着它们全都具有早期曾国文化的性质，因此也未必说明早期曾国同样有如此之大的活动范围。

综上所述，早期出土文字和考古文化遗存两个方面的材料，基本上都显示出与曾国的联系。另一方面，出土文字和考古文化遗存彼此所反映的可能为早期曾国的文化面貌基本一致。因此，早期出土文字和考古文化遗存两个方面的材料，反映的可能就是早期曾国自殷墟文化时期至西周早期的文化面貌。

---

① 《中国文物地图集·湖北分册》第251页，西安地图出版社，2002年。

② 武汉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等：《西花园与庙台子》，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

③ 发掘报告认为庙台子商时期遗存年代在殷墟文化第一、二期。参武汉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等《西花园与庙台子·结语》第191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

④ 庙台子遗址西周时期单位中出土有卜甲残片，卜甲带圆钻。颇疑其为商时期遗物。

第七章　总　结

曾国青铜器研究的目的之一，是试图从地域文化的角度，来折射出两周时期青铜文化的某些共同特征。由这样一项个别到一般的区域文化研究，我们希望从地方到中央这样一个不同的视角，观察某些我们从中央看地方所不易观察到的文化现象。

目前为我们所知的曾国青铜器属于西周晚期至战国中期即中国青铜时代的晚期，大体较完整地经历了从西周中期至春秋早期的转变时期和从春秋中期至战国中期的新兴时期①。曾国青铜器既是中国青铜时代这两个时期青铜器变化的反映，又代表了这两个时期许多诸侯国青铜文化的一般情形。

一　作为诸侯国和附庸国的青铜文化

迄今所见明确可知的曾国青铜器早至西周晚期，这并非是一个偶然现象。实际上，我们可能并不能够指望将来还会发现大量的西周晚期之前的曾国青铜器。曾国所代表的诸侯国青铜文化在西周晚期的兴起，正是西周王朝封建体制发展的必然结果。西周以诸侯国为政治实体来达到“藩屏”宗周的目的，但对周王朝而言却可能是一个积弱的过程②。如从考古学的角度观察这一过程可以发现，西周早期金文所见的军事行动多是由王室所控制，而西周晚期诸侯国实力较强，周王朝赖之以讨伐其他反叛势力。西周中晚期青铜器铭文由此前纪念性的战争、赏赐、土地诉讼等内容，转变为以自作器、祝愿子孙的嘏辞为主要内容。西周中期开始形成标明等级的器用制度，与其说是礼制发展的产物，毋宁说是在地方贵族实力日益壮大的背景下，旨在重新规范和划分日益丰富的社会等级、对日益崛起的贵族社会活动的一种限制③。西周晚期曾国青铜器等以诸侯国身份出现的大量地方青铜文化，也正是诸侯国实力与势力空前发展的具体表达。这一时期的这些诸侯国青铜器已经形成一定生产规模，一些青铜器的形制特征已经形成有一定的个

① 孙华：《中国青铜文化体系的几个问题》，《考古学研究（五）》，科学出版社，2002年。

② 直至西汉时期中央政权还在为遏止这一现象而努力并引发与地方利益的激烈冲突。甚至可以说这种中央与地方的矛盾贯穿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始终。

③ 以不同的鼎数划分贵族阶层意味着贵族群体的扩大，因此用鼎制度是在不同贵族群体拥有大量社会财富、青铜器生产获得较大发展的背景下产生，它是社会政治经济发生发展变化的结果而非原因。

性。特别是其铸造工艺简化的技术倾向，不仅影响到时代风格，更催生了春秋早期之后以分铸为突出特征的技术变革。因此，从地方文化发展的角度而言，西周王朝的衰败直至脆弱到不堪异族一击的地步，实是一个必然的过程。

但西周王朝的覆灭使诸侯国青铜文化失去了一个可遵从或追寻的文化中心，直至春秋中期之前，诸侯国青铜器的外在形态都是在较慢节奏中向前发展。在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不同期别的曾国青铜器，各类青铜器形制因素变化都很小，多数青铜器纹饰构图甚至难以看出时代变化，铭文多见不规范的行款和书写。这些或许可视为在当时文化格局之下诸侯国青铜文化发展的阵痛现象。春秋中期之后晋、秦、楚等区域文化系统的形成，曾国这类国家仍然处于次一级文化地位，青铜文化的特征转而与各自新的中心文化区域保持着一致性，但青铜文化的发展频率，却较大地加快了步伐。除了社会背景之外，广为运用的分铸焊接技术，是这一变化的内在动力。同时，分铸焊接技术为青铜作坊内不同环节的劳动力分工提供了可能，又使侯马这类中心青铜作坊在大规模生产中极大地提高其产量。

但是分铸焊接技术形成的社会背景并非是大规模生产的社会需要，恰恰相反，它是因为其较为简单的技术难度，在两周之际前后被各个诸侯国在各自规模较小的青铜生产中所采用并日渐流行。分铸焊接技术的发展成熟一方面是两周之际前后青铜文化发展中最大的亮点，同时又是各诸侯国推动这一转变时期青铜文化的重要贡献。当时那些政治势力较小的诸侯国如曾国在春秋中期之前文化进程中的另一重要作用，是为本区域文化格局的形成如同晋、楚等国一样推动着各自区域文化系统的形成。例如春秋中期曾国青铜器中可观察到多种楚文化因素的早期形成阶段，楚文化的形成是在周文化基础上一个区域内多个诸侯国文化融合的过程，它并不是楚国文化单极发展的过程。

春秋晚期及其后，曾国这样的附庸国文化地位急遽下降，文化个性减弱而与主体文化趋同性更加强化。这种同化意味着各个大的文化区系之间青铜文化外在形式的分化。不过，由于铸造技术在整个东周时期一直保持着较大范围的同一发展步调，这又使各个区系之间青铜文化的内在形式和一些新的文化因素有较大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的发展，构成了其后华夏文化重新走向统一的重要力量①。

综观曾国所代表的诸侯国和附庸国青铜器发展水平，较之中心文化区域青铜器，大体有如下几个主要特点：其一，较为单调的青铜器器类、较为单一的纹饰类别和组合、较为简单的器形变化；其二，工艺上常常采取较简单的手段处理一些技术环节，对于范型、连接等技术手段的运用略为教条，较为少见灵活多变的技术手段；其三，在高层次

① 李零也认为：东周时期“地方差异的浑融和整个文化的统一才是它的基本趋势”。李零：《论楚国铜器的类型》，《出山与入塞》第326页，文物出版社，2004年。

因素上的水准和创造力略为欠缺，第一、二阶段曾国青铜器铭文均出现制作缺陷，纹饰设计缺乏创新。

二　春秋中期前后的变化

曾国以春秋中期为界的前后两个阶段的首要变化是疆域上的。两周之际的曾国掩有漳河、滚水和涢水中游这一颇大的区域，在当时无疑是地域面积较大的诸侯国。春秋中期，曾国已经失去此前拥有的漳河和滚水流域，春秋晚期，曾国退出了安居一带，在地域上只拥有今随州至均川一线的狭小范围。疆域的大面积缩小并由此而影响到政治、经济实力，曾国的政治地位如同其他许多小国一样，由诸侯国而转变为附庸国。类似的政治变化发生在曾国之外，小国日渐衰小，大国日渐膨大，在春秋时期楚疆域范围之内仍然可见有不少诸侯国遗存，至战国时期则多为封君性质的地方势力所取代，原曾国之地滚水一带的九连墩发现系列大型楚墓即说明这一背景，它是楚国步步加强其控制力的结果。

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曾国的政治、文化背景分别是周王室周文化的式微和楚国楚文化的壮大两种截然不同的局面。作为亚文化的曾国青铜文化，其基本面貌和特征虽然都是与其中心文化保持一致，都表现出较为单一、程式化的次文化面貌，但其个性变化恰好与其中心文化发展趋势相反。第一阶段的曾国经历西周的衰落和灭亡，政治上存在较自由的空间。反映在文化上，曾国青铜器在器形、纹饰等面貌上个性特征愈来愈张扬，特别是在器形方面发展形成有一些曾国风格和传统，表现出一定的活力。第二阶段的曾国处于扩张和发展中的楚国和楚文化的控制之下，政治和文化空间都在萎缩之中。曾国青铜文化除了春秋中期一段时间保持自己较强的自身传统之外，此后基本都是以楚文化青铜器面貌出现。即便是曾侯乙墓这样等级和规模的铜器群，虽然目前在楚文化中缺乏相应可对比的铜器群，但曾侯乙青铜器风格上的个性特征也仍然十分有限。从大局而言，诸侯国第一阶段个性化的发展趋势，是春秋中期几个区域文化板块形成的前奏，而第二阶段单一化的面貌，又是秦在政治上最终统一的基础。

与其他方面不同，曾国第一、二阶段的铸造技术都表现得相对比较活跃。第一阶段青铜器较早较多地采用分铸和焊接技术，体现了诸侯国青铜文化较为简化的技术趋向。第二阶段的春秋中晚期，正在完成分铸转型过程的技术随意性较大，同一种器形的铸型可能采用不同形式的处理，另一方面，在不同档次的铜器群之中所采用的技术层次也有不同。这些多样性显示曾国此时的铸造技术较第一阶段更加娴熟，发展水平更高。不过，这种成熟性其实更是中国青铜时代技术发展的成熟而不仅仅是曾国铸造技术的成熟。

三 青铜器的不同方面因素

曾国青铜器在器形与器类、纹饰、工艺、铭文、器物群等不同方面，与中心区域文化相比所表现出的同一性和个性并不平衡。这种不平衡同样也会不同程度地发生在其他不同国家青铜器之中，它们是青铜器不同方面内在特质的反映。

在器形与器类方面，第一阶段曾国青铜器形成了附耳宽腹窃曲纹鼎、折肩重环纹鬲等特征性器类。与第一阶段不同的是，第二阶段曾国青铜器多项因素如升鼎、盖鼎等都在楚文化相应器类中居于早期形态，显示出曾国青铜文化在楚文化体系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因此，我们在观察曾国青铜器在两个不同阶段的个性特征时，与纹饰、铭文、工艺等方面相比，器形与器类中的个性因素的比例总是较大。这一方面是人们的不同风尚品味比较易于关注于器形这样引人注目的方面，也因为地方文化的作坊系统相对容易地在器形方面有所创作。我们说春秋中期楚、晋等各个大国形成的区域文化特征，实际上也往往集中体现在器形与器类特征上。但某些器类的发展又相对保守，第二阶段的器类和基本器形在第一阶段已经出现，一些器形在第二阶段沿用时间很长，形成第二阶段青铜器的“旧制”。这些多是占有礼制核心地位的如鼎、簋、方壶等重要礼器，它们往往代表高层贵族的社会等级，也就成为礼器中生命力较持久的部分。

装饰纹样方面，第一、二阶段曾国青铜器都几乎照搬和模仿中心文化区域青铜器纹饰，其变化只是将不同类别的纹饰以较为固定的搭配方式装饰于器物、或者将一类或几类纹饰高频率地使用。纵观整个曾国青铜器的发展过程，在包括曾侯乙墓青铜器在内的铜器群中，还很难发现某类新的装饰构图为曾国所创作。纹饰在时空上的同一特征具有广泛性。春秋中晚期曾国与郑晋地区青铜器装饰的蟠虺纹构图完全相同。在个性特征颇强的黄国青铜器中，纹饰是唯一与同时期中原文化青铜器保持高度一致的方面。

铸造工艺与同时期其他青铜文化表现出较同一的面貌，例如第一阶段曾国青铜器总体特征与虢国墓地青铜器类似，第二阶段工艺特征基本与楚国青铜器相同，个性特征只在细部上存在。技术上的这种一致性颇为引人注目，在当时诸侯纷争的政治局面下，铸造技术在东周时期大范围地同步发展，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探讨的文化现象。

曾国青铜器两个阶段的铭文无论是内容、辞例、排列方式以及字体，都基本与中心文化区域铭文相同。铭文的个性特征，除了内容与辞例的单一性，还偶尔在辞例上有细微的变化。比较突出的现象是在铭文制作上，两个阶段曾国青铜器铭文都出现较多的铭文右行、反书等现象，文字也有错、漏、缺笔现象，铭文整体布局不善的问题。在青铜器铸造技术日益成熟的条件下，铭文制作出现的问题似乎与文化水平相关，即制作铭文

的匠人对铭文的认识有限，他们对于铭文的理解远不如对合范、浇铸、焊接的理解。

相对于纹饰、铭文等与周文化较强的一致性，从铜器群的角度看，曾国青铜器如苏家垅铜器群使用九鼎表现出较高的社会等级，但其组合复杂程度却不及虢国墓地 M2001 七鼎墓铜器群，说明这一时期曾国的社会背景较为复杂。第二阶段曾国青铜器各铜器群，大体只能分为曾侯和其他贵族两个等级，曾国贵族表现出较少的社会分层，曾国的曾侯一级和高级贵族铜器群器用等级的差别较大，这与其附庸小国的地位相符。

从区域的角度观察来看，第一阶段曾国青铜器与邻近的黄国虽然政治关系密切，但青铜器器形及组合特征差异却颇大。但同时，曾国青铜器与山东地区青铜器却表现出颇为紧密的关系。第二阶段以曾国青铜器作为观察的基点，可以看出当时一些共同的文化因素包括工艺技术手段在较为广大的区域范围传播，这些文化共性从晋及楚、由汉淮而至吴越地区。由此可见由中原地区至南方地区在春秋晚期之后日益积累的文化共性，这种同一性的趋势可以理解为战国末期开始的政治统一的前兆。

四　文化个性与独立生产的青铜器

曾国青铜文化先后分别属于周、楚文化的大格局之下，它与周、楚中心文化的共性无疑是压倒性的。那么，一个统一文化格局下地方文化的个性可能的表现方式是怎样？这在本书而言是一个探索性尝试。我们理解在这样的个性大约可以分为三个方面：

其一，个性因素完全由其中心文化的因素构成，只是这些因素在地方青铜文化中出现的频率不同，或者以较低的品质出现，有的因素甚至只在中心文化或者中心文化区域出现而不见于地方文化。这种情况我们主要表述为地方文化的单一性。例如第一阶段第一期重环纹反复出现在绝大部分青铜器上，其出现频率远高于中心文化地区甚至其他青铜文化。

其二，将中心文化因素进行改造或重新组合，形成新的表现方式，这种方式未必只局限于本地青铜文化，但往往在本地更为流行。第一阶段曾国的宽体附耳鼎即属于此类。

其三，不同于中心文化的、基本独立的新因素。第一阶段的直条纹鑐与曾伯陭钺、第二阶段的素面方壶属于此列。

一支地方亚文化独立性的程度，与以上三个方面因素顺次呈正比。如第三方面因素愈多，其文化独立性愈强，或直至成为一支独立的青铜文化。曾国青铜器第一、二阶段的第三方面因素均比较个别，而第一阶段的第二方面因素略多，因此如果作一总体评估，第一阶段曾国青铜文化的个性和独立性要强于第二阶段。

某些个性因素是指示独立铸造青铜器的标志物。在第三、四两章，我们通过对曾国青铜器从器形、纹饰、铭文乃至技术等方面个性特征的考察，明确了第一和第二阶段曾

国青铜器独立生产的性质①，说明这一问题的因素包括多个方面的个性因素。

曾国青铜器铭文的一些个性是说明独立生产青铜器的主要依据。铭文是高社会等级的代表物，但其制作者的社会地位和文化水平却可能都较低，铭文制作出现中心文化区域不会出现的不规范甚至错讹现象，铭文内容出现有一些反映语言风格差异的、近似于方言的熟语。这样一些特殊的特性，恰好是青铜器为曾国当地生产的反映。

某些器物形制反映出地方青铜文化的社会风尚和审美趋向，这种趋向往往表现出地方文化较单一或单调的发展水平，也不会是中心文化作坊的产品风格。例如曾仲斿父方壶完全仿照圆壶纹饰，曾侯乙墓绳纹铜鬲复制当地陶鬲形制，如此等等的风尚趋向，不是可以在中心文化作坊定制所可能出现的现象。

在我们最初的课题设计中，原来希望主要通过铸造工艺技术的分析来解决曾国是否存在独立的青铜制造业问题。但两个阶段曾国青铜器所表现出来的铸造技术与中心区域文化及其他地方青铜文化技术的一致性，使这一设想最终基本落空。但对于铸造技术的性质，却有一些新的认识。

铸造技术在青铜器诸方面因素中可以说是最为活跃的一个方面。这里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在大区域范围之中，技术演进的一致性显示其交流与传播极为活跃。无论是第一还是第二阶段，我们可以看到那些主要的、关键性工艺技术比如先铸鼎足、榫式焊接等等，在不同的大区出现的时间几乎相同。工艺技术活跃性的第二个层面含义，是体现在技术细节的灵活性上。当铸工掌握基本制作技术之后，在一些具体环节上采用灵活的处理方式是手工作坊的一个普遍特性，其中有些方式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形成一些工艺习惯。例如苏家垅铜器群多件鼎、簋底部中央设垫片的方式，晋至两周地区青铜鼎鼎足范型前后双合的方式等等。第二阶段曾国青铜器这类灵活性表现得更加广泛，是春秋晚期前后青铜铸造技术更加成熟的大文化格局的具体表现。

看来，至少在中国青铜时代晚期，青铜器铸造并不存在、或者在程度上不如我们曾经设想的那样中心文化对于地方文化的控制、国家与国家之间设置障碍等等技术壁垒问题。特别是曾国先后处于周楚不同政治势力的控制之下，但拥有属于自己的青铜作坊的局面并未发生改变。实际上，当某一工业发展成熟之后，控制与壁垒已无存在价值。早在古代中国青铜器的地方化生产至少在殷墟文化时期就已经存在②。在东周时期，甚至一些新的工艺技术，也很快在大区域范围得到推广。春秋晚期出现的金属镶嵌或铸镶技

① 诸侯国亚文化独立的青铜铸造能力还很难说是一个普遍现象，而是在不同时期、不同等级或规模的国家可能有不同。这需要更多层次的个案研究。

② 这一点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为西方学者所注意，参见 Virginia C. Kane, The Independent Bronze Industries in the South of China Contemporary with the Shang and Western Chou Dynasties, Archives of Asian Art 28, 1974 – 75.

术、“刻纹”技术以及锻制技术等等，虽然都不属于传统青铜工业技术风格，但在很短的时间内在不同的区域范围都有相关发现。根据杜德兰的研究，嵌错图像纹饰的技术在春秋晚期出现后，迅速在不同地区出现，但工艺技术手法基本相同①。中国青铜时代晚期技术的交流与融合的文化格局，无疑是其后政治文化统一的内在动力之一。

那么，又是什么因素促使青铜铸造这样影响当时生产力发展的核心技术得到交流？曾侯乙铜器群纹饰和铭文特征显示其大部分容器和甬钟分别属于同一批次铸造，这无疑显示出颇大的作坊规模。但以曾国当时较小的国力，不可能常年维持如此规模的作坊系统特别是大量高水准的技术工人。曾国青铜器一些传统个性的存在，又说明曾国应当有一个常年维持的技术工人和青铜作坊系统。从曾国这样的地方青铜文化的角度而言，像曾侯乙尊盘的失蜡法工艺并非当时范铸的主流技术，却在曾国得到高水平运用，显示其与其他作坊技术系统如楚国的内在关联。不难设想，独立或半独立的技术工人群体的存在，是曾国青铜作坊大规模生产能力和高新技术被熟练运用的背景。这些工人可能在不同国家之间活动以应一些较大规模生产之需，而曾国自身的工人则为维持日常规模的生产。相反的假设是，如果曾国的匠人群体相对封闭，则曾国会很难保持其青铜器的发展与其他国家在技术上的一致性。流动匠人的生产组织在世界其他文明中作为一种主要形式明确存在。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旧巴比伦时期（约公元前 2000 - 公元前 1600 年），Ur 神庙的黄金作坊人手不足时，可能会从 Larsa 雇用独立的手工个人②。正因为这样动态的交流，技术系统的发展活力、一致性等特征才得以充分体现。春秋晚期前后曾国在政治上完全附庸于楚，但仍然表现出不少与中原地区青铜器相同的性质，这种超然于政治格局之外的共性，极有可能是通过技术层面来实现的。

① Alain Thote,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as Seen from Chinese Pictorial Bronzes from the fifth Century BCE, Res (Harvard University), Spring 1999, p. 11 - 41.

② J. N. Postgate, Early Mesopotamia: Society and Economy at the Dawn of History, p229. Routledge, London and Now York 2007.

附　论

历史文献中随、缯与曾国的关系考辨

通过我们此前对曾国青铜器所作的考古学文化分析，我们可以大体勾勒出曾国青铜器所反映的历史轮廓：曾至迟在殷墟第二期文化时期即已立国，商时期大约活动于今随枣走廊一带，西周早中期与周人关系密切，此后的曾国文化与周文化面貌一致。西周晚期的曾国青铜器有较大范围的分布，而两周之际曾国较为强盛，其疆域包括有今漳河中上游、滚河流域、涢水中上游较广大的地区，其中心区域可能在今枣阳东赵湖一带。春秋早期之后曾国迅速衰弱，不仅地域缩小，其中心区域也趋于东移至今随州城区。在政治上，曾国成为楚国的附庸，文化面貌与楚文化基本一致，这一状况一直延续到战国中期曾国亡于楚。

曾国这样的地域范围至少在春秋早期之后重合于历史文献记载中的另外一个国家——随国。与曾国明确于出土资料相反，随国历史文物则从未有过出土。曾国如何以与历史文献记载中的国家关联，也就是所谓“曾国之谜”①。如本书《前言·曾国青铜器研究史》所述，历代学者已经就此提出了种种设想与论证，其中的曾国即随国之说广为学术界所接受。但曾随说显然并非铁证如山，对该说的辩诘和歧见仍然不绝于缕，由此可见，曾国之谜远未水落石出。

由于近年新的曾国青铜器材料的出现，由于对这些材料重新梳理的研究基础，对曾国之谜的重新讨论，有了较过去大为有利的条件。以下我们首先讨论与曾国最可能出现关联的随国、缯国，而后探讨曾国可能的历史状态。

第一节　随、曾之辨

一　有关随国的历史文献记载和随国历史

有关随国的历史文献记载相当丰富，因此学术界已就此有较为清晰的认识。以下仅以《左传》为主线辑录其基本材料来反映其历史轮廓。

---

① 李学勤：《曾国之谜》，《新出青铜器研究》，文物出版社，1990年。

《左传·桓公六年》（前706年）："楚武王侵随，……斗伯比言于楚子曰：'吾不得志于汉东也，我则使然。汉东之国，随为大。随张，必弃小国'。"杜注："随国，今义阳随县。"《正义》引《世本》："随国姬姓，不知始封为谁？……哀元年随侯见《经》，其后不知为谁所灭。"《水经注·溳水》："楚灭之以为县。"

《左传·桓公八年》（前708年）："楚子会诸侯于沈鹿，黄、随不会。……楚子伐随，军于汉、淮之间。……战于速杞，随师败绩。"

《左传·庄公四年》（前690年）："楚武王荆尸，授师孑焉，以伐随。……令尹斗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溠，营军临随，随人惧，行成。莫敖以王命入盟随侯，且请为会于汉汭而还。济汉而后发丧。"

《左传·僖公二十年》（前640年）："楚人伐随。"

《左传·僖公二十年》："随以汉东诸侯叛楚。冬，楚斗谷于菟帅师伐随，取成而还。君子曰：'随之见伐，不量力也。'"

《左传·昭公十七年》（前525年）："楚师继之，大败吴师，获其乘舟余皇。使随人与后至者守之，环而堑之。"

《左传·定公四年》（前506年）："楚……王奔随。吴人从之，谓随人曰：'周之子孙在汉川者，楚实尽之'。……随人卜与之，不吉，乃辞吴曰：'以随之辟小，而密迩于楚，楚实存之。世有盟誓，至于今未改。若难而弃之，何以事君？'。吴人乃退。"

《左传·哀公元年》（前494年）："楚子、陈侯、随侯、许男围蔡。"这一年是随国最后见诸历史文献。

从上述材料可得到如下要点：1）随国在今随州一带，这由杜注及《左传》描述楚随关系所反映的地理概势可知。2）虽然晚期历史文献关于随国族姓有不同记载，"姬姓、姜姓、祝姓三说，未详孰是"①。但上述资料显示随国为姬姓：不仅《世本》有随国姬姓记载，"周之子孙在汉川者"也指出随国与周人相同的族姓。故随国族姓，现代史家均无异议。3）公元前640年至前506年之间，是楚随关系转变时期，此后随国为楚之附庸，未曾有变化。而随楚"世有盟誓，至于今未改"还暗示，随成为楚国附庸可能就发生在公元前640年之后。

随国作为周王同姓宗亲的姬姓国家，但不知为谁所封，早期历史不详。不过，《国语·郑语》史伯所言："当成周者，南有荆蛮、申、吕、应、邓、陈、蔡、随、唐"，随国至迟在西周晚期就已在汉东地区立国，春秋早期"汉东之国随为大，随张，必弃小国"，说明这一时期随国国力不仅强盛，而且是汉水以东地区诸多小国所依附的对象。

---

① 陈盘：《春秋大事表列国爵姓及存灭表撰异》四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9年。

二 随与曾的关系

历史文献中的随国，与出土青铜器的曾国，有着似是而非的关联。

1. 随国似乎就是曾国

曾随说的学者为随国就是曾国的观点提出了许多依据，其主要有力者如下：

历史文献记载随国在今随州一带，春秋早期为汉东大国，其地域范围与曾国铜器的分布大体吻合。就国力而言，就汉东地区由春秋而至战国时期能与出土铜器的曾国相匹配的国家而言，似乎非随国莫属。

曾侯乙墓的发现说明当时曾国的都城应当在随州，“据文献记载，随县正是随国的国都所在”①。两者恰相吻合。

随国历史的变化过程与曾国铜器所体现的时代变化、实力消长一致。随国与曾国都在两周之际和战国早期表现出较强的国力。另一方面，曾国的文化内涵在春秋中期以前属于周文化系统，此后逐步被楚文化所同化而属于楚文化体系，这与文献记载中随国历史的变化无疑是相似的。

从族属上看，随州季氏梁墓地出土的曾国铜器中有两件铭文铜戈分别有：“周王孙季怠孔臧元武，元用戈”、“穆侯之子、西宫之孙，曾大攻尹季怠之用”铭文，这里的穆侯应当是指曾国国君，这样，季怡既是属于曾国的公族，又与周王室有着直接的血缘关系，此时的曾国应当是周王室的同姓之国，或曰“这两件戈铭是汉东曾国为姬姓的铁证”②。除此之外，曾侯作叔姬簠、曾仲姬壶等也都指示曾国姬姓，这与随国姬姓侯爵的情况相同。

战国早期曾侯乙墓出土极其丰富的随葬品反映出高度的生产力水平，曾侯乙墓随葬品的丰富和精美程度，大大超过了稍早的春秋晚期另外一个附庸国国君蔡申侯墓葬的随葬品。同时，楚王对曾侯乙下葬给予了高礼遇和规格，曾侯乙编钟中有楚王酓章所赠镈钟，镈钟有“楚王酓章作曾侯乙宗彝，奠之于西阳”语。这些特别现象暗示曾国在春秋晚期之后受到楚国的优待超乎一般附庸国地位。这说明曾国可能即为随国，因为随国历史上接纳了为吴人所败的楚昭王，楚人随后表达的报德之意。曾、随在这一历史背景上也相互重合。

至于曾国为什么又称为随国，曾随说的解释是，在周代历史上有的诸侯国有两个国名，因此曾国与随国也是一国二名，如“吕国又称为甫，山东安丘的州国又称为淳

① 李学勤：《曾国之谜》，《新出青铜器研究》，文物出版社，1990年。

② 舒之梅、刘彬徽：《论汉东曾国为土著姬姓随国》，《江汉论坛》1982年第1期。

于”①。

除了上述曾随说学者提出的理由，曾国即随国其实还有一些表现：

1988 年江苏六合县程桥中学 M3 出土有曾子义行簠。M3 属于春秋晚期，同出鼎、甗等 9 件青铜器，其中盘、匜有铭，分别为吴国攻吴太叔、罗儿之器。这批青铜器的性质属于吴国②。曾国青铜器出土于吴国墓葬，可能与其时楚、吴战争相关。前述《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吴楚之间的战争，随国参与其中。若曾国即随国，正与这一历史背景相符。

与曾国青铜器出土在吴国的情况相反，曾国墓葬中也出土有可能是来自吴国的青铜器。属于春秋晚期的东风油库 M2 出土有“S”形纹饰鼎，此类纹饰常见于长江下游地区。该鼎三足与器腹浑铸，并在鼎底形成三角形范缝，这一铸型是典型的春秋早期以前技术。而在春秋中期以后的楚文化系统青铜鼎中，鼎足均为分铸、器底形成圆形范缝。东风油库 M2 鼎铸造技术与春秋中期前后长江下游地区铸造技术滞后的情况相符，因此该鼎来自长江下游地区是无疑的。考虑春秋晚期的地理政治态势，此鼎来自吴国是很有可能的。此例同样说明曾国可能是随国参与了楚吴之间的战争，并获取有青铜器。

如果曾国不是随国，曾国和随国这样两个国力较强的国家，自西周至战国时期同时并存于鄂北地区的随枣走廊一带，在当时特别是春秋中期以后的政治格局之下，几乎是不可能的。

如果综合这些因素分析，结论似乎只能是：曾国就是历史上的随国。

2. 随国似乎不是曾国

尽管随国为什么称为曾国的问题并无圆满的答案，但曾随合一的论点不可谓不是一项创举。但是，随国也有一些与曾国不相吻合的因素，这些因素有的是曾随说难以逾越的障碍。

在上一章关于出土青铜器反映的曾国历史中，我们已经说明：从甲骨文等等方面的材料看，曾国的历史早至殷墟二期文化或更早。但若姬姓的随国就是曾国，则姬姓的族群没有可能在商时期就已经活动在随枣走廊一带。

曾随说论者也注意到姬姓国家与其历史早至商时期的矛盾。舒之梅等提出姬姓随国早在原始氏族社会时期就已经在汉东地区活动③。但将随国的历史活动上溯到史前时期明显有主观臆测的成分，况且季怠戈所谓“周王孙”的地位，也明确表明曾国与周人直接的血缘关系。李学勤也试图弥补此说关于曾国早期历史的漏洞，他说：“商和西周

① 李学勤：《曾国之谜》，《新出青铜器研究》，文物出版社，1990 年。

② 曹锦炎：《程桥新出铜器考释及相关问题》，《东南文化》1991 年第 1 期。

③ 舒之梅、刘彬徽：《论汉东曾国为土著姬姓随国》，《江汉论坛》1982 年第 1 期。

有汉东的曾，不等于说东周时期的曾国有这样长的历史”①。他暗示，曾国早晚不同阶段的人群及其族姓可能不同。换言之，东周时期的曾国是姬姓的随国，但商西周时期的曾国可能不是随国。这实际上已经是部分否认曾国即随国的观点。

再就国力而言，春秋早期“汉东之国，随为大”，随国较大只是基于与汉东地区其他国家的实力对比而言，并非是说随国是当时的大国。《左传》这条文献的潜台词更应当理解为“汉东的小国中，只有随国是较大的”。在《国语》中史伯罗列的西周晚期诸大国中，南方的强国有缯、申、吕等，但并没有提到随国。曾国在西周晚期到两周之际地域及文化面貌所表现的大国气势非随国同时的力量所能比拟②。这一时期曾国疆域范围北达桐柏山南麓，南至大洪山以南，东西由滚河流域至涢水中游，这一广大的范围是当时一般诸侯国难以企及的实力范围。第一阶段曾国青铜器反映出的器用规格，甚至有超出虢国之势。这样看来，青铜器所反映的曾国较历史文献记载的随国，在实力对比上有较大差别，它说明这一时期的曾国可能并非随国。

同时，西周晚期强大的曾国还给我们更深一层的启示是：如果曾国即是姬姓的随国，那么在申国之南的曾国作为周人的同姓诸侯，以其西周晚期强劲的实力，可以很好地控制南土。又何须周王用心良苦大张旗鼓地动员力量将申国改封于南阳（详见下节）、来完成“南土是保”的任务？

第二节 缯、曾之辨

一 有关缯国的历史文献记载和缯国历史

历史文献关于缯的记载几乎都是涉及西周灭亡的故事。如《国语·郑语》：“申、缯、西戎方强，王室方骚。……王欲杀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申人弗畀，必伐之。若伐申，而缯与西戎会以伐周，周不守矣。”韦昭注曰：“缯，姒姓，申之与国也。”《国语》对灭周事件的进一步记载，见于《晋语一》：“申人、鄫人召西戎以伐周，周于是乎亡”。

缯国与戎人联合攻灭西周一事还见载于古本《竹书记年》、《史记》中。如《史记·周本纪》：“申侯怒，与缯、西夷犬戎攻幽王。”另一条关于西周灭亡的记载则未提到缯，《史记·秦本纪》：“西戎犬戎与申侯伐周，杀幽王骊山下”。

另外，历史文献与缯相关的记载还有山东的鄫国。《春秋经·僖公十一年》（前649

① 李学勤：《续论曾国之谜》，《楚学论丛——江汉论坛专刊》1990年9月。

② 时学颜已注意到“曾国所占领或影响的区域似乎要比随国大”。时学颜：《有关曾国遗物所表现的文化性质》，《江汉考古》1985年第3期。

年）："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春秋经·襄公六年》（前567年）："莒人灭鄫。"鄫为小国，附庸于鲁，但为莒所灭。1981年山东临朐泉头村发现上曾太子般殷鼎①，这个"上曾"应该就是鄫国②。

鄫还作为地名多次出现。《左传》中有"盟于鄫"（《宣公十八年》）、"次于鄫"（《襄公元年》）、"谋鄫"（《僖公十六年》）等，这些"缯"基本都是作为郑国地名出现，不一定代表这个地点曾经是鄫国故地。

历史文献中对"缯"、"鄫"的写法不分："春秋左氏、公羊两传作'鄫'、穀梁传作'缯'，国语晋语作'鄫'、郑语作'缯'"③。此外《史记》作"缯"。毫无疑问，"缯"和"鄫"两种写法在历史文献中原本是互相通用的。因此，郑玄在《左传》僖公十四年鄫条下注释说："鄫似绫反本或作缯。"

上述叛周的缯国和山东的鄫国均为姒姓，史家的记载基本清楚明了。《国语·周语》："杞、缯由大姒。"《周语》又有："杞、鄫，二国，夏后也。"《史记·夏本纪》："禹为姒姓，其后分封，用国为姓，故有夏后氏……杞氏、缯氏。"可见韦昭所说"缯，姒姓"应当没有问题。周代的缯国是作为夏族的遗民而存在，其历史渊源颇长。

但刘节提出历史上"有姬姓之鄫，又有姒姓之鄫"④，其中郑地之鄫为姬姓。他的这个观点有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出土青铜器曾侯作叔姬簠有曾国为姬姓的铭文材料，二是依据"徐锴说文系传引杜预曰'鄫，姬姓'"。不过，他引用历史文献缯为姬姓之说是一条错误材料，学者们已经指出其误⑤。同时，将青铜器中的姬姓之曾，直接对应于历史文献的某一缯国，认为该缯国为姬姓，在逻辑上也有问题。因为青铜器的姬姓之曾，有可能在历史文献中并无记载，而历史文献中的缯国在可考的资料上都是指向姒姓。因此刘节认为历史文献中的鄫有姬姓之国，是缺乏直接依据的。实际上，缯国之名属于"用国为姓"（《史记·夏本纪》），其族群可能的确与夏遗民相关。在关于曾国性质的讨论中，不少学者引刘节缯国姬姓之说，提出叛周之缯为姬姓⑥，也就存在前提问题了。另外与曾随说的矛盾相同的是，设若叛周之缯为姬姓，在其与周交恶之前的西周晚期，以其强大的实力，周人何需另外分封申国来"式是南邦"（《诗·崧高》）？

---

① 临朐县文化馆等：《山东临朐发现齐、鄩、曾诸国铜器》，《文物》1983年第12期。

② 孙敬明等：《山东临朐新出铜器铭文考释与有关问题》，《文物》1983年第12期。李学勤：《试论山东新出青铜器的意义》，《文物》1983年第12期，又载于《新出青铜器研究》，文物出版社，1990年。

③ 容庚：《武英殿彝器图录》38曾子⿸匚簠，哈佛燕京学社，1934年。

④ 刘节：《寿县所出楚铜器考释》，《古史考存》第108～140页，人民出版社，1958年。

⑤ 屈万里：《曾伯霥簠考释》，《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三十三本，台北，1962年。李学勤：《论江淮间的春秋青铜器·再论曾国之谜》，《文物》1980年第1期。

⑥ 如屈万里认为缯国姬姓，位于今襄阳一带。屈万里：《曾伯霥簠考释》，《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三十三本，台北，1962年。

叛周之缯其他方面的历史信息很少，特别是少有关于其地望的文献记载。归纳过去论点，清代以来学者有关缯国地望情况的研究，均基于缯国邻近于申，并由此形成二说：

一是缯邻近于申国，即位于南阳附近。清人高士奇、雷学淇提出这一观点①。如高士奇认为："当是时，申国初受改封之际，国于谢，在楚方城之内，度缯国必与之相近，故得偕举兵。哀四年致方城之外于缯关，岂其故墟乎？"② 根据这一认识，缯国的地望与申国相关。申国地望，根据《诗·崧高》孔颖达疏在今南阳。这样，缯国地处楚之方城（即今方城县），恰好邻近南阳之申。杨宽进一步认为"西周时代曾国的国都在后来楚国方城附近的缯关、缯丘一带"③。

二是缯邻近于另一个申国——西申，地望在临潼骊山一带，因此缯国也应地处关中。清人崔述怀疑位于南阳的申国与周西北的戎"相距辽越，申侯何缘越周而附于戎？"④ 因为古本《竹书纪年》有"平王奔西申而立"的记载，童书业认为叛周之申为关中的西申⑤。这一看法为石泉⑥、宋新潮⑦等现代学者所从。

看来，缯国地望的确定，首先需要明确参与叛周的申国到底是南阳申国抑或为"西申"。对这一问题以上说法都无直接依据，因此直到近年学术界仍然看法各异⑧。比较两种观点，西申说仅仅以南阳至关西较远的距离为反诘之据，理由十分微弱。而从目前已知的信息和当时的政治情势推测，叛周的申国实应为南阳之申。以下为几点理由。

参与叛周之申为南阳之申，与西周晚期的政治格局相吻合。西周中期前后，周王朝对"南土"的控制主要得力于在南阳一带的噩国，但后来噩侯反叛，噩国为周人所灭⑨。于是周宣王又封申国于谢地，维护周人对东南方向的势力。《诗·崧高》记述了申国受封时的盛况，其中说"王遣申伯，路车乘马，我图尔居，莫如南土。锡尔介圭，以作尔宝。往近元舅，南土是保。……申伯信迈，王饯于郿，申伯还南，谢于诚归"。

---

① 参见杨宽：《西周史》第646－64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

② 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卷十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③ 杨宽：《西周史》第64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

④ 顾颉刚编订：《崔东壁遗书·丰镐考信录》卷7，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⑤ 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第39－4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

⑥ 石泉：《古代曾国——随国地望初探》，《古代荆楚地理新探》注释20，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

⑦ 宋新潮：《骊山之役及平王东迁历史考述》，《人文杂志》1989年第4期。

⑧ 西方学者亦见类似分歧，夏含夷（Edward L. Shaughnessy）主南阳之申之说，参 Edward L. Shaughnessy, Western Zhou History, p350.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 from the Origins of Civilization to 221 B. C. Michael Loewe and Edward L. Shaughnessy, editor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李峰认为西申叛周，参李峰：《西周金文中的郑地和郑国东迁》，《文物》2006年第9期。

⑨ 张昌平：《噩国与噩国铜器》，《华夏考古》1995年第1期。

受封场面的隆重，寄予了周王对申伯藩屏南土的厚望。申伯以“王之元舅”的身份当此大任，反映的是西周晚期周人南土地区政治格局错综、东南地区淮夷等异族叛服不定的复杂情况。可以推测，申国新封于谢地，根基尚未稳妥，形势所需地与缯国结为联盟，后来申周变恶，申、缯联合叛周便在情理之中了。

叛周之申为南阳之申，在历史文献的记载中也比较明确。西周灭亡的直接导火索，是一场与南阳之申相关的政治斗争。周幽王宠褒姒而欲立其子伯服，故废申后及太子宜臼。《国语·晋语》：“周幽王……逐太子宜臼，而立伯服，太子出奔申，申人、鄫人召西戎以伐周，周于是乎亡。”韦昭注曰：“申，姜姓之国，平王母家也。”周代婚姻多因政治故，申嫁女入侍周王，也是如此。自厉王至幽王，联姻关系暗示涉及的都是南阳之申。申国之封于南阳，也是因其为王舅的身份，这一身份又恰好与其后发生的废申后及太子关联。很难设想，西周末年周之东西各有一个申国，两国都有嫁女入周故事。

《国语·郑语》主要记载的是郑桓公与史伯的对话。史伯说：“当成周者，南有荆蛮、申、吕、应、邓、陈、蔡、随、唐”，史伯随后又继续分析说：“申、缯、西戎方强，王室方骚，……王欲杀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申人弗畀，必伐之。若伐申，而缯与西戎会以伐周，周不守矣”。前面的申国在南土，为南阳之申无疑，后面提到的申，当然是与叛周事件相关的申。史伯前后所说的申国，当然是指同一个申国，而无可能在后面提及另外一个西申。

西申可能确在周人之西，但并非为平王所奔之所。《后汉书·西羌传》记周宣王“伐申戎”，所指或即西申。周朝西、北为戎人等少数民族活跃地域，戎人可能包含多支。犬戎或为西戎的一支，其他如“姜氏之戎”（《史记·周本纪》）。西申近于戎人之所，又有“申戎”之称。从政治的角度看，西申与周交恶，亦无可能为宜臼出奔处。无论如何，我们不能以西申的存在而度造其附近还有一个缯国。

其实，若申、缯在今豫南鄂北地区，地理位置距关中的西戎较远，但这并不妨碍它们之间结为联盟。历史上武王伐纣，周与参加联军的其他部族距离或超过申与西戎。因此西申之说的这一理由并不成立①。

出土材料已经明确申国、曾国的存在及其相邻的位置关系。在这里，出土材料和历史文献有关曾、申的历史地理情况又恰好相互吻合。如果西申之说正确的话，西申的与国缯邻近于旁。难以想象，当时在周人东西两侧，各有一个申与曾相邻的地理布局。

由此看来，叛周之申、缯位于南阳及附近，是较合理的解释。

---

① 姚政：《古曾国考》，《南充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4期。

二 缯与曾的关系

历史文献中的叛周之缯，与出土青铜器的曾国，也有着似是而非的关联。

1. 缯国似乎就是曾国

先秦出土文献中的国名，若出现在后世的历史文献中，往往加有邑旁。《说文解字·邑部》解释说“邑，国也。”因此，“古代的地名，其从邑的偏旁，常常有后人加入的。例如北、庸之作邶鄘，奠之作郑，寺之作郜，朱之作邾皆是”。“曾伯霥簠的曾，就是后世所写的鄫，在字形的变化上来说，是没有问题的。由于《左传》及《穀梁传》互证，那么，鄫就是缯，也是没有问题的”①。临朐出土的“上曾太子般殷鼎”也直接证明了出土材料的曾国在历史文献中称为鄫国。这样，历史文献中的缯国，应当对应于豫南鄂北出土青铜器的曾国，从逻辑上、从实践上来说都是没有问题的。

“申、缯、西戎方强”，西周末年缯国实力强大，吻合于出土青铜器的曾国势力。曾国青铜器的分期表明，两周之际时期曾国青铜器批次最多，苏家垅、郭家庙墓地M21、M17等高等级铜器群常见，体现出当时曾国正值繁盛阶段。根据本书《曾国青铜器所反映的曾国历史·曾国的疆域》一节分析，两周之际曾国范围大体包括从漳河、滚河到溵水的广大区域，这一范围方圆约80千米，曾国疆域的这一面积，可能大于当时的晋国。根据邹衡对早期晋国文化遗址的分析，“在翼城的翔山以西、曲沃县的汾河以东，浍河以北，翼城、曲沃二县的崇山以南，东西长约30、南北广约15千米的长形地带，在此范围之内大概也就是晋始封地的中心所在”②。从器用制度而言，曾国青铜器的苏家垅铜器群见礼器33件，其中9件列鼎。如第三章所述，苏家垅铜器群器主还未必为曾侯。相比之下，虢国墓地M2001一般认为属于虢国国君虢季墓。M2001出土7鼎6簋，仅从青铜器反映的级别来判断的话，低于曾国。两周之际的虢国国君为王之三公，按礼制其级别应当高于诸侯③。西周晚期的晋国，晋侯用鼎为5列鼎④，级别更低。因此曾国当时所使用的鼎制可能是超乎常制的。周代礼制对于一些异姓诸侯的约束，似乎有所不同。例如西周晚期吕国在青铜器铭文中自称王，传世有吕王鬲（《集成》635）、吕王壶（《集成》9630）等等。周代“诸侯自行称王”现象，均为周邦以外诸侯⑤。曾国青铜器器用制度是否也表现出异姓特征？

---

① 屈万里：《曾伯霥簠考释》，《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三十三本，台北，1962年。

② 邹衡：《晋始封地考略》，《尽心集——庆祝张政烺先生八十寿辰》，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

③ 王世民：《关于西周春秋高级贵族礼器制度的一些看法》，《文物出版社成立三十周年纪念文物与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

④ 孙华：《关于晋侯对组墓的几个问题》，《文物》1995年第9期。

⑤ 王世民：《西周春秋金文中的诸侯爵称》，《历史研究》1983年第3期。

叛周之缯可能邻近申国的格局，符合曾国与申国在地理位置上相距不远的实际。宣王所封的申国位于今南阳，已经为历史文献和考古发现所证实①。位于桐柏山南麓的曾国在地理上与申国虽有山脉阻隔，但由南阳盆地至随枣走廊之间的文化联系从古至今一直频繁，在《区域文化之下的曾国青铜器》一章中我们也可见两周之际前后这两个地区之间的文化关联。因此，将曾国定位为申国的与国，是合乎情理的。当然，这里缯国的地望，与前人缯关之说不同。缯国在缯关之说仅仅根据“楚人……至方城之外于缯关”（《左传·哀公四年》）中“缯关”之名而将缯国定位于方城，并无可靠之处。缯关和郑地一带的鄫地一样，可能只是作为地名出现，未必与缯国地望有直接关联。曾国青铜器分布区域大体明确后，学者们多已经趋向于缯国的地望可能在申国之南的观点②。

缯国历史至少早到商代，与出土文献及考古材料所反映的曾国情况一致。《国语·周语》：“杞、鄫，二国，夏后也。”《周语》又有：“有夏虽衰，杞、鄫尤在。”缯国作为夏遗民建立的国家，其历史在商代必定就已经存在。夏遗民在商时期的活动，也可能会抵及南阳及其附近。我们在上一章已经说明，考古材料证明曾国历史在商时期已经存在。缯国与曾国的历史情况，基本一致。

山东临朐所出的上曾铜器还使我们得到了这样的启示：“上曾”包含有方位的含意，是相对于另一个曾国而言③，后者极可能就是指豫南鄂北出土青铜器的曾国。上曾太子般殷鼎不但暗示湖北之曾为历史文献的缯国，而且也说明这个缯国与山东之鄫相同的族姓。上曾太子般殷鼎作附耳浅腹宽体，形制与曾国常见而有自身特征的附耳鼎完全相同，乃至有学者认为该鼎为湖北之曾所作④。该鼎铭文有：“上曾太子般殷乃择吉金，自作𩰫彝……”如我们在《区域文化之下的曾国青铜器》一章所论，“择其吉金，自作××”具有豫南鄂北一带区域文化特征。上曾太子般殷鼎与湖北之曾青铜器文化关系近密，而与山东地区两周之际流行青铜鼎有一定区别，可能表明了两个曾国之间的特殊关联。

曾子𨚕鼎铭文有：“曾子𨚕择其吉金，用铸𠦪彝。惠于刺曲，𠭯屖（迟）下保，臧敌集□，百民是奠……”其中“刺曲”，马承源认为即“曲烈”之倒⑤。他说：“按《通志·氏族略》三引《世本》文，‘曾氏，夏少康封其少子曲烈于鄫，襄六年莒灭

① 李学勤：《论仲禹父簋与申国》，《中原文物》1984年第4期。徐少华：《周代南土历史地理与文化·申国》第28－39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

② 屈万里：《曾伯霥簠考释》，《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三十三本，台北，1962年。湖北省博物馆：《湖北京山发现曾国铜器》，《文物》1972年第2期。

③ 孙敬明等：《山东临朐新出铜器铭文考释与有关问题》，《文物》1983年第12期。

④ 王恩田：《上曾太子鼎的国别及其相关问题》，《江汉考古》1995年第2期。

⑤ 马承源：《记上海博物馆新收集的青铜器〈曾子斿鼎〉》，《文物》1964年第7期。

之'。金文之刺字，经典中作烈，刺曲即《世本》的曲烈，此铭可更正《世本》传抄的颠倒。"马氏这一论点重述于《铭文选4》，并为杨宽所从①。若此说确实，更说明湖北之曾与山东之鄫为同源，同为姒姓。

2. 缯国似乎并非曾国

季氏梁季怠戈、曾侯作叔姬簠、曾仲姬壶等铭文资料显示的曾国为姬姓，这无疑与缯国姒姓的文献记载矛盾。

如果曾国是缯国，则曾国和随国是两个性质不同但又同时并立的国家。这两个国力较强的国家，自西周至战国时期同时活动于随枣走廊一带，在当时的情况下几乎是不可能的。特别是至第二阶段曾国的中心区域与历史文献记载的随国都城在地理位置上重合，也是曾国即缯国之说不可逾越的矛盾。

第三节　曾为缯—随说

一　"曾国之谜"面面观

随着曾国铜器出土数量的增多，曾国铜器所表露出的历史信息对于研究曾国的国族属性却愈添复杂性。正如前所述，曾国铜器所表现的属性确有似随而非随，似缯而非缯的矛盾双重性。正因如此，才导致曾国铜器的国属问题历来的歧见纷披，论者各执一词。的确，曾国铜器出在似是毫无关联的随国地域，而本是姒姓的缯国却与姬姓的曾国又似有一种内在的联系。另一方面，出土青铜器的曾国、历史文献记载的缯国和随国，其材料依据都足以说明它们作为国家在当时的确存在。个中的矛盾重重，前人所持结论的种种不同自然也就不足为怪了。让我们看看学术界对"曾国之谜"的种种猜测，并对各说略作辨析，或许有益于这一谜底的明朗。

曾国即随国说，或简称曾随说。此说的矛盾之处已如前述。此外，如果综合考虑曾、缯、随的对应关系，既然山东曾国与历史文献中鄫国对应无误，说明曾国与缯国的关联从逻辑上、从实践上来说都无问题，这种条件下的曾国即随国之说，似乎有舍本求末之感。

曾国即缯国，与随国无瓜葛。这种观点又有若干不同的解释。一说如杨宽等认为曾国即灭周之缯，姒姓，缯国是与姬姓随国并存的国家②。如前所述，曾国为姬姓的事实，是此说不可逾越的障碍。一说如黄盛璋认为姬姓曾国原来在南阳新野一带，"应是

① 杨宽：《西周史》第65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

② 杨宽、钱林书：《曾侯之谜试探》，《复旦大学学报（社哲版）》1980年第3期。

随为楚灭后迁居随地”①。但是，曾国的活动范围并无大的改变，这由曾国青铜器的出土地点有清楚的反映，曾国由新野南迁尤其缺乏证据。同时，历史文献记载随国的存在，由西周晚期直到春秋末年是很清晰的，并不见楚国灭随的迹象。一说如曾昭岷等认为曾国青铜器分别属于三个不同的姒姓国家，历年出土的各批曾国铜器是楚国灭亡不同缯国后将各国器用集中放置于湖北地区②。此说矛盾较多，况且曾国铜器从西周晚期一直到战国中期延绵成系列，各批铜器组合、搭配大都井然有序，难以想象楚人网罗分属三国的铜器置于湖北一地。

曾国就是缯国，姒姓，由南阳盆地进入随枣走廊，春秋中期灭掉随国而据有其地③。但我们知道，西周晚期曾国铜器即已发现于随州、枣阳，两周之际的曾国铜器已遍布随枣走廊。无论是从历史文献还是从出土铜器都很难看出曾国有任何南迁的迹象，也更无可能在春秋中期灭随。

早期曾国是缯国，姒姓，春秋晚期被楚国所灭，曾为楚所设封君，国都于随④。此说的主要根据是曾侯乙墓属于楚墓，理由是从曾侯乙墓出土的遣策记载来看，为曾侯乙助葬的都是楚国的大臣和封君，并无其他诸侯国的国君和使节，而按照古制，诸侯国国君死后，参加葬礼的应有通好之国。不过现在看来，曾侯乙墓的文化性质固然可列入楚文化范畴，但仍保留着一些姬周文化的传统色彩，该墓的许多特点都和楚墓有所不同，况且楚国的一个封君兼称曾、随两面国名，也非常令人费解。

以上将曾国与缯国关联的各说共同矛盾也是最大的障碍还在于：随州季氏梁出土的曾季怠铜器明确证明曾国为姬姓，与缯国姒姓的性质不同。

曾国即缯国为姬姓，由南阳以北的缯关迁至随国故地。前面说过，缯关只是一处地名而非国名，与缯国并不见得有直接联系，曾国也没有一再南迁的迹象。再则，历史文献中的缯国为姬姓的说法，本身是一个误传。我们现在当然也不能因为出土青铜器的曾国为姬姓，因此就判定文献记载中的缯国为姬姓。为避免曾国南迁的臆测，此说后又有发展，认为缯、随俱为姬姓，同处于汉水流域，两周之际或其后缯灭随⑤。但缯为姬姓、缯与随并存于同一地区的矛盾，已如前述。此外，持此说的任伟认为中甗（《集

① 黄盛璋：《山东诸小国铜器研究·鄫（上曾）国》，《华夏考古》1989年第1期。

② 曾昭岷、李瑾：《曾国和曾国铜器综考》，《江汉考古》1980年第1期。

③ 顾铁符：《随国、曾侯的秘奥》，《楚文化新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

④ 徐扬杰：《关于曾侯问题的一点看法》，《江汉论坛》1979年第3期。唐兰曾提出类似想法，参唐兰：《寿县所出铜器考略》，《国学季刊》四卷一期，1944年。

⑤ 任伟：《曾、随之谜试解》，《华夏文明的形成与发展——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建所五十周年庆祝会暨华夏文明的形成与发展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大象出版社，2003年。

成》949)、静方鼎[①]等青铜器铭文中记载有周王南省诸多方国，因此“昭王南征当是从成周出发，自北而南……行军线路应是经曾、方、邓、溵、噩”，或者“王在成周，所讲地名，自然是由近及远，由北而南”[②]，以此证明传统的曾在缯关之说，即当时的曾国地望在今河南方城一带。但验之以中甗等器地望确切的国家，如邓国在今襄阳、噩国在今南阳，若曾国在方城，则曾→邓→噩的方向是北→南→北，周王行军的上述次序并不成立。可见，缯灭随之说并无新的依据。

曾为缯—随说[③]，即随国灭亡姒姓的缯国之后迁都西阳（今河南光山），自称曾。此说并无其他各说那样的族姓方面的矛盾，但就地域而言，曾国铜器的出土以随州一带为中心大致不出新野—京山—线，与该种说法所考证的曾国在泌阳—光山的地理位置不符。

曾国既是随国也是缯国之说[④]。随、缯两国以不同族姓并存于西周晚期是毫无疑问的，曾国铜器不可能同时代表两个国家。《国语·郑语》中说“当成周者，南有荆蛮、申、吕、应、邓、陈、蔡、随、唐”，同时又有“申、缯、西戎方强，王室方骚”之语，说明西周晚期随、缯是同时并存的两个国家，也就是说，出土铜器中的曾国不可能同时是随国和曾国，但却又似乎与这两个国家特征接近，这无疑给“曾国之谜”的破译增添了更大的难度。

以上的各种说法基本上都注意到考古中的曾国铜器与文献中缯国的联系，但除了曾随说之外，各说多猜谜式推测而少有考古学证据。同时，曾、缯、随的复杂关系致使各说各有上述无法避免的要害矛盾。

最后，我们还应该考虑到并讨论这样一种可能，即曾国既非缯国，也非随国，这三个国家各自独立，彼此不同。不过如果稍加分析，会发现这种可能性也难以成立。一是曾、缯、随实力均较强，若三国并立于随枣走廊一带，在地理空间上无法展开。二是既然曾、随为姬姓，如前所述，周人无需另外分封申国来加强南土的势力。三是如果湖北曾国并非反叛周朝的缯国，那么当时的曾国至少有山东的鄫国、反叛周朝的缯国、出土铜器的曾国等等，缯国之多也令人难以理解。

以上的诸种看法可以说几乎包揽曾、缯、随这组关系中所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但经过前面的分析却表明，积年所论的各说或多或少都有其缺陷，而每项之不足之处又是

---

① 徐天进：《日本出光美术馆收藏的静方鼎》，《文物》1998年第5期。

② 任伟：《曾、随之谜试解》，《华夏文明的形成与发展——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建所五十周年庆祝会暨华夏文明的形成与发展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大象出版社，2003年。

③ 于豪亮：《为什么随县出土曾侯墓》，《古文字研究》第1辑，中华书局，1979年。

④ 周永珍：《曾国与曾国铜器》，《考古》1980年第5期。姚政：《古曾国考》，《南充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4期。

该种说法难以成立的障碍。曾国和缯国、随国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我们应该更多地去分析具体考古材料、将考古材料结合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之下，去寻找曾国是随国抑或是缯国的证据，更多地去用证据而不是用推论去说是或不是。实际上，经过多年的积累，现有的考古材料已经能够说明许多问题了。

二　曾国为先缯后随的假说

如果我们回顾第一、二节对曾国与缯、随关系的分析，在检讨曾国青铜器表现出来的似随非随、似缯非缯的双重性时，会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曾国与缯、随的矛盾都只是表现在早晚不同的时间段上。在曾国与随国的对应上，曾国为随国的矛盾主要表现在曾国的早期历史上，即随国与早期曾国历史不符：姬姓随国的历史不可能早至商时期，随国在西周晚期至两周之际时期内表现出的国力较曾国为小。而在曾国与缯国的对应上，曾国为缯国的矛盾主要表现在曾国的较晚历史时期，即缯国与曾国晚期历史不符：春秋早期及其后曾国表现出姬姓特征，春秋中期之后曾国中心区域与随国重合。

考虑到这种情况，结合如前所述的分析，我们对“曾国之谜”的看法是：早期曾国铜器所代表的国家是缯国，晚期曾国铜器所代表的国家是随国，缯国大约于春秋早期偏晚时灭亡，而随国取代缯国并自称曾，即“曾国之谜”的谜底可以归结为曾→缯→随。这与前面说到的缯随说基本观点一致，但不同之处是曾国的地望应该在随枣走廊一线。

按照这一假设，如果曾国前后两阶段所代表的国属与族姓都不同的话，这种变化似乎就可能会在考古学文化中有所体现。但实际上由于第一阶段曾国或随枣走廊一带青铜器基本为周文化青铜器特征范畴，随替代缯在这一地区文化面貌同一性很大的条件下，并不会引起文化基本特征的巨变现象。特别是，历史政治事件往往难以在考古学文化现象中有立时而鲜明的物化反映，如果没有文献的依据，考古发现很难直接揭示从君位的更迭到王朝的替代——学术界关于夏商文化分界的讨论、商周之际青铜器的区分，莫不是这一情形的体现。但无论如何，假如随国替代甚至是灭亡缯国的现象存在，这一历史事件总可能会在出土遗存中留下蛛丝马迹。

下列现象可能有助于我们对随灭缯这一变故作一定的了解。

枣阳段营墓葬出土的青铜器中，鼎铭文为：“唯曾子仲谡用其吉金自作𩰫鼎，子子孙孙其永用之”。曾子仲谡所作之器又见于新野小西关墓葬，其甗铭文：“唯曾子仲谡用其吉金自乍旅，子子孙孙其永用之”。除自铭之外，两件青铜器铭文字迹、辞例完全相同，为同一人同时所作之器。但这两件青铜器一件出在枣阳，一件出在新野，两座墓葬时代一座属于两周之际，一座属于春秋早期偏晚。曾子仲谡甗的年代明显早于墓葬年代，因此小西关墓葬的墓主可确定并非曾子仲谡，同时，段营墓葬只出曾子仲谡鼎一件

铭文铜器，茶庵墓葬的墓主也未必为曾子仲谏。类似曾子仲谏铜器这种分散的现象，在两周之际曾国青铜器中多见。例如，郭家庙 M21 墓主可能为曾伯陭，但曾伯陭圆壶早已传世。同样，桐柏出土的曾子伯沓盘，在传世品中也有同人所作的匜。

随州万店周家岗墓葬出有曾太保簋两件，两件簋的器底、盖内铭文均被刮削，同座墓葬出土的鼎、盘，其铭文有“庳季之伯”。曾太保簋的年代，根据器物形制约当在两周之际，即年代早于庳季之伯器，可见此墓的墓主决非“曾太保”而应该是“庳季之伯”。曾太保簋铭文被刮削，无疑是庳季之伯攫取曾太保簋后据为己有后的行为。周家岗墓葬出土的鬲铭文为“……之孙伯毂自作尊鬲”，族氏名被刮削，情况与曾太保簋相似。

同人所作之器出现在不同地点或单位，或不同人所作之器出现在同一单位，反映的可能是或掠夺、或赠赙①这样不同的情况。器物的赠赙往往只发生在“血缘亲属关系”集体内部②，如晋侯墓地常见父子、夫妻关系铜器同出于一个墓葬。曾国青铜器中，东风油库 M3 出土有曾仲姬圆壶、曾侯遗鼎，其中鼎大约就是曾侯遗赠与曾仲姬随葬之用。曾侯乙墓中亦见铭文被刮之事，曾侯乙盘铭文即系“曾侯遗”名字改刻，尊盘由属于曾侯遗转到曾侯乙之手。不难看出，曾侯乙以当时附庸国国君的身份与他的气势磅礴的随葬品极不相称，用其先君“曾侯遗”、“曾侯郧”的青铜器来装点门面与曾侯乙墓恣肆之风一致。

但是，曾子仲谏、曾太保这些分散的青铜器显然不是赠赙现象。铭文被刮削，往往反映的是器物易主——如第三章所述，曾国青铜器在两周之际时期的铭文，往往是在辞例上强调作器者对器物的拥有。淅川下寺 M2 出土的王子午升鼎，应当就是为倗所攫取③。这种礼器易手现象发生在重于礼制的周朝，是很严重的事件。金文中常见赏赐与交换的事例，但礼器往往不在其列。所以孔子说：“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礼，……政之大节也。若以假人，与人政也，政亡，则国家从之，弗可止也已。”（《左传·成公二年》）《孟子·梁惠王下》也说：“毁其宗庙，迁其重器。”可见，作为祭祀祖先、标明等级的礼器还有着代表其政权的重要意义，器失则政亡，故两国相争，战胜国往往同时攫取败亡者的礼器，这种事例，在史籍、考古中时有所见。诚然，铜器分散现象有时原因较复杂，但是这种现象如此集中地出现在曾国铜器之中，说明当时的缯国政权被摧毁，可能并非是无稽之谈。如果我们注

① 曹玮：《西周时期的赠赙制度》，《商承祚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文物出版社，2003 年。曹玮：《东周时期的赠赙制度》，《考古与文物》2002 年第 6 期。

② 张长寿：《论泾阳高家堡周墓》，《远望集（上）》，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 年。

③ 陈伟：《淅川下寺二号墓及其相关问题》，《江汉考古》1983 年第 1 期。

意到曾国青铜器分散现象的出现时间与地点，会发现这样一个明显的现象：第一阶段曾国青铜器的分散现象，都出现在当时的政治中心——枣阳东赵湖地区之外，那些分散的有曾国标识的青铜器年代往往早于埋藏时间。这样的时空结构，正合乎曾国覆亡时青铜器可能发生的变迁。

曾子仲谌甗、曾太保簋等器均是两周之际铜器出土于春秋早期偏晚时期墓葬之中，暗示缯国覆灭的时间可能发生在春秋早期某时间。这一时间晚于两周之际的曾子仲谌甗、曾太保簋，而早于春秋早期偏晚的周家岗墓葬和71新野小西关墓葬。另一现象可能也和这一时间关联。1989年罗山高店砖瓦厂一座墓葬中出土有曾子季夨臣簠、曾季夨盘、曾夨臣匜和鼎、圆壶，其他铜器有戈等兵器以及车马器。成组的曾季夨臣铜器表明他是该墓墓主。曾季夨臣青铜器造型、风格颇为特异。罗山一带为黄国之地①，过去数次出土有黄国、蔡国青铜器②。春秋早期之前黄与曾国的关系甚为密切，两国联姻的青铜器数见。从这个角度考虑，曾夨臣当属于客死于黄国的曾国贵族。曾季夨臣墓葬下葬年代在春秋中期，此时黄国大约新亡，曾季夨臣前往黄国的时间应当在此前时间。曾季夨臣何以居于黄国而不得回归曾国？确切背景已不可知。是否因为缯国覆亡，身为缯国贵族的曾季夨臣出逃流亡？

如果说曾季夨臣铜器群的事例不足以说明随灭缯事件，那么郭家庙墓地的情况则似乎直接得多。2002年发掘的郭家庙墓地25座墓葬中，仅有4座墓葬保存完整，19座墓葬早期被盗，另外2座墓葬被晚期破坏，是否被盗，情况不明。由于未见盗墓遗物，盗墓时间难以判断。从发掘报告所示图例来看，被盗墓葬往往被大面积扰乱，这不是以获取随葬青铜器为目的的晚期常见盗墓方式③。郭家庙墓地被盗墓葬不仅有M21、M17等级别最高墓葬，也包括M11、M18等规模最小的墓葬。显然，盗墓者是以摧毁郭家庙墓地墓葬并攫取其彝器为目的的。

郭家庙墓地被盗的这些情况暗示郭家庙墓地的盗毁可能与缯国的灭亡相关。郭家庙墓地使用时间为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这一时期中原文化性质的墓葬尚未有使用封土的葬俗④。郭家庙墓地这种公墓性质墓地，按照《周礼·春官》记载是“冢人”管理和规划墓地。这种墓地若废弃时间较长，墓葬的准确分布甚至墓地的一般情况，都难以为后世所知。因此假设盗墓发生在春秋早期之后的数十年或以后，在当时的知识条件下盗

① 徐少华：《周代南土历史地理与文化·黄国》第93－103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

② 信阳地区文管会等：《罗山县高店公社又发现一批春秋时期青铜器》，《中原文物》1981年第4期。

③ 发掘报告有趣的形容墓地被盗为“应是早年惨遭有组织、有专业人员参加的大规模盗劫”。襄樊市考古队等：《枣阳郭家庙曾国墓地》第6页，科学出版社，2005年。

④ 林留根：《论中国墓葬封土之源流》，《东南文化》1996年第4期。

墓者难以如此全面地发现墓地，更难以做到“盗洞的痕迹清楚，一般位于墓坑东部”①。因此可以推定郭家庙墓地被盗时间可能就发生在春秋早期，也就是说，缯国的灭亡与墓地的废弃、被盗直接相关。由于郭家庙墓地为公墓地的性质，盗墓者不仅为获取“重器”，更是为摧毁墓地所代表的缯国宗祀。从盗墓行为的性质而言，这不是偷“盗”而是公开地“毁”。这种战胜者对墓葬破坏的情形，在两周时期应该较多发生。《史记·楚世家》记载吴人入郢，“辱平王之墓”，《史记·白起列传》记载“白起拔我郢，烧先王墓夷陵”。在已发掘的战国时期大型墓葬也常见有早期被盗现象。曾国擂鼓墩墓群大墓如曾侯乙墓、擂鼓墩 M2 均有被盗痕迹，根据盗洞出土遗物，我们曾分析曾侯乙墓被盗时间在战国中期曾国灭亡后不久②。岐山周公庙遗址的几处墓地“不论是大型墓葬，还是中小型墓葬，被盗扰的情况非常普遍，……相当一部分的墓葬则是在埋葬后不久就遭到了‘盗掘’”③。郭家庙墓地这种破坏大约也是属于灭国“盗”墓，其主体与受体，按照《左传·定公四年》楚国与随国之间“世有盟誓”的情况，应该不会发生在楚国与随国之间。按照曾国青铜器分散的现象推测，参与灭亡曾国的可能有东部随州周家岗及其南一带的随国、新野与桐柏一带的国家，当然可能还有这一时期向东北发展的楚国。而随国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则是因其替代缯国。

或许我们可以置疑，上述夺器、毁墓等等现象，未必就是反映曾国国族发生颠覆性变化，因为这也可能反映的是曾国统治阶层内部或族系之间的政治纷争。那么，是否有一定考古学依据显示曾国在春秋早期前后性质的变化？

埋葬习俗是考古学材料中最直接反映族群属性的内容。在曾国代表国君一级墓葬中，春秋早期前后有两点变化是引人注目的。一是墓葬形制的变化。春秋早期及以前曾国国君一级墓葬遗存发现两处：郭家庙 M21 和 M17，它们分别可能为曾国国君和夫人墓，这一点在第三章已经论证。春秋早期之后曾国国君一级墓葬只在擂鼓墩墓群有发现，这里有包括曾侯乙墓和擂鼓墩 M2 在内的六座可能为曾侯的墓葬，这些墓葬均不带墓道④。商周时期墓葬是否使用墓道是体现等级、埋葬习俗的重要因素，由于上述墓葬等级上均属国君一级，曾国墓葬制度这一变化显然可排除等级的原因。擂鼓墩墓群曾国陵园不使用墓道的制度也可以排除楚国埋葬习俗影响的原因，因为战国时期楚墓从一般到高级贵族墓葬均有使用墓道的现象。显然，是否使用墓道的葬俗变化来自前后曾国自身意识观念的变化。曾国墓葬习俗的另一个变化是随葬器用制度的变化。我们知道西周

① 襄樊市考古队等：《枣阳郭家庙曾国墓地》第 6 页，科学出版社，2005 年。

② 张昌平：《关于擂鼓墩墓群》，《江汉考古》2007 年第 1 期。

③ 徐天进：《周公庙遗址的考古所获及所思》，《文物》2006 年第 8 期。

④ 张昌平：《关于擂鼓墩墓群》，《江汉考古》2007 年第 1 期。

中期以后高级别贵族墓葬器用制度中，编钟的使用是与用鼎制度几乎同等重要的方面。曾国青铜器也是以编钟而著称——曾侯乙编钟和擂鼓墩 M2 编钟仍然是迄今有关商周时期考古发现中最大型的单套编钟，以曾国的国势而言，这样的情形反映了当时曾国对于乐礼的高度重视。春秋早期之后高等级曾国墓葬不多，但属于春秋中期的季氏梁墓葬出土有 5 件一套编钟。反观春秋早期及以前，苏家垅、郭家庙 M21、M17 等相当于国君一级铜器群中，均未见编钟。但在大约同时期的晋国、虢国国君一级墓葬中，均随葬编钟。考虑到苏家垅铜器群使用九鼎的情况，这一时期曾国不同于中原其他诸侯国的礼制，当然并非是其等级所限，而可能是其与姬周文化习俗有所不类的反映，因此它与春秋中期之后姬姓的曾国文化不同，也就不足为奇了。

历史文献的记载其实也可见缯国春秋早期已灭亡的线索。关于缯国历史文献见于《国语》、《史记》、古本《竹书纪年》中，但都是大同小异地记述申、缯、西戎联合灭周一事，而未见缯国其他事迹，这使西周晚期强势一时的缯国突然销声匿迹。推想缯国参与叛周之后或许为诸侯所排斥，春秋早期迅速衰败。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应当是枣阳一带正缨楚人春秋早期北进之锋，终致亡国。缯国在春秋早期即已消失于文献之中，只因其国已亡。

这样看来，枣阳东赵湖一带曾国青铜器的中心，对应的是缯国政治中心。而从安居到随州一带春秋中期之后的曾国中心区域，对应的则是随国的都城。

那么，如果说春秋早期缯国为随国所替代，代表宗周地位的随国为什么又要继续以曾国为国名？一则，“曾”作为地名、国名由来已久，山东鄫国称“曾”是因为与湖北之曾同族姓、同先祖，随国沿用“曾”名，缘于曾作为地名历史更为久远，都是不足为怪的。在先秦时期，灭其国而沿用被灭国的旧名不乏惯例，比如周成王灭唐而封其弟叔虞、韩国灭郑、田陈代齐等等，都曾经以所灭之国国名自称。依照历史沿革称呼地名、国名也是古代常见现象。另外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则可能是因为缯国此前国力强盛，较小的随国欲借缯名而强势，故以自称为曾，但他国依然可能称其为随。这大约是何以历史文献记随，而出土文献称曾的原因。而这里自称与他称之别，也是先秦时期国名变化的一个并不少见的现象。

综合前面的讨论，我们提出曾即缯→随的假说作为“曾国之谜”的谜底，这一看法的基本思路是以历史文献有关缯国、鄫国的记载为前提，以山东发现鄫国文物的考古证据确定曾与鄫、缯相通，再联系到缯国地望与曾国相同、早期曾国铜器所表现出的地位国力与缯国相符、早期曾国铜器所表现出与随国特点不相符等几个方面，由曾国青铜器等反映的一些特异现象导出结论。若以上推测勉能成立的话，我们就不再会对曾国铜器所表现出的亦随非随、亦缯非缯的双重性以及曾国起源与曾国族姓等诸多矛盾感到困惑。曾、缯、随的关系也似乎只有作如是说才容易解释。

虽然我们认为曾国为先缯国后随国的可能较为合理，但这一主张远未契如符节，而是仍然迷雾重重。例如，两周之际及以前这两个国家的地域范围如何？迄今所见春秋早期及此前的曾国青铜器哪些属缯？哪些属随？

显然，揭开“曾国之谜”的谜底，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

附表1　　漳河、滚水、浈水等区域出土曾国青铜器登记表

出土单位	出土铜器	同出其他物	出土背景	组合价值	分期
苏家垅	鼎9、鬲9、甗1、簋7、豆2、方壶2、盉1、盘1、匜1；其他有马镳、衔等马器64		墓葬?	Ⅰ	一2
檀梨树岗	鼎1、鬲1			Ⅳ	一1
段营	鼎3、簋4、壶2；戈1、矛1、镞3；车辖、马衔等车马器275		墓葬	Ⅱ	一2
72曹门湾	鼎2、簋2		墓葬?	Ⅱ	一1
82曹门湾	戈1			Ⅳ	一3
83曹门湾	鼎1、簋2、壶1		墓葬	Ⅱ	一2
郭家庙M1	鼎1、簠2、方壶2、盘1、匜1；镳1、节约1、环1	玉饰	墓葬	Ⅱ	一3
郭家庙M6	鼎1；戈1、矛1、镞10	陶罐1	墓葬	Ⅲ	一3
郭家庙M8	匜1；削1	陶豆2	墓葬	Ⅳ	一3
郭家庙M17	鼎2、鼎足1、壶2、鬲1、杯1；器座1、铃7；其他小件7	陶鬲2、罐5、豆4、盖6、玉石器141	墓葬	Ⅱ	一2
郭家庙M21	簋足、壶冠；铃7；钺1、戈16、矛4、镞131、盾锡8；軎等车马器1887	玉石器18、骨管251	墓葬	Ⅳ	一2
郭家庙M25	壶1；戈1、矛1、镞4；车马器8	玉器1、陶器1	墓葬	Ⅳ	—
郭家庙M01	鼎1、盘1		墓葬	Ⅳ	一2
郭家庙M02	鼎1、鐳2		墓葬	Ⅱ	一3
70熊家老湾	簋4、鐳1、方卣1		墓葬?	Ⅱ	一1
72熊家老湾	鼎3、方甗1、簋2、鐳1、盘1、匜1		墓葬?	Ⅰ	一1
75刘家崖A	升鼎3、鼎1		墓葬	Ⅱ	二2
75刘家崖B	方豆2		墓葬	Ⅳ	二5
75刘家崖C	方壶2		墓葬?	Ⅳ	二2
80刘家崖	鼎2、鼎足1、鬲4、簋耳4、圆壶2、勺2；编铃5；戈1；车马器9	金箔、玉石器20、陶罐2	墓葬	Ⅱ	二1
何家台	鼎2、方甗1、鬲4、簋2、圆壶2、盘1、匜1；马衔2、车軎2、锛1	玉饰	墓葬?	Ⅰ	一2

续附表 1

出土单位	出土铜器	同出其他物	出土背景	组合价值	分期
桃花坡 M1	鼎 2、鬲 4、簋 4、壶 1、盘 1、匜 1；车軎 2、马衔 2、马镳 2、节约 138	残玉、漆器	墓葬	Ⅰ	一 1
桃花坡 M2	鼎 4、鬲 2、簋 1		墓葬	Ⅱ	一 1
汪家墓	鼎 1、簠 2、镈 2	铅方壶 2、陶罐 1	墓葬	Ⅰ	二 3
周家岗	鼎 2、鬲 2、簋 2、圆壶 2、盘 1、匜 1；戈 2、车軎 4		墓葬	Ⅰ	一 3
旭光砖瓦厂	簋 2；铲 1、矛 1、镈 12		墓葬	Ⅲ	一 2
76 义地岗	鼎 1、盏 1		墓葬?	Ⅱ	二 2
季氏梁墓葬	鼎 1、甗 1、簠 2；编钟 5、戈 2、车马器等 40	玉器 5	墓葬	Ⅱ	二 1
八角楼墓葬	鼎 1、盏 1	陶鬲 1、罐 1	墓葬	Ⅰ	二 1
义地岗 M83	鬲 1、盘 1、匜 1	玉环 2	墓葬	Ⅰ	一 1
东风油库 M1	鼎 1、甗 1、簠 1、方壶 1、盘 1、匜 1；戈 1、镈 4	陶鼎 1、豆 1、壶 1	墓葬	Ⅰ	二 3
东风油库 M2	鼎 1、簠 1、方壶 1、盘 1、匜 1	陶鼎 1、豆 1、壶 1；玉器等饰品	墓葬	Ⅰ	二 3
东风油库 M3	鼎 1、方豆 1、壶 1、盘 1、匜 1、器盖 1	陶鼎 2、罐 1；玉器等饰品	墓葬	Ⅰ	二 3
黄土坡 M1	鼎 1；戈 1、钺 1	鬲、壶等陶器	墓葬	Ⅲ	一 2
擂鼓墩 M1（曾侯乙墓）	鼎 20、鬲 10、甗 1、簋 8、簠 4、豆 3、鼎形器 10、盒 2、尊缶 2、联禁大壶 2、提链壶 2、鉴缶 2、尊盘 1、小口鼎 1、匜鼎 1、鉴 1、盥缶 4、盘 1、匜 2；编钟 65；其他器类	陶、玉石、金、漆器	墓葬	Ⅰ	二 4
擂鼓墩 M2	鼎 17、鬲 10、甗 1、簋 8、簠 4、方壶 2、圆壶 2、豆 3、釜 1、方尊缶 2、圆尊缶 2、盥缶 2、盘 1、匜 1；编钟 36；杂器 14；车马器 155；其他器类	陶豆 9、玉石器	墓葬	Ⅰ	二 5
鲢鱼嘴	鼎 2、簠 2、盆 1、戈 3			Ⅳ	二 2
罗山高庙	鼎 1、簠 2、壶 2、盘 1、匜 1；戈 2、矛 1；车軎等车马器 26		墓葬	Ⅱ	二 1

附表 2　　零星出土和采集的曾国青铜器

性质	器名	出土背景	分期
零星出土	曾孟嬭谏盆	湖北襄阳太平店出土，同出青铜器流失	一3
	曾侯昃戈	湖北襄阳梁家老坟 M11，战国中期楚墓出土	二3
	曾子伯沓盘	河南桐柏出土，详情未见报道	一
	曾子仲谌甗	河南新野小西关春秋早期墓葬出土	一2
	曾太师鼎	河南淅川和尚岭 M1，战国早期楚墓出土	二3
	曾仲𠈌君臆器座	河南淅川和尚岭 M2，战国早期楚墓出土	二3
	曾嫚嬗朱姬簠	河南淅川徐家岭 M9，战国早期楚墓出土	二3
	曾姬盘	河南潢川高稻场春秋晚期楚墓出土	二3
	曾姬无卹方壶	安徽寿县李三孤堆战国晚期楚墓出土	二5
	曾子义行簠	江苏六合程桥 M3，春秋晚期墓葬出土	二3
	邵鼎	四川新都马家乡战国中期蜀国墓葬出土	二5
收集	曾伯从宠鼎	1965 年收集于武汉市	一1
	曾仲子敔鼎	1979 年收集于襄樊市	一1
	曾子㝬鼎	1964 年从湖北运抵上海冶炼厂的废铜中拣选	一2
	曾伯宫父鬲	传湖北出土	一1
	曾太保庆盆	可能为随枣走廊或信阳地区流出	一2
	曾侯郳簠	可能为随枣走廊或信阳地区流出	二3

附表3 传世曾国青铜器著录表

器名	著录	说明	分期
曾师季韩盘	《薛氏》16.165	原名“翼师盘”	一2
曾伯霥簠	《积古》7.7、《国博》17	原名“曾伯黎簠”	一3
曾仲盘	《积古》8.1		一2
曾诸子鼎	《捃古》2－2.37?、《善斋》34、《通考》76、《故铜》下下78	原名“曾者子鼎”	一2
曾子仲宣鼎	《缀古斋稿本》2.1		一3
曾子尿簠（2）	《周存》3.145、146	原名“曾子尾鼎”	一3
曾侯作叔姬簠	《周存》3.126	又名“曾侯簠”、“叔姬簠”	一3
曾子遗缶	《周存》5.32		二3
曾太保𩰫叔盆	《周存》4.37、《颂续》48、《善斋》100、《通考》880		一2
曾孙无谌鼎	《贞松》3.13、《善斋》36、《故铜》下下93		二2
曾伯陭壶	《贞松》7.32、《故宫》第5期、《通考》721	清宫旧藏	一2
曾子伯𠈌匜	《贞松》10.34	原名“曾子白匜”	一2
曾子⧄簠	《贞松》6.31、《武英殿》38、《大系》图139、《通考》364、《故铜》下下203	清宫旧藏	二3
曾□⧄簠	《贞松》6.34	《贞松》：“庚午岁（1930）见之辽东估人手”	二1
曾子遗簠	《贞松》6.24	《贞松》：“己未岁（1919）见之都肆”	二3
曾子遗簠	《贞补》上30		二3
曾子伯詣鼎	《铭文选》四446、《夏商周》441		一2
曾孙史夷簠	《集成》4591、《夏商周》557		一3
曾侯昃戈	《东周鸟篆文字编》下123、《鸟虫书通考》8、22		二3

说明：著录文献为简称，其全称参考附录一《曾国青铜器著录文献》。

附表4　第一阶段曾国青铜器铭文登记表

出土地点	器物	字数	位置	内容	特征	著录
70熊家老湾	曾伯文簋（4）	4－23＋2	器、盖内壁	唯曾伯文自作/宝簋，用赐眉/寿黄耇，其万年/子子孙孙永保用享		《集成》4051－4053
	曾伯文罍	12	口沿上	唯曾伯文自作厥饮罍。用征行	顺旋	《集成》9961
72熊家老湾	曾仲大父蠡簋（2）	6－52＋2	器内底、盖内壁	唯五月既生霸庚申，/曾仲大父蠡廼用吉攸（鉴），/叙乃雒金，用自作宝簋。蠡/其用追孝于其皇考，用/赐眉寿黄耇霝终，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享		《集成》4203、4204
	黄季作季嬴鼎	3－16	器内壁	黄季作季嬴/宝鼎，其万年/子孙永保用享	第3行弯曲排列	《集成》2565
	黄季小鼎	3－12	器内壁	黄季作/，其万/年永宝用		新见
桃花坡M1	起右盘	4－24＋2	器内底	唯起右自作用/其吉金宝盘，迺/用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享，永用之	语序、文字颠倒	《集成》10150
义地岗M83	□伯鬲		口沿上	伯……宝尊鬲，其万年永宝用	逆旋	《近出》133
檀梨树岗	曾太师鼎	3－7	2号足对应的内壁	曾太师/[illegible]/作鼎	反书，字体大	《曾国青铜器》第7页
	曾子单鬲	1－10	口沿上	曾子单用吉金自作宝鬲	逆旋	《集成》635
传世品	曾伯从宠鼎	3－15	1、2号足之间对应的内壁	唯王十月既/吉，曾伯从宠/自作宝鼎用		《集成》2550
	曾仲子敔鼎	3－16	1、2号足之间对应的内壁	曾仲子敔用吉/金自作宝鼎，/子孙永用享	右行	《集成》2564
	曾伯宫父鬲	1－15	口沿上	唯曾伯宫父穆乃用吉金，自作宝尊鬲	顺旋	《集成》699
苏家垅	曾侯仲子游鼎（2）	2－10	器内壁	曾侯仲子游/父自作[illegible]		《集成》2423、2424
	曾仲斿父豆（2）	2－8	器内底	曾仲斿父/自作宝甫		《集成》4673、4674
	曾仲斿父方壶（器2）	4－12	颈内壁	曾仲斿/父用吉/金自作/宝尊壶	右行、字间距大	《集成》9628、9629

续附表4

出土地点	器物	字数	位置	内容	特征	著录
苏家垅	曾仲斿父方壶（冠）	5－12	子口与莲瓣之间的内壁	曾仲斿/父用吉/金自作/宝尊/壶		《集成》9628
	曾仲斿父方壶（冠）	4－11	子口与莲瓣之间的内壁	曾斿/父用吉/金自作/宝尊壶	漏“仲”字	《集成》9629
	黄朱柁鬲（2）	1－9	口沿上	唯黄朱柁用吉金作鬲	顺旋	《集成》609、610
	黾乎簋（2）	6－38	盖内壁、器内底	唯正二月既死霸/壬戌，黾乎作宝/簋。用听夙夜，用/享孝皇祖文考，/用匄眉寿永命。/乎其万人永用。束	其中《集成》4157器铭为反书、右行	《集成》4157、4158
段营	曾子仲谏鼎	3－19＋2	器内壁	唯曾子仲谏，用/其吉金自作鼒/彝，子子孙孙其永用之	第3行弯曲排列	《集成》2620
小西关	曾子仲谏甗	3－19＋2	器内壁	唯曾子仲谏，用/其吉金自作旅/甗，子子孙孙其永用之		《集成》943
83曹门湾	曾侯緐伯戈	2－6	内尾	曾侯緐/伯秉戈		《集成》11121
郭家庙M17	曾亘嫚非录鼎（2）	3－13	器内壁	曾亘嫚非录/为妳/行器，尔永祜福	第2行前3字位置空出	《枣阳郭家庙曾国墓地》
郭家庙M21	曾伯陭钺	2－18	两面刃部	曾伯陭铸戚戊（钺），用为民/鬻（刑），非歷殷井（刑），用为民政	右行	《枣阳郭家庙曾国墓地》
传世品	曾伯陭壶	10－39＋2	盖内、口外、缘外，器颈内侧	唯曾伯陭乃用吉金鐈鋚，用自作醴壶，用飨宾客，为德无叚（瑕），用孝用享，用赐眉寿，子子孙孙用受大福无疆		《集成》9712
郭家庙M01	卫伯须鼎	4－13	内底中部	卫伯须/用吉金作/宝鼎，子孙/用之	右行	《枣阳郭家庙曾国墓地》
桐柏	曾子伯沓盘	5－28		唯曾子伯沓用/其吉金，自作旅/盘。其黄耇霝（令）终，/万年无疆，子孙/永宝用享	右行	《集成》10156

续附表4

出土地点	器物	字数	位置	内容	特征	著录
传世品	曾子伯沓匜	3－9		唯曾子/伯沓自/作尊匜	右行	《集成》10207
	曾子𨚕鼎	4－39	器内壁	曾子𨚕择其吉金，用/铸𠂤彝。惠于刺曲，函犀（迟）/下保，臧敌集□，百民是/奠，孔□□□，使于四国。/用考（孝）用享，民俱俾卿（饗）	多行弯曲排列	《集成》2757
	曾子伯詣鼎	3－11	器内壁	曾子伯詣/铸行器，/尔永祜福		《集成》2450
	曾诸子鼎	4－16＋1	器内壁	曾者（诸）子𨚕/用作鬻鼎，/用享于祖，/子子孙永寿		《集成》2563
	曾太保𩰫叔盆	3－19＋2	器内壁	曾太保𩰫叔/亟用其吉金，自作旅/盆，子子孙孙永用之		《集成》10336
	曾太保庆盆	3－8	器内底	曾太保/庆，用/作宝皿		《古文字研究》24
	曾仲盘	3－12＋1		曾仲自作/旅盘，子子孙/永宝用之		《集成》10097
	曾师季韩盘	4－19		曾师季韩用/其吉金，自作宝/盘，用孝用享，/福无疆	右行、反书	《薛氏》165.3，《集成》10138
周家岗	廓季鼎（2）	4－20	器内壁	廓季之伯歸/塞用其吉金，/自作宝鼎，子/孙永用之	一器铭文子、孙为重文	《集成》2044、2045
	伯毅鬲	1－8	口沿上	……之孙伯毅自作尊鬲	铭文被刮	《集成》592
	曾太保簋（2）	4－23＋2	盖内壁、器内底	曾太保□用吉/金自作宝簋，用/享于其皇祖文/考，子子孙孙永用之	铭文被刮	《集成》4054
	廓季盘	3－19＋2	器内底	廓季之伯歸塞/用其吉金，自作/盥盘，子子孙孙永用之	右行	《考古》1984年第6期
郭家庙M1	幻伯隹方壶（2）	5－14	盖子口外壁、口内壁	幻伯隹/作雉宝/壶，其万/年子孙/用之		《枣阳郭家庙曾国墓地》
	曾孟嬴削簠（器）	3－12	器内底	曾孟嬴削/自作行簠，/则永祜福		《枣阳郭家庙曾国墓地》
太平店	曾孟嫚谏盆	1－12	盖内壁、器内底	曾孟嫚谏作𩰫（饗）盆，其眉寿用之	顺旋	《集成》10332

续附表 4

出土地点	器物	字数	位置	内容	特征	著录
传世品	曾子仲宣鼎	6－33＋2		曾子仲宣⧄/用其吉金，自作/宝鼎。宣丧（尚）用/饗其诸父、诸兄，其万年无/疆，子子孙孙永宝用享		《集成》2737
	曾子尿簠（2）	3－11	盖内壁、器内底	曾子尿自/作行器，则/永祜福		《集成》4528、4529
	曾伯霥簠	11－88＋4	盖内壁	唯王九月初吉庚午，/曾伯霥哲圣元武，元武孔/嚎（致），克狄（逖）淮夷，印（抑）燮繁/汤（阳），金道锡行，具既卑（俾）/方。余择其吉金黄（铝），/余用自作旅簠，以征/以行，用盛稻粱，用孝/用享于我皇祖文考。/天赐之福，曾伯霥叚（遐）/不（丕）黄耇，万年眉寿无/疆，子子孙孙永宝用之享	《集成》4632漏“伯”、“祖”字	《集成》4631、4632
	曾孙史夷簠	5－20＋2	盖内壁、器内底	曾孙史夷/作飤簋。其/眉寿万年/无疆，子子孙孙/永宝用之	刻铭	《集成》4591
	曾侯作叔姬簠	4－26		叔姬霝作黄邦，/曾侯作叔姬邛/嬭媵器簠彝。其/子子孙孙其永用之		《集成》4598

说明：1）字数中数字格式为：行数－字数＋重文数。

2）铭文特征中顺旋表示铭文作顺时针排列，逆旋相反。

3）铭文位置栏目为空白者，表示情况不明。鼎、甗铭文位置标明为“器内壁”者，说明其对应于第 3 足的内壁。

附表 5　第一阶段曾国青铜容器铸造登记表

地点	器物		铸造工艺				口径	重
			铸形结构	足	耳/鋬	其他		
70 熊家老湾	曾伯文簋（2）	盖	3－○＋1	——	——	见有垫片	18.5	1：4324 2：3810
		器	4－○＋1	浑铸	榫式后铸	见有垫片		
	曾伯文鐳（器）		4－○＋3	——	榫式后铸	盖有 2 个泥芯撑痕迹。盖壁呈凸凹状	15.5	6.65
	垂鳞纹卣		4－□＋1	——	浑铸	盖、器范型相同。双耳自带芯范。器壁呈凸凹状	12.7	4117
72 熊家老湾	龙纹黄季鼎		3－△＋1	浑铸	浑铸	足内侧为凹棱形，足端见气孔	31	11.3
	重环纹黄季鼎		3－△＋1	浑铸	浑铸	三角形底范内有三弧线加强筋。器表多见气孔	24.8	3751
	环带纹方甗	甑体	4－□＋1	—	浑铸		27.5	10006
		鬲体	4－□＋1	浑铸	浑铸	箅孔是由底范出凸条形成		
	曾仲大父蟠簋（2）	盖	3－○＋1	——	——		20.4	1：7.2 2：6005
		器	4－○＋1	浑铸	分铸			
	波折纹鐳		4－○＋2	——	浑铸	芯范分范位置对应于颈部凸弦纹处。两范缝应耳	13.4	10.8
	龙纹盘		4－○＋1	——	先铸	盘外底有残存的先铸悬铃环纽	28.4	2766
	重环纹匜		？－□＋1	浑铸	浑铸	鋬与腹之间设芯范，鋬内侧露出范土	27.8	1045
桃花坡 M1	垂鳞纹鼎（2）		3－△＋1	浑铸	浑铸	耳使用泥芯撑。底有垫片。足呈槽状，有范土露出	1：24.4	1：2380
	龙纹鬲（4）		3－△＋1	浑铸	——	下腹足根两侧各 2 个垫片	1：12.8	1：907
	重环纹簋（4）	盖	3－○＋1	——	——	顶中央有垫片	1：18.7	1：4097
		器	4－○＋1	浑铸	浑铸	双耳与范缝重合，一耳内侧中央见范缝		
	窃曲纹壶	盖	3－○＋1	——	——	顶有 3 块垫片。	11.6	7250
		器	4－○＋1	浑铸	榫式后铸	每组瓦纹处各安置两周密集垫片		
	起右盘		4－○＋1	无榫后铸	榫式后铸	圈足下卧牛为无榫后铸。鋬偏离范缝约 2 厘米。底有垫片和网纹	34.6	4479
	重环纹管流匜		3－□＋1	浑铸	榫式后铸	椭方形底有网状加强筋	16.6	1171

续附表5

地点	器物		铸造工艺				口径	重
			铸形结构	足	耳/鋬	其他		
桃花坡 M2	重环纹鼎（3）		3－△＋1	浑铸	浑铸	足呈槽状，有范土露出	3：22.5	3124
	弦纹鼎		3－△＋1	浑铸	浑铸	足呈槽状，范土已被清空	22.6	2714
	变形窃曲纹鬲(2)		3－△＋1	浑铸	——	底、下腹见垫片	14.2	1430
	瓦纹簋		?	浑铸?	榫式后铸	器表光素，范型难以明确。外底有三对角形阳线加强筋	17	3300
义地岗 M83	□伯鬲		3－△＋1	浑铸	——	足内侧露出范土，下腹、底见垫片	16.9	1123
	蟠龙纹盘		4－○＋1	——	浑铸	耳与腹壁之间设有芯范。器表多气孔	28.5	2792
	重环纹匜		2－□＋1	浑铸	浑铸	鋬、腹之间设芯范。浇口在底范侧面范缝中部	27.5	1195
72 曹门湾	龙纹鼎		3－▽＋1	先铸	浑铸	底部垫片四个。足内侧封闭，足下部有补铸	22.5	3329
	瓦纹簋（2）	盖	3－○＋1	——	——		17.5	4999
		器	2－○＋1	浑铸	浑铸	耳、腹之间设有芯范。范缝应耳		
檀梨树岗	曾太师鼎		3－△＋1	浑铸	浑铸	浇口在第2足端。口沿下有漏铸。铭文对应第2足	14.5	1006
	曾子单鬲		3－△＋1	——	——	底部凸起，底面多有气孔。上腹、底见垫片	25.6	4711
其他	曾伯从宠鼎		3－△＋1	浑铸	浑铸	外底见弧线三角形阳线。足内侧封闭。下腹及底见垫片20余。多气孔，下腹有补铸	16.5	
	曾仲子敔鼎		3－△＋1	浑铸	浑铸	足内侧封闭。足底端多气孔	28.5	6.5
	曾伯宫父鬲		3－△＋1	——	——	上腹、下腹、近底处各一周9个垫片、底范处3个垫片	14.2	980
苏家垅	窃曲纹鼎（9）		3－△＋1	浑铸	浑铸	耳带圆梗。耳与腹壁之间设有芯范。凸底，多数器底中部带垫片。最大鼎浇口在底范范缝中部。足端见气孔，足内侧露范土	1：38.2	1：11.8
	龙纹甗	甑体	4－□＋1	——	浑铸	箅孔是由底范出凸条形成	34.4	10006
		鬲体	4－□＋1	——	浑铸	耳带圆梗。耳与腹壁之间设有芯范	25	

续附表5

地点	器物		铸造工艺				口径	重
			铸形结构	足	耳/鋬	其他		
苏家垅	鬲（9）		3－△＋1	——	——	二件鬲带扉棱。多数鬲腹、底见垫片。部分鬲下部有气孔	1：25.8	3530
	簋身	有铭（2）	4－○＋1	先铸	榫式后铸	部分簋有气孔。盖及中底部有垫片。簋盖的范形不明	1：20.3	5.4
		无铭（7）	4－○＋1	浑铸	榫式后铸		3：20	8.05
	曾仲斿父豆（2）		4－○＋1	浑铸	——	盘底见有垫片。镂孔是由圈足内范凸起形成	25.5	1：4725
	曾仲斿父方壶（2）	冠	4－□－N	——	——	耳见焊料注孔。圈足有加强筋，外底见阳网纹。圈足下见契入的榫头，壶底可能因此形成裂缝。外底可见补铸	21.5	1：32
		器	4－□＋2	浑铸	榫式焊接			
	环带纹盉		4－□＋1	浑铸	先铸	先铸鋬内连接链的圆球，再先铸鋬和管形流	11.7	4.4
	窃曲纹盘		4－○＋1	浑铸	浑铸	耳与腹壁之间设有芯范。浇口在底外中央	41	7.04
	窃曲纹匜		4－□＋1	浑铸	浑铸	鋬、腹之间设有芯范	35.4	2546
何店何家台	窃曲纹鼎（2）		3－△＋1	浑铸	浑铸	足内侧露出范土。浇口在底范一侧范缝中部	27.3	1：4640
	龙纹方甗	甑体	4－□＋1	——	浑铸		28	11.5
		鬲体	4－□＋1	——	浑铸	耳与腹壁之间设有芯范		
	重环纹鬲（4）		3－△＋1	——	——	一件较大的鬲带扉棱。中底带有垫片	1：22.4 2：14.2 3：14.2	1：2919 2：1355 3：1009
	窃曲纹簋（2）		4－○＋1	浑铸	榫式后铸	两盖分别为3、4个外范	18.2	1：4.9
	龙纹壶（2）	盖	3－○＋1	——	——	顶中部有垫片	12.4	1：4251 2：3891
		器	2－○＋1	——	先铸?	圈足口内带加强筋		
	窃曲纹盘		4－○＋1	——	浑铸	附耳自带芯范。圈足口内带加强筋，底部带有垫片	34.8	4676
	窃曲纹匜		4－□＋1	浑铸	浑铸	器内尚存范土	35.5	2843

续附表 5

地点	器物		铸造工艺				口径	重
			铸形结构	足	耳/鋬	其他		
郭家庙 M17	曾亘嫚非录鼎（2）		3－△＋1	浑铸	浑铸	耳带圆梗。耳与腹壁之间设有芯范。足内侧露出范土。底有垫片 3 个	1：31.8	1：6.64
	重环纹鬲		3－Y＋1	——	——	底为“Y”字形范缝	19.2	2.7
	龙纹壶（2）	盖	3－○＋1	——	——	盖顶见垫片 3 个	1：14	1：10.1
		器	4－○＋1	——	榫式焊接	下腹 8 个垫片。圈足内有加强筋		
	龙纹杯		4－○＋1	——	榫式后铸		8.6	220
茶庵段营	曾子仲谡鼎		3－△＋1	浑铸	浑铸	耳带圆梗。耳与腹壁之间设有芯范。足内侧未闭合。底部凸起，浇口在一底部范缝中部。纹饰填黑色物	26.6	3370
	重环纹鼎（2）		3－△＋1	浑铸	浑铸	耳带圆梗。耳与腹壁之间设有芯范。足内侧未闭合	25.5	6 公斤
	重环纹簋（3）	盖	3－○＋1	——	——		18.5	6.3 公斤
		器	4－○＋1	——	榫式后铸			
	环带纹壶（2）	盖	4－○＋1	——	——		16.4	16 公斤
		器	2－○＋1	——	铆式焊接	范缝应耳。器表面铸造痕迹不明显，不能明确腹范是否为两块。双耳可见铸焊焊料凹孔。外底有“十”字形加强筋		
83 曹门湾	窃曲纹鼎		3－△＋1	浑铸	浑铸	铸造粗糙。腹部多见垫片	22	3576
	窃曲纹簋（2）	盖	4－○＋1	——	——	顶一周 6 个垫片，中央 1 个垫片	13.6	4992
		器	4－○＋1	——	榫式后铸	器内见范土		
	环带纹壶	盖	3－○＋1	——	——	见垫片	13.5	7.5
		器	2－○＋2	——	榫式焊接	耳根处见销孔，有焊料溢出。见垫片。圈足内有加强筋		
郭家庙 M01	卫伯须鼎		3－△＋1	浑铸	浑铸	足经过补铸	27	残
	窃曲纹盘		4－○＋1	浑铸	浑铸	耳与腹壁之间设有芯范	38.6	残
黄土坡 M1	龙纹鼎		3－△＋1	浑铸	浑铸	耳顶部 2、内上侧 1 个泥芯撑痕迹		
旭光砖瓦厂	窃曲纹簋（2）		4－○＋1	浑铸	榫式后铸			

续附表 5

地点	器物		铸造工艺				口径	重
			铸形结构	足	耳/鋬	其他		
其他	曾子軌鼎		3－△＋1	残	浑铸	耳带圆梗，耳与腹壁之间设有芯范。纹饰间填黑色物质	31.8	残
	曾子伯詣鼎		3－△＋1	浑铸	浑铸	耳带圆梗，耳与腹壁之间设有芯范。足内侧未封闭。浇口明显，设在三条底范范缝中部	27.8	4120
	曾诸子鼎		3－△＋1			耳带圆梗，耳与腹壁之间设有芯范。器表多气孔	25.7	6135
	曾子仲谡甗		3－△＋1	——	均为浑铸	鬲体耳带圆梗，耳与腹壁之间设有芯范	28.5	
	曾伯陭圆壶		4－○＋1	——	焊接	二范缝应耳。器底见网状阳纹	11.4	9355
	曾太保釐叔盆		4－○＋1	——	榫式后铸	下腹多见垫片，铭文周围亦见垫片	27	
	曾太保庆盆		4－○＋1	——	——	下腹见垫片	25.5	2230
周家岗	庳季鼎（2）		3－▽＋1	先铸	浑铸	耳与腹壁之间设有芯范。浇口在底范缝中部。鼎足 2 外范	27	1：7.8
	伯毅鬲（2）		3－△＋1	——	——	下腹、底分别有 6、3 个垫片	14	1：875
	曾太保簋（2）	盖	3－○＋1	——	——	象首形足范缝在足前后。见较大垫片。器外底有网状加强筋。铭文均被刮削	1：20.2	1：7.75
		器	4－○＋1	无榫后铸	榫式后铸			
	龙纹壶（2）		3－○＋2	——	榫式焊接	一腹范范缝大体对应于一耳。芯范分段对应于腹外颈部弦纹处。浇口在圈足	15.5	5.6
	窃曲纹盘		4－○＋1	浑铸	浑铸	耳带圆梗。耳与腹壁之间设有芯范。底见垫片，并有补铸	40	5.4
	蟠螭纹匜		4－□＋1	浑铸	榫式后铸	鋬内侧未封闭。足与底之间有三棱形加强筋	35.6	1770
郭家庙 M1	窃曲纹鼎		3－△＋1	浑铸	浑铸	耳带圆梗。耳与腹壁之间设有芯范。足内侧未闭合。纹饰间填黑色物质	27.6	残
	曾孟嬴削簠（2）		4－□＋1	浑铸	浑铸	耳与腹部之间设芯范。腹壁多垫片，垫片或打破铭文	28	残

续附表 5

地点	器物		铸造工艺				口径	重
			铸形结构	足	耳/鋬	其他		
郭家庙 M1	幻白隹方壶（2）		2×4－□+1	浑铸	浑铸	二范缝应耳。水平分范，下腹范缝与背带纹重合。贯耳内设芯范。圈足带加强筋	17	残
郭家庙 M02	窃曲纹鼎		3－△+1	浑铸	浑铸	耳带圆梗。耳腹之间设芯范。下腹有浇不足	26	4678
	龙纹鱊（2）		4－○+2	——	浑铸	浇口在底侧。垫片多见	16.3	6.25
郭家庙 M6	窃曲纹鼎		3－▽+1	先铸	浑铸	耳带圆梗。耳与腹壁之间设有芯范。底部多垫片	25	3250
郭家庙 M8	蟠螭纹匜		3－○+1	——	铆式焊接	多个垫片	18.3	613
郭家庙 M25	垂鳞纹壶（器）		4－○+1	——	浑铸	顶见数个垫片，耳、腹之间设芯范	13.4	8850
其他	曾子尿簠		4－□+1	浑铸	榫式焊接	器表见气孔	26.9	
	曾伯霥簠		4－□+1	浑铸		耳失，残存榫式焊接的榫头	32.8	
	曾孙史夷簠		4－□+1	浑铸	榫式焊接		28.2	4860
	曾孟嬭谏盆	盖	3－○+1	——	——	铸造痕迹不甚明显。耳根见销孔	18.6	2014
		器	4－○+1	——	榫式焊接			

说明：1）铸造工艺项目中，足在簋类器中均指圈足下小足而言。

2）器名后括号中的数字表示器物的件数。

3）口径中，如若为方形器或匜，则指器口之长，数据单位为厘米。重量单位中，数据大于三位数，单位及精确度为克；数据小于两位数，单位及精确度为千克。

4）范型结构仅指器身相关范的数量及拼合情况，因此对于铭文和分铸的附件用范情况不包括在内。

附表 6　曾侯乙墓青铜器纹饰、铭文登记表

器类	器号	器名	位置关系	纹饰		铭文			
				类	名称	类	行/周	特征	件数
乐器	C65	楚王酓章镈钟	下层	铸	蟠龙纹	其他			1
		曾侯乙甬钟（45）	中、下层	铸/嵌	蟠龙纹/龙纹	Ⅳ	1		45
		纽钟（19）	上层	无		乐铭			19
	C53	曾侯乙磬架	中室	铸	云纹	Ⅴ	4		1
	C67	曾侯乙鼓座	中室	铸	蟠龙纹	Ⅳ	1		1
	E37	曾侯乙鹿角立鹤	东室	铸/嵌	云纹、蟠虺纹	Ⅴ	2	行款特别	1
食器	C96	曾侯乙镬鼎	中室	铸	蟠虺纹	Ⅴ	2	“侯”反书	1
	C155	曾侯乙鼎钩	鼎之耳旁	铸	云纹	Ⅴ	1	逆旋。“侯”反书、“作持”缺笔	2×1
	C97	曾侯乙镬鼎	两镬鼎并列	嵌	龙纹	Ⅴ	2	右行	1
	C154	曾侯乙鼎钩	鼎之耳旁	铸	云纹	Ⅴ	1	顺旋	2×1
	C183	曾侯乙匕	两件镬鼎上	铸	蟠虺纹	Ⅴ	4		1
	C166	曾侯乙炭炉	镬鼎旁	嵌	变形龙纹	Ⅴ	4		1
	C168	曾侯乙箕	炭炉内	铸	席文	Ⅴ	1		1
	C167	曾侯乙漏铲	炭炉内	嵌	变形龙纹	Ⅴ	1		1
	C87—95	曾侯乙升鼎（9）	中室	嵌	龙纹	Ⅴ	4		9
	C169	曾侯乙匕	升鼎内	嵌	变形龙纹	Ⅴ	1		1
	C98－101、104	曾侯乙牛纽盖鼎（5）	中室	嵌	变形龙纹	Ⅴ	2	器身铭文右行	2×5
	C149－153	曾侯乙鼎钩（5）	鼎盖上	铸	云纹	Ⅴ	1	逆旋	2×5
	C103	曾侯乙四纽盖鼎	镬鼎旁	嵌	变形龙纹	Ⅴ	2	“侯”缺笔	2×1
	C102	曾侯乙三纽盖鼎	镬鼎 C96 旁	铸	蟠螭纹	Ⅴ	2	笔画有增减	2×1
	C126	绳纹鬲	镬鼎旁	铸	绳纹	无			
	C156－164	曾侯乙鬲（9）	牛纽鼎旁	嵌	龙纹	Ⅴ	1	顺旋	9
	C171、241	曾侯乙匕（2）	鬲上	铸	云纹	Ⅴ	1		2
	C165	曾侯乙甗	中室	嵌	变形龙纹	无			
	C105－112	曾侯乙簋（8）	升鼎旁	嵌	龙纹	Ⅴ	2	盖铭顺旋一周	2×8
	C122－125	曾侯乙簠（4）	镬鼎旁	嵌	变形龙纹	Ⅴ	2		2×4

续附表6

器类	器号	器名	位置关系	纹饰		铭文			
				类	名称	类	行/周	特征	件数
食器	C195、196	曾侯乙浅盘豆（2）	中室	嵌	变形龙纹	V	2	一豆另外有阳文“曾”	2
	C194	曾侯乙盖豆	浅盘豆旁	嵌	变形龙纹	V	2	笔画有增减	2×1
	C113－121、136	曾侯乙鼎形器（10）	近于簋	嵌	变形龙纹	无			
	C172－181	素面匕（10）	鼎形器内	无		无			
酒器	N5、6	曾侯乙尊缶（2）	北室	铸	蟠螭纹/蟠虺纹	V	2	“侯”反书	2
	C132、133	曾侯乙联禁圆壶（2）	中室	铸	蟠螭纹	V	2	“侯”反书	2
	C135	铜禁	圆壶之下	铸	蟠虺纹	无			
	C182、184	曾侯乙提链壶（2）	镬鼎旁	嵌	变形龙纹	V	4		2
	C139、141	曾侯乙方鉴（2）	中室	铸	蟠虺纹	V	1	刻铭	2×2
	同上	曾侯乙方尊缶（2）	方鉴内	铸	蟠虺纹	V	1	刻铭	2
	C23	曾侯乙过滤器	鉴缶旁	无		Ⅳ	1	有反书	1
	C138、140	曾侯乙勺（2）	鉴缶上	铸	蟠虺纹	V	2		2
	C38	曾侯乙盘	中室	铸	蟠虺纹	V	1	逆旋。铸后改刻	1
	同上	曾侯乙尊	盘内	铸	蟠虺纹	V	1	錾铭	1
水器	C185	曾侯乙小口鼎	中室	嵌	龙纹	V	2	盖铭带阳格	2×1
	C186－189	曾侯乙盥缶（4）	中室	嵌	龙纹	V	2	顺旋	2×4
	C170	曾侯乙斗	盥缶上	嵌	变形龙纹	V	2		1
	C142	蟠虺纹匜鼎	炉盘旁	铸	蟠虺纹	无			
	C127、128	曾侯乙圆鉴（2）	中室	嵌	变形龙纹	V	2		2×2
	C148	曾侯乙三足盘	中室	嵌	龙纹	V	4		1
	C147	曾侯乙平底匜	盘内	嵌	龙纹	V	2		1
	C190	曾侯乙三足匜	盥缶旁	嵌	变形龙纹	V	2		1
	C191	曾侯乙钩形器	三足匜内	铸	蟠螭纹	V	1		1
日用品	C235、236	角形纽盖鼎（2）	食具箱内	铸	蟠虺纹	无			
	C237、238	素面盒（2）	食具箱内	无		无			
	C229	蟠虺纹罐	食具箱内	铸	蟠虺纹	无			
	C230	素面勺	食具箱内	无		无			
	C197	双层炉盘	浅盘豆旁	无		无			
	E4、94、109、138	蟠龙纹镇（4）	东室	铸	蟠龙纹	无			

续附表 6

器类	器号	器名	位置关系	纹饰		铭文			
				类	名称	类	行/周	特征	件数
日用品	E51	熏	东室	无		无			
	E3	镂空杯	东室	铸	蟠龙纹	无			
工具	E136、137、188、214	玉首削刀（4）	东室	无		无			
	EC11：98	玉首刻刀	东室	无		无			
	N41	木柄凿	北室	无		无			

说明：1）登记表不包括葬具所用青铜器如椁架；青铜兵器另见第二章；鼎钩的数量以对为单位计算。

2）纹饰类别中“铸”指铸造成形的纹饰，“嵌”指铸镶或镶嵌类纹饰。

3）铭文的分类情况，参考第四章。

附表7 第二阶段曾国青铜器铭文登记表（除曾侯乙墓青铜器铭文）

地点	器物	字数	位置	内容	特征	著录
季氏梁	陈公子仲庆簠	6－23＋2	器内底	陈公子仲/庆自作匡/簠，用祈眉/寿万年无/疆，子子孙孙永/寿用之		《集成》4597
	周王孙季怠戈	4－24	内尾两面	周王孙/季怠孔/臧元武，/元用戈		《集成》11309
	曾大工尹季怠戈	4－16	内尾两面	穆侯之子/西宫之孙，/曾大工尹/季怠之用		《集成》11365
80刘家崖	洛叔鼎	2－8	器内底	洛叔之行/鼎，永用之		《集成》2355
	盅鼎	2－8	器内底	盅之登鼎，/其永用之	右行	
	盜叔壶1	1－12	腹外壁	择厥吉日丁，盜叔尊壶，永用之	“叔”字为后侧加于旁，右行	《集成》9625
	盜叔壶2	2－13	腹外壁	择厥吉日丁，盜叔之尊/壶，永用之		《集成》9626
	盜叔戈	2－5	内尾	盜叔/之行戈		《集成》11067
罗山高店	曾子季兴臣簠1	2－8	内底	曾子季兴/臣之飤簠	右行	新出
	曾子季兴簠2	2－7	内底	曾子季兴/之飤簠	右行	新出
	曾季兴臣盘	3－24	内底一侧	唯正月初吉丁亥，曾/季兴臣铸其盥盘/以征以行，永用之，[illegible]	右行	新出
	曾兴臣匜	2－5	内底	曾兴臣/之铗		新出
	车戈	1－2	内部	车戈		新出
传世	曾□□簠	5－29＋2		唯正□初吉丁/亥，曾□□择/其吉金，自作饋/簠。其眉寿无/疆，子子孙孙永宝用之		《集成》4614
75刘家崖A	连迁盖鼎	1－5	腹内壁	连迁之御吉		《集成》2083
	连迁升鼎（3）	2－5	一耳内侧	连迁/之行升	右行	《集成》2084
76义地岗	敃鼎	1－4	盖、腹内壁	敃之行鼎		《集成》1990
	敃盏	2－6	盖、腹内壁	贶于敃/之行盏		《集成》4636
鲢鱼嘴	曾子原彝簠（器）	2－18	器内壁	唯正月初吉庚申，曾子/原彝为孟姬鄙铸媵簠		《集成》4573
	曾仲之孙戈	1－8	内部	曾仲之孙[illegible]虘用戈		《集成》11254

续附表 7

地点	器物	字数	位置	内容	特征	著录
传世	曾孙无谌鼎	4－18	腹内壁	曾孙无谌自/作飤鬵。眉寿/无疆，子孙/永宝用之		《集成》2606
汪家墩	曾孙定鼎	2－6	盖、腹内壁	曾孙定/之脰鼎		《近出》299
	曾都尹定簠（2）	2－7	盖、器内底	曾都尹定/之行簠		《近出》511
东风油库 M1	曾少宰黄仲鼎	2－9	盖、腹内壁	曾少宰黄/仲酉之行鼎	盖铭“仲”字在第一行	新出
	曾少宰黄仲甗	2－9	腹部内壁近一耳处	曾少宰黄/仲酉之行甗		新出
	曾少宰黄仲簠	2－9	盖、器内底	曾少宰黄仲/酉之行	盖铭“仲”字在第一行	新出
	曾少宰黄仲方壶	2－9	颈外长边	曾少宰黄/仲酉之行		新出
	曾少宰黄仲盘	2－9	内底	曾少宰黄/仲酉之行盥		新出
	曾少宰黄仲匜	2－9	内底	曾少宰黄仲/酉之行		新出
东风油库 M2	可簠	2－4	盖、器内底	可之/行		新出
	可方壶	2－4	颈内长边	可之/行	阳文	新出
	可盘	1－4	内底	可之行盘		新出
	可匜	1－4	内底	可之行		新出
东风油库 M3	曾仲姬壶	1－6	腹外壁	曾仲姬之壶	横行	新出
	曾侯郕鼎	2－6	盖、腹内壁	曾侯郕/之飤鼎		新出
收集	曾侯郕簠	2－5	器、盖内壁	曾侯郕/作時		《古文字研究》24
梁家老坟 M11	曾侯昃戈	3－6	援胡之间	曾侯/昃之/用戈	右行	《湖北出土文物精粹》
传世	曾侯昃戈	3－6	援胡之间	曾侯/昃之/用戈	右行	《东周鸟篆文字编》
淅川和尚岭 M1	曾太师鼎	1－7	盖内	曾太师奠之脰鼎	逆旋	《和尚岭与徐家岭楚墓》
淅川和尚岭 M2	曾仲郳君䏰方器座	1－8	座顶	曾仲郳君䏰之且（祖）埶	逆旋	《和尚岭与徐家岭楚墓》

续附表7

地点	器物	字数	位置	内容	特征	著录
淅川徐家岭M9	曾嫚嬇朱姬簠	2－8＋1	器、盖内底	穆穆曾嫚嬇/朱姬作		《和尚岭与徐家岭楚墓》
潢川高稻场	曾姬盘		内底	⧄夫人𦉜姬之盘		新出
六合程桥	曾子义行簠	3－15	器、盖内底	曾子义行自作飤簠，子孙其永保用之	盖铭漏“自”	《东南文化》1991年1期
传世	曾子遗簠（2）	2－6		曾子遗/之行簠		《集成》4488、4489
	曾子遗缶	6		曾子遗之行缶	顺旋	《集成》9996
	曾子⧄簠	4－20＋2	内底	唯正月初吉/丁亥，曾子⧄/自作飤簠。子子/孙孙永宝用之		《集成》4588
75刘家崖B	邵豆（2）	2－4	盖内壁	邵之/御盤		《集成》4660、4661
新都马家乡	邵鼎	2－4	盖内壁	邵之/飤鼎		《集成》1980
寿县李三孤堆	曾姬无卹方壶（2）	5－39	器口内壁	唯王廿二又六年，聖趄（桓）/之夫人曾姬无卹，望/安茲漾陵，蒿间之无/䭫（匹），用作宗彝尊壶。后/嗣用之，职在王室		《集成》9710、9711

说明：字数一栏中数字格式为：行数－字数＋重文数。

附表 8　第二阶段曾国青铜器容器铸造登记表

地点	器物		铸造工艺					口径/口长
			范型结构	足	耳/鋬	附件外范情况	其他	
季氏梁	蟠虺纹平盖鼎		3－○＋1	先铸	浑铸	足范左右对开	附耳与腹之间设芯范。浇口在中底。盖立纽为浑铸，桥形纽后铸接。多见垫片	25
	云纹甗	甑体	3－○＋1	——	浑铸	足与耳范左右对开	甑与鬲接口有卯式设计。鬲体一耳对一足，另一耳所对范缝曲行。浇口在底范范缝处	28.4
		鬲体	3－○＋1	先铸	先铸			13.2
	陈公子仲庆簠		4－□＋1	——	后铸	器、盖范型相同	多用垫片	30
八角楼	蟠虺纹盖鼎		3－○＋1	先铸	先铸	足范左右对开。耳外范二	纽先铸。多见垫片	18
	蟠虺纹盏		？－○＋1	榫焊	榫焊	足范左右对开	纽先铸、捉手榫焊。多见垫片	22
80 刘家崖	垂鳞纹升鼎（2）		3－○＋1	榫焊	浑铸	足范左右对开	附耳与腹之间设芯范。壁多有补铸	1:27
	素面鬲（4）		3－Y＋1	——	——		铸造痕迹不明显。腹内带范土，为明器	9.8
	盨叔壶（2）		2－○＋1	——		双耳失，只残留榫头	圈足内见浇不足现象。铸造不精	15
罗山高庙	垂鳞纹鼎		3－△＋1	浑铸	浑铸	耳与器壁之间设芯范		17.8
	曾子季奚簠（2）		4－□＋1		榫焊			31.7
	贯耳壶（2）		2－○＋1	——	浑铸		有补铸	11.5
	曾季奚臣盘		4－○＋1	——	浑铸	耳与器壁之间设芯范	浇口在器中底	34
	曾奚臣匜		？－○＋	——	铆式焊接		多见垫片	25
八角楼采集	蟠虺纹平盖鼎		3－○＋1	先铸	浑铸	足范型左右对开	附耳与腹之间设芯范。浇口在中底。盖立纽为浑铸，桥形纽后铸接。多见垫片	
75 刘家崖 A	连迁盖鼎（器）		4－○＋1	先铸	先铸	足范左右对开。耳外范 2。腹部环纽亦为先铸	一环纽对应第 3 足	21.6
	连迁升鼎（3）		3－○＋1	榫焊	榫焊	足范左右对开。耳外范 3，范缝在耳缘	腹部错范较多。耳、足各 3 个泥芯撑。腹部见浇不足	1:21.5

续附表 8

地点	器物	铸造工艺					口径/口长
		范型结构	足	耳/鋬	附件外范情况	其他	
76 义地岗	敃鼎	2－N＋1	先铸	先铸	足范左右对开。耳外范 3，范缝在耳缘	盖捉手先铸。腹有浇不足。足多见泥芯撑	13.7
	敃盉	？－○＋1	先铸	——	足范左右对开。盖与器 8 个纽均先铸	器壁腐蚀较甚。腹见二范缝，铸型不明	14.1
75 刘家崖 C	环带纹方壶（2）	2×2－□＋2	——	榫焊	伏兽下部为左右对开范	范缝对应背带纹。芯范、外范均水平分范。圈足处设泥芯撑。浇口在外底中间	15.1
其他	曾孙无谌鼎	4－○＋1	先铸	先铸	足范左右对开	足经补铸	29.2
	曾子原彝簠	4－□＋1	——	榫焊	耳范左右对开	多见垫片	30.6
汪家墓	曾孙定鼎	3－○＋1	先铸	先铸	足范左右对开。耳外范 3，范缝在耳缘。盖纽先铸	浇口在中底。足部有泥芯撑	21
	曾都尹定簠（2）	4－□＋1	——	浑铸		多处浇不足，有补铸痕迹	20.5
东风油库 M1	曾少宰黄仲鼎	3－○＋1	先铸	先铸	立纽先铸。足范对开		18.6
	曾少宰黄仲甗 甑体	3－○＋1	——	先铸	耳 2 外范，范缝在耳缘		18.1
	曾少宰黄仲甗 鬲体	3－○＋1	先铸	——	足范对开	足见泥芯撑	
	曾少宰黄仲簠	4－□＋1		浑铸		器、盖多见垫片	19.2
	曾少宰黄仲方壶	2－□＋1	——	——	纽浑铸	口、圈足镂孔与泥芯撑性质近似	10.1
	曾少宰黄仲盘	？	——	榫焊	足范对开	多见垫片	24.8
	曾少宰黄仲匜	4－○＋1	——	浑铸		芯范作椭圆形。浇口在外底	12.6
东风油库 M2	S 形纹鼎	3－△＋1	浑铸	浑铸		底部多见气孔。浇口在外底	20.6
	可簠	4－□＋1	——	浑铸		多处浇不足。多垫片	19.6
	可方壶	2－□＋1			纽浑铸	颈部和圈足多盲孔，近似泥芯撑	10.9
	可盘	？－○＋1	榫焊	榫焊	不明		22.4
	可匜		——	浑铸			12.2
东风油库 M3	曾侯郧鼎	3－○＋1	先铸	先铸	足范左右对开。耳外范 2，范缝在耳缘	浇口在中底	31
	曾仲姬壶						10.9

续附表 8

地点	器物	铸造工艺					口径/口长
		范型结构	足	耳/鋬	附件外范情况	其他	
其他	曾太师鼎	4－○＋1	先铸	先铸	足范左右对开		23.5
	曾子⧄簠	4－□＋1	——	榫焊?	耳失		
	曾嫚嬇朱姬簠	4－□＋1	——	榫焊	耳范左右对开		29.5
	曾子义行簠	4－□＋1	——	榫焊			
	曾侯郧簠	4－□＋1	——	榫焊			
	曾姬盘	4－○＋1	铆式焊接		足范左右对开	有补铸	39.2
曾侯乙墓	曾侯乙镬鼎（2）	3－○＋1	先铸	先铸	足范左右对开。耳外范3	器与足浇口分别在底范边缘以及足端	1：64.2
	曾侯乙牛纽盖鼎（5）	3－○＋1	先铸	先铸	足范左右对开。耳外范3。牛纽焊接	器与足浇口分别在底范范缝和足端	1：39.6
	曾侯乙四环纽盖鼎	3－○＋1	先铸	先铸	足范左右对开。耳外范3。环纽先铸	器与足浇口分别在底范范缝和足端	23.8
	曾侯乙三环纽盖鼎	3－○＋1	先铸	先铸	足范左右对开。耳外范3。环纽先铸	器与足浇口分别在底范范缝和足端	23.6
	曾侯乙升鼎（9）	3－○＋1	榫焊	榫焊	足范左右对开。耳外范3	爬兽焊接。器与足浇口分别在底缝和足端	46
	变形龙纹甗 甑体	3－○＋1	——	焊接	耳四外范。纽先铸		47.8
	变形龙纹甗 鬲体	3－△＋1	浑铸	——		底范延续至足跟。浇口在足端	
	绳纹鬲	3－△＋1	浑铸	——		底范延伸至足跟，浇口在足端	40.2
	曾侯乙鬲（9）	3－Y＋1	浑铸	——	扉棱浑铸	浇口3处在足端，浇口与范缝位置垂直。冒口在“Y”形底范合范处	15.55
	曾侯乙方座簋（8）	体3－○＋1 座4－□＋1	——	榫焊	耳范水平分范：兽首2范，兽尾2范，身3范	盖捉手莲瓣先铸	22.4
	曾侯乙簠（4）	4－□＋1	——	榫焊	耳范左右对开		31.4
	曾侯乙折盘豆（2）	1—N＋1	——	——	豆柄榫焊，外范左右对开	豆柄由芯处浇铅锡焊接豆盘	21.4

续附表 8

地点	器物	铸造工艺					口径/口长
		范型结构	足	耳/鋬	附件外范情况	其他	
曾侯乙墓	曾侯乙盖豆	? －N＋1	——	——	豆柄榫焊，外范左右对开	豆柄由芯处浇铅锡焊接豆盘	20.6
	曾侯乙鼎形器（10）	2－N＋1	先铸	——	足打磨，范型不明	器身范缝较明显	1：11.8
	曾侯乙尊缶（2）	2×4－○＋?	——	——	器纽先铸	水平分范，范缝在下腹三角形纹处	1：48.2
	曾侯乙联禁壶（2）				不明		1：33.8
	曾侯乙提链壶（2）	3－○＋1	——	——	腹侧鸟形环为榫焊	浇口在圈足	1：10.7
	曾侯乙方鉴（2）	4－□＋1	焊接	——	口部附饰和腹部爬兽均榫焊	颈与腹部之间可能水平分范	1：62.8
	曾侯乙方缶（2）	4－□＋1	——	——	纽先铸	口设榫头、圈足设榫眼与盖、鉴扣合	1：23.8
	曾侯乙盘						58
	曾侯乙尊	2－○＋1	——	——	多件附饰，多为分铸而后焊接	浇口在圈足底，冒口在腹外底	25
	曾侯乙小口鼎	3－○＋1	先铸	焊接	足范左右对开。环纽先铸	浇口在底范范缝，其缝较宽	25.7
	曾侯乙盥缶（4）	3－○＋1	——	榫焊	耳外范二，左右对开	两件为铸嵌红铜纹饰	1：25.2
	曾侯乙圆鉴（2）	3－○＋1	——	焊接	环纽先铸		44.6
	曾侯乙三足盘	3－○＋1	榫焊	先铸	耳3外范		41.6
	曾侯乙平底匜	2－○＋1	——	榫焊	鋬范左右对开		19.4
	曾侯乙三足匜	4－○＋1	先铸	榫焊	足、鋬范均左右对开		26.7
	角形纽盖鼎（2）	3－○＋1	先铸	先铸	足范左右对开。耳外范3。角形纽先铸	底范见“十”字形阳带	24.5
	蟠虺纹匜鼎	4－○＋1	先铸	——	足范左右对开。流上镂空部分、纽先铸		50.2
	双层炉盘	?	榫焊	焊接	足、上与下层盘均为焊接	多次补铸	39.2
	素面盒（2）	?	——	——			1：25

续附表 8

地点	器物		铸造工艺					口径/口长
			范型结构	足	耳/鋬	附件外范情况	其他	
曾侯乙墓	蟠虺纹罐		3－○＋1	——	——	纽先铸		12.2
擂鼓墩 M2	镬鼎		3－○＋1	先铸	先铸	足范左右对开。足、耳多见泥芯撑		53
	立牛盖鼎（4）		3－○＋1	先铸	先铸	足范左右对开。牛焊接		39.2
	卧牛盖鼎		4－○＋1	先铸	先铸	足前后分范	浇口在外底中部	27.23
	环纽鼎（2）		3－○＋1	先铸	先铸	足范左右对开。纽先铸		
	升鼎（9）		3－○＋1	榫焊	榫焊	足范左右对开。足、耳多见泥芯撑	浇口足在端部	35.6
	甗	甑体	2－○＋1	——	焊接			37.5
		鬲体	3－○＋1	浑铸	——		浇口在足端	
	绳纹鬲		3－△＋1	浑铸	——			25.2
	素面鬲（9）		3－△＋1	浑铸	——		浇口在三足内侧	9
			3－N＋1	浑铸	——		外范设在下腹一、上腹二	
	方座簋（8）		2－□＋1	——	榫焊	耳范左右对开	方座与器浑铸，范缝在方座两角	18.3
	簠（4）		4－□＋1	——	榫焊	耳范左右对开		36.5
	素面方豆		？－○＋1	——	——		器、把浑铸，器表经打磨	17.2
	素面折盘豆（2）		？－○＋1	——	——	把榫焊接器腹，把二外范对开	器表经打磨	19
	素面盆		3－○＋1	——	——			30
	方壶（2）		4－□＋1	——	榫焊	兽首榫焊至兽身，兽身外范左右对开	外范范缝在器四角	18
	圆壶（2）		？－○＋1	——	——		器表经打磨。浇口在外底中央	11
	方缶（2）		4－□＋1	——	——		器表经打磨。铸造较精致	15.4
	圆缶（2）		4－○＋1	——	——	纽先铸	范缝在四纽之间	17
	盥缶（2）		3－○＋1	——	榫焊	双耳外范左右对开。盖柱形捉手先铸	一条外范范缝与耳对应	22.5
	小口鼎							

续附表 8

地点	器物	铸造工艺					口径/口长
		范型结构	足	耳/鋬	附件外范情况	其他	
擂鼓墩 M2	炉	3－○＋1	先铸	榫焊	足左右对开外范	外底有“Y”形凸起阳带，浇口在中央	51.5
	素面盘	？－○＋1	——	——		器表经打磨。浇口在外底中央	33
	素面匜	？－○＋1	——	——			20.4
75 刘家崖 B	邵方豆	2－N＋1	——		四耳已失，残存榫头	豆柄失，盘底残存榫头。榫头斜侧见范缝	13.3
其他	邵鼎	3－○＋1	先铸	先铸			22
	曾姬无卹方壶	2×4－□＋1	——	榫焊	爬兽 3 外范，兽下部对开范，兽首面 1 范	沿背带纹顶部水平分范。纵向范缝与背带纹重合	21

说明：1）数据单位为厘米。不同器以编号并加冒号表示。

2）榫式焊接简称为榫焊。

附录一

曾国青铜器著录文献

一　发掘品（以年代为序）

湖北省博物馆：《湖北京山发现曾国铜器》，《文物》1972 年第 2 期。
鄂兵：《湖北随县发现曾国铜器》，《文物》1973 年第 5 期。
郑杰祥：《河南新野发现的曾国铜器》，《文物》1973 年第 5 期。
湖北省博物馆：《湖北枣阳县发现曾国墓葬》，《考古》1975 年第 4 期。
随县博物馆：《湖北随县城郊发现春秋墓葬和铜器》，《文物》1980 年第 1 期。
程欣人：《随县溳阳出土楚、曾、息青铜器》，《江汉考古》1980 年第 1 期。
四川省博物馆、新都县文物管理所：《四川新都战国木椁墓》，《文物》1981 年第 6 期。
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县安居出土青铜器》，《文物》1982 年第 12 期。
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县刘家崖发现古代青铜器》，《考古》1982 年第 2 期。
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县新发现古代青铜器》，《考古》1982 年第 2 期。
襄樊市文物管理处：《湖北襄樊拣选的商周青铜器》，《文物》1982 年第 9 期。
陈欣人、刘彬徽：《古盏小议》，《江汉考古》1983 年第 1 期。
田海峰：《湖北枣阳县又发现曾国铜器》，《江汉考古》1983 年第 3 期。
杨权喜：《江汉地区发现的商周青铜器——兼述楚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关系》，《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4 年。
徐正国：《枣阳东赵湖再次出土青铜器》，《江汉考古》1984 年第 4 期。
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县发现商周青铜器》，《考古》1984 年第 6 期。
左德田：《随州旭光砖瓦厂出土青铜器》，《江汉考古》1985 年第 1 期。
湖北省博物馆等：《湖北随州擂鼓墩二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85 年第 1 期。
随州市博物馆：《随州均川出土铭文青铜器》，《江汉考古》1986 年第 2 期。
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文物出版社，1989 年。
随州市博物馆：《随州东城区发现东周墓葬和青铜器》，《江汉考古》1989 年第 1 期。
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州市安居镇发现春秋曾国墓》，《江汉考古》1990 年第 1 期。
南京市博物馆、六合县文教局：《江苏六合程桥东周三号墓》，《东南文化》1991 年第 1 期。
黄锡全：《湖北出土商周文字辑证》，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 年。

随州市考古队：《湖北随州义地岗又出土青铜器》，《江汉考古》1994 年第 2 期。
《河南潢川春秋墓群发掘获初步成果》，《中国文物报》2000 年 1 月 16 日，总 774 期。
徐正国：《枣阳文物古迹录》，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 年。
左超：《关于曾国问题的补遗》，《楚文化研究论集》第五集，黄山书社，2003 年。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北随州市擂鼓墩墓群的勘查与试掘》，《考古》2003 年第 9 期。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淅川和尚岭与徐家岭楚墓》，大象出版社，2004 年。
襄樊市考古队等：《枣阳郭家庙曾国墓地》，科学出版社，2005 年。
湖北省博物馆：《湖北出土文物精粹》，文物出版社，2006 年。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曾国青铜器》，文物出版社，2007 年。
拓古、熊燕：《湖北随州市黄土坡周代墓的发掘》，《考古》2007 年第 8 期。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北随州义地岗墓地曾国墓 1994 年发掘简报》，《文物》2008 年第 2 期。

二 传世品与收集品（括号内为简称）

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初印于 1144 年。中华书局，1986 年。（《薛氏》）
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1804 年。（《积古》）
吴世芬：《捃（攈）古录金文》，1895 年。（《捃古》）
邹安：《周金文存》，1916 年，石印本。（《周存》）
方浚益：《缀遗斋彝器款识考释》，1935 年，石印本。（《缀遗》）
罗振玉：《贞松堂集古遗文》，1930 年，石印本。（《贞松》）
罗振玉：《贞松堂集古遗文补遗》，1931 年，石印本。（《贞补》）
容庚：《颂斋吉金图录》，考古学社专集第八种，1933 年。（《颂斋》）
容庚：《武英殿彝器图》，哈佛燕京学社，1934 年。（《武英殿》）
容庚：《善斋彝器图录》，哈佛燕京学社，1936 年。（《善斋》）
容庚：《颂斋吉金录续录》，考古学社专集第十四种，1938 年。（《颂续》）
容庚：《商周彝器通考》，哈佛燕京学社，1940 年。（《通考》）
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科学出版社，1957 年。（《大系》）
台北故宫、“中央”博物院联合管理处编：《故宫铜器图录》，中华丛书委员会，台北，1958 年。（《故铜》）
马承源：《记上海博物馆新收集的青铜器》，《文物》1964 年第 7 期。
蓝蔚：《武汉发现鄫伯鼎一件》，《文物》1965 年第 7 期。
曾昭岷、李谨：《曾国和曾国青铜器综考》，《江汉考古》1980 年第 1 期。
陈芳妹：《商周青铜酒器》，台北故宫博物院，1989 年。
马承源主编：《商周青铜器铭文选》第四卷，文物出版社，1990 年。
张光裕、曹锦炎：《东周鸟篆文字编》，翰墨轩出版有限公司，香港，1994 年。
曹锦炎：《鸟虫书通考》，上海书画出版社，1999 年。

中国历史博物馆保管部：《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捐赠文物集萃》，长城出版社，1999 年。（《国博》）
韩自强、刘海洋：《近年所见有铭铜器简述》，《古文字研究》第 24 辑，中华书局，2002 年。
陈佩芬：《夏商周青铜器研究·东周卷（上）》，世纪出版集团等，2004 年。（《夏商周》）

附录二

参考文献

一　中文文献

《虢国墓地再次出土大量大量珍贵文物》，《中国文物报》1991 年 1 月 6 日第 1 版。
《河南潢川春秋墓群发掘获初步成果》，《中国文物报》2000 年 1 月 16 日，总 774 期。
安徽大学等：《皖南商周青铜器》，文物出版社，2006 年。
安徽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安徽淮南市蔡家岗赵家孤堆战国墓》，《考古》1963 年第 4 期。
安徽省文物工作队：《安徽舒城九里墩春秋墓》，《考古学报》1982 年第 2 期。
安徽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安徽省博物馆：《寿县蔡侯墓出土遗物》，科学出版社，1956 年。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考古学与中国历史的重构——为纪念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成立五十周年而作》，《文物》2002 年第 7 期。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吉金铸国史——周原出土西周青铜器精粹》，文物出版社，2002 年。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等：《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二次发掘》，《文物》1994 年第 1 期。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等：《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四次发掘》，《文物》1994 年第 8 期。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等：《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第五次发掘》，《文物》1995 年第 7 期。
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商周考古》，文物出版社，1979 年。
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北京市新征集的商周青铜器》，《文物资料丛刊》第 2 辑，1978 年。
宾晖：《金文试释二则》，《江汉考古》1985 年第 1 期。又收录于刘彬徽《早期文明与楚文化研究》第 158－161 页，岳麓书社，2001 年。
曹锦炎：《程桥新出铜器考释及相关问题》，《东南文化》1991 年第 1 期。
曹锦炎：《鸟虫书通考》，上海书画出版社，1999 年。
曹玮：《从青铜器的演化试论西周前后期之交的礼制变化》，《周秦文化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 年。
曹玮：《关于晋侯墓随葬器用制度的思考》，《远望集上》，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 年。
曹玮：《东周时期的赗赙制度》，《考古与文物》2002 年 6 期。
曹玮：《西周时期的赗赙制度》，《商承祚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文物出版社，2003 年。
曹玮：《周原甲骨文》，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2 年。
曹玮：《周原出土青铜器》1－10 册，巴蜀书社，2005 年。

曹兆兰：《周代金文嵌姓的称谓结构模式》，《古文字研究》第24辑。

陈芳妹：《商后期青铜斧钺制的发展及其文化意义》，臧振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会议论文集之四·中国考古学与历史学之整合研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台北，1997年。

陈芳妹：《商周青铜粢盛器特展图录》，台北故宫博物院，1985年。

陈芳妹：《商周青铜酒器》，台北故宫博物院，1989年。

陈公柔：《“曾伯簠”铭中的“金道锡行”及相关问题》，《中国考古学论丛》，科学出版社，1993年。

陈梦家：《蔡器三论》，《考古》1963年第7期。

陈梦家：《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科学出版社，1962年。

陈梦家：《寿县蔡侯墓铜器》，《考古学报》1956年第2期。

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二）》，《考古学报》1955年第10册。

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六）》，《考古学报》1956年第4期。

陈盘：《春秋大事表列国爵姓及存灭表撰异》，“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9年。

陈佩芬：《夏商周青铜器研究·西周卷（下）》，世纪出版集团等，2004年。

陈佩芬：《夏商周青铜器研究·东周卷（上）》，世纪出版集团等，2004年。

陈佩芬：《新获两周青铜器》，《上海博物馆集刊》第8期，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年。

陈平：《〈秦子戈、矛考〉补议》，《考古与文物》1990年第1期。

陈平：《秦子戈、矛考》，《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2期。

陈千万等：《枣阳郭家庙曾国墓地出土铜器铸造工艺探析》，襄樊市考古队等《枣阳郭家庙曾国墓地》附录三，科学出版社，2005年。

陈伟：《淅川下寺二号墓及其相关问题》，《江汉考古》1983年第1期。

陈欣人、刘彬徽：《古盏小议》，《江汉考古》1983年第1期。

陈阳：《周原铸铜遗址所出陶范的初步研究》，《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打印本），2005年。

陈昭容：《从青铜器铭文看两周汉淮地区诸国婚姻关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七十五本第四分，2004年。

陈振裕、梁柱：《试论曾国与曾楚关系》，《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6期。

陈振裕：《中国先秦青铜钟的分区探索》，湖北省博物馆等《曾侯乙编钟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

程继林、吕继祥：《泰安城前村出土鲁侯铭文铜器》，《文物》1986年第4期。

程欣人：《随县涢阳出土楚、曾、息青铜器》，《江汉考古》1980年第1期。

楚皇城考古发掘队：《湖北宜城楚皇城勘察简报》，《考古》1980年第2期。

崔庆明等：《南阳市北郊出土一批申国青铜器》，《中原文物》1984年第4期。

大冶县文教局、文化馆：《湖北大冶罗桥出土商周铜器》，《文物资料丛刊》第5辑，1981年。

戴修正：《湖北石首出土商代青铜器》，《文物》2000年第11期。

丹羽崇史：《春秋战国时代青铜器生产体制复原的基础研究——铸造技术的地区比较》，湘鄂豫皖楚文化研究会第九次年会论文，打印稿，2005年。日本中国考古学会编《中国考古学》第6号，2006年。

鄂兵：《湖北随县发现曾国铜器》，《文物》1973 年第 5 期。
方酉生：《有关曾侯乙墓的几个问题》，《武汉大学学报（社哲版）》1981 年第 6 期。
高成林：《长沙市博物馆所藏一件深腹矮足鼎浅析》，《青年考古学家》（北京大学文物爱好者学会编辑）第 16 期，2004 年。
高成林：《淅川和尚岭楚墓的年代问题》，《中原文物》1996 年第 4 期。
高崇文：《东周楚式鼎形态分析》，《江汉考古》1983 年第 1 期。
高崇文：《两周时期铜壶的形态学研究》，俞伟超主编《考古类型学的理论与实践》，文物出版社，1989 年。
高明：《中原地区东周时代青铜礼器研究（上）》，《考古与文物》1981 年第 2 期。
高明：《中原地区东周时代青铜礼器研究（中）》，《考古与文物》1981 年第 3 期。
高明：《中原地区东周时代青铜礼器研究（下）》，《考古与文物》1981 年第 4 期。
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卷十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版。
故宫博物院：《故宫青铜器》，紫禁城出版社，1999 年。
顾颉刚编订：《崔东壁遗书·丰镐考信录》卷 7，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年。
顾铁符：《随国、曾侯的秘奥》，《楚文化新探》，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1 年。
郭宝钧：《关于戟之演变》，郭沫若《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附录二，科学出版社，1961 年。
郭宝均：《商周青铜器群综合研究》，文物出版社，1981 年。
郭德维：《随县曾侯乙墓的年代——与曾昭岷、李瑾同志商榷》，《武汉师范学院学报》1980 年第 1－2 期合刊本。
郭德维：《曾侯乙墓并非楚墓》，《江汉论坛》1980 年第 1 期。
郭德维：《戈戟之再辨》，《考古》1984 年第 12 期。
郭德维：《楚系墓葬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 年。
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 年。
郭沫若：《说戟》，《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科学出版社，1961 年。
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 年。
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地图集·湖北分册》，西安地图出版社，2002 年。
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精华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5 年。
国立故宫、中央博物院联合管理处编：《故宫铜器图录下册下编》，中华丛书委员会，台北，1958 年。
韩自强、刘海洋：《近年所见有铭铜器简述》，《古文字研究》第 24 辑，中华书局，2002 年。
韩自强：《阜阳亳州出土文物文字篇》，阜阳市博物馆等，2004 年。
郝本性：《虢、郑、秦、蔡、黄等国青铜器概述》，《中国青铜器全集（7）》，文物出版社，1998 年。
何浩：《楚国封君封邑地望续考》，《江汉考古》1991 年第 4 期。
何浩：《楚灭国方略述评》，《楚灭国研究》，武汉出版社，1989 年。
何琳仪：《战国文字通论（订补）》，江苏教育出版社，2003 年。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墓——战国中山国国王之墓》，文物出版社，1996 年。
河南博物院：《群雄逐鹿——两周中原列国文物瑰宝》，大象出版社，2003 年。

河南博物院等：《新郑郑公大墓青铜器》，大象出版社，2001 年。
河南博物院等：《辉县琉璃阁甲乙二墓》，大象出版社，2003 年。
河南省博物馆等：《河南新野古墓葬清理简报》，《文物资料丛刊》第 3 辑，1978 年。
河南省博物馆等：《河南信阳市发现平桥春秋墓发掘简报》，《文物》1981 年第 1 期。
河南省博物馆等：《河南信阳市平桥春秋墓发掘简报》，《文物》1981 年第 1 期。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门峡市文物工作队：《三门峡虢国墓（第一卷）》，文物出版社，1999 年。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郑郑国祭祀遗址》，大象出版社，2006 年。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河南桐柏月河墓地第二次发掘》，《文物》2005 年第 8 期。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淅川和尚岭与徐家岭楚墓》，大象出版社，2004 年。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平顶山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平顶山市北滍村两周墓地一号墓发掘简报》，《华夏考古》1988 年第 1 期。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淅川下寺春秋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 年。
河南信阳地区文管会、光山县文管会：《春秋早期黄君孟夫妇墓发掘报告》，《考古》1984 年第 4 期。
胡厚宣主编：《甲骨文合集释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年。
胡家喜等：《盘龙城遗址青铜器铸造工艺探讨》，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盘龙城》附录七，文物出版社，2001 年。
胡小石：《古文变迁论》，《胡小石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
湖北省博物馆：《湖北京山发现曾国铜器》，《文物》1972 年第 2 期。
湖北省博物馆：《湖北枝江百里洲发现春秋铜器》，《文物》1972 年第 3 期。
湖北省博物馆：《湖北枣阳县发现曾国墓葬》，《考古》1975 年第 4 期。
湖北省博物馆：《襄阳山湾东周墓葬发掘报告》，《江汉考古》1983 年第 2 期。
湖北省博物馆：《襄阳蔡坡战国墓发掘报告》，《江汉考古》1985 年第 1 期。
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文物出版社，1989 年。
湖北省博物馆：《图说楚文化——恢诡谲怪　惊采绝艳》，湖北美术出版社，2006 年。
湖北省博物馆：《湖北出土文物精粹》，文物出版社，2006 年。
湖北省博物馆等：《湖北随州擂鼓墩二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85 年第 1 期。
湖北省博物馆等：《曾侯乙编钟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1992 年。
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 年。
湖北省荆州博物馆：《荆州天星观二号楚墓》，文物出版社，2003 年。
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天星观 1 号楚墓》，《考古学报》1982 年第 1 期。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九店东周墓》，科学出版社，1995 年。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望山沙冢楚墓》，文物出版社，1996 年。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麻城市李家湾春秋楚墓》，《考古》2000 年第 5 期。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枣阳市九连墩楚墓》，《考古》2003 年第 7 期。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曾国青铜器》，文物出版社，2007 年。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北随州市擂鼓墩墓群的勘查与试掘》，《考古》2003 年第 9 期。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襄阳王坡东周秦汉墓》，科学出版社，2005 年。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北随州义地岗墓地曾国墓 1994 年发掘简报》，《文物》2008 年第 2 期。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北郧县乔家院春秋殉人墓》，《考古》2008 年第 4 期。
湖北宜昌地区博物馆等：《当阳赵家湖楚墓》，文物出版社，1992 年。
华觉明、郭德维：《曾侯乙墓青铜器群铸焊技术和失腊法》，《文物》1979 年第 7 期。
华觉明：《中国古代金属技术——铜和铁造就的文明》，大象出版社，1999 年。
华觉明等：《中国失蜡法的研究、鉴定和著述记略》，《中国文物报》2006 年 9 月 15 日第 7 版。
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1957 年河南陕县发掘简报》，《考古》1958 年第 11 期。
黄克映、李京华：《淅川和尚岭、徐家岭楚墓青铜器铸造技术》，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淅川和尚岭与徐家岭楚墓》附录二，大象出版社，2004 年。
黄盛璋：《关于鄂君启节交通路线的复原问题》，《中华文史论丛（五辑）》，中华书局，1964 年 6 月。
黄盛璋：《山东诸小国铜器研究·鄫（上曾）国》，《华夏考古》1989 年第 1 期。
黄盛璋：《淮夷新考》，《文物研究》第 5 辑，1989 年。
黄锡全：《楚器铭文中“楚子某”之称谓问题辨正》，《江汉考古》1986 年第 4 期。
黄锡全：《楚系文字略论》，《华夏考古》1990 年第 3 期。
黄锡全：《湖北出土商周文字辑证》，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 年。
黄锡全：《枣阳郭家庙曾国墓地出土铜器铭文考释》，《枣阳郭家庙曾国墓地》附录一，科学出版社，2005 年。
济青公路文物考古队：《山东临淄后李遗址第一、二次发掘简报》，《考古》1992 年第 11 期。
贾云福等：《曾侯乙墓青铜器红铜纹饰铸镶法的研究》，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附录 12，文物出版社，1989 年。
江鸿：《盘龙城与商朝的南土》，《文物》1976 年第 2 期。收入李学勤《新出青铜器研究》，文物出版社，1990 年。
江苏省丹徒考古队：《江苏丹徒北山顶春秋墓发掘报告》，《东南文化》1988 年第 3、4 期。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新干商代大墓》，文物出版社，1997 年。
金则恭：《湖南东周时期铜戈的分期及有关问题》，《湖南考古辑刊》第 2 辑，1984。
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岳山大队出土一批春秋青铜器》，《文物》1982 年第 10 期。
荆州地区博物馆：《湖北公安石子滩春秋遗址及墓葬》，《文物》1993 年第 3 期。
孔令远、陈永清：《江苏邳州市九女墩三号墩的发掘》，《考古》2002 年第 5 期。
蓝蔚：《武汉发现鄫伯鼎一件》，《文物》1965 年第 7 期。
雷德侯著、张总等译：《万物——中国艺术中的模件化和规模化生产》，三联书店，2005 年。
李伯谦：《试论吴城文化》，《文物季刊（3）》，文物出版社，1981 年 3 月。
李伯谦：《中国青铜文化的发展阶段和分区系统》，《华夏考古》1990 年第 2 期。收入李伯谦《中国青铜文化结构体系研究》，科学出版社，1998 年月。
李伯谦：《天马—曲村遗址发掘与晋国始封地的推定》，《迎接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考古学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98 年。

李伯谦：《晋侯墓地发掘与研究》，上海博物馆编《晋侯墓地出土青铜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书画出版社，2002 年。

李步青：《山东莱阳县出土己国铜器》，《文物》1983 年第 9 期。

李丰：《黄河流域西周墓葬出土青铜礼器的分期与年代》，《考古学报》1988 年第 4 期。

李丰：《虢国墓地铜器群的分期及其相关问题》，《考古》1988 年第 11 期。

李峰：《西周金文中的郑地和郑国东迁》，《文物》2006 年第 9 期。

李国梁：《从青铜兵器看屯溪八墓的时代》，《吴越地区青铜器研究论文集》，两木出版社，1997 年。

李国梁主编：《屯溪土墩幕发掘报告》，安徽人民出版社，2006 年。

李家浩：《从曾姬无卹壶铭文谈楚灭曾的年代》，《文史》第 33 辑，中华书局，1990 年。

李京华：《中原古代冶金技术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 年。

李京华：《包山楚墓青铜器制造技术的初步考察》，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 年。

李京华：《淅川和尚岭楚国青铜器与编钟的铸造技术》，《中原古代冶金技术研究》（第二集），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 年。

李零：《“楚叔之孙倗”究竟是谁——楚淅川下寺二号墓之墓主和年代问题的讨论》，《中原文物》1981 年第 4 期。

李零：《楚鼎图说》，《文物天地》1995 年第 6 期。

李零：《再论淅川下寺楚墓》，《文物》1996 年第 1 期。

李零：《论楚国铜器的类型》，《出山与入塞》，文物出版社，2004 年。

李零：《论中国的有翼神兽》，《出山与入塞》，文物出版社，2004 年。

李敏生：《淅川下寺春秋楚墓部分金属成分测定》，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淅川下寺春秋楚墓》附录三，文物出版社，1991 年。

李琴、杨式昭：《辉县甲乙二墓出土青铜器》，河南博物院等《辉县琉璃阁甲乙二墓》，大象出版社，2003 年。

李先登：《曾国铜器的初步分析》，《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6 年第 9 期。

李学勤：《战国题铭概述》（上），《文物》1959 年第 7 期。

李学勤：《战国题铭概述》（下），《文物》1959 年第 9 期。

李学勤：《曾国之谜》，《光明日报》1978 年 10 月 4 日。后收入《新出青铜器研究》，文物出版社，1990 年。

李学勤：《论汉淮间的春秋青铜器》，《文物》1980 年第 1 期。

李学勤等：《笔谈〈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文物展览〉》，《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总 2 期，1980 年。

李学勤：《试论山东新出青铜器的意义》，《文物》1983 年 12 期。后收入《新出青铜器研究》，文物出版社，1990 年。

李学勤：《论仲禹父簋与申国》，《中原文物》1984 年第 4 期。

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文物出版社，1984 年。

李学勤：《光山黄国墓的几个问题》，《考古与文物》1985 年第 2 期。

李学勤:《论长安花园村两墓青铜器》,《文物》1986 年第 1 期。
李学勤:《非中原地区青铜器研究的几个问题》,《东南文化》1988 年第 5 期。
李学勤:《盘龙城与商朝的南土》,《新出青铜器研究》,文物出版社,1990 年。
李学勤:《兮甲盘与驹父盨》,《新出青铜器研究》,文物出版社,1990 年。
李学勤:《西周时期的诸侯国青铜器》,《新出青铜器研究》,文物出版社,1990 年。
李学勤:《新出青铜器研究》,文物出版社,1990 年。
李学勤:《续论曾国之谜》,《楚学论丛——江汉论坛专刊》1990 年 9 月。
李学勤:《三门峡虢墓新发现与虢国史》,《中国文物报》1991 年 2 月 3 日第 3 版。
李学勤:《先秦人名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1991 年第 5 期。
李学勤等:《欧洲所藏中国青铜器遗珠》,文物出版社,1995 年。
李学勤:《试论楚公逆编钟》,《文物》1995 年第 2 期。
李学勤:《春秋南方青铜器铭文的一个特点》,《吴越地区青铜器研究论文集》,两木出版社,1997。
李学勤:《楚青铜器与楚文化》,《缀古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
李学勤:《戎生编钟铭文考释》,《保利藏金——保利艺术博物馆精品选》,岭南美术出版社,1999 年。
李学勤:《“秦子”新释》,《文博》2003 年第 5 期。
李学勤:《长子、中子和别子》,《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年。
李元芝等:《许公宁透空蟠虺纹青铜饰件——先秦失蜡法之一器例》,《中原文物》2007 年第 1 期。
李志伟:《有关曾侯乙尊盘铸造方法的证明——与 < 中国青铜时代不存在失蜡法铸造工艺 > 文之商榷》,《中国先秦史》(网络版)2006 年 7 月 10 日。
李志伟:《曾侯乙墓编钟及尊、尊座铸造方法新探——兼论先秦青铜铸造工艺》,《楚史论丛》,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 年。
林留根:《论中国墓葬封土之源流》,《东南文化》1996 年第 4 期。
林寿晋:《〈上村岭虢国墓地〉补记》,《考古》1961 年第 9 期。
林沄:《周代用鼎制度商榷》,《林沄学术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 年。
临朐县文化馆等:《山东临朐发现齐、鄩、曾诸国铜器》,《文物》1983 年第 12 期。
刘彬徽:《随州擂鼓墩二号墓青铜器初论》,《文物》1985 年第 1 期。
刘彬徽:《楚国青铜礼器初步研究》,《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5 年。
刘彬徽:《湖北出土两周金文国别年代考述》,《古文字研究》第 13 辑,中华书局,1986 年。
刘彬徽:《楚系铜器略论》,《楚文化研究论集》第 1 集,荆楚书社,1987 年。
刘彬徽:《曾侯乙墓青铜礼器初步研究》,《湖北省考古学会论文选集》1988 年第 1 期。
刘彬徽:《楚系青铜器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 年。
刘彬徽:《山东地区东周青铜器研究》,《中国考古学会第九次年会论文集·1993》,文物出版社,1997 年。
刘彬徽:《早期文明与楚文化研究》,岳麓书社,2001 年。
刘彬徽等:《曾国灭亡年代小考》,《江汉考古》1984 年第 4 期。
刘彬徽等:《包山二号楚墓简牍释文与考释》,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包山楚墓》,文物出版社,

1991 年。
刘彬徽、王世振：《曾国灭亡年代小考》，《江汉考古》1984 年第 4 期。
刘节：《寿县所出楚铜器考释》，《古史考存》第 108－140 页，人民出版社，1958 年。
刘先枚：《“曾国之谜”的猜想》，《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 年第 1 期。
刘翔：《论黄君孟铜器群》，《江汉考古》1988 年第 4 期。
刘翔：《周夷王经营南淮夷及其与鄂国之关系》，《江汉考古》1983 年第 3 期。
罗森：《古代中国的青铜礼器——来自商代和西周时期的墓葬与窖藏的例证》，《中国古代的艺术与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年。
罗森：《是政治家，还是野蛮人？——从青铜器看西周》，《中国古代的艺术与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年。
罗森：《西周青铜冶铸技术的革命及其对各地铸造业的影响》，《中国古代的艺术与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年。
罗振玉：《三代吉金文存》，中华书局，1983 年。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1975－1979 年洛阳北窑西周铸铜遗址的发掘》，《考古》1983 年第 5 期。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北窑西周墓》，文物出版社，1999 年。
马承源：《记上海博物馆新收集的青铜器》，《文物》1964 年第 7 期。
马承源：《商周青铜器纹饰综述》，上海博物馆青铜器研究组《商周青铜器文饰》，文物出版社，1984 年。
马承源：《虢国大墓参观记》，《中国文物报》1991 年 3 月 3 日第 3 版。
马承源：《戎生钟铭文的探讨》，《保利藏金——保利艺术博物馆精品选》，岭南美术出版社，1999 年。收入马承源《中国青铜器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
马承源：《中国古代的青铜艺术》，《中国青铜器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
马承源：《陕西眉县出土窖藏青铜器笔谈》，《文物》2003 年第 6 期。
马承源主编：《商周青铜器铭文选》，文物出版社，1990 年。
马承源主编：《中国青铜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年。
［法］麦里筱：《彝鼎套语程式与春秋铜器铭文释读举隅》，中国文物学会等编《商承祚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文物出版社，2003 年。
莫楚屏、李天元：《曾侯乙墓人骨研究》，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附录四，文物出版社，1989 年。
牟永抗：《绍兴 306 号越墓刍议》，《文物》1984 年第 1 期。
南京市博物馆、六合县文教局：《江苏六合程桥东周三号墓》，《东南文化》1991 年第 1 期。
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南京浦口出土一批青铜器》，《文物》1980 年第 8 期。
南阳市文物工作队：《南阳市西关三座春秋楚墓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92 年第 2 期。
南阳市文物研究所等：《桐柏月河一号春秋墓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97 年第 4 期。
齐文涛：《概述近年来山东出土的商周青铜器》，《文物》1972 年第 5 期。
青阳县文物管理所：《安徽青阳县龙岗春秋墓的发掘》，《考古》1998 年第 2 期。
裘锡圭：《戎生编钟铭文考释》，《保利藏金》，岭南美术出版社，1999 年。

裘锡圭：《谈谈随县曾侯乙墓的文字材料》，《文物》1979 年第 7 期。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2005 年。
屈万里：《曾伯簠考释》，《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三十三本，台北，1962 年。
饶宗颐：《谈盛君簠——随州擂鼓墩文物展侧记》，《江汉考古》1985 年第 1 期。
任伟：《〈无匹壶〉的定名及江汉曾国的族姓问题》，《文博》2002 年第 1 期。
任伟：《曾、随之谜试解》，《华夏文明的形成与发展——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建所五十周年庆祝会暨华夏文明的形成与发展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大象出版社，2003 年。
任相宏：《山东沂源县姑子坪周代遗存相关问题探讨》，《《考古》2003 年第 1 期。
容庚：《颂斋吉金录续录》，考古学社专集第十四种，1938 年。
容庚：《武英殿彝器图录》，哈佛燕京学社，1934 年。
容庚：《商周彝器通考》，哈佛燕京学社，1941 年。
容庚、张维持：《殷周青铜器通论》，文物出版社，1984 年。
山东大学考古系等：《山东沂源县姑子坪周代墓葬》，《考古》2003 年第 1 期。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曲阜鲁国故城》，齐鲁书社，1982 年。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山东沂水刘家店子春秋墓发掘简报》，《文物》1984 年第 9 期。
山西考古研究所等：《太原晋国赵卿墓》，文物出版社，1996 年。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山西省潞城县潞河战国墓》，《文物》1986 年第 6 期。
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山西长治分水岭战国墓第二次发掘》，《考古》1964 年第 3 期。
陕西省博物馆：《三秦瑰宝——陕西新发现文物精华》，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 年。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陕西眉县杨家村西周青铜器窖藏发掘简报》，《文物》2003 年第 6 期。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编：《陕西出土商周青铜器》（三），文物出版社，1980 年。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西周镐京附件部分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86 年第 1 期。
上海博物馆：《晋国奇珍——山西晋侯墓群出土文物精品》，上海美术出版社，2002 年。
上海博物馆青铜器研究组：《商周青铜器文饰》，文物出版社，1984 年。
邵学海：《历史不是橡皮泥——对“佛像入楚”再质疑》，楚文化研究会《楚文化研究论集》，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 年。
石泉：《古代曾国——随国地望初探》，《古代荆楚地理新探》，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 年。
时学颜：《有关曾国遗物所表现的文化性质》，《江汉考古》1985 年第 3 期。
舒之梅、刘彬徽：《从近年出土曾器看楚文化对曾的影响》，《楚史研究专辑》第一期，武汉师范学院学报 1982 年。又见《楚史论丛》，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 年。
舒之梅、刘彬徽：《论汉东曾国为土著姬姓随国》，《江汉论坛》1982 年第 1 期。
四川省博物馆、新都县文物管理所：《四川新都战国木椁墓》，《文物》1981 年第 6 期。
松丸道雄：《西周青铜器制作的背景——周金文研究序章》，樋口隆康主编、蔡凤书翻译《日本考古学研究者·中国考古学研究论文集》，东方书店，1990 年，香港。
宋少华：《长沙出土商、春秋青铜器》，《湖南博物馆文集》，岳麓书社，1991 年。
宋新潮：《骊山之役及平王东迁历史考述》，《人文杂志》1989 年第 4 期。

苏秉琦：《从楚文化探索中提出的问题》，《江汉考古》1982 年 1 期。
苏荣誉等：《新干商代大墓青铜器铸造工艺研究》，江西省博物馆等《新干商代大墓》附录九，文物出版社，1997 年。
苏荣誉等：《中国上古金属技术》，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 年。
随县博物馆：《湖北随县城郊发现春秋墓葬和铜器》，《文物》1980 年第 1 期。
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县刘家崖发现古代青铜器》，《考古》1982 年第 2 期。
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县新发现古代青铜器》，《考古》1982 年第 2 期。
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县安居出土青铜器》，《文物》1982 年第 12 期。
随州市博物馆：《随州擂鼓墩砖瓦厂十三号墓发掘简报》，《江汉考古》1984 年第 3 期。
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县发现商周青铜器》，《考古》1984 年第 6 期。
随州市博物馆：《随州均川出土铭文青铜器》，《江汉考古》1986 年第 2 期。
随州市博物馆：《随州东城区发现东周墓葬和青铜器》，《江汉考古》1989 年第 1 期。
随州市博物馆：《湖北随州出土西周青铜镈》，《文物》1998 年第 10 期。
随州市考古队：《湖北随州义地岗又出土青铜器》，《江汉考古》1994 年第 2 期。
孙华：《关于晋侯对组墓的几个问题》，《文物》1995 年第 9 期。
孙华：《周代前期的周人墓地》，《远望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华诞四十周年纪念文集》，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 年。
孙华：《中原青铜文化系统的几个问题》，许倬云、张忠培主编《中国考古学的跨世纪反思》下册，商务印书馆，1999 年。
孙华：《中国青铜文化体系的几个问题》，《考古学研究（五）》，科学出版社，2002 年。
孙敬明等：《山东临朐新出铜器铭文考释与有关问题》，《文物》1983 年第 12 期。
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晋国赵卿墓》，文物出版社，2004 年。
谭德睿等：《吴越青铜技术考察报告（之一）》，《吴越地区青铜器研究论文集》，两木出版社，1997 年。
谭德睿：《中国早期失蜡铸造问题的考察与思考》，《南方文物》2007 年第 2 期。
谭维四：《20 世纪中国文物考古发现与研究丛书·曾侯乙墓》，文物出版社，2001 年。
谭维四等：《湖北出土文物精华》，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 年。
汤文兴：《淅川下寺一号墓青铜器的铸造技术》，《考古》1981 年第 2 期。
唐兰：《寿县所出铜器考略》，《国学季刊》四卷一期，1944 年。
唐继根：《中商文化研究》，《考古学报》1999 年第 4 期。
田海峰：《湖北枣阳县又发现曾国铜器》，《江汉考古》1983 年第 3 期。
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年。
拓古：《望城高砂脊与酉族》，《江汉考古》2001 年第 3 期。
拓古、熊燕：《湖北随州市黄土坡周代墓的发掘》，《考古》2007 年第 8 期。
万家保：《辉县及汲县出土东周时期青铜鼎形器的铸造及合金研究》，《大陆杂志》第五十卷第六期，1975 年。

万家保：《毛公鼎的铸造及相关问题》，《大陆杂志》第六十卷第四期，1980 年 4 月。

万家保：《试论中国古代青铜器的连接方法——中西古代金属技术发展比较之二》，《大陆杂志》第六十四卷第六期，1982 年。

王长丰：《束、亚束方国氏族徽源流考》，《文物研究》第 14 辑，2005 年。

王恩田：《上曾太子鼎的国别及其相关问题》，《江汉考古》1995 年第 2 期。

王光镐：《楚史源流新证》，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 年。

王辉：《关于秦子戈、矛的几个问题》，《考古与文物》1986 年第 6 期。

王辉：《读〈“秦子戈、矛考”补议〉书后》，《考古与文物》1990 年第 1 期。

王然、丁兰：《麻城李家湾楚墓考析》，《江汉考古》2000 年第 4 期。

王儒林：《河南桐柏发现周代铜器》，《考古》1965 年第 7 期。

王善才、黄建勋：《随州市师范学校战国墓群》，《中国考古学年鉴 1989》，文物出版社，1990 年。

王世民：《西周春秋金文中的诸侯爵称》，《历史研究》1983 年第 3 期。

王世民：《关于西周春秋高级贵族礼器制度的一些看法》，文物出版社编辑部《文物出版社成立三十周年纪念文物与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6 年。

王世民：《西周时期诸侯方国青铜器概述》，《中国青铜器全集（6）》，文物出版社，1997 年。

王世民等：《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文物出版社，1999 年。

王育成：《从两周金文探讨妇名" 称国" 规律》，《江汉考古》1982 年第 1 期。

王子初：《郑国祭祀遗址出土编钟的考察和研究》，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郑郑国祭祀遗址》附录一，大象出版社，2006 年。

巫鸿：《“明器”的理论和实践——战国时期礼仪美术中的观念化倾向》，《文物》2006 年第 6 期。

吴坤仪：《当阳赵家湖楚墓铜器铸造工艺》，湖北省宜昌地区博物馆等《当阳赵家湖楚墓》附录二，文物出版社，1992 年。

吴坤仪：《太原晋国赵卿墓青铜器制作技术》，山西考古研究所等《太原晋国赵卿墓》附录四，文物出版社，1996 年。

吴坤仪等：《虢国墓地出土青铜器铸造工艺分析与研究》，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三门峡虢国墓（第一卷）》，文物出版社，1999 年。

吴其昌：《金文历朔疏证》，上海商务出版社，1936 年。又版于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 年。

吴晓筠：《商至春秋时期中原地区青铜车马器形式研究》，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等编《古代文明》第 1 卷，文物出版社，2002 年。

吴郁芳：《擂鼓墩二号墓簋铭“盛君”小考》，《文物》1986 年第 2 期。

吴镇烽：《金文人名研究》，《周秦文化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 年。

武汉大学荆楚史地与考古教研室：《随州安居遗址初次调查报告》，《江汉考古》1984 年第 4 期。

武汉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等：《西花园与庙台子》，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 年。

夏渌等：《楚子超鼎浅释》，《江汉考古》1983 年第 1 期。

夏志峰：《新郑器群三考》，河南博物院等《新郑郑公大墓青铜器》，大象出版社，2001 年。

襄樊市博物馆：《湖北谷城、枣阳出土周代青铜器》，《考古》1987 年第 5 期。

襄樊市博物馆：《湖北枣阳毛狗洞遗址调查》，《江汉考古》1988 年第 3 期。
襄樊市考古队等：《枣阳郭家庙曾国墓地》，科学出版社，2005 年。
襄樊市博物馆、谷城县文化馆：《襄樊市、谷城县馆藏青铜器》，《文物》1986 年第 4 期。
襄樊市文物管理处：《湖北襄樊拣选的商周青铜器》，《文物》1982 年第 9 期。
信阳地区文管会：《河南信阳发现两批春秋铜器》，《文物》1980 年第 1 期。
信阳地区文管会等：《罗山县高店公社又发现一批春秋时期青铜器》，《中原文物》1981 年第 4 期。
信阳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光山县文物管理委员会：《河南光山春秋黄季佗父墓发掘简报》，《考古》1989 年第 1 期。
信阳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等：《河南信阳市平桥五号春秋墓发掘简报》，《考古》1989 年第 1 期。
熊北生、李广安：《湖北谷城过山出土春秋有铭铜盏》，《文物》2002 年第 1 期。
熊学兵：《京山发现一批西周铜器》，《江汉考古》1983 年第 1 期。
徐俊英：《南阳征集“楚子弃疾簠”》，《中国文物报》1989 年 5 月 26 日。
徐少华：《曾即随及其历史渊源》，《江汉论坛》1986 年第 4 期。
徐少华：《周代南土历史地理与文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 年。
徐少华：《陈国铜器及其历史地理与文化综论》，《江汉考古》1995 年第 2 期。
徐少华：《论近年出土的几件春秋有铭邓器》，《古文字研究》第 25 辑，中华书局，2004 年。
徐天进：《日本出光美术馆收藏的静方鼎》，《文物》1998 年第 5 期。
徐天进：《晋侯墓地的发现及研究现状》，《晋侯墓地出土青铜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书画出版社，2002 年。
徐天进：《周公庙遗址的考古所获及所思》，《文物》2006 年第 8 期。
徐扬杰：《关于曾侯问题的一点看法》，《江汉论坛》1979 年第 3 期。
徐正国：《枣阳东赵湖再次出土青铜器》，《江汉考古》1984 年第 4 期。
徐正国：《湖北枣阳发现一件商代铜尊》，《文物》1990 年 6 期。
徐正国：《湖北枣阳市博物馆收藏的几件青铜器》，《文物》1994 年 4 月。
徐正国：《枣阳文物古迹录》，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 年。
徐中舒主编：《甲骨文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1990 年。
许杰：《晋侯墓地中南排晋侯墓的早晚系列及其相关问题》，上海博物馆编《晋侯墓地出土青铜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书画出版社，2002 年。
烟台市博物馆等：《海阳嘴子前》，齐鲁书社，2002 年。
杨宝成：《试论曾国铜器的分期》，《中原文物》1991 年第 4 期。
杨宝成：《试论随枣地区的两周铜器》，《中国考古学会第七次年会论文集·1989》，文物出版社，1992 年。
杨泓：《中国古代的戟》，《中国古兵器论丛（增订本）》，文物出版社，1986 年。
杨宽、钱林书：《曾侯之谜试探》，《复旦大学学报（社哲版）》1980 年第 3 期。
杨宽：《西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年。
杨美莉：《玉戈的研究》（下），《故宫学术季刊》第十六卷第二期，1998 年。

杨平：《西周中胡二穿戈》，《中国文物报》1994 年 5 月 22 日第 3 版。
杨权喜：《江汉地区发现的商周青铜器——兼述楚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关系》，《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4 年 4 月。
杨深富：《山东日照崮河崖出土一批青铜器》，《考古》1984 年第 7 期。
杨树达：《积微居金文说》（增订本），中华书局，1997 年。
杨新、张临生：《国宝荟萃·北京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品精华》，商务印书馆，香港，1992 年。
姚孝遂主编：《殷墟甲骨刻辞类纂》，中华书局，1989 年。
姚政：《古曾国考》，《南充师范学院学报》1980 年第 4 期。
叶植：《楚式鼎刍议》，《江汉考古》1991 年第 4 期。
叶植：《襄樊市文物史迹普查实录》，今日中国出版社，1995 年。
殷涤非：《安徽屯溪周墓二次发掘》，《考古》1990 年第 3 期。
殷伟璋、曹淑琴：《周初太保器综合研究》，《考古学报》1991 年第 1 期。
尹俊敏：《南阳出土的彭伯壶》，《文物》1997 年第 12 期。
应山县文化观文物组：《湖北应山吴店古墓葬清理简报》，《文物》1989 年第 3 期。
于豪亮：《为什么随县出土曾侯墓》，《古文字研究》第一辑，中华书局，1979 年。
于省吾：《甲骨文字诂林·释》，中华书局，1979 年。
余从新：《安陆馆藏的几件青铜器》，《江汉考古》1984 年第 2 期。
俞伟超：《上村岭虢国墓地新发现及其相关问题》，《中国文物报》1991 年 2 月 3 日第 3 版。
俞伟超：《长江流域青铜文化发展背景的新思考》，《古史的考古学探索》，文物出版社，2002 年。
俞伟超：《考古学中的汉文化问题》，《古史的考古学探索》，文物出版社，2002 年。
俞伟超、高明：《周代用鼎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学报（社哲版）》1978 年第 1 期。
岳阳市文物工作队：《湖南省岳阳县凤形嘴山一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93 年第 1 期。
郧县博物馆：《湖北肖家河发现春秋唐国青铜器》，《江汉考古》2003 年第 1 期。
郧阳地区博物馆：《湖北郧县肖家河春秋楚墓》，《考古》1998 年第 4 期。
曾昭岷、李谨：《曾国和曾国青铜器综考》，《江汉考古》1980 年第 1 期。
曾昭岷、李瑾：《随县擂鼓墩一号墓年代、国别问题刍议》，《武汉师范学院学报》1979 年第 4 期。
曾昭岷、李瑾：《随县擂墓断代补论——兼答郭德维君》，《武汉师范学院学报》1982 年第 2 期。
张昌平：《曾国铜器的分期及其相关问题》，《江汉考古》1992 年第 3 期。
张昌平：《曾国为缯——随说》，《江汉考古》1994 年第 4 期。
张昌平：《噩国与噩国铜器》，《华夏考古》1995 年第 1 期。
张昌平：《论湖北襄樊地区两周甲骨》，《考古与文物》1996 年第 5 期。
张昌平：《安居周代城址的发现及其意义》，《中国文物报》1998 年 8 月 26 日第 3 版。
张昌平：《楚鬲研究》，《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论文集》，湖北科技出版社，2001 年。
张昌平：《论殷墟时期南方尊与罍》，《考古学集刊》第 15 辑，文物出版社，2004 年。
张昌平：《早期楚文化中心区域的考古学观察》，《楚文化研究论集》第六集，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 年。

张昌平：《商周时期带铃铜容器》，周边与中心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台北，2006 年。
张昌平：《关于擂鼓墩墓群》，《江汉考古》2007 年第 1 期。
张昌平：《关于曾侯乙尊盘是否采用失蜡法铸造争论的述评》，《江汉考古》2007 年第 4 期。
张昌平：《曾侯乙墓玉器的改制》，《中国历史文物》2008 年第 1 期。
张昌平：《商周青铜器铭文的若干制作方式》，《文物》2009 年第 12 期。
张长寿：《虢国墓地的新发现》，《中国文物报》1991 年 3 月 17 日第 3 版。
张长寿：《论泾阳高家堡周墓》，《远望集上》，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 年。
张春龙等：《湖南出土的两件东周铜器铭文考释》，《中国历史文物》2004 年第 5 期。
张懋镕：《静方鼎小考》，《文物》1998 年第 5 期。
张亚初：《殷周青铜鼎器名、用途研究》，《古文字研究》第 18 辑，中华书局，1992 年。
张亚初：《殷周金文集成引得》，中华书局，2001 年。
张亚初、刘雨：《西周金文官制研究》，中华书局，1986 年。
张吟午、李福新：《湖北宜城骆家山一号墓出土的青铜器》，《江汉考古》1983 年第 1 期。
张振林：《试论铜器铭文形式上的时代标记》，《古文字研究》第 5 辑，中华书局，1981 年。
张正明：《汉淮之间——周代的一个文化交错地带》，《中原文物》1992 年第 2 期。
张正明等：《战国中期曾有佛教造像传入南楚》，《江汉论坛》2001 年第 8 期。
赵化成：《从商周“集中公墓制”到秦汉“独立陵园制”的演化轨迹》，《文物》2006 年第 7 期。
赵平安：《河南淅川和尚岭所出镇墓兽铭文解读》，www. bsm. org. cn 简帛网·楚简专栏，2006 年 5 月 17 日。
赵世纲：《淅川下寺春秋楚墓青铜器铸造工艺》，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淅川下寺春秋楚墓》附录二，文物出版社，1991 年。
赵世纲：《楚文化的形成时间》，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淅川下寺春秋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 年。
赵世纲：《曾侯乙钟与楚钟》，湖北省博物馆等《曾侯乙编钟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1992 年。
赵世纲：《虢国青铜器与虢国墓地的年代问题》，《河南文物考古论集》第 350－364 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 年。
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绍兴 306 号战国墓发掘简报》，《文物》1984 年第 1 期。
郑杰祥、张亚夫：《河南潢川县发现一批青铜器》，《文物》1979 年第 9 期。
郑杰祥：《河南新野发现的曾国铜器》，《文物》1973 年第 5 期。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上村岭虢国墓地》，科学出版社，1959 年。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工作队：《山东邹县滕县古城址调查》，《考古》1965 年第 12 期。
中国历史博物馆保管部：《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捐赠文物集粹》，长城出版社，1999 年。
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青铜器全集（6）》，文物出版社，1997 年。
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青铜器全集（7）》，文物出版社，1998 年。
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青铜器全集（8）》，文物出版社，1995 年。
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青铜器全集（10）》，文物出版社，1998 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小屯南地甲骨》，中华书局，1980 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1994 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 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张家坡西周墓地》，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 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曾侯乙墓青铜器所用低熔点焊料化学成分的检测》，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墓》附录一三，文物出版社，1989 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甲骨文合集》，中华书局，1978－1982 年。
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总编辑部：《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湖北卷》第 31 页，大象出版社，1999 年。
钟少异：《试论戟的几个问题》，《文物》1995 年第 11 期。
周卫荣等：《失蜡工艺不是中国青铜时代的选择》，《中国文物报》2006 年 7 月 21 日第 7 版。
周卫荣等：《中国青铜时代不存在失蜡法铸造工艺》，《江汉考古》2006 年第 2 期。
周卫荣等：《再论“失蜡工艺不是中国青铜时代的选择”》，《南方文物》2007 年第 2 期。
周亚：《伯遊父诸器刍议》，《上海博物馆馆刊》第十期，上海书画出版社，2005 年。
周亚：《关于晋侯苏鼎件数的探讨》，上海博物馆《晋侯墓地出土青铜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书画出版社，2002 年。
周亚：《晋韦父盘与盘盉组合的相关问题》，《文物》2004 年第 2 期。
周永珍：《曾国与曾国铜器》，《考古》1980 年第 5 期。
朱凤瀚：《古代中国青铜器》，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 年。
朱凤瀚：《论中国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关系》，《历史研究》2003 年第 1 期。
朱凤瀚：《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增订本），天津古籍出版社，2002 年。
邹衡：《晋始封地考略》，《尽心集——庆祝张政烺先生八十寿辰》，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 年。
邹衡：《论早期晋都》，上海博物馆编《晋侯墓地出土青铜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书画出版社，2002 年。
邹衡、徐自强：《整理后记》，郭宝均《商周青铜器群综合研究》第 201 页，文物出版社，1981 年。
左超：《关于曾国问题的补遗》，《楚文化研究论集》（第五集），黄山书社，2003 年。
左德田：《随州旭光砖瓦厂出土青铜器》，《江汉考古》1985 年第 1 期。
左德田：《曾都刍议》，《江汉考古》1990 年第 1 期。

二 西文文献

Bagley, Robert The Prehistory of Chinese Music Theory, 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 131, The British Academy, 2005.
——Transformation of the Bronze Art in Later Western Zhou, The Great Bronze Age of China: an Exhibition fro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dited by Wen Fong.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New York, 1980.
——Shang Ritual Bronzes in the 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s, Washington, 1987.
——Shang Ritual Bronzes: Casting Technique and Vessel Design, Archives of Asian Art, 43, 1990.
——What the Bronzes from Hunyuan Tell Us about the Foundry at Houma, Orientations, January 1995.
Baines, John Image and Picture in Egyptian Art, Art International, Vol. 1, Paris, 1987.

Barnard, Noel Bronze casting and Bronze Alloys in Ancient China.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and Monumenta Serica, 1961.

Chase, W. T.; Lee, J. May Ancient Chinese Bronze Art Casting the Precious Sacral Vessel, New York City: China House Gallery, 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 1991.

Falkenhausen, Lothar Von On the Historiographical Orientation of Chinese Archaeology. Antiquity 67. 257 (1993).

——The Bronzes from Xiasi and Their Owners.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考古学研究（五）·庆祝邹衡先生七十五寿辰暨从事考古研究五十年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03 年。

——The Waning of the Bronze Age,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 from the Origins of Civilization to 221 B. C. Michael Loewe and Edward L. Shaughnessy, editor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Suspended Music – Chime – Bells in the Culture of Bronze Age Chi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Fong, Wen The Great bronze age of China: an exhibition fro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London,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New York, 1980.

Gettens, Rutherford J. The Freer Chinese Bronzes, Volume Ⅱ, Technical Studies.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Washington, 1969.

Hargrove, Suzanne Technical Observations and Analyses of Chinese Bronzes, Ancient Chinese Bronzes in the Saint Louis Art Museum, St. Louis Art Museum. St. Louis, 1997.

Kane, Virginia C. The Independent Bronze Industries in the South of China Contemporary with the Shang and Western Chou Dynasties, Archives of Asian Art 28.

Li, Yung – ti The Anyang Bronze Foundries: Archaeological Remains, Casting Technology, and Production Organization. A Doctorial Dissertation from Harvard University, 2003.

Loehr, Max The Bronze Styles of the Anyang Period (1300 – 1028B. C.), Archives of the Chinese Art Society of America, 1953, 7.

Loveday, Helen Diversity in Eastern Zhou Bronze Casting: A Look at a Group of Openwork Vessels, Journal of East Asian Archaeology, Vol. 4 1 – 4, 2002.

Postgate, J. N. Early Mesopotamia: Society and Economy at the Dawn of History. Routledge, London and Now York 2007.

Rawson, Jessica Chinese Bronzes: Art and Ritual. British Museum Publications Ltd, London, 1987.

——Western Zhou Ritual Bronzes from the 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s, Washington, D. C. 1990.

Shaughnessy, Edward L. Western Zhou History.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 from the Origins of Civilization to 221 B. C. Michael Loewe and Edward L. Shaughnessy, editor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So, Jenny F. Eastern Zhou Ritual Bronzes from the Arthur M. Sackler Collections, Washington, D. C. 1995.

Thorp, **Robert L.** The Sui Xian Tomb: Re - Thinking the Fifth Century. Artibus Asiae, Vol, 43, No. 1/2. (1981).

Thote, **Alain**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as Seen from Chinese Pictorial Bronzes from the Fifth Century BCE, Res (Harvard University), Spring 1999.

Watt, **James C. Y.** The Arts of Ancient China,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Bulletin, Summer 1990.

Weber, **Charles** D. Chinese Pictorial Bronze Vessels of the Late Chou Period, Fig36 - 37, Artibus Asian, Switzerland, 1968.

三 日文文献

吉開将人:《會侯乙墓出土戟、戈の研究》,《東京大学文学部考古学研究室研究紀要》, 第 12 号, 东京, 1994 年。

林巳奈夫:《殷周青銅器銘文鑄造法に關する若干の問題》,《東方學報》第 51 册, 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 1979 年。

林巳奈夫:《殷周時代青銅器紋様の研究》, 吉川弘文館, 1986 年。

林巳奈夫:《春秋戰國时代青銅器の研究——殷周青銅器纵览三》, 吉川弘文館, 1989 年。

梅原末治:《戰國式銅器の研究》, 東方文化學院京都研究所, 1936 年。

内藤乾吉:《日本蒐儲支那古銅精華》(Ⅰ), 山中商會, 1959 年。

泉屋博古馆, 泉屋博古:《中国古銅器編》, 便利堂, 2002 年。

松丸道雄:《西周青銅器とその国家》, 東京大学出版會, 1980 年。

致　谢

工作多年重回北大，一方面固然是想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但更功利的考虑是想暂时逃离杂务缠身的工作单位，完成手头上的几个研究项目。在北大的三年，对于考古学的感悟和感情，较过去大有不同。这要感谢为我求学提供指导和帮助的北大诸位师友。

首先要感谢导师孙华先生。自我开始博士论文项目之始，孙华师就帮助制订学习计划，并说服我放弃原先打算一并进行的早期楚文化、殷墟时期南方青铜器等研究，而只专注于曾国青铜器。从编辑《曾国青铜器》图录，到论文阶段的《曾国青铜器研究》，我所受到的教益延伸到研究布局中的各个方面。孙老师学术上的博学与高效令我叹羡而不能企及，但更时时激起我的向学之心。

李伯谦、高崇文、刘绪、徐天进、苏荣誉等答辩委员也是我求教最多的专业老师。李伯谦先生是我考古学的启蒙老师，聆听先生教诲而每获愉悦之感，相信在考古界并非只是我一人的感受。本书能够出版，更仗李伯谦先生的全力推荐。高崇文老师着力的楚文化，与曾国青铜文化关系近密，因此他的学术观点对我影响良多。刘绪老师的指导意见多为平实之辞，但总能对问题提出周全的考虑。徐天进老师对学术敏锐且常伴有美妙的创意，我论文中的思路多有他的影响之处。他对论文的一些期望也是我进一步修改论文的动力。因为苏荣誉先生的引导，我对青铜器铸造工艺方面的知识由门外而至深厚的兴趣。同时也因为和苏先生多次合作的影响，使我感受到作为一名学者的快意人生。此外，感谢参加答辩的张长寿、朱凤翰先生。

马健、张海、袁艳玲、宝文博、朴载福、燕生东、冯峰、常怀颖、干小莉、万娇等小师弟师妹为我的论文提供了各种帮助，我也在与他们的讨论中受益匪浅。他们的年轻与才气更让我感受到中国考古学光明的未来。老友郭伟民与我同是在这个社会大潮中仍对专业有所追求的“另类”，与他在北大同学是件很高兴的事情。

北大的学习还应感谢赵辉、赵化成、葛英会、董珊、雷兴山、孙庆伟、胡东波、杨哲峰、韦正、金英、方月妹诸位师友的指导与帮助。

感谢普林斯顿大学唐氏东亚艺术中心（The P. Y. and Kinmay W. Tang Center for East Asian Art, Princeton University）谢百轲（Jerome Silbergeld）和贝格立（Robert Bagley）教授的访问邀请，使我有机会专心完成论文的修改。普林斯顿于学习、生活俱为

胜地，这所世界顶尖大学令人真正有享受学术的感受。贝格立教授对于学术的严谨风尚和献身精神、对学生的关爱和待人友善的态度，非亲身感受不能置信。在普林斯顿和贝教授讨论曾国青铜器的时间并不很多，但向他请教世界早期文明艺术乃至音乐知识的机会不少。因此一年的访问与其说是和贝教授合作研究，不如说是学习——贝氏的青铜器艺术风格分析方法令我仰慕已久，也是我深感应当作为青铜器研究的一个部分。

在普林斯顿期间，感谢经崇仪（Dora Ching）女士和史可安（Kyle Steinke）先生给予的许多帮助。感谢孙志新先生及夫人对我们一家在普林斯顿生活提供的种种便利。他们以及许多我认识的在美华人亲善、助人的态度，令人感动。

感谢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王红星先生的多方支持，特别感谢他对我转向学术的理解。

感谢刘庆平、黄建勋、陈千万、潘杰夫、熊学兵、徐正国、韩壮丽、李永迪、盛为人、周亚、马今洪、程存洁、华国荣、陈颜堂、田凯、曹玮、左超、姚晨辰诸先生为本书资料提供的方便。感谢郝勤建先生，书中未注明出处的图像多数为郝先生所摄。

回到国内或将改行教学工作，这个选择大约算是北大和普林斯顿对我最大的影响。感谢北大，感谢普林斯顿。

2008 年 6 月 26 日于普林斯顿

Aurora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Ancient Civilizations, Peking University
Publication Series, No.18

The Research on the Bronzes of the Zeng State

Zhang Changping

ISBN 978-7-5010-2747-7

9 787501 027477 >

定价：148.00元